



1980-1984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说月报

XIAOSHUOYUEBAO

30年

卷一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卷一

1980-1984

人到中年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蝴蝶
那五
射天狼
高山下的花环
锅碗瓢盆交响曲
美食家
迷人的海

西线轶事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陈奂生上城
丹凤眼
灵与肉
受戒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哦，香雪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谌容
张一弓
王蒙
邓友梅
朱苏进
李存葆
蒋子龙
陆文夫
邓刚

徐怀中
张弦
高晓声
陈建功
张贤亮
汪曾祺
冯骥才
梁晓声
铁凝
史铁生

ISBN 978-7-5306-5596-2



9 787530 655962 >

定价:60.00元

1980-1984

祖父在父亲心中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小說月報

XIAOSHUYUEBAO

[illegible]

雨季的感觉

卷一

1247.7

X378-3

蝴蝶

義伏羲

王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北京超越汽车在乡村的专卖店。ART-PUB

云, 雨里又听到, 真让人昏昏沉沉。发疯的咆哮咆哮的咆哮, 时间过去, 第一阵咆哮也不息响, 连续不断的咆哮, 这咆哮的, 含泪的咆哮吗? 这是幸福的, 这是幸福的吗? 天黑了, 也会听到咆哮的。就在一九五六年, 带着我快满四岁的女儿去冷食店吃冰棍, 当冬吃了一口豆腐、甜菜、苹果、香蕉又在商店里的冰棍店, 不是觉得快活吗? 为什么? 因为设计于千禧于使臣想起了第一次提到一只老鼠的小鼠鼠, 他羡慕的小鼠鼠, 不是这样自由地咆哮吗?

[illegibl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三十年. 第1卷, 1980~1984 /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306-5596-2

I. ①小…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305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7 插页 2 字数 664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60.00 元

总序

一

朗朗乾坤,神州大地,历经十年浩劫,百废待兴,积重难返。国人渴盼拨乱反正。小平高瞻远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振聋发聩,一扫阴霾!

斯时,国人除了腹中饥肠碌碌,文化生活贫瘠匮乏。十年间仅有八个戏,一本书。

于是,《伤痕》、《班主任》、《于无声处》等一批冲破樊篱的优秀作品一经发表,瞬间便传遍全国,人人争读,街谈巷议,一时传为佳话。

于是,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林呐先生倡议,经社委会充分论证并一致通过:《小说月报》便应运而生,于一九八〇年一月正式创刊。

刊物一经面世,首期发行三十五万册,一抢而空,二期发行五十余万册,三期即达一百一十余万册。由于争购者众,邮局不得不采取排号限订措施。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二

作为国内首创的文学选刊,从全国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择优拔萃,每月一期向读者汇报。创刊三十年来,忠实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创作历史和发展轨迹,见证了无数优秀作家的发现、成长和辉煌。更有数十万计的文学青年,数百万计普通读者的拥趸。《小说月报》一路走来,既有登临高峰的辉煌与自豪,

也有跌落谷底的沮丧与失落。从一九八二年的顶峰时的期发一百六十余万册，到一九八九年的期发九万余册。既有过五关，也有走麦城。斯时，国内几乎所有文学期刊的情形也大抵相似。

鄙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走马上任，履新之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率全体编刊人员，认真总结前辈及同业的经验教训，研判读者的审美取向变化。励精图治，殚精竭虑，锐意革新。从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三年，历经十年奋斗，刊物又逐渐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青睐。《小说月报》也由过去单一版本，期发十余万册，开发出四个版本，期发八十余万册，并延伸开发了五个系列品种图书，形成书刊互动，优势互补的产品链。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十余年苦尽甘来：蝉联三届国家期刊奖；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集体；天津市五一劳动模范奖状等称号。国家教委选订向海外中国留学生赠阅的唯一文学期刊等等。《小说月报》以其雅俗共赏的办刊风格，成为国内外文学界的专家、学者、评论家、作家，影视界的制片人、导演、编剧的案头首选，是国内发行量最大最为读者喜爱的文学期刊。

三

环顾当今世界，中国历经三十年高速发展，已成为首屈可数的政治经济大国，国外甚至有将中国与美国并称G2的，但中国不被忽悠，保持清醒头脑，埋头苦干，继续坚持科学发展之路，才是治国安邦乃至做人与办刊之道。

“您在有限的时间内，花有限的钱，便可及时读到全国最优秀的小说佳作。”

“一册在手，精览无余。”

“乘改革开放春风，述大众生活百态。”

这些曾经的宣传广告语，至今仍被《小说月报》编刊人捧为珍宝，视为经典，历久弥新，发扬光大！

陈津海

卷 一

(1980~1984)

中篇小说

人到中年	谌 容 003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063
蝴蝶	王 蒙 095
那五	邓友梅 139
射天狼	朱苏进 169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 197
锅碗瓢盆交响曲	蒋子龙 274
美食家	陆文夫 344
迷人的海	邓 刚 401

短篇小说

西线轶事	徐怀中 427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 弦 458

卷 一

(1980~1984)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471
丹凤眼	陈建功 479
灵与肉	张贤亮 493
受戒	汪曾祺 511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525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 533
哦,香雪	铁 凝 554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563
编后记	575
小说月报三十年总目录(1980~1984)	577

第四节 自相矛盾的宇宙观·····	150
第九章 前期法家的思想·····	159
第一节 慎到的“抱法处势”思想·····	159
第二节 申不害的“法”“术”思想·····	163
第三节 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	165
第四节 商鞅变法的思想内容·····	170
第十章 孟子的天人论和性善论·····	178
第一节 “尽心知天”的天人论·····	179
第二节 “良知良能”的认识论·····	185
第三节 “恻隐之心”的性善论·····	188
第四节 “寡欲养心”的修养论·····	194
第五节 “爱人行仁”的仁政论·····	197
第六节 “恒产保民”的经济论·····	202
第七节 历史地位及其思想影响·····	209
第十一章 庄子对道家思想的发展·····	211
第一节 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	211
第二节 天道自然无为的宇宙观·····	212
第三节 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220
第四节 自然纯朴的人性论·····	228
第五节 追求自由的人生论·····	233
第十二章 名辩思潮和名家的思想·····	238
第一节 名辩思潮的出现和名家的形成·····	238
第二节 邓析的名辩思想·····	239
第三节 惠施的“合同异”思想·····	246
第四节 公孙龙的“离坚白”思想·····	251
第五节 其他辩者的二十一事·····	261

中篇小说

人到中年

● 谌 容

一

仿佛是星儿在太空中闪烁,仿佛是船儿在水面上摇荡。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她想喊,喊不出声来。她想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眼前有无数的光环,忽暗忽明,变幻无常。只觉得身子被一片浮云托起,时沉时浮,飘游不定。

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

她记得,好像她刚来上班,刚进手术室,刚换上手术衣,刚走到洗手池边。对,她的好友姜亚芬是主动要求给她当助手的。姜亚芬的出国申请被批准了,他们一家就要去加拿大,这是姜亚芬跟自己一起做最后的一次手术了。

她们并肩站在一起洗手。这两个五十年代在医学院一起读书,六十年代初一起分配到这所大医院,同窗共事二十余载的好友即将天各一方,两人心情都很沉重。这种情绪在手术之前是不适宜的。她记得,自己曾想说些什么,调节一下这种离别前的惨淡的气氛。她说了些什么呢?对,她扭头问过:

“亚芬,飞机票订好了吗?”

姜亚芬说什么了?她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眼圈儿红了。

停了好久,姜亚芬才问了一句:

“文婷,你一上午做三个手术,行吗?”

她回答了吗?不记得了,好像是没有回答,只是一遍一遍地用刷子刷手。那小刷子好像是新换上的,一根根的鬃毛尖尖的,刺得手指尖好疼啊!她只看见手上白白的肥皂泡,只注视着墙上的挂钟,严格地按照规定,刷手、刷腕、刷臂,一次三分钟。她刷完三次,十分钟过去,她把双臂浸泡在消毒酒精水桶里。那酒精含量百分之七十五的消毒水好像是白色的,又好像是黄色的,直到现在,她的手

和臂都发麻,火辣辣的。这是酒精的刺激吗?好像不是的。从二十年前实习时第一次上手术台到如今,她的手和臂几乎已经被酒精泡得发白,并没有感到什么刺痛呀?为什么现在这手好像抬也抬不起来了?

她记得,已经上了手术台,已经给病人的眼球后注射了奴佛卡因,手术就要开始了,这时,姜亚芬却悄悄问了一句话:

“文婷,你小孩的肺炎好了吗?”

啊!亚芬今天是怎么啦?难道她不知道一个眼科大夫上了手术台,就应该摒弃一切杂念,全神贯注于病人的眼睛,忘掉一切,包括自己,也包括自己的爱人、孩子和家庭。怎么能在这时候探问小佳佳的病呢?或许,亚芬正为她将去到异国而不安,竟至忘掉了她正在协助手术?

陆文婷几乎有些生气了,只答了一句:

“现在我除了这只眼睛,什么也不想。”

于是,她低下头去,用弯剪刀剪开了病眼的球结膜,手术就进行下去了。

啊!手术,手术,一个接着一个,这天上午怎么安排了三个手术呢?焦副部长的白内障摘除,王小嫚的斜视矫正,张老汉的角膜移植。从八点到十二点半,整整四个半小时,她坐在高高的手术凳上,俯身在明亮的灯下,聚精会神地操作。剪开,缝合;再剪开,再缝合。当她缝完最后一针,给病人眼睛上盖上纱布时,她站起身来,腿僵了,腰硬了,迈不开步了。

姜亚芬换好了衣服,站在门边叫她:

“文婷,走啊!”

“你先走吧!”陆文婷站住不动说。

“我等你。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到医院来了。”

说着,姜亚芬的眼圈儿又红了。她那对漂亮的大眼睛水汪汪的,她是在哭吗?她为什么难过?

“你快回家收拾东西吧,刘大夫一定等你呢!”

“他都弄好了。”姜亚芬抬起头来,忽然叫道,“你,你的腿怎么啦?”

“坐久了,有点麻,一会儿就好了。晚上我去看你。”

“那,我先走了。”

姜亚芬走了,陆文婷退身到墙边,用手扶着白色瓷砖镶嵌的冰冷的墙壁,站了好一阵,才一步一步走到更衣室。

她记得,她是换了衣服的,是的那件灰色的布上衣。她记得她走出医院的大门,几乎已经走进了那条小胡同,已经望见了家门口。可是忽然,她觉得疲劳,一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极度的疲劳。这疲劳从头到脚震动着她,眼前的路变得模糊了,小胡同忽然变长了,家门口忽然变远了,她觉得永远也走不到了。

手软了,腿软了,整个身子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眼睛累了,睁不开了。嘴唇干了,动不了了。渴啊,渴啊,到哪里去找一点水喝?

她那干枯的嘴唇颤动了一下。

二

“孙主任,你看,陆大夫说话了!”一直守在病床边的姜亚芬轻声叫了起来。

眼科主任孙逸民正在翻阅陆文婷的病历,“心肌梗塞”四个字把他吓住了。他显得心事重重,摇了摇头,推了推架在高鼻梁上的黑边眼镜,不由联想到在他这个科里,四十岁左右的大夫患冠心病的已经不是一个了。陆文婷大夫才四十二岁,自称没病没灾,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心脏不好,怎么突然心肌梗塞?这多么出人意料,又是多么可怕啊!

听到姜亚芬的喊声,孙主任转过高大的,有些驼背的身躯,俯视着面色苍白的陆文婷大夫,只见她双目紧闭,鼻息微弱,干裂的唇动了一下,闭上了,又歛动了一下。

“陆大夫!”孙逸民轻轻地喊了一声。

陆文婷又一动不动了。她那瘦削的浮肿的脸上没有一点反应。

“陆大夫!文婷!”姜亚芬低声唤着。

陆文婷依旧没有反应。

孙逸民抬头望着阴森森竖在墙角的氧气筒,又盯着床头的心电监视仪。当他看到示波器的荧光屏上心动电描图闪现着有规律的QRS波时,才稍许放心。他又扭过头看了看病人,挥了挥手说:

“快去叫她爱人来!”

一个中等身材,面目英俊,有些秃顶的四十多岁的男同志跑了进来。他是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守在床边,没有合过眼,刚才孙主任来,劝他到病房外边的长椅上去歇一会儿,他才勉强离开。

这时,孙逸民忙闪开床头的位置,傅家杰过来,俯身在陆文婷的枕边,紧张地盯着这张曾经那么熟悉,现在又变得那么陌生的白纸一样的脸。

陆文婷的嘴唇又微微动了一下。这无声的语言,没有任何人能听懂,只有她的爱人明白了:

“快拿水来!她说她渴!”

姜亚芬赶忙递过床头柜上的小瓷壶。傅家杰接过来,小心地绕过输氧的橡皮管,把壶嘴挨在那像两片枯叶似的唇边,一滴一滴的清水流进了这垂危病人的口中。

“文婷，文婷！”

傅家杰喊着，他的手抖着，瓷壶里的水珠滴到了那雪一般惨白的脸上，她似乎又微微动了一下。

三

眼睛，眼睛，眼睛……

一双双眼睛纷至沓来，在陆文婷紧闭的双眸前飞掠而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的，小的；明亮的，浑浊的，千差万别，各不相同，在她四周闪着，闪着……

这是一双眼底出血的病眼，

这是一双患白内障的浊眼，

这是一双眼球脱落的伤眼。

这，这……啊！这是家杰的眼睛！喜悦和忧虑，烦恼和欢欣，痛苦和希望，全在这双眼睛中闪现。不用眼底灯，不用裂隙镜，就可以看到他的眼底，看到他的心底。

家杰的眼底清澈明亮，就像天上金色的太阳。家杰的心底是火热的，他曾给她多少温暖啊！

是他的声音，家杰的声音！那么亲切，那么温柔，却又那么遥远，好似从九天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飘来：

我愿意是激流，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这是在什么地方？啊，是在一片银白色的天地中。冰冻的湖面，水晶一般透明。红的、蓝的、紫的、白的身影在冰面上飞翔。那欢乐的笑声啊，好似要把这透明的宫殿震穿！她和他也手拉着手，穿梭在人流里。笑脸，一张张的笑脸，她都看不见，她只看见他。他们并肩滑翔着，旋转着，嬉笑着，那是多么快乐的日子啊！

银装素裹的五龙亭，庄严古老，清幽旷寂，她和他倚身在汉白玉的亭台栏杆旁。片片雪花打在他们脸上，戏弄着他们的头发。他们不觉得冷，四只手紧紧地

握在一起，傲视着这冷峻无情的严寒。

那时她是多么年轻！

她没有幻想过飞来的爱情，也没有幻想过超出常人的幸福。从小，她就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幼年父亲出走，母亲在困苦中把她抚养成人。她不记得曾有过欢乐的童年，只记得一盏孤灯伴着早衰的母亲，夜夜剪裁缝补，度过了一个冬春。

进了医学院，她住女生宿舍，在食堂吃大锅饭。天不亮，她就起床背外语单词。铃声响，她夹着书本去听课，大课小课，密密麻麻的笔记。接着是晚自习，然后在解剖室待到深夜，她把青春慷慨地奉献给一堂接着一堂的课程，一次接着一次的考试。

爱情似乎与她无缘。姜亚芬是她同班同学，两人同住一间宿舍。姜亚芬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有一张迷人的小嘴；有修长的身材，有活泼的性格。每个星期，她都会收到不能公开的来信；每个周末，她都有神秘的约会。而陆文婷却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来信，也没有约会。她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少女。

当她和姜亚芬一起被分配到这所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著名的大医院时，医院向她们宣布了一条规定：医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到本院先当四年住院医。在任住院医期间，必须二十四小时待在医院，并且不能结婚。

姜亚芬背后咒骂“这简直是修道院”，陆文婷却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苛求。二十四小时待在医院，这算什么？她恨不得一天有四十八小时献给医院！四年之内不能结婚，这又算得了什么？医学上有成就的人，不是晚婚就是独身，这样的范例还少吗？小陆大夫把自己全身的精力投入了工作，兢兢业业地在医学的大山上登攀。

然而，生活总是出人意料的。傅家杰忽然闯进了她那宁静的，甚至是刻板的生活里来。

这是怎么回事？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她一直闹不明白，她也没有去闹明白。他因为突然的眼病来住院了，恰巧是她负责的病人。她为他治好了眼睛。也许，就在她认真细巧的治疗中，唤起了他的另一种感情。这种感情蔓延着，燃烧着，使得他们两人的生活都改变了。

北国的冬天多么冷啊！那年的冬天对她又是多么温暖！她从来不曾想到，爱情竟是这样的迷人，这样的令人心醉！她简直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早去寻求？那一年，她已在人世间经历了二十八个春天，算不得年轻，然而，她的心却是年轻的。她用整个纯洁的身心来迎接这迟到的爱情。

我愿意是荒林，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林间做窝、鸣叫.....

这简直不可思议。傅家杰是学冶金的。他在冶金研究所里专攻金属力学，据说是为“上天”研制新型材料的。他有点傻气，有点呆气，姜亚芬就说他是“书呆子”。可是，这个书呆子会念诗，而且念得那么好！

“这是谁的诗？”她问他。

“裴多菲，匈牙利的诗人。”

“真怪，你是搞科学的，还有时间读诗？”

“科学需要幻想，从这一点说，它同诗是相通的。”

谁说傅家杰傻？他回答得很聪明。

“你呢？你喜欢诗吗？”他问她。

“我？我不懂诗，也很少念诗。”她微笑着略带嘲讽地说，“我们眼科是手术科，一针一剪都严格得很，不能有半点儿幻想的……”

“不，你的工作就是一首最美的诗。”傅家杰打断她的话，热切地说，“你使千千万万人重见光明……”

他微笑着挨近她，脸对着脸，靠得那么近。她从未感到过的男人的热气，猛烈地飘洒在她脸上，使她迷惑，使她慌乱。她觉得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他伸开双臂，那么有力地把她拥进自己的怀里。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她惶恐地望着这双贴近的含笑的眼睛，张开的双唇。她心跳神驰，微仰起头，下意识地躲闪着，慌乱地紧闭了眼睛，承受着这不可抗拒的爱情的袭击。

雪中的北海，好像是专为她而安排。浓浓的雪花，纷纷扬扬，遮盖着高高的白塔、葱葱的琼岛、长长的游廊和静静的湖面，也遮盖着恋人们甜蜜的羞涩。

于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四年住院医的独身生活结束之后，陆文婷最先举行了婚礼。这只能说是命运的安排，谁能想到在她生活的路上会跳出一个傅家杰来？他要结婚，她怎么能拒绝呢？你看他多么固执地追求着，渴望着，愿意为她牺牲一切——

我愿意是废墟，

.....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春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多好啊，生活！多美啊，爱情！这久远的往事重现在脑际，使得垂危中的她似乎有了生的活力，她的眼睛微微启开了一下。

四

在服用了大量镇静和镇痛的药物之后，陆文婷大夫仍在昏睡。内科主任亲自自来为她做了检查。他仔细听了她心脏和肺部的情况，看了心动电描图和病房记录，嘱咐值班大夫继续为病人静脉滴注极化液，注射罂粟碱和吗啡，密切监视心电图变化，以防止梗塞面扩大和发生严重的合并症。

走出病房，内科主任对孙逸民说道：

“她的体质太弱了。我记得，陆大夫刚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身体很好嘛！”

“是啊！”孙逸民摇摇头，叹息着说，“她到我们医院，算来有十八年了。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啊！”

十八年前，孙逸民已经是一位享有盛名的眼科专家了。他高超的医术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赢得了眼科全体大夫的敬畏。这位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教授，把培养年轻医生当作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每当医学院分来一批学生，他都要逐个考察，亲自挑选。他认为，要把这所医院的眼科办成全国最好的眼科，必须从挑选最有前途的住院医开始。

陆文婷是怎么被他挑上的呢？他记得很清楚。最初，这个二十四岁的医学院毕业生并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天一上午，孙主任已经同五个新分配来的大学生谈了话，心里感到非常失望。这五个大学生，有的很适宜搞眼科，可是看不起眼科，表示不愿意在眼科工作；有的倒是愿意在眼科，可又把眼科看得很简单，以为这是很清闲的一科。当他拿起第六份档案，看到陆文婷这个名字时，他感到有点累，也并不期待还能出现奇迹。他心里想的是应该改进医学院的教学工作，使学生从一开始对眼科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这时，门悄悄地推开。一个苗条的女生轻步走了进来。孙逸民抬起头来，只见进来的这个女学生穿一身布衣布裤，袖口补着一圈新布边，长裤的膝盖处已经发白。她是朴素的，甚至显得有些寒伧。孙逸民望着档案袋上“陆文婷”三个

字,又抬头漫不经心地打量了她一眼。这个女大学生看起来真像一个小姑娘。她小巧的身子,瓜子形的脸儿,一头乌黑透亮的好头发,短短地剪齐在耳垂下。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安静得像一滴水。

孙主任照例问了一般学业上的问题。陆文婷一一回答了,但只限于回答,没有更多的话。

“你愿意在眼科吗?”孙逸民几乎决定草草结束这谈话了。他手臂撑在桌沿上,用手指揉着太阳穴,疲倦地问道。

“愿意。我在学校的时候就对眼科有兴趣。”她说话略带南方口音。

这个回答,使孙逸民那么高兴。他松开了按在太阳穴上的手指,好像额头不那么涨痛了。他立刻改变了主意,要把谈话认真地进行下去。他审视着这女学生,问道:

“为什么有兴趣呢?”

话一出口,他自己感到这个问题提得不好,叫人家太难回答了。不想,那女学生却不慌不忙地回答了:

“我们国家的眼科太落后了……”

“好,你讲讲看,怎么落后?”孙逸民简直是急急地在问了。

“我也讲不好,反正我觉得,有些手术,外国已经搞开了,我们还是空白。比如,用激光封闭视网膜破口。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尝试的。”

“是啊!”孙逸民在心里已经给这个学生打了“五”分。他又问道,“还有呢?还有什么想法?”

“还有……嗯……用冷冻摘除白内障,也应该普遍推广。反正我觉得,有很多新的课题,值得研究。”

“好啊,你讲得很好。你能看外文资料吗?”

“查字典看,很吃力。我喜欢外语。”

“这太好了。”

孙逸民主任在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面前连连赞好,这是绝无仅有的。过了几天,陆文婷和姜亚芬首先被眼科要了来。如果说姜亚芬以她的聪慧、热情、精干被孙逸民挑上,那么,陆文婷就是以她的朴实、深沉、敏锐而被选中。

第一年,她们做外眼手术,熟读眼科学。第二年,她们做内眼手术,读屈光学和眼肌学。第三年,她们能做比较精细的白内障之类的手术了。这一年,有一件事更使孙主任对陆文婷大夫另眼相看。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星期一,孙主任查病房来了。穿白大褂的各级大夫跟了一群。病人怀着急切的心情,都早已坐好在床上,翘首盼望这位有名的教授给自己看上一眼。好像他的手一按到自己的眼睛上,那病就会好似的。

每到一个床位,孙主任总是接过从背后递上来的病历,一边翻阅着,一边听主治大夫或高年大夫汇报诊断与治疗的情况。有时他掰开病人的眼皮瞧上一眼,有时他拍拍病人的肩膀,嘱咐病人手术时不要紧张,然后转到下一个床位。

查完病房之后,照例有一个短会,交换意见,安排工作。在这样的会上,通常都是孙主任和主治大夫们发言,住院医只用心地在一边听着,谁也不敢说什么,怕说错了在这些眼科权威们面前出乖露丑,日后成为全科的笑料。这一次也是如此,该说的说完了,该布置的布置了。孙逸民准备走了,他站起来问: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这时,在屋子角落里,响起了一个很低的女同志的声音:

“四室三床的病人,请孙主任再看看片子。”

满屋的人都朝说话的方向转过头去。孙逸民也看清了,说话的是陆文婷大夫。她确实长得个子不高,而且很不显眼。刚才查房时,孙逸民就没有注意到尾随在自己身后的还有这个住院医。后来进了办公室,谈了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有注意到参加会的还有这个陆文婷大夫。

“三床?”孙逸民侧过脸望着总住院医生。

“三床是工伤。”总住院医答道。

“门诊收住院时,给他照过片子。”陆文婷说,“放射科的报告是未见金属异物。住院后,伤口缝合了,病人还是嚷痛。我又给他做了无骨照相,我认为确实有异物。请孙主任再看看。”

片子被取来了。孙主任看了,在场的总住院医和主治大夫们都轮流看着。

姜亚芬直拿大眼瞪自己的同学,心说:你不会等会后再给孙主任看,万一你判断错了,就在全科闹下话柄;就算你诊断对了,那也等于说人家门诊的大夫不够仔细,人家可是主治大夫呀!

“你的看法对,是有异物。”孙逸民又接过片子来,点着头。然后,他环视着在场的大夫说道,“陆大夫到眼科不久,肯钻研业务,对工作认真细致,这是很可贵的。”

听到这话,陆文婷反低下了头。她没有想到孙主任会当众表扬自己,一时脸红了。孙主任看着她那神情却微微笑了。他也很明白,这个住院医敢于对主治医的诊断怀疑,不仅要有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还需要极大的勇气。

医院与别的单位不同,一级一级,等级森严。这倒也没有什么明文规定,然而,低年大夫要服从高年大夫,住院医要听主治医的,教授、副教授的意见则是不容辩驳的,如此等等。这个还算不上高年大夫的陆文婷竟然能对主治医的诊断提出不同看法,不能不引起孙逸民格外的重视。

“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眼科大夫。”从那时起,孙主任就对陆文婷下了这样

的断语。

如今,转瞬之间十八年过去了。陆文婷、姜亚芬这批大夫,已经成为这所医院眼科的骨干。按规定,如果凭考试晋升,她们早就应该是主任级大夫了。可是,实际上她们不仅不是主任级大夫,连主治大夫都不是。她们是十八年一贯的住院大夫。文化革命砍断了她们晋级的阶梯,粉碎“四人帮”后的春雨还没有来得及洒到这些多年住院医的身上。

“一茎瘦草!”望着奄奄一息的陆文婷,一种怜悯之情,从他心中油然而生。孙逸民拉住内科主任问道:

“你看她,还不至于……”

内科主任回头朝病房望了望,叹了口气,又摇着头低声说:

“孙老,只希望她很快脱离危险吧!”

孙逸民忧心忡忡地又回身往病房走来。他的步履变得沉重,看上去真是老态龙钟了。到门边,他一眼看见姜亚芬还偎在陆文婷枕边,就站住了,没有前去惊动这两个挚友。

深秋天气,昼短夜长。五点多钟,天已经暗了下来。秋风吹动着窗外的梧桐树叶,沙沙地响。一片、两片、三片……枯黄的叶儿在秋风中飘落了。

孙主任眼望窗外飘泊落下的黄叶,耳听那如泣如诉的沙沙沙的声响,感到一阵从来未曾有过的怅惘。他面前的这两位骨干,两名有造就的眼科医生,一个已经倒下去了,能不能再站起来,尚不可知;一个即将离去,能不能再回来,亦不可料。她们是支撑着这著名医院眼科的两根柱子。撤掉了这两根柱子,他感到整个眼科就如同那秋风中的梧桐,正在一天天地衰落下去。

五

朦胧之中,陆文婷大夫觉得自己走在一条漫长的路上,没有边际,没有尽头。

这不是崎岖的山路。山路尽管险峻难攀,却是千回百折,令人意气风发。这也不是田间的小道。小道尽管狭窄难行,却有稻花飘香,令人心旷神怡。这是一步一坑的沙滩,这是举步难行的泥潭,这是无边无沿的荒原。极目远眺,人迹渺无,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啊!多么难走的路,多么累人的路!

歇下来吧,躺下来吧!沙滩是和暖的,泥潭是柔软的。让大地温暖你冰冷的身躯,让春光抚摸你劳累的筋骨。她好像听见死神在冥冥之中低声轻唤着她的名字:

“安歇吧,陆大夫!”

啊！这么歇下来多么好，永远歇下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知道。没有烦恼，没有悲伤，没有劳累。

可是，不行啊！在那漫长道路的尽头，病人在等着她。她好像看见了，那病人正因双目刺痛辗转不安。她好像看见了，那病人在面临失明的威胁而暗自饮泣。她看见了，看见了一双双望穿秋水的焦急的眼睛，在等着她，等着她的来临。她耳边只听见病人在绝望中的呼喊：“陆大夫！陆大夫！”

这是神圣的召唤，这是不可抗拒的命令。她抬起麻木的双腿，继续在长长的路上艰难地行走。从家门到医院，从门诊到病房，从这个医疗点到那个巡回的地方，每天，每月，每年，走啊走啊……

“陆大夫！”

这又是谁在喊呢？好像是赵院长的声音。对了，是他来的电话。她记得，她在门诊护士长的台前放下了电话，把没有看完的病人交代给同诊室的姜亚芬，就向院长办公室走去了。

从眼科门诊到院长办公室，要经过一个小花园。她快步踏着园中小石子儿铺成的甬道，简直没有留心到那满园的菊花娇娜万朵，黄白争艳；也没有感到那从桂花树上飘来的阵阵清香；更没有看到那双双的蝴蝶在花丛中戏舞翩翩。她只想赶快走到院长办公室，赶快办完事，赶快回诊室。一上午要看完十七个病人，今天她才叫了七个号。明天就该轮到她去病房，门诊还有些病人需要交代安排。

她很快就到了院长办公室的门前，她记得自己好像没有敲门，就推开门径直往里走。立刻，她看见了迎面沙发上坐着的一男一女两位客人。她不由在门边站住了，以为自己来得不是时候，转眼才看见赵院长斜身坐在皮转椅上。

“陆大夫，请进来呀！”赵院长回身笑着招呼她。

她走了进去，在靠窗的一把皮靠背椅上坐下了。

那间屋子好亮啊！又清洁又宽敞。那间屋子好静啊！没有门诊部那种杂乱的脚步声、乱哄哄的说话声和小病人的哭叫声。坐在那窗明几净的房间里，她感到一种异样的，很不习惯的恬静。

坐在那里的人们，也是那么温文尔雅，安安静静。赵院长总保持着学者的风度，挺直的脊背，和蔼的面容，金丝眼镜后面一双含笑的眼睛，头发梳理得很整齐。雪白的衬衣，乌黑的皮鞋，一身笔挺的浅灰色中山服。

那坐在沙发上的男客身材颀长，两鬓斑白，戴一副茶色眼镜，使人看不见他的目光。但是陆文婷一望而知，这是一位眼科的病人。只见他斜倚在沙发靠背上，无意地摆弄着身边的手杖，心平气和，举止安详。

坐在他身旁的女客五十多岁的样子。尽管上了年纪，仍是眉清目秀。染过的

黑发经理发师稍稍冷烫过,既蓬松又不显轻浮时髦,十分得体。身上穿的是普通式样的干部服,但质地考究,剪裁合身,显得很有精神。

她记得,从自己一站在门口,这位女客的目光就跟踪着自己,从上到下地打量。而反映在那女客脸上的则是一种明显的疑虑、不安和失望。

“陆大夫,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焦副部长焦成思同志。这位是成思同志的爱人秦波同志。”

焦副部长?部长?是啊,在她十几年的医生生涯中,她曾为多少部长、书记、主任治过眼睛。她没有注意到这职称,只是习惯地想:他的眼睛怎么了?好像是失明?

“陆大夫,你现在是在门诊还是在病房?”赵院长问。

“今天还在门诊,明天就该上病房了。”

“正好。”赵院长笑道,“陆大夫,焦部长想在我们这儿做白内障手术。”

病情就是敌情。这一句话就等于把任务交给她了。她开始问诊了:

“是一个眼睛吗?”

“一个。”

“哪只眼睛?”

“左眼。”

“完全看不见了吗?”

那病人点了点头。

“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吗?”

她记得,病人说了一个什么医院的名字。她就站了起来,准备走过去看那只眼睛。可是,好像出了什么事,没有看成。为什么没有看成呢?记起来了,是坐在一旁的秦波同志客客气气地把她拦住了。

“陆大夫,你先坐,坐嘛,不要急。要检查,恐怕还要到你们的暗室里去吧!”秦波笑了笑,又扭头说,“赵院长,老焦的眼睛一有病,我也成半个眼科大夫了。”

就这样,当时没有给焦副部长诊断。可是,在那间办公室坐了那么久,谈了些什么呢?对,秦波同志问了好些问题,问得真仔细啊!

“陆大夫,你在医院工作几年了?”

几年?她一时算不清了,她只记得自己是哪年毕业的,就那么回答了:

“我是六一年来的。”

“啊,六一年,那也有十八年了。”

秦波屈指算着,十分认真的样子。

她问这些干什么?只听赵院长从旁说道:“陆大夫临床经验很丰富,手术做

得很漂亮。”

赵院长为什么要当着病人这么夸赞自己？这有什么必要呢？

秦波同志又问道：

“你身体好像不大好，陆大夫？”

这又是什么意思？她整天给别人治病，很少研究自己的健康。本院的保健科甚至没有她的病历档案，也从未有上一级的领导问过她的身体状况。怎么面前坐的这位初次见面的客人忽然关心起自己的身体来了？她迟疑了一下，记得是回答说：

“我身体很好。”

赵院长在一旁又说话了：

“她在咱们这儿，就算身强力壮的了。陆大夫，我记得，你这几年一直是全勤。”

她没有回答。她闹不明白，全勤不全勤，身体好不好，和面前的这位夫人有什么关系呢？她记得，当时只是很着急，担心姜亚芬一个人看不完那些病人。

那夫人盯着她，笑了笑，又问道：

“陆大夫，对于白内障手术，你有把握吗？”

把握？又是一个叫人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确，在她做过的多少次白内障摘除手术中，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的事故。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如果病人配合得不好，或者麻醉的大意，都可能使眼内溶物脱出。

她不记得自己回答没有了，只记得秦波那一双包在皱褶里的眼睛，那双眼睛很大，闪着两道不信任的亮光，盯着自己一眨也不眨。这使她感到难以忍受。她接触过各式各样的病人，感到最难缠的就是一些高干夫人。不过，她接触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当她正考虑怎么委婉答复时，她记得，就在这时，焦副部长不耐烦地把身子在沙发上挪动了一下，朝秦波那边扭过头去。这一来，那夫人不说话了，眼睛也从自己身上移开了。

这场很难进行下去的谈话是怎么结束的呢？不记得了。对了，是姜亚芬跑来了，她探进半个身子，叫道：

“陆大夫，你约的那个张大爷又来了，他非等你不可。”

记得秦波立即客气地说：

“陆大夫有事，那就先忙去吧！”

她赶忙起身离开了这间明亮宽大的办公室，只感到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叫人透不过气来。

啊！多么憋闷！

六

赵天辉院长赶在下班前,匆匆忙忙来到内科病房。

“孙老,陆大夫身体一向不错,怎么突然就病倒了?”赵天辉两手插在白大褂的衣兜里,一边同孙逸民谈着,一边向病房走去。他比孙逸民小八岁,看上去却年轻得多,声音也洪亮得多。

“这是一个信号啊!”赵天辉摇摇头又说,“中年大夫,是我们医院的骨干力量,工作上担子重,生活负担也最重,身体素质一年不如一年,长此以往,一个个病倒了,你这位主任,我这个院长就没法办了。陆大夫家里几口人?住几间房?”

他侧身看了看心情沉重、面带愁容的孙逸民,又说:

“什么?四口人一间房?是啊,是啊,是这个情况。工资呢?工资多少?五十六块半?你看,你看,难怪人家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真是一点不假。嗯,去年调工资,怎么没给她调?”

“僧多粥少,调不过来。”孙逸民冷冷地说。

“唉,真是个问题啊!孙老,我看就请你和支部的同志商量一下,在眼科搞个中年大夫的调查,他们的工作情况,收入情况,生活情况,还有住房情况,搞个材料给我!”

“这有用吗?我记得这种材料,开科学大会的时候就让写过,交上去不也就完了。”孙逸民客气地反驳着,眼睛看着地面,不看身边的人。

“孙老,你就不要带头发牢骚了嘛!有个材料总比没有材料好。我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去,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这张状子递上去。中央三令五申,要珍惜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科技人员待遇,总不能到了下边就变成一句空话吧!前天还传达市委开会的精神,要重视中年干部,我还是相信,有办法的,会解决的。”

赵天辉挽着孙逸民的手臂,跨进陆文婷的病房,才停了话头。

傅家杰早已站了起来,赵天辉冲他挥了挥手,就一直走近床边,弯下腰去,端详着病人的脸色,又从值班大夫手上接过病历。这时,他已经丢掉院长的身份,进入大夫的角色。

赵天辉是国内著名的胸科专家。全国解放时,他在国外学成归来,以自己精湛的医术服务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他的政治热情很高,五十年代中期就被视为又红又专的典范,入了党,后来又被任命为院长。自从担任了这个行政职务,一大堆行政管理事务和会议压下来,使他除了参加重要的会诊,就很少有机会接触病人了。那十年,住“牛棚”、扫院子,自然谈不上发挥他的专长,这三年又处

在拨乱反正的特殊历史时期,身为一院之长,每天处理成堆的问题,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上手术台了。

现在,赵院长亲自来到病房,显然是为陆大夫看病来了。内科病房的大夫都被吸引了出来,在他身后围了一圈,悄悄地观摩他的临床诊断。

然而,他似乎有些令人失望。他看完病房记录和心电图记录,又看了看心电图监视仪的荧光屏,只嘱咐要继续密切监视心电变化,防止出现合并症,就回头问孙逸民:

“她爱人来了吗?”

孙逸民把傅家杰拉到前边来作了介绍,赵天辉才知道他原来就是陆大夫的爱人。他打量着傅家杰,一眼就看到他的秃顶和额前的皱纹,心里有点奇怪,这个面目清秀的中年人怎么已经开始秃顶?看来,他不大会保养身体,当然也就不会知道怎样爱护自己的妻子。

“你要多辛苦了。”赵天辉握了握他的手说,“陆大夫需要绝对静卧,不能让她动,大小便,翻身,都要人,应该二十四小时都有专人护理。你在哪儿工作?需要跟你们单位领导讲一讲,这几天你不能上班了。当然,你一个人也不行,还得有人替你。你们家还有什么人没有?”

傅家杰摇摇头说:

“有两个孩子,都还小。”

赵天辉回头问孙逸民:

“眼科能不能抽人值班啊?”

“一天两天,当然是可以的。”孙逸民说,“长期值下去,人力就安排不过来了。”

“先顾眼前吧!”

赵天辉又回头凝望着陆文婷苍白的瘦脸,心里简直不能明白,这个以精力旺盛著名的小陆大夫,怎么突然间就病成这样?

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是给焦副部长做手术,心里过于紧张了?不可能呀!陆大夫不是一个新手,即使是个新手,也很少发生因手术时精神负担过重,导致心肌梗塞。更何况,心肌梗塞的发病常常来得很突然,不一定有什么诱发因素。

他想排除这种念头,但是,不行。不知为什么,焦副部长的手术和陆大夫的病总是绞在一起,好像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甚至有些后悔,当初不该竭力推荐她。而且事实上,那位副部长夫人从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她做手术。

“赵院长,我想问一下,陆大夫是副主任吗?”那天,陆文婷走后,秦波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不是。”

“那么,她是主治大夫吗?”

“不是。”

“是党员吧?”

“也不是。”

“我的同志哟!”秦波不大客气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恕我直言,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来给焦部长动手术,这,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

她的话被焦成思手杖“笃、笃”戳地的声音打断了。焦副部长把头扭向他夫人这边,生气地说:

“秦波,你说些什么?听医院安排嘛!谁做不都一样。”

秦波并不屈服,她向焦成思开起连珠炮来:

“老焦,我就不赞成你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这是对自己的眼睛不负责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对革命负责,对党负责!”

眼看老首长两口子要开战,赵天辉不得不过来劝解。他笑道:

“秦波同志,请你相信我们。陆大夫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夫,却是我们眼科的一把好刀。她做白内障手术是很有把握的,请放心吧!”

“不是我不放心。赵院长,也不是我替老焦考虑过多。”秦波叹口气说,“我在干校的时候,有个老同志,也是白内障。当时,不准他回北京,就在当地一个小医院开刀。结果,手术没做完,眼珠掉出来了。赵院长,老焦被‘四人帮’关了七年,刚出来工作不久,他可不能没有眼睛啊!”

“不会的,秦波同志,我们医院很少有这样的事。”

秦波考虑了一下,还是力争着:

“赵院长,能不能请眼科孙主任亲自替老焦动这个手术?”

赵天辉摇摇头,笑了笑说:

“孙主任已经快七十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行了。再说,他已经好几年没上手术台。他现在的任务是搞点学术研究,带好这一批中青年大夫,还有教学的任务。让他做手术,老实说,还不如让陆大夫做更有把握。”

“要不,请郭大夫做,行不行?”

“郭大夫?”赵天辉一愣。

看来,这位副部长夫人对这里的眼科很做了一番调查。她提示说:

“郭汝清。”

赵天辉两手一摊说:

“郭大夫出国了。”

秦波仍不罢休,她急切地问:

“他什么时候回国？”

“不回国了。”

“为什么？”秦波瞪大眼问道。

赵天辉把头摇了摇，叹道：

“郭大夫的爱人是个归国华侨。她父亲在东南亚开一间杂货铺，不久前病故了。两个月以前，他们申请出国继承遗产，被批准走了。”

“放着大夫不当，去当杂货铺老板，简直不可理解。”焦成思感慨地说。

“在卫生界，这已经不是个别的了。拿我们医院来说，已经批准出国和正在申请要走的，就有好几个了。而且，还都是我们医院的骨干，业务上拿得起来的呀！”

“这些人，真不知是什么想法？”秦波颇有些愤愤然了。

焦成思把手中的拐杖扬了扬，脸向着赵天辉，说道：

“五十年代初，你们这批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阻力，回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想不到七十年代末，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往外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这么下去怎么得了？”秦波说，“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哟，粉碎‘四人帮’以后，知识分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随着四化的实现，生活条件、学习条件都会改善的嘛。”

“是啊。我们党委讨论的时候，也是这个看法。”赵天辉说，“郭大夫走之前，我代表党委找他谈过两次，再三表示挽留，可是没有用啊！”

秦波还想发点议论，焦成思晃了晃自己的手杖拦住她说：

“赵院长，我来找你们，倒不是非想找个什么专家教授。我对你们医院信得过，或者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前几年，我右边这只眼睛白内障，就是在你们医院做的，手术很不错。”

“哦！那是谁做的？”赵天辉忙问。

焦成思深为遗憾地说：

“可惜啊，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姓什么。”

“那好办，查一查病历就知道了。”

赵天辉拿起电话，他想，只要把那位大夫找来，焦副部长的夫人总该放心了吧！

焦成思对赵院长连连摆手说：

“你不用查了，你也查不到。那时是在你们门诊做的手术，根本没有病历。只记得，是个女同志，说话带南方口音。”

“这就不好找了。”赵天辉放下电话，笑道，“我们这里南方口音的女同志很多，陆大夫就是南方人。就让她做吧！”

当秦波扶着焦副部长站起来时,他们接受了赵院长的意见,让陆文婷大夫来给做这个手术。

也许,就因为这个手术使她心肌梗塞?赵天辉自己想着,又摇摇头,觉得不可能。这样的手术她做过上百次了,不会那么紧张。再说,那天手术前自己还亲自去了,他看见这位女大夫走上手术台时从容不迫,很有信心,精神也很好。怎么可能发生这样意外的不测呢?

赵天辉又把关切的目光停留在陆文婷脸上。他感到,即便是在这生死线上,陆文婷大夫的脸色仍是从容的,好像没有什么病痛,只是安安静静地酣睡在溫柔的梦乡。

七

她素来是从容的,沉静的。想让陆文婷大夫生气,在眼科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几乎是不可能的。

秦波对她的挑剔和轻侮,换了别人,十有八九会当面顶撞,即使不说出口,也会怒形于色,或者过后愤愤不平,耿耿于怀。陆文婷呢?她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心平似镜,一如往常。她没有把替焦副部长做手术,看作是不可多得的荣誉;也没有把秦波的刁难,视为难以忍受的凌辱。手术做不做,要看病人自愿,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不做,这有什么呢?

“怎么,又找你做手术,什么大官儿呀?”姜亚芬见她出来,便悄悄问道。

“还没定做不做呢。”

“快走吧!”姜亚芬拉着她说,“你约的那个老大爷,真难办,简直跟他讲不清,他坚决不做手术了。”

“那怎么行?他是外地来的,花了那么多路费,能治不治,我们也没尽到责任。”

“那你去说服吧!”

回到门诊部,穿过坐满了候诊病人的过道时,一些熟悉的病人早已站起来向她们致意。她俩含笑四顾,点头招呼着。陆文婷进到自己的诊室,正低声回答着一个年轻病人的问题,忽然从身后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喊声:

“陆大夫!”

这一嗓子把病人和大夫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只见一个高大结实的汉子摸索着朝诊室门口走来。这病人身穿青布裤褂,头缠白色毛巾,肩宽腰圆,五十多岁的样子。他那人比人高出一头的个子本来就引人注目,加上这一声喊,两边的人都给他让开了路。但他双目几近失明,不知这么多人在看自己,只伸出两只大

手,迎着陆文婷说话的声音摸去。

陆文婷忙转身迎出去,双手扶住这盲人,说:

“张大爷,快坐下吧!”

“您坐,陆大夫!俺找您,说个情况。”

“说吧,坐下说。”陆文婷搀扶着老汉在长椅上坐下。

“陆大夫,是这么回事儿。我在这儿也住了不少日子了。我寻思,还是先回去吧,赶明儿再来……”

“那怎么行?张大爷,您这么远跑到北京,花了这么多路费……”

“谁说不是呢!”不等陆文婷说完,张老汉拍着自己的膝盖抢过话说,“我是想着,回去再干一秋活儿,挣点分儿。您别瞧我眼神不济,摸摸索索也能干,队上派活儿挺照顾我。陆大夫,我拿定主意先回去,可一想,怎么也得来跟您说一声儿。为俺这双眼睛,真没叫您少操心。”

张老汉患角膜溃疡多年,瘢痕很厚,久治不愈。陆文婷在那里巡回医疗时,曾建议他移植角膜。老汉就是为做这个手术来的。

“张大爷,您儿子花了这么多钱,让您到这儿治病,没治好就回去了,我们也过意不去啊!”

“嘻,有您这份儿心,啥都有了。”

陆文婷笑笑,拍着老汉的胳膊说:

“眼睛治好了,您干活就不用人家照顾了。您身体这么好,还能干它二十年呢!”

张老汉呵呵笑了起来,连声答道:

“那敢情!要不是两眼不争气,啥活儿也难不住我!”

陆文婷笑道:

“那就还是做吧!”

张老汉放低了声音,说道:

“陆大夫,我拿您也不当外人,俺就实话实说吧,俺愁的就是钱。俺这趟治病,全靠自个儿掏,老在北京住店,住不起呀!”

陆文婷愣了一下,马上又说:

“张大爷,您别着急,我已经查过预约本了,这回该轮到您了。这两天,只要有材料,就马上给您做手术,行吧?”

张老汉被说服了,陆文婷把他送到走廊外,转身回来时,被一个十一二岁的漂亮小女孩拦住了。

这孩子长得可真俊。圆鼓鼓红扑扑的脸儿,黑眉毛高鼻梁配上一个红嘴唇儿,一只双眼皮儿大眼睛滴溜溜水汪汪的。可惜,另一只眼却向外斜着。她穿着医院的白裤褂躲躲闪闪地叫:

“陆大夫！”

“王小嫚,你怎么跑出来了?”陆文婷向她走去。这是她昨天收进来的小病人。

“我害怕,我要回家!”说着,王小嫚抹起眼泪儿来了,“我,不做手术了。”

陆文婷搂住这女孩子的肩膀问:

“来,告诉阿姨,怎么又不想做手术啦?”

“我怕疼。”

“傻丫头!不疼。到时候我给你打麻药。保证一点儿都不疼!”陆文婷拍拍她的头,又弯腰凝视着这张小脸儿,像在惋惜地欣赏一件不小心弄坏了的艺术品似的,不无遗憾地说,“你看,就是这只眼睛!王小嫚,等阿姨给你矫正过来,跟那边的眼睛一样,你看,多好!快回病房去,听话,哎!医院不准乱跑的。”

王小嫚擦干眼泪走了,陆文婷才回到自己的诊桌,一个一个地叫号。

这两天病人很多。今天也一样。她必须抓紧时间,把刚才去院长办公室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她忘记了焦副部长,忘记了秦波,也忘记了自己,只一个接一个地看下去。问明情况,带到暗室,开药方,给预约号,一个接一个……

“陆大夫,你的电话!”护士跑来叫她。

“请你稍等一下。”陆文婷向病人打了招呼,跑过去拿起听筒。

“佳佳病了,昨天晚上就发烧。”托儿所的阿姨在电话里说,“我们知道你工作很忙,没敢告诉你,带她去看了急诊,打了针。可是,现在还不退烧,老哼哼,要找妈妈,你能不能来看看。”

“好的,我就来。”她放下了电话。

可是,她并没有去托儿所。这么多病人压着,怎么能丢下走开?她又拿起电话,拨通傅家杰机关的号码,那边告诉她傅家杰外出开会去了。她只好挂上了电话。

“谁来的电话?有事儿吗?”姜亚芬问。

“没什么。”她答道。

她从来不麻烦别人,也从来不麻烦组织。“先把病人看完了,再上托儿所也行。”她想着,又坐回到诊桌旁,继续看病。开始,哼哼的佳佳,哭喊妈妈的佳佳,还在她脑子里转。后来,一双双病人的眼睛取代了佳佳的位置,直到把所有的病人都看完了,陆文婷才急急忙忙地赶到托儿所去。

八

“陆大夫,你怎么才来呀?”托儿所的阿姨抱怨地说。

她冲向隔离室,只见小佳佳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小床上。她的小脸蛋儿烧得彤红,小嘴唇儿张着,小鼻子吃力地扇动着,眼睛却闭得紧紧的。

“佳佳,妈妈来了!”陆文婷扑到小床栏杆上。

佳佳的小脑袋在枕头上动了动。她沙哑地喊了一声:

“妈——妈——,回家!”

“回家,回家!”她急忙抱起小佳佳,转回本院儿科看急诊。

“肺炎。”儿科的大夫同情地说,“陆大夫,要好好护理几天啊!”

她点点头,给佳佳打了针,取了药,走出儿科急诊室。

中午时,医院安静下来。门诊的病人走了,住院的病人睡了,医护人员也各自奔回家或者找地方休息去了。偌大的一个院子显得空落落的,只有一些不知疲倦的麻雀在梧桐树上叫着,逍遥自在地飞来飞去。原来,在这大楼林立、空气污染、充满噪音的市区,也还有大自然的造物在与人类争妍。陆文婷心中觉得奇怪,怎么天天在医院走来走去,竟没有发现这里还有鸟儿?

她抱着孩子站在院子当中,不知该往哪儿去。回托儿所吧,想到病成这样的孩子,独自单单地躺在隔离室,于心不忍。抱回家去吧,下午还要上班,谁来照顾她。

愣了片刻,她狠了狠心,朝托儿所走去。

伏在她肩上、垂着头的佳佳,忽然大哭起来:

“我不上托儿所,不上……”

“佳佳,乖,听话……”

“不,不,我回家!”佳佳两腿乱踢起来。

“好,回家,回家。”陆文婷只好抱着佳佳朝回家的路上走去。

从医院到家里,要穿过繁华的商业大街。新竖的巨幅时装广告,大街两旁琳琅满目的陈列橱窗,以及人行道上农民自由出售的活鸡活鱼、瓜子、花生等等稀缺的农副产品,陆文婷都一概视而不见。自从有了两个孩子,月月入不敷出,她就同高档商品无缘了。此刻她怀里抱着佳佳,心里惦着园园,更是目不斜视,行迹匆匆。

回到家里,已经快一点了。园园撅着嘴说:

“妈,你怎么才回来?”

“你没看见小妹病了吗?”陆文婷瞪了园园一眼,忙给佳佳脱了衣服,把她放在床上,替她盖上被子。

园园站在桌边,着急地说:

“妈,快做饭呀!要迟到了!”

陆文婷心烦意乱,不由地吼了一声:

“催！你就会催！”

园园又委屈又着急，眼圈儿一红，眼泪儿就在眼眶里打起转来。

陆文婷顾不上去理他，走出房门打开蜂窝煤炉。封闭了一上午的煤块已经奄奄一息，火是一时上不来了。她再掀开锅盖，打开碗橱，全都空空如也，连一点剩菜剩饭都没有了。

她又转身进屋，看见儿子仍站在那里伤心，心里感到内疚。孩子是无辜的，自己为什么拿他出气呢？

近年来，她越来越感到家务劳动的负担沉重。文化革命那些年，傅家杰的实验室被造反的人们封闭了，他研究的专题也被取消了，他变成了“八九二三部队”的成员。每天八点上班，九点下班；二点上班，三点下班。他整天无所事事，把全部精力和聪明才智都用在家务上了。一日三餐他包了，还学会了做棉裤、织毛衣。这倒使陆文婷免去了后顾之忧。粉碎“四人帮”以后，科研工作要大上，傅家杰被视为骨干，他的科研项目被列为重点，又成了忙人。这样，家务劳动的重担又有很大一部分压到陆文婷肩上。

每天中午，不论酷暑和严寒，陆文婷往返奔波在医院和家庭之间，放下手术刀拿起切菜刀，脱下白大褂系上蓝围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分秒必争的战斗。从捅开炉子，到饭菜上桌，这一切必须在五十分钟内完成。这样，园园才能按时上学，家杰才能蹬车赶回研究所，她也才能准时到医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诊室里，迎接第一个病人。

一遇到今天的情况，全家就有面临饥饿的危险。她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点零钱说：

“园园，你自己去买个烧饼吃吧！”

园园接过钱，正往外走，又回过身来问：

“妈，你吃什么呀？”

“我不饿。”

“也给你买个烧饼吧！”

一会儿，园园给她送回一个烧饼，自己一边吃一边上学去了。

陆文婷啃着干硬的冷烧饼，呆呆地望着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

对于生活，她和他都没有非分的企求。他们结婚的时候，就住在这间屋子里。房间没有沙发，没有大立柜，没有新桌椅，甚至没有新铺盖。两个人把自己平日的被褥集中到一起，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们的被褥是单薄的，他们的书籍是丰厚的。院里的陈大妈说：“一对书呆子，怎么过日子哟！”而他们觉得，日子美得很。一间小屋，足以安身；两身布衣，足以御寒；三餐粗饭，足以充饥。这就够了。

他们视为珍宝的,是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每天晚上,这陋室里就铺开了两摊子。陆文婷占据了唯一的一张三屉桌,借助于外文词典,阅读国外眼科医学文献,贪婪地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下有用的资料。傅家杰屈居于床边的一叠箱子上,把一本本参考书摊在床上,研究他的金属断裂专题。院里那些调皮的孩子们,常常来窥探这对新婚夫妇的秘密,他们看到的总是这样一幅夜读图。

对于他们来说,能够有一张平静的书桌读一点书,能够不受干扰地开一个夜车研究一点学问,这一天就过得非常充实。尽管没有地方给他们发夜班津贴,她和他天天工作到深夜,把一天变成两天,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精力。夏天的晚上,邻居们在院子里乘凉。香茶、团扇,徐徐的晚风,明亮的星星,有趣的新闻,海阔天空的闲扯,都不能把这对“书呆子”从闷热的小屋里吸引出来。

啊!多么安宁的日子,多么充实的夜晚,多么难得的生活。它刚刚开始,却又匆匆离去。

两个新的生命,相继来到这间小屋。园园和佳佳,多么逗人疼爱的两个小人儿!不能说孩子的降临没有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欢乐,但是,他们也带来了混乱和灾难。小屋里挤进一张小孩床,后来又换成了单人床,几乎没有转身之地了。屋内空中挂起了“万国旗”,瓶瓶罐罐堆起来。孩子的哭声、嬉笑声、吵闹声,破坏了这小屋的宁静。

傅家杰是体贴的。他在屋里拉起一块绿色的塑料布,把三屉桌挪到布幔后面,希望能在这瓶瓶罐罐、哭哭啼啼的世界里,为妻子另辟一块安定的绿洲,使她能像以前一样夜夜攻读。这谈何容易!

但是,一个眼科大夫,不掌握各国眼科医学的新成果,怎么能开阔自己的眼界,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做出新的贡献呢?她常常强迫自己躲在布幔后面,把自己隔离起来,直至深夜。

当园园成为一名小学生以后,这张珍贵的三屉桌的优先使用权属于了园园。只有等儿子功课做完了,腾出地方来,陆文婷才能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和借来的医学文献书籍。至于傅家杰,只好排在最后了。

啊!生活,你是多么艰难!

陆文婷啃着冷烧饼,望着窗台上的小闹钟:一点五分,一点十分,一点十五分了!怎么办?该上班去了?明天去病房,门诊还有好多事需要交代。可,佳佳交给谁?再给家杰打电话吗?附近没有电话。就算有电话,也不一定能找到他。再说,他已经耽误了十年,现在不该再占他的时间,不能再让他请假!

她双眉紧皱,一筹莫展了。

或许,一生的错误就在于结婚。不是人常说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那时候,自己是多么天真,总以为对别人说来,也许是如此。对自己来说,那是绝不可能

的。如果当时就慎重考虑一下,我们究竟有没有结婚的权利,我们的肩膀能不能承担起组成一个家庭的重担,也许就不会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在生活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艰难!

闹钟无情地滴答着,已经一点二十分了!实在没办法,她只好找院里的陈大妈帮忙。陈大妈是街道积极分子,一向热心助人。以前每遇这种情况,也多亏了这位老大妈。可是,陈大妈坚持义务帮忙,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报酬,这使陆文婷总觉得于心有愧,也就尽量不去麻烦她。

今天又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她只好去找这位好心肠的大妈。陈大妈满口答应:

“你尽管放心上班去,陆大夫!”

陆文婷把佳佳喜欢的小人书和积木放在小枕头边,又托付陈大妈按时给她喂药,便匆忙赶回医院。

她坐在诊桌旁时,心里还想着,一会儿跟护士长说一下,少叫几个号,我得早点回去。可是,病人一来,这一切又都忘了。

赵院长亲自打电话告诉她:焦副部长明天入院,请她准备手术。

秦波同志接连来了两次电话,询问手术前要注意什么事项,需要病人和病人家属做哪些配合,在精神和物质上都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这使她很难回答。她做过上百例这样手术,还很少有人向她提过这样的问题,只好答道:

“也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嗯——怎么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我的同志哟,凡事预则立。思想准备充分一些总好嘛,是不是呀?我看,还是我来一下吧,咱们当面研究一次。”

陆文婷不得不赶忙挡驾,对着话筒说:

“我这里还有很多病人。”

“那明天我们到医院再谈吧!”

“好。”

放下这叫人头疼的电话,她又回到诊桌旁边,一直看完最后一个病人。这时,天已经擦黑了。

她赶回家去。走到窗户底下就听见陈大妈正唱着自己即兴创作的儿歌:

佳佳、佳佳
快长大,
赶明儿变个
科学家!

佳佳“咯咯”地笑了起来。陆文婷心中感激万分，忙进屋谢了大妈，又摸摸孩子的额头，烧也退了些，她才松了口气。

给孩子打完针，傅家杰回来了。跟着又来了两位客人——姜亚芬和她的爱人刘学尧大夫。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姜亚芬说。

“你要上哪儿去呀？”陆文婷问。

“我们申请去加拿大，护照批下来了。”姜亚芬的眼睛埋下，望着地面说。

刘学尧的父亲在加拿大行医，陆文婷是知道的。他几次来信要刘学尧夫妇去国外，她也听说过。但是，他们真的要走，却是她意想不到的。

“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她问。

“可能就去不回了。”刘学尧做出轻松的样子耸了耸肩膀答道。

陆文婷盯着自己的好朋友问道：

“亚芬，为什么你早没告诉我？”

“怕你劝阻我，更怕我自己动摇。”姜亚芬仍是躲开陆文婷的目光，眼睛盯着地面，好像要把这地望穿。

刘学尧从提包里拿出一包一包的卤菜，最后拿出一瓶葡萄酒来，兴致勃勃地说：

“你们还没做饭吧？正好，我借贵方一块宝地，举行告别宴会。”

九

这是一次含泪的晚宴。

与其说他们喝的是酒，不如说他们咽下的是泪。与其说他们吃的是美味的菜肴，不如说他们嚼的是人生的苦果。

佳佳睡着了，园园上邻家看电视去了。刘学尧举起酒杯，望着杯中的酒，感慨万端地说：

“人生，人生，人生真是难以预料啊！我父亲是个医生，古文底子很厚。我从小喜爱诗词歌赋，一心想当文人，可是命中注定要我继承父业，一晃三十多年。家严一生为人谨慎，他处世的格言是‘言多必失’。可惜，这一点，我没有学来！我爱说，爱提意见，结果是祸从口出，每次运动都挨上。五七年毕业时差点成了右派，文化革命更不用说，又脱了一层皮。我是个中国人，不敢说有多么高的政治觉悟，可总还是爱国的，真心希望我的祖国富强起来。连我自己也想不到，在我快五十岁的时候，忽然会远离我的祖国。”

“不能不走吗？”陆文婷轻轻地说。

“是啊，为什么非走不可呢？我自己跟自己辩论过无数次了。”刘学尧晃动着手内半杯殷红的葡萄酒，又说，“我已经过了大半辈子，还能活几年？为什么要把骨灰扔进异国他乡的土壤？”

一桌人都默默不语，听着刘学尧抒发他的离别愁情。可是，他忽然缄口不言，仰脖把半杯剩酒一干而尽，才吐出一句话来：

“你们骂我吧！我是中华民族不肖的子孙！”

“老刘！别这么说，这些年你的遭遇，我们都知道的。”傅家杰给他斟上酒说，“现在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来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我相信。”刘学尧点点头，“可是，光明什么时候才能照到我家门前？什么时候才能照到我女儿身上？我等不及啊！”

“不谈这些吧！”陆文婷猜想到刘学尧非要出国不可的理由，可能是为了他那唯一的女儿，觉得不便深谈，便岔开话说，“我从来不喝酒，亚芬和你要走了，今天我要敬你们一杯！”

“不，应该我敬你一杯！”刘学尧按住酒杯说，“你是我们医院的支柱，是中华医学的新秀！”

“你喝醉了！”陆文婷笑道。

“不，我没有醉。”

半天没有开口的姜亚芬，也举杯说道：

“我诚心诚意为文婷干一杯！为了我们二十多年的友谊，也为了未来的眼科专家！”

“哎呀！你们这是干吗？我算什么呀？”陆文婷连连摆着手说。

“算什么？”刘学尧真有点醉似的，愤愤地说，“像你这样身居陋室，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计报酬，一心苦干的大夫，真可以说是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这是鲁迅先生的话，对不对？傅家杰？”

傅家杰默默地独自喝着酒，点了点头。

“这样的人太多了，又不是我一个。”陆文婷仍笑着说。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刘学尧又喝了一杯。

姜亚芬望着熟睡在床上的佳佳，不无伤感地叹道：

“就是嘛，宁肯耽误自己孩子的病，也不肯误了给别人治病。”

刘学尧站起来，给所有人斟满酒，说道：

“这就是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普救天下。”

“你们今天怎么回事？专门抬我？”陆文婷笑着指指傅家杰说，“你问他，我最自私了。我把丈夫打入厨房，我把孩子变成了‘拉兹’，全家都跟着我遭殃。说实

话,我是个不称职的妻子,也是个不称职的妈妈。”

“你是一个称职的医生!”刘学尧叫道。

傅家杰又喝了一口酒,放下杯子说:

“这一点,我对你们医院是有意见的。大夫也有家,也有孩子。大夫的孩子也会生病,为什么从来没人关心过?”

“老傅啊!”刘学尧打断他的话,叫了起来,“如果我是赵院长,我首先给你发勋章,还要给园园、佳佳发勋章!是你们做出了牺牲,才使我们医院有了这么好的大夫……”

傅家杰抢过话来说:

“我不求勋章,也不要表扬。我只希望你们医院了解,做一个大夫的爱人,是多么不容易。且不说巡回医疗,抗灾救灾,一声令下,抬腿就走,家里一摊全撂下不管;就连平常手术台上下来,踏进家门,精疲力尽,做饭连手都抬不起来!试问:这种情况下,我不进厨房谁进厨房?说来真要感谢文化革命,给了我那么多时间,也把我练出来了。”

“亚芬早就说要给你摘掉‘书呆子’的帽子。”刘学尧拍拍他的肩膀,笑道,“现在你是既能研究上天的尖端技术,又能深入厨房拳打脚踢,简直是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在成长,谁说文化革命成绩不是主要的?”

傅家杰平日不沾酒,今天喝了一点,脸就红了。他拉着刘学尧的袖口笑道:

“对嘛,文化革命就是改造人的大革命。那几年,我不就被改造成家庭妇男了吗?不信,你们问文婷,我什么不干?什么不会?”

陆文婷听着这些含泪的笑谈,心里很苦。她不能制止他们。此时此刻,好像也只有这种过去的笑话才能冲淡离愁。见傅家杰含笑看着自己,只好勉强笑道:

“什么都会,就是不会纳鞋底。不然园园就不会老嚷买球鞋了。”

“这就是你的苛求了!”刘学尧一本正经地说,“傅家杰改造得再彻底,也不能像农村老太太那样,拿着鞋底到处转啊!”

“要不是粉碎了‘四人帮’,说不定我还真拿着鞋底到研究所批判大会上纳去。”傅家杰说,“你们想,那种状况继续下去,科学、技术、知识统统打倒,不就剩下纳鞋底了吗?”

然而,这样伤心的笑谈又能持续多久呢?他们谈到粉碎“四人帮”,谈到科学的春天到来,谈到“臭老九”变成了“穷老三”,谈到中年干部的疾苦,空气又沉闷起来。

“老刘,你认识的人多,可惜你要走了。”傅家杰又打起精神,拍着刘学尧的肩膀说,“我听说当保姆收入颇高。我真想托你打听一下,谁家要雇男保姆……”

“我走了不要紧。”刘学尧也拍着傅家杰的手说,“现在出了一张《市场报》,

登待聘广告,你可以试一试。”

“那太好了!”傅家杰推了推宽边眼镜,嘻嘻哈哈地说,“本人大学毕业,精通两门外国语,擅长烹调蒸煮,缝纫洗涤,兼做男女粗细各种杂活。体格健壮,性情温和,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最后一条,报酬面议。哈哈!”

姜亚芬默默地坐在一旁,不举杯,不动筷,看他们笑,自己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她碰了碰自己的丈夫说:

“别说这些了,有什么意思?”

“意思?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啊!”刘学尧挥着手说,“中年,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科技人员身上;工厂的各种难活是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你少发点议论吧!一个大夫管那么多干吗?”姜亚芬打断了他的话。

刘学尧眯起眼,似醉非醉地说:

“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是个无名医生,可我不敢忘却国家大事。我请问:谁都说中年是骨干,可他们的甘苦有谁知道?他们外有业务重担,内有家务重担;上要供养父母,下要抚育儿女。他们所以发挥骨干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还在于他们忍受着生活的熬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包括他们的爱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牺牲。”

陆文婷呆呆地听着,轻轻说了一句:

“可惜,能看到这一点的人太少了!”

傅家杰愣了一下,给刘学尧斟上酒,笑道:

“老刘,你不应该当医生,也不应该当文人,你应该去研究社会学。”

刘学尧苦笑道:

“那我就是大右派了!研究社会学,必然要研究社会的弊病啊!”

“找到了弊病,加以改进,社会才能前进。这是左派,不是右派!”傅家杰说。

“算啦,左派右派我都不想当,不过,我对社会问题的确有兴趣。你比如说中年问题。”刘学尧两个胳膊肘扒在桌沿上,玩着空酒杯,又滔滔不绝起来,“旧社会有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这反映了在那个社会里,我们的民族未老先衰。人才活到四十岁,就觉得这辈子完了,不能再有什么作为了。现在呢,可以改一个字,‘人到中年万事忙’。对吧?四五十岁的人,知识比较多了,经验比较多了,加上年富力强,正是担当重任的时候。这也反映在新社会里我们的民族年轻了,富有青春的活力了。中年人,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

“高论!”傅家杰赞道。

“你别忙叫好,我还有谬论。”刘学尧按住傅家杰的胳膊,谈兴更高了,“单从

这方面看,我们这一代中年可以说是生逢其时的幸运儿了。其实不然,这一代的中年人又是不幸的。”

“话都叫你说了!”姜亚芬又打断他。

傅家杰拦住姜亚芬说:

“我倒很想听听这个不幸。”

“不幸在于他们最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林彪、‘四人帮’的动乱耽误了。”刘学尧长长叹了口气说,“像你吧,几乎成了无业游民。现在,这批中年人要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

“你们这些人也真难伺候!”姜亚芬笑道,“不用你们吧,你们发牢骚;又是怀才不遇啦,又是生不逢时啦!重用你们吧,反倒又叫苦连天;又是担子太重啦,又是待遇太低啦!”

“你就没有牢骚?”刘学尧反问她。

姜亚芬低头不语了。

从刘学尧的这通议论里,陆文婷又感到,他之所以非出去不可,可能不全是為了他女儿,也为了他自己。

刘学尧又举起杯来,叫道:

“来!为中年干一杯!”

十

这天晚上,客人走了,孩子睡了,陆文婷刷了锅,洗了碗,回到屋里,只见傅家杰歪身靠在床头,摸着自己的额头发呆。

“家杰,你在想什么?”陆文婷站在他面前,望着他忧郁的神色,吃惊地问。

傅家杰没有回答她的话,却问道:

“你还记得裴多菲那首诗吗?”

“记得。”

“我愿意是废墟……”傅家杰把手从额上放下说,“我现在真成废墟了。我已经不像中年人,好像是老年了。你看,头顶秃了,头发白了,额头的皱纹多深了呀,我自己都能摸出来。真像一片残垣断壁,一片荒废景象。”

啊,真的,他变得多么苍老啊!陆文婷心酸地扑到他身旁,抚着他的前额说:

“都是我不好,让家务把你拖垮了,都怪我!”

傅家杰取下她的手,温柔地捏在自己手中说:

“不,这不怪你。”

“我太自私了，只顾自己的业务。”陆文婷的眼睛离不开那印着皱痕的前额，声音颤抖着，“我有家，可是我的心思不在家里。不论我干什么家务事，缠在我脑子里的都是病人的眼睛，走到哪儿，都好像有几百双眼睛跟着我。真的，我只想我的病人，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做母亲的责任……”

“别说傻话。你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只有我知道。”他忍住涌上眼眶的泪水，不说了。

陆文婷依偎在傅家杰胸前，伤心地说：

“你老了，我，我真不愿意你老……”

“不要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他轻声地吟着他们喜爱的诗句。

秋夜，静静的。陆文婷倚在爱人的胸前睡着了。泪珠还凝结在她黑黑的睫毛上。傅家杰抬起身子，轻轻地让她在床上睡好。她睁开眼问：

“我睡着了吗？”

“你疲劳了。”

“不，我一点也不疲劳。”

傅家杰斜躺在床边，一手撑着自己的头，望着她说：

“金属也会疲劳。先产生疲劳显微裂纹，然后逐步扩展，到一定程度就发生断裂……”

疲劳、断裂，是傅家杰研究的专题，他常常挂在嘴边，从陆文婷耳边飘过。只有这一次，这些专有名词仿佛有着千钧重量，给她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啊，多么可怕的疲劳，多么可怕的断裂。她觉得，在这悄静的夜晚，在这大千世界，几乎每个角落都有断裂的声音。负荷着巍巍大桥的支架在断裂，承受着万里钢轨的枕木在断裂，废墟上的陈砖在断裂，那在荒凉的废墟上攀援上升的常春藤也在断裂……

十一

夜深了。

病房中的大吊灯熄灭了，只有墙上的壁灯放出蓝幽幽的暗光。

陆文婷躺在病床上，只觉得眼前有两点蓝蓝的光。时而像夏夜的萤火虫在飞跃，时而像荒原的磷火在闪烁，待到定睛看时，又变成了秦波那两道冷冷的目光。

秦波的目光是严厉的。但是，在焦副部长住进医院的那天上午，她把陆文婷叫去的时候，目光却是亲切的，温和的。

“陆大夫，你来了，快，先坐一会儿！老焦做心电图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当陆文婷跨上一幢十分幽静的小楼，穿过铺着暗红色地毯的过道，来到焦副部长住的高干病房门前时，秦波正坐在靠门的沙发上，她立刻起身，堆满笑容地接待了陆文婷。

秦波把陆文婷让到小沙发上坐下，自己也隔着茶几坐下了。可她立刻又站起来，走向床边，从床头柜里拿出一小筐橘子，放到茶几上说：

“来，吃个橘子！”

陆文婷摆了摆手，连说：

“不客气！”

“尝一个吧！这是老战友从南方带来的，很不错的。”说着，秦波亲自拣了一个递过来。

陆文婷只好把这黄澄澄的橘子接在手里。尽管今天秦波态度和蔼，陆文婷还是觉得背后冷飕飕的。那天初次见面时秦波的眼光好像两支冷箭一样至今还插在她背上。

“陆大夫，白内障到底是怎么一种病啊？我听一些医生说，怎么有的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秦波竭力用谦逊的声调问，那声音里甚至还含有讨好的成分。

“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体变得混浊了。”陆文婷看着手上的橘子说，“我们把混浊的程度不同分为初期、膨胀期、成熟期、过熟期，一般认为在成熟期做手术比较好……”

“哦，哦，”秦波点着头，又问道，“要是成熟期不做手术，再拖一拖又会怎么样呢？”

“那样不好。”陆文婷解释说，“到了过熟期，晶体缩小，晶体内部的皮质溶化，悬韧带松脆，手术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时候晶体很容易脱位。”

“哦，哦！”秦波答应着，又点着头。

陆文婷感到她并没有听懂，也并不想弄懂。她为什么要问这些她并不懂得，也并不打算真正弄懂的问题呢？消磨时间吗？自己还有那么多事情在等着。刚到病房，病人情况需要了解，好多问题堆在脑子里，她真有点坐不住了。可是，她不能走，焦副部长也是病人，他的眼睛术前应该检查。他怎么还不回来呢？

“听说外国有一种人工晶体，”秦波想着，又说，“做完白内障手术，装上人工晶体，就可以不用配凸透镜了，是吧？”

陆文婷点头答道：

“对，我们也正在试验。”

秦波忙问：

“能不能给焦副部长装一个人工晶体？”

陆文婷微微一笑,说道:

“秦波同志,我才说了,这种手术我们正在试验阶段,给焦副部长装,合适吗?”

“那就算了。”秦波马上同意不在焦副部长身上做试验了。可是,她想了想,又问,“你看,焦副部长这次手术,要采取一些什么措施?”

“采取什么措施?”陆文婷简直莫名其妙。

“我是说,要不要订一个什么手术方案。万一出现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处理,事先安排好,免得到时候慌了手脚,乱了套。”秦波见陆文婷呆呆地望着自己,还不开窍的样子,就又补充说,“我看报上常登这方面的消息,有的还成立手术小组,先讨论方案嘛!”

陆文婷听到这里,不由笑道:

“这没有必要,白内障摘除是很一般的手术。”

秦波把头扭向一边,有点不高兴了。但她还是又把头转过来,心平气和地,甚至笑了笑说:

“我的同志哟!不要轻敌嘛,唉?轻敌思想往往造成失败,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过的……”

秦波耐心地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又引导陆文婷大夫去设想,在什么情况下,白内障手术容易遭致失败。

“如果病人有心脏病,或者血压很高,做手术就要考虑。”陆文婷说,“还有,要是病人有气管炎的话,也要治好咳嗽再做手术。要不然,伤口切开了,病人一咳嗽,眼内容物很可能脱落出来。”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啊!”秦波拍着沙发扶手,叫了起来,“焦副部长心脏不大好,血压也高。”

“手术前我们都要检查的。”陆文婷安慰她说。

“他还有气管炎。”

“这几天咳嗽厉害吗?”

“这几天倒没有,可是,万一上了手术台咳嗽呢?嗯?怎么办?”

这时,陆文婷真感到这位夫人不好对付了。你不知道她想什么,也不知道她哪来这么多担心。陆文婷看了一下手表,已经快下班了。她望着两扇落地式大玻璃窗旁一动不动的白纱窗帘,心中不免着急。她侧耳留神听着门外,一阵轻轻的脚步走来,又过去了。又过了好久,才看见门被推开,焦副部长披着蓝条子的毛巾睡衣,由保健护士搀着进来。

“怎么去了这么久?”秦波问。

焦成思同陆文婷握了握手,朝沙发上坐下去,有点疲倦地说:

“到了这里就要听医院的。抽血、透视、做心电图。我不用排队,够照顾的

了。”

秦波赶忙递过一杯热茶，焦成思喝了一口，说道：

“其实，眼睛做个手术，也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陆文婷从护士手中接过病历，一边翻阅，一边说：

“胸部透视正常，心电图正常，血压稍高一点。”

“高多少？”秦波急忙问道。

“高压150，低压100，不妨碍做手术。”陆文婷又问，“焦副部长，你这几天咳嗽吗？”

“不咳嗽。”焦成思毫不犹豫地答道。

秦波马上盯问道：

“你能保证上了手术台一声不咳嗽？”

“这……”焦成思困惑了，不知该怎么回答。

“老焦，你可不要掉以轻心。”秦波严肃地说，“刚才陆大夫说了，上了手术台，你要是一咳嗽，眼珠就可能掉出来。”

“这，我怎么能保证呢？”焦成思转向陆文婷问道。

“也没有说得那么严重。”陆文婷说，“焦副部长，你是抽烟的吧？最好手术前不要抽烟。”

“这没有问题，我可以做到。”焦成思说。

秦波又马上盯问道：

“万一呢？万一你咳嗽起来怎么办？”

陆文婷笑道：

“秦波同志，这也不要紧。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立即把切口缝上，避免出危险。等咳嗽过后，打开再做。”

“对，对，”焦成思说，“我上次右边这只眼睛做的时候，也是打开，缝上，又打开的。不过，那倒不是因为我要咳嗽。”

“那是为什么？”陆文婷觉得很奇怪。

焦成思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掏出烟盒，想起大夫刚才的话，又装了进去，叹了口气说道：

“那时候，我被打成叛徒。右眼看不见了，跑来做手术。刚开始手术，造反派就闯了进来，硬逼着大夫中断手术，说是绝不能让叛徒重见光明。当时，我简直气晕了，浑身的血直往头上冲。多亏了那位大夫沉着冷静。她立刻把切口缝上了，避免了意外。她又把造反派赶了出去，才把手术做完了，唉！”

“啊……”陆文婷听了不由一怔，忙问道，“你右眼是在哪个医院做的？”

“就在你们医院。”

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雷同的事?她看了看焦成思,竭力想看出这个人是否曾经相识。可是,一点也看不出来了。

十年前,她曾给一个“叛徒”做过白内障摘除,在手术过程中也曾发生过造反派阻拦的事,情节和焦副部长说的一模一样。那个病人姓什么呢?对,也姓焦。是他,就是他!后来造反派串联了医院响当当的人物,给陆文婷刷了大标语:“陆文婷的手术刀为大叛徒焦成思服务,是对无产阶级彻头彻尾的背叛!”

啊,怎么会认不出来了呢?十年前的焦成思身披一件破旧棉袄,脸色憔悴,精神不振,孤身一人来挂普通门诊。陆文婷建议他做手术,开了预约单,病人如期到来。就在刚开始手术的一瞬,就听外面护士在嚷:

“这是手术室,谁也不准进!”

接着就听一阵乱叫乱吼:

“什么手术室?他是大叛徒!给叛徒做手术,我们就是要造反!造定了!”

“臭老九给叛徒大开方便之门,决不允许!”

“冲!往里冲!”

焦成思在手术床上听得清清楚楚。他气急地说:

“算了,瞎就瞎吧,不要做了,大夫!”

“你不要动!”陆文婷一边说,一边已经飞快地把切口的预置缝线结扎好了。

三个大汉冲进了手术室,还有几个胆小的在门口站着。陆文婷坐在手术台的床头一动不动。

刚才,焦副部长说是那位大夫“把造反派赶出去”的。这不对。陆文婷从来没有骂过人,也从来没有赶过人。当时,她身穿白色的手术袍,脚穿绿色的泡沫塑料拖鞋,头戴蓝色的布帽,脸上蒙着一个大口罩,只有两个眼睛和一双戴橡皮手套的手露在外面。也许是头一次看到这种陌生的装束;也许是头一次感到手术室异样庄严的气氛;也许是头一次见到手术台上雪白的有孔巾下露出一只血淋淋的眼球,造反派们给吓住了。陆文婷大夫仍然坐在那只高凳上,只是从口罩底下吐出几个字来:

“请你们出去!”

几个造反派面面相觑,好像也感到这里确实不是一个造反的地方,转身走了。

当陆文婷又重新剪开缝线,继续工作时,焦成思说:

“还是不做了吧!就算你把我的眼睛治好了,他们还会把我整瞎的。而且,可能祸及于你。”

“不要说话!”陆文婷几乎是命令说,同时两手飞快地操作。等到手术完毕,为他缠上纱布时,才说了一句,“我是医生。”

就这样,陆文婷为焦成思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做了右眼的白内障手术。

当年,焦成思机关里的造反派到医院来给陆文婷刷大字报,也曾经轰动一时。但是,对陆大夫来说,这也不算不得什么!无非是在“白专道路”、“修正主义苗子”等等原有的罪名之外,又新加一个“包庇叛徒”的罪名。这个罪名连同这个手术,她都没有往心里去,也都逐渐从她的记忆中隐退了。如果不是焦成思偶然提起,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陆大夫,我就佩服这样的医生,真是治病救人哪!”秦波感叹地说,“可惜那时没有病历,不知她姓什么叫什么。昨天我们还跟赵院长谈起,如果请她做手术,就放心了。”

陆文婷听了,脸上露出尴尬的神色,秦波一见,又忙说道:

“不过,陆大夫,你也不要见怪。赵院长对你是很信任的。我们,当然也是信任你的。希望你不要辜负领导上对你的期望,要向上次给焦副部长做手术的那位大夫学习。当然,我们也要向她学习。你说,是不是啊?”

陆文婷只好把低着的头点了点。

“你还很年轻哟!”秦波又鼓励她说,“听说你还没有入党,是不是啊?要努力争取嘛,我的同志哟!”

“我家庭出身不好。”陆文婷老实地答道。

“唉——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看嘛!家庭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秦波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们党的政策历来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只要你真正同家庭划清界限,靠拢组织,对人民作出贡献,党的大门是对你开着的。”

陆文婷没有再说什么,走过去拉上窗帘,掏出眼底镜来给焦成思做检查。之后她说:

“焦副部长,如果你没有什么别的情况,我们后天就把手术做了吧!”

“行,早做完早出院。”焦成思痛痛快快地抢先答应了。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了,陆文婷告辞出来。秦波又追出来,喊住她:

“陆大夫,你是回家吗?”

“是呀!”

“用焦副部长的车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

陆文婷连忙摆着手走了。

十二

临近子夜,病房里没有一点声息,没有一点动静。壁上那盏蓝色的孤灯,依

稀地照着吊瓶中的溶液在无声地滴着。一滴,一滴,缓缓地输进病人那青筋隆起的血管里。在这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似乎只有它是唯一的信息,告诉人们,陆大夫还活着!

傅家杰呆坐在床头,痴痴地望着自己的妻子。在这纷乱的二十多个小时里,他还是第一次独自守护在她身畔。不,在十几年的共同生活中,似乎也是第一次这样地守在她身旁,这样地看着她。

记得有一次,大概还是热恋的时候,他也曾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可是她却歪着头问:“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他只好讪讪地把视线移开。现在,她不能歪过头去了,她也不能问话了。她好像被解除了武装,任凭他的目光在她脸上久久地停留,再也不能“抗议”了。

直到此刻,他才心惊地发现,她变得多么衰老了啊!原来漆黑的美发已夹杂着银丝,原来润泽的肌肉已经松弛,原来缎子般光滑的前额已刻上了皱纹。那嘴角,那小巧的嘴角也已经弯落下来。啊!她的生命似乎也已像耗尽了最后一滴油的灯芯,只剩下微弱的光和热了。他简直不愿相信,自己的妻子,一个如此坚强的女性,竟在昼夜之间变得这样虚弱!

他深知她不是一个弱女子。她生来苗条纤细,看上去弱不禁风,然而,她并不是弱不禁风的。她总是用瘦削的双肩,默默地承受着生活中各种突然的袭击和经常的折磨。没有怨言,没有怯懦,也没有气馁。

“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傅家杰常说。

“我?不,我很软弱哩!一点儿也不坚强。”她总是这样回答。

这一次,就在她病倒的头一天晚上,她又作出了一个被傅家杰称为坚强的决定——让他搬到研究所去住。

那天晚上,佳佳的病基本好了,园园的功课也做完了,兄妹俩相继睡去。小屋里得到片刻的安宁。

已是秋天了,阵阵秋风送来了寒意。托儿所通知家长们给孩子送棉衣了。陆文婷拿出佳佳去年穿的小棉袄,把它拆开,放大,接长袖子。她把棉袄铺在那张三屉桌上,为女儿过冬的棉衣絮上一层新棉花。

傅家杰从书架上取下他的一篇未完成的论文,在桌旁站了站,就歪身在床头坐下。

“等一会儿,我马上就絮完了。”陆文婷说着,没有回头,只加快了速度。

当陆文婷把絮好的棉袄撤走时,傅家杰说:

“什么时候再有半间房就好了。哪怕六平方米,五平方米也行,只要能搁下一张桌子。”

陆文婷坐在床边低头做活。她听着,没有答话。过一会儿,她忙忙地把没缝

完的棉袄折起来,说:

“我得到医院去一下,桌子你尽管用吧!”

傅家杰回过头来问:

“这么晚了,还上医院?”

陆文婷一边穿上外衣,一边说:

“明天早上的两个手术,有些不放心,我得去看看。”

其实,陆文婷晚上跑到医院去是常有的事。为此,傅家杰常常笑她:“人在家中,魂在医院。”

“你多穿一件衣服吧,夜里冷。”

“我马上就回来。”陆文婷忙说,又带着歉意地笑道,“你不知道,明天的两个手术挺有意思。一老一小。一位副部长,他夫人老怕手术做不好,总是制造紧张空气,所以我得去看看他。小的是个女孩儿,娇得很,今天还缠着我说,她晚上尽做梦,睡不好……”

“行啊,我的大夫!快去快回吧!”傅家杰也笑道。

她走了。回来时见傅家杰还在灯下用功。她没有惊动他,过去给孩子掖了掖被子,说道:

“我先睡了。”

傅家杰见她躺下了,又埋头于稿纸和书本。过了一阵,他虽并不曾回身,却感觉到陆文婷还没有入睡。是不是灯光影响了她?傅家杰把台灯弯得更低些,又用一张报纸挡上,才继续工作。

又过了一阵,他听到她发出了轻轻的均匀的呼吸声。傅家杰心里很清楚,她并没有睡着。多少次,她都是用这种假意的鼾声,企图给他一种错觉和安慰,要他不必顾忌她能不能在灯光下入睡,而专心于自己的著作。其实,这个小小的“诡计”傅家杰早已识破,只是不忍心拆穿它。

再过了一阵,傅家杰站了起来,伸了伸腰说:

“算啦!我也睡吧!”

“你别管我!”陆文婷忙答道,“我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了。”

傅家杰双臂撑在桌沿上,望着未完成的论文,犹豫了片刻,还是劈劈啪啪扣上了一本本的书,下决心说:

“不干了!”

“你的论文怎么办?不抓紧晚上的时间,什么时候能写完?”

“损失了十年的时间,一夜也补不回来啊!”

陆文婷索性坐了起来,随手披上一件毛衣,靠在床头,很认真地对他说:

“你知道刚才我在想什么?”

“你什么也不该想！你应该快闭上你的眼睛，明天你还要给人家治眼睛……”

“你别打岔。你听我说，我想，你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这样，你就有时间了。”

傅家杰站在床前，瞪大眼睛望着她，只见她脸上放着光，眼睛是笑的，她显然被自己的想法兴奋着。

“我不是说着玩儿，我真的这么想。你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应该是科学家。是我和孩子拖累了你，影响你不能早出成果。”

“唉！不是这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陆文婷打断他的话说，“当然，我们又不能离婚。孩子们不能没有爸爸，科学家也不能没有家庭。可是，我们可以想点办法，把你的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

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事，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这怎么行？”傅家杰不同意。

“这怎么不行呢？离了你，我们家也在地球上转呀！”

他提出种种具体困难，她一一讲出解决的方案，最后她说：

“你不是常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吗？你就放心吧！我能挑起这副担子，你的儿子不会饿肚子，你的女儿不会受委屈。”

他被说服了。他们决定从明天起就试一试。

“在中国，要干一点事情真不容易啊！”傅家杰脱衣上床时说，“战争年代，老一辈为了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很多牺牲。我们这一代人，为了实现四化，也在作出很多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常常不被人看见……”

傅家杰独自说着，当他脱下衣服搭在椅背上，回头看时，陆文婷已经睡着了。这回是真的睡着了。她的脸上还留着笑意，好像在睡梦中还为自己的这个倡议感到欣喜。

唉！谁会料到，这个试验在第一天就失败了。

十三

她的试验是失败的，她的手术是成功的。

那天上午，当她照例提前十分钟来到病房时，孙逸民迎着她说道：

“陆大夫，我正等你呢！今天有角膜材料，能做移植手术吗？”

“太好了。我正有个病人，急等着要做呢！”陆文婷立刻高兴地答应。

“你上午已经安排两个手术了。身体能顶下来吗？”

“能。”陆文婷挺直了身子，笑了笑，好像要证明她身上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力。

“好吧，那就做吧！”孙逸民决定了。

于是，陆文婷挽着姜亚芬的手臂，朝手术室走去。她精神愉快，步履轻捷，好像不是走向一个紧张的战场，而是走向一个可以安憩的地方。

这所医院的手术室占了整整一层楼，气派宏大。“手术室”三个大红字漆在乳白色的玻璃门上。当病人躺在活动床上，被护士推进这两扇玻璃门之后，他们的家属就只能徘徊于这森严的大门之外，提心吊胆地望着那神秘的、似乎是很可怕的地方。好像死神正在那里游荡，随时可以伸出魔爪夺走自己的亲人。

其实，手术室并不是死神的宫殿，它是一个给人以生的希望的地方。进入手术室宽阔的走廊，四周高大的墙壁刷成淡绿色，使屋内的光线变得很柔和。走廊两边分别是外科、妇科、耳鼻喉科、眼科的手术室。这里每个人都穿着白色消毒长袍，眉上都严严实实地戴着浅蓝色印有“手术室”字样的消毒布帽。人人眼下都是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这里的人没有美与丑之分，甚至也看不出男和女之别。这里只有医生、助手、麻醉师、器械护士。白色的人群轻轻地走来走去，他们的脚步是迅速的，又是轻盈的。这里没有笑语，没有喧哗，在这座每天拥入上千人的大医院里，手术室是最安静、最有秩序的一角。

焦成思被送进了手术室。他躺在高高的乳白色的铁架手术床上，被蒙在消毒的有孔巾下。他整个的脸都被蒙上了，只从那橄榄形的小孔内露出一只需要动手术的眼睛。

陆文婷早已换好衣服，高举起戴上橡皮手套的双手，在手术床头的圆形铁凳上坐下。这只活动的凳子，像自行车的车座似的，可以自由升降。陆文婷个子矮，每次手术都需要把凳子升高。今天没有调整，高矮却很合适。她扭头朝坐在一旁的姜亚芬看了一眼，心里明白，这是就要和自己分别的老同学放好的。

护士把手术床旁的托盘架推过来。那长方形的盘内有剪子、缝针、有牙镊、无牙镊、固定镊、持针器、蚊式止血钳、球后针头、晶体勺等等小巧玲珑的手术器械。这个可以移动的托盘架，现在正放在焦成思胸前的上方。医生可以抬手取到自己所需要的用具。陆文婷大夫坐在床头手术凳上，面对托盘架，正好像一个食客坐在餐桌前，隔在餐桌与食客之间的只是下面的一只眼睛。

“我们开始了。你不要紧张。先给你打麻药，这样，你的眼睛就没什么感觉。一会儿手术就做完了。”陆文婷看着那只眼睛说。

听了这话，焦成思忽然叫道：

“等一等！”

怎么啦？陆文婷和姜亚芬都吃了一惊。只见焦成思一把扯下那有孔巾，竭力朝后仰起头，又伸出手来，叫道：

“陆大夫，我上次这只眼睛，就是你做的手术吧？”

陆大夫把双手举得高高的，怕病人的手碰着自己经过消毒的手，还未答话，只听焦成思又那么激动地叫道：

“是你，是你，一定是你！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声调语气都一样！”

“是我。”陆文婷只好承认。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应该好好感谢你啊！”

“那没有什么……”陆文婷找不到更多的话说了。她遗憾地望着扯下来的有孔巾，示意站在一旁的护士再换上一条。然后又说，“焦副部长，我们开始吧！”

焦成思连声叹息着，似乎一时很难安静下来。陆文婷又用命令的语气说：

“不要动，不要说话！我们开始了！”

说着，她熟练地在眼睛下方皮下注射了奴佛卡因。然后，把病眼的上下眼皮分别用针穿上，拉开固定在有孔巾上。这样，一只被白色混浊体挡住了视线的眼珠，就完全暴露在灯光下了。陆文婷此时已经完全忘了躺在面前的是什么人，她只看到一只有病的眼珠。

这样的手术，陆文婷大夫不知做过多少次了。可是，每当她一上手术台，面对一只新的眼睛，拿起手术刀时，她的感觉都好像是初次上阵的士兵。这一次，也是这样。当她小心翼翼地把眼球结膜剪开，再把角巩膜半切开时，在一旁的姜亚芬已把穿好线的针递了过来。陆文婷伸出两个细长的手指，拿起像小剪刀一般的持针器，夹住针头，朝巩膜扎下去。

咦？不知为什么扎不动？她把浑身的力气都凝聚到了手指上，扎了几下，还是扎不进去。姜亚芬在一旁低声问：

“怎么回事？”

陆文婷没有答话，只把针拿起来对着灯光照看。把这半圆形像钓鱼钩似的针审视了一会儿，她回头问道：

“这针是不是新换的？”

姜亚芬也不知道，回头问器械护士：

“是换了针吗？”

器械护士走过来悄悄地说：

“是新换的。”

陆文婷又看了看针头，小声说：

“这种针怎么能用？”

为医疗器械的不合规格，陆文婷和大夫们不知提过多少次意见。然而，这些

不合格品的次品仍然经常出现在托盘里。没办法，陆文婷只好挑选使用。碰到好的刀、剪、针，她就请器械护士保存好，一用再用。

不知为什么，今天换了全新的一套手术包，偏偏碰上这么一个次品。每逢这种情况，一向温和的陆大夫就变了颜色，很严厉地责备器械护士。小护士虽有十分委屈，也不好辩白。是呀，一根针虽小，但在病人的巩膜上一扎再扎，不必要的延长手术时间，将会给病人增加多少不必要的痛苦！

此刻，陆文婷皱起双眉。病人正躺在床上，巩膜扎不动，她又不能让病人知道内情，只低声吩咐了一句：

“换一根针来！”

她的声音完全是命令式的，护士忙从消毒盒里把旧针拿了来。

手术室的护士们对陆文婷大夫七分佩服，三分畏惧。佩服的是陆大夫手术漂亮，怕的是她要求严格。眼科被称为手术科。眼科大夫的威望全在刀上。一把刀能给人以光明，一把刀也能陷人于黑暗。像陆文婷这样的大夫，虽然无职无权，无名无位，然而，她手中救人的刀就是无声的权威。

针换来了。陆文婷很快在巩膜上把预置线缝上，只等把白内障摘除后，把缝线结扎上，这手术就成功了。谁知，就在她把巩膜全切开时，有孔巾下的焦成思忽然身子一动。

“不要动！”陆文婷严厉地说。

姜亚芬也急忙在一旁说：

“不要动！你怎么回事？”

可是，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从有孔巾下传了出来：

“我……要咳，咳……嗽！”

啊！真被秦波说中了！怎么偏偏在这关键时刻要咳嗽？也许只是他的一种心理作用，一种条件反射吧？陆文婷问道：

“能忍一忍吗？”

“不……不行……”焦成思的胸部已经在不停地起伏了。

任何有经验的眼科大夫，在做这种手术时，当病人的眼珠被打开的一刹那，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而在这时，最忌讳的是病人咳嗽。

事不宜迟，陆文婷一面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安慰着病人：

“等一下！你呵气，呵气，先别咳出来！”

她一边说，一边两手不停地忙着，把刚缝上的预置线结扎起来。焦成思在大口大口地呵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好像马上就要憋死过去。待最后一个结打完，陆文婷舒了一口气，说：

“你可以咳嗽了！轻一点！”

然而，焦成思并没有咳出声来。他的呼吸又慢慢恢复了正常。

“你咳吧，不要紧了。”姜亚芬在一旁说。

焦成思很抱歉地说：

“真对不起，我不想咳嗽了，你们做吧！”

姜亚芬瞪起大眼，几乎想说，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不能控制自己。陆文婷朝她看了一眼，她才没有说出来。两人却相视一笑。类似这种情况也是经常有的啊！

陆文婷又把结扎好的线剪掉，手术从头做起。这次很顺利地做完了。当陆文婷离开手术凳，坐在小桌前开处方时，焦成思已经被挪到活动床上，护士正准备把他推走，他叫道：

“陆大夫！”这微微带着颤抖的声音，很像出自一个做错事的男孩子口中。

陆文婷走到两眼缠着纱布的焦成思身旁，弯下腰问道：

“你怎么啦？”

焦成思伸出两手在空中摸着，抓到陆文婷还未脱去手套的手，他使劲握了握说：

“两次手术，都给你格外添了麻烦，真过意不去……”

陆文婷愣了一下，盯着这缠着十字形纱布的脸，安慰地说：

“没什么，你好好休息，过几天给你拆线！”

焦成思被护士推走了。陆文婷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本来四十分钟可以完的手术用了一个钟头。她脱下身上的这一件手术袍，摘下橡皮手套，又伸臂套上另一件刚从包里取出的消毒袍。当她转身等护士给她系上后面的腰带时，姜亚芬问道：

“接着做吗？”

“做。”

十四

“这个手术我来做，你休息一下，做下一个。”姜亚芬说。

陆文婷摇头笑道：

“还是我来吧。你不知道这个王小嫚，她害怕得要命。这两天跟我熟了，还好一些了。”

王小嫚不是躺在床上被推进来，而是被护士半拉半拽带进手术室的。她被罩在一套嫌大的白色病服里，扭扭捏捏不肯上手术床。

“陆阿姨，我害怕，我不做了，您出去跟我妈说！”

一见手术室里大夫和护士的打扮,王小嫚更紧张了,心跳得嘭嘭的,她求救似的朝陆文婷喊着,想挣脱护士的手。

陆文婷走到床头,笑着招呼她说:

“来呀,小嫚,我们不是讲好了吗?要勇敢呀!我给你打麻药,保证你一点儿都不疼!”

王小嫚从上到下打量着变了样的陆大夫,最后又直盯着她的眼睛。从那双温柔的含着笑意的眼睛里,孩子似乎找到了力量。她身不由主地上了手术台。护士给小病人罩上有孔巾。陆文婷示意护士把孩子的手腕用床两边的带子系上。王小嫚刚要反抗时,陆文婷坐在床头说:

“王小嫚,听话呀!谁都要捆上手的。你别动,一会儿就完了!”说着,就给注射麻醉剂,一边打一边说,“我在给你打麻药了。打完了,你就一点儿也不疼了。”

这时,陆文婷不仅是一位手术医生,而且是一个溺爱孩子的妈妈,甚至是一名幼儿园的阿姨。她一边从姜亚芬手中接过适时递过来的剪子、镊子和各种特殊用处的手术针,一边细声细语地同小病人说着话。当她用小剪刀剪去眼里造成斜视的多余的肌肉时,牵动了神经,王小嫚哼哼起来,感到恶心。陆文婷忙说:

“有点恶心吧?不要紧,坚持一会儿。嗯,真听话!还恶心吗?好点了吧?一会儿就做完了,真是好孩子!”

王小嫚就在这动听的催眠曲中,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接受了手术。当她被缠上绷带推出手术室时,她清醒地记起了妈妈嘱咐的话,甜甜地说了一句:

“谢谢阿姨!”

手术室的大夫和护士都笑了。墙上挂钟的长针才走了半圈。

这时,陆文婷已经浑身是汗。额头渗出了汗珠,贴身的背心汗湿了,连手术袍的两腋也汗湿了。她自己 also 感到奇怪:天气并不热,怎么出这么多汗?她轻轻抡了一下胳膊,那由于长时间悬空操作的双臂,好像已经酸痛得麻木了。

当陆文婷再次脱下身上的长袍,伸出手臂去套另一件新袍的一刹那,她忽然感到眼前冒起一排金星。她把眼闭了一下,把头晃了几晃,然后慢慢地把手伸进袖子里。护士过来给她束好腰带后,忽然端详着她问道:

“陆大夫!你怎么嘴唇发白?”

正在一边换手术袍的姜亚芬回头一看,不禁也吃惊地问:

“真的,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的确,陆文婷的脸色十分难看。青白的脸上两个乌黑的眼圈,好似上妆的演员用炭笔画出来的。上下眼皮都肿了起来,完全是一副病容。

见姜亚芬那么盯着自己,陆文婷笑了笑说:

“怎么啦?过一阵就好了。”

她不仅嘴上这么说,心里也确信自己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多少年来不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吗?

“手术还接着做吗?”护士站着不动。

“做呀!”

怎么能不做呢?角膜材料不能搁,病人不能久等,当然要做呀!

姜亚芬走上前去说:

“文婷,休息半个钟头再做吧!”

陆文婷抬头看了看挂钟,已经十点过了。推迟半小时,到食堂吃饭的同志就赶不上开饭时间,要吃凉菜;双职工也赶不上回家给孩子做饭了。

“接着做吗?”护士又问。

“做。”

十五

经特许来观摩移植手术的外院和本院的进修大夫们来了,正站在门外和陆文婷说话。

张老汉已又说又笑地被护士扶上了手术床。手术床对于这身材高大的老汉是太小了。他那一双穿着布袜子的大脚悬空搁在床外,两只胳膊也半悬在床侧。甚至于他浑身的精力也好似悬在四周。他真像一棵坚硬的橡树,那么高大,那么结实。他的嗓门真大,他一刻也憋不住,正和护士说着话儿:

“姑娘,您别笑话,要不是巡回医疗队去我们村,说死了我也不敢挨这一刀。您想,我的肉,你的刀,这一刀子下去,是好是歹谁知道呀!哈哈!”

年轻护士抿嘴儿笑了,又悄悄嘱咐他:

“老大爷,您小点声儿!”

“这我懂,姑娘,医院嘛,那可是个肃静的地方。”说是说,老汉的嗓门并不见小多少。他又抬起一只胳膊,比划着说,“唉,您不知道,一听说我这眼睛瞎了还能治好,我是又想哭又想笑。我爹就瞎了半辈子,临了就那么窝窝囊囊地入了土。没想轮到我这儿,瞎了还能见太阳。您说,是两个世道不是?说到哪儿,我也得说,社会主义好!”

小护士一边抿嘴儿笑着,一边给这兴奋得直要坐起来的病人蒙上有孔巾,一边嘱咐说:

“老大爷,您可别动了,这是消了毒的,一碰就脏了!”

“那是!”张老汉十分认真地说,“入乡随俗。到哪儿听哪儿的,入了医院,就得守医院的规矩。”说是说,他那粗大的胳膊又想往上抬。

一旁的护士瞧着不放心,拿起拴在手术床旁的带子说道:

“老大爷,给您手腕系上点儿,这是医院的规矩!”

张老汉一愣,继而又哈哈笑道:

“您就捆吧,这还用说!说实话,姑娘,要不是这双眼制的我,我可不是那老实待着的主儿。就这,我在家还一天下两遍地。唉!生就的兔子脾气,就爱满世乱蹦达,待不住呀!”

小护士又被他说得笑了起来,他自己也嘿嘿地笑了。当陆文婷刚一迈进来,他立即止住了笑,侧耳一听,就叫了起来:

“陆大夫!是您吗?我一听就听出来了。也怪,这眼一瞎,俩耳朵倒透着那么好使。没法子,耳朵当眼睛使了。”

陆文婷望着这充满活力的病人,听着他的话,也不由笑了。她坐下来,开始了手术前的准备工作。从托盘架上的一个小杯里取出珍贵的角膜材料,先缝在纱布的眼珠模型上。这工夫,张老汉又说话了:

“这眼珠子还能换,我可一辈子头回听说!”

姜亚芬笑道:

“不是换眼珠,是换眼珠上边的一层膜。”

“嗨,那都是一码事儿!”张老汉并不深究其详情,只自顾自地感叹着,“您说,这得多高的手艺!等我带俩好眼睛回去,村里人别说我遇了仙呢!哈哈!我得告诉他们,我遇见了陆大夫!”

姜亚芬“扑哧”笑了,冲着陆文婷直眨巴眼儿。陆文婷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了,一边缝,说了一句:

“别的大夫也一样做的。”

“那是!”张老汉肯定地说,“闹着玩儿的吗?没能耐的大夫他也迈不进这大医院的高门坎儿呀!”

准备工作完毕,陆文婷用开睑器撑开了病人的眼睛,同时说道:

“我们开始了。你不要紧张。”

张老汉可不像一般病人那么默默地听着,他觉得大夫跟你说话,你不吭气儿是不够礼貌的。于是,他十分通情达理地答道:

“不紧张,不紧张,没事儿,疼点儿也没啥。您想这个理儿,动刀动剪子的还有个不疼的吗?您尽管放心动刀!我信得过您,再说……”

姜亚芬笑着拦住他说:

“老大爷,您可不准再说话了。”

张老汉这才不言语了。

陆文婷开始操作。她拿起像钢笔帽口那么小的环钻,轻轻地把病人坏死的

角膜取下。又拿过那块缝在纱布上的材料,用同一环钻切下同样大小的一块,按在病人的眼珠上。然后拿起持针器,细心地一针一针地缝了。

在一块只有钢笔帽口那么点的角膜周围,需要缝上十二针。这不是在服服帖帖的布面上缝,是在溜滑菲薄的一层膜上缝。每缝一针,她似乎都把自己浑身的力量凝聚在手指尖上,把自己满腔的热血通过那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青线,通过那比绣花针儿还纤小的缝针,一点一滴注入病人的眼中。此时,她那一双看来十分平常的眼睛放出了异样的智慧的光芒,显得很美。

手术极其顺利,最后一针缝好了,最后的一个结扎上了。那移植上去的圆形材料,严丝合缝地贴在了病人的眼珠上。如果没有四周黑色的线结,你简直认不出那是刚刚才换上去的。

“手术真漂亮!”围观的大夫们悄悄发出由衷的称赞。

陆文婷轻轻舒了一口气。旁边的姜亚芬抬起眼睛,感动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老同学,没有说话,把一叠厚厚的长方形纱布盖在病人的眼上。

张老汉被挪到活动床上往外推时,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他顿时活跃起来,人到了门外,还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喊了一声:

“陆大夫,让您受累了!”

手术结束了,陆文婷想站起来。可是,只觉得双腿发麻,站不起来。她停了停,又试图站起,这样好几次,才站了起来。一阵腰部的酸痛突然向她袭来,她反过一只手按住腰。这在她也是常有的事。每当她聚精会神地在这张圆凳上坐了几个小时,全部智与力都集中在手术时,她丝毫也不觉得身体的劳累。可是,当手术一结束,她就觉得浑身像散了架,连迈步都很困难了。

十六

这时,傅家杰正骑着自行车往家跑。

本来,他是不准备回家的。根据昨天晚上陆文婷的建议,傅家杰今天一早就把被褥打成包,捆在车后座上,带到研究所,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到了中午下班时,他的决心动摇了。今天她在病房,手术能按时完吗?一想到她疲乏不堪地走进家门,又要手忙脚乱地做饭,总觉得过意不去。他还是蹬上车回家了。

就在他骑着车刚拐进胡同口时,一眼就看见陆文婷扶着墙站在那儿,好像走不动了。

“文婷!怎么啦?”傅家杰喊了一声,赶紧下车搀住她。

“不要紧,有点累。”陆文婷把胳膊搭在傅家杰肩上,一步一步走回家里。

她只说有点累,可是傅家杰见她脸色苍白,一头冷汗,不放心地问: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陆文婷闭着眼睛在床边坐下说:

“不用了。歇一会儿就好了。”

她指指床,好像没有力气再说话,也不愿再动了。傅家杰替她脱了鞋,脱了外衣,说:

“那你先躺一会儿,休息休息,我一会儿叫你……”

“不用叫,”她躺下时还说,“我反正睡不着,躺一躺就好了。”

傅家杰转身出去,坐上一锅水,又回到屋里来取挂面时,还听见陆文婷说:

“是该休息休息。这个星期天,我们带孩子到北海玩一趟吧!十多年没有去过北海了!”

“好呀,我赞成!”傅家杰口里答应着,心里却疑惑起来:十多年没去北海了,也没有动过去北海的念头,怎么她今天突然提起要去北海?

傅家杰不安地望了望躺着的妻子,转身出去煮面。他又切了点葱花、几片榨菜分放在碗里。当他端着面进屋时,陆文婷已经睡着了。他见她闭目静睡,没忍心叫醒她。园园回来,他们就一块吃起面来。

正在这时,陆文婷在床上呻吟起来。傅家杰忙撂下碗转身到床前,只见陆文婷面如白纸,一头冷汗,微微喘着叫道:

“不行了!”

傅家杰吓慌了,攥着她的指尖,忙问:

“你哪儿不舒服?哪儿疼?”

她只痛苦地挣扎着,指了指左胸,答不出话来。

傅家杰在屋里乱转。他一会儿打开抽屉找止疼片,一会儿想想不对,又去找安定片。

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中,陆文婷似乎还是冷静的。她用手势止住了傅家杰的慌忙,尽力说了三个字:

“上医院!”

傅家杰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们共同生活十几年来,陆文婷虽然天天去医院上班,可从来没有自己提出来去医院看病。她显然病得不轻。傅家杰顾不得多想,回头就往外走,到门口又扭头说了一声:

“我去叫出租汽车!”

公用电话在胡同口上。他忙忙拨了汽车公司的号码,接电话的人冷冷地说:

“现在没有车。”

“喂,喂,我是送病人呀!”

“那也要等半个钟头！”

傅家杰还想哀求，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上了。

他没办法，赶紧给陆文婷所在的医院打电话。眼科办公室没人接，他让总机接到汽车队。汽车队的一个同志回答他：

“没有领导批的条子，不能派车。”

他上哪儿去找领导批条子呢？

“喂，喂！”他冲话筒嚷着，那边已经没有声音了。

他又给医院政治处打电话。政治处总该过问一下这种事吧？

电话铃声响了半天，才有一个女同志来接。听完他的话，这位女同志很客气地答道：

“请你和行政处联系一下吧！”

他又请总机把电话转到行政处。总机的电话员都听出了他的声音，不耐烦地问：“你到底要哪儿？”到底应该要哪儿呢？傅家杰也搞不清了。他只央求给接行政处。接通了，叮铃铃，叮铃铃响了半天，根本没有人接电话。

傅家杰彻底失望了。他放弃了叫汽车的念头，转而去叫平板三轮车。胡同里有一家做纸盒的“五·七”工厂，常常用三轮车运货。他跑到工厂说明情况，那主事的老太太倒挺同情，可惜帮不上忙，厂里仅有的两辆平板三轮都派出去了。

怎么办？傅家杰站在胡同里，差点要急疯了。用自行车推吧？她看来坐都坐不住，怎么推？

这时，一辆浅灰色的“一三〇”小卡车开了过来。傅家杰来不及多想，就两步站到路中央，向司机举起手来。

车停了下来。从驾驶室探出一张满腮胡子的脸来，大眼珠瞪着拦车的人。可是，当他听说家里有人得了急病，需要立刻送医院时，二话没说，就把手一挥，招呼傅家杰上车。

“一三〇”开到傅家杰家门口停下。等傅家杰搀着陆文婷一步一挨地走到车边时，司机忙伸出大手来把陆文婷扶进驾驶室，一直小心地把车开到医院的急诊室。

十七

从来没有睡得这么久，从来没有睡得这么累。陆文婷觉得好像是从高高的云端摔落下来，跌得浑身疼痛难禁，没有一点力气了。这突然的静卧，四肢休息了，心也静了下来，脑海里几乎成了一片空白。

多少年来，她奔波在生活的道路上，没有时间停下来，看一看走过的路上曾

有多少坎坷困苦;更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未来的路上还有多少荆棘艰难。如今,肩上的重担卸下了,种种的操劳免去了,似乎有足够的时间去寻找过去的足迹,去探求未来的路。然而,脑子里空空荡荡,没有回忆,没有希望,什么也没有。

啊!多么可怕的空白!

也许,这只是一个梦,一个寂寞的梦。过去,也曾有过这样的梦,也是这样孤独,这样悲凉……

那一年,她还是一个五岁的小姑娘。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妈妈出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天黑了,妈妈还没有回来。她第一次感到孤单、感到恐怖。她哭着,喊着:“妈妈……妈妈呀!”后来,这情景,常在她的梦中萦绕。那怒吼的风声,那被吹开了的房门,那昏暗的油灯,是如此逼真。竟使她长久以来分辨不清,是当真入梦,还是把梦当真。

不,这一回不是梦,是真的了!

自己是躺在病床上,家杰还守在自己身旁,看,他累了。他歪倒身子靠在床沿上睡着了。他会着凉的,应该把他叫醒。可是她试了几次,总听不见自己的噪音。喉咙好像被什么卡住了,叫不出声来。她想伸过手去,拉一件衣服给他披上,可是手动不了,它好像不是属于自己的了。

她朝四周打量了一眼,发现自己是躺在单人病房里。这种“特殊照顾”通常都属于垂危的病人。她忽然感到一阵恐怖:难道我也……

瑟瑟的秋风叩打着门窗,沉沉的夜色吞噬着病房。她出了一身冷汗,神智反而清醒了。她意识到眼前的一切真真实实,这确实不是梦。这是生的尽头,这是死的来临。

死亡原来是这样的,并不可怕,并不痛苦。它不过是生命逐渐地枯萎,意识逐渐地朦胧,它不过是缓缓地沉落,像一片漂在水中的叶儿,正随波逝去,终致淹没在水底。

她觉得一切都无可挽回地结束了。汹涌的波涛漫过了她的胸前,她正随水而去……

“妈妈……妈妈……”

她听见佳佳在呼喊,她看见佳佳沿着河岸追来。她忙回过头去,伸开双臂喊道:

“佳佳……我的女儿……”

流水把她席卷而去。佳佳的面容模糊了,沙哑的呼喊变成了可怜的抽噎:

“妈妈……我要梳小辫儿……”

为什么不给她扎小辫儿呢?她来到人间才六个年头,她对生活的希望,不过是扎上两个小辫儿。每逢看见那些扎着小辫、系着蝴蝶结的小姑娘,她是多么羨

慕！可是，就连这一点小小的要求，她都不能满足她。她没有时间，星期一早上医院的病人也最多，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对她来说都是宝贵的。

“妈妈……妈妈……”

她听见园园在呼喊，她看见园园沿着河岸追来。她忙回过头去，伸出双臂喊道：

“园园……园园……”

一个浪头把她打下去，她挣扎出水面，园园已经看不见了，只有他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妈妈……别忘了……白球鞋……”

各式各样的球鞋像装在万花筒里，在她面前转开了：白色的、蓝色的，高筒的、矮帮的，白色带红边的，白色带蓝边的。给园园挑一双吧，他脚上的鞋早已破了。给他买一双白球鞋吧，他会高兴一个月。可是，顷刻间，这样那样的球鞋都消失了。一张张标价牌迎面打来：三元一角，四元五角，六元三角……

家杰追来了。流水倒映出他狂奔的身影。他跑得那么急，他的声音在发抖：

“文婷，你不能走……”

她多么想停住，等他追来，拉自己一把。然而，流水无情，她身不由主随波逐流！

“陆大夫！陆大夫！”

两岸有多少人在呼喊她啊！穿着白大褂的亚芬、老刘、赵院长、孙主任，穿着病房衣服的焦成思、张老汉、王小嫚，还有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病人，都在喊着，喊着。

他们在喊我？我不能走，是不能走啊！在这世界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了结，还有很多责任没有尽到。我不能让园园和佳佳变成没有妈妈的孤儿。我不能让家杰遭到中年丧妻的打击。我离不开我的医院，我的病人。离不开啊，离不开这折磨人而又叫人难舍的生活！

我不能在这死亡之水中沉没。我要挣扎，我要反抗，我要留在人间。可，我怎么那么累呢？我没有力气反抗，没有力气挣扎，我正在沉下去，沉下去……

啊！永别了，园园！永别了，佳佳！你们还会想起妈妈吗？在这生命的最后一息，妈妈是带着对你们深深的眷恋离去的。我多么想念你们，让我紧紧地搂住你们，听我对你们说：孩子啊！原谅妈妈对你们爱得太少，原谅妈妈不得不一次次缩回向你们伸出的双臂，推开你们扑向我的笑脸，使你们在幼小的年纪就离开了妈妈的怀抱。

永别了，家杰！你为我付出了一切。没有你，我的生活寸步难行。没有你，我活在这世界上索然无味。啊，你为我做了多么大的牺牲！如果允许我忏悔，我将

跪倒在你面前,请你原谅,原谅我没有能报答你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原谅我对你照顾得那么少,给你的那么少。多少次我想着,等我稍许空一点,我要多尽一点妻子的责任,我要按时下班回家,让你吃上一顿现成的晚饭。我要把三屉桌让给你,给你创造条件,写完你的论文。遗憾啊,晚了,我再也没有时间了。

永别了,门诊的病人!住院的病人!十八年来,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属于你们。无论我行、走、坐、卧,回旋在我脑际的是你们,是你们的眼睛!你们不知道,每治好一只眼睛,你们给予我——一个医生,多少巨大的慰藉和快乐。可惜,这种快乐再也不会有了!

永别了,我的亲人!永别了,医院!永别了,我的病人!我是舍不得离开你们的啊!

我……

十八

“心动异常!”监视着荧光屏的大夫叫了起来。

“文婷,文婷!”傅家杰望着呼吸困难的妻子,尖声喊叫着。

值班室的大夫和护士们跑来了。

“静脉注射利多卡因!”值班大夫命令说。

护士飞快地把针头挑进病人的静脉。可是,刚注入一半,病人已经两手攥成拳、嘴唇发青、眼睛朝上翻去。可怕的阿斯氏综合征出现了。

陆文婷大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紧张的抢救开始了。几个大夫轮流为病人进行人工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器也罩在病人脸上,发出“咕哒、咕哒”的声响。心脏去颤器打开了,当用这特殊的器械向病人胸部一击之后,病人的心脏又开始了跳动。

“准备冰帽!”值班大夫满头大汗地说。

陆文婷的头被套上了橡皮冰帽。

十九

窗外的天空泛出青色,天终于亮了。陆文婷大夫的生命挨过了危急的夜晚,也进入了新的一天。

接班的护士走来,轻轻拉开紧闭了一夜的百叶窗。一股清新的空气和着鸟儿欢乐的鸣叫一齐扑进病房,顿时冲淡了这里浓烈的药味和沉重的气息。黎明给垂危的生命带来了希望。

量体温的护士,送早饭的卫生员,接早班的大夫,川流不息地来了。在床上度过了一夜的病人似乎又重新燃起了生的希望,病房里呈现出新的生机。

王小嫚头上斜缠着纱布,包着那只经过手术的眼睛,向内科病房的护士苦苦哀求:

“让我去看看陆大夫!就看一眼!”

“不行。陆大夫昨天晚上刚抢救过来,谁也不能进去!”

“阿姨!你不知道!她就是给我做手术,才病的呀!叫我去看看吧!我一句话都不说……”

“不行!”护士板起脸来。

“看一眼都不行呀?”王小嫚要哭了。这时,她一扭脸,看见张老汉正扶着他的小孙子走过来,忙扑上去叫道,“张大爷,您快跟她说说,她不让进……”

张老汉头上缠着纱布,被王小嫚拉到护士面前。他站定了说:

“同志啊!让我们进去瞧一眼吧!”

护士一见,又来了个老大爷,生气地嚷了起来:

“眼科的病人怎么到处乱窜啊!”

“嗨!瞧您说的,您咋不懂啊!”张老汉的嗓门可小多了。他低声下气地说,“您不知道这内里详情。陆大夫为啥病倒的?就为给我们开刀呀。唉!说实话,我瞧也是瞧不见。我寻思,在她床边站站,也算尽我这点心意。”

这护士心眼儿软,见大爷情真意切,只好耐心劝道:

“不是我不叫你们进去。陆大夫得的是心脏病,不能激动。你们不是为她好吗?你们去了一惊动,对她反而不好。”

“唉!是这个理儿。”张老汉长叹了一口气,在过道长椅子上歪身坐下,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后悔不迭地埋怨自己,“都怪我这老头子,催呀催呀,催个没完,硬挤着要早点动手术。唉!真没想到……这,陆大夫要是有个好歹,这可怎么好啊!”

老汉说着,伤心地低下了头。

孙逸民也赶在上班前来看望陆文婷。他忙忙地走着,不意被王小嫚一把拉住。

“孙主任,您是去看陆大夫的吧?”

孙逸民点点头。

“带我进去看看吧!嗯?”

“过些日子吧,现在不行。”

张老汉也闻声站了起来,摸索着拉住孙逸民的袖口说道:

“孙主任,听您的,我们就不进去。可,我有句话,今儿不管您多忙,您得听我

把话说完。”

孙逸民用另一只手拍着张大爷的胳膊说：

“好，您说吧！”

“孙主任！陆大夫可是个好大夫。你们当领导的，可得花本钱给她治啊！您把她救好了，她能救好些人哪！不是有那好药吗？给她吃，别舍不得！我跟人打听，吃那贵重的药得自个儿掏钱。陆大夫拉家带口的，这又一病，她能掏得起吗？医院这么大，能给她掏点不？”

张老汉住了嘴，两手拉着孙逸民，脸向着他，侧过耳朵，期待着回答。

孙逸民为人古板，从不喜怒形于色。但这一次，他被老汉的话打动了，激动地握着老汉的手说：

“我们一定尽一切努力给她治病！”

张老汉似乎才把心放下，又叫过孙子来，摸着他的胳膊上的布书包，对孙逸民说：

“给，几个鸡蛋，您能进去，您给她带进去！”

孙逸民忙说：

“这个，不用了。”

张老汉顿时生气了，拉着孙逸民大声说：

“您不拿进去，今儿我就不走！”

孙逸民只好接上一书包鸡蛋，打算等会儿再叫护士给送回去，解释一下。谁知，张老汉却猜到了，又说道：

“孙主任，您要叫人送回来，我可不依您！”

孙逸民无法，只好拿着鸡蛋，直把这一老一小送下楼去。

这时，赵天辉陪着秦波朝内科病房走来。

“赵院长，我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你怎么也不了解情况哟？”秦波边走边说，神情非常激动，“要不是老焦把她认出来，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

“那一段我也在干校啊！”赵天辉无可奈何地答了一句。

他们进入病房时，孙逸民也走了进来。内科大夫汇报了昨晚的险情和抢救情况。赵天辉又看了看病房记录，点头说：

“要继续密切监视。”

傅家杰见来了这么多人，忙站了起来。秦波根本没有看见他，抢上去就在那张圆凳上坐下说：

“陆大夫，你好一点吗？”

陆文婷双目微启，没有应声。

“焦部长都跟我讲了。”秦波叹息道，“他很感谢你。他本来要亲自来看你，我

没让他来。我代表他来看你。你想吃什么,缺什么,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们帮你解决,不要客气,大家都是革命同志。”

陆文婷闭了闭眼睛。

“你还年轻,要乐观些。对待疾病嘛,既来之,则安之,这……”秦波还想说下去。

一旁的赵天辉拦住她说:

“秦波同志,让病人休息吧,她刚好一点。”

“行,行,你好好休息吧!”秦波一边抬身站起,一边说,“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走出病房,秦波又皱起双眉对赵天辉说:

“赵院长,我可要给你们提个意见呀,像陆大夫这样的人才,怎么平时不关心,让她病成这样呢?中年干部,现在是我们的骨干力量,我的同志哟,要珍惜人才呀!”

“对。”赵天辉答道。

望着她远去的身影,傅家杰小声问孙逸民:

“她是谁?”

孙逸民从镜片上方望着门,皱了皱眉头,答道:

“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

二十

这一天,陆文婷大夫的病情略有好转。她能不大费力地睁开眼睛了,她还喝了两匙牛奶和一点橘汁。但,她仰卧着,两个眼睛直视着一个地方,目光是呆滞的,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对四周的一切幸与不幸都很淡漠,对自己的重病以及这给全家带来的厄运也很淡漠。她那无动于衷的可怕的呆滞,简直是对人生的淡漠了。

傅家杰从未看见过她现在的这种样子。他被吓坏了。他连连唤她,她只轻轻晃动了一下手掌,好像不愿让人惊动,好像她在那种令人担心的半麻痹状态中感到舒服,决心把自己永远禁锢在那里面。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傅家杰紧张地坐在陆文婷床边,已经两夜没有合眼了。他觉得自己也到了疲劳的顶点,也在断裂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一阵撕裂人心的哭叫声,震动着每一个病房,也把傅家杰从麻木的疲惫状态中惊醒。

只听见隔壁房间里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在厉声哭叫:“妈、妈妈呀!”接着是一个男子呜呜的哭声。再接着是一阵混杂的脚步声,好像很多人朝隔壁拥去。

傅家杰也奔到病房门口。他看见,先是一张病床从房里推了出来。床上严严实实地罩着一条白被单,蒙着一位死者的遗体。接着露出护士白色的身影,她轻轻地推着这活动床。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猛地从房中追了出来。她头发散乱,浑身颤抖,扑过来双手痉挛地抓住床沿,泪流满面地哀哀哭叫:

“别推她走!别推她走!我妈妈睡着了!她会醒的,会醒的呀!”

往来探视病人的家属被堵塞在过道里。人们让开一条道,用静默来表示对这位陌生的死者的哀悼。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移动脚步,似乎怕惊扰了被单下安息着的灵魂。

傅家杰也呆立在人群中,双脚像被钉子钉在那里了。他那明显变得消瘦的脸上,两个颧骨凸起。浓眉下布满红丝的眼睛里闪着泪花。他把汗湿的手掌紧紧捏成拳头,仍然克制不住周身簌簌地颤抖。他几乎想用手蒙住耳朵,不愿再听那凄厉的哭声。

“妈,妈妈呀!你醒醒,醒醒呀!他们要把你推走了!”那女孩子疯狂地喊着,扑过去要掀那被单,好不容易才被两旁的人拉住。

那个尾随在床边痛苦的中年男人,一边哭,一边反复喊着一句话:

“我对不起你呀!……我对不起你呀!”

这绝望的喊声像一把尖刀刺进傅家杰的胸膛。他睁着眼,紧盯着从他面前缓缓推过的这张床,紧盯着那无情的白被单下隆起的遗体。突然,他像触了电似的,猛然朝陆文婷的病房跑去。他一口气跑到她的床前,一头扑在她枕边,闭着眼,喘着气,嘴里只喃喃地重复着三个字:

“你活着!你活着!你活着!”

他那粗重的喘息声,惊醒了半睡中的陆文婷大夫。她睁开眼来,朝他望了望,又好像并没有看见他。

这呆滞的目光,使傅家杰浑身发抖,他失声喊道:

“文婷……”

陆文婷的眼光又停留在傅家杰脸上,仍然是那种冷漠的眼光。这眼光令人胆寒心碎,使人感到她的灵魂已经飞离身躯,正在太空中遨游。

傅家杰不知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唤回她对生的热望。这是他的妻子,是他在世上最亲的亲人。从那年冬天和她漫游北海,给她念诗,到如今,多少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她一直是他最亲的人。他不能没有她。他要留住她!

诗!念诗吧!还像当年那样念诗吧!十多年前,是动人的诗句打开了她的心房。今天,再用同样的诗句唤起她最美好的回忆,唤起她对生的欲望和勇气吧!

于是,傅家杰半跪在她床前,含泪念道:

我愿意是激流，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条小鱼，

在我的浪花中，

快乐地游来游去。

这诗句，好似惊动了她，她侧过脸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嘴唇动了动。傅家杰挨近她，听懂了她含混不清的话：

“我不能……游了……”

傅家杰忍下眼泪，又念道：

我愿意是荒林，

……

只要我的爱人，

是一只小鸟，

在我的稠密的，

树林间做窝、鸣叫……

陆文婷又轻轻吐出几个字：

“我……飞不动了……”

傅家杰心痛难忍，但他仍含泪念下去：

我愿意是废墟，

……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春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这时，陆文婷眼里滚出两行晶莹的泪珠，默默地顺着眼角滴到雪白的枕头上。她又吃力地说：

“我……攀不……上去了！”

傅家杰扑在她身上，像孩子似的哭起来：

“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

他睁开泪眼，呆住了。只见陆文婷的眼光又像先前一样停在一个地方，呆呆地停着，似乎没有听见他的哭声，没有听见他的叫声，对身旁的一切都漠不关心了。

病房大夫闻声赶来，见这情景，对傅家杰说：

“陆大夫身体很弱，你，不要跟她多说话！”

傅家杰就这样无言地守了一个下午。黄昏时，陆文婷好像又好了一些，她把头转向傅家杰，双唇动了动，努力要说什么的樣子。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你说吧！”傅家杰攥住她的手哀求道。

她终于说了：

“给园园……买一双白球鞋……”

“我明天就去买。”他答着，泪水不自主地滴了下来，他忙用手背擦去。

她望着他，还想说什么的樣子。半天，才又说出几个字来：

“给佳佳，扎，扎小辫儿……”

“我，给她扎！”傅家杰吞吐着。他透过泪水模糊的眼望着妻子，希望她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可是，她闭上嘴，好像已经用尽了力气，再不开口了。

二十一

两天以后，傅家杰收到一封寄自首都机场的信。他打开看到——

文婷：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见到这封信。也许，它将是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信。我多么希望不会是这样的，我也相信绝不会是这样的。这次，你病得很重，但我总觉得你会好起来的。你还能干很多事情，你正是出成果的时候，你不应该这么早就离开我们！

昨晚，我和老刘去向你告别时，你还昏昏地睡着。我们本来准备今天上午再去看你，可是临行前的琐事太多了，实在抽不出时间。一想到昨夜一别，也许会成为我们最后的一面，我的心就发抖。同窗共事二十余年，知我者莫如你，知你也莫如我，想不到我们竟是这样地分别了。

现在，我在首都机场候机室里给你写信。你知道我站在什么地方吗？就在二楼出售工艺美术品的柜台边上。这里没有人，只有玻璃柜里陈列的展品对着我。还记得吗？我们俩第一次坐飞机，也曾来过这里，还在这个卖工艺品的柜台前欣赏了半天。有一盆水仙做得那么逼真，那么姣好，细细的绿叶上还滴着露水珠。你说你最喜欢了。弯下腰一看标价，把我们俩都吓跑

了。唉！现在我一个人站在这柜台前，又有一盆水仙，只不过花盆是另一种黄色的。那一盆，想必被人买走了。我望着这盆水仙花，不知为什么，只想哭。我忽然想到，一切都过去了。

记得傅家杰刚认识你的时候，有一次他到我们宿舍来，随口念了一句普希金的诗：“一切过去了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当时我直撇嘴，说这话不确切，还质问他：“过去的幸也怀念吗？”傅家杰笑笑，拒绝和我辩论。他心里一定认为我不懂诗。今天我忽然懂了！我觉得这句诗太确切了，简直是我此时此刻心情的写照，简直是为我写的！我真的觉得：一切过去了的都是那么亲切，那么让人怀念啊！

耳边又听得一阵隆隆声，又是一架飞机起飞了，不知要飞到哪里去？再过一个钟头，我也要登上舷梯，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一想到足踏在故国土地上只有六十分钟了，我忍不住泪水，我哭了，把信纸打湿了。可是，文婷，我没有时间换一张纸了，就这么写下去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伤心，我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错事，我不该走的。我舍不得这里的一切，舍不得！舍不得我们的医院，舍不得我们的手术室，舍不得门诊室里我那一小张小桌子！我常在背后说孙主任凶，不允许人家有一点错。现在，我愿再听一声他的斥责。他是个多么严厉的老师，没有他的苛求，我不会有今天这一手技术！

广播又响了起来，在祝愿旅客一路平安。能平安吗？想到就要上飞机了，我心里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漂泊在天空的气球，不知将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又将是什么？我心神不定，甚至感到害怕！是的，是害怕！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同我们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我们能适应吗？怎么能不害怕呢？

老刘坐在那边的沙发长椅上发呆。他一直忙于收拾东西，不及思索，好像走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但是昨天晚上，他把最后一件衣服塞进箱子里去，忽然说：“从此以后，我们就是天涯孤客了！”后来，他就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现在，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我知道他心里也很矛盾。

亚亚对这次走是最积极的。她甚至还表现出一种迫不及待的兴奋之情，我几次恨不得揍她一顿。但此刻，她站在候机室的大玻璃门前，望着忙忙碌碌的停机坪，也好像不愿离去了。

“不能不走吗？”我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里，你曾这样问过。

我不能用一句话回答你，为什么我们非走不可。这几个月里，我和老刘几乎天天都在为走或不走烦恼着，争论着。促使我们下这决心的原因很多。为了亚亚，为了老刘，也为了我。但是，各式各样的理由，都不曾使我减少内

心的痛苦,我们是不该走的。我们的国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历史(或许还该加上民族)赋予我们的使命。用造反派的语言来说,则是“工人农民的血汗把你们养大了,你们不应该背叛”!

同你相比,我是软弱的。我在这十年中受到的磨难比你少得多,但是我不能像你那样忍受。对于那些恶意的中伤,无端的诽谤,我常常爆发。这并不是我比你坚强,恰恰是我比你脆弱。我确实曾经想过,那么屈辱的活着不如死了好!只是为了亚亚,我才打消了这种念头。老刘作为“特嫌”被关起来那几年,我能熬过来,能活下来,亲眼见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连我自己都意想不到。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的伤心事了。傅家杰说得对,“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已经到来。”可惜的是,林贼、“四人帮”造成的一代人的偏见,绝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中央的政策来到基层,还要经过千山万水,积怨难除,人言可畏。我惧怕过去的噩梦,我缺少像你那样的勇气!

记得有一次批判白专道路,那些占领医疗卫生阵地的“沙子”,点了你的名,也点了我的名。会后,我们一起走出医院的大门。我说:“我想不通。为什么刚有一点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就要打下去?以后,再开这种会,我不参加,以示抗议!”而你却说:“何必呢!再开一百次我也参加。反正手术还得我们做。我回家照样钻研!”我问你:“这么批你,你不觉得冤吗?”你还笑了,你说:“我一天忙得昏头转向,没时间去想它!”当时,我真佩服你!只是快分手时,你却嘱咐我:“这种事,你别告诉傅家杰,他自己的事就够烦的了。”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条街。我看到你的脸色是平静的,目光是自信的。你心里的想法是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我也明白,你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抵抗着那些袭来的石子,走着自己生活的路。如果我能够有你一半的勇气和毅力,我也不会作出今天的抉择。

原谅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我走了,我把心留在你身边,留在我亲爱的祖国。不管我的双足走向何方,我都不会忘记故国的恩情。相信我吧!我只能对你这样说。相信我们会回来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等亚亚学有所长,等我们在医学上稍有成就,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最后,衷心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经过这场大病,你应该接受教训,自己多照顾自己。这不是我劝你自私。你的不自私,是我历来敬佩的。我只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只希望中华医学的新秀能够吐出更多的芬芳!

别了,你的好友!

亚芬
匆匆于机场

二十二

一个半月以后,陆文婷大夫病体初愈,被允许出院了。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以陆文婷平日极为虚弱的身体,突然遭到这样一场大病的袭击,几次濒于死亡的边缘,最后竟能活了过来,内科大夫都感到惊异和庆幸。

这天上午,傅家杰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妻子身边忙着。他替她穿上棉衣毛裤,又穿上一件蓝布棉猴儿,围上一条驼色大长毛围巾。

“家里怎么样了?”她问。

“挺好。昨天你们支部还派人去帮着收拾了。”

她立刻想起那间小屋,那个罩着白布的大书架,那窗台上的小闹钟,那张三屉桌……

从死亡线上回来的她,虽然穿了这么多衣服,仍觉得身上轻飘飘的。当她站起来时,两腿打着哆嗦,很难支持身体的重量。她整个身子几乎全靠在丈夫身上,一手拽住他的衣袖,一手扶着墙,才迈出了步子。接着,一步又一步,她慢慢地走出了病房。

赵天辉院长、孙逸民主任,还有内科和眼科的一些同志们,跟在她身后,看着她一步一停地沿着长长的甬道,朝门外走去。

接连下了几天雨,一阵冷风吹得光秃的树枝呼呼地响。雨后的阳光格外的明媚,强烈的光束直射进这长长的长廊,冷风也呼啸着迎面吹来。傅家杰倍加小心地搀着妻子,迎着朝阳和寒风朝前走去。

门外石阶下停着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那是赵院长亲自打电话给行政处要来的。

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一步朝门外走去……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 张一弓

一 清明时节

清明时节为什么总要下雨呢？那无声的、细细密密的雨丝，如同编织着银色的网，和纷乱的思绪纠结一起，笼罩在地委书记田振山的心头。

田振山正坐在吉普车上，去一个偏僻的山区小县，参加一个党支部书记的平反大会。

这位支部书记离开人世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来，历史给人们带来多少意外的纷扰，开了多少严峻的玩笑啊！但是，田振山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人——李铜钟，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的“瘸腿支书”李铜钟。就是这样一个李铜钟，临死却变成“勾结靠山店粮站主任，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李铜钟了。

而现在，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尽管县委、地委对于李铜钟的平反有过激烈的争论，尽管作出平反决定以后还有一些同志对此忧心忡忡，新上任的地委书记还是决定亲自参加这次平反大会。为了让活着的人们更加聪明起来，为了把人间的事情料理得更好一些，他要到那个阔别了十九年的小山寨里去，到那个被野草覆盖着的坟头上去，为一个戴着镣铐的鬼魂去掉镣铐了。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颠簸着、急驶着。田振山打开车窗，让清凉的山风把无声的细雨吹洒在他刻满皱纹的脸庞上，他合上眼睛，想起了那个发生在十九年前的奇异的故事。……

二 春荒

党支部书记李铜钟变成抢劫犯李铜钟，是在公元一九六〇年春天。

这个该诅咒的春天,是跟罕见的饥荒一起,来到李家寨的。

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旮旯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呀!暖暖暖暖……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饭篮,暖暖暖暖……”

哭,也是一种传染病。老杠叔的哭声从没有关严的门缝里溜出来,首先传染给那些掂着饭罐来食堂打汤的老婆婆们,接着又传染给那些家里有孩子喊饥的年轻媳妇们,再往后,就变成连男人们也无法抗拒的一场瘟疫了。

“不能哭,不能哭。”沉重的假腿在雪地里“咯吱咯吱”响着,李铜钟从大队部跑过来,向大家讲着不能哭的道理:“哭多了,眼要疼,头要晕哩;哭多了,也要伤身体哩。我眼下再去公社问问,说不定统销粮有消息啦!”

哭声平息了。大家都无言地望着年轻的支书。这个百里挑一的强壮汉子,也明显地饿走样了。他眼皮虚肿着,好像能掐出水来,四方脸庞上塌下了两个坑儿。但他颠拐着七斤半重的假腿向村外走去的时候,却把屋里人张翠英递给他的柳木棍扔得远远的,穿着褪色军大衣的五尺四寸五的身个儿照旧挺得笔直,网着血丝的黑沉沉的大眼睛还在打闪哩。那姿态和眼神都仿佛告诉大家:这个复员兵,还能打几仗哩。

李铜钟的心里却是沉重的。当他想着要向那位“带头书记”杨文秀要饭吃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愤懑和忧郁。

“带头书记”原来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他辛辛苦苦干了五年,渐渐感到,在县委大院里,像他这样一个没有区、乡工作经验的人,往后能当上秘书,写一点“遵命文牍”就算到顶了,“鸡蛋壳里发面——没有大发头”啊!因此,一九五八年,他积极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从此,他就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并在三天之内拿出符合这种意图的典型经验上了。比如他来十里铺上任以前,听说理论界提出了一国能不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他立即感到这同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取得胜利的论断具有同等的意义。他依次类推,得出结论说,一个公社首先进入共产主义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个公社当然就是十里铺公社。因此,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此后,他每天都要吸两包烟卷,那双好像用小刀子在脸上随便剜出来的小眼睛总是眯细着、眨动着、闪烁着神秘的光,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选择县委书记田振山没有外出的时机,向县委报喜。

过分卖力的时候,动作是容易变形的。上级意图——且不说这意图是否正

确,一经杨文秀加工,就会变成一幅极其夸张的漫画。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勾无一幸免,通通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吓得李铜钟的屋里人连连祷告,千万别叫炼铜,因为她的男人是“铜钟”。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又指示各队: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粉要搽在脸上。为了充分表现报纸上说的那种“老人赛过老黄忠,妇女赛过穆桂英”的冲天干劲,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装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占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

李铜钟用忧郁的目光望着这一切,他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演戏,在给上级演戏,巴望着受到赏识和喝彩。他嘱咐李家寨的干部:“李家寨都是种地户,不是戏班子,咱不要他那花架子、木头刀。”

但是,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的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正是因为这个“不变”的缘故,在十里铺公社应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李铜钟不得不跛着腿,一趟接一趟地往公社跑着,向杨文秀汇报着使共产主义变得十分渺茫的春荒问题了。

每去公社一次,对李铜钟的忍耐力都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第一次,是李家寨社员一天还能吃到“二大两”的时候,也是杨文秀把县委、县人委颁发的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的奖状挂到墙上的时候。

“李铜钟同志,”杨文秀的声音是严厉的。“你知道是哪些人叫喊粮食问题吗?”

“知道。”

“哪些人?”

“贫下中农。”

“你说啥?”杨文秀困窘地把烟卷举在空中,怔住了,但很快又在空中划一个圈儿,说:“新中农吧,是新的上中农嘛,同志,你的屁股不要再坐到富裕中农的板凳上了。”

没等李铜钟回话,“带头书记”已经迈着跃进式的步伐,冲出了小会议室。

第二次,是李家寨眼看就要断粮的时候,也是杨文秀亲眼看见李家寨的榆树皮已被剥光的时候。

“李家寨的口粮是有点紧张。”杨文秀避开了李铜钟的黑沉沉的眼睛。“可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啊,反两眼向上的伸手派啊,不是我不愿向县里要粮食,就

怕那顶右倾帽子不好戴啊！”

“你把帽子给我。”李铜钟沉声说，“只要反右倾能反出粮食，反出吃的，这右倾帽子，我戴一万年。”

“不要意气用事嘛，同志。”杨文秀踱着步子，说：“口粮不足，不光你一个李家寨嘛。听说地委正开保人保畜会，咱县田书记去了。等他回来，听听精神再说。你们食堂菜地种的不赖，再顶一阵子嘛。”

李铜钟，你有多么坚韧的忍耐力啊。但是，历史证明，肚子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在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以后，食堂门口传来了社员们的哭声。虽然三天前李铜钟就托人给县委书记田振山送去了一封“告急信”，并按照李家寨坐头把交椅的文化人、会计崔文的建议，在信上画了三个像炸弹一样的“！”，但还没有收到回音。李铜钟只好再一次用他的假腿，“砰通、砰通”地敲打着公社门口的青石台阶了。

“铜钟，不用说了。”杨文秀推着自行车往门外走着。“田书记回来了，县委通知开会，专门研究社员生活，你回去等着吧。”

“可眼下？……”

杨文秀已经蹬上自行车，一阵风似的走了，但他回过头来喊叫：“萝卜。”

李铜钟回来了。路过好汉坡时，他觉得头晕，脚不把握，一下子栽倒在路沟里。他一动不动地躺在积雪上，没有力量爬起来。他很想这样躺下去，永远躺下去，不再起来了。但他想起还有几百口人在等着他，想起县委在开会，说不定田书记已经收到了那封告急信。于是，他吞了几口雪，挣扎着爬了起来。当他走到寨门外时，已经挺直了腰杆，对守在寨门洞里等他归来的干部们说：“宰牛吧。”

三 “花狸虎”的悲剧

“把我宰了吧，把我煮锅里吧！”在三队饲养室里，李套老汉死死抓住“花狸虎”的缰绳，愤懑地喊叫着：“谁的主意，吃牲口？干脆把我吃了算拉倒！”

队长小宽牵着牲口说：“套叔，你掂量掂量，保人、保畜，哪轻哪重？再说，这是大队的决定，俺铜钟哥拿的主张。”

“是铜钟？”李套老汉怔住了，他没想到这是他那个残废儿子的主见。论家法，他是“领导”；论国法，铜钟可是上级哩。看来，“花狸虎”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了。“牛，牛，你牵走，这几槽牲口你都牵走，咱散伙，咱不过了！”李套老汉松了缰绳，不忍心再看“花狸虎”一眼，就坐在小板凳上，脸朝墙，哭起来。不多时，食堂屋后传来“哞哞”的牛叫声，他觉得那是“花狸虎”在叫他，好像一把刀刺着他的心，他眼前一黑，晕倒在草垛上。

几个社员把李套老汉抬到了家里。大队卫生室的王先生，拄着棍，匆匆跑来，用指头掐住李套老汉的“人中穴”，差点掐出血来，老汉才睁开眼，把窝在心里的那口气吐了出来。

儿媳妇小声问：“爹，好些儿没？”

老公公只叹气，不吭声。

孙儿小囤儿趴在床头上，“爷，谁惹你啦？”

爷爷只叹气，不吭声。

王先生把铜钟家叫到外间，板着脸说：“人饿虚了，经不住急火攻心，没啥好法子，静养吧。”王先生叹口气，想着牛，拄着棍走了。

“花狸虎”已经被绳子捆住四条腿，卧倒在地上。它“哞哞”叫着，一双通人性的圆鼓鼓的眼睛，滴着蚕豆大的泪珠。它绝望地瞪着人们，好像在说：人啊，不要杀我，我还能犁地哩，七寸步犁也拉得动哩，杀了我，够你们吃几顿呢？李铜钟不忍心再下去，悄悄离开了屠宰场。半路上，又忍不住勾回头，从拉起来的军大衣领子上看了“花狸虎”最后一眼。为了不让自己听见那“哞哞”的牛叫声，他拉下了棉帽耳朵。

铜钟听说爹晕倒了，急忙回家看爹。爹却偏过脸，对着墙，不理他。铜钟明白，爹是心疼“花狸虎”呀。记得是互助组转初级社那年，他带上复员费，跟爹去十里铺牲口市上牵回了这头牲口。俗话说，卖菜不卖筐，卖牲口不卖缰。他的复员费将够买这头大牛。爹就到山货行货场上捡了一根草绳，爹笑着说这是“金缰”，就用这根“金缰”把牲口牵了回来。一进村，爹就指着这头身上有黑色条纹的大牡牛，向组员们夸说：“俺牵回来一头‘花狸虎’，你看它那腿，就是四根柱。”家里窄狭，没处喂牲口，爹就把牲口拴到外屋大梁上。夜里，“花狸虎”啃断草绳，钻到里屋，吃了五斤棉花子儿、六斤半谷种，还把装谷种的一口新铁锅撞到地下，摔了八瓣。“中，中，”爹又摸着胡子夸说：“好吃手，准是好套活。”转社时，爹叫翠英用扭秧歌用的红彩绸，结了个大绣球，挂在牛角上。爹又把一床新铺盖搭在牛背上，骄傲地牵着牛在村里游行，拐弯抹角走了四四一十六条胡同，才来到新盖起的饲养室。从此，他跟牛都在那里住下，度过了七个寒暑。如今，槽上虽说添了十几头大牲口，可爹对“花狸虎”总是有点偏心，他时常抚着牛背，说：“社会主义是辆车，靠它拉的头一程。”

眼下，铜钟站在爹床前，抱愧地说：“爹，‘花狸虎’岁口嫌老些儿……”

“不说这，不说这……”爹的胡子哆嗦着。

“爹，等来年丰收后，我还您牲口……”

“不说这，不说这……”两行眼泪从爹的眼角里涌出来。

“爹，您是说？……”

“我是说……”爹用胳膊撑起上半身，直愣愣地望着儿子，小声问：“你对爹说实话……党还要咱不要啦？……”爹忽然咬住被角，瘦削的肩膀猛烈地抽动起来。

“党要咱，党要咱。”铜钟抑制了内心的激动，凄然地说，“党不知道咱忍饥……”

“那就好，那就好！”爹又挣扎着坐起来，哀怜地望着儿子，说：“那你这当支书的，万万不敢躺下，万万不敢。你没看看？乡亲们忍饥受饿，也没一人逃荒，没一声怨言，那为啥？就因为对党信得过。孩子，四五百口人的死活搁在你身上。爹知道，你肚里也没装一粒粮食子儿，你要是饿得受不住，就想想民国三十一年是咋过来的，想想你那死在逃荒路上的娘，说啥也要把全村人领过这一春天。孩子，爹求你……求你！”

铜钟“扑通”跪在爹跟前，眼里噙着泪说：“爹，孩子我记住这话。”

四 吹牛不报税

牛肉过了秤，连杂碎在内，一口人九两零三钱。为了把牛肉公平合理地装到社员肚子里，大队决定分肉到户。食堂里剩下的白菜、萝卜和烧煤，跟牛肉一起，连夜分了下去。时兴了一年多的集体食堂不声不响地解散了。李家寨一百二十多座农舍里，已经生起煤火，响起了开水滚锅声。“花狸虎”跟另外几头老牛一起，在一百多个砂锅、铜盆、搪瓷盆里冒着热气，就要为人们尽着最后的义务了。

“我不吃，我吃不下。”大队长张双喜像下神一样闭着眼，盘腿坐在煤火台上，推开了女人端给他的青釉大瓷碗。

女人问：“你是跟谁怄气？”

张双喜忽然扬起巴掌，“噼啪”地打着自己的脸，说：“我跟它，我跟它！”

女人惊慌地按住他的手，说：“老天爷，这是你的脸！”

“我就打它！”张双喜又打着嘴说，“我叫你说瞎话，我叫你说瞎话！……你虚报产量，叫全村人跟着受累！……”这个四十岁出头的小个子庄稼人打着、说着，把嘴撇得像瓢一样，十分痛心地哭起来。

张双喜那两片薄薄的被旱烟熏得发黄的嘴唇，并不是生来就有说瞎话的爱好。他传染上这种像感冒一样使人头脑发烧、嗓门发痒的流行病，是在公元一九五八年。

那年麦子收罢，张双喜跟铜钟、崔文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那时节，省报印着红字的号外——张双喜把它叫做“外号”的，正在连续放射亩产小麦三千七百多斤、五千三百多斤以至八千七百多斤的丰收“卫星”，宣扬着“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的跃进哲学和哲学的跃进,这样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批驳了“保守派”、“摇头派”、“秋后算账派”的种种谬论。

那年麦季,这个县尽管获得了空前的丰收,而且有了一个明年把粮食产量提高百分之五十一·五的持续跃进规划,但在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这个县还是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啊,持续跃进的步伐落后于形势的需要啊,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估计不足啊等等,等等。

面对着地委的批评和党报的“号外”,县委书记田振山跟县委其他领导同志,怀疑自己是大大地落后了,他们感到脚下踩着的这块土地,正在报喜的锣鼓声中震动、沸腾的土地,说不定当真到了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他们诚恳地反了自己的右倾,按照地委布置下来的指标,在三级干部会上宣布了一个“一年‘上纲’、两年‘过江’”的规划。

“带头书记”杨文秀早已摸透了上级意图,他立即在大会发言中宣布:十里铺公社一年“过江”,迎接共产主义的到来。他引用一首据说是十里铺的民谣,描绘了共产主义的幸福情景。可惜那时文化部门正开展着“全民皆诗人”的群众运动,由于都成了诗人,这首民谣的作者也就无从查考,有些诗句也已湮灭在诗歌的汪洋中了。有幸得到杨文秀的引用而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几个警句:

咱吃蒸馍,蘸白糖,
你看咱过的瓢不瓢!
咱穿呢子,大皮靴,
你看咱过的得不得!
咱乘火箭,坐飞艇,
你看咱过的中不中!

田振山在台上连连点头,说:“中,中!”

台下,张双喜却向李铜钟耳语:“咱赶紧出去躲躲吧,一会儿把房顶吹塌了,别砸住咱!”

李铜钟坐着没动,他紧皱眉头,不住地用“号外”纸卷着烟卷,像一个愤怒的火车头,喷出一缕缕呛人的浓烟。

大组会上,要各队报规划时,队干部都变得格外谦虚,互相推诿着,谁也不打头一炮。杨文秀知道张双喜口齿伶俐,讲话煽动性强,眼下又是特别需要这种煽动性的时候,于是,他点名叫张双喜发言。张双喜却用巴掌捂住半边脸,从牙缝里“啦啦”地吸着风说:“书记,我牙疼。”杨文秀鼓励他说:“不需要长篇大论,

只要说到点子上,有个态度就行。”又带头鼓掌,“欢迎欢迎!”张双喜不得不站了起来,而一旦站起来,说话就不由自己了。只见他咳嗽两声,清了嗓门,大声吆喝道:“那就长话短说,我跟俺支书、会计商量的,俺大队老落后,一年上不了‘缸’,只能上‘盆儿’,还是那二号盆儿。”在人们的哄笑声里,他露出最正经、最认真不过的神色,望着屋顶说:“啥时候‘过江’哩?等俺爬到‘缸’沿上,吸袋烟,看看再说。”连那些最不爱笑的庄稼人,也都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张双喜神色庄严地坐回到半截砖头上,小声问铜钟:“咋样?”铜钟插他一拳说:“大实话,是咱庄稼人的大实话。”崔文却踢了踢双喜的脚,往台上努了努嘴。只见杨文秀瞪眼望着他们,紫涨着脸,气得像吹猪一样。

谁能料到呢?李家寨就这样变成了右倾的典型。杨文秀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缸”和“上盆儿”之争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十里铺公社的集中表现;所谓“上盆儿”,实质上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狭隘性,二流子的懒惰性,摇头派的摇摆性,保守派的顽固性;宣扬“上盆儿”论的人必须转变立场,首先在思想觉悟上来一个跃进,从“盆儿”上跃到“缸”上。

散会回来时,爱唱路戏的张双喜变成了哑巴。

崔文抱怨他:“双喜哥,你发言咋不讲点策略?反正,吹牛不报税。”

铜钟说:“我拥护双喜哥的发言,共产党为群众办事,就得石柞子捣石臼——石(实)打石(实),不要嘴把式。”

双喜说:“反正,往后我嘴上贴封条,嘴角再站俩把门儿的。”

但是,五八年以后运动多,三天两头要汇报运动情况。李铜钟的假腿没有张双喜的真腿好使唤,上公社汇报的任务,就像灾难一样落在张双喜的头上。

在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上,开始学了一点“发言策略”的队干部们,有的说做到了“几净几光”,有的说几“臭”变成了几“香”。张双喜搁心里说:“天冷偏烤湿柴火——对着吹吧。”轮到张双喜汇报,杨文秀膘他一眼说:“好,这一回又看李家寨的了。”张双喜憋了一肚子气,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报复。他小声咳嗽着,用那种站不到人前的后进队长的胆怯声调,谦卑地说:“俺李家寨卫生运动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头。可经过领导帮扶,向先进看齐,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驴儿总算养成了刷牙的习惯。……”真是语惊四座,使得外队的所有汇报通通黯然失色了。张双喜看见杨文秀露出惊异的神色,暗暗拧开了钢笔帽,就不由地感到一种快意,一种进行了一次小小报复的快意。他想着小毛驴儿摇着头刷牙的模样,便忍不住“哧”地笑了。几十张有胡子和没有胡子的嘴巴几乎是同时咧开,哈哈大笑起来。

“静静!”杨文秀用钢笔杆儿敲着桌子,问道:“小毛驴怎样养成了刷牙的习惯,怎见得它养成了这良好的习惯?”

这倒是一个难题。张双喜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中文系,却不乏形象思维的能力,他说道:“今儿清早我去三队饲养室,正碰上二夯家牵着那头白眼窝小叫驴儿走亲戚,小驴儿‘哏儿夯、哏儿夯’直叫唤,就是不跟她走。鞭抽它,它不走,鞭杆儿捣它,它不走。二夯家问那小驴儿:‘你是惊住啦?吓住啦?’驴摇摇头;又问:‘你是缺草啦?缺料啦?’驴又摇摇头。‘那你到底有啥心事?’小驴儿仰着下巴颏,朝着二夯家直龇牙。二夯家吓得包袱丢地下,扯着嗓子直喊叫:‘哎呀,套叔,您的驴咬俺哩!’饲养员李套老汉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来,看见小驴儿正龇牙,就对二夯家说:‘别怕,她嫂子,它不是咬你,它是怪我慌张,没给它刷牙。’李套老汉把小驴儿牵回去,一盆净水,一把刷子,都是消过毒的,给小驴儿上牙刷三遭,下牙刷三遭,牙槽里刷三遭,刷够三三见九这个数,才把缰绳递给二夯家,往驴腿上拍一巴掌,说:‘走吧。’小驴儿就打了个响鼻儿,乖乖儿地跟二夯家走了,一路上尥着蹶子直撒欢儿。”张双喜擦去由于紧张的形象思维而在鼻尖上沁出的汗珠,朝杨文秀一摊手,说:“就这。”

杨文秀急急地往本子上记着,问道:“给牲口刷牙有哪些好处?”

这一回,张双喜运用逻辑思维,答道:“免生口疮舌刺儿。”

张双喜的汇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诚惶诚恐地从杨文秀手里接过一面锦旗,上写:“卫生先锋”。但他一出公社门儿,就把锦旗掖到腰里。回到家,又把它塞到墙窟窿里,从来没向别人提过它。

从此,每逢汇报某个运动的开展情况而又有杨文秀在场的时候,不知是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还是牛顿的惯性定律,就在张双喜的嘴上得到一再的证明。比如,汇报扫盲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有老两口,都七十多岁了,夜里瞌睡少,老头就在老婆脊梁上画字儿,叫老婆认,直到鸡儿叫二遍……汇报除“四害”运动情况时,他说,李家寨的猫娃饿得“喵喵”直叫唤,因为没老鼠吃了。只是消灭麻雀的成绩不老好,老祠堂屋檐底下有一窝麻雀漏了网,可等他拿着手电去掏窝,只摸了一手麻雀屎,原来这窝麻雀也搬家了。咦,这麻雀真是鬼能鬼能!

于是,杨文秀多次表扬了李家寨的转变,公社秘书小陶时常摇着电话机,喊叫:“喂喂,李家寨吗?双喜在不在?公社往县上写报告,杨书记特意交代,叫他再补充点活材料。活的!……”

每逢张双喜回了这样的电话,就像吃了蝇子一样吐着唾沫,对崔文说:“呸,真叫你说对了,吹牛就是不报税。”但他嘱咐崔文:“可不敢叫铜钟知道,他要知道了,不用破鞋底打我的嘴才怪。”

去年秋后,张双喜终于受到了吹牛的惩罚。

那是他去参加公社核产会的时候,一进公社大门,就看见影壁墙上画着一

幅图表,最顶上画着火箭,依次类推,是飞机、汽车、牛车、乌龟,上写:“十里铺公社秋季产量评比图”。他想,我的身体不老好,坐火箭怕头晕,骑乌龟又老霉气。报产量时,他不往上挤,不往下靠,向中等偏上的大队看齐,多报了十万斤总产,坐上“飞机”回来了。

李铜钟一听说坐上了这号“飞机”,就向张双喜发了一顿脾气。“双喜哥,你也学会卖嘴啦?这镜子里的烧饼十万斤,是叫工人吃,是叫解放军吃?党中央、毛主席叫咱鼓实劲,没叫咱吹糖人,你就是吹出个天堂,叫谁住?”李铜钟放了一通“上甘岭上的炮弹”以后,就跑到公社说:“把俺那产量减下十万斤,我情愿骑乌龟。”但他一去就是十天。在公社后院小楼上,他跟那些坐上“牛车”和“乌龟”的大队干部们一起,叫反了十天右倾。等他回来的时候,在公社“反瞒产”工作组的指挥下,李家寨已经超额十万斤完成了秋粮征购任务。

眼下,张双喜照旧坐在煤火台上,像下神一样哭着、骂着:“你真混蛋,你不该坐那飞机!……”

五 老杠叔和他的钥匙

九两三钱肉能产生多少卡的热量呢?

断粮第七天,李铜钟跟王先生在全村挨门检查了一遍。他发现,李家寨四百九十多口人,就有四百九十多个浮肿病号。有百十口人已经挺在床上不会动弹了。王先生铁青着脸,用拐棍捣着地,对铜钟说:“要是这两天还不见粮食,你就组织专业队,上西山刨墓坑吧!”

李铜钟探望的最后一家是“三堂总管”老杠叔。四天以前,老杠叔蹲在食堂库房里哭了一场以后,回家就病倒了。食堂库房里已经没有生的或熟的叫他操心,再也用不着一天十二遍地开门、锁门、出生、进熟、过秤、上账了,生活变得空虚而寂寞,支撑着他这把老骨头的精神支柱突然倾倒了。他躺在床上,掂着库房门上的那一串钥匙,长久端详着,“老伙计,咱得分手了。我不能带你去,那儿用不着你……”

李铜钟和王先生来到老杠叔家门口,看见门头上挂的那块“光荣烈属”牌,止不住心里一阵难受,老杠叔的独生子是一九四四年跟皮司令走的,淮海战役时牺牲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这两位老人家比旁人更有权力过几天不知饥寒的日子啊!

李铜钟和王先生走进院子,正听见老杠叔在屋里喊叫:“花她娘……人死如灯灭,还做那啥送老衣?……你要心疼我……就拽一把棉花套子,叫我啃啃……啃啃……”

王先生听见这话，就像软瘫了一样，一下子蹲在老椿树底下的捶布石上，说：“这病人我不敢看，不敢看，看着老难受……”

李铜钟一个人进屋了。老杠婶正用面布袋给老伴做送老衣，一见铜钟就哭了。她搬个小板凳，让铜钟坐下，说：“你叔眼看不中了，论说他活这六十多，也够他的了。俺啥也不想，只想他种了一辈子庄稼，管了一年多食堂，能叫他临走……临走有一把粮食子儿嚼嚼……”

老杠叔在里屋听见这话，就责怪老伴说：“你没问问铜钟吃的啥？我说铜钟，你就别听她瞎说……你过来，叫我再看看你。”

李铜钟走进里屋，坐到床沿上，攥住老杠叔的手，说：“叔，怪我没能耐，叫您老人家受恁大委屈……”

“不怨你，孩子，不怨你。”老杠叔温存地望着铜钟，从腰带上解下那串钥匙，捧在手里，说：“支部……群众信任我……叫我管食堂一年七个月……零八天。……我老没成色，只会开开门、关关门……办不了大事……不能为你分忧。往后，再来了粮食，选个靠得住的……把钥匙给他。”老杠叔嘴唇哆嗦着，手也哆嗦着，把钥匙塞到铜钟手里。

铜钟把钥匙还给老杠叔，说：“叔，说啥您也得熬过这两天。支部给田书记，就是来咱村搞土改的田政委，写了信，公社杨书记上县开会快回来了。我约摸着，粮食该下来了。这钥匙，还得您管。”

这时候，王先生推门进来了，手里攥着一瓶鱼肝油丸，对老杠说：“哥，这是你大侄子从湖北捎回来的西药丸，按西医说，这是那啥营养药，一天吃几丸，兴比嚼那棉花套子强些儿。”他郑重地拧开瓶盖，倒出两粒，塞到老杠嘴里，又接过老杠婶端过来的一杯水，把药丸冲了下去。

大门外有人喊叫：“铜钟，铜钟，快，快……”随着话音，崔文跑进门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杨书记打电话……叫你去公社，口粮……有办法啦！”

昏暗的屋子里好像“唰”地一下充满了光亮。李铜钟大步噔噔走出屋门时，老杠叔已经叫老伴扶着坐起来，把那串钥匙重新系在裤腰带上。

这一回，王先生不是用拐棍捣地，而是在地上画着圈儿，说：“这比啥药都强！”

六 “这叫化学！”

杨文秀在他生着煤火的小西屋里接待了匆匆赶来的李铜钟。他取出夹在笔记本里的一封信，从眯细着的缝眼里逼视着李铜钟，问道：“这封信是你写给田书记的？”

“是我。”李铜钟向信上扫了一眼,看见一行粗大的铅笔字:“如情况属实,应抓紧解决。”

“李家寨当真没一点粮食啦?”

“这样吧,书记,”李铜钟凄苦地笑笑,说:“你去尝尝李家寨那饭,那清水萝卜饭,不叫你多吃,只吃三天。”

“不管有多大困难,公社给你们解决嘛。”杨文秀想起,田振山把信转给他时,用那种困惑不解的目光审视着他,好像在说:啊?杨“带头”同志,你是这样带头的啊。这使他紧张而且懊恼。眼下,他把那封信折叠起来,装到衣兜里,说:“你就是不写这封信,公社也不会不解决;你写了这封信,照样还得公社解决嘛。”

“该解决了,书记。”

“那么,你说说,李家寨还有玉米皮、红薯秧吗?”

“你是说?……”李铜钟怔住了。

“红薯秧,玉米皮——包在玉米穗外边的那几片叶子。”

李铜钟寻思说:“玉米皮大部分垫圈沤粪了,红薯秧还有。”

“麦秸多不多?”

“麦秸?”

“对,麦秸。”

“麦秸不缺,牲口能吃到麦口。”

“这就好。”杨文秀像是丢下一桩心事,又对铜钟说:“走吧,我叫你看几样东西。”

“啥东西?”

“吃的。”

李铜钟跟着杨文秀,来到了会议室。只见柳树拐、椿树坪、竹竿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和食堂司务长们,正围着会议桌抽烟。公社秘书小陶已经把窗户上的雨搭卸下来,贴上了红纸,正用排笔蘸着黄颜色,写着“报喜”的最后一个“口”字。会议桌上,一溜儿摆着十几个八寸白瓷盘,盘上放着黑色、黄色、黑红色的块状、条状和圆锥形物体。

杨文秀对李铜钟说:“这次县委开会,传达了地委的精神,号召缺粮社、队大搞代食品,没等散会,我就提前回来,搞了试点。很成功,为解决缺粮问题找到了一条门路。”他指着盘子里的东西,宣布了世界上新出现的几个食物品种:“一口酥”玉米皮淀粉虚糕、“扯不断”红薯秧淀粉粉条、“将军盔”麦秸淀粉窝头,等等。他挨个儿地介绍了每一种代食品的原料,特点和优越性,那封“告急信”给他带来的紧张和气恼,都被这些营养学方面的重大发明抛到九霄云外了。

李铜钟觉得他面前出现了奇迹,但他的右倾思想使他对这些奇迹还有些疑问:“这是红薯秧玉米皮做的?”

“你不信?”杨文秀拿起一块“一口酥”,送到李铜钟嘴上,说,“我请你吃饭,不收粮票,好就好在不收粮票。”

李铜钟掰下一块,细细品尝着。味觉告诉他,虽说有点发涩,可也没有太大的怪味;触觉告诉他,虽说有点艮牙,却也咽得下去;听觉告诉他,嚼起来沙沙作响,可这是玉米皮做的哩,能跟八五粉比吗?他在懊恼,玉米皮不该铡碎填圈。

按照杨文秀的指点,李铜钟品尝了每一种代食品。他觉得,那种“扯不断”淀粉粉条更接近粮食的味道,暗暗庆幸三个队的红薯秧还保存完好。

“铜钟同志,”杨文秀郑重地说,“李家寨的唯一出路,就是大搞代食品。抓住这一着,一盘死棋就下活了。”他发觉李铜钟脸上还蒙着一层疑云,又说:“这没有什么神秘嘛,不外乎把玉米皮、红薯秧煮煮、碾碾、沤沤、蒸蒸,起一点化学变化就是了。”最后,他加重语气说:“眼下的精神还是反右倾,要彻底打破在缺粮问题上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懒汉懦夫思想,迅速开展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铜钟,事实证明,反右倾可以反出粮食,反出吃的,灵得很!”

李铜钟没有注意这个意味深长的警句,他完全被这些奇妙的代食品吸引住了,他要求说:“最好请先进队派人到俺李家寨指导指导,叫俺明天就吃上这‘一口酥’。”

杨文秀指着柳树拐大队党支部书记说:“石头,包给你了。”

刘石头跟李铜钟是老伙计,去年秋天,他俩都骑过“乌龟”,住过公社小楼。刘石头满口答应:“没问题,包你一学就会。”

“那咱眼下就细说细说。”李铜钟拉着刘石头,走出会议室,钻进了书记屋。他掏出小本儿,拧下钢笔帽,说:“俺队红薯秧还不少,你先说说红薯秧咋做粉条?”

刘石头瞪他一眼,说:“咋做?用粉芡做呗。”

“红薯秧能做粉芡?”

“咋不能?如今兴坑人。不光红薯秧能做粉芡,猪毛边能炸丸子。这叫化学!”

李铜钟觉得一瓢冷水从他头顶泼下来,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问道:“那‘一口酥’?”

“掺了一半玉米面。”

“那‘将军盔’?”

“人吃了没一点益处,落个牲口没草吃。”

全部希望顿时化为灰烬。李铜钟为像受到谁的捉弄似的,愤懑地站了起来。他忽然想起,那年他病倒在逃荒路上,昏过去了,不知是谁用星星草捅他的鼻

子,叫他打了三个喷嚏。……

“杨书记知道底细吗?”铜钟问石头。

“敢叫他知道?!”

“石头哥,你也学会哄人啦?”

“不哄他,他克咱;哄哄他,他舒坦。啥法儿哩!”

“石头,咱共产党不能这样胡来!”

刘石头把脸仰到李铜钟眼皮底下,说:“你看看,兄弟,你看看,我刘石头像那号说瞎话的人不像?……可我是属鼠的,听俺娘说,我生下来就胆小,十五岁那年,俺哥、俺姐架住我,我才敢看看死蛤蟆。打从年前咱俩住了公社小楼,我就落下个心跳的病,一见杨书记,心里就‘咚咚咚咚’,跟敲鼓一样。你没听人说?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公社小楼上‘背靠背’。我算叫反右倾反怕了!”

李铜钟拉下棉帽耳朵,不愿再听下去。他很想痛哭一场,而终于没有哭出来。

公社大门外,响起了热闹的唢呐声和锣鼓声。杨文秀和椿树坪、竹竿园大队干部,还有十里铺的几个吹鼓手,站在一部“热特”拖拉机的拖车上,带着神奇的食品,去县委报喜了。

李铜钟忽然抓住刘石头的袄襟,推搡着他说:“石头哥,你去赶上他们,抓住他们,趴下磕个头说,咱都改了吧,我往后再不说瞎话,你们也别再逼着我说瞎话,我求求你,求求你,看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上,咱都改了吧,改了吧!”

刘石头吃惊地望着铜钟,突然蹲地下,捂住脸哭起来。

七 血红的指印

就这样回去,把绝望带给李家寨吗?李铜钟像一头愤怒而又疲惫的狮子,在公社门口的雪地里徘徊。他看见四百多双饿得发黄的眼睛,眼巴巴盯着李家寨东南的赶集路,他们的瘸腿支书将从这条路上回来,给他们带回吃的,而瘸腿支书要对他们说:“乡亲们,咱忍饥受饿,因为咱是傻子,不懂化学。……”

李铜钟啊,在社员们七天没吃一粒粮食子儿以后,你还有什么办法使他们免于死亡呢?你能叫麦苗儿今天夜里就起葶儿、明天清早就扬花儿、不到晌午就结子儿吗?你能叫“反瞒产”反走的十万斤粮食长上腿,回到李家寨吗?你能对社员们说,民国三十一年经验证明,北山裤裆沟里的白甘土可以当粮食吃吗?要不,你就狠狠心,说,乡亲们啊,可怜我这个一条腿的人没能耐,挑不动这副担子,请大家掂上打狗棍,自谋生路去吧。然后,你就把一级残废证装到玻璃框里,用竹竿儿举着,领着婆娘、娃娃,去荣军休养所要碗饭吃吧。

不能,不能,不能哩。要是世界上没有饥饿和寒冷,还要共产党做啥?共产党员李铜钟啊,你跑到鸭绿江那厢打狼,你瘸着一条腿回家,难道是为了在乡亲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抛开他们吗?支部书记李铜钟啊,你这一辈子能有几回像今天这样检查你对人民的忠诚,考验你的党性啊!

李铜钟的胸膛里燃起了一场大火。只有那条必然给他带来严重后果而又不能不走的道路好走了。这条路走得通吗?他不知道。但他大步颠拐着,向西山脚下的靠山店粮站走去了。

在粮站里,一个一条胳膊的中年汉子,正爬在梯子上,用胳膊窝夹着扫帚把,用一只手挥动扫帚,清扫着库房上的积雪。他的动作是那样熟练,好像使用扫帚本来就是一只手的工作,而且要用左手。

这是李铜钟的战友——粮站主任朱老庆。在朝鲜大水洞消灭美军二师三十八团的战斗中,他俩一个折了胳膊,一个断了腿。断了腿的给折了胳膊的包扎了伤口,折了胳膊的把断了腿的背到了急救站。后来,他们一起回国,进了荣誉军人休养所,又同样因为过不惯请吃坐穿的日子,一个复员务农,一个转业到了粮站。

“你好啊,司务长。”李铜钟站在梯子下面喊叫,用的是部队里的称呼。

一张发黄的长满黑胡楂子的脸庞从梯子上扭过来。“咦,是二班长,啥风把你吹来啦?”

“报告司务长,我来要饭吃。”李铜钟的表情是严肃的,毫无开玩笑的意思。

“你是说?……”

“我是说借点粮食。”

“这算啥话?借,借!”朱老庆摇着脑袋,从梯子上爬了下来。他发觉铜钟好像害着一场大病,只有他的眼睛还在闪耀着火一样的光亮。“铜钟啊,你朱大哥知道,农村口粮紧张,好赖我还穿着这四个兜的衣裳,旱涝保收,一月少不了二十九斤口粮。一块窝窝,咱一掰两半。可你说啥?借,借!”他慢吞吞地说着,把铜钟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住室,又慢吞吞走到煤火台后边,从一个木箱子里掂出半布袋面,搁到桌子上,用命令的口气说:“掂去。”

李铜钟推开面布袋,“这不够。我是说,借你这大仓里的粮食,五万斤。”

像火烧屁股一样,朱老庆“噌”地站起来,直愣愣地盯着铜钟,“你说啥?”

“仓库里的粮食,借给我五万斤。”一个字就是一颗炸弹。

朱老庆又“通”地坐在椅子上。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耳朵没有毛病,关紧屋门,说:“铜钟,你是神经上出了毛病?咱粮站可没有这规矩。”

“这我知道。”李铜钟把棉帽摔到桌子上。“老朱,李家寨四百九十多口,断粮七天了,靠清水煮萝卜保命。党把这四百多口交给我,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家等

死！”

“啊！……”朱老庆瞪眼望着铜钟，呆住了。

“要是李家寨都是懒虫，把地种荒了，那我就领着这四百九十多口，坐到北山脊上，张大嘴喝西北风去，那活该！可俺李家寨，都是那号最能受苦受累的‘受家’，谁个手上没有铜钱厚的老茧，谁个没有起早贪黑的跃进？他们侍候庄稼，就跟当娘的打扮她们的小闺女一样，我不是夸他们，自从上改到现在，穷乡亲们一个心眼扑在社会主义上，一滴汗水摔八瓣儿，一步一个深坑儿走过来，把山旮旯变成粮食囤儿，年年赶着大车，往你这仓库里送了几百万斤粮食。去年年景不好，大家还想着把细粮卖给国家，都是一等一的碧玛一号。可有人‘反瞒产’反红了眼，把李家寨的口粮也挖走了。”李铜钟忽然站起来，指着窗外的库房，大声说，“就在那儿，就在那儿，那儿装着李家寨的口粮！”

“啊！……”朱老庆望着库房，小声惊叫着。

“打老日，打老蒋，抗美援朝，乡亲们把咱俩这样的苦孩子，牵马戴花交给党，去给反动派拼命，咱俩回来了，可有不少好同志，回不来了。如今，我眼睁睁看着他们爹妈……饿躺在床上，说：给我拽一把套子，叫我啃啃……啃啃！”李铜钟发出了抑制不住的哽咽声，但他很快又控制了自己，逼视着朱老庆说，“老朱，你说，你是借不借？”

朱老庆毫无表情地回答：“我不借！”不知为什么，两滴眼泪却顺着他的鼻梁滴下来，挂在胡子上。然而，他的声音是无情的：“这是国家的粮食，保护它，像保护生命一样，是我的职责。”

“老朱，把麻绳给我。”

“干啥？”

“我要把你捆起来！”

两个战友虎视眈眈地对峙着。火光、炽烈的火光，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里燃烧着、跳跃着。“老朱，我要的不是粮食，那是党疼爱人民的心胸，是党跟咱鱼水难分的深情，是党老老实实、不吹不骗的传统。庄稼人想它、念它、等它、盼它，把眼都盼出血来了，可你……”李铜钟眼前一黑，觉得天旋地转，高大的身躯猝然倒了下去。朱老庆急忙迎上去，紧紧地抱住他，失声喊叫：“二班长，二班长！……”

只有一条胳膊的，把只有一条腿的拖到床上。那个一条腿的，吃力地睁开眼睛，嘴唇蠕动着，衰弱而又固执地说：“借给我，我还，我还……”

朱老庆用开水泡了一碗饼干，一勺一勺地喂着铜钟，嗓音沙哑地说：“铜钟，向上级反映吧，咱俩这缺胳膊少腿的厮跟上。”

“反映了，老朱哥。”

“怎么说？”

“上级说，玉米皮、红薯秧会变成粮食，叫那饿了七天的人，吃这……吃这化学。”

朱老庆沉声不吭了。他从兜里摸出来一根一拃长的玉石嘴旱烟袋，坐在小板凳上，一袋接一袋地抽着。他觉得心里发冷，连说话的声音也哆嗦起来。“这仓库经我手管理，还没有出过岔子。我消灭老鼠，就跟打鬼子一样。为的啥？为这是庄稼人的血汗，国家的命脉……经我手，收你们李家寨的粮食，不下几百万斤，可我不知，李家寨在忍饥。……”朱老庆不善辞令，尤其在这心乱如麻的时候，很难听出他下的是什么决心。“这仓库里倒是有十几万斤粮食，要不是大雪封山，早叫调运走了。西仓库，五万斤玉米，一色的‘金皇后’，雪前翻晒过。今儿晚上，月黑头，仓库后门，虚掩着，是你这个一条胳膊的朱大哥值班。”他突然咳嗽起来，“我的肺不老好，不老好。”

李铜钟听懂了，生命的活力立刻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翻身下床，说：“老朱哥，给我一张纸，我得写个借条。”

“没用，没用。”朱老庆摇摇脑袋，又指指心窝，“反正，我这儿，有数。”

李铜钟在桌上找到一张信纸，拧开笔帽，寻思着。他想写上李家寨的难处，写上他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的经过，写上百十口浮肿病号离死亡的门槛只有一指远了，但心里千头万绪，不知道该从哪里下笔。最后只写了这样几句话：

春荒严重，断粮七天 社员群众，忍饥受寒 粮站借粮，生死相关 违犯
国法，一人承担 救命玉米，来年归还
今借到靠山店粮站玉米伍万斤整

李家寨大队共产党员李铜钟

一九六〇年二月七日

朱老庆戴上老花眼镜看了借条，从袄兜里掏出钢笔，在“一人承担”的“一”上添了一道，又在李铜钟名字底下写上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靠山店粮站共产党员朱老庆”。他好像遗忘了什么，想了想，又郑重地打开印盒，用指头蘸了印色，在他名字底下按了一个血红的指印。

李铜钟感激地望着战友，不吭声咬破了食指。

“铜钟，你？……”

“我用这，我用这。”

李铜钟把食指按了下去。

“夜里十一点。”朱老庆说着，把两包饼干塞到铜钟的大衣兜里。

八 “不敢吃！”

黄昏后,李铜钟回到了李家寨。当他通知各队准备车辆、磨场管理员准备开磨的时候,每一座农舍里都点亮了灯,好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霎时传遍全村:“统销粮下来啦!”

“婶,婶,”李铜钟喊叫着,从半截院墙上把手伸过去,往老杠婶手里塞了两包东西,说,“叫俺叔先嚼嚼这,赶明兴能吃上一顿饱饭。”没等老杠婶看清是啥东西,铜钟就转回身向大队部走去了。

不知是两包饼干,还是来了统销粮的消息,把老杠叔从死亡的门槛上拉了回来。“甬哭了,”他对老伴说:“这一回俺真不走了,俺算着咱还有十年以上的阳寿。”他摸索着下了床,看见隔壁大队部的马灯亮了,就掂根棍拄着,不顾老伴的阻拦,捏着系在腰带上的钥匙,说:“我去听听会,我活着就得为社员们跑腿儿。”说着,一摇三晃地出了门。

大队部正在开会。当老杠叔悄悄坐在门外那块槐树疙瘩上的时候,正赶上铜钟讲“借粮”经过。队干部惊呆了,老杠叔在门外也惊呆了。他想着这粮食的来路,想着铜钟这个支书当的老不容易,鼻子一酸,忍不住哭起来。

“谁?”崔文从门缝里伸出脑袋,问着。

“是我。”老杠叔埋怨自己不该惊动队委们,拄着棍,想站起来,可他来时那股劲没有了。

崔文扶起他,说:“进屋吧,你一个人在这儿难受啥哩?”

老杠叔抹着泪说:“我想着当个人老不容易。”

大家把老杠扶到崔文平时睡在那里守电话的小床上,又各就各位,沉声不响了。

打破沉默的是老杠叔。“铜钟,咱就是饿死,也不能吃这粮食。……咱李家寨没做过违法的事……你们在党的在党,在团的在团……不在党、不在团的……也都是共产党的基本群众……咱饿死也不能动公仓。”老杠叔看看大家,又说:“五一年,毛主席在北京瞅见咱衣裳单薄,怕冻着咱……一入冬就发下寒衣……经如今田县委的手,给我发了这棉裤。”他用指头捣着棉裤,说:“就它,就它。……饿得心慌了,我就看看棉裤,心想……毛主席不叫咱冻着……就不会叫咱饿着。……兴是年前风老大,电话线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等两天,再等两天……等电话线接上……”

灯光照不着的地方,有人抽噎着,擤着鼻子。

“那就缓两天。”一队队长李荒年往鞋底上磕着烟锅,说:“不能叫铜钟为咱

担恁大责任。”

“我发言。”这是张双喜。好多天了，他觉得没脸见乡亲，一头缩在家里不出来，开会时也蹲在黑影里。眼下却从墙角站起来，说：“老杠叔，荒年哥，趁咱眼下还能鼓捣动，快把粮食背回来吧。再等两天，就是给咱粮食，怕咱也鼓捣不动，背不回来了。李家寨四百多口，就是饿坏一口，也是咱一辈子赎不完的罪。往后，要是铜钟有个三长两短，我……”他挥挥手，停下来，等鼻子里冲上来的像吃了生葱一样的气味过去以后，才哑着嗓子说：“蹲黑屋、过大堂、上劳改队，再大磨难，我张双喜替他。”

窗户外有人喊叫：“荒年叔，咱队牲口不济事，卧那儿不起来。”这是一队鞭把二楞的声音。

“荒年叔，你听听，”会计崔文已经打定主意。“不光人不能等了，牲口也不能等了。我看这粮食非吃不可，天塌下来，咱队委一块顶着。”

队委们都站起来，说：“就这，就这。”

李铜钟最后说了话：“老杠叔，我知罪，你就原谅你侄儿这一回罪过。眼下借点粮食，保人保畜；来日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兴能把我这罪过赎回来。抓紧准备吧，等会儿在西寨门外集合。”他想了想，又说：“大队去我一个人就行了，双喜哥、崔文兄弟都留在村里照应。”

散会了。人们带着紧张和宽慰交织一起的心情离开了大队部。不知是谁家窗纸上映着人影，喊声里夹杂着哭声：“他爹，你醒醒……醒醒，救命粮下来啦！”

九 饲养室里

在三队饲养室，李套老汉已经把两头辕骡和四头帮梢牲口交给了鞭把，正满心欢喜地向他那些拴在槽上的臣民们宣布：“统销粮来了，你们熬过来了，熬过来了！”

铜钟、小宽跟一队鞭把二楞，掀开棉门帘走进来。

小宽向铜钟使个眼色，说：“套叔，你看，一队社员来向你取经。”

李套老汉从槽前勾回头，说：“咦，还没吃上一顿饱饭，可又取经哩！”他对风行一时的“取经”很有点信不过。

二楞说：“灾荒年景，俺一队见你喂那牲口老壮实，把大车又套上了，不知你用的啥仙法儿。可俺队牲口不争气，凑合着只能派出去一辆车。大家叫我问问套叔，你这牲口是咋喂的？”

“咋喂的？”李套老汉心里像三伏天用小扇子扇着。“牲口不会说话，全靠人替它操心。”他看看儿子和小宽，“实话说，我给你们当干部的守了点密。秋后，我

看粮食紧缺,天天省下几把料。”他掀开草垛,露出几个料布袋,说:“这不,到如今,这群吃材虽说料不足,可没断过顿。啥经?就这。”

小宽说:“咦,你对俺铜钟哥也守密?”

李套膘儿子一眼,说:“他牲口都舍得吃,能不吃我这牲口料?”他想起了“花狸虎”,可怜它没能熬到今天,心里又难过起来。“可也难怪你们。我是喂牲口的,是把牲口看得高些儿。社会主义是辆车,全靠大骡子大马拉着跑哩!”

李铜钟感激地望着老爹,他想起,食堂里还能打来一瓢稀饭的时候,爹时常等送饭的媳妇走后,把稀饭倒在牲口槽里。

小宽看时机成熟了,笑着说:“套叔,眼看要去拉粮食,可一队牲口有困难……”

李套心里一沉。“你是说使咱这牲口?”

“套叔,俺队社员说,不使你喂这牲口,粮食别想拉回来。”二楞嘴上像抹了蜜。

李套老汉坐在草垛上,想了足足一袋烟的工夫,才开腔说:“我能眼看着粮食拉不回来?可我这牲口也不是老硬邦,这四川马跟那青骡子,勉强能驾辕。既然你们当干部的事先拍了板儿,我一个喂牲口的还能挡车?”

没等李套老汉说完,二楞就去槽上解缰绳,“等等。”李套老汉用烟袋锅点着二楞的鼻子,说:“你们那帮牲口可得硬邦点,你们当鞭把的不能鞭打快牲口。”

“老叔,你看看。”二楞掀开棉袄襟子,指着肋条说:“就是叫我甩扎鞭,你侄儿我也没那力气。”

李套郑重地看看他那二九一十八根肋条,那确实是二九一十八个可靠的保证。他终于解下了缰绳。

小宽、二楞把牲口牵走后,李套老汉又叫住儿子,说:“听说粮食不算少,可你记住给社员讲讲,囤底儿省,不如囤尖儿省;能吃半顿,不叫断顿;不能有了狠,没了忍。”老汉又心疼地打量着儿子,“这些天,难为你了。等粮食拉回来……”他指着儿子的假腿,“叫它好好歇歇,是根拐棍儿也不能整天拄着。”

“中,爹,等粮食拉回来……”铜钟想起了什么,神色怏然地说,“我跟它都歇。”

“是这话。为群众跑腿儿,天还长哩。”爹说着,背着手,向槽前走去。

十 寨门外的呼喊

西寨门外大路上,摆着大车小辆。由基干民兵组成的运粮队,在一天吃了两碗萝卜熬白菜以后,已经排好队站在寨门洞里。

李铜钟向大家约法三章:第一,要遵守纪律,到了粮站,是给咱的咱拿走,不是给咱的,一粒粮食子儿也不能拿;第二,不要坐车,叫牲口留着气力拉粮食;第

三,黑更半夜的,不要惊动四邻八家。

在积雪映照着的靠山公路上,人马出发了。

“你坐上,你那腿不得劲。”有人在铜钟耳边说话。这是张双喜。

“你不该来。”

李铜钟有点生气。

“我陪你,到天边儿,我也陪你。”

“咱队委……都陪你。”这是崔文的声音。

星光下,李铜钟看见十几个人影,无声地簇拥着、跟随着他。他不满地叹了口气,颠拐然而坚定地 toward 粮站走去。

“不能去呀,不能去呀!”寨门里,传来老杠叔的嘶哑的哭喊声。他跌跌撞撞地奔出寨门,跌倒在路旁的积雪里,但他扒着、爬着、喊叫着:“孩儿们,回来呀……咱饿死也不能动公仓……”

一阵山风卷走了老杠叔的呼唤。

李铜钟头也不回地走着。他觉得有一条小虫子从他眼角里爬出来,那是一滴只有在人们看不见的时候才让它流出来的共产党员的眼泪。

大路上,没有人声,只有“嘚嘚”的马蹄声。

十一 “毛主席,请您老人家原谅……”

沉默多天后,李家寨的三座磨屋里又响起了轰隆轰隆的磨面声。磨屋前都排着长长的队。按照连夜分配到户的口粮指标,每户先领一天的面,让全村人赶紧吃上一顿饱饭,然后随磨随领。

石磨在轰鸣,老杠叔却在叹息。小宽从西寨门外把他背回来以后,他就躺在床上,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中,咋办好呢?违法粮吃不得;不吃违法粮,眼看要饿死人啦!你活了六十多,土拥住脖子了,闭住嘴不吃这违法粮,当个干干净净不犯法的鬼去。可全村四五百口,都叫跟着你,啃那墓坑里的土?

但是,在大多数七天没吃一粒粮食子儿的庄稼人看来,对于他们必不可少的肠胃运动和衰弱到极限的身体来说,违法粮跟合法粮没有任何区别,或者可以说是同样的“老好”。营养学家可以作证,玉米,无论是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它所包含的蛋白、淀粉和含热量完全相同。

正是这缘故,磨屋前才排着长长的队,一张张浮肿的面容上都已露出宽慰的微笑,一双双昏黄的眼睛里都在闪耀着生命的光芒了。就连老杠叔的百依百顺的老伴,也好像完全明白了老杠的心思,已经以烈属的身份站在领面行列的第一名了。

违法粮同时又是救命粮,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分裂,使得老杠叔越想越糊涂了。而这时,崔文在门外喊叫:“老杠叔,磨屋里堆不下恁些粮食,还得用食堂库房,小队保管立等你开锁!”

老杠叔必须马上决定对这批违法粮的态度了。他“吭吭”地咳嗽着,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

“老杠叔,我在一队等你。”崔文忙得脚不沾地,没进屋就走了。

咋办好啊?法律与营养的矛盾逼得老杠叔无路可走了。他从床上爬下来,站起,又坐下;走两步,又返回来,最后,才想起什么,摸摸索索点着了灯,举在手里,照亮了墙上的毛主席像。两行热泪“噗嗒嗒”响着,滴在上改时分的那张八仙桌上。“毛主席,您老人家就原谅俺一回……”他哽咽着说:“咱李家寨的干部都是正经庄稼人,没偷过,没抢过。……铜钟是俺从小看大的,去朝鲜打过仗,是您教育多年的孩子。……俺吃这粮食,实在是没有法子……”透过蒙眬的泪水,老杠叔望见毛主席慈祥地向他微笑。他擦擦眼泪,吹灭了灯。

在夜色笼罩的村巷里,老杠叔拄着棍,颤巍巍地走着。“原谅……原谅……”伴随着钥匙的叮当声。

十二 三口大锅

整个村寨都沉浸在喜悦的气氛里,李铜钟和他的假腿,却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床下,甜甜地睡熟了。

只是在平安地拉回粮食、磨屋里响起轰鸣声、社员们开始把黄澄澄的玉米面掂回家里的时候,李铜钟才忽然感到那样衰弱和疲累,多天来一直在右肋下折磨着他的疼痛,断腿骨朵上磨出的新的伤口,都忽然变得那样难于忍受了。他感到必须睡一个好觉,才能有足够的精力,让那条假腿把他带到县公安局“投案自首”。

翠英跟社员们一样,还不知道这批粮食的秘密。她喜气洋洋地和婶子、大娘们厮跟着,领口粮去了。为了让男人睡个好觉,她把囤儿送到饲养室,交给了公爹。恬静的小屋里,只有铜钟在说着梦话:“是我……我是李铜钟……”

铜钟醒来时,已经过晌午了。屋子里弥漫着白茫茫的水蒸气,荡漾着玉米面馍的甜香。翠英却坐在灶边,悄悄地擦着眼角。

“翠英,你?……”

翠英把几个玉米面馍、一大碗黄糊涂端到床头桌上,说:“全村人都吃了一顿饱饭,就剩你了。”

她说着,把脸偏到一旁。

“翠英，你哭了？”

“吃你的吧。”翠英避开了铜钟的眼睛，“煤火不老好，我加了把柴火，烟熏住眼了。”

是哩，庄户人家有了粮食，喜欢还来不及呢，哪有哭的道理！铜钟拿起馍，大口大口地嚼起来。“好吃，好吃！”他连声称赞，“你做的是糠吃着也香，这可是成色十足的玉米面。”

翠英悲伤地瞟他一眼，又低下头，把两块玉米面馍用手巾兜着，又用勺子刮着锅底，舀了半瓦罐黄糊涂，掂着出了门。

“翠英，才给咱爹送饭？”

“爹吃了，闺女也吃了。”

“那你是往哪儿掂？”

“别问了，你吃一顿安生饭吧。”

“谁家出啥事啦？”铜钟在找他的假腿。

翠英停下脚步，眼圈红了。“我去寨外拾柴火，碰见一个逃荒的……”

“逃荒的？”铜钟心里一沉，他明白，他这个逃荒逃到李家寨的屋里人，老爹是饿死在寨壕里的，他懂得逃荒的艰难，忙推开碗说，“那你快送去。”

翠英刚出屋门，铜钟就套上了假腿。

当铜钟来到西寨门时，只见一个花白胡子老汉，抱着一根棍，倚着铺盖卷儿，歪倒在寨门洞里。翠英正一口一口地给老汉喂饭。老汉身边围着一圈社员，正把一块块刚蒸好的黄面馍塞到老汉的破竹篮里。老汉已经缓过劲来，直起身子说：“谢谢，谢谢！”

铜钟问：“大爷，你是哪村的？”

“柳树拐。”

李铜钟想起了刘石头和他的“一口酥”，拿定主意说：“大爷，不要走了，我给你挖点粮食，送你回去。”

“多谢了。”老汉用棍指指寨门外，说，“俺后头还有上百口子，不能都麻烦你。”

铜钟走到寨门外。他看见一个无声的人群正在北山脚下缓缓移动着。有人背着铺盖，有人挎着篮子，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的山路，移动着，吃力地移动着。

走在前头的那个人，肩上挎着铺盖卷儿，手里掂着一个小广播筒，不时地勾回头，把广播筒扣在嘴上喊叫：“不敢掉队，不敢掉队！”

“石头！”铜钟喊叫那个领头的。

刘石头装着没听见，低着头，不看他。

铜钟迎上去，把石头拉到路边，说：“你这个支书，领着社员上哪儿去？”

刘石头没好气地说：“你就别叫我支书，你就叫我要饭头。支部决定了，出外逃荒，也得书记挂帅。”他瞥铜钟一眼，忽然把帽子抹下来，像碗一样捧在手里，行着鞠躬礼，说：“行行好，行行好，同志，您就留一口，留一口，留个碗底儿叫俺舔舔，叫俺这种粮食的人舔舔……舔舔……”刘石头学说看，不由得眼圈红了。

李铜钟一把抓过来帽子，给他戴头上，说：“咱说正经话，你们在这儿避避风，李家寨送你们一人两碗稠糊糊。”

“咦咦，你那粮食不敢吃。”

“为啥？”

“吃了会吓死俺！”石头又朝铜钟瞥了一眼，说，“你们会计媳妇是俺村闺女，今儿清早，她掂回去一手巾兜玉米面，她说……”石头用胳膊肘碰碰铜钟，“老弟，你打过仗，胆大！”

铜钟说：“不管咋说，这两碗黄糊糊，你们非喝不可！”

石头说：“椿树坪、竹竿园也有二三百口逃荒的，一会儿就过来，你管得起？你不知，眼下趁公社干部都在县里开会，光咱十里铺公社，就有几千口人去卧龙坡扒车。”

李铜钟心里乱了。他在想，李家寨的人不挨饿了，可还有多少柳树拐、椿树坪啊！……

转眼到了寨门口。李铜钟抓过来刘石头的广播筒，对柳树拐的逃荒社员说：“婶子、大娘、大叔、大伯们，你们路过俺李家寨，李家寨也没啥送你们，就在这寨门洞里避避风，给大家熬几锅黄糊糊，喝了再走。”他把广播筒还给刘石头，就一颠一拐地朝寨子里奔去了。

村巷里，才吃了一顿饱饭的庄稼人商议着：“一人省下二两，送送咱那逃荒的乡邻吧！”

就这样，李家寨西门外支起了三口大锅。锅里煮着稠玉米糝，勺子搅不动，筷子挑得起，一人两大碗，送走了柳树拐、椿树坪、竹竿园的逃荒社员。

天黑了。走风口吹来的寒风，猛烈地摇落了树上的积雪，天黑得像倒扣着的染缸一样。不知是什么时候又开始下雪了。鹅毛雪片在风中狂舞，淹没了逃荒的人群。

据喇叭碗里的气象预报：今夜大雪，北风七级，最低温度零下十五度。想着那个小车站上的逃荒社员，李铜钟心里结冰了。

十三 首犯是这样落网的

李铜钟回到寨子里，天已经黑透了。

他刚走进西寨门，会计崔文就失魂落魄地跑过来，往寨门外推着他，说：“跑，快跑，公安局来人啦！……”

李铜钟平静地问：“面都分下去啦？”

崔文把一小包钱和粮票塞到铜钟的大衣兜里，推着他：“你就别管啦，跑吧，俺替你打官司。……”

李铜钟好不容易才从崔文手里挣脱出来，照旧用那颠拐着的大步，朝寨子里走去。

迎面一阵脚步声，三个人影急速地跑过来

李铜钟迎上去，问道：“同志，是找李铜钟？”

“他在哪儿？”

“在这儿。”李铜钟用指头点着自己说，“他在这儿。”

三个人全怔住了。这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同志。他们没有料到，那个“哄抢国家粮食仓库的首犯”，竟是这样平静甚至是友好地自投法网了。

手电的强光照射在李铜钟的脸上，他们看见了一张憔悴然而纯正的脸庞，在他眯细着的眼缝里，闪动着镇静、和善的目光。

一张纸像一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在李铜钟面前晃动。“这是逮捕证。”

“手！”

李铜钟顺从地伸出双手。当一个冰冷坚硬的物件箍在他手腕上的时候，他对那个软瘫在寨墙底下的大队会计说：“记住给双喜哥说，种子得留够……”

村巷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李铜钟微微皱起眉头，朝西寨门仰下巴颏，对公安局的同志说：“从这儿走吧，这条路清静。”他领头走进了寨门洞。

不要抓他，不要抓他！”张双喜像疯了一样跑过来，喊叫着：“我替他，我替他！”

社员们从各条村巷里奔出，汇成一股人流，像潮水一样涌过来，伴随着惊慌的哭叫和凄厉的呼喊。

“俺们保他，俺们保他！”

“李家寨不能没有他呀！”

刑警队的同志吃惊地怔住了，但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用身体堵住了寨门洞。刑警队长喊叫着：“社员同志们，我们是奉命办案，有意见可向法院反映，不要乱，不要乱，警惕坏人破坏！……”

人流还在向寨门洞拥着，囤儿爬在小宽肩膀上喊叫：“爹，爹呀！……”

李铜钟转回身向人群走去，人们忽然肃静下来。

“回去吧，乡亲们。”像是拉家常一样，犯人李铜钟发表着他的告别演说，“都回去吧，下着雪，怪冷的。公安局的同志是依法办案，咱得遵守章程，不能给同志

们添麻烦,对不对?党、团员带个头,队委们带个头,把上岁数的搀回去,好好养养身子,不误春耕大忙。我去向上级汇报汇报,过些时兴能回来,兴能赶上种秋。……”

人们顺从地站在寨门口,一动不动了。只有眼泪从那一一张张瘦削的脸庞上淌下来。

李铜钟看见妻子翠英直愣愣地盯着他,翠英在人群里朝前挤着、挤着,突然闭上眼,歪倒在李四婶的肩头上。

“唉唉唉唉……”老杠叔哭着,头撞着寨墙,“老天爷,这是咋啦?咋啦?……”

雪花在北风中狂舞。风雪路上响起了那条假腿“咯吱、咯吱”的声音。望着黑魆魆的走风口,李铜钟想起了卧龙坡车站,他的心冷到了冰点以下。

十四 胁从犯与县委书记

没等李铜钟自动投案,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天上午,县粮食局调运靠山店粮站十万斤粮食的时候,朱老庆把五万斤粮食装上汽车,而把五万斤粮食的借条交给了县粮食局长。然后,他刮了胡子,穿上那套发白的旧军衣,扣上风纪扣,把军帽戴到眉上二指远的地方,又把空袖筒塞到衣兜里,好像准备去参加一个隆重的宴会。

印着两个血红指印的“借条”,已经送到县委书记田振山的手里。田振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盯着李铜钟的名字,想起了土改时那个带头参军的民兵队长,想起他复员时怎样跛着那条假腿来县委看他,接着又从李家寨传来李铜钟带头办社、开山引水的消息。这两年,他不仅没有再看到过李铜钟,跟公社以下的干部也都很少见面了。有什么法子呢?一年只有三百六十天,而去年一年他就开了二百九十四天会,只开半晌的小会还没有统计在内。有什么法子呢?样样工作都要书记挂帅啊!当他听说有人叫他“开会书记”的时候,他苦笑了,是嘛,“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嘛!有什么法子呢!当他难能可贵地抽出时间下乡跑跑的时候,只好是“下去一条线,沿着公路转,隔着玻璃看,公社吃顿饭”了。没想到,当他跟李铜钟久违、久违的时候,李铜钟的“借条”就这样跑到了他的面前。他头脑里空空洞洞,记忆的仓库里只有李铜钟给他写的那封“告急”信同这个“借条”之间似乎存在着联系,但杨文秀昨天来县委报喜时还特意向他汇报,李家寨的缺粮问题已经妥善而及时地解决了。他还退回了县里从机动粮中拨给十里铺公社的统销粮指标,表示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支援困难社、队。

“他们就这样无法无天?”田振山摇着“借条”,望着县粮食局长。

“反正,仓库是空了。”

“朱老庆是什么人？平时表现怎么样？”

“残废军人，一条胳膊扔在朝鲜了，管了六年仓库，平时表现……咋说好哩？……就这么说吧，比有两条胳膊的还干得好些。”

“啊？……”

朱老庆被带到县委书记的面前。“穿军装的庄稼人”，田振山概括了他对这个胁从犯的第一个印象。胁从犯正局促不安地望着他，立正，用左手行了一个军礼。

田振山让他坐下，摇着“借条”问道：“这是你和李铜钟干的？”

“人是铁，饭是钢，首长……”朱老庆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说，“李家寨断粮七天了，那不假，首长，断粮七天了。”

“断粮七天？这可能吗？”

“李铜钟不会哄人，首长，你要说：二班长李铜钟同志，你去把二五〇高地拿下来，控制制高点。他就说：是。你要说：二班长李铜钟同志，你说一句瞎话叫我听听。他就说：报告首长，俺爹还没教过我。”

田振山挑剔而又赞赏地望着这个胁从犯，再次让他坐下，问道：“这么说，你和李铜钟是老关系喽？”

“老关系，老关系。”朱老庆连声回答，“俺两个一块打仗，一块挂彩，一块回国，又一块写了这个条子，首长。”

“你是粮站主任，你懂不懂这是犯法行为？”

“懂，我懂，首长，可人是铁，饭是钢……”朱老庆还想讲一些更深奥的哲理性的东西，但终于没能找到。

县委书记站了起来，不无痛苦地说：“一个支部书记，一个粮站主任，竟然……”他选择了一个分量较轻的提法：“竟然擅自动用国家粮食仓库，数量之多也是很惊人的，一个大案件哩！检察院说，这要依法逮捕哩！”

“是哩，是哩，首长。”朱老庆笔直地站起来，连连点头，表示完全的赞同。当他被带走的时候，还没有忘记立正，用左手行一个军礼。

十五 李铜钟的供词

根据县委指示，县法院决定当天夜间对哄抢国家粮食仓库首犯李铜钟进行第一次审讯。由于县委书记要参加这次审讯，这就格外增添了这一案件的严重性和神秘色彩。

审讯室里增加了一排椅子。田振山和法院院长、审判长、审判员都已就座。县、社两级干部会上的主角杨文秀，也中断了他那个“大抓代食品试点经验”的

总结性发言,来这里旁听这次审讯了。这个突然发生的案件,完全破坏了这个胜利者正向人们叙说胜利的自我陶醉的心情,他坐在靠近墙角的一把椅子上,好像坐在锋利的耙齿上,陷于极度惊愕和恐惧之中。

“你是昨天下午和李铜钟见面的吗?”田振山继续着他和杨文秀的谈话。

“是的。他很善于伪装,对代食品,特别是对‘一口酥’,表示很满意、很热心,丝毫没有看出他有犯罪的动机。”

“怪人,怪人!”田振山连连叹息着。

审讯就要开始了。犯人是从李家寨直接带到这里来的。虽然押送他的刑警很怜惜他那条假腿,路过公社时特意找了一台拖拉机让他坐上,但他来到县法院时,还是精疲力尽了。在他出现在审讯室之前,那长长的水泥走廊里,传来了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砰——通,砰——通……”

审讯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高大、憔悴、脸颊上长满黑胡楂子的犯人出现在审判者的面前。他用肩膀抵住门框,喘了口气,疲惫的目光向审讯室巡视一周,落在把孤零零地放在审判席前的椅子上。他认出那是自己的位置,吃力地走过去,在离椅子还有两步远的时候,就把手伸过去,扶住了椅背,然后把假腿拉过去,调整好搞乱了脚步,挺了挺身子,准备就座了。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县委书记田振山,他怔住了,“田政委?……”他用土改时的称呼小声呢喃着,眼睛里闪烁着惊讶、喜悦的光芒,蓦地伸出那双铐在一起的大手,呼唤着:“田政委,救救农民吧!”接着,“砰通”一声巨响,他那高大然而瘦削的身躯栽倒在审判席前。

审判者们都被这意外的事件惊呆了。随着一阵桌子和椅子的扭动声,审判者奔向被审判者,内心的剧烈的悸动使田振山把犯人抱在怀里,大声叫喊着:“铜钟,铜钟!……”

李铜钟睁开了布满血丝的眼睛,干裂的嘴唇蠕动着。“政委,快去……卧龙坡车站……快,快……”像是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李铜钟恬静地入睡了。

寒风扑打着审讯室的窗口,鹅毛大雪在无声地飘落着。

十六 卧龙坡车站

卧龙坡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在研究“食物化学”的县、社干部竟无一人说得清楚。县委决定暂时停止对这一新兴科学的探讨。田振山带领大家,乘车向卧龙坡驰去。

在那个只有两间候车室的小站门口,田振山首先跳下了汽车。他望见,在灯光黯淡的候车室里,在没有烟火的饭棚、茶棚里,在寒风嘶啸的露天站台上,在积雪盈尺的铁道两旁,挤满了等着扒车的逃荒社员。他们有的裹着被子,有的蒙

着被单,如同被严寒凝结在那里似的,一动不动地蜷伏着,只有灯光和身上的积雪勾勒出他们的轮廓。

田振山在一座饭棚外停下脚步,问道:“老乡,你们是往哪儿去的?”

人们沉默着,在心里思忖,往哪儿去?谁知道哩!哪儿有粮食上哪儿,扒上火车再说。

田振山又走到候车室门口,问道:“老乡,你们是哪个公社的?”

人群沉默着,又在心里数落,逃荒要饭,还打啥公社旗号?老丢人,老丢人!

田振山站在车站门口的灯光下,大声说:“社员同志们,醒醒,我们是县、社干部,来这里看望大家。……”

沉默的人群开始活动了。在一座小饭棚门旁,刘石头坐在一个倒扣着的箩筐上,从被子里伸出了脑袋。他认出站在车站门口的是县委书记田振山,又连忙缩回脖子,重新裹紧了被子。但是,不知是谁把被子掀开一道缝,小声问:“你是刘石头?”刘石头露出一只眼,朝外边打量着,他立即吃了一惊,原来是杨文秀。抓着被角的手不由自主地松开了,被子滑落在地上,毫无掩盖地把他暴露出来。他慌忙站起来说:“是我,杨书记,是我。”杨文秀紧张而恼怒地瞪他一眼,忽然把他按在箩筐上,又抓起被子,连头带身子把他蒙上了。“娘啊,他想咋样处置我哩?”刘石头蒙着被子,一动也不敢动地坐着,心里“咚咚”地敲鼓。他听见“嚓嚓”的脚步声向他走来,神经就越发紧张了。

“这是谁?”是田振山的声音。

杨文秀干咳着,说:“不认识。”

但是,就在杨文秀说话的同时,刘石头就像安了弹簧一样,“噌”地站起来,如同一个会活动的粮食布袋,直立在田振山的面前了。紧裹着的被子里发出了胆怯的声音:“俺是刘石头。”

“哦?”田振山问杨文秀,“刘石头?是柳树拐那个刘石头?”

没等杨文秀开口,刘石头就连声回答:“是我,是我。”由于县委书记也竟然知道了他的尊姓大名和仙山台甫,使他很感到紧张和荣幸,从被子里伸出脑袋说:“田书记,不是俺给咱县抹黑,实因为口粮嫌紧缺些儿,出去几口人,叫留在家的多吃一把米。要都守住家,好比两人盖一床小被子,顾这头顾不住那头。反正,到麦口俺都回来,不误三夏大忙。”

田振山已经觉察到一个使他痛心的问题,但他还要证实一下。“刘石头同志,你们搞代食品不是很有成绩嘛!”

“我检讨,田书记。”刘石头以为田书记掌握了代食品的真实情况,惊慌地说,“我刘石头活了四十岁,只说过这一回瞎话。我也知,瞎话哄不住肚皮,可就怕搞不成代食品,又犯那右倾的错误。”

田振山痛苦地沉默着,县、社干部们都在痛苦地沉默着。就在今天下午的大会上,他们还算了一笔细账,得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数字:全县的红薯秧和玉米皮等于三千万斤粮食!

远方传来火车的吼叫声。田振山感到大地在震颤着,两年多来他赖以作出种种决定的基础在震颤着。那些精确程度达到小数点以下三位数的增产数字,那些几乎是天天送上门来的喜报和震耳欲聋的锣鼓声,那些总是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情况汇报,都在这个挤满逃荒社员的小车站上受到无情的检验,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田振山取下挂在刘石头胸前的小广播筒,站到那个倒扣着的箩筐上,喊道:“社员同志们,我是县委书记田振山。……怪我没有领好,怪我脱离了你们,叫你们一担两筐、顶风冒雪,走上这逃荒路。……”田振山的声嘶哑了。他从箩筐上跳下来,从一个花白胡子老汉身边掂起一个要饭篮,举在手里,说:“现在,我请大家回去,这个要饭篮我要掂回去,把它挂到县委大院里,叫我们好好看看,好好想想,该怎样度过春荒,该怎样叫种粮食的吃上粮食。”

被严寒和饥饿凝结了的人群已经活动起来,嘈杂然而充满希望的低语声使车站热闹起来了。那个花白胡子老汉正拄着棍,从雪地里站起来,老泪纵横地自语着:“中,俺回去,回去……”

这时候,杨文秀正蹲在饭棚后边的雪地上。烟卷的火光,映出了一张不住痉挛着、被绝望和恐惧笼罩着的脸。这个人在想:碰上李铜钟那个愣头青,再加上刘石头这个打锅货,两年的心血算是白费了!……

十七 在危急病号室

在县卫生院的危急病号室里,李铜钟安静地躺着,已经三天了。

按照县委指示,县卫生院正在全力抢救李铜钟的生命。由于不再担心一个昏死的犯人行为不端,那个冰冷坚硬的物件也从他手腕上取了下来。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因病保释”的名义下进行的。从法律上看,李铜钟仍然是一个套着锁链的犯人。

李铜钟啊,你知道这三天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全县二十几个粮食仓库一齐打开了,由于大雪封山而没有调走的粮食,已经分配到饥寒的山村。炊烟升起了,春天回来了。但是,谁能料到呢?田振山已经在今天下午被撤销了职务,就要到地委接受审查和批判了。一个紧急通报上写着他的罪名:“违反党纪国法,擅自提高本县统销粮指标,盗用粮食库存,破坏统购统销。”田振山感到那样忧伤和歉疚,却不是因为这个通报,而是因为他已没有能力来改变李铜钟、朱老庆

的命运了。

去地委以前,田振山来到县卫生院,向李铜钟告别。当他来到病床前的时候,李铜钟睡得正香,不知是浸沉在一个什么样的梦境中,他的浓黑的眉毛微皱着,嘴角却挂着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田振山握着一只冰冷然而结实的大手,小声喊叫着:“铜钟……”他顿住了,他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一位医生小声提醒他:“病人昏迷不醒,他听不见。”

“不,大夫。”这是一个妇女的哽咽的声音。

田振山向病房角落里望去,望见翠英和一个男孩儿坐在一条长凳上。他还能认出这是铜钟的妻子、土改时的秧歌队长。男孩儿是陌生的,但他认识那一双深沉而固执的大眼睛。

“三天了,他在等你,叫你。”翠英抽泣着。“他不叫爹,不叫娘,叫你,田政委。你就对他说两句,他,能听见,能!”

田振山的心猛烈地绞痛着,好久,好久,他才从巨大的悲痛里挣脱出来,对那个听不见声音的人说:“铜钟,我叫你等得太久了。可你再等等,再等等,党一定会纠正错误,你等等……”田振山忽然感觉到什么,摇着那只冰冷的手,喊叫起来:“铜钟,铜钟!……”

“铜钟,铜钟!”双喜、崔文和李家寨的社员们喊叫着,拥进了病房。

医生通知大家:“病人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卫生院长挤过来,把一份诊断书交给了田振山,上边写着:“过度饥饿和劳累引起严重水肿和黄疽性肝炎。”

李铜钟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如此匆忙,他是属大龙的,年仅三十一岁。

病房里,十家八姓的庄稼人都在恸哭。用脑袋撞着床帮的,是老杠叔。他又在悲恸而困惑地哭问苍天:“老天爷呀,这是咋啦?咋啦?……”

田振山久久地站在李铜钟的遗体前含泪默哀。当他看见那个男孩儿抱着一条假腿,把眼泪滴在假腿上的时候,他悲痛地想着:我们这些两条腿的,不能把路走得更好些吗?

十八 记住吧,人们

吉普车在山区公路上急驶,田振山的脑海里仍像潮水一样翻腾。

历史是滔滔东去的黄河,而黄河是浑浊的,它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需要时间来澄清。十九年够用吗?

田振山想起,就在李铜钟死后不久,大概是老杠叔说的——被大风吹断的电话线重新接通的时候,党中央发现了这场严重的饥荒,采取了有力的善后措

施。地委也终止了对田振山的审查,要他到一个国营农场当场长去了。但在他的审查结论上写着:“擅自提高本县统销粮指标,未经批准而动用国家粮食库存,这在组织上仍是一个错误。”田振山对此没有疑议。使他感到痛苦的是:那时他听说,人们提出了李铜钟的平反问题,却由于涉及法律,人也做了“古人”,就被搁置下来了。同案犯朱老庆虽已释放,但是无罪释放,还是胁从不问,法院未加说明。大概是由于不宜再做仓库保管工作的缘故,有人看见他晃荡着那只空袖筒,叼着一撮长的玉石嘴旱烟袋,忙着为县粮食局的干部经办伙食。至于杨文秀,听说害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到鸡冠山疗养所疗养去了。田振山给他寄过一本书:《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表示与他共勉,但一直没有收到回信,这是使他感到遗憾的。

现在,李铜钟、朱老庆终于平反了。田振山是否稍许感到一些宽慰呢?他再三琢磨着平反结论上这样的措辞:“虽然李铜钟、朱老庆二同志所采取的方法不利于法制的加强,但是……”但是,但是!田振山激动地想,还需要制定那样的法律,对于那些吹牛者、迫使他人吹牛者,那些搞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用其他手段侵犯农民利益而屡教不改者,也应酌情予以法律制裁。是的,他辛酸地想,需要这样的法律!

吉普车吼叫着、颠簸着,爬上了走风口。李家寨——那样亲切,又那样陌生的李家寨,就在山洼里静静地躺着。小河一样的人流,正从四面八方向西山坡下汇聚。平反大会就要在那儿举行。田振山的目光落在西山坡一座坟垴堆上,一座被挺拔的苍松翠柏掩映着的坟垴堆上。当他看到庄稼人的供饷和洁白的花圈摆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眼睛湿润了。

“记住这历史的一课吧!”田振山在心底呼喊,“战胜敌人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战胜自己的谬误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活着的人们啊,争取用较少的代价,换取较多的智慧吧!”

蝴蝶

● 王 蒙

北京牌越野汽车在乡村的公路上飞驰。一颠一晃,摇来摆去,车篷里又闷热,真让人昏昏欲睡。发动机的嗡嗡声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像一阵阵经久不息的、连绵不断的呻吟。这是痛苦的、含泪的呻吟吗?这是幸福的、满足的呻吟吗?人高兴了,也会呻吟起来的。就像一九五六年,他带着快满四岁的冬冬去冷食店吃大冰砖,当冬冬咬了一口芳香、甜美、丰腴而又冰凉爽人的冰砖以后,不是曾经快乐地呻吟过吗?他的那个样子甚至于使爸爸想起了第一次捉到一只老鼠的小猫儿。捉到老鼠的小猫儿,不也是这样自得地呜呜叫吗?

汽车开行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头抛在了后边。眼前闪过村庄、房屋、自动列成一队向他们鼓掌欢呼的穿得五颜六色的女孩子,顽皮的、敌意的、眯着一只眼睛向小车投掷石块的男孩子,喜悦地和漠然地看着他们的农民,比院墙高耸起许多的草堆,还有树木、田野、池塘、道路、丘陵地和洼地,堆满了用泥巴齐齐整整地封起了顶子的麦草的场院,以及牲畜、胶轮马车、手扶拖拉机和它所牵引的斗子……光滑的柏油路面和夏天的时候被山洪冲坏了的裸露的、受了伤的砂石路面,以至路面上的尘土和由于驭手偷懒、没有挂好粪兜而漏落下的马粪蛋,全都照直向着他和他的北京牌扑来,越靠近越快,“刷”的一下,从他身下蹿到了他和车的身后。指示盘上说明越野小车的时速已经超过了六十公里。车轮的滚动发出了愤怒而又威严的、矜持而又满不在乎的轰轰声。车轮轧在地面上的时候,还有一种敏捷的、轻飘飘的沙沙声,这种沙沙声则是属于青春的,属于在冰场上滑冰、在太液池上划船、在清晨跑步的青年人的。他仍然在坚持长跑,穿一身海蓝色的腈纶秋衣秋裤。该死的汽车,为什么要把他和地面,和那么富有,那么公平,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抵抗不住任何些微的污染的新鲜空气隔离开来呢?然而坐在汽车上是舒服的。汽车可以节约许多宝贵的时间。在北京,人们认为坐在后排才是尊贵的,驾驶员身旁的那个单人的座位则是留给秘书、警卫人员或者翻译坐的,他们时时需要推开车门,跳下去和对方的一位秘

书,对方的警卫人员或者对方的翻译联系,而作为首长的他,则呆呆地坐在车后不动。甚至当一切都联系好了的时候,当他的秘书或者别的什么人打开后车门探进头来,俯着身向他报告的时候,他也是懒洋洋的,没有表情的,疲倦的和似乎是丝毫不感兴趣的。有时他接连打两个哈欠。许多时候他要等秘书说了两遍或者三遍以后才微微地点头或摇摇头,“嗯”一声或者“哼”一声。这样才更像首长。倒不是装模作样,而是他实在太忙。只有行车的时候他才能得到片刻的解脱,才能返身想一想他自己。同时也还有这样的习惯:所有的小事情他都无须过问,无须操心,无须动手甚至无须动口。

那是什么?忽然,他的本来已经粘上的眼皮睁开了。在他的眼下出现了一朵颤抖的小白花,生长在一块残破的路面中间。这是什么花呢?竟然在初冬开放,在千碾万轧的柏油路的疤痕上生长?抑或这只是他的幻觉?因为等到他力图再捕捉一下这初冬的白花的时候,白花已经落到了他乘坐的这辆小汽车的轮子下面了。他似乎看见了白花被碾压得粉碎。他感到了那被碾压的痛楚。他听到了那被碾压的一刹那的白花的叹息。啊,海云,你不就是这样被压碎的吗?你那因为爱,因为恨,因为幸福和因为失望常常颤抖的,始终像儿童一样纯真的、纤小的身躯呀!而我仍然坐在车上呢。

他稳稳地坐在车上,按照山村的习惯,他被安排坐在与驾驶员一排的单独座位上。现在他在哪里都坐最尊贵的座位了。却总不像十多年以前,那样安稳。离开山村的时候,秋文和乡亲们围着汽车送他。“老张头,下回还来!”拴福大哥捋着胡须,笑咪咪地说。大嫂呢,抹着眼泪,用手遮在眼眉上,那样深情地看着他。其实,并没有刺目的阳光,她只是用那手势表示着她的目光的专注。秋文的饱经沧桑,仿佛洞察一切的悲天悯人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期待和远眺的神情。他们的分别是沉重的。他们的分别是轻松的。这样,如秋文说的,他们可以更勇敢地走在各自的路上。路啊,各式各样的路!那个坐着吉姆牌轿车,穿过街灯明亮、两旁都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的大街的张思远副部长,和那个背着一篓子羊粪,屈背弓腰,咬着牙行走在山间的崎岖小路上的“老张头”,是一个人吗?他是“老张头”,却突然变成了张副部长吗?他是张副部长,却突然变成了“老张头”吗?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抑或他既不是张副部长也不是老张头,而只是他张思远自己?除去了张副部长和老张头,“张思远”三个字又余下了多少东西呢?副部长和老张头,这是意义重大的吗?决定一切的吗?这是无聊的吗?不值得多想的吗?

秋文说:“好好地做官去吧,我们拥护你这样的官,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官,我们期待着你这样的官……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她缓缓地、微笑着说,她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悲凉,她说得那样平稳,那样从容,那样温存又那样

有力量,一刹那间,她好像成了张思远的大姐姐,她好像在安慰一个没有放起自己制作的风筝因而哭哭啼啼的小弟弟,其实,她比老张要小好几岁呢!其实,老张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快六十的人了,在他那个圈子里却还算作“年轻有为”。古老的中国,悠久的中华!这些年,青年人的年龄上限正像转氨酶实验阳性反应的上限一样,大大地放宽了。过去,转氨酶一百二十就可以确诊肝炎,现在呢,转氨酶两百还不给开病假条呢!

离开山村,他好像丢了魂儿。他把老张头丢在了那个山乡。他把秋文,广义地说,把冬冬也丢在了那边。把石片搭的房子,把五股粪叉,把背篓和大锄,草帽和煤油灯,旱烟袋和榆叶山芋小米饭……全都丢下了。秋文和冬冬,这是照耀他这个年轻的老年人的光。秋文便是照耀他的无限好的夕阳,他把夕阳留在了长满核桃树的云霞山那边。夕阳对他招着手,远去了。一步一远啊,这是文姬归汉时所唱的歌词。而有了北京牌越野汽车,车轮的旋转使变远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冬冬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理解他呢?冬冬什么时候才能来到他的身边呢?为了冬冬的母亲——海云,那棵颤抖的、被碾碎了的小白花,这一切报应都是应当的。然而他挂牵着冬冬,冬冬还只是一颗在地平线上闪烁,远远还没有升起来的小星星。这颗星星总会照耀他的。他完全知道,所有的老年人对于下一代的过分的关心,过分周到的安排,给下一代提供的过分优越的条件和为了防范下一代而画地为牢的一切努力不仅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往往是有害的。然而他仍然默默地祝福着冬冬,这个连他的姓都不肯姓的他的唯一的儿子。他为冬冬的思想的偏激而忐忑不安,虽然他知道要求青年人毫不偏激无异于要求青年不要是青年,何况这一代青年成长在颠倒和错乱的年代,他们受了太多的骗,他们有更多的怀疑和愤怒。但是,冬冬是太过分了。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了解历史,能够了解现实,能够了解中国,能够了解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他希望他的儿子不要走上歧路。他希望儿子的可以原谅一部分的偏激,不至于向害己害人害国的破坏性方面发展。

天晴了。明亮的夕阳有点儿晃眼。他把车内的褐色的遮光板放了下来。透过褐色的遮光板,他看到的是乡间的薄暮。然而他的身上有阳光。他的上衣和膝盖头上的阳光变幻着。路旁的树枝切割着夕阳,把光的碎屑不断地洒向他的全身,这给他一种捉摸不定的行进的感觉。他沐浴在这瞬息万变的光网里,渐渐地觉得舒适和满意。随着这嗡嗡声、轰轰声和沙沙声,随着指示盘上的红字的旋转和黑字的跳动,他离山乡越来越远,离北京越来越近,离老张头越来越远,离副部长越来越近。正在工作忙的时候,他竟然请了十几天的假。他甚至告诉部长,他要解决他的生活问题,接一个老伴来。把爱情说成是解决生活问题或解决个人问题,似乎这样说才合法,才规范。如果他说他要去看看他的心上人,那么人

们马上会认为他“作风不好”,认为他感情不健康或者正在变“修”。把爱情叫做“问题”,把结婚叫做“解决问题”,这真是对祖国语言的歪曲和对人的感情的侮辱。但他还是要从俗,他还是用这种刻板的、僵硬的语言请了假。他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离开了一系列紧张而繁忙的事务,这使他十分不安。离开一个本来属于他的,他在里面过得很舒服、很适宜、很习惯了的办公室和住宅,这好像是不那么愉快的。但是老年人也是充满了想象的。那种想象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悄悄地走了。他坐了硬卧火车。他坐了长途汽车。夜间休息的时候四十二个人住在一间大房子里。烟气、汗气和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的荧光灯终夜不关。他也坐过专门给他这个级别的领导干部派的小汽车。坐上这样的柔软而轻便的车,连侧视镜里映出的他的影像都像刚刚沐浴,刚刚擦过油和吹过风一样的鲜亮。坐上这样的车,他美好得像一块新出炉的面包,带着小麦、牛奶、蛋黄和砂糖的芳香,烘烤得红扑扑的。下了这样的车,他住进只供外宾和高级干部住的宾馆。新安装的空调设备,开动起来就像野蜂在花的原野上飞舞。洁白的浴盆。小巧而方便的电加热淋浴喷头。然而这一切与他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一切并不决定于他本身,他自己。他自己毋宁说是更适合那个遥远的山乡。他到那里去寻找秋文,寻找冬冬,寻找那还没有失去的老张头,寻找一个被农民所信赖、所关照的不幸的幸运的人。现在,他离去了。高级宾馆的一夜以后是四个小时的飞行。然后是他的吉姆。秘书到机场来迎接,使他确认了自己的副部长的身份。又是繁华的街道,雪白的快行线,又是红灯。人口和车辆都增加了很多,一到十字路口,就要耽搁。再拐两个弯,汽车减慢了速度,停下了。握手,道谢,他邀请驾驶员上去坐一坐,驾驶员谢绝了。秘书从他手中抢去了所有的本来也不多的东西。明亮的电梯间,烫发的女服务员向他问好。他又回到了一个凡是知道他的职务的人都向他微笑的地方。钥匙插在锁孔里,他没有把钥匙给秘书,而是自己开的门。他不愿意在每一件小事上劳动别人。门开了,灯亮了,高分子化合物的墙壁和地面仍然是一尘不染,就像天天有人用洗涤剂刷洗过似的,他回来了,他坐到了沙发上。

海 云

这是昨天刚刚发生过的事吗?海云的声浪还在他的耳边颤抖吗?她的声音还在空气里传播着吗?即使已经衰减到近于零了也罢,但总不是零啊,总存在着啊。还有她的分明的清秀的身影,这形象所映射出来的光辉,又传播到宇宙的哪些角落呢?她真的不在了吗?现在在宇宙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也许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她吧?一颗属于另一个星系的星星此时此刻的光,被人们看见还要用上几

百年的时间,她的光呢?不也可能比她自身更长久么?

然而这毕竟是遥远的往事,是上辈子的事了。这是一种老年人的心理吧,每当他想起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事,恍若隔世。会不会在一百年以后,二百年以后,五百年以后,有人会回忆起海云或类似海云来呢?他的那么多甜的、苦的、酸的和灼热的回忆,会不会在五百年以后隐隐约约地出现在那时的幸福而公正的社会(但也绝不会是天堂)的一个小伙子的心灵里呢?

上辈子,上辈子,是不是他与海云在上辈子见过面?一九四九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得好来打得妙呀打得妙,打得好来打得热闹真热闹,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着毛泽东前进,人们就是唱着这些歌来解放全中国的。战争的严酷,行军的艰苦,转移、撤退、暂时的失利,牺牲,流血,负伤,饥谨,化装进城,宪兵的钢盔和闪亮的刺刀尖,碉堡的阴森森的眼睛,“剿匪总司令部”的布告;三整三查的紧张空气,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在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人类所能付出的最大的代价以后,解放军摧枯拉朽,坦克、骑兵、炮兵与红绸舞、腰鼓队、秧歌队一起行进。一进城就先扭秧歌,一进城就响彻了腰鼓。人们甩着红绸解放了全中国,人们扭着秧歌可以扭到天堂,而一敲腰鼓,仿佛就会敲出公正、道义和财富。他那时二十九岁,唇边有一圈黑黑的胡髭,穿一身灰干部服,胸前和左臂上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标志。在他的目光里、举止里,洋溢着一种给人间带来光明、自由和幸福的得胜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神气。他每天可以工作十六个小时、十八个小时到二十个小时。他不知道疲劳。他有扭转乾坤的力量。他正在扭转乾坤。他比一切年轻人都更年轻,因为他前途无量。他比一切老年人更有经验,因为他是只占居民人口的千分之几的风毛麟角的“老”革命家。他担任这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的军管会副主任,他每天接待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驻军领导、工会和学联代表、科技人员、资本家和国民党军政起义人士。他的话,他的道理,连同他爱用的词汇——克服呀、阶段呀、搞透呀、贯彻呀、结合呀、解决呀、方针呀、突破呀、扭转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革命的化身,新潮流的化身,凯歌、胜利、突然拥有的巨大的——简直是无限的——威信和权力的化身。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倾听,被详细地记录,被学习讨论、深刻领会、贯彻执行,而且立即得到了效果,成功。我们要兑换伪币,稳定物价,于是货币兑换了,物价稳定了。我们要整顿治安,维护秩序,于是流氓与小偷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们要禁毒禁娼,立刻“土膏店”与妓院寿终正寝。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就没有了什么。有一天,他正在对市政工作人员讲述“我们要……”的时候,雪白的衬衫耀眼,进来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现在想起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就像小时候走也走不完的长街,长大了以后一看,原来是一条小巷。

她那时是多少岁呢？十六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六岁，比他小十三岁。瘦瘦的，两只热情、轻信而又活泼的大眼睛。她进来了，她说话的时候两眼紧盯着你，她那么愿意看你，因为，你就是党。她当时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后来把“自治”两个字去掉了。不知为什么。）她的同学们因为参加欢庆解放的军民联欢游园活动和讨论社会发展史，同校董事会和几名外国修女发生了冲突。海云激动地向他诉说事件的始末，说得他也热血沸腾起来……等到这个事情以中国青年人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以后，海云又来了，“我们全体同学都希望您去做一个报告，讲一讲我们的斗争的胜利的意义。”“全体同学？那么你自己呢？”他问。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他这样问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这个不大不小的姑娘闯进他的办公室使他觉得愉快，就像白鸽使蓝天变得亲切，而鱼儿使海水变得活泼。他对这个姑娘的明亮的眸子产生了一种好感。“我自己更不用说了，我愿意天天听您讲话。”海云回答。她为什么这样回答呢？这难道不是爱吗？当然是爱，然而爱的是党。叮叮当当，蓝色的火花打响在头顶上，他和海云坐在有轨电车里。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小汽车，那时候他并不注意出门的时候要小车，那时候小汽车远没有日后那么大的意义。有轨电车的司机叉着腿，用脚踩着铃铛，刚把手柄放开，刷地一下又关掉了电门。他们没有座位，他们各自握着一个悬挂在皮带上的赛璐珞白环。就这样海云也不住嘴地说了许多。“我们班有两个特务，她们现在很惊慌。她们造谣说蒋介石的空军把上海给炸平了。我们组织了斗争会，在这场斗争里有四个同学申请入团。”“我们组织了讨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而已……’我们把保尔·柯察金的话抄在了壁报上。”他进入了礼堂，女学生们拼命鼓掌，鼓掌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所有的眼睛都乌黑，晶亮，闪烁着崇敬和喜悦的泪光。麦克风坏了，先是发不出声音，后来又嗡嗡地响个不住。等待麦克风的修理就用了半个钟头。海云站到了台上：“同学们，咱们唱个歌儿好不好？”“好！”回答的声音比上课还齐。“你们那一角是第一部，顺序往这边是第二部、第三部……”她一挥手就把学生分了四部，韩信当年指挥军队也不会这么利索。

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爱人民……

共产党的恩情，恩情……

说不完哪……说不完……不完……

呀呼咳咳依呼呀呼咳，呀呼，呀呼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全礼堂都在“咳咳咳咳咳咳”，好像在抬木头，好像在砸石头，好像在开山，

好像在打铁。是的,打铁。

我们大家,都是熔铁匠,
锻炼着幸福的钥匙……
快把那铁锤,高高举起,
打呀打呀打……

和声部分开始了,只有从充满了热情、欢乐和神圣的革命目标的少女的心灵里,才能唱出这么动人的歌。海云指挥着,她的头发舞动如火焰,张思远看到了激情在怎样使她的年轻的身体颤抖。她就是刘胡兰,她就是卓娅,她就是革命的青春。麦克风终于修好了,他开始作报告。“青年团员们!”鼓掌。“同学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革命的、战斗的敬礼!”鼓掌。“你们是新社会的主人,你们是新生活的主人,先烈的鲜血冲开了光辉而宽阔的道路,你们将在这条道路上,从胜利走向胜利!”点头称是,一字不漏地往小本子上记,但仍然不影响频频地鼓掌。“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开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再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再不用悲叹,再不用流泪……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铸造我们的未来,一切失去的,我们都要夺回来!一切还没有的,我们都要创造……在消灭了剥削,消灭了压迫,消灭了一切自私、落后和不义之后,我们失去的只有锁链,我们得到了全世界……”更加热烈的鼓掌。他看见了海云的激动的泪花。泪花在女学生们的睫毛中间滚动。泪光里闪耀着红旗、灯塔、军号和水电站。那一次,他怎么那样口若悬河,热情澎湃?他讲了许多空洞的、幼稚的话。但是,他是真诚的,他是相信的,她们都是相信的。过去的一切都被革命的烈火烧成了灰烬,而新的生活,新的历史,就像那洁白、光滑、浑圆的电车上的赛璐珞环一样,掌握在她们自己的手心里……

然后是通信、打电话、见面、散步、逛公园、看电影、吃冰棍和冰激凌。他和海云在一起。然而主要的并不是公园、电影和冰棍,主要的是政治课,是海云提问和他进行解答、辅导。他像全能的上帝一样,可以准确无误地回答海云关于世界、关于中国、关于人生、关于党史、关于苏联、关于青年团支部的工作的一切问题。海云用那样虔诚、热烈而庄严的目光看着他。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突然把海云搂到自己的怀里,吻了她。她没有一点儿抵抗,没有一点儿对自己的保护,没有一点儿疑虑,甚至连羞怯也没有了。她只是爱慕他,崇拜他,服从他。他不是同样地觉得她亲近吗?他不是从第一眼起就觉得她已经是自己的亲人了吗?上级和同事的一切劝告对于他都没有起作用,就像海云的父母的激烈反对对于海云没有起作用一样。他们结婚了,他三十岁,海云虚岁十八。爱情和革命

都在洒满阳光的大道上迅跑。为了他们的婚姻,海云中学都没有上完,她到一个党委机关做打字员去了。

一九五〇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就在这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朝鲜战场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而在这个城市出现了一起反革命破坏事件。为了支前,为了宣传,更为了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他竟一个多月之内没有回一趟家,虽然他家离他的办公地点不过三公里。那天,在一个重要的会议上,他接到了海云的电话,说是孩子发高烧,很危险。“我正忙啊!”他说,电话挂上了,他似乎听见了海云的哭泣,他的心动了一下,他有点儿责备自己。“散了会我要回去一下。”他对自己说。其实他如果真的想回去他早就回去了。但是,大家都在忙,连科长和干事也是每天开夜车,一连多少天不回家,不但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就连新年和春节也在忙于工作。革命无常规!常规非革命!多加一分钟的班,世界革命就能提前一分钟取得胜利,纽约的贫民窟就会早一分钟照上太阳,而朝鲜代表在保卫和平大会上讲的那些苦难就会早一分钟消逝。那一天开完会是深夜一点四十分。他有意识地提前结束了会议。一个和外国间谍有牵连的反革命集团被侦破了,很快撒下了天罗地网,两个小时后开始行动。抓个空子他回了家,进门的时候他还在看手腕上的表。然而……

孩子,他和海云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死了。

海云在发呆,她的茫然如洞的两只眼睛使张思远倒吸了一口冷气。他问,他劝,他安慰,她始终木然。他检讨自己,他哭了,他甚至想跪在死了的孩子和呆了的小母亲面前,她仍是木然。“可你不能只想到自己,海云!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一刻,美国的B29飞机正在轰炸平壤,成百上千的朝鲜儿童死在燃烧弹和子母弹下面……”他忽然激动起来了,他说了许多过后看来是冠冕堂皇的和不近人情的,在当时却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话。到时间了,警卫员前来催他,他匆匆地走了。

从此他和海云互相变得陌生了。海云还是一个未经事的,没有得到足够的改造和锻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她既平庸而又琐碎。而他在海云的眼里呢,也许愈来愈显得冷酷、自私、夸夸其谈。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谴责自己破坏了海云的学业,甚至是海云的幸福。经过他的努力,海云到上海的一个名牌大学学外国文学去了——是海云自己最喜爱的专业。在火车站上,当汽笛鸣叫了三声,当广东音乐《娱乐升平》的曲调响起,当机车沉重地喘了几声粗气,当学生打扮、穿着朴素、用一根橡皮筋束起了头发的海云从车厢里探出头来,向他挥手的时候,他看到了海云的笑脸上的光辉。恋爱、婚姻,压缩到最小最小的家庭生活,孩子的生和死,所有这一切好像并没有当真发生过,海云仍然是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

到了上海的大学,她将仍能指挥上千名学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他呢,仍然是一个年轻的老革命,一个忘我地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那么质朴,那么纯洁,那么高尚。正像没有邂逅便没有友谊和爱情一样,没有离别也就没有感情的留恋。海云走了,他们通着信,他想念海云,想得很苦,很苦。正是沸腾的岁月,“三反五反”,打“老虎”,他领导运动的几个单位一共揪出了十四个贪污数字过亿(旧币)的大老虎,虽然后来经过复查,真正能够成立的只有两个人,他仍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肃反,大家结合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进行揭发、检举、交代、追查和斗争。搞出了枪,搞出了电台,搞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反革命分子。又查清了一大批人的历史。运动接踵而来,他们正在荡涤旧世界的污泥浊水。五六年,他被任命为这个市的市委书记。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到全市三十万人,就连他的皱眉或者微笑,他的表情和手势,他的目光和步伐,都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他就是城市,他就是市委,他就是头脑、心脏、决策。他殚精竭虑把全市的工作做好,不论是打苍蝇还是盖工厂,他们的工作都走在前面。他成为一架辉煌的、巨大的机器的一部分,在这机器的运转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觉悟、智慧、精力、责任心,感受到自己的分量,他的生存的意义。没有市委,没有他对于市委的指挥,也就没有他。

但是和海云的事情还是弄不好。海云上大学一个学期,寒假中回来了,离别唤醒了他们的爱情,他们一起谈论福楼拜和莫泊桑,他对于法国文学就像海云对于党委领导工作一样无知,他的问题和话语使海云哈哈大笑,海云完全明白他是为了讨自己的欢心才不怕谬误百出的。为了报答他,海云也关心起这个市的普选和财政预算。他们还一起烧了一次鱼,他发现海云的烹调技术胜过饭店的特级厨师。浇鱼的汤汁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始终是一个谜。春节的饺子以后是灯节的元宵。然后海云又走了,临走的时候因为一个重要的会议他没有能够上车站。海云来了信,她又怀孕了。他皱起眉来让海云去做流产,这激怒了海云,一连四个月不给他写信。放暑假的时候,大着肚子的海云办好了休学手续回到了家。“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海云的忧郁的目光在埋怨。他也感到内疚,生产以后不但找了很好的保姆,而且新成立的儿童医院的主治大夫成了书记家里的常客。本来说是休学半年,实际休了一年,海云离不开他们的第二个也是唯一的儿子。张思远认为既然这样就不必再去上学,上不上大学对于她来说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上不上大学她也会得到足够的尊敬和足够良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不,海云一定要上,而且换个本市的学校也不行。这么坚决,却又在临行前夜把眼泪落在快满一周岁的冬冬头上……

风和风打架。水和水冲突。人和人矛盾。自己也跟自己过不去。这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和人生!月亮缺了,还会复圆。你果真能断定,这复圆了的月亮,便是

当初那缺了、窄了、暗淡了的月亮吗？蚕蛾僵了，又出现了许许多多赶忙吃桑叶的蚕宝宝，你当然知道，这蚕已经不是那蚕。江河流去，一个浪头跟着一个浪头，后浪和前浪，它们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联结，又在哪里呢？

海云，海云，我了解你么？你了解我么？你为什么不原谅我？你又怎么能原谅我！

风言风语。好心的，恶意的和居心叵测的。张思远大发雷霆。难道我管得了——一个城市的几十万人，却管不了你一个吗？他的内心里甚至发出了这样强梁跋扈的呐喊……但是为什么，当海云一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发现海云穿着的完全是她自己的旧衣服，而他给她买的一切讲究的服装都被丢弃了的时候，他是那样空虚，连一句硬话都说不出来了呢？“为了我们的孩子……”在那里请求的竟是你自己。海云沉默着，她哭了一场，退了学，答应和那个男同学断绝关系。虽然没有毕业也罢，海云到本市的一个师范专科学校做助教去了，不久，她还被任命为系党总支的副书记。于是，张思远放心了，何况，海云上下班也是由市委的车子接送……

晴天霹雳。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海云被揪出来了。“我实在没想到你会堕落到这一步，你怎么竟然去为那些反党的小说喝彩？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忘记了吗？”他背着手，踱来踱去，立场坚定，铁面无私。“只有低头认罪，重新做人，革面洗心，脱胎换骨！”他的每个字都使海云瑟缩，就像一根一根的针扎在她身上，然后她抬起头，张思远打了一个冷战，他看到她的冰一样的目光。……一个月以后，海云提出来离婚，他仍然想挽回，但是各方面的情况都说明离婚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他最后一次见到已经办好离婚手续的海云的时候，他甚至发现了海云脸上的喜气，这曾经使他大为恼怒。“堕落了，确实是堕落了。”他对自己说。

枝头的树叶呀，每年的春天，你都是那样鲜嫩，那样充满生机。你欣悦地接受春雨和朝阳。你在和煦的春风中摆动着你的身体。你召唤着鸟儿的歌喉。你点缀着庭院、街道、田野和天空。甚至于你也想说话，想朗诵诗，想发出你对接受你的庇荫的正在热恋的男女青年的祝福。不是吗，黄昏时分走近你，将会听到你那温柔的声音。你等待着夏天的繁茂，你甚至也愿意承受秋天的肃杀，最后飘落下来的时候，你甚至没有一声叹息。因为你已经生活过了，尝过了，爱过了。你虽然只是一片小小的叶子，却为大树、为鸟儿、为情人做了你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如果你竟是在春天，在阳光灿烂的夏天刚刚到来之际就被撕掳下来呢？你难道不流泪吗？你难道不留恋吗？虽然树上还有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第二个春天会有同样的千千万万的树叶，虽然这棵大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许永远不会衰老，然而，你这一片树叶却是永远不会再现的了。地老天荒，即使这个地球消逝了，而宇宙间的星云又重新结合成一个又一个的新的地球，你却永远不会再接

受到阳光和春雨的爱抚了,你也永远不能再发出你的善良的絮语了。

然而汽车在奔驰,每小时六十公里。火车在飞驰,每小时一百公里。飞机划破了长空,每小时九百公里。人造卫星在发射,每小时两万八千公里。轰隆轰隆,速度挟带着威严的巨响。

美 兰

美兰是一条鱼。美兰是一只雪白的天鹅。美兰是一朵云。美兰是一把老虎钳子。

海云才走,美兰就来了。很可能这出自许多关心他的人的通力安排。他们早就不赞成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学生娃娃式的女人共同生活。美兰浑身放着光泽和香气。美兰有一张大白脸。美兰那样坚定地来填补海云留下的空缺,好像这一切都是注定了的。她来接任书记夫人的职务就像他接受书记的职务一样充满信心和不容怀疑。她有时候凝神沉思,脸上显出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前额上会出现两道显得有点儿凶恶的竖纹。然而只要一看到张思远,这竖纹便立即消失了,露出迷人的微笑。她的到来使张思远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衣、食、住、行,一切都出现了飞跃。“为了你的工作……”美兰把这句话挂在嘴上,使他觉得名正言顺、心安理得。旧沙发换了新沙发,金黄色的缎子面闪闪发光。他软瘫在上面,舒适而又疲乏。他恍惚有一个印象,美兰动不动就找行政处交涉什么。他抗议说:“不要随便提什么要求。生活上不要太讲究。原来的沙发就很好,换什么?”美兰嫣然一笑:“瞧你说的!你忙得忘记了一切,你忙得未老先衰了,你难得回家休息那么一小会儿,难道就不应该把条件搞好一点儿么?”他没说什么。他正在横下一条心搞炼钢,许多家庭把锅都砸了。反右,反右倾,反保守,形势逼人,他的神经长期处于紧张之中。一个新的发光的柔软的沙发,正像一个新的发光的温柔的夫人一样,对于他来说绝不是什么奢侈。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要听从美兰的安排,有时简直是被美兰牵着鼻子走。这使他有些不快。在更偶然的情况下,一个娇小的、瘦弱的、纯洁的海云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他心头蓦地一动,他大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好像一株小树从车窗外面掠过,他定睛看时,小树早已经被车轮抛在远远的后面了,他没有工夫怀恋,他没有工夫叹息。

变 异

处境和人,这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坐在黄缎面的沙发上,吸着带过滤嘴

的熊猫牌香烟,拉长了声音说着啊——喽——这个这个——每说一句话就有许多人在旁边记录,所有的人都向他显出了尊敬的——可以说,有时候是讨好的笑意的,无时无刻——不论是坐车、看戏、吃饭还是买东西——不感到自己在生活中的特别尊贵的位置的张书记,和原来的那个打着裹腿的八路军的文化教员,那个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在草棵子里匍匐过两天两夜的新任指导员张思远,究竟有多少区别呢?他们是不同的吗?难道艰苦奋斗的目的不正是为了取得政权、掌握政权、改造中国、改造社会吗?难道他在草棵子里,在房东大娘的热炕上,在钢丝床或者席梦思床上,不都是一样地把自己的身心、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每一天和每一夜献给同一个伟大的党的事业吗?难道他不是时时怀念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那崇高卓越的革命理想,并引为光荣么?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那种视胜利为死灭的格瓦拉式的“革命”,究竟与我们的现实,我们的人民有什么相干呢?他们是相同的吗?那为什么他这样怕失去沙发、席梦思和小汽车呢?他还能同样亲密无间地睡在房东大娘的热炕头上吗?

他怕失去他的领导职务,绝不仅仅因为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他自己辩解说。他怕失去党,失去战斗的岗位,失去在这个伟大的队伍中的重要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好像比人还要重要。这些年,他主持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他亲眼看见了那些失去了位置的人的狼狈相。揪出来,定性,这是比上帝的旨意,比阎王爷的勾魂诏,比任何人和多少人的愿望、意志和情感更强大一千倍的自在的和可畏的力量。他当过市委书记,他自以为是全市的主宰,但是,当海云被“揪出来”和“定下来”以后,他毫无办法可想。他亲手经办了一个又一个的揪出来和定下来的事情。一夜之间,一个神气活现的领导干部便成了人人所不齿的狗屎,扬起的眉毛塌下来,刺人的目光变得可怜巴巴,挺直的腰身弓下去,焕发的容光变得毫无血色。人们对这种挨斗的脸色有一种粗野的比喻,叫做像被屁熏过一样。这简直是一种魔法,一种丝毫不逊于把说谎的孩童变成驴子、把美貌的公主变成青蛙、把不可一世的君王变成患麻风病的乞丐的法术。

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法术会施行到他的身上。历次运动中,他经常给下级、给群众讲:“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体会到的是胜利的喜悦,斗争对于我们的是得心应手的事情。只有没落阶级,才对斗争充满灭亡前夕的恐惧和感伤。”那么,一九六六年为什么他一听见红卫兵的锣鼓声就心跳呢?

事后他经常回忆,这一天是怎么到来的。当“五·一六通知”刚刚下达的时候,他仍然像历次运动一样,紧张中又有点儿兴奋。他知道这样的运动既是无情的又是伟大和神圣的。但这次势头好像特别猛。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他只有迎着风浪上。而且他深信这一切是为了反修防修,是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创造历史的必要。他知道又要有一批领导干部倒下去,但是为了党的利益他

不能温情,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阶级斗争之剑。他批准了对于报纸副刊主任的批判,这种批判实际上是政治上的乱棍。接着又把文联主席作为黑帮头子抛了出来。报纸上一个劲儿地提醒人们警惕走资派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一个文联主席是太小了,于是他横下心抛出了市委宣传部长。然后是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黑帮、牛鬼蛇神越抛越多,越抛越把他自己裸露到了最前线。终于,水到渠成,再往下揪就该轮到他自己了。

但他仍然觉得突然,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是另一个张思远被揪了出来,被辱骂,被啐唾沫,被说成是走资派、叛徒、“三反”分子。他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张思远才是他本来的面目,那个张思远坐在市委小楼(专为常委以上领导干部办公用的)的书记办公室,小楼门口有武装警卫。办公室有两间,外面一间比较大,铺着略旧了的地毯,墙上挂着市区平面图、城市规划图、绿化图和郊区水利工程图。一张一头沉办公桌,桌上有电话分机,还有一套沙发。他的秘书坐在一头沉的后面,细心、负责、一丝不苟。里间屋是他用的,有讲究的吊灯和台灯,有崭新的地毯,有黑漆硬木的大写字台,有皮面的旋转软椅,还有一张铜栏杆的钢丝床,供给他在中午或会议的间隙小事休憩之用。他看文件,他写批语,他划圈和打钩,他打电话,他沉吟、苦思,他毅然决断,然后告诉秘书去办。按他的级别,省辖市的书记本来不应配秘书,但是办公室还是派了一个秘书来,多年来,别人,他自己和秘书本人都认为就是他个人的秘书。除去全市的工作,他没有个人的兴趣,个人的喜怒哀乐。他几乎整整十七年没有休过假。甚至于在看他自幼喜爱的地方戏的时候他也不得安宁,有些急件要送到剧场,有些电话转到了剧场来。离开了领导工作,就不存在什么张思远。同样,他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市委能离得开他。

然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张思远,一个弯腰缩脖、低头认罪、未老先衰、面目可憎的张思远,一个任凭别人辱骂、殴打、诬陷、折磨,却不能还手、不能畅快地呼吸的张思远,一个没有人同情、不能休息和回家(现在他多么想回家歇歇啊!)、不能理发和洗澡、不能穿料子服装、不能吸两毛钱以上一包的香烟的罪犯、贱民张思远,一个被党所抛弃,一个被人民所抛弃,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丧家之犬张思远。这是我吗?我是张思远吗?张思远是黑帮和“三反”分子吗?我在仅仅两个星期以前还主持着市委的工作吗?这个弯着的腰,是张思远书记——就是我的腰吗?这个灌满了稀糨糊的棉衣(红卫兵把大字报贴到了他的背上,顺手把一桶热糨糊顺着脖领子给他灌进去了)是穿在我身上吗?这个移动困难的,即使上厕所也有人监视的衰老的身躯,就是那个形象高大、动作有力、充满自信的张书记的身躯吗?这个像疟疾病人的呻吟一样发声的喉咙,就是那个清亮的、威风凛凛的书记的发声器官吗?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他得到结论:这只能是一场噩梦。这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差

错,简直是在开一个恶狠狠的玩笑。不,他不相信自己会成为党和人民的敌人,不相信自己会落得这样下场。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这个活着还不如死了好的癞皮狗一样的“三反”分子、黑帮张思远并不是他自身,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躯壳硬安在了他的身上。标语上说:张思远在革命小将的照妖镜下现了原形,不,那不是原形,是变形。他要坚强,要经得住变形的考验。

但是,冬冬的几个嘴巴把他的精神支柱摧垮了。

冬 冬

父亲对于孩子的感情和母亲是不同的。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不,从生命的信息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肚子里,孩子的一哭一笑,一动一止,一声一息都牵动着母亲的心。而张思远在开始的时候竟然感觉不到那个软软的、抱也抱不起来、身上带着尿臊味儿、哭起来没完、哭起来就闭上眼睛不肯睁开的小生命和自己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第一个儿子的夭亡,他对于一九五二年冬天来到他和海云的生活里的冬冬,抱着一种特别小心翼翼的加意保护的态度。这是一种责任感,这是一种习俗——父亲都应该爱儿子。然而,这不是爱。有爱也暂时还只是对于海云的。他知道海云是怎样牵肠挂肚、如呆如痴地爱着孩子,在海云坐月子的头一个星期,张思远为了海云甚至需要做出非常喜欢冬冬的样子,这使他觉得羞愧、不自然。

十个月以后,海云休学完毕,走了。冬冬已经能站立,能扶着墙挪动一下步子,能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叫“叔叔”了。冬冬总是把父亲叫成叔叔,使张思远略感不快。那时的冬冬已经长出了八个牙,能吃饼干,甚至有一次流着眼泪嚼完一根大葱。这一切使冬冬像一个人了,一个新的人来到了张思远的身边,他将是自己人生路上的又一个伴侣。这种想法使张思远嗓子里热乎了一下。在工作忙的时候,他有时会打个电话问问孩子的情形。

这以后传来了海云和班上一个男同学关系“不正常”的消息。一种最庸俗、最卑劣的令人恐怖的念头一闪而过:冬冬是我的吗?讨厌!我哪有时间管这些。我要管的是三十万人的命运。他忙得没有时间正眼看冬冬一眼了。

但是他原谅了海云,因为他是一个登高望远的领导者,更因为,他爱海云。有爱就有宽恕,什么都能宽恕。他看不得海云的孩子般的面孔上缀满泪珠。他宁愿自己受辱。但如果他的爱恰恰是海云的不幸的根苗呢?啊,啊,啊?海云的泪珠,荷叶上的雨滴,化雪时候的房檐,第一次的,连焦渴的地面也滋润不过来的春雨!一九五四年春天,隔着雨丝他一眼就看到了冬冬的紧贴在玻璃窗的脸,压

扁了的鼻头青、白、丑得可爱。到处是清凉、湿润、对于焦渴的心灵的慰藉。永远不老的春天，永远新鲜的绿叶，永远不会凝固、不会僵硬、不会冻结的雨丝！小冬冬爬到了桌子上，把脸贴到玻璃窗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大自然的奇观，到处悬挂着亮晶晶的雨丝，新鲜、好奇、迷恋而又困惑。这是一个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赏雨。忙碌在会议和文件之中，像蚕儿忙碌在桑叶之中的张思远被冬冬赏雨的画面深深地打动了，他心潮汹涌。春天，绿叶，雨丝，这是为了新生者而存在的。只有年幼者才能看到他所看不到那些惊人的美丽，只有第二代才能懂得他所不懂的生活的魅力。生生不已，这世界才不会霉朽在锈垢里。他没有惊动自己的亲儿子。亲儿子，亲儿子！这甚至使他回想起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回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正是他自己，在他两岁的时候，在三十一以前，也用同样的姿势，压扁了鼻子，欣赏这人生的第一遭春雨。冬冬和他，不就是一条生命之线上的两个点吗？他走了，为了千千万万幼小的孩子，他愿意背负起所有的重担，他愿意把一切心力献给自己从幼小就参加了的人类最宏伟也最艰巨的事业。冬冬长大了，他们的生活会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祝你幸福，儿子！

从此，他一有空闲就愿意与儿子在一起。当他拉着儿子的手，缓缓地（儿子已经在小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在他的身旁，不是一个和他一样的，或者即将和他一样的男子汉吗？当他把儿子抱到冷食店的乳白色的藤椅上的时候，他不是平等地在和另一个独立的人——现在是他的客人呢——“共进冷饮”吗？当儿子把脸伏在一块北冰洋牌大冰砖上，快乐地发出呜呜的声音，他又是怎样地幸福，怎样地惬意啊！等冬冬吃完了，他把儿子高高地举起来，举得远远高过了自己的头颅，看，儿子比我还高呢！父与子的爱，男性的爱，与其说是血缘的亲密，不如说是友谊！

然而这友谊遭到了风暴，原因当然是孩子的母亲。一九五七年，海云居然在系里宣扬几篇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向党进攻的小说。这几篇小说是二十年以后张思远才看到的。为什么我当时竟想不起来找小说看一看呢？然而即使有空去看小说也是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一个看重信仰和热情远远胜过现实和理性的年代。于是海云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企图从内部攻破堡垒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披着羊皮的豺狼，化装成美女（我的天）的毒蛇，睡在身边（！）的敌人，她起的是蒋介石所不能起的危险和恶劣的作用。而结果呢，自然是海云要求离婚，他尽最大的力量作最后的努力，没有效果。我可是仁至义尽了，办离婚手续前后他一再自己对自己说，正是这种对自己无咎的坚信和一再提醒，使他意识到自己有一点底虚，正像大声唱着歌走夜路的人，声音越大，说明他越虚弱。

冬冬怎么办？他们没有谈很多。“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你仍然是他的母亲”，这是不言而喻的，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者，不会像划分私有财产一样地划分孩

子。孩子一开始住在他这里,很快他也认识到没有母亲的孩子便是没有人穿的衣服,而没有父亲的孩子至多是没有衣服穿的人。孩子后来住到了海云那里,他有空的时候,便派汽车去接。然而冬冬是太懂事了,不论是北冰洋牌的冰砖,是粉红色的草莓冰激凌还是高级西餐馆里的、装在高脚银杯里的菠萝三得,已经不能使他快乐,使他呜呜地叫,甚至也不能使他展眉一笑了。

然后美兰占领了他的全部空白,虽然他们没有孩子。他也逐渐适应了、喜欢了美兰给他安排的舒适而又合理的生活。美兰一定学过运筹学,她的生活的第一准则绝不是享乐,而是合理。早晨喝茶而晚上喝酒,早上用较凉的水洗脸而晚上用温热的水洗浴,坐着伏尔加牌汽车去看电影的时候还要让司机在电影开演以后开上车去菜市场买鲜笋,一切都透着合理。然而这样合理又这样美满的生活,仍然使张思远激动不起来。她带来的只是舒服,是令人困倦的幸福,是一种酒醉饭饱的无差别境界。而这境界又是乏味的。他几次找已经上了小学的冬冬,没有找来。于是,一九六四年的一天他自己乘车去郊区的一个小学看望冬冬。他不愿意见海云,他不能去海云家。尤其是海云也已经结婚,对方正是大学期间的那个同学,海云的这种行为更证明了他的高尚无瑕,他的良心获得了一种解脱。

一九六四年的冬冬瘦弱、苍白,显然营养不良。一九六〇年困难时期,张思远曾经打发人给冬冬送过几次高价的奶油点心与高级巧克力,奶油点心与巧克力并没能使儿子壮实起来。而且,张思远觉得,在送过点心与巧克力之后,儿子与他更疏远了。一九六四年的这次见面,冬冬一再强调:“爸爸待我很好。”他管继父叫做爸爸而称亲父张思远做父亲,而且全部称呼都是“您”,他才十二岁。他那种客气而又提防的表情使张思远想起自己的某个下属。又加上美兰得知他去看望冬冬以后给他施加的无形的压力——一切如常,只是美兰的额头显出了那两道竖纹,而且笑声特别不自然。这种笑声使他觉得脊背上冒冷气。于是,他不再去看冬冬了。一九六五年春节,他又派人往学校给冬冬带去了花蛋糕。谁想得到,花蛋糕被原封退了回来。附有冬冬的一个字条:父亲,谢谢您。不要再给我送吃的了,请您不要生气。他生气了,他已经越来越习惯把人分成上级和下级,下级对于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他轻易地向下级发脾气而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而且,脾气是威严、是权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冬冬,(当然不会是他的上级)却这样对待他,真是岂有此理!

将来等他大了,他会明白这一切的,他会自己来找我的,他会懂得,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有一个市委书记的爸爸是多么荣耀和福气!张思远这样想。

两年以后,他弯腰撅腚,站在台上挨斗。打倒大叛徒大特务张思远!张思远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砸烂张思远的狗头!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顽固派……只能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呼噜咕咚鸣隆,好像在开锅,好像在刮

风,好像耳朵聋了什么都没有听见。头发根被揪得发麻,腰弯得好像变成了两截。但这一切总会过去,他被斗已不是第一次。就在这时候忽然冲上来一个少年,他正好撩起眼皮偷看了一眼,天呀,冬冬!嗖地抡起了巴掌,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耳朵上,这真是咬牙切齿的狠狠的一击,只有想杀人、想见血的人才会这样打人,只一下就打得张思远从两个扭住他的胳膊的小将手里跳了起来,连脑袋都嗡地一响,像通了电,耳膜里的刺心的疼痛使他半身麻木,恶心得想要呕吐。抡起的手臂,又用手掌背反打了他的右耳,这一下比较轻,感到的疼痛却更加分明,等挨了第三个巴掌以后,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昏迷中,他听到了那个打他的少年——他就是冬冬,没错!好像哭出了声。

阶级报复!只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才能说明这一切。海云是已经定性、已经作了板上钉钉的正式结论的阶级敌人。而张思远,尽管目前在受群众的审查,但他的职务是省委正式任命并在中央组织部备了案的。他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城市的党的委员会的领导人。革命群众要打倒他,给他提出了许多罪名,但这一切没有作结论,没有定性。他的问题与海云有着本质的差别,阶级的差别。冬冬顽固地站在他的妈妈的反动立场上,也许是接受他妈妈的指使,对张思远实行阶级报复,谋杀!不是说“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么?不是说,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难免有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跳出来么?冬冬的行为就是右派翻天,就是牛鬼蛇神跳了出来。需要找个机会,向看管他的革命群众把这个问题谈一谈,提醒他们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提醒他们对于社会上的真正对党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的人,绝对不能手软。

然而他自己先软了。没过几天,他得到了海云自缢身亡的消息。几乎与此同时,他得知美兰已经正式贴出了造反声明,要与他彻底划清界限。这后一个消息对他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审 判

我请求判我的罪。

你是无罪的。

不。那有轨电车的叮当声,便是海云的青春和生命的挽歌,从她找到我的办公室的那一天起,便注定了她的灭亡。

是她找的你。是她爱的你。你曾经给她带来幸福。

我更给她带来毁灭。我没有照顾好我的第一个儿子,到现在我甚至于想不起他的小脸是什么样子。我得罪了冬冬,我现在才明白,我送去的巧克力和花蛋

糕只能提醒他注意到我和他最亲爱的妈妈的处境的差别。在她流泪的时候,我本应该用手绢,不,用手指揩干她的泪水。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向她打了一番官腔。但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些。如果没有我,她会安心上大学,她会成为教授、专家,她会毫无负担地在完成学业、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后找一个年龄、性格、地位更合适的伴侣。由于有了我,这一切都成为不可能了。这使她郁郁寡欢,这使她在五七年说了一些带情绪的话。

但是你爱她。真的吗?

我们都有一死。我希望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刹那再说一句:海云,我爱你!但如果我真的爱她,我就不应该在五〇年和她结婚,我就不应该在四九年和她相爱。我们不相信魂灵,但我假设我们还有一千个一万个来世,我愿意一千次一万次地匍匐在海云脚下,请她审判我,请她处罚我。

你是人,你的地位并没有剥夺你的爱的权利,更不能剥夺你回答一个少女的爱的召唤的权利。

然而我更成熟,我应该理智一些,我应该负起责任。我不应该闯入一个如此纯洁而幼小的灵魂。

在一九四九年,你就不纯洁吗?你就不幼小吗?那是我们的共和国的童年,也是我们大家的童年。

但我为什么竟没有想到去保护她?豁出命我也应该在她的身边。

然而后来是她不爱你了,她太轻浮,她有毛病。在大学,她有了自己的情人,该责备的只能是她而不是你。

我的痛苦就在这里。竟没有人能够惩罚我。

有。

谁?

冬冬。

山 村

庄生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轻盈地飞来飞去。醒了以后,倒弄不清自身为何物。庄生是醒,蝴蝶是梦吗?抑或蝴蝶是醒,庄生是梦?他是庄生,梦中化作一只蝴蝶吗?还是他干脆就是一只蝴蝶,只是由于做梦才把自己认作一个人,一个庄生呢?

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有趣的,听来却有点悲凉的想象。原因是他有一个有趣的,简直是美妙的梦。能够做这样的梦的人有福了,如果梦中不是化为蝴蝶,而是化为罪囚,与世隔绝,听不到任何解释,甚至连审讯都没有,没有办法生活,

又没有办法不活,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再仔细一看,监狱竟是自己任时监造的,是自己视察过的,用来关阶级敌人的……他又将想些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铁一样的令人窒息的梦也醒了。张思远在一九七〇年突然被释放了,就像前三年突然“升级”关进单人监狱一样莫名其妙。更使他清醒的是他的家,他的家已经没有了,在他监禁期间,美兰已经去法院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带走了他尚存的全部家产。这样的消息对于一个出狱者,真像山泉沐浴一样爽心明目、安神败火。

也是一只蝴蝶,却不悠游。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的事情现在还排不到日程上。”专案组长对张思远说。一个钻山沟的八路军干部,化成了一个赫赫威权的领导者、执政者,又化成了一个被革命群众扭过来、按过去的活靶子,又化成了一个孤独的囚犯,又化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我能不能经得住这一切变化呢?

他不像有些被拉下马来可怜虫,把生活的意义、生存的目的放在等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上。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市委书记需要一个“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天大的笑话。他需要活下去,需要思考,需要找到他的儿子。

于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初春,他动身到冬冬插队的一个边远的山村。山下一片杏花如云。山谷里溪流旋转,奔腾跳跃,叮咚作响,银雾飞溅。到处都是生机,就连背阴处的薄冰下面,也流着水,也游着密密麻麻的小鱼。向阳的地方更不用说了,一片葱绿。从草势来看,即使在冬天,这草也没有停止生长。顽皮的松鼠在枝上跳来跳去。大青石上是松鼠嗑掉的杏核皮,嗑得干干净净。小花蛇在枯叶里钻进钻出。野兔跑起来就像一溜烟。记得有一次张思远到郊区去视察,夜间行车,一只小灰兔闯进了越野小汽车的前灯的光柱里。它一下子那么惊慌,左右都是一片漆黑,后面是疾驶着的、紧紧追赶着它的可怖的怪物——汽车。它只有向前一条路,它只有沿着车灯光柱的方向拼命跑。司机哈哈大笑起来,踩踩油门,加快了速度。当时张思远真想命令司机停住车,关上灯,让灰兔走掉。但他不好意思这样婆婆妈妈。眼看汽车就要把灰兔轧倒了,张思远看到了小兔的颤抖的长耳朵。忽然,小兔不知道怎样来了一股勇气,转身一蹿,得救了。张思远长出了一口气。

山径崎岖。人生的道路更加崎岖。但山还是山,人还是人。尽管祖国的大地承受着太多的苦难,春天仍然是祖国的春天,山的春天,人的春天。他真希望自己变成一只蝴蝶,从积雪的山峰飞向流水叮咚的山谷,从茂密的野果林飞到梯田。一组青年在梯田上犁地。为首的小伙子斜披着黑色的小棉袄,打着口哨。忽然,他高声唱起了山歌:

天大的冤屈告诉你哥哥,

妹妹呀你莫要想不开，
莫要投河……

海云没有投河，她把脖子伸到绳环里。张思远感到了在蹬倒凳子以后的一刹那，绳索像铁钳一样地咯吱一声勒断喉咙的痛苦。一想到这儿，他就半天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发音器官出了毛病。他就是以此为理由请求不去“五七”干校而去他儿子插队的地方的。

他是作为“白丁”来到山村的。没有官衔，没有权，没有美名或者恶名，除了赤条条的他自己以外什么都没有。就像五十年前他来到这个诱人而又恼人的世界上一样。人出生的时候不是一无所有，甚至连遮掩身体的裤衩都没有吗？一无所有的他住到了山村里，儿子却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村落。我们会慢慢了解的，他冷静地住了下来。他并没有很快了解他的儿子，他首先了解，首先发现的乃是他自己。

在登山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腿，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腿。在帮助农民扬场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双臂。在挑水的时候，他发现了肩。在背背篓子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背和腰。在劳动间隙，扶着锄把，伸长了脖子看着公路上扬起大片尘土的小汽车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眼睛。过去，是他坐在扬尘迅跑的小车的软座上，隔着透明塑料板看地头劳动的农民的。

他甚至发现了自己仍然是一个不坏的、有点魅力的男人。不然，那些结过婚的女社员，那些壮年妇女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他说说笑笑呢？已婚的男女农民们互相开那么重的玩笑，说那样的粗话，让他简直受不了。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难道休息的时候还不能自己拿自己开开心吗？他们开心的事够少的了，总不能歇地头的时候也念“凡是敌人反对的……”或者高唱什么“冲云天”“冲霄汉”啊。他们巴望着土里多出点东西，他们不想跑到云天或者霄汉上去。倒是他张思远，过去常常坐着“安—24”或者“伊尔—18”在云天和霄汉上飞行。

他甚至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觉悟，自己的人望。十七年当中，他到处受到尊敬。但这尊敬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诬陷、强暴、摧残。连美兰和他的儿子也离开了他。他恍然大悟，这尊敬不是对张思远而是对市委书记的。他失去了市委书记便失去了这一切。但是现在不同了，农民们同情他，信任他，有什么事都来找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确实正派，有觉悟，有品德，也不笨，挺聪明也挺能关心和帮助人。

然而在冬冬面前不行。他第一次去看冬冬的时候，冬冬正在缝鞋，拿起一块皮子，噗噗噗往上喷一些唾沫，然后是锥子引针。他看得出，冬冬在努力表现自己是一个缝鞋的老手，完全具有在城市的十字路口摆鞋匠摊的经验和水平。但正因为他太努力了，他并不真像一个会缝鞋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话……”他问冬冬。

“没什么可说的。您何必到这儿来？我连姓都改了，我不姓张。”

“那随你。但是毕竟只剩下了我们两个。我除了你，你除了我，再没有别的亲人。”

“如果您官复原职，您是要先杀一批的吧？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政权便是镇压之权。我不是第一个该杀的吗？”

“别……淘气！胡说八道！”

“您为什么不说不恨我呢？那天您没有认出我来吗？那天是我打的您。说老实话，您当时是怎么想的？阶级斗争，阶级报复……是吧？”

张思远战栗了。

“这样倒好一点儿。我需要的是诚实。诚实的恨对于我比虚假的爱好。”冬冬激动了，他的锥子扎破了左手的无名指。他把那个指头放到嘴里，嘬着、咽着自己的血。他的这个姿势活像他的母亲。张思远新婚的时候，不，大概还是结婚以前呢，海云给他钉扣子的时候也扎破过自己的手。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点儿你母亲最后几天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

“那天我打了你，就被送到了公安局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这是你们提出来的口号。”

又是战栗……那绳索勒断脖颈的痛苦，咯吱，残酷的一声响，咯，咯……

“您怎么了？”

“咯……咯……”

冬冬把他扶到了床上，而且给他倒了一杯水。

“你……为什么……躲着我？”张思远的嗓子劈啦劈啦的，像在拉一个破风箱，像在转动一架旧风车。

冬冬听懂了他的话。半天没言语，然后反问了一句：

“您能原谅我吗？”

“也许，应该请求原谅的是我呢。”

“您说我为什么要……打……您？”

“为了你母……”

“不，不是的，”不等父亲说完冬冬就打断了他，他生怕父亲说出那荒唐而可怖的话，“我打您……真真正正是为了革命造反，我们那一派的头头鼓励我……恰恰相反，在您揪出来以后，母亲多次给我说，您不是大字报上所说的那种人……母亲的死，和我不听她的话也许不是没有关系。当然，主要是她被打得皮开

肉绽。她受不了。我……”

热泪切割着皮肤。悲痛切割着心。他们和解了。

他们没有和解。在张思远和他的儿子慢慢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来往关系以后,有一次,他看到了儿子写的一篇日记。日记写得灰暗,简直是颓废,什么“够了,这谎言和伪善,这高调和欺骗”,什么“人是最自私也最卑劣的”,什么“生活便是错误,生活便是痛苦”。看着看着,张思远的手抖了起来。难道我们这一代艰苦奋斗,流血牺牲,鞠躬尽瘁,夜以继日,就是为了让你们搞这种渺小卑微的无病呻吟吗?他激动地责备了冬冬,冬冬也激动起来。

冬冬说:“立场?立场?您说我站在什么立场?您们当然是站在党的立场,您们牺牲,您们从党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比您们献给党的少!就是现在您坐了监狱,您委委屈屈,您们每月的收入也比农民一年的收入多。而且,您们当然充满信心,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您们又会坐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

“住口!”张思远动怒了,“你可以尽管骂我,却不能诬蔑我们的党!不能诬蔑我们整整一代革命者。李大钊,方志敏……是为了人民而抛头颅、洒热血……”

“为了我们,为了让我们受罪吗?”

“你这样说太危险!太反动!”

“您要送我进监狱吗?本来您建造监狱也不是为了关自己的呀!”

“你……”张思远气得说不出话来。如果是五年以前,他听到这样的言论,不论是谁,他都要和他决裂,他都要全力给以回击,给以打击,给以镇压。他听到这种话简直要爆炸了,他压低了声音,含糊地骂了一句,拂袖而去。

在回自己住处的路上,碰上了雷雨。闪电就在树梢上放光,雷声炸响在头顶。雨声哗哗,真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跑,在呐喊,在厮杀。雨水在脚下流淌,走在山路上,就像趟过溪水一样,鞋变得又重又湿。这个时候,张思远多么渴望自身也变成一声沉雷,一道闪电,他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发光,能爆炸呀!他甚至想,触雷该是多么痛快的事啊!

他滑了一跤。

复 职

不知道为了什么,
忧愁常围绕着我,
每天我都在祈祷,
快驱散爱的寂寞……

一首香港的流行歌曲正在风靡全国。原来他并不太知道。他只是恍惚听说许多青年在录制香港的歌曲。那时他只是轻蔑地一笑。对于香港的文化,他从来没有放到眼里。只是在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悄悄地动身去他作为老张头曾经劳动过六年、流过六年汗、心里头更是流过六年血的地方,在他转车之前住到了一个一般干部住的招待所里,他才从同室的一个贸易公司采购员所携带的录音机那儿,仔仔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了这首歌。

怎么说呢?他不是音乐家。在部队,他学会了识简谱,学会了打拍子。八路军战士都爱唱歌。一个初到边区的人,头一个印象便是歌声多。有一个歌的头两句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然后底下两句是“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解放战争时期,只要听一听蒋管区流行的《疯狂世界》,再听一听解放区流行的《我们是民主青年》,便可以知道中国的未来是属于谁的了。

然而现在呢?现在是怎么回事?三十年的教育,三十年的训练,唱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好”、“年轻人,火热的心”,甚至还唱了几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之后,一首“爱的寂寞”征服了全国!

他想砸掉这个采购员的录音机,他站起来,转了一圈,拳头握得指甲刺痛了手心。这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是彻头彻尾的轻浮!那些在酒吧间里扭动着屁股,撩着长发,叼着香烟或是噙着香槟的眉来眼去的少爷们和小姐们,那些一听到外国,一听到香港,甚至一听到台湾(!)就垂涎三尺而又不读书、不流汗、不开夜车,却又整天梦想着电冰箱、流线型家具和席梦思的混蛋们,他们难道真正懂得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忧愁,什么叫寂寞吗?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三等照相馆里照相时候的令人作呕的装腔作势!

一首矫揉造作的歌。一首虚情假意的歌。一首浅薄的甚至是庸俗的歌。嗓子不如郭兰英,不如郭淑珍,不如许多姓郭的和不姓郭的女歌唱家。但是这首歌得意洋洋,这首歌打败了众多的对手,即便禁止——我们不会再干这样的蠢事了吧?谁知道呢?——也禁止不住。

甚至是一首昏昏欲睡的歌。也许在大喊大叫所招致的疲劳和麻木后面,昏昏欲睡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必然?

但是不,张思远副部长不能昏昏欲睡。从一九七五年四月复职以来,张思远夜夜都不能踏踏实实地合上眼睛。

一九七五年四月,张思远正在山村他和儿子合住的那一间用石头砌的墙,用石片盖顶子的小屋里择韭菜。由于女医生秋文的帮助,他和儿子已经和解很久了。现在他择菜,打算等儿子回来吃一顿饺子,他还想邀请秋文和她的女儿一道来吃晚饭。经过了一冬的萝卜白菜之后,拿起一把哪怕是沾满了泥土和马粪

的碧绿的韭菜,也顿时觉得石屋里充满了春光,充满了春的生机。白茎绿叶的韭菜,是和阔别好几个月的和暖的风,和小鸟的啁啾,和融化着的一道一道的雪水,和愈来愈长了的明亮的白天,和返青的小麦,和愈来愈频繁的驴与马的嘶鸣,和大自然的每个角落里所孕育着、萌动着的那种雄浑而又微妙的爱的力量不可分离地扭结在一起的。所有这些都敲打着每个人的心灵,即使创痛使某个心灵变成了裂了纹的鼓,也总会发出一点儿声息,给人一点儿希望。何况是张思远,贫穷和压迫熔铸了他的童年,血与火染红了他的青春,党与领袖指引着他的路,人民的尊敬、信赖与期待推动着他的步履。他已习惯于乐观和充满希望。在这个春天他又重新充满了对于某种转机的预感。总不能老是一个样子。连小孩子都分得清的是非,党能够弄不清吗?回顾一生,回顾上下左右,回顾历史和现实,回顾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展望明天,党毕竟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而且终将是正确的党。

这当真是预感吗?抑或只是事后才自以为是预感?不是从一九六六年他被“揪”出来的第一天起他就不相信那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期待着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定吗?他不是觉得昨天比今天更真实,而明天既杳然又带来向昨天靠拢的希望吗?还有这个“揪”字,什么叫揪呢?查一查《辞海》,当作“抓住、扭住”解。这是一个具体而又形象的动作。而现在所说的“揪”出来,又代表着一种多么明晰而又含混的意思!特殊的政治产生了特殊的政治术语。这几年简直是对语言法则的挑战,斯大林关于语言的稳定性的论述到底还灵不灵呢?我们的后代能够理解今天流行的这些花样翻新的词汇吗?他们能够理解“炮轰”和“油炸”,“靠边站”和“砸烂”,“站队”和“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吗?

所以他需要转机,他像赛前的跑马一样地迫不及待。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事情。他与这一切息息相关。但是山村的生活又明明改变着他。他为在春天择一把韭菜而衷心喜悦,正像他不畏刺目的阳光抬起头来去寻找盘旋歌唱的云雀,为这春天的第一只鸣禽而衷心欢喜一样。他细心地从韭菜中剔除枯叶和杂草。他着重取掉靠近根部的不洁的鳞片。他闻到了新鲜的韭菜的辣而芳香的气息。他拿不定主意去请还是不请秋文,并为这拿不定主意而觉得懊恼。

有一种声音。不是牛的声音,不是风的声音,不是乡村孩子们的声音。拖拉机和柴油机吗?为什么声音愈来愈近?是汽车?哪一辆汽车迷了路?坐汽车的人既受人尊敬又脱离群众,但总要有人坐小汽车。“砰砰砰”,这么早就剁起肉来了吗?哪里来的肉啊?放两个鸡蛋就行了,金黄的鸡蛋,油绿的韭菜。然而用鸡蛋作馅子费油,农村里供油的标准太低了。“砰砰砰”,却原来是敲门。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草绿色的军服,闪闪的红星。立正,一个军礼。韭菜落到了地上,站起身来的时候碰翻了小板凳,咣当。

张思远同志：

请于四月二十五日前来省委组织部报到。

此致

革命敬礼！

这是什么意思？同志，承认我是“同志”了吗？组织部，这个机密而又重要的部门，总是由最可靠、最有经验、最沉着的同志掌管的。此致敬礼，所以伟大的长城的一员把手举到了帽檐前。图章却是革委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代）。谁也闹不清这种组织机构的名称和内涵，弄不清党的机构是何时何人为了什么取消的，弄不清为什么革委会的党的核心小组变成了党委，弄不清现在让他去报到的组织部是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他所熟悉的掌管党员和干部的党委的一个要害部门。

但毕竟是要他去组织部。至今，他的党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但他按月寄去党费，既然没有给他什么处分，他就有权利——义务变成了权利——缴纳党费，而不论是政工组还是核心组，无法拒绝。而且，他是按照他原有的级别和工资缴纳的，虽然他现在每月的生活费不足他应领工资的三分之一。这也是他的一个挑战，我仍然是高级干部，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也并不比你们少！

“快坐下”，他热情而又客气地请前来接他的军人同志坐下。他的口气，他的笑容，他的弓曲的腰和背更像山区的老农。这几年，他已经惯于仰视那些在新生的红色政权里工作、支左的人。那些人的工资比他少一半也罢，却有着十倍、百倍于他的威风。仰视红色政权的干部便会平视农民、“五七”战士和再教育青年，这是令人痛快的。年轻的，刚刚长出一圈黑胡子的解放军同志却没有坐下，他说：“外面有车。张思远同志能不能料理一下，下午就动身？”主任说是愈快愈好……”年轻人的口气既缓和又礼貌，这种口气使张思远想起了昨天，想起了他有过的秘书和司机，想起了他的党龄和职位。“这个——”他把“个”字拉长了声音，声音拉得长短和职务的高低常常成正比。他已经有九年没有这样拉长声音说话了，当明天具有了向昨天靠拢的希望的时候他的声音立即拉长了，完全并非有意。他的脸刷地一红。

九年来他的心好像一个平静的湖泊。尽管湖泊的深处有漩涡，有波动，甚至有火山的爆发和死灭，然而湖面是愈来愈平静了。平静的湖面是美丽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湖面上看到自己的倒影，而且，倒影往往比活人更有魅力。

来接他的军人和汽车只不过是向湖泊吹了一口气。湖面上呈现了浅浅的同心圆。于是湖的自我感觉在发生变化，不管湖泊承认不承认。

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他回到了市委小楼。他被任命为新生的红色的市委

的第二把手了，“可我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呢！”他提出。“先上任去！”有关领导回答他。还是那条路。还是那座楼。粉刷和油漆遮盖了九年的疮痍。镶木地板和白晃晃的大吊灯在最初的一刹那竟使他热泪盈眶了。幸好，谁也没有看见。失去的天堂，他想起了这一句实在不应该想起的话。九年来，他已经忘记镶木地板和大吊灯了。五年来，他只知道崎岖的、石子铺成的山径，掩映的树木，石块和石片搭成的房子，室内的地也是土质的，要适当地洒一点儿水，洒少了起尘土，洒多了和泥。夜间照明靠煤油灯，关键在于把罩子擦净，擦亮。最初他用呵气的方法，向着玻璃罩子呵了一口气，然后用柔软的手绢擦过来擦过去。有一次把玻璃擦碎了，险些扎破了手。后来他学到了一条经验，用白酒把手绢沾湿，果然擦得晶亮异常，照得石窑就像白昼一样。何况，晴天有满天星斗，乡村的星星比城市多得多，而且，由于山比地面更靠近天，所以星星离山村的农民比离城市居民近得多。但是他怕阴天，怕下雨。那次如果没有秋文医生他也许就没命了。

他现在不怕阴天，不怕下雨，也不怕黑夜了。城市无夜晚。汽车里无阴雨。拥有暖气设备的办公楼和宿舍无冬天。但是，没有夜晚就没有星星。没有阴雨就没有雨过天晴的重生的欢欣。没有冬天就没有洒洒扬扬的漫天飞雪的纯洁。有一得必有一失。

许多的老同志、老朋友、老下属、老同学来找他。正像他当初一下子变成了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不可接触一样，他一下子又成了人们的希望，人们的注目的中心。“我早就想去看你了，这中间我打听过好几次。”有人说，显然不是假的。“我犹豫了半天。现在人家官复原职了，找的人也多，别去打搅吧……可咱们毕竟是老关系了，张书记还能把咱们忘了吗？”如此这般。特别是市委的老人，更是把希望寄托在张思远身上。张思远重返市委领导岗位，是他们各自回到体面的昨天里去的先声。

然而，被今天毁坏了的昨天却不可能在明天照原样恢复。不仅某一派的“警惕走资派复辟还乡”和温柔一点的“穿新鞋走老路我们不答应”之类的标语在时时敲打着他。而且，在他熟悉的一切后面他发现了格格不入的陌生。公共汽车堆积在终点站上不肯发车，汽车站上等车的人一群一群，翘首相望。据说司机围拢在一起打扑克，谁被“抠”了“底”，谁开行一次。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大批判、热烈欢呼。甜食店成立革命领导小组也说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黄纸红字（这两种颜色代表喜庆，白纸黑字代表声讨、共诛之）十分醒目的大标语下面是没有扫尽的垃圾和伸手乞讨的儿童。清洁工也不好好干活了。而乞丐正与空话一起增长。到处是喝酒，请客，“哥儿俩好，八仙寿”。据说“批林批孔”的时候有一位左派提出划拳行令中的用语有儒家思想，另一位左派便设计了新的拳经：

“一元化呀，三结合呀，五星红旗呀，八路军呀……”荒唐变成现实，现实变成梦魇。莫非好几亿人都把脚气灵或者痔漏膏当作补药咽到了肚子里？

市委也不是原来的市委了。每天上班进市委的门的时候，他的心都要动一下，我没有走错吧？我真的又来这里的吗？这是什么地方呢，我不是去挨打的吧？市委的牌子换得更讲究——据说原来的牌子被不知谁拿去做大立柜了，五合板嘛，市场上缺——所以增加了警卫，戒备森严，这当然是必要的。连团市委和妇联门口也站着带枪的人。有一次张思远无意中听到了两个不在哨位上的警卫排战士模仿样板戏的对话，“……两件什么宝？”“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

“新鲜事物”还多着呢。小汽车增加了三倍还不够用，因为副职增加了五倍。组织科四个科长只有一个干事，到处是谣言、小道消息、传说：梅花党，长江大桥擒匪，美人鱼，棺材里的死人诈尸……公开的山头和宗派。完全取消了党的组织生活，更不可能进行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公事私办，私事公办，来联系工作的人还要拿上私人的介绍信，为了私事可以巧立出差名目。明目张胆地伸手要党票，要官，要权……

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要完蛋吗？想到这里，就像发了寒热病，张思远一会儿冻得浑身打战，牙齿咯咯地响，一会儿七窍生烟，忧心如焚。何况，他的头顶上又出来了一位第一书记，一位除了抓辫子搞阴谋仍然只会抓辫子搞阴谋的新贵。

美兰也来凑热闹了，她要求复婚。几次来信，张思远没有回复。电话约谈，张思远回答说：“不必了。”他挂上电话，不顾耳机里传来的吱哟乱叫。一天下班，我的天，美兰已经坐在他的房里，她大概是拧开了锁，而别人不敢拦阻。完全是“复辟”后的全权的女主人，床单拽下来准备洗涤，卧室里新添了两束塑料花。张思远什么话都没说，回到了办公室。这时他由衷感谢市委大门戒备的森严。他拿起一叠文件，全是“大批促大变”，也许是促大便吧？什么反潮流，什么法权，什么全面专政，什么唯生产力论，什么教育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愈来愈好。他漾起了酸水。他的胃在收缩，贲门在收缩。各种新名词连同小道消息，连同革命拳经，连同美兰的大白柿饼子似的面孔一起旋转，如刀如炸弹，如雾如烟，如风如电，如商标如膏药如济公活佛的蒲扇。

回到昨天是不可能的。他的余生是为了明天。必须抢救明天。

秋 文

那次他在雷雨中跌了一跤。醒过来后，张思远发现自己是躺在公社医院的

病房里。远近驰名的大大夫秋文亲自在护理他。这一跤,不仅摔坏了他的腰椎,而且,濯雨的结果是上呼吸道感染继发肺炎。

张思远到山村来没有几天就知道了秋文,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四十多岁,高身量,大眼睛,长圆脸,头发黑亮如漆。她把头发盘在脑后,表面上像是学农村的老太太梳的纂儿,然而配在她的头上却显得分外潇洒。衣服总是一尘不染,走在山路上,健步如飞。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农村,本来是一个很格涩的人物,但她偏偏非常随和,不但和农村的男女老少都说得来,而且接过农民让过来的烟袋就能吸两口,在红白喜事上,接过农民让过来的酒杯就喝。

听说她和丈夫离了婚,独自带着一个女孩子生活在山村。这种独身女人本来是很难在农村生活的,偏偏她和这里的男男女女交往,却没有有人在背后说过她的半个不字。

开始,张思远觉得她有点儿神秘,同时直觉地不那么喜欢她,虽然他承认她本来应该说是相当漂亮的。他觉得她有点乍乍唬唬,每天说的话,走的路,抽的烟和喝的酒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是,她的医术好,和农民的关系好,所以张思远每次见到她也都礼貌地招呼一番。后来他又了解到,冬冬倒是常到秋文医生那里去,说是为了找一点儿医书看。生活总不会把一切门窗堵死。

“您说了许多胡话,”秋文医生说,轻轻地,音调完全不同于她日常的说笑。“可能您想的事太多了,大干部嘛。”隔着口罩,张思远好像看到了秋文医生嘴角的笑容。她的眼睛也在微笑着。这微笑里充满了理解,充满了悲哀,充满了凝结着悲哀的清冷的自信,好像是雪天里的篝火,天与海的尽头的白帆,月光下的一株老胡桃树。那个带几分男人气质的、饶舌的、随波逐流的大大夫退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把你们拉下来当当老百姓也不赖”,另一次她这样说,丝毫不顾忌同病室的其他人,“要不,别看报纸上喊什么下乡、蹲点喊得那么凶,你们躲在自己的小楼里才不愿意下来呢。您说对不对?老张头!”

张思远想抗议,他并没有什么小楼。他现在连家都没有了。但是老张头的称呼使他觉得温暖,就像小时候母亲叫他“小石头”一样。张思远的名字(乡下管这种名字叫做“官名儿”,可见,这种名字是为了做官才起的)才像石头一样硬。人需要母亲,需要亲昵,需要照料、理解和同情。所以每当秋文医生说:“好好吃下这些药,多喝开水,你会很快好的”的时候,他都觉得特别熨帖。

冬冬每天来给他送饭,挂面,荷包蛋,山药汤,小米粥。“您不要那样生气,”冬冬说,“我不过是在日记本上发发牢骚罢了,爱发牢骚的人其实倒不会怎么样。那天是我不对,对于李大钊和方志敏,我永远崇敬他们。我最近常想,生活压根儿就不像我小时候想的那样美好,所以生活压根儿也不像我理想的那样

不好。”

“你？你转变了？”张思远惊喜交加。

“谈不上转变。我大概总不会完全了解您，就像您不会完全了解我。人和人的隔膜，是永远也无法消除的。于是发展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

“那你为什么又天天给我送饭来呢？”

“秋文阿姨让我来的。她说，”冬冬迟疑了一下，好像不知道该不该把底下的话说出来，“秋文阿姨说，你爸爸也不容易……”

“你和她谈过我？”

“谈过。”

“谈过你的母亲？”

“谈过。”

“还谈过什么？”

“什么都谈过。怎么？违反保密条例么？”冬冬的语气又是那样刻薄了。

“不。我说，那很好。”

张思远——不，老张头从冬冬那里了解了一点儿秋文的事情。秋文原来的丈夫是一九五七年划的“极右”，现在还在劳改农场。冬冬认为，只是为了女儿的前途，秋文才与丈夫离了婚，实际上，她在等待着那人的自由。一九六四年“四清”的时候的工作队，和一九七〇年“清队”时候的宣传队开始都瞧着她不顺眼，准备立案专门审查，但是所有的社员和基层干部都向着她。她主动到工作组和宣传队去谈自己的一切，谈笑风生，全无禁忌，反而打消了别人对她的猜疑。

她有一层保护色吧？她分明是一株异地移植的树，既善于适应水土，又保留着自己的与这里的植物群全然不同的个性。她的随和后面是清高，饶舌后面是沉思，喜笑乐天（带点傻气）后面是对十字架的背负。

但那些又不仅仅是保护色，清高后面确有一种由衷的利他主义，沉思后面确有拿得起放得下的丈夫气，而背负着十字架的她仍然时时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想想她对村里的少男少女的婚姻恋爱的关切吧，她都快成了新式的、可靠的、不怕受累、不怕落埋怨的媒婆了。如果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她的笑声能那样真诚，那样傻气么？

但是她显然用另外的调子与张思远谈话，“好好了解了解我们的生活吧，官复原职以后，可别忘了山里人！”

张思远挥挥手，表示对“官复原职”丝毫不感兴趣。但是秋文不饶人：“甭摆手，我如果是你就争取早点儿回去。一个月挣着那么多钱跑到这儿来摸锄把子？不但官复原职，而且会官运亨通！”

“越说越不着边际了。”张思远更摇头了。

“当然。自然死亡再加上穷整,真正有经验、有水平又能干事的领导干部现在是越来越少!不光你们越来越少,就连我们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也越来越少。再搞上十年教育革命,等到中国人都成了文盲,小学毕业的就是圣人!而你们这些大干部呢,更成了打着灯笼也讨唤不着的宝贝!反正说下大天来,你既不能把国家装在兜里带走,也不能把国家摸摸脑袋随便交给哪个只会摸锄把子的农民!中国还是要靠你们来治理的,治不好,山里人和山外人都会摇头顿足地骂你们!”

张思远只觉得眼前一亮,心头一亮。治国治党,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事情总会发生变化,总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想不到秋文还是一位政治家呢。但是我能等到那一天吗?不是整天说离了谁地球也照样转吗?不是我已经被抛出社会生活的轨道有许多年了吗?

秋文的话应验了,没有用很久。一九七五年,张思远正择着韭菜就被接回了市委。一九七七年,粉碎“四人帮”后,张思远升任省委的副书记。一九七九年,张思远又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的一个部的副部长。

上 路

他终于暂时离开了质地讲究的“部长楼”。这一幢高层建筑是为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提供住房的,老百姓称之为部长楼。经常有许许多多小汽车停在楼前。有警卫,所以一般人不走近它。住惯了部长楼离开它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张思远这次的重返山村之行已经计划了许久了,已经下决心许久了,但他还是挪不动自己的脚步。一想到他要离开自己的惯常的和应有的生活轨道,他就觉得不安,甚至有点烦恼。就像一个坚持按时每日三餐的人,突然让他改成一天吃两顿饭或者四顿饭,就像一条鱼忽然准备去陆地上观光。今晚我躺在这里。明晚,后天晚上,以及后天以后的诸晚,我将躺在哪里呢?出发前夕,张思远辗转反侧,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劝阻他,在拉着他的手,拉着他的腿,拉着他的衣角。别折腾了,你现在不是很好吗?你已经快要六十岁了,你担负着党政要职,热情、想象和任性对于你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一种不能原谅的罪过。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但他终于离开了部长楼,而且,他坚持没有坐飞机和软席卧铺,坚持不准他的秘书预先挂长途电话通知当地各级领导准备接待。秘书几次企图说服他,暗示他的这种坚持不但是幼稚的,无意义的而且是不近人情的,不正常的。秘书只差问他一句话了:您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

他用沉默压倒了秘书。现在,火车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开动了。秘书,司机和他坐惯了的黑色吉姆都离开了他。汽笛发出了刚亮的愉快的叫声。机轮的声

音也是铿锵有力的,金属的撞击令人焕发精神。李光羲的“朋友啊请你干一杯”之中夹杂着女列车员的吐字急促的问话:“这是谁的行李?”张思远闭了一下眼睛,有一位脾气大的母亲打了她的淘气的孩子的屁股蛋,于是孩子和李光羲展开了咏叹比赛。张思远睁开眼睛,阳光洒满车厢。风吹动了他的花白的头发。有人打开了车窗。他轻松而自由。我又是一只蝴蝶了么?

“把票给我!”女列车员向他伸出手,下令说。铁路员工的蓝色制帽下是一张年轻的、不耐烦的脸。如果在软卧,她就会用另一种口气说话。这挺有意思。张思远掏出了自己的车票。铁路制服,还有解放军的军服,似乎都应该改进一下了,这两年人们穿得愈来愈好,而制服与军服却依然旧貌。本来,这种制服,尤其是军服,应该有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一个红鼻头,敞着怀的大胖子摇摇摆摆地坐到了他的旁边,大胖子的不寻常的分量使卧铺吱地一响。“玩两把百分吧?”大胖子说话是胶东半岛的口音,嘴里喷出辛辣的生葱味儿。如果在软卧……

如果在软卧车厢会比这儿好得多。当然。但这一类的想法只不过微弱地一闪。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阳光。他喜欢这一节车厢。喜欢脸孔绷得紧紧的列车员姑娘,瞧,她又来拖地板了,多辛苦!他喜欢他头上的中铺和上铺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开车就睡着了,年轻人的睡眠是多么香甜呀!他喜欢对面的吸着两毛钱一包的香烟的干部,这位干部死乞白赖地向他让烟,他怎么推也推不出去。为什么把烟和酒的作用看得那样阴暗呢?这位同志的让烟就丝毫不意味着托他办事之类。还有带孩子的母亲和在车厢里跑来跑去,给陌生的“叔叔”表演节目的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变得好过多了。冬冬爱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但是人也是人可以相亲相爱的呀。

是的,从一九七五年恢复工作到现在又是四年多了。艰难的,令人惶惑失望,摇摇欲坠的头一年;绝处逢生的,狂喜又狂哭的第二年;麻烦的,纠缠不休的,明明又是扎扎实实地迈步前进的这两年。回顾昨日,他不能不为已经发生的变化巨大和迅速而惊叹。面对百废待举的现实,他又为某些人的因循麻木而心急火燎。他很忙。他很少有机会与这些坐硬卧车厢的普通人坐在一起。即使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他的位置也与别人不同。但是他不能那样重访山村,他不能前呼后拥,气宇轩昂地以高干的姿态出现在冬冬和秋文的面前。如果他那样做,他就是欺负人,他就是自己把自己从冬冬和秋文身边拉开。虽然他知道,坐小汽车绝不是他的或任何人的过错,住“部长楼”,进软席车厢也绝不是应该责备的事情。平均主义从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他不能,他不愿,他不敢,他也不应该以高于普通劳动者的任何方式重返山村。

细想起来,就连硬席卧铺也不能使平均主义者安宁。更多的人坐着硬座。从

起点站到终点站要运行七十几个小时,有不少的人就这样坐七十几个小时。中国人的耐性、韧性、吃苦耐劳真是举世无双。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连硬卧都坐不起呢?三十年了,你不觉得脸发烧吗?你能不加倍努力工作吗?看看每个车站上,挑着箩筐,背着大包袱,扶老携幼,上车下车的百姓们!

那就是老张头,老李头,老王头和老刘头们。他又有两个星期可以做老张头了。恢复工作以后,他常常回忆在山村的老张头的的生活。他有时候自问,可能不可能有另一个张思远,另一个自身,即那个被唤作老张头的我仍然生活在那个遥远的、美丽的、多雨又多雪、多树又多草、多鸟又多蜂蝶的山村呢?当他低头踏进吉姆车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鸟鸣中上山拾柴吗?当他在会议上发言,拉长了“啊——啊——啊——”的声音的时候,那个老张头不正在地头和歇憩的农民、农妇们说笑话吗?他完全不是装腔拿调地拉长了“啊”的声音,他在对非常复杂的工作、思想、认识问题发表意见,他的话语应该清晰、准确,他必须对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和每一个标点符号负责,他要一边用心思考一边说,他还要使听他的发言,他的讲话或者被称作张副部长的指示的人有领会、温习、思索、消化的时间,这一切都说明“啊”的拉长是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另一个张思远——老张头就从来不把“啊”拉长。说起话来又快又巧妙,那个老张头比张副部长要年轻一些,健壮一些。当张副部长出席一个招待外宾的宴会的时候,当他衣着整齐地,彬彬有礼地为外宾布菜的时候,当五星啤酒和北冰洋汽水,通化红葡萄和贵州茅台,崂山矿泉水和绍兴黄酒被任意选用,任意啜饮的时候,另一个“我”不正在烟气未尽的石板小屋里,在煤油灯的光焰照耀下,在热烘烘的锅灶旁边,在钉得一条腿有点歪斜的小板凳上,端着山区人民喜爱的粗瓷大海碗,就着老腌咸菜,大口大口地喝着暖人心脾的,掺杂着诱人的红小豆、白芸豆、绿豆和豇豆的浓浓的包谷糝子粥吗?老腌咸菜是以“老”而自豪的,拴福大哥说他的那一缸咸菜汤还是民国十八年的底子。从民国十八年腌了那一缸咸菜,每年夏天都要熬一次汤,每年秋天都要加菜,加盐,加水,一直到如今。当张副部长正在为处理一个人事问题(如今人事问题占用了他那么多精力,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在斟酌词句,而在搜索枯肠寻找一个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照顾关系,既要有利工作又要挡住从某个方向攻来的明枪暗箭的方案的时候,那个老张头是不是正在饶有兴趣地倾听拴福大哥叙讲自己的腌菜汤的悠久历史呢?

现在呢,他又把张副部长留在北京了。让张副部长去开那些开不完的会,看那些看不完的文件去吧。经过十年的动乱,张副部长正在按照党心民心进行紧张的工作,他并没有忘记使自己的工作对人民、对山村、对老张头和拴福大哥更为有利。不管有多少缺陷,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政策更好的政策,他想不出有比现在的做法更对人民有利的做法,如果张副部长要和老张头谈谈,他并不感到

不安。

他接受了对面的同志让给他的有点儿呛人的纸烟。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掏出了自己的带过滤嘴的“中华”。这并没有引起惊奇,因为现在即使是学徒工出门在外也要带两包好烟,这叫做践牌子。硬卧下铺的空间位置已经决定了他在社会上的位置,不会有人怀疑。他接受了口里发出葱味的胖子的玩扑克的邀请。对家、横甩、抠底、满分升级。只是在戴上了叛徒、三反分子的帽子以后他才学会了打百分,下象棋。他也像每个无事可做的旅客一样,努力领会和钻研列车运行时刻表,好像这一次旅行以后他就要调到铁路运输部门担任调度员似的。他拦住跑来跑去的小孩子,给他们吃糖,和他们逗着玩。他本来计划在火车上读点儿书,但拿起书来常常被打搅。也好。老张头与众人平等,与众人一样并无更多的责任因而也并无急迫感。拴福大哥讲过一个理论:人总是要死的,急急忙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急急忙忙地去死,不慌不忙地做事情,也就等于慢慢腾腾地去死。真是高论。老张头虽然轻松而又自由,率直而又天真,然而却又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随波逐流,无所事事。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失去的代价未免太大。

还有许多细小的,无足挂齿却又相当讨厌的付出代价。老张头必须事事排队:进站,上车要排队;去餐车吃饭要排队;上厕所和去洗脸池洗脸刷牙都要排队。作为老张头应该完全适应和完全习惯的排队,却引起了张副部长的抗议。他还必须忍受不礼貌的对待和恶劣的条件。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孩子,看样子不过五六岁,常常横冲直撞地在车厢里穿过来走过去。老张头拦住了他,给他一块糖,无非是想逗他玩一玩,男孩子却小霸王一样地打掉他的糖,而且出口不逊,“×你妈!”这一句粗话引得所有听到的旅客哈哈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赞赏,好像是听到了侯宝林在相声中甩出来的一个“包袱”。张思远,多半也是张副部长霎时间血往上冲,脸大概都红了,黑帮听到骂骂只能低头认罪,但是副部长却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你怎么骂人?”他责问了一句,稍微有点严肃。五六岁的小胖子威风地扬起了头:“就骂!就骂!待会儿告诉我爸爸,不给你开饭……”原来,小胖子的爸爸是餐车上的炊事员。旅客们又哄然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分析:“好小子,这么点几个就懂得了‘权’的厉害!”

还有比这更难堪的。下了火车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汽车司机对待旅客就像对待一群猪猡。中途停车时他看也不看大家,蛮横而又含混地发一个令:尿尿!吃饭!休息!下车!快上!那种腔调简直令人发指。这且罢了。第一天停车休息,他住进的是一间四十二个人同住的大房间,烟气汗气臭气熏天。六盏四十瓦功率的荧光灯管,终夜不关。半夜里旅店工作人员前来查铺,看有没有没开票就住下了,又查了个鸡飞狗跳。他一夜根本没有合眼。他简直后悔这次出行,后悔

自己太不现实,本应该听秘书的话。如果当地省委派小车来接,这两天的路程只要多半天就够了。他毕竟已经老了,已经不是那两年的老张头……

但是第二天他精神还好。上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打了一个胜仗。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没有失去普通劳动者的本色的人。但是他隐隐地觉得自己的微笑后面仍然有一种无法排除的优越感,他隐隐地预先听到了一个声音:这几天的生活,对于张副部长来说,不过是客串罢了……他皱起了眉。

但是有一件事他实在忍不住了。当第二天中午他排着长队等候买票在交通食堂就餐的时候,有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登山服,大约有一米九高的大个子,偏偏在他快要排到窗口的时候横着走了过来,用胳膊肘把他往后一搗,插到了他的前面。问题不在于不排队,加塞儿,问题在于这个大个子在食堂卖票的窗口站了一会儿,偏偏等到张思远过来时夹了进来,这明明是看到张思远老弱可欺,这是专门针对张思远的欺负、侮辱。“同志,你为什么不排队?”张思远的声音颤抖了。根本不予理睬。“后面排队去!”张思远大喝一声,而且动手去拉那个大汉。大汉纹丝不动,回过头来,轻蔑地看了张思远一眼,“少他娘的废话!”他威胁地举起了拳头,“谁说我没排队?我就是排在你前头的!”“大家说,他排队了没有?”张思远问,并无畏惧,他相信蛮不讲理的无赖定会受到公众的舆论制裁。然而,多么惊人,多么气人,多么恼人啊!没有一个人言声,有的人还故意掉转了头。“我看,是你没有排队!”大汉一拨拉,差点儿没把张思远推倒在地,他把张思远推出队外,而且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势。你难道能和这样的人动手打架吗?张思远在这个时候多么希望自己的秘书、警卫员、司机在身旁啊!他想象着当自己的身份公布出来,当警卫员掏出手枪,当秘书打电话叫来了公安人员之后这个无赖将怎样地恐惧、面如土色、赔罪求饶,说不定会跪到地上。而周围的群众又怎样地拍手称快……现在,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动手,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在“黑帮”时期我碰到这样的事,我会这样生气吗?张思远问自己,这个自问像一阵清凉的风,吹过了他的身体。

行路难。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当老百姓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正像当“高干”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个故事不应该是庄生梦见自己成了蝴蝶或者蝴蝶梦见自己成了庄生,它应该是一条耕牛梦见自己成了拖拉机或者一台拖拉机梦见自己成了耕牛。在生活里飘飘然和翩翩然的飞翔实在少见。六岁多为了躲土匪,爸爸曾经带着他奔逃,晚间睡在大车店的牲口棚里。他到六十岁也还记得那静夜里马吃夜草的沙沙声,静夜的寒气袭人。这是童年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抗日战争时期呢,他们常常睡在青纱帐里,夏夜可以听到玉米地里叭、叭的声音,乡亲说,那是玉米在拔节,那是一种不可压制的生命的力量,生长的力量,来自泥土、雨水和天空的力量。甚至在长途行军中他走着路也能打盹,

前面喊了立正,后面的人把头撞在前面的人的背上。

发牢骚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发牢骚不需要培训,而且时髦。七十年代末期的某些中国人,似乎觉得不发牢骚就不得天黑。他这一路就有许多牢骚俯拾即是。可惜他不是作家,否则光是交通食堂和交通旅馆的肮脏就够他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文章,再加上两个人物一点儿情节,一点儿感叹和两句尖锐刺激的话,就能做成一篇勇敢地揭露阴暗面的小说。说不定他还能“红”起来,能够参加作家协会,成为一个指手画脚,骂骂咧咧,高人一等,比谁都正确的英雄。写文章咒骂一个交通食堂总比办好一个交通食堂容易得多也痛快得多。然而这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难道把我们的岁月,我们的生命湮没在牢骚和怨言里么?一个没有恪尽己责的人,一个丧失了公民的责任感的人的牢骚,究竟值几分钱呢?他在部里给干部讲话的时候曾经提过这么一个建议:我建议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四小时发牢骚四小时工作,前四个小时大家一起发牢骚,跺着脚骂娘也可以,发完牢骚以后一句牢骚话也不许说,都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四小时工作制也许对于某些涣散的单位比八小时工作制效率还高。当然,这是激愤之语。

所以,他渐渐地不再有牢骚。他想的是自己的责任,每一个人的责任。不管有多少粗野和贫穷,火车在前进,汽车在前进,车轮的旋转使他和别的乘客们时时到达新的地点,车轮的旋转是通向他们的目的地的。正是在旅途中,时间的推移意味着空间的推移,时间的行进成为有形的,成为催赶人的一股可以触摸的力量。

枣 雨

到了,到了,真的到了!到达目的地的快乐便是对于旅途的艰辛的最好的报偿。正像成功便是对于一切艰苦奋斗的报偿。再转过一个山头,再绕过两块圆圆的,两块非人间所能有的巨大的磨盘似的石头,就是山村的汽车站。老乡们说,这两块石头是当年二郎神担着它追赶太阳的时候,中途撂到这里的。谁也不知道这两块石头已经在这里存留了多少年和将要继续存留多少年。反正张思远离去的这四年多石头并没有丝毫变化,它仍然那样沉着、持重而又永远不老地迎接着远道而来的张思远,它的欢迎的姿势与那几年张思远去邻村办事、买东西或者看病归来的时候毫无二致,就像张思远压根儿没有离开过,没有当上什么书记或者副部长一样。停车的时候冬冬和冬冬头上的高压线他是同时看到的。冬冬好像又高了,肩膀也宽了,他早已经调到县里担任小学教员。他们在信上说好了,冬冬来这里迎接父亲。“有电了么?”张思远问,这是他下车后问的第一句话,有电了,并且正在用电灯代替煤油灯,用电磨代替石碾子,用电动弹花机、脱

粒机、榨油机、舂米机和粉碎机武装粮棉加工……这是冬冬的回答。父子两人向前走了几步就来到了老杏树下,老杏树依然是流出了那么多树胶,像是多感的老年人的泪水,叫人心疼。树胶的颜色、多少、部位和形状完全和四年前一样,昨天老张头还在这棵杏树底下抽旱烟。父亲递给儿子一根过滤嘴中华。儿子接过去的时候嘴角微微地一撇。杏树旁边是一个泉眼,为了保持清洁,泉的源头盖着两块青石板。弄脏了清水泉就不是好姑娘,这是波兰玛佐夫舍民间歌舞团演唱的一首歌里的歌词。海云最爱唱这首歌的。初冬的太阳照得他们暖烘烘的,这是一个避风的地方。看,泉眼边的杂草,黄叶中竟又长出了新绿的芽儿,初冬的太阳,没有风,不也和初春的太阳相似吗?那新萌发的小小的草芽儿,可知道它的面前并不是明媚的春天吗?他推开石板掬起清泉喝了两口。还是一样地清冽甘甜。抬起头,他看到了这次重访第一个遇到的山里人。是一个裁缝,一个他在山村期间最少打交道的人。圆圆的老式的花镜,好像与两块巨石一样历史悠久。然而裁缝一眼认出了他,他也一眼认出了裁缝。这不是张书记吗?您怎么又来到了这个小山沟?来来来我给您提着包。好好好我们大家都好,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您这回来是视察还是蹲点?这可是对我们山区人民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官腔官调,应付长官,多么令人悲哀!

幸好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的山里人。拴福大哥就不是这样,“张!”老远就大喊了一声,他的习惯是只称呼姓,这个习惯倒有点像外国人。大嫂见了他竟咧起嘴哭了。真想不到你还能到这里来!真想不到大嫂活着还能再一次见到你!真想不到这两年日子一下好了许多!我们养了三头猪和五头羊,还有十五只鸡。本来是二十五只,本来有两只公鸡,天天你啄我我啄你,啄得冠子上全是血,只好把战败的那个宰掉了,谁让你没本事?又有九只母鸡串了瘟。这九只是后买的。那十四只是先买的,秋文医生给那十四只扎过针。用蘸水钢笔把鸡瘟疫苗注射到鸡翅膀上。秋文医生连鸡病、猪病也治,其实公社有兽医站。粮价也提了。核桃、杏仁、枣和蜂蜜的收购价都提了不少。电灯也亮了,广播喇叭也响了。只是粮站工作人员老是压低粮食的等级,农民钱拿多了就好像他们的屁股里被塞进了草。有电但常停电,煤油灯还不能丢,却又减少了煤油的供应。我们年终分了四百多块钱。买了一套二十四个花瓷碗。你现在高升?平安?到了北京?见过中央的那些领导人吧?可干部怎么不下来了呢?过去每年冬天都要来的,虽说有几次也乱整一气,但是我们还是想这些干部们,让他们来嘛,给山里人说说,世界上又出了什么能人,出了什么新鲜事?

十五只鸡马上变成了十三只。年近七十的瘦小的老太婆抓鸡的时候其灵活程度不下于一个排球运动员。她跳起来把已经起飞的鸡抓到屋里。于是鸡毛上天而鸡肉上了案板。过油的时候鸡丁哧啦啦地响。于是白面馍馍入笼和出笼。

于是夏秋晾下的干蒜苗、干豇豆、干茄子和腌猪肉也出场。没等到饭熟,乡亲已经来了许多。当场有五家对张思远提出了在这同一天举行洗尘饮宴的邀请,而且不容许不答应。张思远一一点头,不过前后错开,安排了一下时间。张思远再一次后悔没有随身带上秘书和工作台历。这项安排日程的繁重工作只好临时分配给了冬冬。

多么好啊多么好!就像他从来没离开过山村。一样的乡音,一样的乡情,一样的人心!一样的推推哪家的门都可以进,拿起哪家的筷子都可以吃,倒在哪一家的炕头都可以睡!甚至连那几条老狗也没有忘记他,摇着尾巴向他跑来,伸起前爪扑他的腿,从湿湿的狗鼻子里发出撒娇的声音。他实在抱歉,倒是想到了给乡亲们带来一点糖果、圆珠笔、画片,却忘了给这些友好的狗带几块骨头。于是他只好抛起了酸梅糖,用这种东西来款待它们可实在不够意思。有一只黄狗不认识他,凶恶地吠叫,它大概是在他离去这段时间出生和成长起来的。狗的主人把黄狗狠狠批评了一顿,“你是怎么回事?怎么连自己人,连咱们的老张头也咬?你想找死?”骂得黄狗垂头丧气,诚惶诚恐,灰溜溜地退到一旁,深刻反省自己为什么犯了这么大的过失,其实它的出发点却是忠于职守和立功受奖。

虽然也有不少的乡亲问起他的官职,并咋舌惊叹,还一致认为他的升官是一件好事,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但谁也没有把他当作“上级”看待。他说话既不拉长声,也没有那么多词儿,既不摇头摆尾,也不倒背上手踱来踱去,既不用事前斟酌词句,也不用事后为哪句话不当而追悔。无官一身轻!无官暖人心啊!没有平等,就没有友谊,正像没有土地就没有庄稼,没有核桃树就没有核桃果。还有山里的红枣呢,每一颗枣都像张思远的童年一样久远,占老,鲜甜。张思远小的时候,在他还不是张思远,当然更不会是张教员、张指导员或是张书记,在他只是石头,或者——像母亲称呼的那样——小石头的时候,他们家也有一株枣树。打枣,这就是童年的节日,童年的欢乐的不可逾越的高峰!“噼里啪啦”,竹竿在上面打;“稀里哗啦”,枣子往地上掉。许多相好的和不那么相好的小朋友都来了,一边吃,一边捡,一边装,一边找,一边喊。有的枣滚到了渠沟里,草丛里,瓦片底下,凡是企图隐藏自己的枣子也正是最甜、最饱满,又绝对没有虫子的枣儿。这样狡猾的枣子的每一颗的发现都会引起自己和同伴的欢呼。连土都是甜的,连风都是香的,这童年的喧闹和喧闹的童年!这满脸是土,满脸是汗,满脸是鼻涕和眼泪,满脸是带口水的枣皮和欢笑的童年!也许,对于平等、质朴、友情以及像枣雨一样地洒落地上的社会财富的向往,对于共同的公正而富足的生活的向往,就埋藏在这些喧闹的小小拾枣者的心里?也许,马克思、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事业和学说的力量正来自这些喧闹的小小的拾枣者的心底?

现在,须发花白的张思远,身居高位的张副部长,又回到这童年般的喧闹中来了。重新造访的第一天,走到哪里都被山村的男女老幼所包围,被七嘴八舌的问候、说笑、祝福和诉说所包围。我们企盼过的,我们应允过的,我们拖欠过的,我们损害过的,终于我们要渐渐地兑现了。我们总算学会了一点儿东西。乡亲们,鲜红的甜枣,普落如雨!

第一天他来不及和冬冬以及和秋文谈什么。秋文也把自己的音波汇入到欢呼枣儿洒地的儿童式的喧嚣之中。当他的目光与在人群中的秋文的目光相遇的时候,他像孩子一样地兴奋、期待、欢喜。对看着他的是这一生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种看透了一切悲哀的明朗,是那种负责打枣的大孩子看到闹闹嚷嚷的小孩子时候的满意,是照耀着落光了树叶的枣树的月光的沉寂,他微微战栗。

晚上他和儿子,和老农睡在一起。肉、酒、喧闹、温情充塞着他的一夜。于是这一夜的梦概括了他的一生:来自他五十九年的生活经历的压缩复制。放羊娃和地主崽子的打架。穿棉袍的乡村教师的垂青。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队伍的到来。枪林弹雨,第一枚手榴弹没有拉弦就扔了出去。红旗下举手宣誓。他不怕牺牲,他渴望献身,他深信迈过这一步便是幸福的红枣降落到每一个家庭的餐盘里。

夏天。洁白的短袖衬衫。两根宽带联结着蓝色的裙子。四五八三,她们学校的电话。拨动字盘,然后电话机里传来怯生生的声音。接电话的人不问也知道是谁打的。洁白的身影在眼前一闪。什么,她也到了山里?在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村子?原来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原来你还在,你不要走,不要死,让我们再谈两句。平反昭雪的通知你怎么没有拿到手?四五八三,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咣咣,把电话机砸坏了。哭声,是我在哭么?囚徒,自由,吉姆车在王府井大街奔驰。软席卧铺车厢在京汉线上行驶。波音飞机在蓝天与白云之间飞行。上面的天比宝石还蓝。下面的云比雪团还白。又关闭了一个发动机。枣落如雨。弹飞如雨。传单如雨。众拳如雨。请听一听我的心脏。请给我一瓶白药片。请给我打一针。是的,报告已经草拟,明天发下去征求意见。

这能行吗?这不可能吗?他一再警告自己早已不是热情和想象的年纪。然而,与生命俱来的想象和热情,不是只能与生命俱去么?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真的……不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假设是指引他行路向前的火炬么?来以前还有点儿犹豫,有点儿打鼓,有点儿担心呢。还有点儿舍不得部长楼的那四间高分子贴面的住宅呢。真不好意思。张思远就在这里呢!张思远没有变。张思远是山里人,张思远就是自己。什么?到时间了?我马上就去。开不完的会,在睡梦里也还要开会。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好。我们要安定团结,要进行改革,要精兵简政,官比兵多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距 离

天气也欢迎张思远的重新造访。一连许多天都分外晴好。人,山,树和空气,都从容安详。冬冬陪着父亲转遍了每一块梯田,山坡,果园,菜地。高大的柿子,丰满的核桃,古怪的花椒,俏皮的山楂,风流的桃李,朴实的苹果……别来无恙。趟过一段酸枣刺,躲避着猎獾人下的夹,他们来到育林区。五年前他们冒雨栽下的油松、马尾松和落叶松苗,已经长得超过了膝盖。自己亲手栽下的(那天手上,脸上和衣服上全是泥)松树将要久远地在这里成长壮大,将要在这一代人,这两代人,这几代人身后继续葱郁葳蕤地庇荫这块山坡。这真让人欣慰。

但是他和冬冬却谈不拢。这次来冬冬对他特别体谅和关心。您要锻炼身体。该休息也得休息。最好每年夏天都到海滨去一次。冬冬真是大了,懂得疼人啦。回北京吧,你完全有理由……让我们在一起,我一天天地老了。冬冬的回答是意想不到的坚决:不。为什么?不为什么,我不愿意当高干子弟。这是什么意思?“高干”就不能有自己的孩子?我们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没有吝惜过生命和鲜血。张思远有点儿激动,冬冬却很平静。您们可能是崇高的和伟大的一代人,但您总该正视现实。群众舆论对高干子弟那么不利。您别忙。我们也愿意做崇高伟大的一代人,像您们一样,作披荆斩棘的探求者,开路者,创业者。但是您们只要求我们、只允许我们做守业者,做接班人,只允许我们顶替你们的位置,要求我们走在您们的脚印上。不,那是办不到的。我已经二十七岁了,从生下来我们就受教育,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听团小组长的话,听贫下中农的话,听屁大的一个什么官儿的话。现在,我们该自己教育教育自己了,该自己去选择自己要说的话。

你这样说既片面又空洞。何必故作惊人之语呢?中国吃各种惊人之语的亏还不够吗?是党的政策而不是你们的惊人之语——另一种类型的假、大、空话——给农民带来好处。你不是真空,中国不是真空,历史不是真空。你们不能从钻木取火开始。你们既不了解国情又不了解历史。靠你们的那些皮皮毛毛的见解只能误国误己,头破血流。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革命是几代人的事业。接班丝毫不意味着墨守成规,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为发展、创造、突破扫清了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工作而不是狂徒的自我膨胀。活到老学到老,连我也时时觉得自己需要受教育……

冬冬发现有一株山楂树上竟有五颗鲜红的果实没有被采摘走,他捡起几块石头去击落那幸存的红果。他对与父亲辩论并没有什么兴趣。最后他说:

“明天我就回县城了,我们还可以在县城谈谈,请您不要生气,我现在不那

么愿意和您在一起,一个原因就是您太爱对我进行教育。妈妈在世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她用十分之九的力量照顾我,只用十分之一的力量指点我。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她是一个弱者,而您是一个强者。我宁愿碰得头破血流也不愿依附于您。我会去看您的。今年暑假我可能就去……还不行吗?”

张思远沉默了,他转过身,凝视着对面山坡上的小松树,默默地把儿子分给他的两颗酸果放到嘴里。夕阳照耀着小松树,小松树拖下了比自身长得多的影子。

告 别

早在一九七七年,张思远便得知了秋文原来的丈夫已经死于劳改队的消息。他给秋文写去了慰问的信,由于那特殊的难知其详的“离婚”,他无法直言哀悼,只是关切地问候起居,也讲述了自己工作上、生活上、身体健康上的一些苦恼,并且表述了不被这些苦恼所压倒,而要压倒这些苦恼,一往直前,鞠躬尽瘁的心思。

他没有收到回信。这是他给秋文写的第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他刚刚回到市委以后,夹在给冬冬的信里,寥寥数语:“我常常想起在山村的难忘的日子。我非常感谢您在医疗和其他方面对我的帮助。我更感谢您对冬冬的关心。祝您和您的女儿安好。”这封信也没有得到回信,只是冬冬来信时提到:“秋文阿姨叫代问您好。”

第二封信是一九七六年春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悲剧和闹剧里又要强迫张思远扮演一个罪人的角色。空气肃杀,写信也是战战兢兢的。回信上来了,用的全是社论里可以找到出处的词语。“让我们坚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这里的贫下中农随时准备接待您重新来进行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张思远完全懂得这些话的意思,一想起秋文,冬冬和山村,他的心就落到了实处。

从一九七七年他就想再去看望一次秋文,他想去探求一下改变他们俩的生活,使他们俩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秋文是他遇到过的一个有点儿怪的人,一个既有松树的坚定又有柳树的灵活的人,在山村的五年,秋文要比他更强,更有力量。另外,自从他明确地坚决地表示不愿再与美兰恢复关系以后,关心他的“生活问题”、“个人问题”的人实在太多,有许多老战友特别是老战友的夫人硬把照片塞到他的手里,他不胜其烦。有一次他干脆宣布,他已经自己找好了,就在他曾经劳动过的山村,他将亲自把她带来,无劳众位费心。塞到手里的照片没有了。半信半疑的好人们一见到他就要问:“什么时候?”好像在提醒他和催促他快

快偿还积年老债。

“也许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早就不应该说这些了。也许,我的话会使你不高兴。但是,这话在我的心里已经好多年了。最初,我得肺炎的时候,还没有这么老,是你给了我力量,镇静和勇气。只是因为……我才把这种感情压在心底。”

“谢谢您了。”秋文这样说。真诚,又有点嘲笑。

“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同志。你既清高,又随和,既泼辣,又温良,既……”

“这么说我也是高大完美,几百年出一个了?”

“请别开玩笑,”张思远的声音有点忧郁了,“而且,我觉得你了解我,也许你还喜欢我。”

秋文动了一下,躲避开张思远的目光。

“我碰到许多困难。我的脖子上套着捆脖,我还得拉套,有时候还要驾辕。遇到难题,我常想,假如你在我的身边,假如你能给我当参谋,当后台,当……不论什么,工作和生活就会容易得多了。”

“……”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你不会猜不到的,跟我走吧。你去了以后,工作由你自己挑选。还有女儿,她当然跟着我们……”

“什么我们?”秋文的声调是严厉的。“为什么我要去做你的参谋、顾问呢?为什么我要放弃我的工作,我的岗位,我的生活,我的邻居和乡亲,去跟着您做部长夫人呢?”

“……”

“瞧,您想的只有自己!官儿大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是不是?您连一秒钟也没有想到,您可以离开北京,离开您的官职,到我身边来,做我的参谋,我的后台,我的友人。是这样吗?”

“这个方案也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官腔!对不起。单冲我刚才的表现,也证明我并不像您想的那么好。您的工作本来就比我的重要一百倍,一千倍。不服是不行的。我拥护您和您的同僚们。您们是国家的精华和希望。您们失去了太多的时间,我相信您们会夺回来。我祝您们成功。我愿意和您们拉起手来。但是我不能去。我已经野惯了。部长夫人的生活会使我窒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呢?你准备在这里终此一生吗?你难道和这里的环境没有距离吗?”

“更多的是融洽。所以我佩服您。您既能当副部长,又能来到山村和我们在

一起。还异想天开地想把我也拉了去。而我的适应幅度可没有这么大,我就做个乡村医生吧,给山里人解除一点痛苦。别忘记我们!心上要有我们,这就什么都有了。谢谢您……”秋文的声音有点呜咽了,“我只希望您多为人民做好事,不做坏事……您们做了好事,老百姓是不会不记下的。”

张思远的喉头也郁结了。他缓缓地离去了。秋文没有送他。他长久地后悔,为什么不多看上两眼,秋文坐的结实沉重的椅子,秋文的没有上过油漆的白木桌子。她的灯,她的书,她的脸盆架,她的草帽和听诊器。这一切物品都比他幸福,这一切物品都昼夜陪伴着秋文,都和秋文在一起。

乡亲们继续招待,胃和头脑一起进行社会调查。豆腐和粉丝,果酒和老醋,全部是自己的副业。鲜鸡蛋,咸鸡蛋,松花蛋和臭鸡蛋,动物蛋白和零花钱都在增长。黍面油炸糕蘸蜂蜜,这是山里人最好的甜食……还有什么困难么?还有什么意见么?就是怕变。只要政策不变,只要这样搞下去,只要再不自己折腾自己,日子就步步登高。乡下的情况比原来设想的还要好些。你们快点富起来吧,我们的国家指望着你们呢!记住以往的经验教训,稳稳当当地带着我们前进吧,我们农民指望着你们呢!酒足饭饱,他们互相鼓励着。

底下便是告别了。张副部长的秘书很会办事情,在张思远悄悄地回到山村,在他重温了和饱尝了普通老百姓的好处与难处之后一周,当地领导接到了他的秘书的电话。立刻,领导人、接待人员、小汽车都来到了山村。张思远注意地环顾四周,最后他确信乡亲们对他比儿子对他更要理解,他悟到乡亲们那样亲热并不是因为不知道他官复原职而且有升迁,不是不知道他完全有可能坐上小车,带上随行人员前来,而是知道了这一切但更知道他的为人,他的本色。乡亲们对待他没有变,是因为相信他没有变。这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使一周来的经历更具有动人的美好色彩。于是人们簇拥在一对巨石旁欢送他。别忘了我们!人们希望的不过如此。难道能够忘怀和违背这样的愿望吗?他含着泪坐到了司机旁的当地认为最尊贵的座位上。他的心留在了山村。他也把山村装到自己的心里,装到汽车上带走了。他一无所得?他满载而归。他丢了魂?他找到了魂。在县里与冬冬话别以后向省城驶去。当然,再没有排队,没有野蛮霸道的小孩子和大流氓,没有生葱味,没有令人无法安眠的大房间。我敢忘记我受到了多少照顾吗?我没有责任、没有义务让大家都过上文明和富裕的生活吗?在省城的高级宾馆住过一夜以后他上了飞机。是四个人一排的头等舱。“禁止吸烟”和“系好安全带”的字灯亮了,发动机像发了疯一样地怒吼。飞机抬头了,他们腾空而起。山村被远远地撂在后面,繁重的工作堆在前面。回去以后他面临的任务棘手而又大有可为,他什么都不怕了。穿着清洁的蓝制服,头上戴着缀有中国民航的银色鹰徽的硬壳帽子的小小的女服务员端来了香茶、夹心巧克力、胶姆糖、纪念画片和

一家外商承印的附有广告的飞行时刻表。一只翅膀略略抬高,他们在转弯,达到了预定的高度。比任何一只蝴蝶都飞得高得多。发动机的声音平稳,庄重,叫人放心。机舱愈来愈热了,他旋松头顶的黑色塑料“龙头”,冷空气吹到他的脸上。他隔着圆圆的舷窗长久地注视着祖国大地。他爱这阳光和阴影,轮廓和色彩十分分明的一个又一个的山岭,像是一排排裸露的核桃仁。他爱这线条齐整如棋盘格子的田园。他爱这纵横交错如蛛网的大大小小的道路。什么时候,能把我们的祖国,包括我们的山村,都放到喷气式飞机上,赋予她们以应有的前进的高速呢?难道民国十八年开始用的菜汤,还要继续腌下去吗?下面是云层了,白茫茫,灰蒙蒙。不管飞得多么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他拧紧调节空气的旋钮,放低了椅背,他安安静静地睡着了。

桥 梁

他吃了一碗鸡丝汤面,一个花卷,几片火腿和几片榨菜。他伸了一个懒腰,点起一支烟,吸了几口就掐灭了。他不是诗人,他再没有时间抒情、缅怀和遐想。他必须像牛一样地、像拖拉机一样地工作。工作做好了就有了一切。他换上睡衣和拖鞋,拿起剃须刀架,打开洗澡间的顶灯和整容镜上的罩灯,他放了热水,把胡须剃了个干干净净。所有的愁雾都吞咽到肚子里而面孔在两盏灯的交映下容光焕发。他一贯如此。他往澡盆里放水,不断地用手试着水的温度。他试着哼了哼在旅途中听过的那首香港的什么“爱的寂寞”的歌曲,他哈哈大笑。他改唱起《兄妹开荒》来。他好好地洗了个澡。把一切不必要的,多余的负担都洗掉了,他坚信洗澡是快乐与健康之源。他坚信他会顽强地活下去,工作下去,直到至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洁白闪亮的澡盆。他用干毛巾揩净了身体上的水珠。顶灯与整容灯照红了他的皮肤。他还不老。他的血管里流着热和红的血液。他关掉这两个灯,来到客厅。他吸完刚才撂下的那半支烟。他打开落地式收音机,李谷一在演唱《洁白的羽毛寄深情》。他站起来,洗过澡以后人们轻盈得就像蝴蝶。他轻轻走过去打开阳台的钢门。清冷的夜气扑来,他以为是来自山谷的风。他披上大衣走了出去,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灯火联结在一起。他看着这些无言的、久远的星星。他发现这些谦逊而持重的,丝毫也不与盛气凌人的新贵——碘灯和钠灯——争辉的星星和山村的星星并没有两样。支持她们的是同一个天空,憧憬她们的是同一个地面。在昨天,今天和明天之间,在父与子与孙之间,在山村二郎神担过的巨石与十七层的部长楼之间,在海云的在天之灵与拴福大嫂新买的瓷碗之间,在李谷一的“洁白的羽毛”和民国十八年的咸菜汤之间,在肮脏、混乱而又辛苦经营的交通食堂和外商承印的飞行时刻表之间,在秋文的目光、冬冬

的执拗、一九四九年的腰鼓、一九七六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见证便是他的心,便是张思远自己。要使这桥坚固而又畅通无阻。他渴望着一次又一次地与海云,与秋文和冬冬,与拴福一家的相会。他期待明天,也眺望无穷。

他做了几个扩胸的动作,深深地吸了几口空气。似乎电话铃在响。他走进温暖明亮的室内,随手拉上了浅绿色的窗帘。他关掉客厅里的灯,走进装有电话的居室。他拿起电话,是部长,向他问候旅途辛苦和健康,问他“任务完成了没有?”“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他爽朗地回答,这个脱口而出的答话恰到好处。然后部长向他叙述了一些情况,通知他后天有一个事关重大的会议,要他准备好发言。

他谢了部长,放下电话,走向写字台。最急需看的文件、信件和资料秘书已经送到了这里。秘书开列了一个立刻要处理的事项的清单。他拿起粗大的铅笔。他开始翻阅这些材料,一下子就钻进去了。他觉得有那么多人正在注视他、支持他、期待他、鞭策他。

明天他更忙。

那 五

● 邓友梅

“房新画不占，必是内务府。”那五的祖父做过内务府堂官。所以到他爸爸福大爷卖府的时候，那房子卖的钱还足够折腾几年。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官五品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辛亥革命成全了他。没等他到挎刀的年纪，就把大清朝推翻了。

福大爷有产业时，门上不缺清客相公。所以他会玩鸽子，能走马。洋玩意能捅台球，还会糊风筝。最上心的是唱京戏，拍昆曲。给涛贝勒配过戏，跟溥侗合作过《珠帘寨》。有名的琴师胡大头是他家常客。他不光给福大爷说戏、吊嗓，还有义务给他喊好。因为吊嗓时座上无人，不喊好透着冷清。常常是大头拉个过门，福大爷刚唱一句：“太保儿推杯换大斗”，他就赶紧放下弓子，拍一下巴掌喊：“好！”喊完赶紧再拾起弓子往下拉。碰巧福大爷头一天睡得不够，嗓子发干，听他喊完好也有起疑的时候：

“我怎么觉着这一句不怎么样哪？”

“嗯，味儿是差点，您先饮饮场！”大头继续往下拉，毫不气馁。

福大奶奶去世早，福大爷声明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不再续弦。弦是没续，但今天给京剧坤伶买行头，明天为唱大鼓的姑娘赎身。他那后花园子的五间暖阁从没断过堂客。大爷事情这么忙，自然顾不上照顾孩子。

那五也用不着当老子的照顾。他有一群伙伴。三贝子、二额驸、索中堂的少爷、袁宫保的嫡孙。年纪相仿，门第相当。你夸我家的厨子好，我称你府上的裁缝强。斗鸡走狗，听戏看花。还有比他们老子胜一筹的，是学会些摩登派的新奇玩意儿。溜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上“来今雨轩”饮茶泡招待。他们从来不知道钱有什么可珍贵的；手紧了管他铜的瓷的、是书是画，从后楼上

拿两锦匣悄悄交给清客相公,就又支应个十天半月,直到福大爷把房产像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五少爷把古董像猫儿叼食似的叼净。债主请京师地方法院把他从剩下的号房里轰出来,这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连换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

福大爷一口气上不来,西方接引了,留下那五成了舍哥儿。

二

那五的爷爷晚年收房一个丫头,名唤紫云。比福大爷还小个八九岁。老太爷临去世,叮嘱福大爷关照她些。福大爷并不小气。把原来马号一个小院分给紫云,叫她另立门户,声明从此断绝来往。

紫云是庄子上佃户出身,勤俭惯了的,把这房守住了,招了一户房客。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敢找没根底的户搭邻居。宁可少收房钱,租与一家老中医。这中医姓过,只有老两口,没有儿女。老太太是个痼病底儿,树叶一落就马趴在床上下不了地,紫云看着大夫又要看病,又要伺候老伴,盆朝天碗朝地,家也不像个家。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为病人煎汤熬药,洗干涮净的细活全揽了过来。过老太太开头只是说些感激话,心想等自己能下地时再慢慢补付。哪知这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老太太有天就拉着紫云的手说:“您寡妇失业的也不容易,天天伺候我我不落忍。咱们亲姐妹明算账。打下月起咱这房钱再涨几块钱吧!我不敢说是给您工钱。有钱买不来这份情意。”紫云一听眼圈红了。扶着老太太坐在床沿上说:“老嫂子,我一个人好混,不在乎几块钱上。那边老太爷从收了我,没几年就走了。除去他,我这辈子没叫人疼过。想疼疼别人,也没人叫我疼。说正格的,我给您端个汤倒个水,自己反觉着比光疼自己活得有精神。您叫我伺候着,就是疼了我了。这比给我钱强!”

又过了两年,老太太觉着自己灯碗要干。就把过大夫支出去,把紫云叫到床边,挣扎着倚在床上要给紫云磕头。紫云吓得忙扶住她说:“您这不是净意儿的折我的寿吗?”过老太太说:“我有话对你说,先行个大礼!”紫云说:“咱姐俩谁跟谁呢?”于是过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和过大夫总角夫妻,一辈子没红过脸。现在眼看自己不行了。一想起丢下老头一个人就揪心。这人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除去会看病,连钉个纽扣也钉不上。她看了多少年,没有紫云这么心慈面软的好人,要是能把老头交给她,她在九泉下也为紫云念佛。紫云回答说:“老姐姐,您不就是放心不下过大夫吗?您把话说到这儿就行了。以后有您在,没有您在,我都把过大夫这个差事当正事办。您要还不放心,咱挑个日子,摆上一桌酒,请来左邻右舍,再带上派出所警察,我当众给过家的祖先磕个头,认

过大夫当干哥哥！”

过老太太听了，对紫云又感激又有点遗憾。和过大夫一商量，过大夫却是对紫云钦敬不已。紫云借过端午的机会，挎了一篮粽子去看福大爷，委婉地说了一下认干亲的打算，探探福大爷的口气。福大爷说：“从老太爷去世，你跟那家没关系了。别说认干亲，你就嫁人我们也不过问。”紫云擦着泪说：“大爷虽然开通，我可不敢忘了太爷的恩典。”

六月初一摆酒认干亲，紫云不记得自己父母姓什么，多少年来在户口上只写“那氏”二字，席间她又塞给警察一个红包。请他在“那”字之下加个“过”字。正式写成过大夫的胞妹。

过老太太言而有信。这事办完不久就驾鹤西游了。紫云正式把家管了起来。人们为此对她另眼相看，称呼她云奶奶。

三

听说那五落魄，云奶奶跟哥哥商量，要把他接来同住。她说：“不看金面看佛面。不能让街坊邻居指咱脊梁骨，说咱不仗义。”过大夫对这老妹妹的主张，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就到处打听那五的行止，后来总算在打磨厂一家客店找到了他。穿的也还体面。过大夫说明来意。本以为那五会感激涕零的，谁知那五反把笑容收了，直嘬牙花子。

“到您那儿住倒是行，可怎么个称呼法儿呢？我们家不兴管姨太太称呼奶奶！”

过大夫气得脸色都变了，恨不能伸手抽他几个嘴巴。甩袖走了出来。回到家不好如实说，只讲那五现在混得还可以，不愿意来，不必勉强吧！

云奶奶不死心，再三追问，过大夫无法，就如实告诉了她那五的原话。云奶奶叹口气说：“他们金枝玉叶的，就是臭规矩！他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吧。咱们又不冲他，不是冲他的祖宗吗？他既混得还体面，不来就罢了。”

谁知过了几天，那五自己找上门来了。进门又是请安，又是问好，也随邻居称呼“云奶奶”，叫过大夫“老伯”。尽管辈分不对，云奶奶还是喜欢得坐不住站不住。云奶奶问他：“我怕你在外边没人照顾，叫你搬来你怎么不来？”那五说：“说出来臊死人，我跟人合伙做买卖，把衣裳全当了做本钱，本想货出了手，手下富裕点，买点什么拿着来看您，谁想这笔买卖赔了……”

云奶奶说：“自己一家人，讲这虚礼干什么？来了就好。外边不方便，你就搬来住吧。”

那五难道是个会做买卖的人吗？

买卖是做了一次,但没成交。天津有个德国人,在中国刮了点钱,临回国想买点瓷器带走。到北京几处古玩店看了看,没有中意的。那五到古玩店卖东西,碰上他在看货,就在门外等着。等外国人出来,就上去搭讪,说自己是内务大臣家的少爷,倒有几宗瓷器想出手,可以约个时间看看。外国人要到他府上拜访,他说这事要瞒着家里进行,只能在外边交易。约定三天后在西河沿一家客店见面。那五并没瓷器,但他知道索家老七从家中偷出一套“占月轩”来,藏在连升客栈。索七想卖,又怕家里知道不饶他。那五就找索七说,现在有个好买主,买完就运出中国。不会暴露,又能出大价。你出面怕引起府上注意,我担这个卖主名义好了。事情成了,我按成三破四取佣金,多一个大子儿不要。可你得先借我几十块赎赎当,替我在这客栈包一间房,要不够派头,外国人就不出价儿。索七少比那五还窝囊,完全依计照办。过大夫来找那五时,那五刚搬进客店,还在做发财梦。当然毫不热心。

索七嘴不严,这事叫廊房头条的博古堂古玩店知道了。博古堂掌柜马齐早知道索七偷出这套东西来,一直想弄到手,谈了几次都因为要价高没成交。可是东西看到过,真正的“占月轩”,跟他所收藏的几个小碗是一个窑。恰好德国人来他店中看货。他就悄悄吩咐大伙计,把几个“占月轩”的小碗摆到客厅茶几上。外国人看完货,他让到客厅去休息。假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提起茶壶就往那“占月轩”碗里倒茶,并捧给了德国人。德国人接过茶碗一看,连口称赞,奇怪地说:“你们柜上摆的瓷器都并不好,怎么平常用的茶具反倒十分精美?”

马齐一听,哈哈大笑,说:“你要喜欢,卖给你,比你认为不好的任何一种都便宜,连那一半钱也不值!”

德国人说:“你开玩笑?”

马齐说:“完全实话。”

德国人问:“为什么?”

马齐说:“这是假的。你看不中意的那些是古瓷,这是当今仿制品!买瓷器不能光看外表!要听声,摸底儿,看胎!”他说着从前柜拿来一件瓷器,一边比较一边讲,把个外国人说得迷迷糊糊。最后他把没倒茶的两个碗叫学徒用棉纸包了,放到德国人跟前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一对不值钱的假货送你作纪念!”

那德国人把这碗拿回去,反复地看。没两天就把“假瓷”的特征全记在心里了。等他去客栈拜访那五时,那五一打开箱盖他就笑了起来。这不和博古堂送他的假货一模一样吗?但他却出于礼貌并不说破。问了一下价钱,贵得出奇。再看那五住的这么寒酸,也不像个贵胄子弟,连说:“No, no”,起身走了。他很感激博古堂的掌柜教给他知识。到那儿把柜台上摆的假瓷器当真货扫数买走,高高兴兴回德国了。

买卖不成,索七怪那五做派不像,逼着叫他还赎当的钱。也不肯付房间费。那五把赎出来的衣服又送回当铺,这才投奔云奶奶来。

过了不久,马齐终于由人说合,只花了卖假瓷器的一半钱,把索七的真货弄到了手。等索家发觉来追查时,他早以几倍的高价卖给天津出口商蔡家了。

四

云奶奶是自谦自卑惯了的,那五肯来同住,认为挺给自己争脸,就拿他当凤凰蛋捧着。那五虽说在外边已混得没了体面,在这姨奶奶面前可还放不下主子身份。嘴里虽称呼“云奶奶”,那口气态度可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尔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作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云奶奶用体己钱把衣裳给他赎出来之后,他又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换一回叫云奶奶洗一回,洗一回还要烫一回。稍有点不平整,就皱着眉说:“像牛嘴里嚼过似的,叫人怎么穿哪?”云奶奶请来这位祖宗,从早到晚手脚再没有得闲的时候了。

过大夫仍住在南屋。那五来后,他尽量少见他少理他。这他还是忍不住气。有天就借着说闲话儿的空儿对那五说:“少爷,我们是上埋半截的人了,怎么凑合都行,可您还年轻哪,总得想个谋生之路。铁杆庄稼那是倒定了,扶不起来了。总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别看医者小技,总还能换口棒子面吃。您要肯放下架子,就跟我学医吧。平常过日子,也就别那么讲究了。”那五说:“我一看《汤头歌》、《药性赋》脑壳仁就疼!有没有简便点儿的?比如偏方啊,念咒啊!要有这个我倒可以学学。”过先生说:“念咒我不会。偏方倒有一些,您想学治哪一类病的呢?”那五说:“我想学打胎!有的大宅门小姐,有了私情怕出丑,打一回胎就给个百儿八十的!”过先生一听,差点儿背过气去!从此不再理他——那年头不兴计划生育、人工流产,医生把打胎看作有损阴德的犯罪行为!

五

那五在云奶奶家住了不到一个月。虽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耐不住这寂寞,受不了这贫寒。好在衣服赎出来了,就东投亲西访友想找个事由混混。也该当走运,他随着索七去捧角儿,认识了《紫罗兰画报》的主笔马森。马森见那五对梨园界很熟,又会摆弄照相机,就请那五来当《紫罗兰画报》的记者。

这《紫罗兰画报》专登坤伶动态,后台新闻,武侠言情,奇谈怪论。社址设在煤市街一家小店里。总共两个人。除去马森,还有个副主笔陶芝。这两人两个做

派。马森是西装革履,陶芝是蓝布大褂;马森一天刮两次脸、三天吹一次风,陶芝头发披到耳后,满脸胡子拉碴。这办公室屋内只有两张小桌,三把椅子,报纸、杂志全堆在地下。那五上任这天,两位主笔请他到门框胡同吃了顿爆肚,同时就讲明了规矩:他这记者既不拿薪金也没有车马费。稿费也有限。可是发他一个记者证章,他可以凭这证章四出活动,自己去找饭辙。

那五一听,这不是涮人吗?但已答应了,也不好拒绝,决定试试看。他干了两个月,结识了几个同行,才知道这里大有门道。写捧角儿的文章不仅角儿要给钱,捧家儿也给钱。平常多遛遛腿儿,发现牛角坑有空房,丰泽园卖时新菜,就可以编一篇“牛角坑空房闹鬼”的新闻,“丰泽园菜中有蛆”的来信,拿去请牛角坑的房东和丰泽园掌柜过目。说是这稿子投来几天了,我们压下没有登。都是朋友,不能不先送个信儿,看看官了好还是私了好!买卖人怕惹事,房东怕房子没人敢租,都会花钱把稿子买下来。那五很得意,觉着又交上一步好运。

《紫罗兰画报》连载着言情小说《小家碧玉》,作者是正在发红的“醉寝斋主”。不知为什么,发到第十六回,斋主不送稿子来了。正好那五在报社。陶芝委托他去拜访醉寝斋主,带去稿费,索取下文。告诉那五这“醉寝斋”在莲花河后身十号。

六

这莲花河在石头胡同背后,一条窄巷,有三五户民宅。十号是个砖砌的古式二层楼,当中一个天井,院角有一条一踩乱晃、仅容一个人走动的楼梯。一转遭儿上下各有几间房子,家家房门口都摆着煤球炉子、水缸、土簸箕。那五正在院子观望,从楼梯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烫着发、描着眉、穿一件半短袖花丝葛旗袍、软缎绣花鞋的女人;一个是穿灰布裤褂、双脸洒鞋,戴一顶面斗帽的中年男人。这两人一见那五,交换一下眼色就站住了。男人问:“先生,您找谁?”

那五说:“有个编小说的……”

“嗯!”男人用嘴朝楼梯下面一努,有点扫兴地冲女人一甩头,两人走了。那五弯腰绕到楼梯下,才看见有个挂着竹帘的小房。门口用白梨木刻了个横额“醉寝斋”。

这房里外两间。里间什么样,因为太黑,看不清楚。外间屋放着一张和这房子极不相称的铁梨木镶螺钿的书桌。两把第一监狱出产的白木茬椅子和一把躺椅。书桌上书报、稿纸、烟盒、烟缸、砚台、笔筒堆得严严实实。随着脚步声,从里间屋门口钻出一个又瘦又高、灰白面孔、留着八字胡的人来:“您找谁?”

“醉寝斋主先生住这儿?”

“就是不才，请坐，您从哪儿来？”

“报社，主笔叫我取稿子来了。”

“噢，坐，坐，这两天应酬太多，忙懵了，把您这个碴忘了！”

“哎哟，就等您的稿子出版哪！”

“甭忙，您坐一会儿，现写也来得及，上一段写到哪儿啦？”

“啊？”那五并没看这几版小说，红了脸。斋主一笑说道：“没关系，您不记得不要紧，我这儿有账！”

他坐到书桌前，从纸堆中拉出个蓝色的流水账本，翻了几页问：“在您那儿登的是《燕双飞》吧？”

那五说：“不，我们是《紫罗兰画报》，登的是《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斋主把账本掀到底，扔到一边，又拉过一本账来，翻了翻说，“啊呀，这《小家碧玉》在哪本账上呢？噢，有了！”他又扔下这本账，从抽屉里找出本毛边纸订的一厚册稿子，找到用金枪牌香烟盒隔着的一页，笑道：“您好运气，不用现写，抄一段就完了。”马上铺下一张格纸，拿起毛笔，刷刷刷抄了起来。那五临来受了指教，便把一张一元钱的票子捏在手中，转眼斋主把稿子抄好，叠起来放进信封，那五便把那一元票子放在了桌上。斋主看了一眼钞票，却不动它。回身冲里屋喊道：“来客人了，快沏茶呀！”

屋里走出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圆脸，元宝头，向那五蹲了蹲身说：“早来了您哪，请坐您哪！这浅屋子破房的招您笑话。”就提起一把壶，伸手从桌上抄起那一元钱说：“我打水去。”

那五问道：“我看外边的小报上，全在登您的小说，您同时写几部呀？”

“八九部！”

“全写好了放在那儿？”

“不，写一段登一段，登一段吃一段。”

“才刚我看这《小家碧玉》不是全本都写好了吗？”

“嗽，那是二手活。”

“什么是二手活？”

斋主告诉他：“有人写了小说，可是没名气，登不出去。也有人写来消遣，却不愿要这名气。还有人写好了稿子，急着用钱，等不及一段段零登。他们就把稿子卖了。我买下来，整段零售，能赚几分利！”

那五奇怪地说：“照这么说，只要有钱买稿，自己不动手也能出名喽？”

斋主说：“当然，这是占已有之的，明朝有个王爷，一辈子刻了多少部戏曲，没一个字是他写的！”

那五听了，眉开眼笑。拿真话当假话说：“明儿一高兴我也买两部稿子，过过

当名人的瘾。”

斋主正色说：“像您这吃报行饭的，没点名气到哪儿都矮一头，玩不转，应该想办法创出牌子来。再说买来稿子您总得看，不光看还要抄。熟能生巧，没有三天力巴，慢慢自己也就写了。写小说这玩意儿是层纸窗户，一捅就破。”

说来说去，斋主把一部才买到手的武侠小说《鲤鱼镖》卖给了那五。要价一百大洋。那五正拿着甘子千造的假画要去当，这下就更鼓起了兴头。等他分到三百元当价后，从便宜坊出来就直接来到了“醉寝斋”，对斋主说：“钱我是带来了，得先看看货啊？”

斋主说：“您又老斗了不是？买稿子这玩意儿不能像买黄瓜，反过来调过去看，再掐一口尝尝。您把内容看在肚子里，放下不买了，回头照这意思又编出一本来我怎么办？隔山买老牛，全凭的是信用。”

那五把钱在手里掂了又掂，拿不定主意。斋主一拍桌子说：“罢了，我交你这个朋友了！”回身进里屋，从床下找出个破鞋盒子，在那里边掏出一本红格纸的稿本，拿到门外拍打拍打尘上，交给那五说：“你先看看回目吧！”

那五看看回目，倒也火炽热闹。可掂掂分量，看看厚薄说：“这哪能分一百段登啊？我一百块钱买下来，登三十段完了……”

斋主说：“说您年轻不是？名利是一回事，可不能一块来。您不是先求名吗？这稿子写得好，保您一鸣惊人！出名以后再图利！”

那五把钱交了出去，夹着稿子出来，自己没顾上看就交给编辑部，请求逐段发表。马森收下，一放个把月，没有回音。他每次问，马森都说：“还没看完，我看还不错。”可就不提发表的事。那五向陶芝打听消息。陶芝笑道：

“那人卖给你稿子，就没告诉你登稿子的规矩？”

那五问：“我看咱们登醉寝斋主的稿子也没有什么规矩呀，不就发一段给一块钱吗？”

副主笔笑了起来。对他说：“醉寝斋主好比马连良，是唱出名的了，他只要登台就不怕没人捧场。您哪，好比票友，票友唱戏不能挣钱，而要花钱。租场子自己出钱，请场面自己出钱，请人配戏自己出钱，临完还要请人吃饭、送票，人家才来捧场。演员唱戏为的是吃饭。票友唱戏是图出名。图找乐子！捧红了自然也能下海，可先得自己花钱打下底儿来。”

那五又掏出一百元，请陶芝给他开个名单，在宴宾楼请了一桌客。《鲤鱼镖》这才以“听风楼主”的笔名登载出来。自这天起，有些朋友见面就叫他“作家”，祝贺他“一鸣惊人”，说是重振家声大有把握了。那五嘴上谦虚，可心里就像装了四两烧刀子^①，晕乎乎热腾腾，说话声音也变了，走道脚下也轻了，觉得二百大洋花

^① 烧刀子，白干酒。

得不屈。尽管那张假画露了马脚，逼他又卖了套西服才填上坑。有这成名成家的路子鼓劲，竟没挫了他的锐气。

小说登到七八段上，情形有点不对了。不知是陶芝开的名单不全，怠慢了什么人，还是有人故意为难。另外几家小报上，出现了评论《鲤鱼镖》的文章。这些文章连挖苦带骂。有说他偷的，有说他剽的，有说他“热昏妄语，不知天高地厚”的。还有人查出来“听风楼主者，某内务府堂官之后也。其祖上曾受恩于八卦门某拳师，故写小说贬形意而捧八卦云云。”那五有点沉不住气。他跑去找醉寝斋主，问他说：“您这稿子犯了点什么忌讳吧？怎么招来这么多闲话呀？”斋主这本稿子本是花了十块钱买的一位烟客的，自己并没看过。就双手抱拳说：“我说您一鸣惊人不是？这儿给您道喜哪！一有人挑眼您就快红了。当初我专门花钱请人写稿骂我呢！你想想，光登小说，你的名字不是三天才见一回报吗？别人一评论，骂也好，捧也好，一篇文章中你这名字就得提好几回，还怕众人记不住？再说，天下之事，成破相辅，大凡有人骂的，相应就会有人捧，他们斗气儿，您坐收渔人之利，岂不大喜？”

那五听了，觉得确有此理，又转愁为乐。可没乐了几天，这天一进编辑部，马森就递过一封信来说：“五爷，这是您的信，咱们合作原本是好换好，您可千万别连累我们哥儿俩。给我们留下《紫罗兰画报》这块地盘混粥喝吧！”

口气这么重，那五自然是看作玩笑。等打开信封一看，他这才明白自己落在井口下，正往水深处坠呢。

这是一张宣纸八行朱栏，用浓墨行书写道：

“听风楼主那先生台鉴。兹定于本月初六、午后三时，在大栅栏福寿境上膏店烹茶候教。如不光临，谨防止戈。言出人随，勿谓言之不预也！”署名是：“武存忠”。

他问马森：“这武存忠好耳熟，是干什么的？”

马森没说话，把一张小报扔给他。那上边用红墨水圈了一篇小文章：“武存忠年老体衰，力辞某县长镖师之聘！”下边说武存忠乃形意门传人，清末在善扑营当过拳勇，民国以后在天桥撂场子卖艺，“七七”事变后改行打草绳。近来有位县长以重金礼聘他去当保镖，他力辞不任。那五看完，马森加了一句：“你听说前些年有个俄国大力士在中山公园摆擂台，谁要打败他，他让出十块金牌这件事不？”

那五说：“不就是叫李存义扔下台去，摔折一条腿的那回吗？”

马森说：“对了。武存忠是李存义的师哥！”

那五一听，后脊梁都潮了。带着哭声说：“他见我一来劲，不得把我劈了吗？”

马森埋怨他说：“登小说就登小说不结了，你胡扯八卦形意的门户之争干什

么？”

那五说：“老佛爷，我哪儿懂哪！那不是买来的稿本吗？”

陶芝见他怪可怜，就安慰说：“你也别急，这路人多半倒讲情面。你去了多磕头少说话，他见你服了软，也未必会怎么样。”

马森说：“你可不能不去，你要不去他敢来把这客店拆了，到时候咱包赔不起！”

打这天起，那五三天之内没吃过一顿整桩饭，没睡过一宿踏实觉。

七

初六这天，偏又是大热天，晒得树叶发蔫马路流油。他一步挪不了三寸地来到大栅栏。从钱市拐进一个巷子，见一家门口大白瓷电灯罩上写着“福寿境土膏店”，就推门进去，迎门却是个楼梯，阴暗、潮湿。他上了楼梯，这才看见两边都挂着白布门帘。掀开一个探探头，就有个中年胖子摇着蒲扇拦门坐着：“您买烟？”

“我找个人，武存忠……”

“那边雅座二号。”

那五又掀帘进了另一间屋。这屋是一长条房子，被两排木隔栅隔着。每边四个小门，门上悬着半截布帘，帘上印着号头。他找到二号，轻轻问了声：“武先生在吗？”

里边没动静。这时过来个女招待，手中托着擦得锃亮的烟具，冲他努努嘴。那五感谢地点点头，掀帘走了进去。屋子很小，只有一张烟榻一把椅子，但收拾的干净雅致。榻上铺着凉席枕席，墙上挂着字画。一个穿白竹布裤褂，胸前留着长髯的老人仰面躺着，两目微合，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那五轻声说：“武先生，我遵照你的吩咐来了！”

老头连眼皮都没哆嗦一下。那五迟疑片刻又退了出去，站在门外不知如何是好。恰好那女招待又走了过来。那五掏出一元钞票，往女招待围裙的口袋里一塞说：“武先生高睡了。您找个地方叫我歇歇脚，等他醒了叫我一声。”

女招待笑笑，用手指指二号门，摇摇手，推那五一把，又指指门径自走了。

那五第二次又进到二号房，一声不响地站在榻前等武存忠睁眼。那五走了一路，早已热了。偏这大烟馆的规矩是既不许开窗户，又不能安电扇的。他站在那儿只觉着脸上身上，汗珠像小虫似的从上往下爬。心里急得像有团火，却又不肯露出焦急相。站了足有五分钟，看老头还没有睁眼的样子，那五心一横就在榻前跪下了。

“武先生，武大爷，武老太爷！我跟您认错儿。我是个混蛋。什么也不懂。信

口雌黄。您大人不见小人怪,犯不上跟我这样的人动肝火!我……”

老头绷着绷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欠起身说:“起来起来,别这样啊!”

“我这儿给您赔礼了!”那五就地磕了一个头,这才起来。武老头笑道:“看你写得头头是道,还以为你是个练家子呢!”那五说:“我什么也不是,马勺上的苍蝇混饭吃!”武老头问道:“既是这样,下笔以前也该打听打听,不能乱褒乱贬哪。”那五说:“哎哟我的大爷,跟您说实话吧,那小说也不是我编的,我是买的别人的,图个虚名,没想惹您生了这么大气!”

老头哈哈笑了起来,那五一个劲服软,他早消了火了,口气和缓了一点说:“你坐,会抽烟吗?”

那五坐下。武存忠问了他几句闲话。打听他家庭出身,听说他是内务府堂官的后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说起来有缘,那年我往蒙古地去办差,回来时带了蒙古王爷送给你祖父的礼物。我到府上交接,你祖父还招待了我一顿酒饭。内院我当然见不着,就外院那排场劲我看了都眼晕哪!当时我就想,太过了,太过了!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照这么挥金如土,是座金山也有掏空的日子。儿孙们不知谋生之难,将来会落到哪一步呢?你现在就凭胡诌乱扯混日子?”

那五红着脸点点头。

武存忠说:“你还年轻,又识文断字,学点生技还来得及。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拉下脸面,放下架子,干点什么不行?凭劳动吃饭,站在哪儿也不比人低,比当‘无来优’不强吗?”

“是您哪!我爸爸死的早,没人教训我,多谢您教训我。”

武存忠见那五虽然油腔滑调,倒也有几分诚心感谢他的意思。就说:“我在先农坛根住。攒钱买了架机器打草绳子。你别处混不上了,上我这儿来,你又识字,我正少个帮手!”

那五心想,你可太不把武大郎当神仙了,我这金枝玉叶,再落魄也不能去卖苦大力呀!可又不敢让武老头看出他瞧不起这行当,忙说:“我现在还混得下去。将来短不了麻烦您!”

武存忠看出他不愿意,也不再劝。就告诉他小说这段公案算是了啦。原来有几个师兄弟很不忿,当真想找到《紫罗兰画报》把那报社砸了,是他把事按住,决定先和这“听风楼主”谈谈再作道理。他做主了结,别人也不会再缠着不放。那五连声称谢,又鞠了几个躬,这才告辞。武存忠挡住他说:“别忙,既叫你来了不能叫你白来。中国的武术是衰落了,国家不振,百业必定萧条。不过各派里人才还是有一点。你出去宣传宣传,也给咱们习武的朋友们壮壮气儿。老朽是没什么真本事的,给你表演个小招儿解闷吧!老三!”

这时隔壁就有人虎声虎气地应声：“在！”

“点灯去！”

武存忠下榻，提上鞋，紧紧腰上的板带领头出了二号门。这时走廊站着有四个汉子。有两个年轻人搭过一张桌子来，女招待帮忙点上了三盏大烟灯。

这些精壮汉子，见了那五都互送眼色咧开嘴笑，那五有点胆怯。武存忠说：“你甭担心，这都是我的徒弟。本来我们以为你是会个三门科四门斗的，提防着要交手。现在好了，和为贵，大家交个朋友吧！”

说话间就又聚来了几个闲人，把走廊围满了。

这大烟灯乃是山西出品，名叫“太谷灯”，一个个茶杯粗细，下边是个铜盏，上边的玻璃罩是用半寸厚的玻璃砖磨成，立在那儿像个去了尖的小窝头。平常要俯首向下，对准那圆口才能吹熄。女招待把它点亮之后，一个徒弟就把它从里向外摆成直溜溜的一排。武存忠自己看了看，亲自又校正了一下位置。然后退到五步开外，骑马蹲裆式站好，猛吸了一口气，板带之下腹部就鼓起个小盆。武存忠稍稍晃了晃膀子，站稳之后，“呼”的一口把气喷出。只见三个烟灯一齐火苗摇摆，挨次熄灭了。两边看的人齐声喊了声：“好！”

武存忠双手抱拳说：“献丑献丑。老了，不中用了。白招列位耻笑。”

那五两腿发颤，觉得连汗都变凉了。他挣扎着雇了辆三轮，回到编辑部。向两位上司报告这段险遇，两人听了同声祝贺，一同请他去丰泽园，要了个菜，一壶酒为他压惊。席间马森把《鲤鱼镖》原稿奉还，说是不宜再往下刊登。同时也表示，那五已成了著名人物，《紫罗兰画报》树矮难栖金凤凰，收回了那个珉琅的记者证章。

八

自从当记者之后，那五自己在南城租了间小房，和紫云断绝了来往。这时眼看房钱既拿不出来，饭钱也没着落，厚着脸皮买了盒大八件，去看云奶奶。哪知几个月没见面，情况大变。老中医已经由于急症去世，院里一片凄凉景象。紫云奶奶正在给人成盆地洗衣裳。一见那五进门，就哭了。抽抽噎噎地说：“我没照顾好你。叫你吃不爱吃，喝不爱喝的，把你气走了，可你也太心狠。再不好我们不也是亲眷吗？那家的人还剩下谁呢！别看家业旺腾的时候大门口车轿不断流，一败落下来谁还认这门亲？咱俩不亲还有谁亲？”几句话说得那五鼻子也酸溜溜的，低低叫了声：“奶奶！”这一声不要紧，老太太又哭了！“哎哟，你别折我的寿。你要心疼我孤苦伶仃的，打今儿就别走了。我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怎么也能挣出两口人的吃喝来！等你成了家，我伺候你们两口子。有了孩子，我给你看孩子，只

要不嫌我下贱就成！叫什么随便！”

那五答应下来。紫云高兴地连声念佛说：“你只管待着，爱看书看书，爱玩就玩。只要你不走，我就有了主心骨了。你坐着，我给你打扫房子去！”

紫云把老中医住的房子给那五收拾好，叫他过来看，还有哪里不如意的，再给他拾掇。那五一看，屋中只有一床一桌一把椅子，倒也干净。外间屋还放着两个花梨木书架，上边堆满线装书。他随手翻了翻，除去些《灵枢经》、《伤寒论》，就是几本《四书集注》、《唐诗别裁》。紫云就说：“别的全卖了发送老头了。就剩下这两架书，他的几个徒弟拦着不让卖，说要卖的话他们买，省得值仨不值两地便宜了打鼓的。他们这一说，我琢磨兴许有值钱的书，就说等你来了再定。要卖要留等你的话。你拣拣，凡是你要的就留下，不要的送他们得了，老头临死，几个徒弟跑前跑后没少出力，我没什么报答人家的，这也算个人情。”

那五大大方方地说：“您叫他们把书拉走，光把书架儿留给我就行。”

打这天起，紫云脸上有了点笑容。她把那五的衣裳全翻出来。该洗的，该浆的，补领子，缀纽扣，收拾得整整齐齐。有点余钱就给他几角，叫他到门口书摊上租小说看，那五租了几本《十二金钱镖》，看着看着，又想起醉寝斋主卖他稿子这事来。觉得不能这么便宜这老小子。这天推说要去看看个朋友，向云奶奶要钱坐车。紫云把刚收来的两块钱工钱全给了他，说：“出去散散心也好，省得憋闷出病来！可记住，别跟那些嘎杂子打连连，咱们是有名有姓的人家！”

一连气的粗茶淡饭，那五觉得肠子上的油都刮干了。出门先到东四拐角喝了碗炒肝。又到隆福寺吃了碗羊双肠。这才坐电车奔珠市口。来到醉寝斋，一掀帘，斋主趿着鞋忙迎了出来。拉着手问：“哟，您是发财了吧，怎么到处打听就问不出您的下落？”那五说：“有您那本《鲤鱼镖》，我还能不发财吗？差点叫武存忠打折脊梁骨！”斋主说：“这也怨你，哪有买来的文稿就一字不动往外登的？你把形意门八卦门这些词一改，编个什么雁荡派、剑门派不就百无事了？这些旧话不用提，当前正有一注子财等你去取！”那五说：“您可别拿我离嘻！”斋主说：“信也罢不信也罢，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来。”斋主把那五稳住，倒上杯茶，走出门去，听脚步声是上了楼。过了一顿饭时，一边说着一边领进一个人来：“你不总想见见那少爷吗？今天碰巧驾临茅舍了！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贾凤楼老板！”

那五认出是头天来时指给他们的那个中年男人。忙站起身来，点了点头：“咱们见过！”

“可不是吗？那天我眼睛一搭，就看着您出众！就看着您不凡！说句不怕您生气的話，我打心里不知怎么的就这么爱您！能让我当面和您叙谈一次，这辈子都不枉做人……”

“不敢当，不敢当，您太客气了！”

“这是打心眼儿里掏出来的真话！后来一打听，您敢情是那大人府上的少爷！我简直想打自己两嘴巴：这么高贵的人物，我这种贱民怎么敢妄想攀附哪？”

斋主插言说：“那少爷可就是文明开通、从不拿大！”

“是啊！我这高邻可再三介绍，说您不摆架子，最开通过！我就说，您再来了，无论如何赏光到舍下去坐一会儿，咱们认识一下。”

那五说：“您太抬爱了！我不过是沾祖上一点光，自己可是不成材的，您快坐！”

贾凤楼就笑着对斋主说：“我看就请我那边坐吧。”

斋主对那五说：“刚才我一提您来了，贾老板就派人叫菜，却之不恭，您就移步吧！”

那五推辞说：“初次见面这合适吗？这么着，咱们上正阳楼，我请客！”

“不赏脸不是？”贾凤楼说，“我妹妹也想见您，要不叫她来劝驾？”

斋主就拉着那五胳膊，连搀带架，三人上楼去。

贾凤楼住着楼上四间房，他和他养妹各住一间，两间作客厅。凤楼把那五让进北边客厅。墙上悬挂着凤魁放大的便装照片和演出照片。镜框里镶着从报纸上剪下的，为凤魁捧场的文章。博古架上放着带大红穗子的八角鼓。一旁挂着三弦。红漆书桌蒙着花格漆布，放了几本《立言画刊》《三六九画报》和宝文堂出的鼓词戏考，戏码折子。茶几上摆着架带大喇叭的哥伦比亚牌话匣子。那五这才知道贾家兄妹是作艺的。坐下之后，斋主就介绍说：“那少爷专听京评剧，不大涉足书曲界，您有空去听听，凤魁姑娘的单弦牌子曲，是正宗荣派，色艺双佳！”

那五欠身说：“有机会一定领教。”

凤楼说：“那少爷哪有工夫赏我们脸呢？舍妹的活儿太粗俗，有污耳音。”

“这可是客气话！”斋主一本正经地说，“凤魁不光艺术精湛，而且最讲情义，最讲良心。我常说，捧角儿的主儿要碰上凤姑娘，是修来的造化。”

那五心想：你别摆罗圈阵。捧大鼓娘我爸爸最拿手。我有这心也没这力！

这时一掀门帘，贾凤魁进来了。

贾凤魁今天没涂脂粉，只淡淡地点了点唇膏，显得比头次见面年轻不少，多说也不过十七八岁。穿了件半截袖横罗旗袍，白缎子绣花便鞋，头发松松的往耳后一拢，用珍珠色大发片卡住，鬓角插了一朵白兰花。她笑一笑，不卑不亢地双手平扶着大腿，微微朝那五一蹲身。

“迎接晚了，少爷多包涵，请那屋用点心吧。”

贾凤楼又把那五让到隔壁另一间客厅里，桌上已摆下了几个烧碟，一壶白酒，一壶花雕。

饮酒之间，无非还是说些奉承那五的话。那五几杯落肚，架子就放下来了。

开始和贾凤魁说起逗趣的话来。凤魁既不接碴儿,也不板脸,仿佛她是个局外人。有时听他们说话拣个笑,有时两眼走神想自己的心思。

饭后贾凤楼又把客人往另一间客厅让。斋主推说赶稿儿,抢先溜了。凤魁要收拾残席,告便留下。那五也要告辞,贾凤楼拉住他说:“我正有事相求,话还没说到正题上,您哪能走呢?”

那五只得又坐了下来。

贾凤楼让过一杯茶后,对那五说:“如今有一注财,伸手可取,可就少个量活的,想借少爷点福荫。”

那五知道“量活”是做帮手的意思。就问:“什么事呢?”

“有位暴发户的少爷,这些日子正拿钱砍舍妹。我们是卖艺不卖身的!”

那五说:“可敬,可敬。”

贾凤楼说:“话说回来,没有君子,不养艺人。人不能随他摆弄,钱可得让他掏出来。他们囤积居奇,钱也不是好来的,凭什么让他省下呢?”

那五说:“有这么一说,可怎么才能叫他既摸不着人,又心甘情愿地花钱呢?”

贾凤楼说:“得出来另一个财主,也捧舍妹,舍得拿钱跟他比着花!他既爱舍妹又要面子,不怕他不连底端出来。钱花净了还没压过对手,不怕他不羞惭而退!”

那五说:“我明白了。您是叫我跟他比着往令妹身上扔钱!”

“着,着,着!”

那五一笑,嘲弄地说:“这主意是极好,我对令妹也有爱慕之心,可惜就是阮囊羞涩。”

贾凤楼说:“您想到哪儿去了?咱们是朋友,怎么说生分话?既叫您帮忙还能叫您破财吗?得了手我倒是要给您谢仪呢!”

那五这才郑重起来,精神抖擞地问:“你细说说这里的门子。谢仪我不指望,可我为朋友决不惜两肋插刀!”

贾凤楼说:“有这句话,事情成了一半了。打明儿起,您天天到天桥清音茶社听玩意儿去。到了那儿自有人给您摆果盘子送手巾把,您都不用客气。等舍妹上台后,听到有人点段,您就也点。他点一段您也点一段,他赏十块,您可就不能赏十块,至少也得十五,多点二十也行!”

那五说:“当场不掏钱吗?”

贾凤楼说:“当然得现掏,不过您别担心,到时候我会叫送手巾把的人把钱暗地给您送去。我送多少,您赏多少,别留体己,别让茶房中间抽头就行!活儿完了,咱们二友居楼上雅座见面,夜宵是我的。亲兄弟明算账,谢仪我也面呈不误!”

那五兴致勃勃地说：“行！赌好吧！”

“不过……”贾凤楼沉吟一下，压下声音说，“此事你知我知，万不可泄露。还有，您得换换叶子！”

“什么叫叶子？”

“就是换换衣裳。您这一身，一看是个少爷。少爷们别看手松，可底不厚，镇不住人。因为钱在他老子手里。花的太冲了还让人起疑。您得扮成自己当家、有产有业的身份。”

“行！”那五笑道，“装穷人装不像。作阔佬是咱的本色！”

“要不我头一眼就看着您不凡呢？”

临走，贾凤楼把个红纸包塞在那五手中说：“进茶社给小费，总得花点。这个您拿去添补着用。”

那五客气地推辞了一下。贾凤楼说：“亲是亲，财是财，该我拿的不能叫您破费！”

九

那五回到家，却跟云奶奶说，有个朋友办喜事，叫他去帮着忙活几天。云奶奶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事上多上点心是好事。”那五说：“可我这一身儿亮不出去呀！想找您拆兑两钱，上估衣铺赁两件行头。”云奶奶说：“估衣铺衣裳穿不合体，再说烧了扯了的他拿大价儿讹咱，咱赔不起。我这儿有爷爷留下的几件衣裳，都是好料子。我给你改改，保你穿出去打眼。”说着云奶奶就给那五量尺寸，然后从樟木箱中找出几件香云纱的、杭纺的、横罗的袍子、马褂，让那五挑出心爱的，连夜就着煤油灯赶做起来。那五舒舒服服睡了一觉，第二天一睁眼，衣裳烫得平平整整，叠好放在椅子上。他兴冲冲地爬起来试着穿，不光合体，而且样式也新——云奶奶近来靠做针线过日子，对服装样式并不落伍。那五穿好衣服过去道谢，云奶奶已经出门买菜去了。他自己对着镜子左顾右盼，确像个极有资财的青年东家，只可惜少一顶合适的帽子，没钱买，赶紧去剪剪头，油擦亮点，卷儿吹大点，也顶个好帽子使唤。

这清音茶社在天桥三角市场的西南方，距离天桥中心有一箭之路。穿过那些撂地的卖艺场，矮板凳大布棚的饮食摊，绕过宝三带耍中幡的摔跤场，这里显得稍冷清了一点。两旁也挤满了摊子。修脚的、点痞子的、拿猴子的、代写书信、细批八字、圆梦看相、拔牙补眼、戏装照相。膏药铺门口摆着锅，一个学徒要着两根棒槌似的东西在搅锅里的膏药，喊着：“专治五淋白浊，五癆七伤。”直到西头，才看见秫秸墙抹灰，挂着一溜红色小木牌幌子的“清音茶社”。门口挂着半截门

帘,一位戴着草帽、白布衫敞着怀的人,手里托个柳条编的小筐箩,一面掂得里面硬币哗哗响,一面大声喊:“唉,还有不怕甜的没有?还有不怕甜的没有?”

那五心想:“怎么,这里改了卖吃食了?”

可那人又接着喊了:“听听贾风魁的小嗓子吧!蹦瓷不叫蹦瓷,品品那小味吧!旱香瓜、喝了蜜,良乡栗子大鸭梨、冰糖疙瘩似的甜喽……”

灰墙上贴满了大红纸写的人名,什么“一斗珠”“白茉莉”,有几个人名是用金箔剪了贴上的,其中有贾风魁。

那五伸手一掀帘,拿筐箩的人伸胳膊挡住他问道:“您贵姓?”

“我姓那呀,怎么着,听玩意儿还要报户口……”

那人并不理会那五的刺话,只把布帘一挑,高声喊道:

“那五爷到!”

里边就像回声似的喊了起来:“那五爷到!”“五爷来了,快请!”“请咧!”有两三个茶房,一块拥了过来。先请安后带路,把那五让到正中偏左的一个茶桌旁,桌上已摆满了黑白瓜子,几片西瓜。一个茶房送来了茶碗,紧接着就有人送上一块洒了香水的热毛巾。那五伸手去接毛巾,一卷软软的东西就塞到了他手心上。那五擦过脸,低头一看,二十元纸币包着一张字条,上写“风雨归舟”。

那五定下神来,这才打量这茶社和舞台。

茶社不大,池子里摆着七八张桌子,桌子上多半有果盘。靠后边几桌空着。前边儿桌子,多半都坐着三五个人。只和他斜吊角靠台边处的一桌上,也是单人独坐。看来比那五还小几岁。西服革履,结着大红底子绣金龙的领带。两廊和后排,全是窄条凳。那儿人倒是挤得满满的,不过一到段子快刹尾,就匆匆地往外走。等到打钱的过去,又呼呼地坐进来。

这舞台是没有后台的。台后墙上挂了些“歌舞升平”、“声遏青云”之类的幛幅,幛幅下边沿着半月形放了十来把椅子,椅子上坐着各种打扮、浓妆艳抹的女人。台前尽管有人在表演,坐着的人仍不断向台下点头、微笑、打招呼。

这时台上一个胖胖的女人,正在唱梅花大鼓“黑驴段”。她唱完,檀板一撂,歪着头鞠了个躬。台下响起掌声。几个茶房就举着筐箩向两廊和后排冲去,嘴里喊着:“钱来,钱来!谢!”台口左边,像药店门口的广告板似的也竖着一块板,上边搭着白粉连纸写的演员姓名,在这纷乱声中,捡场的走过去掀过去一张,露出“贾风魁”三个大字。这名字一露,那穿西装的青年就喊了一声:“好!”随即伸起胳膊招了招手,一个茶房赶过去,弯着腰听他吩咐了几句什么,接过钱飞快地从人丛中钻到台口,抄起一个方木盘,捧着走上台高声喊:“阎大爷点《挑帘裁衣》,赏大洋拾元!”台上坐着的女人、台下奔忙的茶房,立刻齐声喊道:

“谢!”

贾凤魁从座上袅袅婷婷走到台中，笑着朝那青年鞠了躬。

今天贾凤魁换了身行头，蛋青喇叭袖小衫，蛋青甩腿裤子，袖口、大襟、裤口都镶了两道半寸宽的绣花边，耳后接上假发，梳上根又粗又亮的大辫子，红辫根，红辫梢，坠了红流苏，耳朵上戴着一副点翠珠花长耳坠。那五心想：“难怪方才坐下时没认出她来！”

正在出神，肋岔上叫人捅了一下。回头一看，是送毛巾的那个茶房：

“五爷！”茶房朝那二十元钞票吮吮嘴。

他急忙点头，把那卷钞票原封不动又给了茶房。茶房正步奔上台口，拿木盘托着跑上台喊：“那经理点个岔曲《风雨归舟》，赏大洋二十块！”

台上台下又是一声吼。贾凤魁走上台前，朝那五鞠了一躬，笑嘻嘻不紧不慢地说了声：“经理，我们这儿谢谢您哪！”

人们嗡嗡地议论成一片，刷的一下把视线投向了那五。那西装青年站起身来虎视眈眈朝那五盯了一眼，台上响起弦子声这才坐下。一霎时，那五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族声势赫赫的时代。扬眉吐气，得意之态不由自主、尽形于色。刚进门时候那股拿架子演戏的劲头全扫尽了，做派十分大方自然！

从这儿开始，茶房就拿着那二十元钞票一会儿放在盘子里送到台上，一会儿悄没声地装作送手巾把给那五塞到手中。走马灯似转个六够。后来那位阎大爷大概把带来的钱扔干净了，就气哼哼地拍桌子往门外走。茶房一连声地喊：“送阎大爷！”阎大爷回眼扫了一下那五，放大嗓子说：“明天给我在前边留三个桌子，有几个朋友要一块来给凤姑娘捧场！”

那五听了这几句话，浑似三伏天喝了碗冰镇酸梅汤，打心里往外痛快。这几个月处处受人捉弄，今天也算尝到了捉弄人的美劲，连画儿韩那儿受的闷气似乎都吐出来了！不过随着这位冤大头出门，茶房取走那二十块钱再没往回送。没过够摆阔的瘾头。他勉强又听了两个段子，感到没兴头了，茶房送话来，贾凤楼正在“二友居”等他。他把几毛小费摆在桌上，起身走去。那茶房一边收钱一边又喊了声：“那经理回府了！”他就在“送”的喊声中出了门。

贾凤楼在二友居门口等着那五，一路上楼一路说：“天生来的凤子龙孙，那派头学是学不像的！您可帮了大忙了！”

虽说就两人吃夜宵，菜可叫了不少。临分手贾凤楼又塞给那五一个红包。到洋车上打开一看，原来就是那五使了多少遍的二十元钞票。那五算算，那位冤大头今天一晚上少说赏了也有一百五十块，分这点红未免太少。又一想，那家少爷跟这种下九流争斤论两有失身份，会叫他小看。忍了吧，捧角儿还挣钱，也算一乐！路过“信远斋”，他下车买了两盒酸梅料。云奶奶正给他等门。他把酸梅料送进堂屋说：“给您尝尝鲜！”云奶奶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忙问：

“哪来的钱？”

“打牌赢的！”

“往后可别打牌，咱们赢得起可输不起。欠赌账叫人笑话，蚊子轰了，帐子搭下来了，冲个凉快歇着吧！大热的天够多累呀！”

十

那五连着上清音茶社去了十多天，阎大爷少说花了也有一千多块钱。这天竟干脆提个大皮包走了进来。一来一往点了足有十几段。天就耗晚了。警察局有夜禁令，不许超过十二点散场。管事的和贾凤楼来说情，请二位爷明天再赏脸。那五摇了几下脑袋，算是应允了。阎大爷却不依不饶：“你们不是就认识钱吗？大爷没别的，就几个闲钱，还没花完呢！”

这时园子乱了，艺人们也纷纷下了台，凤魁悄没声地走到那五身后拉他一把说：“要出事了，你还不快走！”那五这才从梦里醒来，急忙钻出了茶社。

那五来到门外，才觉出夜已深了。两边的小摊早已收了个一干二净。电车也收了。天桥左近又黑又背，他有点胆怯，就清了清嗓，唱单弦壮胆儿。

“山东阳谷县，有一个武大郎。身量儿不高啊二尺半长。跳着那板凳儿还上不来炕……”

“有跟车的没有？”一辆双人三轮从身后赶了上来。上边坐着一个穿灰裤褂的人，打着鼾声，脑袋摆来摆去。三轮车夫冲那五问：“上东城去的再带一个啊！收车了少算点！”

那五正想乘车，就问：“少算多少钱？”

“一块钱到东单！”

“一块还少算！”

“您往前后看看，花两块叫得着车叫不着？在这地方一个人遛达？不用碰上黑道儿上的哥们儿，碰上巡逻队查夜，你花一块钱运动费能放您吗？”

拉车的嘴里说话，可并不停车，露出一搭没一搭的派头，车已超过那五去了，那五叫道：“我也没说不坐，你别走哇！”

三轮这才停下，推推车上那位说：“劳驾，边上靠靠，再上一个人！”

“什么再上一个人？”那人含糊不清地说，“你一个车拉几份客？”

“两份。您没看是双座的吗！”三轮车夫连推带搡，把那人往边上挪了挪，扶那五上去坐稳当，把车飞快地蹬起来。车出了东西小道，该往北拐了，他却一扭把向南开了下去。

“喂，拉车的，”那五喊道，“上东城，你往哪儿走！”

“老实坐着！”那睡觉的客人一把抓住那五的手，另一只手就掏出把亮晃晃的家伙杵在那五腰上，“再出声我捅了你！”

“哎哟，您……”

“住嘴！”

那五虽说住嘴了，可他哆嗦得车厢板咔咔直响，比说话声儿还大。拿刀的人掐了他大腿一把说：“瞧您这点出息，可惜二十多年咸盐白吃了！”

这车左拐右拐，三转两转来到一条大墙之下。这里一片树林，连个人影都没有。拉三轮的停了车，握刀的抓住那五胳膊把他拽下车来说：“朋友，漂亮点，有钱有表掏出来吧！”

那五语不成声地说：“表有一块，可是不走字，你爱要请拿走。钱可没有多少，我出来就带了两块钱车钱。”

拉三轮的说：“太少爷，没钱能捧角儿吗？我盯了你可不止一天了！”

拿刀的说：“少费话，搜！”

搜了个一佛出世二佛朝天，果然只有两块钱，一块连卖零件也没人要的老卡字表。拿刀的一怒啪啪打了那五两个嘴巴，厉声说：“把衣裳脱下来！”

那五从里到外，脱得只剩一条裤衩。然后就垂手站在那儿乱颤。现在他不害怕了，可觉着冷了，上牙直打下牙。

拉三轮的说：“皮鞋！”

那五说：“您留双鞋叫我走道啊！”

拿刀的说：“往哪儿走？上派出所报告去？脱下来！”

那五弯腰脱鞋，只觉后脑勺叫人猛击了一掌，就背过气去了。等他醒来，发现鞋倒还在脚上。可天还不亮，赤身露体的上哪儿去呢？只好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浑身冻得都透心凉了。

慢慢地有了脚步声，有了咿咿呀呀喊嗓儿声。“我说驸马，你来到我国一十五载……”有人一边说白一边走了过来，听声儿是个女的。那五赶紧又躲到树后头。约摸过了半个时辰，天渐渐透白了。有个人弯腰驼背的从他身后慢慢走了过去，那五喊了声：“先生……”

那人停下来，朝这边望望，走了过来。那五眼尖，还差六七步远就认出来是拉胡琴的胡大头！

“胡老师！”那五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怎么着？那少爷呀？怎么总不来园子采访了？上这儿练功来了！哭什么？云奶奶老了？”

“哪儿啊，我叫人给扒光了！”

“咳，这是怎么说的！”胡大头赶紧把自己大褂脱下来给那五披上，可他里边

也只有一件没有袖儿的汗背心。看看那五、又看看自己说：“不行，这一来不光您动不了窝，我也没法儿见人了。这么着，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找左近人家去借件衣裳。你可别乱动。要不叫警察看见说你有伤风化，还要罚大洋五毛！”

“这是到了哪儿了？还有警察吗？”

“嗨，您怎么晕了，这不是先农坛吗！”

胡大头又把褂子要回去，穿得整整齐齐走了。那五端详一下方位。冤哉，这儿离清音园只隔着一道街，记得东边把角处就有个挂着红电灯罩的派出所！这时天大亮了，喊噪的、遛弯的越来越多。那五躲在树下再也不敢动弹，那模样不像被人扒了，倒像他偷了别人的靴掖子！

十一

不到一顿饭时，胡大头领着武存忠来了，武老头还有老远就喊：“人在哪呢？人在哪呢？”那五闻声站了起来。武存忠定神一看，哈哈大笑。捋着胡子说：“我当是谁呢，听风楼主啊，怎么上这喝风来了？快穿上衣裳嘛！再冻可成了伤风楼主了！”

那五接过武存忠的包袱，一看是块蓝粗布，先皱了皱眉头。打开再一看，是一身阴丹士林布裤褂，洗得泛了白，领子上还有汗渍，又吸了口气。武存忠说：“这是我出门作客的衣裳，您将就着穿。干净不干净的不敢说，反正没虱子。”那五穿好衣裳，武存忠就请他们一道到家去吃点心。那五问：“你们二位早就认识？”胡大头说：“我天天在这坛根遛弯，常去看老先生打绳子，见面就点头，没说过话！”

武存忠的家就在坛根西边。远对着四面钟，门口一片空场，堆着几垛稻草。稻草垛之间，有两帮人练武。一帮是几个半大孩子，由一个青年人领着练拳。那青年手里拿根藤棍，嘴里叫着号：“蹦，劈，专，炮，横！”另一帮是两个小丫头自己在练剑。一边自己念叨：“仙人指路，太公钓鱼！……”武存忠一边走路，一边指点：“小辛，剑摆平，别耷拉头！”“你们那炮拳怎么打的！高射炮啊！冲鼻子尖打！”说着话领他们进了个门道，门洞里就摆着架用脚踩的打绳机，地上放了好几盘才打好的粗细草绳。武存忠领他们穿过这里，走进一间小南屋，南屋迎门放好了炕桌、小板凳，桌中间摆了一盘鬼子姜，一盘腌韭菜，十来个贴饼子。武存忠在让座的工夫，他老伴又端来一盆看不见米粒的小米汤。

“没好的，就是个庄稼饭。”武存忠说，“那少爷也换换口味！”

那五生长在北京几十年，真没想到北京城里还有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家，过这样的日子。他们说穷不穷，说富不富，既不从估衣铺赁衣裳装阔大爷，也不

假叫苦怕人来借钱,不盛气凌人、也不趋炎附势。嘴上不说,心里觉着这么过一辈子可也舒心痛快。

他问:“武先生还有点嗜好?”

武存忠说:“你是说抽大烟哪?我哪有那个福气,上一回是借地方办事,图那种地方不惹眼!我打一天绳子不够两烟泡钱,一家人喝西北风去?也当喝风楼主吗!”

那五也笑了起来。喝了几口米汤,他缓过点劲儿来了。吃了口饼子,也觉着满口香甜。凑趣说:“您这嚼谷还真是味,明儿我真来跟您学打绳子吧!”

“您吃不了那个苦!细皮白肉的,干一天手心上就磨的没皮了。您看看我这手是什么手?”

武存忠把一只小蒲扇似的手伸到那五面前。那五摸了把,“哟”了一声,真是又粗又厚。光有茧子没有皮,比焊水壶的马口铁还硬实。

胡大头问那五怎么会遇上恶人的?那五不好意思说和贾家兄妹连手作套摆弄人,只说听大鼓散场晚了,如何如何。大头问他在哪儿听的大鼓?那五说:“清音茶社。”

大头摇了摇头说:“唉!听大鼓东城有东安市场,西城有西单游艺社。这清音茶社可是您去的地方吗?”

那五说:“反正消遣,哪儿不是唱大鼓呢?”

大头说:“唱与唱可大有分别。清音茶社里献艺的是什么人?有淌河卖唱的,有的干脆就是小班的姑娘。还有是养人的卖了孩子,在这儿见世面!光叫人抢了几件衣裳还真便宜了!”

那五一听,暗中直咋舌,没想到这里还有许多说道。武存忠听到这里,笑笑说:“您要说的是实话,这几件衣裳也许还能找回来。”

那五一听,喜出望外:“老先生有把握?”

“那倒不敢说。”武存忠说,“多少有点路子。这天桥管界的合字号朋友,都跟派出所连着,他们有个规矩,不论抢来的偷来的,是现钱是衣物,十天之内不会动它,防备派出所所有人来找。过了十天,他们或是卖或是分,照例给局子里一份喜钱。”

那五说:“那么我马上去报案。”

武存忠说:“只要一报案,当天可就销赃。东西留着不是等报案,凡是报案的都是没门子的。”

那五说:“那怎么办呢?”

武存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可以托人打听一下。还是那句话,得是偷的抢的。若是报私仇,斗势力,后边别有背景,派出所管不到这个范围,所以我

问你是不是实话。”

那五脸红一阵,摇摇头说:“话是实话。东西不用找了,这点玩意儿我买得起,犯不上再劳您费心。”

武存忠笑笑,再没说什么。

吃过饭,胡大头就要送那五回家,那五心想穿这一身苦大力的衣裳进城,难以见人,就说:

“我把衣裳穿走怎么办,不耽误武老先生用吗?麻烦您上云奶奶那给我取一身衣裳来。我在这儿等着。”

武存忠不明白那五的心理,忙说:“你穿走吧,有空送来,没空先放在那,我不等穿。”

大头明白那五的意思,心里嫌他这股死要排场劲,就说:“不瞒您说,我送您回家是顺路上票房去说戏。下午、晚上又都上园子,我哪有空再来接您呢!作艺吃饭的人,工夫就是棒子面,我哪有半天的闲工夫?”

那五只得和胡大头一同告辞。出来时草绳机已经开动了。只见满屋尘土草屑,呛得睁不开眼,那个叫号练拳的小伙子赤着胸背,一边踩踏板,一边往机器里续草。那两个练剑的小姑娘头上包了毛巾,蹲在地上盘绳子。那五看了看,觉着实在不是他能干的营生。疾走几步穿过那过道,让武先生留步。

武存忠拉住那五的手说:“我和您祖父有一面之缘,又比您虚长几岁,我就卖卖老,嘱咐您几句话。”

“您说,您说。”

“依我看家业败了,也未见得全是坏事。咱们满族人当初进关的时候,兵不过八旗,马不过万匹。统一天下全靠了个人心向上立志争强。这三百年养尊处优,把满洲人那点进取性全消磨尽了,大清不亡,势无天理。家业败了可也甩了那些腐败的门风排场,断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命脉,从此洗心革面,咱们还能重新做个有用的人。乍一改变过日子的路数,为点难是难免的,再难可也别往坑蒙拐骗的泥坑里跳。尤其是别往日本人裤裆下钻。宣统在东北当了儿皇帝,听说北京有的贵胄皇族又往那儿凑。你可拿准主意。多少万有血性的中国人还在抗日打仗。他们的天下能长久吗?千万给自己留个后路!”

那五说:“这您倒放心。政界的边我是一点也不敢沾。我没那个胆量!”

武存忠几句话说得那五脸上直变色,越琢磨越不是滋味。他忽然感觉到:原以为自己与贾凤楼合伙捉弄人的,到头来倒像是自己叫人捉弄了。原来自己不光办好事没能耐,做坏事本事也不到家!不由得叹了口气!

胡大头错会了意,就说:“武先生说的是好话,你别挂不住。依我看,你也该找个正当职业,老这么没头苍蝇似的不是办法!前些天听说你又辞了画报的事。

这我倒赞成。那些报棍子吃艺人、喝艺人，还糟蹋艺人，梨园界没有人不骂的！”

那五说：“就算我想改弦更张，我干什么去好呢？”

胡大头说：“只要拉下脸来，别看不起卖力气活，路还是有的。”

那五想了想：“您教我唱戏怎么样？”

大头笑了出来，说道：“少爷呀少爷，您算是江山好改禀性难移了。这张口饭是这么好吃的吗？坐科是八年大狱呀！出来还要再认师傅，何况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按我跟府上的交情，给您说几出戏算什么，可那能换饭吃吗？”

那五说：“我也不求下海，也不想成名。能会几出在票房混混，分俩车钱，拿个黑杵儿就行！我小时候跟我爸爸学了几段，您不还说过我有本钱吗？”

胡大头看出这那五是不会安分守己一本老实的谋生活了，便不再进言。

云奶奶见那五半夜没回来，急得整宿没睡，一早起就给菩萨上香，祷告许愿，求佛爷保佑少爷别出差错，让她死后难见老太爷。看到那五这么个打扮回来了，城不城乡不乡，粗布裤褂又大又肥，脚下却一双锃亮的新皮鞋，实在哭不得笑不得。及至听说他遇了险，又哆哆嗦嗦地劝告，求那五安生在家，再也不去惹祸。她拿衣裳给那五换过。把武存忠的衣裳洗干净，压板正，又不声不响放了两块钱在那衣裳口袋内，等武存忠来取。过了两天，胡大头来了，说是来东城票房说戏，顺便把衣裳给武老头带回去。

云奶奶说：“又劳动您了不是，好歹赏个脸，吃了饭再走，要不我心里不落忍。”

胡大头在府里原是见过这位姨奶奶的，也就不客气。喝茶的工夫，那五又提学戏的事，大头哼哼哈哈，不说准话。过一会儿那五出去买菜去了，云奶奶就问：“刚才怎么个话头儿？”

大头就说那五想跟他学戏。“老太太，您想想十年能出个状元，可未必出个好戏子，他这么大岁数了，能吃那个苦吗？这不是又云山雾罩吗？”

云奶奶说：“胡大爷，看在我面上，您收他吧。我不求他能挣钱，只要有个准地方去，有件正经事拴住他，他没空再去招三惹四，您就积了大德了！”

大头想了一想，等那五回来时，就对他说：“你要学戏也行，一是进票房跟大伙一块学，我不单教；二是你可别出去说你是我的徒弟！”

那五说：“这都依您，就这票房得出钱，我有点发憊！”

大头说：“这你放心，我带着你去，他们不能收费。”

从此那五就学了京戏。

十二

这票房有穷富之分，票友有高下之别。一等票友，要有闲，有钱，还要有权。

有闲才能下功夫,从毯子功练起;有钱才能请先生,拜名师,置行头;有权才能组织人捧场,大报小报上登剧照,写文章。二等的只有钱有闲,也能出名,可以租台子,请场面,唱旦的可以花钱拜名师。然后请姜妙香、言菊朋等名角傍着唱。三等的既无钱又无权,也要有条好嗓子,有个刻苦劲,练出点真本事,叫内外行都点头,方能混饭吃。那五算哪一等呢?他只是跟着胡大头,作为朋友,到票房玩玩。跟着转了两年,学会几出不用多少身段的戏。《二进宫》《文昭关》《乌盆记》。别人花钱租行头,赁场子也没有让他过瘾的道理,所以一直没上过台。

日本投降前,云奶奶给人洗洗缝缝,还能挣口杂合面。国民党一回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苛捐杂税,没有谁做新衣裳了,也没有谁把衣服送出去洗了。只得让那五搬到北屋与她同住,南房腾空,贴出一张招租的条儿去。这时房子也并不好租。因为解放军节节胜利,有钱人,当官的纷纷南逃,空下不少房子。普通百姓能将就则将就,物价一天三涨,谁还有心搬家换房?云奶奶当尽卖空,三天两头断顿儿了。

那五没机会上台,总得想法混饱肚子。那时社会上不光有唱戏的票友,还有“经历科”的票友,专门约业余演员凑堂会。那五先是经这些人介绍到茶馆唱清唱,后来又上台去播音。茶馆只给很少一点车钱,电台连车钱也不给,但是可以代播广告收广告费。三个人唱《二进宫》,各说各的广告。杨波唱完“怕只怕,辜负了,十年寒窗,九载遨游,八进科场,七篇文章,没有下场。”徐延昭赶快接着说:“妇女月经病,要贴一品膏,血亏血寒症,一帖就能好。”徐延昭唱完“老夫保你满门无伤。”杨波也捋气似的忙说:“小孩没有奶吃是最可怜的了,寿星牌生乳灵专治缺奶……”

电台有个难得的好处,就是广播时报名。唱上几回,那五的名字在听众中有了印象。南苑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办个业余剧团,请正式的艺人来教戏没人敢去,转而找到电台。请清唱的人去教。说好管吃管住,一月给两袋面。那五一想,这比在电台磨舌头有进项,就应邀去了南苑。到那一看,所谓管住,不过是在康乐部地板上铺个草垫子,放两床军毯。而管吃呢,是开饭时上大灶上领两个馒头一碗白菜汤。想不干吧,又怕得罪老总们挨顿臭打。硬着头皮待下来了,好处也是有的,大兵们个个是老斗,你怎么教他怎么唱,绝不会挑眼。那五教了一个月,还没教完一出《二进宫》,解放军围城了。两边不断的打枪打炮。他一想不好,再不走国民党拉去当了兵可不是玩的,就押去挖战壕也受不了!死说活说要下两袋面来,离开飞机场,找个大车店先住下。这两袋面怎么弄走呢?跟大车吧,已经没有奔城里去的车了。雇三轮吧,三轮要一袋面当车钱,他舍不得。等他下狠心花一袋面时,路又不通了。急得他直拍着大腿唱《文昭关》。唱了两天头发倒是没白,可得了重感冒。接着又拉痢疾。大车店掌柜心眼儿好,给他吃偏方,喝香灰,

烧纸,送鬼,过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瘦得成了人灯,他那一袋面早已吃净。剩下一袋给掌柜作房钱。掌柜的给他烙了两张饼送他上路。就这么点路,他走了三天才到永定门。

来到家门口,大门插着,拍了几下门,里边有了回声,三个女的问:“谁呀?”

那五听着耳熟,可不像云奶奶。看看门牌,号数不错。就说:“我!”

“你找谁?”

“这是我家!”

门哗啦一下打开了,是个年轻的女人。俩人対脸一看,都哟了一声。还没等那五回过味来,那女人赶紧把门又推上了。那五使劲一推门,一个踉跄跌进门道里,那女人赶紧又把门关上,插好,朝那五跪了下去。

“五少爷,咱们远无冤近无仇的,您就放我条活命吧。以前的事是贾凤楼干的,我是他们买来挣钱的,没有拿主意的份儿呀!”

“别,别,凤姑娘,您这是打哪儿说起。我没招您惹您,您怎么找到我家里来了?”

云奶奶这时候赶到。直着眼看了一会儿,先把凤魁拉起来,又把那五扶起来。把两人都叫进屋,才问怎么档子事。那五说:“我差点没死在外头,好不容易拼命奔回来,我知道是怎么档子事?”

凤魁这才知道那五确是这一家的人,不是来抓她的,后悔吓晕了头,再也瞒不住自己身份了。这才说她租云奶奶房住时隐瞒了真情。她从小卖给贾家,已经给他们挣下了两所房子。现在外边城围得紧,里边伤兵闹得凶,没法演唱了,贾家又打算把她卖给石头胡同。楼下醉寝斋主暗暗给她送了信,她瞧冷子跑出来的。先在干姐妹家藏着,后来自己上这儿找了房。说完她就给云奶奶跪下磕头说:“我都说了实话了。救我一命也在您,把我交给贾家图个谢礼也在您!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您收下我,这世我报不了恩,来世结草衔环也报答您。”

云奶奶叹口气,拉起凤魁说:“我也是从小叫人卖了的。要想害你早就把你撵出去了。你一没家里人看你,二没有亲朋走动,孤身一人,听见有人敲门就捂心口,天天买菜都不出门,叫我给你带,我是没长眼的?早觉着你有隐情了,只是看你天天偷着哭鼻子抹泪,咱娘俩又没处长,我不便开口问就是了。我没儿没女,你就做我闺女吧。不修今世修来世,我不干损德事!”

凤魁痛痛快快地叫了声:“妈!”娘儿俩搂着哭起来了。那五说:“你们认亲归认亲。这凤姑娘总这么藏着也不是事,纸里还能包住火吗?”

云奶奶说:“你看这局势,说话不就改天换地了?那边一进城,这些坏人藏还藏不及,还敢再找人?放坏?”

那五沿途过了解放军几道卡子,看到了阵势。点头说:“这话不假,那边兵强

马壮,待人也和气,是要改天换地的样儿。”

云奶奶问凤魁和那五是怎么认识的。凤魁不肯说,云奶奶生了气:“你还认我这妈不认了?”

凤魁说:“少爷就是听过我的玩意儿。”

云奶奶说:“不对,那不至于一见面你就吓得跪下!”

凤魁无奈,只好遮遮掩掩的说了下那五架秧子的经过。云奶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什么也不说,只是拿眼看看那五。那五在一边又搓手,又跺脚,还轻轻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说:

“我也叫人蒙在鼓里了不是?”

凤魁也替那五开脱说:“这都是贾凤楼的圈套,五少爷是不知细情的!”

云奶奶朝门外作了个揖说:“那家老太爷您也睁眼瞅瞅。这大宅门里老一代少一代净干些什么事哟!”

凤魁很讲义气,把她偷带来的首饰叫那五拿出去变卖了,三口人凑合生活。又过了个把月,北京和平解放了。云奶奶和凤魁这才舒了口气,可就是那五仍然愁眉不展的。凤魁问他:

“有钱有势的地痞恶棍怕八路,是怕斗争、怕共产。您愁个什么劲呢?”

那五说:“你不去,你也没看布告。按布告上讲,八路军在城市不搞乡下那一套。有钱的人倒未必发愁。可就是我没辙呀!八路军一来,没有吃闲饭这一行了,看样子不劳动是不行了。”

凤魁说:“您还年轻,学什么不行?拉三轮,掏大粪什么不是人干的?您读书识字,总还不至去掏大粪吧!”

“说的也是,我就担心没有人要我。”

十三

过了些天,段上的警察来宣布:凡是在北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全算起义。在家眯着的可以到登记站报到。能分配工作的分配工作,要遣散的可以领两袋白面和一笔遣散费。那五在街上看看穿军装的八路和穿灰制服的干部,待人都挺和气。就把他从飞机场拣来当小褂穿的一件破军装叫云奶奶洗了洗,套在棉袄外边,坐车上南苑登记站去。登记站门口排了好长队。老的、少的、瞎子、瘸子都有,个个穿着破军装。那五就在后边也排上。好大工夫他才进了屋。屋里一溜四个桌子,每个桌子后边都坐着军管会的人。那五看到最后一张桌是个十几岁的小兵,就奔他去了。

“劳您驾,我报个到。”

“叫什么名字？”

“那五。”

“哪个部门的？”

“南苑飞机场，我是国民党空军。”

“什么职务？”

“教员！”

那小兵去到身后，从一大叠名册中找出一本翻了一遍，放下这本换了一本，又翻了一阵。

“你是什么教员？”

“唱戏的教员。”

“归哪一科？”

“没有科，票房的！”

这时另一个桌上有个四十多岁的人就走了过来，上下看看那五说：“一个月多少饷？”

那五说：“管吃管住，一个月两袋面。”

四十多岁的人对那小兵说：“你再翻了，国民党军队没有这么个编制！”又对那五说：“要有军籍才算起义士兵，你不在册。”

那五说：“那么我归谁管呢？也得有个地方给我两袋面吧？”

四十多岁的说：“你教什么戏？”

“国剧！我唱老生。这么唱：千岁爷……”

“知道了，你上前门箭楼，那儿有个戏曲艺人讲习会，他们大概管你！”

面虽没领到，可是摸到了解放军的脾气，这些人明知你是唬事儿，也不打你骂你。那五挺高兴。回家把军装脱了，又换上件棉袍，坐电车奔了前门。

前门对着火车站，人山人海。还有人在箭楼下泼了个冰场，用席围起来卖票滑冰。他好不容易才找着道上了楼梯。刚进门楼，就碰上一个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浑身灰制服又干净又板正的女干部。她问那五：“您找谁？”

“听说这儿有个艺人学习班，我来登记。”

“噢，欢迎，进屋吧。”

原来门楼里还隔开了几间屋子。那五随女干部进了把头的一间。女干部在窗前坐下，让那五坐在她对面。“叫什么名字？”

“那五。”

“什么剧种？”

“国剧，现在叫京剧。”

“哪个行当？”

“老生。”

“哪个班社的？”

“我，我没入班社。”

“那怎么唱戏呢？”

“上电台；也上茶馆。”

“您等等吧。”

女干部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回来对他说：“我打电话问了老梨园公会的人，没有您这一号啊！”

“我确实靠唱戏吃饭！”

“谁能证明呢？”

那五眼睛一转，立刻说：“我师傅，我师傅是胡大头！我是胡大头的徒弟。”

女干部笑了：“你师傅叫胡宝林吧？”

“哎，就是他。”那五心里直打鼓，他不知道胡大头还有别的名字，这名字不是他。

女干部又出去了。一会儿领进一个人来，这人也穿一身崭新的灰制服，戴着帽子。那五一看正是胡大头。忙叫：“师傅”！

“哎哟，我的少爷！”胡大头跺着脚说，“如今是新中国了，您也得改改章程不是？可不许再胡吹乱谤了！您算哪一路的艺人呀？”

那五说：“算什么都好说，反正得有个地方叫我学着自食其力呀！”

胡大头说：“您找武存忠去！他有俩徒弟是地下工作者。他们正成立草绳生产合作社，他能安排人。”

女干部听得有趣，忙问：“这位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胡大头说：“他要填表可省事，什么也没干过！”

那五说：“您怎么这么说呢？我不还当过记者吗？”

胡大头顶了他一句：“对，您当过记者！还登过小说呢？”

女干部睁大眼睛问：“真的，登过小说？”

那五说：“登是登过，不过，没写好……”

女干部责任心很强，她虽然分工管戏曲，可是她那机关也有人管文学，就叫那五回家把他的原稿、当记者时的报纸全拿来，另外写一个履历表。

那五一看有缓。千恩万谢出了门。下午就把女干部要的东西全抱来了。他游移了一下，没说那本《鲤鱼镖》是买别人的。万一女干部说那书不好，再说明这来历也不迟。

女干部当晚就看了他的履历，又花几个晚上看了小说和报纸。终于得出结论：此人祖父时即已破产，成分应算城市贫民。平生未加入任何军、政、党派，政

治历史可谓清楚。办的报纸低级黄色,但并没发表反共文章或吹捧敌伪和国民党的文章,不存在政治问题。小说虽荒诞离奇,但谈不到思想反动。文字却是老练流畅,颇有功底。对这样的旧文人,按政策理应团结、教育、改造。等那五三天后来问消息时,她已和某个部门联系好了。开封信叫他上一个专管通俗文艺的单位去报到。

正是:错用一颗怜才心,招来多少为难事!此后那五在新中国又演出些荒唐故事,只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作交代。

射天狼

◎ 朱苏进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密州出猎》

—

电话兵通过轻型被复线，报话兵通过微微摇曳的鞭状天线，同时收到阵地信息，又同声复诵出：“发射完毕！”

寂静最令人不安。此刻，一枚数十斤重的弹丸正在天空飞行。炮口距目标九千五百米，弹丸需飞行四十余秒，对于观察所指挥人员来说，这是个折磨，长得不堪忍受。谁知道将得到什么，远弹？近弹？命中弹？还是最讨厌的“不见弹”？肉眼根本看不见蓝玻璃似的天空会有一颗压满TNT炸药的合金杀伤大爆破弹。它一出炮口，人们就无可奈何它了，任何力量都不能使它停止飞行或是改变弹道。它按照火炮身管赋予它的方向和角度冲上天，然后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都要落下来触地爆炸，迸出六七百块齿状弹片，疯狂地咬向敢于阻碍它的一切。因此，在实弹射击时，弹道所通过的地域常常没有居民地、公路和建筑物，目标区也设在一片大山里。处于弹道下方并抵近目标区的，只有炮兵观察指挥所，他们要观测这只没有翅膀的铁鸟。

可是为什么看不到爆光？这个散布死亡的东西飞到哪儿去了？

副团长颜子鹄放下望远镜——它虽然能使人望得更远，代价却是把人的视野限制在很小范围内。果然，他放下望远镜视野开阔了，看到右前方褐色山坡后面窜出一股烟柱，接着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它大大偏出目标区域。根据响声判断，炮弹炸在松软的土地上。

观察所发出的一片混乱的惊叫，被颜子鹄的高声命令截断：“查图，找出落弹区！”又朝三连连长罗怀牧下令，“停止射击！炮手脱离炮位，叫副连长逐炮检

查。”

营长递过一比五万的军用地图,食指尖指着 一处:“这里。”地图显示,褐色山坡后面是大片农田。万一有人,可就糟了。

颜子鹄朝旁喊道:“小车!”又催问罗怀牧,“查出来没有?”

罗怀牧脸色灰白,担任射击的是三连,射击指挥员就是他。他吃力地说:“射击指挥无差错,问题出在阵地。副连长报告,三炮方向错了一百密位。”

如此大错!阵地上只有四门炮,却有五位连排干部。颜子鹄气道:“我命令你们坐下来三天!”他喊上营长坐进小车,赶去查看事故后果。

小车从凹凸的山坡蹦跳着冲下来,拐上公路,高速驰向落弹区。颜子鹄去掉军帽,双手抓牢车把手,上身倾出车门,在急风中极力睁眼注视迅速滑后的田野。他忽然叫道:“在这儿,停车!”

颜子鹄和营长跑下公路,从长满草藤的田埂旁边,扶起一位年约五十的农村妇女。她已经昏过去了,左肩和小腿处有血迹。蓝头布落在地上,旁边翻倒一个茶水桶,弹坑距她四十米,不知是否受了致命伤。颜子鹄和营长匆匆给她裹扎好伤处,把她抬进小车。远处,一个小男孩正朝村庄狂跑乱喊,十几位群众朝这里奔来。阳光下,一张张惶恐的、愤怒的、惊讶的脸越来越清晰,有人匆忙中还提着锄头和扁担;有人已经看清发生的事情,跑得更快,急声大呼……颜子鹄他们就要落入十分难堪的境地了。

营长道:“阵地有军医,我们快把老人家送去吧。”

“好!”颜子鹄回答着,又望着拥来的群众,对营长说:“你害怕吗?”

“不,我理解他们。但这时候什么都说不清楚。”

“那你就留下!无论人家动口动手,你都不准躲避,不准发作,不准辩解。否则,就处分你。告诉他们事故的真实原因,找到老人的家属和大队领导,很快我就派车来接你们去看大娘。你这儿比较困难,不是低声下气就能取得群众原谅的,越那样人家越气。我们错了就是错了,要认账。但在大错之下也要体现革命军人的品格,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颜子鹄把老人抱上车,关好车门,双臂把老人家拢在怀里。小车平稳地驰走了。他从后窗望去,群众围在大弹坑边上看了看,然后,慢慢地从三面围住营长。营长垂手站着……

小车停在三连炮阵地的通路出口,响了两声喇叭。颜子鹄钻出车,对快步奔来敬礼的副连长吴晓义道:“拿担架,把老大娘抬下来,快把医生找来!”

“谁呀?”副连长吃惊地看着颜子鹄胸前的血迹。

“你母亲!”颜子鹄绷紧脸,无法控制自己了。“大家不是天天喊,我们是人民

子弟兵、子弟兵吗！”

军医赶来半跪在地上为老大娘检查伤情，然后重新包扎。颜子鹄在他耳旁问：“怎样哇？”声音微颤。

“还好。没有伤到动脉和骨头。不过要快送医院。向团里要救护车吧？”

“不等了。”颜子鹄对吴晓义道，“调一辆炮车，把火炮卸下来，把老人家抬上去。出事的是哪个班？”

“三班。”

“让三班撤出阵地，在车上轮流抱着老人家，立刻送医院。”

吴晓义在前，军医在后，抬着担架往阵地后面绕。颜子鹄喝道：“干吗躲躲闪闪，想藏住自己的失败？不准绕，就从炮阵地上过去。”

所有炮手都笔直地站在炮旁，呆呆注视着担架通过。一看到颜子鹄的脸，好些战士心怯地转开目光。老人家醒了，呻吟着偏转头，恍惚地朝火炮和战士们望着。

“呜……”一位战士扶着火炮瞄准具大哭，接着，跳过火炮大架，钻到相思树林里去了，两个战士急忙跟去。颜子鹄估计他可能就是错了一百密位的瞄准手，低声问：“入伍几年？”

吴晓义答：“一年，工作不错，是党员。”

“现在入党真快，军事素质呢？你们要分工一名干部看护他，不能恶化他的情绪，也不能让他改行当一般炮手，他自己要求也不许。他还是瞄准手，下回实弹射击还是要上。”

颜子鹄是强忍着一团怒气走进阵地的，然而，沿阵地走了一遭后，恼怒便化为一种复杂的感情。他看到，炮车通路两侧的树林，竟无碰断一根树枝；田边必定要碾碎的几棵白菜，早已被战士们包着土挖出来，移到通路远处，准备撤出阵地后再栽回去。在重炮和大型牵引车的缝隙里做到这一点，需要多么严明的军纪和良苦的用心啊！用弹药箱板子钉成的语录牌，插在掩体最高处，写着大家最熟悉的毛主席语录和战斗口号。和一年前不同的是，没有林彪的语录了。不过，这能说明他的一切都埋进温都尔汗沙海了吗？群众纪律执行得很好，没损坏群众一针一线。阵地的政治气氛搞得很浓，简直像打一场灵魂仗。不过，他们疏忽了一点，阵地要隐蔽，要伪装，要和现场保持一致。本属于心灵的语言，不必在嘴上重复了千万遍还嫌不够，又制成语录牌竖在最明显的地方，使敌机在两千米高空都能看到。花架子！

颜子鹄走到阵地指挥所，用电话向政委报告了这里的情况。政委说：“我马上到落弹区去做善后工作，你放心吧。问题出在三连，你看还打不打？”

“打，射击还没完嘛。”

“我也同意打,但是要亲自掌握。另外,师里刚才问到明天一连的实弹射击。一连更难办啊。你看他们还打不打?”

政委是忧虑一连连长袁翰。袁翰返乡探亲已经超假,团里两次电报催归,还不见音信。这件事激怒了颜子鹄。连队临近实弹射击,连长居然无故不在位。颜子鹄和政委的最初决心是:就当袁翰“死了”,一连还是要打仗的,让指挥排长代理连长指挥射击。可是,二连出了事故,政委犹豫了:指挥排长毕竟没有指挥过全连呀。

“袁翰的超假,”颜子鹄通过电话说,“属于执意违背命令,性质比三连的偏弹更为严重,简直不像个军人,非处分不可。但连队的实弹射击,我的意见还是打。垮了连长,不能垮掉连队。打好打坏是一回事,不上炮场,这个连队的人心就散了。我坚持打!”

“知道了。”政委放下话机。

二

一连指挥排长坐在车内连长的位置上,这对他简直是过分的幸福,他将占领观察所,指挥全连火炮实弹射击。阵地指挥员副连长,虽是他的上级,也将逐字逐句的复诵和执行他的口令。每个炮手把他的意志填进炮膛,他将看到弹群按自己的意愿爆炸,仿佛是自己手臂延长了,伸过去捏碎了坚固的目标。热爱军事的人谁不珍重掌中的权力,这权力可以实现自己所追求、所热爱的意愿,和渺小的个人权力欲完全是两码事!尽管他嘴上也讷讷地道:“副团长,我怕不行啊。”这是因为他觉得不谦虚一下就太不像话了,其实,他心里早把三连看矮了半截:哼!打个偏弹,练兵练到脑后去了?他储藏下的本事,使他忍住笑意接下重任,那一刻,他深深感激连长袁翰平时对他的培养。

他刚当排长时,袁翰就逼他学习连长的全盘指挥业务,说:“一年以内,你必须成为全营指挥排长中最强的一个!别怕人家说你有当官的野心,那是蠢猪式的嫉妒。不但理解本职而且理解上级的职能,才能更灵活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满足于仅仅完成本职工作的指挥员永无出息。”好几次野外协同训练,实际指挥一连的是他这个指挥排长,袁翰只在边上传达口令,营指挥所都没察觉。有一回,袁翰竟然在“暂停”时睡着了,醒来后苦笑着说:“我也会偷懒啦。说实话,这一套,六四年我当班长时就会了一半。如今当个连长,比那时候当排长还容易,老是这一套程式,好像敌人听我们调动似的。我要是当敌人的话,别人不敢说,咱们营长就会输给我。”

像那时的不少干部一样,军事上幼稚,阅人览世却过早成熟,小小年纪的指

挥排长,因为袁翰急迫地要把他推上连长位置,竟狐疑起袁翰的用心:“连长,上级要提拔你了吧?”

“天真。他们情愿提你,也不会提我。我是大比武出来的,和罗瑞卿握过手,沾上啦。”

“这是暂时的,”指挥排长很坚决地说,“什么单纯‘军事观点’,什么‘骄傲自大’,一打起仗来,人们就会改变看法了。”

指挥排长的坚定信念,使得袁翰对他特别亲近,甚至有些钦佩他。但袁翰的苦恼消散一阵后,重新聚结起来会更重。“算啦,谈起来心烦。你只要做到在任何时候都能指挥全连,就帮了我大忙了。”

“怎么是帮了你大忙呢?”

“等你顶上我的时候,连队不需要我了,我也可以脱军装了。唉,什么时候才有仗打!”

这是一段往事。现在,指挥排长膝头铺开军用地图,手指间夹着一支管状照明灯,不时探头辨认路旁墨堆似的山影,率车按照图上的开进路线奔向观察所。

指挥车跑着跑着忽然减速,驾驶员上身前倾:“看,像是连长。”

果然是袁翰提着旅行袋,出现在公路拐角处,眼睛抗不住强烈车灯,偏开脸躲避着,脚步歪歪斜斜,差点走到路沟里去,好像刚刚从灾难中脱逃出来似的。

“闭灯,停车。”指挥排长很惊讶,连长怎么狼狈到这个程度!他跳下车奔过去。

袁翰几乎连上车的劲也没了,倒身坐在踏板上,背靠着车门,仰头闭目,享受着全身筋骨骤然松弛后带来的畅快。指挥排长“噼里啪啦”地拍去他身上的尘土,连连问话,但没有得到回答。车上的战士纷纷下来围在连长身边。

指挥排长朝报话班长道:“快报告,连长归队了。”报话班长拿起话筒喊开了密语。指挥排长把地图摊在袁翰面前,手指在图上快速移动:“这儿,是我连阵地,这儿是观察所,我们现在正行进到四十公里路标处。基准射向30—00,目标区在天马山北面,凌晨五时完成一切射击准备。副连长率战炮分队从这条路占领阵地了。指挥排齐装满员,‘无线’正与上级和阵地保持联络,‘有线’还没开设。”说到这里,他把指挥包交给袁翰怀里,“连长,你指挥吧!”

两道雪白的灯柱上下抖动着,一辆小车驰近戛然刹住。灯光灭了,但发动机没停转。颜子鹄在黑暗中质问:“为什么停下来?”

指挥排长道:“连长回来了。”

“那也不能停止前进。看你们,都在公路上窝成一团了。”

战士们迅速登车,袁翰端正军帽,上前敬礼。颜子鹄压低嗓音:“你超假整整二十天,什么原因?”

“老婆生孩子。”

“就这个？”

“就这个。”

“这个我知道，你在请假报告上写了。我问你为什么超假？”

颜子鹄等待几秒，没听到滔滔不绝的申辩、对意外事件的渲染、或是絮絮叨叨的检讨。而这些，正是从超假干部口中常常听到的。他很想按亮手电筒照照袁翰的脸，这个违犯军纪的人究竟知不知愧！

“你等待处理。实弹射击仍然由指挥排长指挥，任务不变。”颜子鹄回到车上，重重地关上车门：“开车！”

袁翰问指挥排长：“他是谁？我没看清。”

“刚从军里调来的颜子鹄副团长，恐怕会当团长呢！”

袁翰从颜子鹄的语气和上下车的动作里，预料到事情不妙了。犯了错误，偏偏碰上个新官上任一把火的领导。

指控排长抱住袁翰双肩，动情地急切地说道：“连长，到底为什么超假？说啊，连我都不告诉？”

“确实是老婆生孩子。”

“都好好的吗？”

“好好的。”

“那你为什么超假？”

“唉，你没结婚，不懂什么叫老婆。车上有干粮吧？我饿了一天了，身上只剩三分钱，买个面包都不够……”袁翰难堪地说不下去了。

“你的钱呢？”

“都摔给她了。”

车上战士赶忙递下馒头和咸鱼。指挥排长看见扔在车踏板上的瘪瘪的旅行袋，鼻眼酸涩。连长家庭生活困难，可是每回探家归来，也和别人一样带许多土特产让大家尝鲜，这是连队的不成文法。空手回来，真不好意思见人。连长这回只带来满身尘土和一副饥肠。看来他是被榨干了。

“再给块雨布吧，我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旁山坡上歇一会儿，你们返回时喊上我。快走！副团长准保掐着秒表在前头等着。”袁翰连连挥手。车快开时，他突然跳上车踏板，对指挥排长说，“记住，别抢时间，保证精度。实弹射击比我俩平日练的那些射击法简单，不同的只是带个响儿。你只要不慌，一定能打好！”说完，他跳下车。

指挥排长双手扣紧指挥包，心安理得了，因为连长也愿意让他指挥。等待自己的将是一场痛快的钢铁格杀，等待袁翰的是什么？副团长的命令太冷酷了，连长既已归队，就该让他指挥全连嘛。指挥排长想到这里，激情已经冷却，而激情

对于取胜是不可少的。他的信心碎裂成胡思乱想，对飞快的车速也有些恐惧：“慢点，别慌。”其实他内心却很慌，总在想，自己指挥的这次射击可能比三连还要糟糕。

下车就找不到登山的小道了，地图上明明有嘛。指挥排长和战士们沿山脚急急搜索，蓦然，看到颜子鹄默立在前边，他身边就是小道，可他偏偏一声不吭，准是在气恼指挥排长到的太晚。他看了看腕上的夜光表，大概没超出规定时间，所以仍然保持沉默。

指挥排长庆幸着：找到了路，还没开灯。否则，灯光一亮，准遭来斥责。打得再好也要扣掉十分。

直到下午实弹射击才结束。归途中，指挥排长在四十公里路标处寻找袁翰。他频频按响车喇叭，但不见袁翰出现。他跳下车跑过草坡攀上山顶，才见袁翰坐着雨布靠住一株歪头小松树酣睡。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射击目标区域。指挥排长意识到：不必向连长报告射击结果了，他什么都看到了，他刚刚睡着。

袁翰睁开滞重的眼皮，哑声问：“全部命中，是不是？”

“除了首发试射，那是个靠近弹。其他嘛，时间、集火、齐射，都还可以。”指挥排长的语气仿佛说一件平淡小事。但他毕竟年轻，不善于把巨大欢乐禁锢在心里，笑意最初就流露在眼角，然后一点点扩大，终于变成“咯咯”的欢笑，把滑到身前的指挥包猛力甩到身后。“我做梦也想不到，咱们连打得那么好。不只是‘命中’，完全是粉碎，对，粉碎！炮弹像被目标吸引过去，把目标都炸没了。真的，一点没剩下。真他妈的痛快！”

“别骄傲啊，沾上这个毛病就终生难改。”袁翰站起来叠好雨布，淡淡地问：“那位颜副团长有什么表示？”

“笑，笑！还给我追加四发炮弹，让我多打了一个转移射。”这是真值得骄傲的，全团指挥排长中，没有谁得到过这种幸运。

袁翰有些惊异：“哟，这位副团长还真知道什么是对炮兵的最好奖赏。”

“哎呀，连长，”指挥排长叫道，“人家是火炮专家！秒表一掐，就知道了全连的协同情况。他看出你是有真本事的连长，要不就带不出这样的炮兵连。他问了我好多你的情况，还说：‘一个连队失去连长仍然能打胜仗，正说明这个连长不平常。’他是在电话里对政委说的，我听到后高兴死了。”

袁翰快步走到前面，不能让指挥排长看出自己的激动。啊，有这句话就够了，完全够了。由他批吧、骂吧、处分吧，因为他有一双明辨贤愚的眼……袁翰真想立刻见到颜子鹄。

指挥排长在后面追赶着说道：“连长、连长，你去见见颜副团长嘛，就在那边。他见到你准保高兴，你再把超假的事和他谈一谈，详细地谈一谈，他总有个

家吧,还不理解你!”

“叫我了么?”袁翰止步。

“干吗非要叫,你不会主动点。”

“不去!”

指挥车开到阵地,与炮车会合返回营区。

营区北头的一片营房就是三连,战士们正在炮场上擦炮——即使只打过一发炮弹,炮膛也需要擦洗数次。暗红色的洗刷杆在炮口出出进进,深黄的炮衣平铺在沙地上曝晒。一连的车炮接近时,他们都朝这边看,对各车厢的歌声和欢笑,对一连战士打去的手势和招呼,他们竟无一回答。

袁翰从车门伸出头朝车厢唤道:“指挥排长,三连怎么了?”

指挥排长从车厢弯下身,胜利的欢乐还浅留在嘴角:“噢,他们打了个偏弹,整整偏出去一百密位,伤了一位老大娘。”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袁翰发怒了。

“我忘了。”指挥排长声音很轻,只能从口型中猜出他是这么说的。

“你只想自己的事,”袁翰冰冷地说道,“通知各车,停止唱歌。”

“车距一百米,怎么通知呀?”

“发防空信号。”

指挥排长朝后面挥舞红绿旗,第二部车立刻平静了,同时把信号传到第三部车……整个车队无人高声说话,探出来的脑袋也全缩了回去。喇叭也不响了,各车减速,拉大距离,缓缓通过三连,仿佛是一路哀兵。

袁翰注视前方,白色的营区通路,无尽头地滑进车底。路两旁的小樟树是他带兵栽的,分别两月,好像粗了些,小树叶像人眼一样闪烁着脉脉神情……袁翰恍如进入一个陌生世界。“偏弹,伤人。”这几年来连队的军事水准,怎么下跌得这么厉害。他曾经在三连当过班长,是三连把他培育成射击指挥员的。他心儿忽有所动,直到这时候,他才隐约地后悔自己不该超假。

三

窗内比外面晦暗许多,主要是因为几个烟鬼抽得太狠了。烟雾最初灰白色,还能飘出窗,后来越积越多,竟聚成凝重的蓝色,飘不动了似的悄悄扯起柔软而厚实的帷幕,遮住人们的脸,从而,使彼此不能从脸上看到心语。人们各自陷在自己的深沉情感里。

在这种地方,你不想吸烟也不行,烟能把你硬熏出瘾来。劣质烟草在猛吸中竟跳出一团团火苗,光块与暗影在脸上乱切乱拼,把人脸歪曲得不像个样子。不

安的,忧虑的,没有一张脸是平日所熟悉的了。它们给人的印象比平日强烈数倍。面前的会议桌——除去球网的乒乓球台上,放着一张盖有两颗大印的公文纸,是上级对袁翰的处分决定。营长刚刚宣读完毕,大家等待着袁翰表态。

袁翰沉默许久,简短地说:“我知错。我想好好考虑一下,再向支部汇报思想。”

营长说:“还有两件事。刚才颜副团长打电话来问,你们谁向全连战士公布处分决定?”

“我。”袁翰拿过决定,他明白颜子鹄问话的意思:必须向全连做检讨。

“下午三点,全团在团部大操场集合,宣读上级关于三连实弹射击出现偏弹事故的通报。”营长望着袁翰,“时间快到了。”

“集合吧!”袁翰随即起身。指挥排长快步出门。袁翰先回宿舍喝了口水,让激动的心情凉下来,然后整好军容,走上炮场。

全连已成四列横队集合完毕,看战士们笔挺的身体和紧张的眼神吧,指挥排长一定先说过什么。

“立正!”

如果精密测量,可以发现袁翰是发令后第一个完成立正动作的。他酷爱此令,此令振人心魄。看,全连霎时凝聚成一群雕像。手足、腹部、脊椎、目光、表情甚至内心欲念,全部固定进条令规范,生命被此令锁住,力量压缩到临炸前的瞬间。每片衣襟驯服地贴在僵硬的躯体上,蚊蝇可以恣意蹿上他们的脸庞……这口令控制的一个整体,可以随你出征任何一个经纬点。

“稍息!”袁翰举起那张公文纸说:“上级决定。”全体立正。“炮兵团榴炮营一连连长袁翰,在今年九月至十月探亲期间,擅自超假二十天。为严肃军纪,教育本人,决定给予袁翰以行政记大过处分!听清楚没有?”

“清楚!”声音稀落。

“清楚没有?”袁翰高声问。

全连振奋地回答:“清楚!”

“今晚,我在全连大会上做检讨,现在到团部大操场开会。向右转,齐步走!”

一连进入大操场时,全团都朝他们望去。那毫无杂音、顿打地面的整齐步伐,袁翰响亮的口令和全连海潮汹涌般的复令,战士们帽檐阴影下一双双正视前方的眼睛,仿佛是来比武的。他们的威风与豪气竟使人们连呼吸也轻细下来。

袁翰很激动,这么好的队列,他当了五年连长也很少见到,他感激战士们,又觉得对不起他们。

“好啊……傲啊!”颜子鹄心内响着两个声音。

各连整队,上千人聚成方阵,颜子鹄站在与全团排面成等腰三角形的指挥

位置上,目光掠去,一眼就认出哪一片是一连。他们普遍比其他连队的战士黑些瘦些,一声向右看齐,腹部回收,胸脯一概挺起来,胸兜里没有凸出香烟盒、打火机之类的杂物,也没有歪腰扭腿、抽动腮帮子的。这高质量的队列,就像一串环环相扣的铁链,胆小鬼夹杂其中也会勇敢起来。有的连队也笔直站立,也昂首不动,实际上差得远呢。严肃的面容下面,也许鼓个吃得太饱的肚子;宽大裤管里,可能有悄悄放松了的膝部关节。老兵熟谙此道,不用劲也站得挺像样。新兵只知憋足一股憋劲,脸儿让血冲得通红,身子明显倾歪,还以为自己站得最直。入伍第一课目就是队列,可是服役三年也未必能来个标准的立正,你也是一身军装,但绝不是完全合格的兵。没有对操场、对机械般动作的痴爱,没有指挥员的威力,就得不到一行真正的队列。

颜子鹄目光又回到一连,这个整体中最触目的部分。唉,这支连队虎威与熊力兼有,可惜也像公鸡那么骄傲。一些战士,甚至为获得骄傲的评语而骄傲。“你们想骄傲还骄傲不起来呢!”元帅和将军离他们太远,眼前最有本事的就是“咱连长”。袁翰好像生来就不信任太谦虚的人,手下几个班长都有点“傲骨”,外出执行任务,使得外单位领导喜忧参半,要使出通身本事才能领导他们。

颜子鹄的声音传至最后一排战士耳里,仍然有力有威:“刚才各连入场,哪个连最好?”

“一连。”

“我最不满意的,是大部分带队干部的口令。”颜子鹄逐个望着队列前排的各连干部,“软声软调,破锣破鼓,男不男女不女,比我这半条喉咙差远啦(他的脖子挨过弹片)。一个炮兵指挥员,必须在炮声中把口令喊出去,还要保证每个炮手在炮声中听到,不仅是听到口令,还要从口令里听出你的必胜信心!我要求你们平时的口令要和战场上一样响,不然的话,到时候你就喊不出来。现在给你们一个标准。袁翰,站到这里来。”颜子鹄用脚跺跺立足点。

袁翰跑步出列。

“一套队列口令。开始!”颜子鹄下了命令。

袁翰采取立正姿势,根本看不到他鼓气、用力,便发出了音调不高但极有力度的声浪,仿佛是门小炮:“立正!向右看齐!……”

全团都在执行他的口令。喊毕,他主动入列。颜子鹄回到指挥位置,大声道:“下次全团集合,各连带队干部的口令,必须达到袁翰水平。回去,你们自己练!”

四

从团部归来,一连战士显得很安静,几乎没人到连部里走动,只从宿舍门窗

朝这里望上一眼。好像都这么认为：连长遭难了，再像以前那样随意说笑，就太没良心了，连长现在需要静静待着。

袁翰闷坐在屋里，忽然感到说不出的难受——缺氧似的。他透过窗玻璃看到空旷的炮场、冷清的炮库和安静得有些反常的战士，这不是他熟识的连队了。孤独可真难受，他受不了别人用怜惜筑起来的墙来包围他。看看表，竟吃一惊，他快三个小时没在班排露面了。他振作精神走出连部。

远处的岗哨有些懒散，像在晒太阳。袁翰瞟他一眼，他立刻振奋地持枪立正，钉住不动。进了排宿舍，战士们纷纷起立，有一位脑壳重重碰到上床铺板，疼得他咬牙红脸，却直直挺立着不肯揉一揉。班长抱怨地看他一眼，嫌他在这时候出丑，然后注视着连长。周围的瞳仁里都流溢着热切的关怀，像在问：有什么心事？说吧，瞧，我们都在这儿呢。

深沉而笨拙的安慰，更使袁翰心里难受。他在这世界上除开妻子，最难割舍的便是这些战士们了，是他们把他从妻子那里夺了来。说实话，两道电报催归令，都不及来自他们的引力能量大。虽然，他可以随意指挥他们，象随意动弹自己的手指头，但他们一双双眼里，不也正向他的心发布命令吗？“你属于连队。”袁翰很想燃起快活的气氛，用坦然的笑容啦，又酸又辣的趣话啦，亲热地碰碰肩膀啦，让他们宽心，别为自己担忧，袁翰还是以以前的袁翰。可惜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还容易被人家的感情感染，他常为此诅咒自己军人气质不足。

你看，通信员肩挎邮件包从营部归来了。袁翰矜持地转开脸，而脑后好像长了眼睛，感觉到通信员越走越近，心也随着那脚步越跳越紧。他焦急等待着，但通信员没唤他，略停顿一下便走过去了。没信，他心儿白白恍动了一阵，重被忧虑失望攫住。没信也好嘛，说明她们平安无事。嗯，明天肯定会有……自从他归队后，他妻子一封信也没来过。

一位面容憔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五六岁的女人，散乱着头发，斜倚在床边，失神地望着床上两个睡去的婴儿，好像一直要望到婴儿大起来才罢休。这就是他妻子的形象，浮上心便难拂去。他月薪五十三元五角，妻子是半工资半工分的民办小学教师，家里有一位老人还有一位在外地上学的妹妹，都依靠这些收入。袁翰像个一月只拿六元钱的新兵那样谨慎开销，把大部分薪金寄回家。干部们讨论应该给他困难补助费时，他好羞啊，没勇气看他们，也没有勇气拒绝那几十元钱，每年都要被这样折磨一两回。妻子四年不孕，今年居然生下一对双胞胎，都是女儿，只比袁翰的手掌大一点儿。姊妹俩给父亲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世上竟有这么小的人！他不敢抱，怕她们从掌中掉下去，又怕捏痛了她们。他用手手指头轻碰她们那细嫩的脸儿，手指简直没有触觉。他的心被一种猛烈的情感碰痛了，说不清是喜是忧。他甚至担心自己的呼吸会伤了她们，屏住气息，俯身下

去,瞧精密军用地图似的瞧她们玩偶般小巧的鼻子、嘴儿。他分不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左边那个蓦然啼哭,在襁褓里很有劲地划动手脚,袁翰吓了一跳,于是,便暗暗唤她“大姑娘”。婴儿的哭声是父亲心灵里的壮歌,在啼声中,他感到翻滚而来能够淹没一切的情感狂潮,恨不能朝什么凶神恶煞扑过去,捣碎了它,看护好两个可怜的小天使。

妻子心里一阵滚热,她从袁翰瘦脸上的爱怜猜到了自己的变化,于是投去感激的一笑。笑容停在嘴角,显出早衰的皱纹,反给丈夫留下一片苦涩。每当半夜,妻子给孩子喂奶,放下这个抱起那个,脸上涌出病态的红潮,两眼痴热地望着怀中婴儿,袁翰就很痛苦,恨自己不是女人……假期的最后一周,夫妻俩时常沉默,目光碰一下又躲开。一到黄昏,妻子就轻声叹息,终于,她提出来,让袁翰给部队发个请求延长假期的电报,即使不批准,等答复也可多住几天。主意很乖巧,但袁翰认为那是老兵油子拖延假期的手段,不肯办。妻子抱怨袁翰只顾自己的名声不管家,小女儿好像有病,吃了就吐,做父亲的能撂下就走吗?她气道:“你要走,抱一个孩子去,我养不活这么多,血给她们喝也不够。”袁翰那天累极了,肝火特别旺,顶撞道:“养不了干吗一家伙生两个?”话刚脱口,他就被妻子晕眩的模样吓坏了。最后一天早上,袁翰起身,见妻子睁大两眼也要起来,他急忙按住她,“别动,我自己来,我什么都会。”妻子一动不动,只有眼睛随袁翰身子转着。袁翰点火、做饭,吃了些东西,提起旅行袋,走到床边和妻子告别,妻子却侧过身去:“你走吧!”手护住两个睡婴。

南去的列车晚点了,烦躁中的时间就显得特别长,看谁都不顺眼,恨不得碰上个无理的人吵上一架。袁翰极力抑制着,规规矩矩坐在门旁靠椅上,看大墙上的车票价格表,计算路途花费,总是神不守舍,一会儿算多了,一会儿算少了。

“快呀,叫爸爸。”一位年轻母亲把小女儿往前推,迎向一位高个儿、被海风吹黑了脸庞、畅快笑着的军人。这人提着两个鼓鼓的旅行袋,还有一挂香蕉,显然是刚下火车。小女儿正在受罪,小胖脚儿迈上一步,就回头求救地看母亲,母亲急声催促:“快呀,快呀,别怕。”(这个“怕”字让袁翰心酸)军人等不住了,雄鹰似的展开双臂,搂住小女儿。小女儿猛一挣扎,从军人怀里漏下去,跌进母亲怀里,小手死死揪住母亲的衣领,哭着往她身上爬。哭声惊扰了候车的人们,父亲狼狈地忍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蓦地,他看到袁翰,认定这是个知音,便朝袁翰苦笑,以解脱窘境。袁翰呆子似的毫无反应。母亲抱着小女儿和军人一起走出候车室。小女儿在母亲怀里还竭力躲远那位军人,但不时从母亲脖子后头偷看。他们不知道,这短短的几个镜头激起袁翰的思绪翻腾。

车站广播喇叭又发出通知,袁翰要乘坐的那列车又要晚点到傍晚,又得等九个小时。他本不想回家,可是,在车站外烦乱地踱了几分钟后,忽然意识到:要

再这么踱下去,就会引来行人的疑视,交警的大喊,甚至医生的关注了。他下定决心,快步回家。

妻子从桌前仰起头,惊异的眼里满是泪水。她在给刚刚离去的狠心丈夫写信。

袁翰走近,她站起身扑过来,头顶着袁翰胸膛,撞了两下,靠住他肩膀,剧烈地啜泣。笔在桌面上滚了很远。“别哭,别……”袁翰安慰着,但妻子却止不住。唉,能在丈夫怀里哭,也是幸福的,你怎么会知道呢!

桌上半截信写着:

袁翰:我的救星,求你转业回来吧,做军人的妻子太痛苦了,一年十二个月,你只能给我一个月,刚刚熟悉共同生活,你又走了。就是这一个月里,头十几天痴狂,匆匆忙忙跟偿债似的。后几天发慌,老是想:你要走了,要走了,中间又有几天安稳日子!我是个弱女子,受不了没有依靠的生活。看见这两个小女,我好害怕,简直不知道怎样把她们养大。老是想:她们会从床上摔下去,会给什么东西咬一口,会发烧……总之会死在这怀里,真是怕极了!这些念头你在时我没有,你一走就冒出来,我是不是疯了。还有经济问题,今后几年我们会很困难,受不了两地生活的花费,还是苦在一处吧……

袁翰迈不动腿了,一拖就是二十天。他写过延假信,但写不下去,没有“过硬的”理由,又不肯编造或是夸张,于是,干脆不写。“写那个还不如写检讨报告呢!”他甘愿承担一切后果,也许因此转业,他隐隐有些高兴。

妻子把部队拍到她单位里去的两封电报,都藏了起来。袁翰在家的日子,她总觉得是自己偷来的,因此一点幸福感也没有。

五

整幢房子都用大块花岗岩石砌成,它是战士们自己采石盖的,笨厚牢固又显得威武,好像砌进了他们的某些性格。太阳已经西斜,花岗岩正在散发下午吸收的热量,靠墙便感到暖意。西头一大间是团党委会议室,全团战士每日的工作、思想、乃至梦里的部分内容,都会在这里被研究、被决定。会开完了,颜子鹄想去一连和袁翰谈谈,他在房外两株塔状扁柏之间踱步,等候小车到来。这几分钟时间里,他整理着对袁翰的印象。

去年,师司令部就要调袁翰去当作训参谋,团领导通过努力把他作为储备作训股长留下了,计划让他在副营长的位置上熟悉一下营的工作后,就负责作

训股工作。档案材料都报上去了,政委准备他探家归队后找他谈话,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却超了假。师长很恼火地质问:“炮团怎么搞的,刚刚报袁翰当副营长,马上又得处分他,你们怎么考察干部的?袁翰超假是什么原因,他到底想不想在部队干?你们要就这个情况,专门写个报告。”

袁翰的超假,使团里几位领导很伤心,他们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显得太弱了。袁翰的超假不但损害了自己,也损害了看重他的人。

颜子鹄对袁翰感到兴趣,接触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在袁翰内心世界充分暴露的时刻。这时看上一眼,可能比相处几年更能了解一个人。“他会带兵。”颜子鹄最爱这点。一连的军事素质就是强于其他连,连队是连长的镜子。袁翰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比如说骄傲,唉,有点本事的人怎么常有这个毛病呢?有的人藏住了,有的人藏不住,当然也有人纯粹因为别人强于自己,就送人家一顶骄傲的帽子戴戴。袁翰的超假完全是因为骄傲吗?似乎也不一定。他过去组织纪律性一贯不错,如今明知超假会受处分,他还是敢超,恐怕另有原因。也许他真是不想在部队干了?颜子鹄最担心的就是这点。不想干的人,任凭你有天大本事,也不能长久留用。

小车在一连炮场边刹住,颜子鹄透过车窗望去,一连副连长正组织炮场训练,各炮手无一被突然而至的小车所吸引。这个小细节让颜子鹄高兴:有些挺过硬的连队里的战士也常在一瞬间走神,这一瞬间常造成一百密位的误差。

颜子鹄用手势告诉副连长:干你的吧,不要中断。他走进连部找袁翰。

“我是想转业的。”袁翰垂下目光,不看颜子鹄眼睛,说话胆子更壮。他一直暗中期待颜子鹄来看自己,但头一句话就使颜子鹄心凉。“我不像有些人那样,成天叫唤‘岁数大啦,放咱走吧’其实他不想走,那是一种牢骚,是提醒领导:自己在这个职务上干了多年,再不提就不干了。我可真心想走。家里有困难,不走怎么办?像个别人那样闹,甩手不工作,处处跟领导为难;或是老提一些你根本解决不了又是实际存在的问题,让你觉得刺头,不得不放……这些鬼名堂我比他们知道的还多,但实在做不来。对这次处分我完全接受,超假二十天再不处分简直没有军法了。如果我当领导,也许得给袁翰来个更重的处分。干脆说吧,这个处分是我自找的,当时有个念头,处分就处分吧,不受这个处分,你们老觉得袁翰太好用了,没一点个人问题。”

“这个念头,和你说的闹转业的作法,性质一样。”颜子鹄严肃地说。

“但是我说出来了,难道要再来个处分?我原本可以什么都不说的,可以用其他办法达到走的目的,而且不受处分。”袁翰沉闷地扭开脸。

“这倒也是事实。说吧,我很愿意听大胆的谈话,好多年没听到了。既然连处分也不怕,总该有你自己的道理。”

“处分有什么了不起,失掉了什么?当兵以来,我立过三次功,立功又有什么了不起,又得到了什么?它们统统睡在档案袋子里。这是气话了,我知道这样看问题很不好,但我的经历就是这样。”袁翰朝营部方向伸出手指,“我们营长是个很好的同志,但他没经过严格训练,连炮兵营海湾战斗队形也摆不清楚。要论射击指挥,我的指挥排长在某些打法上也比他强。这样的同志带兵也可以打胜仗,不过十条命能拿下的山头,他要送出去三十条命,然后会说出了三十位英雄。当然不是有意掩盖失误,而是他确实不知道这个山头只需付出十条生命就可以拿下来。在他面前,我特别谨慎,他年轻,经验少,应该撑台,不能拆台。可不胜任的人在台上难受,台下的人也不轻松,我不是想当个什么官,我想走,心里闷哪……”

“想当官不一定不好,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谁不希望手中有权。官和老爷是两码事嘛!懂军事的人不当指挥官,难道把战士交给不懂军事的人指挥?”

“对对,我为这个想法骂过自己,人哪,有时是会错骂自己的。嘿嘿……副团长,我不把你当领导说话了,行吗?”

“行,当然行。”

“你扛枪的时候,我连细胞还没有哩,而你现在仍然是个上了年纪的副团长,不会没有苦恼吧?苦恼是苦恼,于是干!你不用做我的思想工作,你的存在就能影响人的思想。可我也担心,这样干下去不会又是单纯军事观点吧?”

颜子鹄“哈哈”大笑。

袁翰急步在屋内走动,忽然站住,睁大眼:“副团长,咱们偷偷喝两杯吧,已经开饭了。”

颜子鹄不语。

袁翰朝外喊道:“通信员。”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从中翻出一张十元钞票。“去,到小卖部买筒罐头,让炊事班长热一热。”

颜子鹄道:“你这么干,老婆孩子吃不吃饭了?越穷越大方啊。”

“没事,没事。”

“还是说说吧,家里难到什么程度?”

“一个好军人,很难是个好丈夫。”袁翰叹息道,“能给她的都给她了,不能给的抱怨也没用。咱们归部队掌管,不是归自己掌管,这就要求她自立喽。可她偏是个胆小女人,我不在家,天一黑就关门,过年过节更不好受。再有,老子让她一胎生下两个,结果自己当甩手掌柜,扔给她扶养,一个月寄几十元钱就算完成任务了。其他事,就是天塌地陷,反正我看不着。”袁翰从床下摸出两瓶酒,晃晃道,“这是她酿的。”倒上两杯,望下门外,菜还没来,他等不住了:“来!副团长,品品味。”举杯饮尽,然后轻轻吁口气,胸膛急剧起伏,脸上是饥渴的神情,粗声道:“我们是军队,而军队又和战争分不开……”

颜子鹄举起另一杯酒,细细品咂着酒和话的滋味。

哦,战争,你在哪里?我们默默警惕着你,注视着天空、陆地、海洋……

都知道战争不可避免,也都在切齿痛恨它,即使今生不能消除,也愿把它推得远些,再远些。战争的产儿——军人,袁翰他们,便落入两扇感情的磨盘中。对于各种非正义战争的厌恶,他们一点不比世人少,那一杆枪,正是为了把它们驱入坟墓。正因为这样,他心热,神迷,像数学家爱古怪方程式;像雕塑家对着一尊精灵流泪;像老牛温柔地舔着嫩犊;像少女臆想着情人的胸膛……他有他的事业呀。

“有点冷。”颜子鹄扭动肩膀叨咕道。实际上想说的是:有点累。

“这儿有大衣。”袁翰站起来。

“不用,才十一月,穿什么大衣,站岗的都没穿嘛!”每每听到关切的话语,颜子鹄都感觉到另一种意思:“你不行了,没几年干头了,歇着吧。”他自尊,像姑娘需要打扮得美貌些,他也需要显示自己的年轻。可是年轻人总用关切来刺激他,让他正视自然规律。

“不喝了,你也别喝了。”颜子鹄把杯盘推开,“第一,我们不考虑你的转业问题,希望你打消这个念头。第二,我们准备让你到三连去当连长,你一定要把三连带上来。第三,你们营长很尊敬你,想把你的一套本事全学过去,希望你既当好他的下级,又做好他的师傅。这三条,你好好想一想,我出去看看战士们,回头听你的想法。”

在袁翰呆直的目光中,颜子鹄走出房门。

一排二排正在炮场上拔河,每方十五人,拽住一根胳膊粗的拉炮绳。二排总是被一排拉垮。颜子鹄是这种观众;无论看什么比赛,总是希望弱队取胜,然后笑呵呵地把强队挖苦一顿。四班长对颜子鹄说:“一排要参加师里比赛的,我们是陪练。”

颜子鹄大为不满:“输就输在多了你。你下来,你们十四人和他们比比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拿出勇气来赢他们。我就别下了吧,多个人多份劲,他们也是十五人嘛。”四班长分辩着。

“不不,你还是下来歇歇,多个人未必多份劲。”

四班长下来了,满脸委屈、不平的样子,心中盼望自己排输。再战,系在炮绳中央的红绸又渐渐拉向一排阵地。“顶住!”颜子鹄大喊,酒后的嗓子发出的声音格外刺耳。“一——二!一——二!”他在旁边竭力统一二排的动作。结果二排胜利了,他们把一排拉垮之后,统统摔倒在地上,喘息着,欢叫着。

颜子鹄回到连部,他相信袁翰会有一个正确态度,会干好新的工作,起码会强迫自己干好。但他不愿意完全靠命令的力量去推动一个人。他想和他深长地

谈一谈，他基本上还没谈呢。

袁翰醉倒在床上，发出急迫、不匀的呼吸声。看来他不善饮酒，醉得这么厉害。颜子鹄把大衣轻轻盖在他身上，伫立许久。

六

三连的这些兵像屋里着了火，统统拥出房门，散到宽敞的炮场上，一个碰一个地往前挤，争着站在别人前头。有些人并不知道出来干吗，只不过见别人往前挤，他也就挤别人；别人一激动，他也有些气息不匀了。新兵一般不注意控制情绪，一瞧见什么，就吃惊地张大各种型号的嘴，眼球儿统统给冻住，怪可爱的发呆。穿破几套军装的老兵，矜持地居于后排，像大哥哥把好位置让给小弟弟那样。他们对新兵惊惊乍乍的事不屑一顾，否则就显得太浅薄了。这回可有些不同，他们虽然从人群里退出来，可锐利的目光仍然射向连部。那儿停着一辆摩托，“吭吭吭”地咳嗽，全身不停地抖动。本来没有熄火，驾驶员还是用十分惬意的姿态猛蹬一下起动踏杆，摩托又雷霆般暴叫几声。他知道有许多人看自己，他尽可能地显示出不同于别人的样子。

排长们朝连部奔去，战士们纷纷让路。不一会儿，值班排长跑出来喊：

“注意军容，准备集合，新连长到了。”

新兵们判断事物的重要与否主要凭据老兵的脸色声调，这最保险。此刻，他们严肃起来，提前回屋扎上腰带，端正军帽，出门后彼此靠拢，会意地交换眼神。有几人腰带扎得太紧，把人束成了一只葫芦。偏偏有几位顶老的老兵，像是吃腻了这一套似的，别人越紧张，他们越随心漫意地走动。

吴晓义把集合好的队伍带进饭堂，饭桌板凳都已退居墙角。袁翰站在场地左侧，纹丝不动。大家刚跑进屋时看不到他，然而看到后，就强烈感到他的位置和姿态都强化了他的权威。

吴晓义向袁翰报告全连集合完毕。袁翰打开花名册“晚点。”

全体立正。袁翰惊异地抬头，他听出：靠脚无力，声音杂乱。这是他到三连后的第一个印象：作风散漫。如果在一连，他非得重来一遍不可。此刻他忍住了，不想给战士一个急匆匆树立威信的感觉。他开始呼点姓名，结束后，开始自我介绍：“有的同志可能听说了，我刚受过处分，有的同志可能还不知道，那就不用到处打听了，我把上级的处分决定再宣布一遍。”袁翰清晰缓慢地把处分决定背诵出来，然后谈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向大家做了检查。“情况就是这样，来了个受过处分的连长，希望不伤害同志们的自尊心，我决心在工作中改正错误，希望同志们监督帮助我。但我这次调动工作和犯错误毫无关系，该管的我还是要管，绝不

会因为自己犯过错误,就降低对同志们的要求。我也是有自尊心的,说实话,决心改正错误的连长,干起工作来可能更努力,也可能有过头的地方,请大家有个思想准备……”袁翰注视一位战士,正要唤他,一声闷响,那个战士跌倒在地上。周围人急忙扶他,再远些的人,扒在别人肩上伸长脖子望,一片惊异的议论:

“他病啦?”

“缺氧,快开窗子。”

袁翰已经看出那战士眼神发散,上身钟摆似的摇晃。这在未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中经常见到,体质弱,适应不了挺拔稳固的站立。使袁翰气恼的,不仅是昏倒一个人,而是昏倒一个人之后,竟然丧失了整个队列。他大声发令:“立正!本班班长把他扶下去。还有谁感觉头晕,手脚发凉,立刻报告。”

“我。”又一位胖胖的战士在后排低声道。

“出列,不准躺下,到操场上去走三圈!”

袁翰再次整队,他一直笔直站立。

“条令规定,晚点名最长时间不超出三十分钟,现在只有二十五分。在十九分时倒下去一个,二十三分时又退下去一个。两个同志一个是连部的,一个是炊事班的,说明这两个单位很少出操。当然,责任主要在我们干部,我们要求不严。这两个同志不错,如果他俩在队列里马马虎虎动手动脚,就不会昏倒了。我重申队列纪律,在队列中,口令指挥一切。没有口令,不准乱动。明天的工作:早晨,全连出操……”

队伍带走后,后排剩下一人,是营长。他两眼若有所思地、凝神地注视袁翰。袁翰很不自在,他受不了别人目光里的探究意味,特别是这位年轻营长。他暗想:干吗要这样看人,领导者的特点?

营长坦率地回答他心中的疑问:“三连长,我现在知道咱俩一块训练时,你为什么那么难受了。你应该像刚才对待战士那样对待我。那样,我可能学得更多更快些,你也不会感到难受了。对吗?”

营长这几日正跟袁翰学习射击指挥中的大间隔转移射。袁翰羞愧地笑了。其实,那样做更难,但他决心做到。他用营长刚才注视他的目光注视营长了。

七

三连原连长罗怀牧,已被命令转业,见袁翰和营长走过来,夸张地惊叫:“哎——乖乖!”大笑着,头一个迎上前握手,探身在袁翰耳旁道:“三连的救星到啦。”

干部们齐聚会议室后,罗怀牧却不进去,一手握住门把,一手摆动表示告

辞：“你们忙吧，我该退出了。”没等营长说话，他关上了会议室的门。

袁翰送走营长，刚回到宿舍，就听到窗外有人唤道：“老袁，给你送来啦。”话音刚落，罗怀牧像端着一桌丰宴，用阔大的射击图版端着指挥包、望远镜、手枪、红绿旗、照明具……全套连长装备，步履轻快地走进来，往袁翰床上一倒，舒畅地道：“我算解放啦，让他们跟你立大功吧！快点，一粒子弹一把指挥尺都不少，我从来不把连队的东西带出连队。”

炮连长的装备里有不少美观精巧的小用具：三用照明笔，综合指挥尺。这东西军事上能用，地方工作也能用。每任连长移交时，上了簿册的大东西不会少，小玩意儿就很难说。也许是想带回家给孩子，也许是贪恋太重，藏进怀里做终生的纪念物了。如同离开大海时采走一支珊瑚，它是感情的凝结。

袁翰不肯点，意思是：你不会拿的，即使拿走什么也不要紧。罗怀牧受不了这种信任，逼着袁翰清点。袁翰在清理时发现，不但没少，还有好几样自己用有机玻璃制作的图版量具，做得那么精致，现在也乱糟糟地倒在自己床上。

罗怀牧坐下，感慨地说：“三连的突出问题是军事素质差，素质！”他强调着，“这不仅是个时间的精度问题、战士问题，还有干部……你多大岁数？”

“三十。”袁翰有点意外地回答，接着也就明白他让罗怀牧失望了，作为连长，这个年龄无异于“年过半百，两鬓斑白”。

“你老人家有前途啊，”罗怀牧戳一下袁翰，“知道吧，差一点当作训股长呢！作训股长常常是参谋长的接班人，参谋长常常是团长的接班人……”罗怀牧一声响过一声。

“你饶了我吧，我当个连长不戴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就万岁了，别的啥也不想。”

“哈，想不想是你的事，”罗怀牧眯起眼，“把一支后进连队交给你，正是重用你的表示。我可以预告：第一，三连会在你手里改变面貌，我还不了解你！第二，改变面貌后，上面即使不提你当股长，也会提你当营长。”

“对下级来说，最宝贵的就是上级的信任，我真怕让上级失望。”

“你不该这么想，三连要靠你。你来了，我走得安心。”

“我想努力干两年，带出一支让领导满意的连队，然后转业回家。”

“矛盾就在这里，你干得越好，领导越留你干，年纪大了，再转业就不受欢迎，官越大越不好安排。就拿我来说吧，我要回去的那个厂子才二百来人，你知道有多少领导干部？党委书记、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十几个呀！还不算没解放的老家伙，把我往哪放？亏我只是个小连长，塞到政工科就行了，可批走资派，批唯生产力论，批……谁知道以后还有什么花样，都得从头学呀。所以，让我走也好，趁还不老，到地方上可以重打鼓另开张。我惭愧的是，没有交出一支

好连队,最后一次实弹射击,偏弹伤人。我打过十几回优秀,可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弹……”见袁翰面容阴郁,他把话收住,“我真可恶,自己跑了不说,还干扰你的决心。谈话,谈话,你忙吧。我卸任后也忙啊,不过是自己忙,以前没工夫啊!”

罗怀牧经过窗户时又站住,探进半截身子:“哎,现在我是老百姓,咱俩是军民关系,所以,有些没把握的话我也敢说,供你参考嘛。你没来时,吴晓义以为他会当连长,我看出来了。这个同志好抓权,爱管事,我的方针是‘让他管去’,管得越多越好,我和他相处得挺融洽。我看,你也要用这个方针才是。”

袁翰初到一连当连长时,曾有一位副连长是和他一样的强有力人物,两人磕磕碰碰特别多,过了好长时间才谐调起来。两个强手相处如同两把同型号钢锯相对,配合不好,每个钢齿都顶在尖上,互相损伤;配合准了,每一个齿儿都可以嵌进对方的凹处,严丝合缝。这种人,有时嫌,有时想,友谊很难保持在一条水准线上,总是大起大落,崩溃了再重建,冷了的目光再热起来。袁翰沉吟一会儿道:“放心,我不会把自己的尊严看得太重。”

“哎,听说你得了一对胖丫头,来来,拿照片让我欣赏欣赏。结实吧?漂亮吧?”

“没照片,真的没有。”袁翰又想起两个婴儿,她们不但瘦弱,而且更谈不上漂亮,营养不足啊。袁翰眼睛潮湿了,妻子到现在还不来信!

“我有俩小子,咱们结亲家吧?”罗怀牧笑着走开了。他拨翻了人家的苦水,让人不得不再次吞咽,他全然不觉得大咧咧地离去。

袁翰迈下台阶,走到水泥篮球架下。这时,天完全黑了,明月在身后,把他浓黑的身影投到面前,他动,它也动,仿佛在给他引路。几颗星在寒气中颤抖,他望着它们焦虑地喃喃着:“快来信吧,快……”

袁翰走进排宿舍,灯关着,战士们都已睡去。凡是军营,床位排列都是一致的,袁翰在黑暗中也不会撞着什么。但他恍如走进一个梦境,身子竟有些不稳了。“哧”的一声,他觉得踢走了战士一只鞋,于是蹲下身去摸,把它和另一只并列放好。万一紧急集合,战士起身就可以习惯地踩住两只鞋。袁翰稍稍平静下来,于是听见在四周起伏的、高低不同的鼾声。啊,战士的鼾声有一股奇妙力量,它使你身心宽解,感到夜的安宁。它像把你浸润在平缓的河流中,温柔而又轻盈地浮动着,忘却烦恼。

八

袁翰看着通信员的手伸进邮件袋,拿出来的不是信,而是封套上豁然印着

两个大黑字的电报。通信员说：“连长，你的。”

袁翰背过身拆开电报，上写：两女病重速归。“糟糕，两个呀，要毁了！”那一行字是黑色路标，总把他的思虑引向死亡的崖头。怎么办哪？不可能回去，只好用老办法——寄钱。袁翰把全部钱都找出来，只有十四元三角，向别人借吗？真不好意思，刚上任就借钱，这就是来改变面貌的连长？而且，只要你借过一回钱，别人就记住你了，干部们讨论困难补助时，目光自然转向你。原先领困难补助费的同志，因为你的到来，便反复推让。在一连受过的窘迫又要在三连继续下去，以至于你想改变也改变不了。再说各人觉悟水平不同啊，那几十元钱是烫手的。四周目光忽明忽暗、有冷有热……

他赶到邮局，在汇款单上填写“拾叁元”几个字时，不禁抬起左手遮挡着，继而又对这个动作感到痛楚。尾数既不是五也不是零，而且是寄给妻子的，这等于向她表示：我枯竭了，从而让她更加难受。妻子的同事会用怎样的神情把汇款单交给她呀，她接过去时能保持平静吗？霎时，袁翰竟想把“拾叁”改成“拾”，或者等下月薪金发下来后一块寄去，但这些念头都让他感到羞耻。

回到连队看到战士，袁翰才镇定下来，连队的事物和气氛令他高兴。侦察班从营部考核归来，正在擦拭观测器材。他走过去问：“成绩怎么样？”

“咦，报告过你啦。4.9分，高水平的优秀。”胖胖的炮队镜手说。

“哦……我忘了。”袁翰歉然道，恢复了往日的带兵习惯。“那么，不足在哪里？”

“我们这次考得最好，最大误差才0.5密位。不足嘛……当然要继续努力。”后一句话也是习惯，仅仅是语言习惯。

“我来个小考。”袁翰觉察到他们的自满情绪，说：“占领观察所，通常是近敌隐蔽前进，而且要快。现在，前面那个小高地，大约五百米，就是观察所，够近的吧？实弹射击还难碰到这么近的观察所哪。跟我来。”

袁翰带着侦察班向前跑去。他开始速度并不快，后来越跑越猛，最后弯腰冲上小山包，命令道：“基准射向15—00，架器材！”

侦察班一个没落，在袁翰两旁半跪着，一边喘息一边架设器材。赋予射向是一套精细动作，又是观测技术的基础，非要心静气平不可。两个战士连居中水泡也控制不住了，费了很大劲才架设完毕。袁翰又命令他们拆收器材，以更快的速度跑回连队炮场，重新架设器材。这时他们只有喘息之功，没有架设之力了。

“我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吗？”袁翰问他们。

“没……有。”炮队镜手苦恼地拉长声调，“不过这样做，太难掌握了，最好有个具体标准。”

“有有，你跑瘦了，就达到标准。说实话，炮队镜手不应该这么胖。以后任何

一次外出训练,都必须跑出去,再跑回来。平日里少喝水,多打球,上场就要猛打猛冲。连队的球场不是为了出篮球健将,而是为了出强兵。”

袁翰在炮场边走边看,各种训练计划交替在脑海升现。他重新享受到事业带来的快感,两眼特别清爽,听觉特别灵敏,全身暖意涌流,这差不多是幸福了。……通信员又从旁边冒出来:

“连长,电报。”

袁翰呆了几秒钟才接过去,依然是背转身拆开:两女病危速归。

统共才几小时啊,死神就来找他两次,都是在任新职的第二天。他默默走出炮场。开饭哨响了,声浪震动他耳鼓,但他似乎没有听到,他已经明白,很快,也许就是今天,还会接到第三封电报,上面写着他多次默语又竭力躲避的字眼。既然要来就快些来吧,大痛之后会有复苏,希望总是跟在困难后头。然而来之前的时间怎么度过呀,他在无人处不停地走着。

山洼里响起枪声,袁翰眼里闪出微弱的光亮。

修理所两位同志刚完成一挺机枪的大修,正在这里试射,二百米处插着一个墨绿色全身靶。袁翰从左前方出现,一人对着他大叫:“没看见小红旗吗?退后退后,小心飞弹。”

袁翰走上来低声请求:“让我打几发吧。”语调和神情让人心软。

“想过个瘾?行啊。”

袁翰卧倒,端起枪把,“哒哒哒……”但他心里断续响着这个声音:“会毁掉的,会的。”十几发子弹射完,又接上弹带,他扣动扳机,枪身发狂地抖动,渐渐发热,暗红色火舌不停地从枪口喷射出去。靶子下方一块水牛般大的黑石头,被子弹打的碎渣四溅,出现了许多白点,渐渐密布,相连,扩大,最后大石头上只剩几个黑点了。子弹打光了,着靶的无几。他听到修理所同志喝止的声音,爬起身来。

“你是一连的袁连长吧?”他们仍唤他两天前的职称。

“是的。”

“打炮还不错,打枪真差劲。”

“是的,差劲。”

袁翰感谢了他们,平静地往连队走去。营长站在门前正焦急地四处观望,见袁翰回来了,便关心地问:“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的意见呢?”

袁翰明白,只要自己说一声“回家看看”,营长也会说一声“好吧”。但袁翰想了又想,说:“我离不开,这里更重要。我是连长,不是医生。”

“你回去吧,我可以来代理你的职务。”

袁翰急于工作,再不想什么电报了。对于自己无能为力的事,苦恼越久损失越大。中午,他列出了下一季度军训方案,拿着它去找罗怀牧商量。一路暗暗叮

哼：家里的事，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一点声色都不能漏呀。否则，他会觉得自己转业，走对了道。

袁翰没找到罗怀牧，却碰到吴晓义。

“他呀，忙啊。”吴晓义笑着，“往那儿走，仓库左边，对对，就那个门，进去呀。”他光用手指点，身体不动一步。

袁翰推开门就脸热了，罗怀牧在用连队的木板做箱子。报话班长入伍前学过木匠手艺，此刻正在板上打线。罗怀牧点上一支烟，淡淡地问：“有事？”

“我想和你研究一下训练计划。”袁翰觉得不是自己的声音。

如果换个场合，罗怀牧会高兴的：自己要走了还被人重视，有求必应。但此刻却不很愉快，推脱地说：“没时间！”

“就一会儿。”袁翰坚持着。

“大一点，再大一点。”罗怀牧指示报话班长，根本不看袁翰。

“连长，罗连长就要走了。当了那么多年兵，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报话班长在为罗怀牧说情，解释。

“说那些干吗，干我的私活。”罗怀牧大声道。

袁翰关门走开。再不走，他们非吵起来不可。吴晓义还在连部廊道口站着，见袁翰独自归来，他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既表示理解又显得神妙，是发现别人并不比自己更强时、无论如何都隐忍不住的一笑。他没说话，进了自己房间。

管不管啊？木板是连队留做军训用具的。战上们知道后会怎样想象干部？噢，你们是大口大舌大道理，首先自己就不相信；你们的觉悟是有时间性的，管我们时比我们高，一脱下军装就和我们一样了，甚至还不如我们哪……不行，得管哪，就是战士不知道也得管。瞧副连长见我的软弱时那张笑脸吧！真叫人受不了。可怎么管，老罗是连长我也只是连长。退伍转业的军人最难对付，天老大他老二，就是师长军长，他们也敢笑嘻嘻顶撞几句。再说，老罗当了十年兵，除了一身绿，屁都没有……要管，但不能吵！一吵起来，他即使不带走箱子，也会把箱子砸给你看，让全连战士目瞪口呆，那局面就难收拾了。

傍晚，罗怀牧从小屋走出来，碰到袁翰便冷冷走过，一言不发，也没给袁翰说话的机会。

晚上，罗怀牧又进那间屋子。袁翰两次经过屋门，都没有进去。他想起老罗明天一早就要离连，以后一辈子难相见，心就软了。他承认自己的失败。

第二天一早，罗怀牧很早就起来，吃了炊事班长特意做的荷包蛋肉丝面，提起通信员为他收拾好的零星物品，他不想再惊动别人，悄悄走出房门。可走到外边一看，全连在炮场上列成四排，在寒风里等待跟他告别。他不由有些心酸。

袁翰想了一夜，做了最后决定：箱子你拿走吧，我们不好责怪你，但你一定

要认识到这样做不对。大家向你敬礼告别的时候,你的怨恨会消失,友情会抬头,想想美好的以往……而且,那箱子一部分战士已经看见了,那干脆让大家都看见。不错,老连长是拿走了连队一只箱子,我们没能够阻止他,但我们也没把这事藏掖起来。送走老连长后,召开军人大会,大道理还是要讲几句,主要是和大家谈谈心,谈谈老连长的苦恼和自己的心情,再从自己薪金中扣出钱偿还给连队,但必须明白:这种事在三连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

袁翰整队、发令,然后跑步至罗怀牧面前五米处立定,敬礼:“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罗怀牧走上去和战士们握手告别,行至一半,那些充满恋意的眼睛就让他走不动了。他喉咙发出压抑的哭声,蹲在地上,双肩颤抖。队伍没有乱,后排的战士还在等待着罗怀牧。

罗怀牧终于站起来,含泪向战士们点点头,算是告别。干部们拥上去送他,他一把大家推回去,坚持要独自离去。出操时间到了,悬在电柱上的大喇叭,播出醒神的军号声。罗怀牧在炮场边停住,回脸望望,通信员再也忍不住了,跑出队列,追上去夺他手中背包,非要送他走不可。罗怀牧又把他推回去:“出操去。快!”

“连长,”吴晓义急道,“咱们怎么能让老罗独自走到营部,营长看见了会怎么想?咱们集合全连跟上去吧。”

袁翰不语。如果他转业,也会独自离开炮场,不愿任何人相送。吴晓义和两个排长快步跟上去。袁翰望着他们走远,心情复杂,……袁翰忽然看到他没拿箱子,那两个行李包和背包,并不比一个退伍战士的东西更多。袁翰唤道:“报话班长,出列!”

袁翰来到那间屋子里,箱子完整的放在当中,他不禁叹息了:“罗连长为什么不要?”

报话班长道:“他说太大了。”

“这不是原因。”

“哦,”报话班长眼睛从墙壁转到袁翰脸上,思索着,猜到了:“可能是你的脚步声让他留下的吧,昨天晚上你在门外来回走……”

屋内残留着隔夜的烟味和许多烟头。

九

袁翰野外训练归来,一进屋,就看见营长和教导员都在屋里,都盯住自己。营长说了句多余的话:“回来啦?……”就转脸看教导员,似乎让他接下去说。桌

上摆着一封电报,袁翰早已熟悉它的样式,但这封是刚到的,被拆阅过。

袁翰立刻感觉到气短心跳,脚下一股凉气正往上蔓延,他竭力站好:“哦,没什么。你们忙去吧,不必安慰我,真的。”

“三连长……”

“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两人对望一下,也许是营长更了解袁翰,他起身走开。教导员犹疑地跟出去,在门口停立一会儿,回头关上了门。

袁翰坐下来,朝桌上电报望了几分钟,才走去拿它。这电报已经不是妻子拍来的了,因为上面写着:“大女已亡小女仍病危妻尚好速归。”

“妻尚好。”袁翰默语。就是说她还活着,怎样活着的?小女病危,需要她活着。袁翰眼前迷蒙一片,他头顶住坚硬的墙壁站着,深深喘息着。耳鸣就像婴儿细弱的啼声……

营长坐在门口台阶上,两拳支着腮,所有想来宽慰袁翰的干部战士,都让他用猛烈的手势撵了回去。他坐了一个中午,保护门前这块地方的安静。

身后有响动,袁翰出门了,沙声问:“营长,你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去练一段精密法准备诸元,行吗?”

“现在?”营长望着袁翰洗过的眼睛。

“是的。”袁翰进屋拿出射击图版箱。

营长现在什么也练不下去,但他不愿违悖袁翰的心意,暗想:或许他可以借此获得平静呢。两人并排向营部走去,步伐阔大,一路无语。

十

颜子鹄已经升任了团长,随之也撩动起一个渴望:要到全团每个连、每条路、每个角落去走一遭。以前大都是乘车下来的,脚一落地,便是营部或连部。而战士们踩出来的蜿蜒小路,山洼里的鱼塘猪圈,最偏远的岗哨位置,还并不熟悉。今天,他选择一条能够穿过许多连队的小路,缓缓走过来。陆续遇到的一些战士向他敬礼,他估计一下,大约只认识三分之一,这使他挺懊恼的。

到榴炮营外围,远望去,火炮都脱去了炮衣,身管平衡在水平线上。技师正在进行零位零线检查,这是射击前的火器准备。炮场上的战士,脚步灵快,动作幅度大,不时喊着说话……啊,这是士气。他肩负着近百门大炮、上千名战士的使命,比任何时候都渴望部队能经得住战争的考验。可惜年过五十了,脚步结实但缓慢了,这步子不适于跑,特别适于深思。小路顶头是三连,还离好远,路就变得宽敞平直了。三连的车炮都在库房里,战士们在处理个人事务:写信,看书,洗

溯,不像战前反像战后,因为今天是星期日。一路走来不断添积的兴奋感,到这里就消散掉了。颜子鹄不想干涉,各连有各连的特点嘛,他只管在战斗中检验各连。

袁翰正在写信,但一个字也没写。面前有个立功证,他望着它犹豫:要不要把立功的事告诉妻子?半年来的家庭变化涌上心头,想着想着,竟把写信给忘了。

营党委会上,大部分委员为他请功,说:半年时间里,三连变化很大,他费尽了心血。袁翰不同意,自己在一连当连长时,也是这样工作,并没有记功嘛。由于三连太差,而太差的连队开始赶队,那步子一时会显得很大,在人们印象中会是个了不起的变化,其实是正常现象。以后还能保持这样的步伐吗?连队能进入高峰线不衰不落吗?他有远虑。再说,全连干部都一样苦干,为什么把他突出起来?他的意见被大家否定了。有人说:“袁翰同志刚刚到职,两个女儿就病了,不久,大女儿死去了。他在悲痛中坚持工作,不肯回家。”听到这句话,袁翰惊痛交集:“为什么这么说啊?”他窥见了一些同志为他请功的心理,“哦,大女儿死去了,……”袁翰愈发觉得不能接受这个功,也受不了这个功。但是营党委通过了,上级党委也批准了,随后发下来立功证。

颜子鹄进屋:“嗨,在写信。”他想退出去。

袁翰赶忙拉住颜子鹄:“团长,坐一会儿。”

颜子鹄拿过立功证,对着窗户翻着:“这东西越印越漂亮了。三等,不嫌小吧?打下厦门岛后,我再没得过它,倒给人家发过不少。哈哈……”他又体会到为下级记功时的快活了,那是领导者自豪的时刻。“怎么,一片空白?”颜子鹄扫了一眼桌上的信纸。

“正犯愁呢,不知道要不要把立功的事告诉她。”

“告诉了会怎样?”

“会伤心,我们失去了一个女儿,”袁翰注意看颜子鹄的反应,“而我立了个三等功。”

“告诉她!立功证上是你一个人的名字,但名字后面有你的一家,包括你那才活了时间不长的女儿。她们默默无闻的为你做出了牺牲,也是为我们这支军队做出了牺牲。不管你爱人怎么想,都应该告诉她。我们感激她呀,她承受的太多了。”

袁翰连连点头,他忽然开朗了许多。

“死去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还没来得及起名字。”

“起一个吧,好好起一个。”

“团长给起一个。”袁翰笑道。

颜子鹄肃然地缓缓摇头：“让母亲起吧。”

这动情的声音，使袁翰为妻子羞愧。大女儿死去后，她很少来信，来信也是电报般的，像应付袁翰的询问。她一定在考虑什么，怨愤、伤感从纸上消失了，或许已经麻木了。

“袁翰同志，准备让你担任团里作训股长，你有什么想法？”

袁翰从颜子鹄眼里，知道了他问的是什麼，回答说，“想法，……我还是想转业。我知道这想法不好，但是又克服不掉……请领导放心，让我干什么工作，我一定全力以赴，让我干多久，我就干多久，我是党员，又是军人。”

“能这样已经不错了。”颜子鹄思索着说，“有人想走，有人愿留，千姿百态啊。”

颜子鹄走后，袁翰找出个小铁箱，倒空里面的零碎东西，从抽屉里拿出一封电报，重读一遍，一一放进去。又拿起立功证看看，也放进去，用弹簧锁锁上，他再也不打开了。

一辆小车驰到连部前刹住，驾驶员探头问袁翰：“团长在哪儿，参谋长让我来接他。”

“从小路回团部了。有事吗？”

“不知道。”驾驶员掉转车头返回。吴晓义正从对面走来，小车驶近时，他站在路边，严肃地向车内敬礼，他以为团长坐在里面。驾驶员还他一声喇叭，接受了他的敬礼。

吴晓义走到袁翰跟前：“团长走了？”

“走了。”袁翰不多说，他不想让他受窘。

“说些什么？”吴晓义挺紧张。

“调我到作训股工作。”

“当股长？正营职！”吴晓义高兴地推了下袁翰胸膛，“股长同志，我早说了，你在三连干不长，迟早要提上去。怎样，没错吧！”

袁翰并没听吴晓义说过这话。前一段时间，吴晓义不知从哪儿听说自己能转业，晚上，他愤愤地闯进袁翰屋里，“走就走，早晚都是个走，我早就知道。”……眼睛也潮红了。袁翰竭力宽解他。那天晚上，吴晓义对袁翰的感情跨进了一大步，说了好些知心话。

袁翰判断着：为什么突然来车接团长回去？吴晓义却另有所思，眉间浮动淡淡的忧虑。他显然是被袁翰升任股长的消息震动了。从现在起，到下一位连长任职，他的忧虑不会消失的。

文书推开窗喊：“连长，电话！”

袁翰对吴晓义道：“注意，开始了。”吴晓义这才振作起来。袁翰疾步跑到窗前，文书把听筒从窗内递出去。袁翰一边听一边朝吴晓义做个手势，吴晓义飞跑去摇响警报器。营区翻滚一阵巨风，战士们携带装备冲进车炮库，装车挂炮。脚步声，口令声，汽车引擎声，使人感到浑身发热。

袁翰坐在急驰的指挥车驾驶室内，膝盖上铺盖着一张军用地图。开进路线穿进一圈圈密匝匝的山岭，越过两条小河，进入另一张地图。袁翰急忙找出来，大略地拼接上，统观着。这是“战区”了，各色粗的箭头和断裂的弧形线显示：对方的“天狼工程”已经突破了我方大部防线，“战局”十分险恶。下角有许多我方炮阵地和观察所的符号，其中一个，是袁翰他们的。

汽车突然减速，晃动了一下，靠向路边，然后再回到公路中心线，加速行驶。驾驶员抱怨着：

“那个女人有点不正常，走路也不好好走。”

袁翰并未留意，目光回到“战区”地图上。可是，印象中的那个女人垂在肩后的青色羊毛围巾触动了他，他急忙举起望远镜朝右后方望去。啊，是自己的妻子，她抱着孩子，匆匆拐进通往三连方向的小路。小女儿在她肩上伸出一只小手，好像要抓住威武的火炮，也好像要爸爸抱她。看不见妻子的脸，她要是转过来，看看车辆和火炮该多好啊。“她从家乡赶来干什么？哭诉，扔孩子？……”袁翰心内掠过一个个不祥念头，桉树林遮断视线，袁翰放下望远镜，一切都要等回来后才知。

“亲人哪，为了你们，我才离开你们。”

高山下的花环

● 李存葆

记不清哪朝哪代哪位诗人，曾写下这样一句不朽的诗——“位卑未敢忘忧国”。

——作者题记

引 子

在哀牢山中某步兵团三营营部，在赵蒙生的办公室里，我和他相识了。

寒暄之后坐下来，便是令人难挨的沉默。

赵蒙生是三营的教导员。他出生于革命家庭，其父是位战功赫赫的老将军，其母是位“三八”式的老军人。三年前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他荣立过一等功。三年多来，他毫不艳羡大城市的花红柳绿，默默地战斗在这云南边陲。另外，他还动员他当军医的爱人柳岚，也离开了大城市来到这边疆前哨任职。

在未见到他之前，军文化处的一位干事简介了上述情况之后，对我说：“您要采访赵蒙生，难哪！他的性格相当令人琢磨不透。他的事迹虽好，却一直未能见诸报章，原因就是多次拒绝记者对他的采访！”

脾气怪？搞创作的就想见识一下有性格的人物！

见我执意要去采访，文化处那位干事给赵蒙生所在团政治处打罢电话，又劝我说：“李干事，算了，别去了，去也是白跑路。团政治处的同志说，三天前赵蒙生刚收到一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那汇款单是从你们山东沂蒙山区寄来的。赵蒙生为那汇款单的事两宿未眠，烦恼极了！”

一张汇款单为啥会引起将门之子的苦恼，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于是，我更是毫不迟疑地乘车前往。

此时，我虽见到了他，但他一句“没啥可谈”，便使我吃了“闭门羹”。

坐在我们一旁的是营部书记^①段雨国。像是为了要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他起身给我本来是满着的茶杯,又轻轻添进一丝儿水。

赵蒙生仍是一声不吭。他是个非常英武的军人。从体形到面容,都够得上标准的仪仗队员。显然是因为缺乏睡眠的缘故,此时他那拧着两股英俊之气的剑眉下,一双明眸里布满了血丝,流露着不尽的忧伤和悲凉。难道还是为那汇款单的事而苦恼?

也许他也受不了这样的沉闷,他摘下了军帽。我这才发现他额角右上方,有道二指多宽的伤疤。我正琢磨着该怎样打破这僵局,想不到他竟开口了:“听口音,您像山东人?”

“对,对。我老家离沂蒙山不远。”

“您在济南部队工作?”

“我是济南部队歌舞团的创作员。”

“那么,您怎么会来这云南……”

我连忙告诉他,三年前的初春,在总政文化部的统一组织下,我曾有幸来过这云南前线跟随参战部队,经历了那场世界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我这次来的目的,是想访问一些三年前在战场上涌现的英雄人物,如今又是怎样生活和战斗的……

“噢。”他出于礼貌点了点头。

见采访火候已到,我忙说:“赵教导员,您能否给我谈一谈,您是怎样说服您的爱人柳岚同志来边疆的……”

“啥?让我瞎吹柳岚呀!那真是可悲可叹!”他连连摇头,自嘲地接上道,“柳岚回去休探亲假去了,她现已超假二十多天未归队!我们正准备打报告给她处分。小段,你证实,这可不是瞎说吧?”

书记段雨国约有二十三、四岁,白皙的脸蛋上挂着书生气。他很是认真地对我说:“对。柳军医超假已二十二天了。可她有病假条。”

“那病假条绝对是骗人的鬼把戏!”赵蒙生愤慨地对我说,“柳岚军医大学毕业后分到我们这里还不到一年,就多次嚷着要脱军装转业,说这里绝对不是人住的地方。看来,要让她继续留在这边防,那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他说罢,又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

眼下是三月,我临离开济南时刚见过一场大雪,而这地处亚热带的滇边,竟是酷热难当了。屋外,树上知了的叫声响成一片,我心中涌起阵阵燥热。看来,我这次采访也将是毫无收获了。

过了会儿,他竟又开口了:“既然您是从山东来的,那么,先请您看看这……”

^① 营部书记是搞文书工作的,相当于排职干部。

他递给我的,正是那张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汇款单是从山东沂蒙山区枣花峪大队寄来的。上面写有简短的附言:

蒙生:这是三年多来你寄给梁大娘的钱,现全部如数给你寄回,查收。

“汇款单是前天寄来的。我真搞不清梁大娘为啥把钱全部退给我……”赵蒙生用拳头捶了下头,脸抽搐着,痛苦异常。

沉默了一大会儿,他才静下心来对我说:“在自卫还击战前前后后,我有过非同寻常的经历。也许有了那段经历,我才至今未离开边防前哨。”稍停,他望着我,“您要有兴趣的话,我倒可以把那段经历讲给您听听。”

我连连点头:“好。您讲吧。”

他站起来:“先请您看一下这两幅照片——”

我这才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方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帧带相框的照片。他指着左边的相片说:“这张放大的六寸免冠照,是我要讲述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他原是我们三营九连连长,名叫梁三喜。他是山东沂蒙山人,在还击战中壮烈殉国。当时,我是九连的指导员。”

还未等我仔细端详烈士的遗容,他又指着右面那张十二寸的大照片说:“这是梁三喜烈士一家在他墓前的留影,这衣服上打着补丁的白发老人,是烈士的母亲梁大娘。这身穿孝服的年轻媳妇,是烈士的妻子韩玉秀。玉秀怀中抱着的是梁三喜未曾见过面的女儿,名叫盼盼。”

我们又坐下来。赵蒙生的表情仍很沉重。

我从旅行包里取出小型录音机,轻轻装上了磁带。然而,赵蒙生却向我摆了摆手:“别急。在我讲述之前,我得向您提出三点要求,当您认为我的要求您能接受时,我才有可能对您讲下去。”

“哪三点呢?”我轻声问。

“其一,当您把我讲述的故事写给读者看的时候,我希望您不要用华丽的词藻去打扮这个朴实的故事。要离部队的实际生活近些,再近些。文学是要有审美价值的,而朴实本身不就是美吗?”

想不到眼前这教导员竟如此有文学修养!他说的全乃行家之言,我当即点头同意。

“其二,当前读者对军事题材的作品不甚感兴趣。我看其原因是某些描写战争的作品却没有战争的真情实感,把本来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磨平,从而失去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别林斯基说过,缺乏戏剧性的长篇小说,是生气索然而沉闷的。这话有道理。但有的作者为追求戏剧性,竟凭空编造故事,读来则

更令人感到荒诞不经。这里先请您放心,我的亲身经历,本身已具备了戏剧性。不过,在我进行必要的铺垫和交代时,您开始会感到有点儿沉闷,但希望您不要打断我的讲述。我请求您耐心地听下去。您最终便会知道,这个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故事,即使石头人听了也会为之动情,为之落泪的!”说罢,他望着我,“您能不加粉饰地把它记录下来吗?”

我再次点头表示从命。

“其三,在这个故事中,我和我妈妈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您必须如实描绘生活中的‘这一个’,如果您稍将‘这一个’加以美化的话,这个故事便不能成立了。因此,这是三点中至关紧要的一点。”

我大惑不解。

这时,书记段雨国对我说:“在教导员讲述的故事中,我也是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我也诚恳地企望,您切莫对我笔下留情!”

啊,又出来一位“这一个”,我更不解了。

“我提的三点,尤其是第三点,您能接受吗?”赵蒙生催问我。

我急于听到下文,连忙点头同意。

以下,便是赵蒙生的讲述——

—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九七八年九月六日。

我离开军政治部宣传处,下到九连任指导员。我原来的职务是宣传处的摄影干事,那可是既美气又自在的差事呀。讲摄影技术,我不过是个“二混子”。加上我跟宣传处的几位同志关系处得也不大好,我要求下连任职,是他们巴望不得的事。

我不多的家当,两天前就由团后勤部门的卡车捎到了九连。当团里用小车送我到九连走马上任时,我随身只带着个小皮箱。皮箱里装着一大中华烟,还有一架“YASHIKA”照相机。那架进口照相机,是我八月份回家休假时,妈妈托人给我从侨汇商店里买的。当我把公家的照相机移交之后,高兴时我还可以玩玩这“YASHIKA”。

当时,九连的驻地并不在这边防前哨,离这里少说也有千里之遥,不过,营房也是设在阒无人迹的深山沟里。

我和梁三喜及九连的排长们第一次见了面。

梁三喜两手紧紧握着我的手,煞是激动:“欢迎你,欢迎你!王指导员入校半年多了,我们天天盼着上级派个指导员来!”

看上去,梁三喜是个“吃粮费米,穿衣费布”的大汉子,比我这一米七七的个头,少说要高出两公分。那黝黑的长方脸膛有些瘦削,带着憨气的嘴唇厚厚的,绷成平直的一线。下颌微微上扬。一望便知,他是顶着满头高粱花子参军的。

他望着我:“指导员,有二十六七岁了吧?”

我说:“咱可不是‘选青’对象,都三十一啦!”

“这么说咱俩是同岁,都是属猪的。”他笑着,“可看上去,你少说要比我小七八岁呢!”

“连长,你也学会‘逢人减岁,遇货加钱’啦!”站在我身旁的一位排长对梁三喜说罢,又滑稽地朝我一笑,“行啦,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你俩这一对猪,今后就在一个槽子里吃食吧!”

梁三喜忙给我介绍说:“这是咱连的滑稽演员,炮排排长!”

“靳开来,靳开来!”炮排长靳开来握着我的手,“不是啥滑稽演员,是全团挂号的牢骚大王!”

梁三喜接着把另外三位排长一一给我介绍。

外表比我老气得多的梁三喜,又诚笃地对我笑着说:“行呀,今后你吹笛儿,我捏眼儿,一文一武,咱俩配个搭档吧!”少停,他叹口气,“咳!副连长进了教导队,副指导员因老婆住院回去探家了。这不,连里就我和这四员大将连轴转,你来了,就好了。要不然,今年我的假就休不成了!”

靳开来接上道:“连长,干脆,明天你就打休假报告,争取下个星期就走!别光给韩玉秀开空头支票了,让人家天天在家里盼你!”说罢,他转脸对我,“奶奶的,连队干部,苦行僧的干活!”

看来,我的搭档们都不是“唱高调”的人。这,还算是对我的心思。

紧急集合号声骤起。那刷刷的脚步声告诉我,要让我“宣誓就职”了。

“同志们!”梁三喜郑重地把我介绍给大家,“这是新来的赵指导员!”

如雷的掌声过后,队列里鸦雀无声。

我当摄影干事时曾下连拍摄过队列照片。但如此整齐的队列,我却第一次见到。四行队伍成四条笔直的一线,个个收颌挺胸,纹丝不动。连队是连长的镜子,我顿时觉得梁三喜是位带兵极严的干部……

“同志们,赵指导员是主动要求下到我们九连的!他从大机关里来,文化高,有水平!”他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队列,与适才那轻言慢语的声调判若两人,“同志们不要有丝毫的误解,赵指导员既不是下连带职锻炼,更不是到这里来体验生活的,上级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他的行李和组织关系等等,全一锅端来了!今后,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多报告。军人么,服从命令是天职,大家要坚决服从指导员的指挥!请指导员讲话。”

掌声又起。可爱的士兵们鼓掌也总是拿出拼刺刀的劲头！

“同志们！我……水平不高，我缺乏经验，我……愿和大家一起，把咱连的工作搞好。我……讲完了。”

我本是个侃侃而谈的人，但众目睽睽之下，我的“就职演说”却是如此简短。全连解散后，我仍觉得脸上热辣辣，心跳如鼓。柯涅楚克在《前线》一剧中塑造了个绝妙的艺术典型客里空，眼下我在生活中正充当着客里空的角色。但我又缺乏客里空的演技——撒起谎来可以百倍认真而心不跳脸不红。

演戏，我分明是在演戏！滑稽剧？恶作剧？还是真正的悲剧？指导员——党代表，我是在亵渎这神圣而光荣的称号啊！

有些城镇入伍的战士把参军当成“曲线就业”，我甘愿从军机关下到九连任职，玩的是“曲线调动”的鬼把戏。

我出生于军人之家。授衔时爸爸是少将，妈妈是中校。记得我上四年级时，我曾跟一位同龄的伙伴，为争论谁爸爸的官大而大动干戈：

“赵蒙生，别瞎吹，再吹你爸爸也是一个豆！俺爸爸是‘双铁轨’，四个豆！”

“‘双铁轨’顶啥用！”我反驳说，“我爸爸一个豆是金豆，是将军豆！你爸爸四个豆是银豆，是校官豆。银豆比起金豆来，差远了！”

“你瞎吹！”

“瞎吹？你回去问问你爸爸，我爸爸让他立正，他不敢稍息！”……

于是乎，拳来脚往，俺俩打得不可开交。

这事让我爸爸知道了，我挨了爸爸一顿好揍，我从来没见爸爸发那样大的火。我哭着到妈妈怀中撒娇，谁知妈妈竟也一把推开我，让我站好，严厉地训斥我：“什么官不官的，官再大也是人民的勤务员！记住，你是红军的后代，长大了要为人民服务！”……

那阵儿，爸爸妈妈对我要求极严。他们坐的小车从来都不让我坐，我穿的衣服也是姐姐穿下来之后改做的。妈妈经常给我讲述战争年代的艰辛生活和英雄人物，还常给我买些这方面的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盖达尔的《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读了之后，我和小伙伴们便像铁木儿那样去做好事。清晨送身残的同学上学，放学后给烈军属买粮食，大冬天到教室里帮助工友生炉子。每逢暑假，老师便带我们到郊外过夏令营。面对熊熊燃烧的营火，我们憧憬着未来，崇拜卓娅和舒拉，更崇拜董存瑞……

一九六五年军衔取消了。然而，用童心可以拥抱生活的岁月却越来越变得混浊了。

一九六七年我参军时，爸爸已被关押起来。几经交涉，妈妈领我见到爸爸。妈妈悄声对爸爸说：“总算有门路了。蒙生可以当兵了！”

爸爸从铁栅栏里伸出手,颤抖地抚摸着我的脸:“孩子,莫哭,战士有泪不轻弹嘛。去吧,北上吧,到有枪声的地方去锻炼!要记住你为啥叫蒙生,要记住你是军人的儿子!”

“不是怕打仗,北上是去不成。没熟人,谁会收留蒙生啊!”妈妈抹着泪,“蒙生得南下,这次是××军来征兵。”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军。这个军是当年从山东南下过来的。军、师、团三级现任领导中,不少人是我爸爸的老部下。我曾洒泪感激正直豪爽的军中前辈,在爸爸蒙难之时,他们念及战争岁月的生死之交,对我精心关照……

十年动乱,摧残了多少人才。权力的反复争夺,又使多少人茅塞顿开,学得“猴精”呀!人为万物之灵,极具谋求生存的本领,是适应性最强的动物。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中,心慈的变得狠毒,忠厚的变得狡猾,含蓄的变得外露,温存的变得狂暴……造物主催化万物的奥妙,是在一个“变”字呀!

职位再高的人也是人,人都具有可塑性。妈妈本是军区卫生部副部长,不知从何时起,她已像“外交家”一样极善于周旋了。当五千年古国文明史上首屈一指的“演员”林彪摔死之后,我爸爸“华野山头黑干将”的问题澄清了,又恢复了职务。妈妈的“外交才华”,更是熠熠生辉……

妈妈的“外交内容”事无巨细,颇为繁杂。比如为老战友搞些难搞到的药品啦,补养品啦;又如哪位老同事想当候鸟,随着季节的变换要由北去南或由南去北疗养啦,妈妈便不遗余力地挂长途电话联系,把求上门来的老同事安排到称心之地……最能体现妈妈“外交才华”的是送女同胞参军。那阵儿,城里的父母们一面高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面却在为子女们苦苦寻求出路。尤其是女孩子,不管是高墙深宅的闺秀还是普通人家的千金,大都把穿上军装当作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我的姐姐是一九六二年凭考分进了上海军医大学的,用不着妈妈再操心。我的两个妹妹是同一天穿上军装的,我们家一下便成了“全家兵”……

有人暗中估算过,说通过我妈妈的关系穿上军装的姑娘,足能编一个“红色娘子军连”。这实在太夸张了。我了解实情,妈妈送走的女兵也就是十多个,最多能编一个“娘子军班”。

“送走几个孩子当兵犯什么法?保卫祖国是她们神圣的权利和义务!”妈妈常在人面前这样说,“现在北极熊到处挑衅,当兵是去准备流血牺牲的!杨家将,一齐上。打起仗来,让你们瞧瞧俺赵家的全家兵!”

我当然不相信妈妈的话是出自内心。但我却常常为有妈妈这样的大树作为荫庇,感到莫大的幸福和自豪!

然而,大也有大的难处。因我爱人柳岚上大学的事,妈妈竟遇上了难劈的柴。

一九七七年夏天,S军医大学来我们军招生。名额只有两个,原则上是通过推荐和考试择优录取。柳岚在军门诊部工作,妈妈费了好大的劲才使柳岚刚刚由护士提升为医助。这时,她又想上大学。于是,远在外军区的妈妈打长途电话来,把柳岚推荐上了。参加考试的有二十多位“娘子军”,柳岚考了个倒数第三,却被录取了。“娘子军”可是不好惹,一旦她们发现自己仅仅是些“陪衬角色”时,她们联名写信到处揭发,说柳岚提医助就是走的关系,这次上大学又走后门。什么“这次招生根本不是才华与智慧的选拔,而是权力与地位的竞争”,言辞尖刻得很。有人提出要组成联合调查组,揭开这次招生的内幕,坚决把柳岚追回来……

妈妈接到我的告急电话之后,像基辛格往返中东搞穿梭外交那样,火速赶到军里。

听我说明事态后,妈妈显得有点紧张,转眼便神态自若。她带着我,先后看望了爸爸的两任老部下。

“……老干部活到今天容易吗?是不是有人嫌我和蒙生他爸挨斗挨得还不狠,受罪受得还不够?是不是军里有人生着法子想整我们?群众有情绪,可以开导教育嘛。柳岚的事我是不管,你们看着办!”临别,妈妈朝对方笑了笑,“哎,忘了对您说了。您那老三在我们军区司令部干得很出色哪,群众威信蛮高嘛。听说快提副科长了。”

她又对爸爸的另一位老部下说:“……柳岚考试分数是低了点,那还不是十年动乱造成的!她爸妈都是地方干部,前些年受的罪更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正因为柳岚文化差,才更应该让她上大学深造嘛!不然,没有过硬的技术,怎能让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些活,你们当领导的得出面给同志们解释呀。”临别,妈妈握着对方的手,“呃,忘了跟您报喜了。您那四丫头在我们总院内二科,根本不用人操心,全凭自己干得好,前几天已入党了。对了,她可是到了找对象的年龄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种事,我这当大姨的是得给你们老两口分点忧哪。放心,你们放心。”

一切都在谈笑之间。既不像低级说客那样赤裸裸地进行交易,更不像小商贩那样为头高头低去煞费苦心地拨弄秤砣。然而,我却深悉妈妈话中的潜台词:外交关系按惯例都是对等的,有来无往非礼也!

柳岚的事总算平息下去了。

前两年要不是活动和等待柳岚提升医助,我和她早就调回爸妈身边去了。当柳岚上大学之后,我的调动便列入了妈妈的“议事日程”。

谁知这时,人称“雷神爷”的雷军长在十年靠边站之后,又回到军里任军长来了!

对他的到任,我曾喜出望外。因为妈妈给我讲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曾拼

死救过“雷神爷”的命。现在只要你“雷神爷”点个头,我赵蒙生可以大摇大摆地调回去!

哪知“雷神爷”一到军里,便电闪雷鸣,噉哩喀喳,又是搞党委整风,又是抓机关整顿,那架势,即使是亲娘老子他也不买你的账!

团以下干部跨军区调动,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甚至是没有的事。可这些年,战士跨军区调动也不是奇闻了。按说,连职干部的跨军区调动,也是需要通过军区干部部的。可某些单位为了给某些人以方便,连职干部从师里便可直接调往外军区。这当然是违犯规定的。鉴于这种情况,有人在电话上给我妈妈出点子,说我要想调回去,得赶紧离开军机关,躲开“雷神爷”,千万不能在“雷神爷”眼皮底下干这种事!

干部处的花名册告诉我,这九连的指导员是空位。于是,通过关系,我便冠冕堂皇地上任了。

……

这一切,连长梁三喜还蒙在鼓里呢!

吃过午饭,他领我围着营房到处转,看了连队的菜地、猪圈、豆腐房。边看他边给我当解说员。当他安排完下午各排的训练课目后,又回到连部给我介绍整个连队的思想状况……

他真的把我当成来九连扎根的指导员了!我俩面对面坐着,他轻言慢语地说,我装模作样地在本子上记……

不过,客里空的角色很难扮演,我真不知道这“曲线调动”的戏该怎样收场!

二

熄灯号响了。我和梁三喜隔着一张办公桌,各自躺在自己的铺上。

他告诉我:明天是星期二,早操课目是“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还说我乍从机关来到连队,怕一时难适应紧张的生活,他让我越野时只带上手枪就行,背包啥的就不必带了……

九连执行全训任务,是全团军事训练的先行连。步兵全训连队,往往比搞生产和打坑道的连队更艰苦,更消耗体力。对此,我当时既不甚了解,也没有吃大苦的思想准备。

我睡得正酣,猛觉有人在晃动我。听声是梁三喜:“指导员,快,吹号了!”

我一骨碌爬起来,懵懵懂懂摸过军装穿上。想打背包也谈不上,我连衣服扣儿都没顾上扣,提起手枪就蹿出连部。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自认为动作也够麻利的了。可赶到集合点一看,梁三喜早已带着披挂整齐的战土们,像一队穿山虎

一样嗖嗖远去了……

“指导员，连长让我留下等你。”说话还带着又尖又嫩的童音的司号员小金，边跑边不时回头呼唤我，“指导员，我认识路，快！”

启明星还没隐去，眼前黑黢黢的。蜿蜒山道，崎岖不平，看不清哪处高，哪处低。跑着跑着，我脚下打了个滑，一头摔倒了。全副武装的小金，不得不折回身来拉起我……

我在军机关工作时，散漫邈邈是出名的。我天天早晨睡懒觉，有人开玩笑说我是政治部里的“一号卧龙”。我从来赶不上在机关食堂里吃早餐。柳岚从营养学的角度多次对我说，早饭特别重要。我也曾研究过人体每天需要多少“卡路里”，当然不会让自己的体内缺乏热量。每天睡足之后爬起来，先来一杯浓浓的橘子汁，再来两块美味巧克力或蛋糕啥的……咳！我“一号卧龙”啥时吃过眼前这种苦！不过，为了装装样子，我得咬紧牙关坚持一番……

当我跟在司号员金小柱身后，上气不接下气地爬到一架大山的半腰，离山顶还有一大截子路时，梁三喜已带着全连返回来了。

他在我面前停下，轻声对我说：“比上次越野，又提前了两分多钟到达山顶。”

汗水已浸得我眼也睁不开。我抬起右臂用袖子抹了下脸，发现他携带着背包、挎包、手枪、水壶、小铁锹、指挥旗、望远镜等全副装备，另外，身上还挂着两支步枪，肩上还扛着一架八二无后坐力炮筒。

想不到这“瘦骆驼”样的连长，真能“驮”！

这时，三个掉队的战士赶到他身边，很难为情地把该属于他们携带的铁家伙，从连长的身上取走了。

全连一个个都像刚从河里捞出来一般。梁三喜让炮排长靳开来头前带队，他和我走在队伍的后面。

“别着急，慢慢就适应了。”他谦和地对我说，“人么，总是各有特长。今后，军事训练方面我多抓些，你集中精力抓思想方面的工作。”

看来，他是个很能宽容人的人。

“行。”我有点受感动，点头答应着。

我身上仅带着一支手枪，返回连队途中，却直觉得双腿像灌满了铅，身子像散了架。出现了低血糖症状，“卡路里”消耗殆尽。

后来，我精确计算过，在全副武装越野时，连里步兵班战士的负重尚不值得惊叹，八二无后坐力炮班的战士，每人负重是八十九斤！他们如牛负重，还得像战马一样火速驰骋，拼命冲杀呀……

在我下连之前，连里已进行了两周时间的轻武器射击预习。按规定，连里的

干部也要参加射击考核,并须掌握本连的各种武器。

我既怕打得太差丢人现眼,也想过一次“枪瘾”,便耐着性子和战士们一起,胸贴大地背朝天,苦苦地熬了三天。

星期五这天,第三季度轻武器精度射击考核开始了。

梁三喜第一个上阵,取得了“全优”成绩。然而,战士们谁也没有感到惊讶。看来,这是连长的拿手戏,大家早已多次目睹。

我过去喜欢拨弄手枪,那不过是玩新鲜。眼下却使我没丢大丑。手枪射击我“猎”了个良好,除了轻机枪射击不及格,别的都及格了。

梁三喜脸上漾着笑:“指导员,你还行哩!就预习了三天,不错,打得还算不错!”

接着,从一排开始逐班进行考核。一班、二班打得很理想。临到三班打靶时,战士段雨国八发子弹,只打了十七环……

讲到这,赵蒙生转脸对段雨国:“喂,小段,你当时是个啥形象,你自己塑造一下吧。”

段雨国朝我笑了笑,说:“说起我当时的形象,那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是从厦门市入伍的,爸爸是工艺品外贸公司的经理,妈妈也在外事口工作。我当时哪能吃得了连队生活的苦哇!因我读过几部外国小说,便自命是连里的才子。甚至还曾妄想当中国的雨果。我当时尤其看不起从农村入伍的兵,说他们身上压根没有半个艺术细胞,全身都是地瓜干子味。结果,大家便给满身‘洋味’的我起了个绰号——‘艺术细胞’。连里所有的人都不在我眼里。一次,王指导员给全连上政治课,我在下面听我的袖珍收音机,使课堂骚动不安。王指导员让我站起来,命令我关掉收音机。我当即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得更大,并油腔滑调地说:‘听,这是中央台,是党中央的伟大声音!怎么,不比你指导员那套节目厉害得多吗?’……仅此一事,您就能想象出我当时是个啥德行!好啦,在这个故事中,我是一个很次要的小角色,还是让教导员接下去对您讲吧。”

赵蒙生淡淡一笑,继续讲下去——

当时,三班战士围着小段,一片讥讽。

“喂,请问‘艺术细胞’,你把子弹艺术到哪里去啦?”

“新兵老秤砣,每次打靶都拽班里的成绩!”

“呸!这种玩意儿还叫人,脸皮比地皮都厚!”

“嘴干净些!”段雨国抹了把他那在全连里唯一的长头发,用蔑视的目光望着众人,“不就是飞了几发子弹嘛,老子不在乎!再说,打不准也不怪我,主要是

枪不好！”

梁三喜走过来：“你的枪咋不好？”

“不好就是不好呗，准星歪了！”段雨国挑逗般地望着梁三喜，“怎么，能换支枪让咱再打一次吗？”

梁三喜那厚厚的嘴唇嚅动了几下，我猜他必该动怒了。

然而，他二话没说，一下从小段身上抓过那支步枪，把八发子弹压进枪膛。他没有卧倒在靶台上，举枪便对准靶子，采用的是更见功夫的立姿射击。

一声哨响，靶场寂然。

“叭！叭！叭叭……”他瞬间便射击完毕。

战士们眼睛不眨望着正前方，等待报靶员挥旗报靶。只见报靶员从隐蔽处跃到靶子前瞧了会，扛起靶子飞也似的跑过来……

“让……让中国的雨果先生……”报靶员气喘吁吁，“自己瞧瞧！”

战士们围着靶子，欢呼雀跃：“七十八环！七十八环！”

“喂，‘艺术细胞’，瞧瞧这是不是艺术呀！”

“可爱的雨果先生，过来，过来瞧瞧哟！”

面对战士们的讥笑，段雨国原地不动，故意把头歪在一边：“打八十环也没啥了不起！”

“你说啥？！”随着一声吼，只见炮排长靳开来拨开围成圈的战士们，像头发怒的狮子闯在段雨国面前。

靳开来中等偏上的个头，胖墩墩的。眉毛很浓，眼睛不大。眼神却像两道闪电似的，又尖又亮。他周身结实得像块一撞能出声的钢板，战士们说他是辆“轻型坦克”。他用两个指头点着段雨国的鼻尖儿：“段雨国，又有啥高见，冲我靳开来说！”

段雨国眼皮一耷拉，不吱声了。

“说呀！”靳开来把两个指头收回，攥成拳头，“亏你段雨国不在我炮排！要是你在我炮排，两天内我不治得你‘拉稀’，算我不是靳开来！”

是慑于“轻型坦克”的威力，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段雨国乖乖地低下了头……

三

风吹日晒，摸爬滚打，我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六。

晚上，团电影组来连队放电影，片子是老掉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我懒得去看。司号员小金帮我从伙房提来一大桶温水——再不冲个澡，我实在受不了

啦!

下连六天来,尽管我流的汗水比连长梁三喜,甚至比战士段雨国都要少得多,但我的军装也是天天湿漉漉没干过。要不是昨天小金把我塞到床下的军装和内衣全洗了,眼下连衣服也没得换。

冲完澡,觉得身上轻松些了。我想把堆在地上的那全是汗碱的军装和内衣涮洗一下,但双臂酸疼懒得动手。我用脚把它们踢到床底下。也许明天小金又要抢去帮我洗,那就让他去学雷锋吧……

我晓得指导员应该是个艰苦朴素的角色。下连后我把抽烟的水平主动降低,由抽带过滤嘴的“大中华”降为“大前门”之类。趁眼下没人在,我打开我那小皮箱,先看了看那架“YASHIKA”照相机,又取出一盒“大中华”拆开。点上一支烟,我倚在铺上吸起来。闭上眼,那五光十色“小圈子”里的生活,又频频向我招手——

前不久,七八月份。在军医大学的柳岚放暑假,我也趁机休假了。我和她同时回到了爸妈身边,回到了那令人向往的大城市。

孩提时的伙伴和朋友,纷纷登门邀请我和柳岚,到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光顾一番。

在部队里,我和柳岚已被人们视为“罗曼蒂克派”。可跟那“小圈子”里的红男绿女一比,才深感自惭形秽,才知道我俩还不是“阳春白雪”,仍是“土八路”,“下里巴人”!

“穿‘黄皮’吃香的年代早过去了,快调回来吧!”

“喂,两位‘老解’,还在部队学雷锋呀。瞧瞧我们是怎样学的吧!”孩提时的伙伴们,很友好地戏谑我和柳岚。

“小圈子”里举行家庭舞会:探戈、伦巴、迪斯科、贴面舞……

“小圈子”里比赛家庭现代化:小三洋、大索尼、雪花牌电冰箱……

香水、口红、薄如蝉翼的连衣裙,使看破红尘的男女飘飘然;威士忌、白兰地、可口可乐,令一代骄子筋骨酥软……

我和柳岚眼花缭乱。她以“患流感”为由续假在家多玩了十天,我也以“发高烧”为借口晚十天才回到军里。

理性告诉我,那“小圈子”里的生活是富足而空虚的;本能在向往:我和柳岚完全具备可以那样生活的条件,何乐而不为!

……

“指导员,快出来!”炮排长靳开来进屋便喊道,“来,甩老K!”

听来头是电影散场了。初来乍到,出于礼貌,我摸起一盒没开封的“大前门”烟,从内屋走出来。

梁三喜和另外三位排长,也都进来了。大家围着四张长方桌拼起来的大办公桌坐了下来。

“砰”,靳开来把两副扑克按在桌上,顺手摸起我的“大前门”抽出一支,又朝桌中间一拍:“指导员抽烟的水平不低,弟兄们,都犒劳犒劳!”说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没启封的“三七”,也朝桌子中间一放:“今晚两盒烟抽不完,这场老K不罢休!”

看来他很讲义气。我发现,这“轻型坦克”完全不是发怒时的样子了,面部表情很生动。

梁三喜早已点起一支小指头肚般粗的旱烟。他重重地吸了一口,说:“算了吧,都挺累的,今晚上不用了。”

“我知道看了这场电影,你就没心思甩老K了!”靳开来斜觑着梁三喜,“怎么,要早躺下梦中会‘春妮’呀!”

梁三喜淡淡一笑,轻轻地吐着烟。

“指导员,你还不知道吧。要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在这里连放一百场,连长准会看一百次的。你知为啥?”靳开来先卖个关子,接上说,“别瞧连长这副穷样儿,命好摊了个俊媳妇。媳妇姓韩名玉秀,长得跟电影上演春妮的演员陶……陶啥来?”

“陶玉玲。”显得最年轻的一排长说。

“对。全连一致公认,韩玉秀长得跟陶玉玲似的,心眼儿嘛,比电影上的春妮还好。”靳开来朝我使了个眼色,“喏,你瞧,一提春妮,连长的嘴就合不拢了。”

的确,梁三喜的脸上已漾起美滋滋的笑。下连以来,我首次发现他的笑容是那样甜美。

“奶奶的!陈喜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摊上春妮那样的好媳妇还闹离婚!”靳开来仍饶有兴味地谈论刚看的电影,“要是咱摊上春妮那模样又俊、心眼又好的人当媳妇,下辈子为她变牛变马也值得!哪像咱那老婆,大麻袋包,分量倒是有!”

一排长“嘻嘻”地笑着:“这话要是叫你老婆听见……”

“听见咋啦?她充其量不过是公社社办棉油厂的合同工,我靳开来的每句话,对她都是最高指示!”他说罢,抓起扑克,“不谈老婆了。来,甩老K!争上游?还是升级?”

见梁三喜和我都没有甩老K之意,靳开来把扑克又放下了。他一本正经地对梁三喜说:“连长,别苦熬了,你是该休假了。”

梁三喜看看我:“等指导员再熟悉一下连队情况,我就走。”

“要走你得早些走,韩玉秀可是快抱窝了。”靳开来笑望着梁三喜,掰着指头

算起来,“小韩是三月份来连队的,四、五、六……嗯,她是十二月底生孩子。你等她抱窝时回去,有个啥意思哟!”他诡秘地一笑,骂道:“奶奶的!夫妻两地,远隔五千里,一年就那么一个月的假,早就早死了,涝就涝死了!”

三位排长笑得前仰后合。

梁三喜说:“炮排长呀,你说话就不能文明点儿!”

“甩老K你们不干,谈老婆你又说不文明。那么,这星期六的晚上怎么熬?好吧,我说正事儿。”靳开来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指导员,你刚来还不了解我,我正想找你谈谈心。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我把心里话掏给你。你到团里开会时,请你一定替我反映上去,下批干部转业,说啥我靳开来也得走!为啥?某些领导对咱看不惯,把咱当成‘鸡肋’!鸡肋嘛,吃起来没啥味儿,扔了又觉得可惜。我靳开来不想当这种角色,等人家嚼完了再扔掉!转业回去不图别的,老婆孩子在一块儿,热汤热水!算了,不说了,回去挺尸睡大觉!”说罢,“牢骚大王”扭头而去。

不欢而散。另外三位排长见老K甩不成,也都走了。

梁三喜对我说:“炮排长这个人呀,别听说话脏些,作风很正派。他当排长快六年了,讲资格是全团最老的排长了。论八二无后坐力炮和四〇火箭筒的技术,在全团炮排长中是坐第一把交椅的。他对步兵连的战术,也是呱呱叫。管理方法虽说生硬了些,但他对战士很有感情。实干精神那更是没说的。”停了会儿,梁三喜叹了口气,“咳!这人就是爱发牢骚,爱挑上面的刺,臭就臭在那张嘴上。连里和营里多次提议,想让他当副连长,可上面就是不同意。”

我没吱声。梁三喜面部悒郁地愣了会儿神,说:“以后慢慢就互相了解了。不早了,休息吧。”

我俩回到内间屋。他搬过一个纸箱,打开翻弄着,说要找出衣服明天好换洗一下。

他连个柳条箱也没有,看来这是他的全部家当。纸箱里,他的两套军装全旧了,有一套还打着补丁。下连后我听战士们反映,步兵全训连队的军装不够穿,他这当连长的当然也不例外。我见他纸箱里有个大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件崭新的军大衣。便问他:“这大衣是刚换发的?”

“不是。是去年‘十一’换发的。”

他这当连长的为啥连块手表也没有?他为啥总是抽黑糊糊的旱烟末儿?我已知道他老家是沂蒙山,而我也是在当年炮火连天的沂蒙山中出生的呀!按说,我们这一文一武,有好多话题可闲聊。然而,既然他还不晓得我是高干子弟,压根还不知我为啥要颠儿到这九连来,我可懒得跟他去谈啥沂蒙山……

躺在铺上,我浑身酸疼睡不安宁。听他也不时轻轻翻身儿。他大概认为我睡着了,划火柴抽起烟来。像他这样的人并不怕吃苦,大概也是感到寂寞难熬吧?

是想“春妮”了？我猜。

……我不知不觉地迷糊过去了。外面哗哗的雨声又将我唤醒。朦胧中，我听见他下床了。那扎腰带的声音告诉我，他要冒雨去查铺查哨。

当他轻手轻脚地走出去后，我心中涌起阵阵恻隐之情。是的，像他这样的连长，以及那些土头土脑的战士，无疑都是忠于职守的。对他们，我可以表示同情，怀有怜悯，甚至还可以赞美他们！但是，要让我长期和他们滚在一块儿，我却不敢想象……

咳！这被称为“熔炉”的连队，这真正的“大兵”生涯！没有“苦行僧”的功夫，我该如何继续熬下去！我又恨起“雷神爷”来，要不是为了躲开他，我何用“曲线调动”来九连“修炼”呀！

四

单兵爆破、土工作业、排连进攻、刺杀对抗、周末会操……团司令部下连按“操典”逐一进行验收，指导员竟毫无例外地要做一名战斗员接受考核。

支部建设、季度总结、“双学”评比、党团发展、谈心次数……团政治处要求政治工作渗透在练兵场，指导员的工作包罗万象，很难胜任。

最令我望而生畏的是每星期二早晨那“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尽管我几次都没跑到过目的地，但每遭下来，小腿肚儿准转筋，有一次还差点虚脱过去。另外，可供转化为“卡路里”的一日三餐，也常使我感到度日如年。馒头、大米、玉米面倒可放开肚皮吃，就是副食太差。我真不晓得造物主赐给人的胃都一样，为啥梁三喜他们竟吃得那般香甜。我几次试图让炊事班长改善一下生活，炊事班长叫苦不迭，说伙食标准没增加，物价日见涨。要改善也只能做些“金银卷”（白面、玉米面合制），把碗中菜用皮儿包起来（大包子）。

连队驻在深山沟，我有钱也没处下馆子。一次，我到团部开会时从服务社买回两包点心。人面前不敢吃，每次都是趁人不在时慌忙吞两块，那滋味就跟偷了人似的……

掰着指头数日子，我下连差两天还不到一个月。照照镜子：脸黑了！摸摸腮帮：人瘦了！

每次冲澡时我都发现，身上的皮一层一层朝下蜕……

我已两次给妈妈写信，让她加快展开“外交攻势”。妈妈来信说，她那头好说，准备安排我到军区新闻科当摄影记者，只是我这头还不行。她已给师里有关领导同志写过信、打过长途电话，得到的回音是：眼下不是前几年，调动之事切不可操之过急，过急了太显眼，太显眼容易出娄子。让我在连队干半年再调不迟

.....

天,半年?那我就熬成“瘦骆驼”了!

这天中午,我到营部开会回连,全连已吃过午饭。我到饭堂把炊事班留给我的饭菜胡乱吃了些,便回到宿舍倚在铺上想心事。

猛然间,紧急集合号响了。我忙扎好腰带,走出连部。

只见全连列队站在饭堂门前。梁三喜面对全连,脸上“乌云翻滚”：“……不像话!简直是不像话!”

想不到他的脾气竟是这样大,我第一次见他如此动怒。我不知连里出了啥不像话的事,便悄悄站在队列里洗耳恭听。

“馒头,有人把雪白的一个半馒头扔进了猪食缸!”他用手拍了拍心口窝,“同志们,扪心问一问,感情,我们还有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唉,还有没有?!”

我呆了!适才我吃午饭时,炊事班给我留了三个馒头在碗里,我只吃了一个半,便把剩下的扔进了猪食缸……

“解散!”梁三喜怒吼着,把手一挥,“现场参观!”

战士们围着饭堂旁边的猪食缸,唧唧喳喳地议论着。

靳开来把目标对上了段雨国:“段雨国,你这花花公子,说,这是不是又是你干的!”

段雨国大眼一瞪:“吃柿子单拣软的捏,你就看我好欺侮!面对上帝起誓,谁扔的谁是乌龟蛋!”

三班长出面证实,说中午吃饭时没见段雨国扔馒头。靳开来才不吱声了。

梁三喜余怒未息:“谁扔的,可个别找班长、排长讲一下。今晚各班都要召开班务会,好好议一下这种少爷作风!”

也许我对“公子”、“少爷”这样的字眼尤为敏感,我当下便认定是梁三喜将一个半馒头整我,是想转着圈子丢我的丑。我心中拱着一团火,扭头急步回到连部,气鼓鼓地倒在铺上。过了会儿,梁三喜进来了。我怒气冲冲地对他说:“连长同志,要整我,明着来!不必效仿‘文化大革命’先来个发动群众!一个半馒头,是我扔的!”

“指导员,我……不知你去营部开会已回来了。我确实不知那馒头是你扔的。要知道是你,我会同你个别交换意见的。”梁三喜尴尬地解释。

我“腾”一下转过身去,把脸对着墙壁,又听他叹口气说:“指导员,千万别为这事影响团结。我不是表白自己,我这个人……还没搞过那种背后插绊子的事。我和原来的王指导员共事三年多,俺俩争也争过,吵也吵过,有时也脸红脖子粗。但俺俩始终如同亲兄弟,团结得像一个人。”

我仍不吱声。停了阵,他讷讷地说:“我这就让司号员小金去通知各班,晚上

的班务会,不……不开了。”

为这事我三天没理梁三喜。

这事发生后的一天中午,战士段雨国趁梁三喜不在时溜进了连部。

“指导员,别理那‘七撮毛’!”段雨国察言观色地望着我,“上个月我把吃剩的一块馒头扔进了猪食缸,也是挨了‘七撮毛’一顿好整!”

“什么‘七撮毛’!”

“嘿嘿……是我用艺术手法给连长起的绰号。”段雨国得意地笑着,从梁三喜那破旧的绿色军用牙缸里取出一支牙刷,“指导员,你瞧瞧,他用的这支牙刷像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一撮,两撮,三撮……哟,不是七撮,是九撮……这不,又掉下一撮来,那么,就叫他‘八撮毛’吧!”

我没吱声。和梁三喜一个月的相处,我虽没数过他的牙刷还剩几撮毛,但我早已看出他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十二分地俭省。

“每月六十元的军官,他连支新牙刷都不买!”段雨国把那“八撮毛”的牙刷扔进牙缸里,“攒钱,就知道攒钱,典型的小农民意识!世界已进入高消费的时代,听说日本人衣服穿脏了连洗都不洗,扔进垃圾堆里就换新的。可咱这里,‘八撮毛’竟然借一个半馒头整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也!”

看来段雨国是来寻找“同盟军”,跟我搞“统一战线”来了。尽管我对梁三喜已怀有成见,但指导员这职务最起码的约束,我也不会跟段雨国这样的战士搞在一起。

见我不吭气,他又搭讪道:“指导员,你还不赶快调走呀!”

我一惊:“你听谁说,我要调走?”

段雨国笑了笑:“还用谁说,我自己估计呗!”

我沉下脸来:“你……不能瞎说!”

“这怕啥哟。事情明摆着,咱们跟‘八撮毛’那样的乡下佬在一起,哪有共同语言?哪有共同向往?年底,我就打报告要求复员!”说罢,他又跟我套近乎,“指导员,你要买大彩电和收录机啥的,给我说一声就行。我爸妈都在外事口工作,买进口货对我段雨国来说,是小菜一碟!价格嘛,保准比市面上便宜一半……”

“我啥也不会托你买!请回吧。”

见我冷冰冰的样子,段雨国才怏怏而去。

……

十月中旬,梁三喜的休假报告批下来了。他几次打点行装要动身回沂蒙山,但几次又搁下了。

想走又觉得不能走,我看出他的心情是极为复杂和矛盾的。显然,他早已觉出我是个十二分不称职的指导员,他担心他走后我会把连队搞得一团糟……

这天,他去团部参加为期一天的军训会议返回连里,已是晚上八点多了。

灯下,他把军训会议的精神简要地对我讲了一下,说转眼就是年终考核,劲可鼓不可泄。说罢,他望着我:“指导员,我想明天就动身休假。这样,回来还误不了年终考核。你看呢?”

“那就走呗!”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他。

他把黑糊糊的早烟末卷起一支,吸了两口,很难为情地对我说:“指导员,我这个人有话憋在心里怪难熬的。前些日子我就听说过,这次去团部开会,我又听到关于你要调走的风言风语。”

我打了个愣。

他接上道:“我想,这也可能是有人瞎传。不过,你真要调走的话,这假我暂时不休了。如果没有那回事,那我明天就动身。”

事情既已点破,我也就不在乎了。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休不休假,你自己看着办!至于有人议论我,舌头长在他们嘴里,我任凭他们说长道短!反正组织上还没通知我,把我调走!”

他没有再说啥。第二天,他没有动身。以后,他再也不跟我提休假的事了。

我和连长梁三喜以及连里几位排长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明显了。每逢星期六晚上,连部里空荡荡的,他们早就不愿和我凑到一块儿甩老K和逗笑取乐了。

一天,连里进行正常性的战备教育。按团政治处拟定的教育内容是:把越寇近年来在我广西和云南边境多次进行的武装挑衅,综合起来给战士们讲一次,以激发大家的练兵热情。我便找来一些报纸,念了几篇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消息、通讯,以及我外交部对越南当局的照会等等。我毫无个人发挥,完全是照本宣读……

下课后,炮排长靳开来竟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指导员,飞机上挂暖瓶,你的水平高得很味!不错,你讲得很不错,我们就爱听你上政治课!你放心,啥时打起仗来,我们保证跟着你这指导员的屁股后头,一个劲地往前冲!”

面对他的讥讽挖苦,我扭头而去……

我调动的事,妈妈抓得越来越紧了。每隔几天,我总会收到她的信。她在信中不断向我说明调动一事的进展,叹息她从来没遇到过这么难办的事……

我本想“曲线调动”的事连里是不会知道的。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时,尽管连里还没谁了解其全部内幕,但我来九连是为了调走这一点,不仅连里干部全知道,连消息灵通的部分战士也挤眉眨眼地晓得了。

我苦熬硬撑到十一月底。这天,我又收到妈妈一封信。她在信中告诉我,调动的事总算有眉目了。她让我一旦接到调令,务必尽快离开连队。她在信的结尾部分,煞是神秘地告诉我,说她听说我们这支部队可能有行动。但告诫我:切莫声张!切莫瞎传!

面对两个带叹号的“切莫”，我琢磨不透我们这支部队能有啥行动。不错，南边的形势是够紧张的，但那是小打小闹，枪声离我们这里还远着呢！我竟违背了妈妈的叮嘱，趁没人时悄悄把电话挂到师里那位帮我办调动的领导家里，当我把意思拐弯抹角地说明后，对方哈哈笑了起来，说他压根还没听到啥，说我妈妈的神经太过敏了……

我放心了。但我却一天也不愿在连队里熬了。我天天盼着调令快来！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心烦意乱地到山溪边散了会儿步返回营房。当我走到连部窗前时，听屋内梁三喜和靳开来在高声谈论，我便悄悄停下来。

靳开来：“连长，除了那件大衣是新的，你总共就那么点破家当，又穷鼓捣啥！”

梁三喜：“伙计，你也抽空拾掇拾掇吧，看来是快开拔了。”

靳开来：“开拔？见鬼，往哪开拔？”

梁三喜：“往南边！你不觉得该打一仗了？”

靳开来：“仗看来是要打的。可全国这么多军队，你咋知我们这支部队要往前开？”

梁三喜：“你别问了。等着瞧就行了。”

靳开来：“连长，是不是上面已给你透风了？……怎么，对咱还保密呀！”

梁三喜：“上面没谁给我透风。该咱连级干部知道的事，老百姓也差不多知道了。”

靳开来：“那，你是……”

梁三喜：“我是从指导员他母亲那里得来的消息。”

靳开来：“活见鬼，那老娘们儿能给你啥消息！”

梁三喜：“你真是个直肠子。你就没想想，为啥她对指导员的调动抓得那么急？我听团里的干部干事说，这些天指导员的母亲几乎天天往师里打电话……”

靳开来：“嗯。有道理！听说那老娘们儿神通广大，她知道消息要比师长、军长还早呢！”

梁三喜：“这不就得啦。我看部队在十天八天之后要上前线！这事你千万要保密，绝不能瞎嚷嚷。”

靳开来：“奶奶的！只要是共产党坐天下，那老娘们儿胆敢在部队上前线时把她儿子调回去，看我靳开来不自费告状到北京！”

……

十天之后我终于拿到了调令！

然而，想不到梁三喜竟能料事如神！当我就要离开连队时，一声令下，我们这支部队果真要上前线，要开拔！

当天,炊事班一下便宰了四头猪,但却来不及吃了!

进亦难,退更难。我处在万分矛盾当中!

“滚蛋,你给我赶快滚蛋!”忠厚人梁三喜一下变成靳开来,他面对我劈头盖脸地痛骂,“奶奶娘!你可以拿着盖有红印章的调令滚蛋,我可以再请求组织另派一位指导员来!但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人,你不会不知道你穿着军装!现在,你正处在一道坎上,上前一步还好说,后退一步你是啥?有的是词儿,你自己去想!你自己去琢磨!”

五

长龙般的专列闷罐车载着武器和士兵,昼夜兼程。在九连坐的两节闷罐子里,有我这拿到调令没敢退却的指导员。

不用梁三喜直着骂,我当然也晓得,军人效命沙场,当应义无反顾。倘若在这种时候离开这支部队,那将是对军人称号的最大玷污!众口唾我是“逃兵”算是遣词准确,破口骂我是“叛徒”也毫不过分……

部队开到云南边防线,大家才知道这所谓边防实际上是有边无防。可红河彼岸,我们用肉眼便可看到一个挨着一个的永备性、半永备性的碉堡工事。如果拿起望远镜,就能清晰地看见那瞄准我们胸膛的黑洞洞的射击孔。而我们这边,多年来却一直高喊把自己的国土,当作对方“最辽阔的大后方”……

如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还击,一切都显得紧迫而仓促。一下拥来这么多部队,安营首先成了大问题。团以上指挥机关挤进了地方机关的办公室。连队则分散在深山沟里,用青竹、茅草、芭蕉叶和防雨布,搭成了各式各样的“营房”。为防空防炮,还常常住进那刚挖的又潮又湿的猫耳洞……

当我们九连听了边民有家不能归的控诉,现场参观了河口县托儿所被越寇用机枪横扫后的惨状后,求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到连部。尽管上级不提倡写血书,连里还是有几位战士咬破了中指……可我这个当指导员的,人虽跟着九连来了,心里却仍在打小鼓。我懊丧自己自作自受,我后悔当初不该放着摄影干事的美差不干,来到这九连搞啥“曲线调动”!眼下,我唯一的希望是离开这战斗连队,回到军机关……

于是,我便悄悄找军里和我要好的同志,让他们侧面反映一下,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我重新调回军机关。恰在这时,军党委做出一个十分严厉的决定:凡在连队和基层单位的高干子女,一律不准调到机关里来。已经调的要坚决送回基层,个别因有利于打仗确实需要调的,不管其是干部还是战士,均需军党委审批才能调动。否则,按战时纪律予以追究。

我听后,心里凉了半截。

梁三喜对我的态度倒还够意思。在他骂我滚蛋时我没还嘴,见我跟着连队来了又没离开连队,他不仅没再向我投来鄙视的目光,反而像我刚下连时那样主动找我商量工作。我还觉察到,他已给连里的其他干部悄悄做过工作了。当我们坐着闷罐车往前线开时,一路上靳开来曾不时地说些风凉话给我听。而眼下,他见到我尽管脸还放不开,但大面上也总算说得过去了。

连队进入了临战前的突击性训练。为适应在亚热带山地丛林中作战,团里让我们九连练爬山,练穿林。这比那“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更够人喝一壶的。梁三喜累得嗓音嘶哑,眼球充血,嘴唇龟裂,那瘦削的脸膛更见消瘦了。就连被誉为“轻型坦克”的靳开来,脸颊也凹陷了。至于我,那就更不用提了。我累得晚上睡觉连衣服都懒得脱,常产生那种“还不如一颗流弹打来,便啥也不知道才好”的念头……

我和妈妈已有二十多天中断了联系。来到前线后,料她也无神通可施展了,我也就懒得再给她去信。这天,从后方留守处转来连队一批信件,其中有我三封。一封是柳岚从军医大学写来的,她在信中质问我为啥接到调令后还不回去,讥笑我是不是想当什么英雄了。她毫不掩饰地写道:现在的大学生宁肯信奉纽约伯德罗埃岛上的铜像(自由女神),也决不崇拜斯巴达克斯……另外两封信是妈妈写来的。头一封信她让我离开连队动身时给她拍个电报,她好派车到车站接我回家。第二封信她已觉出事情不妙,似乎也深知在这种时刻调我回去的利害关系。她问我是否因周围有不良反应才没走成,如果觉得实在不能调走,那就无论如何也得离开连队,重回军机关工作方为上策。

妈妈的“上策”和我的心思吻合了。

此时,我多么想赶快离开九连回军部啊!而重回军部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雷军长身上。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多次给我讲过的她救过“雷神爷”一命的往事:

一九四三年秋。近二万名日寇纠合吴化文、刘桂堂(即刘黑七)等部的皇协军,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当时,雷军长是山东军区独立团的一营营长,妈妈是团所属“地下医院”的指导员(因医院的所谓床位不过是一些堡垒户的炕头,故称地下医院)。一营在掩护山东分局机关和渤海银行机关转移时,被敌包围了。人称“雷神爷”的雷营长,率全营四百余众与敌展开血战。战斗从上午十时许打响,直到黄昏,机关安全转移了。这时,“雷神爷”所率的四百余众尚存不足百人,而且大都挂了彩。“雷神爷”也多处负伤,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中。担负救护伤员的妈妈,借着暮色的掩护,冒着纷飞的弹雨,在一片死尸堆里寻找还未死去的伤号。当妈妈用手一捂“雷神爷”的嘴,觉出“雷神爷”还有一丝

呼吸,便将他背在身上,从死尸堆里一步一步爬了出来……

为躲过敌人的清剿,妈妈把“雷神爷”安置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妈妈把一头乌发推成光头,从乡亲们那里借得一顶瓜皮式旧毡帽戴在头上,腰缠一根鬃绳腰带,扮成一个看山林的穷小子,日夜守护着“雷神爷”。妈妈千方百计地为“雷神爷”寻找药物。没有绷带,她把自己唯一的一床被面用开水消毒后,撕成了条条……

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妈妈听到洞外有声声怪叫。出得洞来,借着一道闪电,妈妈发现有四五只狼睁着绿森森的眼睛,嗥叫着向洞口拥来。显然,是“雷神爷”的伤口腐烂,让野狼嗅到了味儿。妈妈将驳壳枪上了顶门火,但怕暴露目标又不敢鸣枪。她便抓过一把镐头立在洞口,与饿狼对峙到天色破晓……

妈妈承受了一个女同胞极难承受的艰险,精心护理“雷神爷”,终于使“雷神爷”死而复生。

在“雷神爷”康复归队那天,他紧紧攥着我妈妈的手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我雷神爷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了你这女中豪杰!”

这真是生死之交!没有妈妈,你“雷神爷”能活到今天当军长吗?!要知道,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尽管你“雷神爷”摆出副“铁面包公”的架势,可妈妈在最关键的时刻求你点事,难道你真会不帮忙吗?再说,我本来就是军机关里的人,军机关也要参战,调我回去并不是啥出大格的事嘛!只要你“雷神爷”说一句“这是工作需要”,那就名正言顺了!

想到这些,我忙给妈妈写了封信,火速发出。

我们在阵地上度过了春节。这时,各连的干部配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我们九连的副连长调到团司令部侦察股任参谋去了。曾发牢骚说自己是“鸡肋”的炮排长靳开来,被任命为副连长……

一个星期又熬过去了。我估计妈妈已收到我的信,我盼着妈妈快写信给“雷神爷”!

战前的训练已停止,各连都在反复检查携带的装备,开始养精蓄锐了。

迟了!我调回军部的事看来是办迟了!

二月十四晚上(后来才知道,此时距十七日凌晨发起进攻,只有五十小时),师里组织排以上干部看内参电影《巴顿》。

看完电影,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师参谋长通过扩音器大声宣布,说军长正忙着最后审定我们师的作战方案,让大家静坐等待,一会儿军长要来讲讲话。

“嗨,我们的巴顿要来讲讲话了!”不知是谁这样小声喊了一句。

我知道,在座的好多人看完《巴顿》后,是很容易把军长跟巴顿将军联想在

一起的。

少顷,人们探头探脑地说军长来了。我一瞧,正是“雷神爷”驾到!

雷军长身高顶多有一米七〇出头,是个干练的瘦老头儿,绝没有巴顿将军的块头。但他却比巴顿更令他的同僚和部属敬畏。他平时走路也按“每步七十五公分”的“操典”进行,腰板笔直,目光平视,一举一动都显出军人的英武和豪迈,将军的自信和威严。

他捷步登上土台子,师参谋长忙把麦克风给他左右矫正了一下。

军长用目光环视了一下这设在山间的露天会场,那俯瞰尘寰的架势告诉人们,他,他统帅的这个军,永远是天下无敌的!

这时,只见他脱下军帽,“砰”地朝桌子上一甩,震得麦克风动了一下。

仅此一甩帽,会场便骤然沉寂。静得像无波的湖水,连片树叶儿落下也会听得见。

在我们军里,谁没听说过雷军长“甩帽”的轶事啊!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席卷神州之后,军机关所在地C市的“左”派要夺市委的大权,“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打电话给军里,让军方支持C市“左”派夺权,并指出军里可派一名主管干部,任C市“三结合”红色新政权的第一把手。在此之前,军里派出的支“左”观察小组已把得来的情况报告过军长,军长已知道参加夺权的那位造反派头头,是个偷鸡摸狗的人物;而准备参加“三结合”的那位革命老干部,则是军长早就一见就烦的“滑头派”……

军长主持召开军党委会,把军帽猛地朝桌上一甩:“不怕罢官者,跟我坐在这里开会!对那帮乌合之众要夺市委的大权,我雷某决不支持!怕丢乌纱帽者,请出去!请到红色新政权中去坐第一把交椅!”……

甩帽的后果:他丢了军长的职位,被押进了学习班。

C市“左”派夺权后搞得实在太不像话。一年之后,连“中央文革”也不喜欢他们了。军长这才从禁闭式的学习班回到军里。但是,军长的职位早有人占了,他便成了个无行政职务的军党委会常委。接着,林彪抓什么“华野山头”,他又一次在军党委会上甩帽,为陈老总评功摆好……

根据军党委会会议记录,十年中军长曾四次甩过军帽。对于甩帽的后果,有几句顺口溜作了描述:“军长甩军帽,每甩必不妙,不是蹲班房,就是进干校。”

眼前,这“雷神爷”为何又甩帽?人们目瞪口呆!

只见他在台上来回踱了两步又站定,双手扶腰,怒气难抑。

终于,炸雷般的喊声从麦克风里传出:“骂娘!我雷某今晚要骂娘!!”

谁也不晓得军长为啥这般狂怒,谁也不知道军长要骂谁的娘!

他狂吼起来:“奶奶娘!知道吗?我的大炮就要万炮轰鸣,我的装甲车就要隆

隆开进！我的千军万马就要去杀敌！就要去拼命！就要去流血！！可刚才，有那么个神通广大的贵妇人，她竟有本事从几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这前沿指挥所！此刻，我指挥所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可那贵妇人来电话干啥？她来电话是让我给她儿子开后门，让我关照关照她儿子！奶奶娘，什么贵妇人，一个贱骨头！她真是狗胆包天！她儿子何许人也？此人原是军机关的干事，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

顿时，我脑袋“嗡”地像炸开一样！军长开口骂的是我妈妈，没点名痛斥的就是我啊！

骂声不绝于耳：“……奶奶娘！走后门，她竟敢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我在电话上把她臭骂了一顿！我雷某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走后门，谁敢把后门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没二话，我雷某要让她儿子第一个扛上炸药包，去炸碉堡！去炸碉堡！！……”

排山倒海的掌声淹没了“雷神爷”的痛骂，撼天动地的掌声长达数分钟不息……

军长又讲了些啥，我一句也听不清了。

那一阵更比一阵狂热的掌声，送给我的是嘲笑！是耻辱！！是鞭笞！！

……………

我差点晕了过去。我不知是梁三喜还是谁把我扶上了卡车，我也不知下车后是怎样躺进连部的帐篷的。

当我从痴呆中缓过来，我放声大哭。

“哭啥，哭顶个屁用！”梁三喜愤慨地说，“不像话，你母亲实在太不像话！她走后门的胆子太大了！”

我仍不停地哭。梁三喜劝慰我说：“谁都会犯错误，只要你能认识到不对，就好。仗还没打，战场上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眼泪哭干了，我又处于痴呆的状态中。

天将破晓了，起床号还没吹。这时，一片议论声又传进帐篷：

“军长骂得好，那娘们儿死不要脸！”不知是谁这样说。

“奶奶的！说一千，道一万，打起仗来还得靠咱这些庄户孙！”靳开来大声嚷道，“上了战场谁敢后退，看我不一枪先崩了他！”

“哼，连里出了个王连举，咱都跟着丢人！”啊，那又尖又嫩的童音告诉我，说这话的是不满十七岁的司号员金小柱。我下连后，小金敬我这指导员曾像敬神一般！可自我拿到调令那天起，他常撅着小嘴儿朝我翻白眼啊……

“别看咱段雨国不咋的，报效祖国也愿流点血！咱决不当可耻的逃兵！”啊，连“艺术细胞”段雨国也神气起来了……

我麻木的神经在清醒,我滚滚的热血在沸腾!奇耻大辱,大辱奇耻,如毒蛇之齿,撕咬着我的心!我想行凶——军中败类!我想自杀——轻如鸿毛!!

我乃七尺汉子,我乃堂堂男儿!我乃父母所生,我乃血肉之躯!我出生在炮火连天的沂蒙战场上,我赵蒙生身上不乏勇士的基因!我晓得脸皮非地皮,我知道人间有廉耻!我,我要捍卫人的起码尊严!我要捍卫将军后代的起码尊严!!

我取出一张洁白的纸,一骨碌爬起来冲出帐篷。

我面对司号员小金:“给我吹紧急集合号!”

小金惊呆了,不知所措。

我神经质般的:“给我紧急集合!!”

梁三喜跟过来,轻声对小金说:“吹号。”……

面对全连百余之众,我狂呼:“从现在起,谁敢再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我和他刺刀见红!是英雄还是狗熊,战场上见!”

说罢,我猛一口咬破中指,在洁白的纸上,噌!噌!噌!用鲜血写下了三个“!!!”惊叹号!

……

说到这,赵蒙生两手捂着脸,把头伏在腿上,双肩在颤动。我知道,他已陷进万分自责的痛苦中。

“咔”的一声响,又一盘磁带转完了。过了会儿,我才轻轻取出录好的磁带,又装进一盘。

良久,赵蒙生才抬起头来,放缓了声调,继续对我讲下去——

六

我们团受领的任务是打穿插。即在战幕拉开之后,全团在师进攻的正面上,兵分数路从敌前沿防线的空隙间猛插过去,楔入纵深断敌退路,在保证大部队全歼第一道防线之敌的同时,为后续部队进逼敌第二道防线取得支撑点。

我们三营任团尖刀营,九连受命为营尖刀连。这就使我们九连一下在全团乃至全师居于钢刀之刃、匕首之尖的位置上!

上级交给我们九连的具体任务是:在战幕拉开的当天,火速急插,务必于当天下午六时抵达敌364高地前沿,于次日攻占敌364高地,并死死扼守该高地。

从地图上看:由无名高地和主峰两个山包组成的364高地,距我边境线直线距离有四十余华里。位于通往越南重镇A市的公路左侧,是敌阻击我南取A市的重要支撑点。

据情报得知:364高地上有敌一个加强连扼守,阵地前设有竹签、铁丝网,布有地雷,高地上有敌炮阵地、多梯次的堑壕和明碉暗堡……

是军长要实践他第一个让我炸碉堡的诺言,还是因九连是全团军事训练的先行连,才使这最艰巨的任务一下便落到我们九连头上?(全营各连曾为争当尖刀连纷纷求战,而营、团两级几乎是毫无争议地便拍板定了我们九连,并说是军长点头让九连先上。)对于这些,我不愿去琢磨了。

全连上下都为争当了尖刀连而自豪。但大家更明白:摆在我们九连面前的,将是一场很难想象的恶仗!

按照步兵打仗前的惯例:全连一律推成了锃亮的光头,一是为肉搏时不致被敌揪住头发,二是为头部负伤时便于救治。

炊事班竭尽全力为全连改善生活,并宣布在国内吃的最后一顿饭将是海米、猪肉、韭菜馅的三鲜水饺。我发现,即使每月拿六元津贴的战士,会抽烟的也大都夹起了带过滤嘴的高级香烟。连从来都抽劣等旱烟末的梁三喜,竟也破例买了两盒“红塔山”。靳开来买来两瓶精装的“五粮液”,硬拉我和其他连、排干部一起醺一口……

人之常情啊,这一切都在告诉我,大家都想到将去决一死战,都想到这次将会流血牺牲。而在告别人生之前,要最后体味一下生活赐予人的芳香!

连里已决定一排为尖刀排。党支部再次开会,商定连干部谁带尖刀排。

团里搞新闻报道的高干事列席了我们的支委会。当上级把尖刀连的重任交给我们连之后,他便来到连里搜集求战书和豪言壮语。显然,一旦我们九连打出威风,那将是他重点报道的对象。

支委们刚刚坐下,靳开来便站起来说:“这个会根本不需要再开嘛!查查我军历史上的战例,副连长带尖刀排,已是成文成规的章程!既然战前上级开恩提我为副连长,给了我个首先去死的官衔,那我靳开来就得知恩必报!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子来!”

高干事没有在他的小本上记,这些牢骚话显然毫无闪光之处。

我沉痛地表示:“执行军长让我第一个炸碉堡的指示吧,这尖刀排,我来带!”

“指导员,你……”梁三喜严肃地望着我,“尖刀排,哪能让你带!”

靳开来接上道:“指导员,我靳开来已觉出你是个有种的人!已过去的事我不提了,也不准你再提起!从现在起,我们将患难相依,生死与共!指导员是连队的中枢神经,要死,第一个也轮不到你!”

他的话充满真诚的感情,我眼里一阵发热。

梁三喜刚提出要带尖刀排,就被靳开来大声喝住:“连长,少啰唆!要带尖刀

排,比起我靳开来,你绝对没有资格!”

我和高干事都一愣。

靳开来接上对梁三喜道:“当然,讲指挥能力,我靳开来从心里服你;论军事素质,你也比我靳开来高一筹!我说的资格是:我靳开来兄弟四个,死我一个,我老父老母还有仨儿子去养老送终,祖坟上断不了烟火。可你梁三喜,你家大哥为革命死得早,二哥为他人死得惨,惨啊!就凭这,不到万不得已,你梁三喜得活下来!”他转脸对我和高干事,“你们不知道连长家的事……咳!我这个人,就愿意把话说得白一些,尽管说白的话怪难听。”

我心里沉甸甸的。下连这么久了,我竟对连长的身世一无所知!看来,连长家中不知遇到过啥样的不幸。而眼下我们已来不及去聊那些事了。

靳开来擦了擦发湿的眼睛:“连长,我说句掏心话,全连谁‘光荣’了,我都不会过分伤心,为国捐躯,打仗死的嘛!唯独你,如果有个万一……你那白发老母亲,还有韩玉秀怎么办……咳!小韩该是早已经生了,可你还不如她生的是男是女啊!”

梁三喜摆了摆手,声音有些颤抖:“副连长,别说那些了!”

我眼里阵阵发潮。怪我,都怪我这不称职的指导员,使连长早该休假却没休成!

“行了。别开马拉松会了。顺理成章,带尖刀排的事,听我的。”靳开来拍板定了音。

接着,我们又进一步设想行动后可能遇到的难题,议论着对付困难的办法。

散会时,靳开来对高干事笑了笑:“喂,笔杆子!一旦我靳开来‘光荣’了,你可得在报纸上吹吹咱呀!”说着,他拍了拍左胸的口袋,“瞧,我的豪言壮语就装在这里,写了一小本子,字字句句闪金光!伙计,怕就怕我到时候踏上地雷,把小本子也炸飞了,那可就……”

梁三喜:“副连长!你……”

靳开来:“开个玩笑嘛!高干事又不是外人,怕啥?”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一切又是何等仓促。

二月十六日下午,从济南部队和北京部队调到我们团一大批战斗骨干,都是班长以下的士兵。团里照顾我们这尖刀连,一下分给我们十五名。显然,他们是从各兄弟部队风尘仆仆刚刚赶到前线。抱歉的是,我们既没有时间组织全连欢迎他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来不及登记,就仨仨俩俩地把他们分到各班,让他们和大家一起去吃“三鲜”水饺去了!

夜幕降临,我们全连伏在红河岸边待命。

① 前线战士们把“光荣”作为牺牲的代名词。

战斗打响前,最大权威者莫过于表的指针。人们越是对它迟缓的步伐感到焦急,它越是不肯改变它那不慌不忙的节奏。当它的时、分、秒针一起叠在十二点上时,正是十七日凌晨。

骤然,一声炮响,牵来万声惊雷,千百门大炮昂首齐吼!顿时,天在摇,地在颤,如同八级地震一般!长空赤丸如流星,远处烈焰在升腾,整个暗夜变成了一片深红色。瑰丽的夜幕下,数不清的橡皮舟和冲锋舟载着千军万马,穿梭往返,飞越红河……

此时,一种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侮的情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更感到自己愧为炎黄子孙!

全连在焦急的等待中迎来了破晓。早晨七时半,冲锋舟把我们送到红河彼岸。

刚过河,就看到从前沿抬下来的烈士和伤员,连里几个感情脆弱的战士掉泪了。

靳开来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把倭家大刀。他把银灼灼的大刀当空一抡:“掉啥泪?哭个尿!把哭留给吃饱了中国大米的狗崽子们!看我们不揍得他们鬼哭狼嚎!”说罢,他转脸对为我们九连带路的华侨说,“老哥,你在身后给我指路,一排,跟我来!”

尖刀排沿两山间的峡谷朝前插去。梁三喜和我率领大家急速跟进。

刚插进不多远,便遇上一群被我正面攻击部队打散的敌兵。他们用平射的高射机枪、枪榴弹、冲锋枪,三面朝我连射击。

“卧倒!”梁三喜一把将我摁倒,厉声下达命令:“三排,占领射击位置,打!”

梁三喜手中的冲锋枪打响了。少顷,三排的轻、重机枪一齐“咕咕咕”叫起来。

我刚端枪瞄准敌人,梁三喜转脸对我喊道:“我带三排留下掩护,你带大家尽快甩开敌人!”

“我留下!”说着,我射出一串子弹。

“执行预定方案,少废话,快!”

梁三喜的话是不容反驳的!我的指挥能力,怎能同他相比啊!

我带二排和炮排匍匐前进躲过敌射界,纵身跃起,紧紧尾随尖刀排上前急插……

十时许,梁三喜才率三排跟了上来。他用袖子抹了抹满脸硝烟和汗水,沉痛地告诉我,有两名战士牺牲了,一名战士负了重伤。烈士遗体 and 伤号已交给担任收容任务的副指导员……

越南北部山区,草深林密,路少坡陡。杯口粗的竹子紧紧挤在一块儿,砍不断,推不倒,硬是像道道天然屏障。芭茅草、飞机草高达两米以上,草丛中夹着杂

木,杂水中盘着带刺的长藤。节令刚过“雨水”,这里的气温竟高达三十四五度。这一切,都给我们急速穿插的尖刀连带来不可想象的困难。

我们心急火燎地沿无路可寻的山洼插进,只见尖刀排在前面停住了。跟上去一看,面前是三米多宽、两米多高的木薯林,钻过去无空隙,爬上去又经受不住人。靳开来手抡傣家大刀,左右横飞,为全连砍通道路……

这时,营长在报话机中呼叫,问我们九连的位置。梁三喜忙展开地图,现地对照。一个扛着八二无后坐力炮的战士凑过来,瞧了几眼地图,一下用手在地图上指点说:“在这儿,错不了,这就是我们九连的位置。”

梁三喜点了点头,看了看眼前这位昨天下午刚补进我连的战士,便对着报话机向营长报告了我们所处的位置。

报话机中传来营长焦急的声音:“太慢!太慢!加快速度!要加快速度!”

“是!”梁三喜回答营长后,站起身对全连命令道:“把背包、多余的衣服,统统扔掉!尖刀排继续头前开路,二、三排和连部的同志,协助炮排携带弹药!”

战士们立即照办了。梁三喜的决定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步兵排每人负重六十多斤,炮排每人负重九十多斤,要加快穿插速度,是得扔掉一些不急需的玩意儿才行啊!

当这一切办完之后,梁三喜问眼前那位识图能力极强的战士:“你,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

“北京部队。”

“叫啥名字?”

“嘿,说名字一时也记不准。我们刚补进来的十五名同志,就我自己是从北京部队来的。干脆,就叫我‘北京’好了。”

这自称“北京”的战士,稍高的个头,长得挺秀气,浓眉下的眼睛一闪一眨,热情,深邃,奔放。显得煞是机灵聪敏。

“那好。你就跟在我身边行军。”梁三喜说。显然,他已觉得身边极需这位很有一套的战士。

我们加快了穿插速度。在通过一道山梁时,又两次遇到小股敌人的阻击。仍是由梁三喜率三排断后掩护,我们很快就甩开了敌人,拼死拼活地往前插……

营长不时地在报话机中询问我们的位置,每次都嫌我们行动迟缓。

下午三时许,营长又一次呼叫我们。战士“北京”又很快在地图上找到了我们的位置。

梁三喜向营长报告后,报话机中的营长火了:“师、团首长对你们行动迟缓极不满意!极不满意!如不按时抵达指定位置,事后要执行战场纪律!执行战场纪律!!喊赵蒙生过来对话。”

梁三喜移动了一下,我蹲到报话机旁。

“赵蒙生!赵蒙生!你战前的表现你清楚!刚才军长在报话机中向我询问过你的表现!你要当心,要当心!政治鼓动要抓紧,要抓紧!不然,战后你跳进黄河洗不清,洗不清!……”

我的头皮又嗖嗖发麻。梁三喜推开我:“营长同志,政治鼓动很重要,很重要!但是我们没空多啰唆!有啥指示,你快说!”

“梁三喜,你别嘴硬!战场纪律,对谁都是无情的!”

营长的喊话停止了。从尖刀排位置折回身来的靳开来,牢骚开了:“娘的!让他们执行战场纪律好了!枪毙,把我们全枪毙!他们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可我们走的是直线距离吗?让他们来瞧瞧,这山,是人爬的吗?问问他们,路,哪里有人走的路!……”

“副连长,少牢骚!”梁三喜额角上的青筋一鼓一跳地蠕动着。

靳开来不吱声了。

梁三喜厉声对战士们命令:“武器弹药携带好,每人留下两顿饭的干粮,另外是水壶,水壶绝对不能丢!其余的,统统扔掉!”

……

没有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人,压根儿想象不出我们这尖刀连在穿插途中的窘迫之状。为争取按时抵达指定地点,我们冒着酷热在亚热带高山密林中穿行,上山豁出命去爬,下山干脆坐下连滑加滚,一个个衣服全扯碎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太阳沉下去了,四周影影绰绰,我已辨不出东西南北。腿早已不打弯了,我跟着大家死死地往前蹿。当听见梁三喜说已到达指定位置时,我一头栽倒了。

梁三喜架起我做惯性运动。我定了下神,见全连绝大部分战士也都倒在了地下。

梁三喜边架扶着我边命令:“都起来,互相协助,活动一下。”他突然松开我,轻声呼唤,“小——金,小金!”

我一看,只见司号员小金栽倒在面前的草丛中。

梁三喜晃动着小金:“小金!金小柱……”

听不见小金的聲音。

我和梁三喜忙把小金身上的装备卸了下来:冲锋枪、子弹袋、十二枚手榴弹、飘着红缨穗的军号、两包压缩饼干、水壶。另外,还有沉重的四发八二无后坐力炮弹——显然,这是他在穿插途中,遵照连长的指示,从炮排战友身上,背到了他的背上……

梁三喜坐下把小金扶起,让小金倚在他怀中。他取过小金的水壶晃了下,听

见有点响声,便将水壶对上小金的嘴:“小金,醒醒,喝点水……”

小金嘴唇紧闭,毫无反应。

我忙给小金做人工呼吸,但无济于事。

我用手一摸,小金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梁三喜眼中涌出滴滴泪珠。他用毛巾擦拭着小金脸上的泥垢和汗渍。小金那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胖乎乎的两腮上,各有一个浅浅的小酒窝……

他还没来得及为全连进攻吹响冲锋号,他没能杀敌立功,就这样安详地睡去了,永远地睡去了。

事后,我反复想过,如果小金扔掉水壶和干粮,不给炮排背那四发炮弹,他也许不会……也许因为他太年轻,也许他的心脏或身体的某个部位本来有点小毛病,使他承受不了如此剧烈的穿插。啊,这位不满十七岁的士兵是累死在战场上的!

我抚摸着他那圆鼓鼓的手,抽泣着。我下连后,就是这双手,曾天天早晨给我打好洗脸水,把牙膏都给我挤在牙刷上;就是这双手,曾给我一次次的洗军装;也是这双手,在那“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时,将摔倒的我扶了起来……我年龄几乎比他大一倍,可我……小金呀,原谅我吧,我不会是个永远都不称职的指导员,更不会成为“王连举”!

战争期间,时间是以分秒计算的。当我们到达364高地前沿时,已是晚上八点零二分。比上级指定的到达时间,误了一百二十二分钟!

然而,我们九连是问心无愧的。

七

梁三喜命令各班检查了装备,武器弹药没有丢损。只是大部分战士梁三喜已把水壶和干粮全扔在穿插途中了。他让各排把仅有的干粮和水集中起来分配。吃了一顿半饥不饱的共产式的“大锅饭”之后,全连基本上粮尽水绝了。

我的水壶和干粮也在穿插途中扔掉了。梁三喜塞给我半包压缩饼干我没接,我瞒他说自己还有吃的。他把小金留下的水壶硬是塞给了我。我怎忍心喝小金留下的水啊!我把那半壶水连同小金为炮排背来的四发炮弹,一起交给了炮排……

夜,黑得像看不到边,窥不见底的深潭。

山崖下的灌木丛中,梁三喜召集各班、排长围拢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他在暗夜中铺开地图,借着圆珠手电笔那圆圆的光点,用手点了点由无名高地和主峰两个山包组成的364高地。接着,他让那位带路的华侨,谈一谈364高地

敌人设防的情况。

我们的向导,是位三十四五岁的庄稼汉。穿插途中,我们派两位体格最棒的战士空手拉扯着他,才使他和我们一起赶到目的地。他是在越南当局反华、排华后蒙难回国的,他原来的家离这364高地不远。但遗憾的是,他对敌军事方面的布防所知甚少。他仅告诉我们,从一九七四年春开始,就看到有越南鬼子在前面的两个山包上构筑碉堡和工事。别的,他啥也不知道了……

面对敌人苦心经营的364高地,大家思忖着。

梁三喜已把战士梁三喜“北京”视为连里的“高参”。此时,他对挨在他身边的“北京”说:“‘北京’同志,先谈谈你的想法吧。”

“那好。我先谈点不成熟的设想,以便抛砖引玉。”战士“北京”说,“我连现已脱离大部队,孤军楔入敌腹。在缺乏强有力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要攻占面前的两个山头,谈何容易!敌人居高临下,以逸待劳,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打法,切莫强攻,必须巧取。”

“说得很有道理。”梁三喜催促,“继续说下去。”

“现在我连已断粮缺水,一时又不能补充,行动必须迅速。趁敌尚未察觉我们,我建议战斗不应在明日,而宜在今夜展开。先拉开一个小小的战斗序幕。”

“序幕?”梁三喜问。

战士“北京”接上说:“对。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小小的序幕是:一、先设法破坏敌阵地前沿的雷区,撕开一道豁口,以便全连接敌;二、以步兵排实施火力佯攻,引敌暴露火力点的位置;三、我炮排和步兵排的爆破组,借暗夜接近敌火力点。在隐蔽好自己的前提下,离敌火力点愈近愈佳。这样,待明晨拂晓,便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下无名高地,取得立足点。然后,才有可能考虑下一步。”

想不到这年轻的战士“北京”,竟对兵家之事如此谙熟,我颇有些折服了。

大家小声议了一阵,一致认为战士“北京”的设想,切实可行。

这时,“北京”又说:“入伍后,我一直在步兵连八二无后坐力炮班当战士。在北京部队时,我参加过几次师里组织的山地进攻实弹演习。要讲摧毁敌火力点,‘八二无’堪称一绝。它绝就绝在,它的最大射程是一千米,但我们可以把炮口当刺刀!山地作战,每块岩石下都可隐蔽自己。我打过多次百米内肩炮射击,根本不需瞄准,其准确程度如同把枪口直指敌人的肚皮,百发百中。眼下,我们是山地攻坚,如果采用远射程射击,倘若一炮打不准,敌碉堡里的机枪饶不了冲锋的步兵战友!我看,四〇火箭筒也可实施百米内发射,不必按教科书上说的最近也得三百米外。可别小瞧越南鬼子,他们打了多年的仗,拼起来是些亡命徒!因此,我们非得冒风险、下绝法子治他们不可!”

梁三喜说：“‘北京’同志说得十分有理。‘八二无’和四〇火箭筒发射时要近些，再近些！必须做到一炮摧毁一个敌碉堡！不然，后果大家都清楚。一排长，行动还是从你们尖刀排开始，你们先用成捆的手榴弹，引爆敌人的地雷……”

靳开来急不可待：“娘的！说干就干！先来十捆手雷，每捆十枚！”

梁三喜摀住要行动的靳开来，又周密地进行了具体分工。

末了，梁三喜对我说：“指导员，战斗要提前打响，按说应该报告营里。可在敌人鼻子底下用报话机呼叫，那就等于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了敌人。你看怎样？”

我当即说：“不必报告了。两座山头反正得我们去攻，早攻下来总比晚拿下来好！”

战士“北京”说：“指导员说得极是。将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

行动开始了。

靳开来率尖刀排把一捆捆手榴弹甩往雷区。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引来阵阵地雷的爆炸声……

迎着爆炸后呛人的梯恩梯味儿，全连在炸开的豁口上，迅速、安全地爬过了雷区。

这时，实施火力佯攻的三排，轻、重机枪早已一齐响起来。无名高地上敌各处的火力点喷吐出火舌。霎时间，山上山下一片枪声……

我默数着敌火力点，对梁三喜说：“十二个，有十二个敌火力点。”

“不，还多，最少是十三个。”

按打响前的分工，梁三喜和我各带炮排的两个班和步兵排组成的爆破组，从无名高地左右两侧朝前运动，去潜伏到敌人的碉堡下。

靳开来和我一起行动。有他在，我心里坦然多了。此时，他这炮排长出身的副连长，手握着火箭筒，身背着火箭弹，跃跃欲试要去炸碉堡了。

三排的轻、重机枪打打停停，各处的敌碉堡不时喷吐出火舌，为人们指引着行动的目标……

我正向前爬着，靳开来扯扯我的衣服，悄声对我说：“别慌，你跟我后面！”

近了，不时喷出火舌的碉堡，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午夜时分，无名高地上完全静了下来。

“啾儿，啾儿……”“唧唧，唧唧……”纺织娘，金钟儿，蚰蚰儿，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虫儿，轻轻奏起了小夜曲。

我和靳开来偎依在山岩下的茅草丛中。

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贴着我的耳根问：“指导员，你在想啥？”

“我……没想啥。”

他突然冒出一句：“你，没想你老婆吗？”

“这种时候，我可顾不上想她了。”

“你老婆肯定很漂亮吧？洋味的？”

“带点洋味。不过，还是上气点的厚道。”

过了会儿，他又悄声自言自语：“我那小男孩四岁了，长得跟我一个熊样。下月六号是他的生日。咳……真想能抱过他亲他几口。”

我们开始闭目养神。这时，我才觉出，被汗水多次浸透的军装已硬似铁甲，双腿沉得像两根木椽一样不能打弯，周身热辣辣地胀痛。

“叮铃铃……”头顶上传来电话铃声。接着是咿哩哇啦的喊叫声。噢，是敌堡里的敌人打电话。神经一收缩，身上的疲惫感顿然消失了。

置身于敌人的碉堡之下，我才深深地感到，这里已绝对没有啥将军后代和农民儿子的区分了。我们将用同样的血肉之躯，去承受雷，去承受火，去扑向死神，去战胜死神，一起用热血去为祖国写下捷报！

八

乳白色的晨雾像纱幔一样轻轻飘散，东方显出了朦胧的光亮。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梁三喜发出了冲锋的信号！

这时，卧在我身边的靳开来早已跃起身，他倚在岩石一侧，肩扛四〇火箭筒，眨眼间便扣响了扳机。但闻“轰”的一声巨响，敌碉堡刚喷出一缕火舌，便腾空飞上了天！

几乎是同时，离我有三十余米远的战士“北京”也扛起“八二无”，只见他身子一动，肩后便喷出长长的火龙^①。

“指导员，隐蔽！”随着靳开来的喊声，我忙卧倒在岩石下。被炸碎的敌碉堡水泥块儿，像雨一般刷刷落在四周。

一声声巨响接二连三地传来，无名高地上腾起一股股硝烟气浪。显然，从左侧接敌的梁三喜他们，也进展顺利……

靳开来和战士梁三喜“北京”朝前跃进，我率火力掩护组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这时，无名高地顶端右侧，又有两个碉堡喷出火舌……

“打！”我用轻机枪扫射着，掩护组一齐压制敌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引过来了。

靳开来和“北京”各扛着自己的家伙，分别绕到敌堡一侧，真是炮口当刺刀，他们离敌堡都只有五十米左右的样子。只听两声巨响，又见两个敌堡飞上了天！

① 八二无后坐力炮发射时两头喷火，从后面喷出的火柱长达二十五米。

声声巨响过后,我们纷纷跃起身,饿虎扑食般冲上了无名高地。这时,从左侧出击的梁三喜他们也扑过来了。

扼守在堑壕中的敌人想负隅顽抗,我们劈头盖脸便是一顿猛扫,既来不及喊啥“诺松空叶”(缴枪不杀),也来不及呼啥“宗堆宽洪毒兵”(我们宽待俘虏),当敌人还没明白过是咋回事时,便死的死,窜的窜了……

战斗进行得如此干净利落,前后只用了十多分钟!

梁三喜激动地拍着战士“北京”的肩说:“行!真不愧是从北京送来的战斗骨干!战后,我们首先为你请功!”说罢,他大声命令大家:“赶快清理阵地,进入堑壕,防敌反冲锋!”

大家立即进入敌人遗弃的堑壕,做好战斗推备。

我当时万万没想到,战斗从这时起便进入了极其残酷的时刻。事后,我们才清楚,仅这无名高地上就驻有敌一个加强连,而主峰上则是敌人的营部和一个101迫击炮排。

眼下,主峰上的敌人把一发发炮弹倾泻到无名高地上。炮弹呼啸着,在我们占领的堑壕周围炸开。浓密的烟雾,像一团团偌大的黑纱,遮住了太阳,遮住了蓝天,罩在我们头顶上。泥土、石块、敌人丢弃的枪支,合着炮弹片的尖叫声,狂飞乱进……

每当炮击过后,敌人便从三面发起冲锋。

由于我们取得了立足点,敌人的头两次反扑,很快便被我们压下去了。但是,连里已有八名同志牺牲,十一名同志负了伤。

敌人又一次极为疯狂的炮击之后,第三次反扑开始了。

我和靳开来每人抱着一挺轻机枪,带领一排扼守在阵地西侧。这时,三十余名敌人在他们的火力掩护下,喊着、叫着,分梯次向我们扑来。

我们向敌猛烈扫射。因敌三次反扑的时间相隔太短,不大会儿,我们的枪管都打红了,不能继续射击了。

“快,拿手榴弹来!多,要多!”靳开来把帽子一丢,亮出了光头。

幸好,敌人丢弃的阵地上,到处是成箱的弹药和横七竖八的枪支,而且全是中国制造。我忙搬过一箱手榴弹,递给靳开来几枚。

“拧开盖,全给我拧开盖!”靳开来吼叫着,顺手便甩出了几枚手榴弹,“换枪,都快换枪!”

眼前有靳开来这样的勇士,懦夫也会壮起胆来!是的,越怕死越不灵,与其窝窝囊囊地死,倒不如痛痛快快地拼!

我把手榴弹盖一个个拧开,靳开来两手左右开弓,把手榴弹“嗖嗖”甩向敌

群。战士们抓紧时机换了枪……

敌人射来的子弹暴雨般在我们面前倾泻，蝗虫般在我们身边乱跳。有几个战士又倒在堑壕边牺牲了。每分钟内，我们都承受着上百次中弹的危险！

……战争，这就是战争！它把人生的经历如此紧张而剧烈地压缩在一起了：胜利与失败、希望与失望、亢奋与悲恸，瞬间的生与死……这一切，有人兴许活上十年、五十年，不见得全部经历到，而战争中的几天，甚至几小时、几分钟之内，士兵们便将这全部体味了！

阵地前又留下一片横倒竖歪的敌尸，敌人的第三次反扑，又被我们打退了。

主峰上的敌人已停止炮击，战场沉寂下来。

我和靳开来走至堑壕中间地段，碰上了梁三喜，见他左臂上缠着绷带，便知他在刚才打退敌人反扑时挂花了。我和靳开来忙查看他的伤口，他抬起左臂摇了摇：“还不碍事，子弹从肉上划了一下，没伤着骨头。”

战士们把烈士遗体一个个安放在堑壕里。初步统计，全连伤亡已接近三分之一……

没有人再流泪了。是的，当看惯了战友流血时，血不能动人了！当看惯了生命突然离开战友时，活下来的人便没有悲伤了！只有一个念头：复仇!!!

这时，梁三喜见三班战士段雨国倚在三班长怀中，便问：“怎么，小段也负伤了？”

“没有。”三班长说，“他晕过去了，渴的。嗨，小段也算不简单，拂晓进攻时，他只身炸了一个敌碉堡。”

“看不出这小子也算有种！”靳开来不无夸奖地说。

我们坐了下来。梁三喜把他的半壶水递给三班长：“快，全给他喝下去。”

三班长不接，梁三喜火了：“战场上，少给我婆婆妈妈的！”

三班长把水壶里的水慢慢倒进段雨国的嘴里。过了会儿，段雨国苏醒了。

三班长对小段说：“这是连长的水，全连就他这半壶水了！”

段雨国慢慢睁开眼，望着梁三喜。他的嘴蠕动着，泪水顺着两腮淌下来……我们尝到了上甘岭上的那种滋味。

在敌人反扑的间隙，梁三喜已两次派出战士在这无名高地周围到处找水，找吃的。别处均没发现有水，就敌人营房旁边有口井，但是，经过卫生员化验，井中已放上毒了。敌人已撤离的营房里，大米倒不少，一麻袋一麻袋的，麻袋上全印着“中国粮”的字样。可没有水，要大米有啥用啊！

时已中午，赤日当头，烤得我们连喘气都感到困难了。

三班长望了望我和梁三喜，嗫嚅地说：“山脚下……有一片甘蔗地……”

靳开来像是没听见三班长的话，朝我伸出手：“指导员，还有烟吗？娘的，我

的烟昨天穿插时跑丢了！”

我摇了摇头。出发前我带着两条烟，穿插时被我扔掉了。

梁三喜掏出他的“红塔山”，一看，还剩两支。他递给靳开来一支，将另一支折一半给了我。

靳开来点起烟，贪婪地吸了两口：“指导员，是否让我去搞点‘战斗力’回来？”

我当然知道他说的“战斗力”是什么，便站起来说：“让我带几个战士去吧，搞它一大捆来！”

靳开来站起来把我摁下：“还用你去！你当指导员的能有这个话，我就高兴！这犯错误的事，我哪能让你们当正职的去干！反正我靳开来没有政治头脑已经出名了，如果不死在这战场上，回国后宁愿背个处分回老家！”

战前，上级曾严厉地三令五申：进入越南后，要像在国内那样，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准动越南老乡的一针一线。违者，要加倍严肃处理。

靳开来又牢骚开了：“自己的老百姓勒紧了裤腰带，却白白送给人家二百个亿！今天，奶奶的，我不信二百个亿就换不了一捆甘蔗。”说罢，他转脸对三班长，“带上三班，跟我走！”

靳开来跃出堑壕，带三班走了。

我和梁三喜有气无力地在堑壕里走着，察看各班、各排的情况。全连又有三个伤号，因流血过多和缺水牺牲了。活下来的同志们个个口干舌燥，偎依在烈日下的堑壕里，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

渴得要命。水，在这种情况下，不也可以说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梁三喜也坚持不住了，他和我坐下来。他倚在堑壕边上，长吁了口气。

猛然间，从高地右下方传来“轰”的一声响，我和梁三喜认为是主峰上的敌人又要进行炮击前的试射，忙一下站起来，让战士们进入射击位置，做好击退敌人反扑的准备。可等了会儿，却不见一点动静。

这时，三班长扛着一大捆甘蔗，跑进堑壕：“不，不好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副连长踩响了地雷！他……他干啥事都非得他走在前头不行，他……”三班长放声哭了。

不大会儿，三班的战士们把靳开来抬到堑壕边沿，我和梁三喜忙上前把靳开来接进堑壕里。

他躺在地上，左脚被炸掉了，浑身到处是伤，我们忙为他包扎。

他极度痛苦地翻了下身，把我们推开：“不，不用包扎了……我，不行了。让……让大家吃……甘蔗吧……”

“副连长，你……”梁三喜一头扑在靳开来身上，抽泣起来。

靳开来用手抓摸着梁三喜的肩：“连长，你……多保重！我……死了也没事，还有他们弟兄三个……”

“副连长……”我呜咽着。

靳开来侧脸望着我：“指导员，我……是个粗人，说话冲，你……多原谅……”

“副连长……”我哭出声来了。

他吃力地用手指了指他左胸的上衣口袋：“指导员，帮我拿……拿出来，不是什么豪言壮语，是……是全家福……”

我忙将手伸进他的口袋，拿出一看，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他、他的妻子和一个四岁左右的小男孩……

我含泪忙把照片拿到他眼前，他用颤抖的手接过照片：“我……要去了，让我最后再……再看一眼……”

赵蒙生哽咽着，讲不下去了。

过了会儿，他擦了擦泪对我说：“副连长靳开来就是这样牺牲的。现在想起他来，使我揪心难过的并不全在于他的死。”

段雨国插话：“回国后评功评模，指导员多次向团里为副连长请功。但是，副连长连个三等功也没立上！”

赵蒙生接上说：“如果按个人取得的战果评的话，我们副连长绝对可以评为战斗英雄！如果他口袋里果真有一小本豪言壮语，那就更能宣扬出去！可当我们如实把他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写成材料报到团里，团里有人说：‘靳开来此人，思想境界一贯不高，是个牢骚大王，战前提他当副连长，他说让他去送死！再说，他是为一捆甘蔗死的，严重地破坏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且不说，死得不值得嘛！’”

“值得，他死得完全值得！”段雨国嚷起来，“是人都会有缺点，他发牢骚也不是没缘由的！不管别人怎么说，副连长在我们九连的心目中，永远是大义凛然的英雄！没有他搞来的那捆甘蔗，我们当时都渴晕了，我们能攻上364高地主峰吗？！”

我们仨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阵子，赵蒙生长叹了口气，接下去讲述这场未完的战斗。

九

战斗愈来愈残酷了。

当我们每人分到的两根甘蔗刚刚嚼完，主峰上的敌人居高临下，又一次向我们实施炮击。这次炮击比前几次更疯狂，更凶狠，炮击持续了长达半小时之久。无名高地上，我们作为依托和立足点的堑壕，前后左右，到处弹坑累累。扑面的硝烟使我们睁不开眼，浓重的梯恩梯味儿呛得我们喘不出气。

炮击刚停，主峰山半腰的两个敌堡，用平射的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向我们这无名高地扫射……

显然，敌人是要从南面反扑了！

“三排，压制敌火力！”梁三喜大声喊道。

我们刚从堑壕里探出头，便见一群敌人已爬上堑壕前的陡崖，离我们只有十几米了！

“打！”梁三喜边喊边端起轻机枪，对着敌群猛扫！全连奋起向偷袭过来的敌群开火，瞬间，阵地前的敌人便被我们打得如同王八偷西瓜，滚的滚，爬的爬……

这群敌人是从主峰上下来。他们趁炮击时我们无法观察，便越过主峰和无名高地间的凹部，偷袭到我们的阵地前沿。真险啊，如果我们稍迟几秒钟发现他们，他们就扑进我们的堑壕里来了！

当敌人的反扑又被我们打退后，敌我双方又平静下来。

这时，报务员跑到梁三喜跟前，说营长在报话机中呼叫九连。

梁三喜极其简要地向营长报告了我们攻下无名高地的经过。营长在报话机中告诉我们：营指挥所和营所属另外三个连队，离我们这无名高地直线距离还有十公里左右。预定的穿插计划因战局发展被打乱，他们已不能按预定方案按时到达预定位置了。眼下，三个连队正分头扼守山口要道，阻截从第一线溃逃下来的敌兵，保证大部队全歼逃敌。因此，他们一时腾不出兵力来支援我们。营长还收回了他昨天对我们的批评，并传达了师、团首长对我们九连的嘉奖令，说我们昨天的穿插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是的，当他们也在我们昨天的穿插路上走一走时，他们便会晓得我们九连为啥误了一百二十二分钟！

“困难，你们有啥困难吗？”营长问。

“伤亡已超过三分之一，断粮断水！”梁三喜喊道，“水，主要是缺水！”

“坚持，你们想办法坚持！要坚持到明天头午，我们才能上去！”稍停，营长喊道，“团首长指示，如果攻下主峰有困难，你们就坚守在无名高地上，等我们上去再说！”

“不行，我们不能在这无名高地上坚持！要死，也只有到主峰上去死！”

“怎么？你是梁三喜还是靳开来，牢骚不轻呀！”

“报告营长，靳开来已经牺牲，我是梁三喜！”梁三喜脸色铁青，“主峰上有敌人的迫击炮阵地，一个点地朝我们头上打炮。如果在这无名高地上坚持到明天头午，九连必将全连覆没！”

……

跟营长通罢电话，梁三喜对我说：“指导员，召开个党员会吧。”

我忙通知党员开会。这时，一些不是党员的战士，也纷纷把他们早写好的火线入党申请书递到我手上，问我可不可以列席参加党员会。我眼里一热，忙说：“可以，绝对可以！”

此时要求入党，绝不是去领取一张谋取私利的通行证，而是准备向党献出一腔热血！

梁三喜对围拢过来的党员、非党员说：“我们不能再被动挨炮了，要主动出击！我提议组成党员突击队，去拿下面前的主峰，去占领敌炮阵地！”

战士“北京”接上说：“连长的话极有道理。看来主峰上敌兵力并不多，他们主要是靠炮来杀伤我们。只有我们站在敌炮阵地上，我们九连才能有点安全感。”

梁三喜望了望众人，宣布了两道命令：任命战前刚提升的炮排长为代理副连长，任命战士“北京”为代理炮排长。

说罢，他问我：“来不及碰头商量了。指导员，你看怎样？”

我连连点头同意。眼下让谁升官，既不需升官者为自己“走后门”，更不需有人为升官者当说客，说文了叫“受命于危难之际”，说白了便是靳开来的话，给你个带头去死的差事！

战士“北京”对梁三喜说：“连长，这种时候我是不会谦虚的。说实话，让我指挥一个炮排，我还是颇能胜任的。不过，我用‘八二无’去炸敌碉堡还有点绝招，因此，我觉得让我作为一名炮手去行动，更能见成效。”

梁三喜一听有理，点头同意了“北京”的要求。

以党、团员为主的突击队组成了。

梁三喜当即决定：由新任命的代理副连长和他带队，分头从主峰左右两侧去攻占主峰。他让我和三排留下扼守无名高地，掩护他们出击……

“连长，你的胳膊已负过伤了！”我吼了起来，“如果你觉得我赵蒙生还有种，这突击队由我来带！”

“少废话！你有没有种，战场上大家不都看见了吗！”梁三喜的眼里射出不容分说的光，“可讲指挥能力，你还不过关！行了，趁敌还未炮击，要分秒必争！”他转脸对战士“北京”一挥手，“带足炮弹，你和弹药手们先顺坡滑下去，速度越快越好！”

无名高地和主峰间是个“凹”形,我阵地面前的坡崖坡陡七十多度,而坡崖又完全暴露在主峰之敌的射界下。当战士“北京”抱着“八二无”炮身,和弹药手们急速从坡崖上滑下去时,主峰山半腰的两个敌碉堡,便开始不停地封锁扫射……

“三排,压制吸引敌火力!”梁三喜命令。

三排对准敌碉堡开火,但狡猾的敌人并不理会,仍不时地朝我面前的坡崖实施拦阻扫射……

要通过这完全暴露在敌射界之下的坡崖,谈何容易啊!

梁三喜皱起眉头。稍停,他对突击队员们大声喊道:“看着点!都按我的样子办!”

说罢,只见他把一挺轻机枪抱在怀中,趁敌射击间隙,飞身跃出堑壕,猛地朝山下滚进,滚进……

我惊呆了!一个基层指挥员在战斗最紧要的关头,他把忠诚、勇敢和智慧所包涵的全部内容变为沉着,继而从沉着中又产生出这果断而不惜赴汤蹈火的行动!

他成功了。

突击队员们学着他的样子,瞅准敌射击间隙,一个个先后“噌噌”跃出堑壕,滚进,急速朝坡崖下滚进……

过了会儿,敌人停止扫射。无名高地上安静无事,我心中越发不安。我问自己:“你不是立誓要血洗自己的耻辱吗?那你为啥不像梁三喜那样去冲锋?!”

敌人又开始拦阻扫射了。我抓过冲锋枪抱在怀中,对三排喊道:“你们坚守,我过去!”

我大步跨出堑壕,横身倒在坡崖上,拼命往山下滚进……

我当时想的是:都是爹娘生的,连长梁三喜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去做的事,我这当指导员的也应照着去做,才算称职!

也怪,滚到山间,除了感到周身麻木外,竟不觉得疼。

主峰上下全是一人多深的芭茅草,一接近它,便躲过了敌人的射界。我火速爬着赶上了梁三喜他们。梁三喜见我来了,也没责怪我。

三排仍不时向敌人射击,敌人也不断还击。我们在草丛中攀援而上,去接近敌堡……

爬了一大阵子,猫起腰便看见敌堡了。

战士“北京”对梁三喜说:“连长,距离最多有五十米。放心,绝对不用打第二炮,干吧!”

梁三喜点头同意。

战士“北京”当即把炮弹装进炮膛。少许,他肩起“八二无”炮身,“噌”地站起来,勾动了扳机!然而,没见炮口喷火!

战士“北京”一下卧倒在地。敌人的子弹“嗖嗖”从我们头顶上飞过……

“怎么?是臭弹?”梁三喜问。

“嗯。是发臭弹。”“北京”说着,忙把臭弹退出炮膛。弹药手赶忙又递给他一发炮弹,他又将炮弹装进了炮膛。

稍停,他又肩起炮,猛地站起身,又一次勾响了扳机,却又一次没见炮口喷火!

“哒哒哒哒……”敌人一串子弹射来,战士“北京”一头栽倒在地上!

“‘北京’!‘北京’同志……”我和梁三喜同声呼唤着。

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

战士“北京”倒在血泊中,身上七处中弹。中的是平射过来的高射机枪子弹,处处伤口大如酒盅,喷出股股热血……

啊,倒下了,一个多么优秀的士兵又倒下了!他连哼一声也没来得及,眨眼间便告别了人生!他二十出头正年轻,芬芳的生活正向他招手!他是那样机敏果敢,他是多么富有才华!昨天晚上,他还以将军般的运筹帷幄,为我们攻打无名高地献出了令人折服的战斗方案!可此刻,他竟这样倒下了!他从北京部队奔赴前线补到我们连,到眼下才刚刚两天,我们还不知道他叫啥名字啊!五十米的距离上,他不瞄准也绝对有把握一炮一个敌碉堡!可臭弹,该死的两发臭弹!!……

梁三喜怒对爬到眼前的弹药手:“他的死,你要负责任!”

弹药手沉下头不吱声。我知道,梁三喜这是由极度悲恸产生的激怒,而激怒又变为这无谓的埋怨!在同生共死的战场上,有哪位弹药手愿意出现臭弹啊!

“怎么两发都是臭弹?哎!”

“早晨打无名高地时,就已出现过一发臭弹。”弹药手伤心地回答梁三喜,“为啥是臭弹,你看看弹身上的标号就晓得……”

梁三喜从战士“北京”身下的血泊中,取过那发退出膛的臭弹看了一眼,递给了我。我一看,只见弹身上印着:一九七四年四月出厂。

弹药手嘟囔说:“批林批孔的年月里出的东西,还能有好玩意儿!那阵儿,到处停工停产搞大批判,军工厂的工人也都不上班……”

啊,我心里一阵冷飕飕!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动乱年月,不仅给人们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精神创伤,还生产出这样的臭弹!如今臭弹造成的恶果,竟让我们在这生死攸关的战场上来吞食!

“奶奶的!”梁三喜气得像斩开来那样骂娘了,“要是再为了争权夺利,今天你搞他,明天他整你,甚至连死了两千多年的孔老二也拉出来批,我们就没个

好！不用敌人打咱们，自己就把自己搞垮了台！”

这时，山左侧传来一声令人振奋的巨响，不用问，那是新上任的代理副连长带着战友们，把敌碉堡炸掉了！

我们上面敌堡中的枪又急骤地响起来，一串串子弹从我们头顶上掠过……

梁三喜问弹药手：“还有几发炮弹？”

弹药手说：“还有九发。有六发是七四年四月出厂的。”

“真他娘的见鬼！扔了，把那六发全给我扔掉！”梁三喜气极了，厉声对弹药手，“你动作快点，给我拿发好弹来！”

梁三喜从战士“北京”身下双手摸过血染的炮身，把那发还在炮膛中的臭弹猛一下退出来，愤然甩出老远！他接过弹药手递过来的炮弹，一下装进了炮膛。

梁三喜肩起炮身。说时迟，那时快，他猛地站起来，眨眼间便见炮口喷火！炮弹“轰”地炸开，敌碉堡被炸得粉碎……

碎石泥尘还在刷刷下落，我们便跃起身，迎着硝烟气浪向前扑去！

上来了！上来了！从左右两侧出击的突击队员，还有从主峰正面待机冲锋的步兵一排，一齐呐喊着，冲上了山顶！

我们，终于站在了364高地主峰上！

“注意搜索残敌！”梁三喜命令说。

我放眼望去，山顶上敌堑壕里一片狼藉，空无一人。位于山顶右侧的炮阵地上，有十几门横倒竖卧的101迫击炮，遍地是发射后退出的空弹壳，还有那一箱箱未开封的炮弹摆在周围……这时，我才更觉出梁三喜判断的准确，决策的正确！如果不攻占这炮阵地，我们坚守在无名高地上是会全连覆没的！

山顶上到处是巉岩怪石。我们沿着堑壕南边向西搜索。

段雨国兴冲冲地来到我和梁三喜身边：“连长，指导员，胜利啦，我们终于胜利啦！这次战斗，能写个很好的电影剧本！”

我望着段雨国那副乐样儿，真没想到他也攻上了主峰！

“隐——蔽！”只听身后的梁三喜大喊一声，接着我便被他猛踹了一脚，我一头跌进堑壕里！跟着传来“哒哒哒”一阵枪响……

当我从堑壕里抬头看时，啊！梁三喜——我们的连长倒下了！

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连长！连长！”我一屁股坐在地下，把他扶在我怀中……

他微微睁开眼，右手紧紧攥着左胸上的口袋，有气无力地对我说：“这里……有我……一张欠账单……”

一句话没说完，他的头便歪倒在我的胳膊弯上，身子慢慢地沉了下去，他攥在左胸上的手也松开了……

我一看，子弹打在他左胸上，打在了人体最要害的部位，打在了他的心脏旁！他的脸转眼间就变得蜡黄蜡黄……

“连长！连长！”战士梁三喜们围过来，哭喊着。

“连——长！”段雨国扑到身上号啕起来，“连长！怪我……都怪我呀……”

梦，这该是场梦吧？战斗就要结束了，梁三喜怎么会这样离开我们！当理智告诉我，这一切已在瞬息间千真万确地发生了时，我紧紧抱着梁三喜，疯了似的哭喊着……

讲到这，赵蒙生两手攥成拳捶打着头，泪涌如注。他已完全置身于当时的场景中了。

我用手擦着不知啥时流下的泪，为梁三喜的死感到极为惋惜和沉痛。

过了良久，赵蒙生才抬起泪脸，喃喃地对我说：“子弹，是一个躲在岩石后面的敌人射过来的。显然，梁三喜最先发现了敌人，如果他不踹我那一脚的话，他完全来得及躲开敌人，可为了我，他……”

段雨国内疚地哽咽说：“怪我，都怪我啊！怪我当时让胜利冲昏了头脑，才使指导员光顾了跟我说话，才使连长他……”

停了会儿，赵蒙生接上说：“痛哭过后，我想起梁三喜临终前没说完的那句话，我从那热血喷涌的弹洞旁边，从他那左胸的口袋里，发现了这……”赵蒙生说着，从一本硬皮日记本里，拿出一片纸，用瑟瑟发抖的手递给我，“你……你看看……”

我接过一看，这是一张血染的纸条。这纸条是三十二开笔记本纸的小半页，四指见方。烈士的笔锋刚劲，字迹虽被血浸染过，但依然清晰可辨。只见上面写着：

我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梁三喜烈士留下的这张欠账单上，密密麻麻写着十七位同志的名字，欠账总额是六百二十元。

我顿感头皮麻嗖嗖的！眼下，我虽还不知梁三喜为啥欠了这么多的账，但我已悟出，为啥赵蒙生在前面的讲述中，一再讲到梁三喜抽的是黑糊糊的旱烟末，

连块手表也没有,用的那牙刷只有“八撮毛”……

赵蒙生叹息了一声,对我说:“三年多来,这血染的欠账单一直像沂蒙山中那古老的碾盘一样,重压在我的心上。每每看到它,我便百感交集。我常常这样想,梁三喜临终前那句没说完的话是:‘这里有我一张欠账单,我欠的账还没偿还,还没偿还啊,……’”

我们又陷入沉默中。

过了会儿,我问:“那么,最后战斗是怎样结束的?”

赵蒙生仍在擦泪,没有回答我。

段雨国说:“当时,一串子弹射来之后,我见连长倒在地上,我误认为连长是就地卧倒隐蔽。我抬头一望,见前面岩石上有个黑影,一晃便不见了。我跑过去一看,也没见敌人在哪里。这时,又过来几位战士,我们一齐搜索,才发现岩石右下侧有个洞口。我返回身来想报告连长时,见连长已牺牲在指导员的怀中。我扑上去就哭起来……当我含泪告诉指导员敌人已钻洞,指导员疯了般地站起来,喊着要手榴弹……”

赵蒙生摆手制止段雨国:“算了,算了!不必讲那些了!”

“实事求是嘛!总得让如实记录这个故事的作者同志,对这场战斗有个大概的了解。”段雨国接上对我说,“……指导员把十几枚手榴弹捆在一起,谁也拽不住他,他像疯了一样跑到洞口边,一下就钻进洞去。过了会儿,我们先是听到一阵枪声,接着是闷雷般的巨响。当时大家心想,指导员肯定牺牲了。我们打着手电,一个个钻进洞中,先把指导员抬了出来,见他额角上流着血,臀部也负了伤,他人事不醒了。接着,我们呼啦啦拖出九具敌尸,洞中的九名敌人,全让指导员那捆手榴弹给报销了!……”

“行了,别塑造我的形象了!”赵蒙生内疚地说,“比比梁三喜、靳开来、战士‘北京’、司号员小金,我算个啥?我不过是让军长和战友们骂上战场的懦夫而已!如果说我还没有愧为炎黄子孙,那是烈士们用热血净化了我的灵魂。”停了停,他望着我,“不过,使我的心灵受到更大更剧烈震动的事情,还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打完仗之后发生的。那石头人听了也会为之动情的故事,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你现在也绝对猜不到。那么,让我给您继续讲下去吧——”

十

我们九连就打了这一仗。

当我抱着手榴弹闯进敌洞时,洞内漆黑,啥也看不见。我贴着洞壁朝前摸,摸进十几米,才听见里面有动静。敌人显然也听到我进来了,射来一串子弹,却

没有打中我。我便将一捆手榴弹拉了弦,扔了过去。之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后来,是代理副连长带领大家,像掏老鼠洞一样又掏了两个敌洞,又炸死了十三个敌人,战斗便胜利结束了。

我是被自己甩出去的那捆手榴弹炸晕的,伤得并不重。这时,我们营的七连奉命赶到364高地,接替了我们九连。

我先是被送到师战地医院,接着又转到国内。十几天后,我的伤就痊愈了。

整个部队班师回国,凯旋门前是人海鲜花,颂歌盈耳;庆功宴上是玉液琼浆,醇香扑鼻。当活下来的我重新体味生活的美好和芳香时,一想起连里殉国的英烈们,我的心情分外沉重。

部队展开了评功活动。军里决定报请军区,授于我们九连为“能攻善守穿插连”的荣誉称号。经过群众评议,我们九连党支部决定报请上级党委,分别授予梁三喜、靳开来、还有不知姓名的战士“北京”战斗英雄称号……

对梁三喜和“北京”同志,团里没有争议。对靳开来,不管我们党支部怎样坚持,却连个三等功也不批!这时,有人竟提议授予我英雄称号,说我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第一个只身闯进敌洞炸死九个敌人,称得上什么“模范指导员”!

我被刺眼的镁光灯和接踵来访的记者包围了。

记者们对我好像尤其感兴趣,连我的名字也具有特别的诱惑力。有位记者说我当年出生在沂蒙战场上,现在又在战场上立了功,很值得宣传。他以抢新闻的架势找到我,对我进行单独采访。并说他想好了一篇通讯的题目:正题是《将门生虎子》,副题——记革命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英雄赵蒙生。他让我围绕着这个题目提供材料。我当即把我参战前后的情况如实给他说了一遍,一下打乱了他的构思。但他仍坚持要宣扬我,并说了一大套理由。

我坚决拒绝了他:“要写,就真真实实地写,别做‘客里空’式的文章!”

是的,战争刚刚打罢,烈士尸骨未寒,我怎敢用烈士的鲜血来粉饰打扮自己!

评功活动完结后,接着进行烈士善后工作。我们连在全团是伤亡最大的连队。团里派出专门的工作组,来帮助我们做这项工作。

烈士善后工作进行极为顺利。烈士的亲属们深知亲人是为国捐躯,个个深明大义,没有谁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超出规定的要求。他们最关心的是亲人怎样牺牲的。我向他们一一讲述烈士的功绩,并把授给烈士的军功章捧献给他们……

但是,当我面对靳开来的妻子和那四岁的小男孩时,我为难了。我向烈士的遗妻和幼子,讲述了副连长怎样带尖刀排为全连开路,怎样炸毁了两个敌碉堡,又怎样坚守无名高地消灭敌人。当然,我省去了副连长带人去搞甘蔗的事,我只说副连长在阵地前找水踩响了地雷……

当靳开来的遗妻抬起泪眼望着我,对这位来自河南禹县一个公社社办棉油

厂的合同工,我已无言安慰。所有烈士亲人都有一枚授予烈士的军功章(大部分是三等功),唯独她没有……

我拭泪把我的一等功军功章双手捧给她:“收下吧,这是我们九连,授给一等功臣靳开来烈士的勋章!”

这位憨厚淳朴的女合同工,双手接过军功章,把它和靳开来烈士留下的那张全家福一起包进手帕,珍藏起来。

她带着那四岁的小男孩,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连队。

谢天谢地,她并不晓得连队是无权决定给谁立功的(哪怕是记三等功)!我默默祝愿,祝愿那枚军功章能使她在巨劫中获得一丝慰藉,也企望那四岁的孩童在晓明世事之后,能为父辈留给他的军功章而感到自豪!

烈士亲属们都一一返回了。唯独不见梁三喜和“北京”同志的亲属来队。团政治处已给山东省民政部门发了电报和函件,请他们尽快通知梁三喜烈士的亲属来队。战士“北京”的真实姓名,在部队回国后我们通过查找对号,得知他叫薛凯华。参战前一天从兄弟军区火速赶来的那批战斗骨干,团军务股存有一份花名册。当时把他们急匆匆分到各连后,几乎所有的连队都没有来得及登记他们的姓名。因此,全团有好几个连队都出现了烈士牺牲时不知其姓名的事情……

团、师、军三级党委,决定重点宣传梁三喜的英雄事迹。让我们连多方搜集梁三喜烈士的遗物、照片、豪言壮语以及有宣传价值的家信等等,以便送到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上展出。

当我着手组织搞这项工作时,确实作难了。

梁三喜的遗物,除了一件一次没穿过的军大衣外,就是两套破旧的军装。团里派人把两套旧军装取走了,因那打着补丁的军装,足能说明烈士生前身先士卒,带领全连摸爬滚打练硬功。团里听说梁三喜有支“八撮毛”的牙刷,又派人来连寻找,因那“八撮毛”的牙刷,足能说明烈士生前崇尚俭朴。然而,很惋惜,在那拼死拼活的穿插途中,梁三喜已把牙刷、牙缸全扔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至于照片,我们到处搜集,也没能找到梁三喜生前的留影。最后,我们从师干部科那里,从干部履历表中,才找到一张梁三喜的二寸免冠照。这为画家给烈士画像,提供了唯一的依据……

我是多么悔恨自己啊!我曾身为摄影干事,下连后还带着一架我私人所有的“YASHIKA”照相机,却未能为梁三喜摄下一张照片!

至于梁三喜写下的豪言壮语和信件,我们也一无所获。梁三喜是高中二年级肄业入伍的,按说他应该写下很闪光的文字。但是,我们只找到一本他平时训练用的备课笔记本,全是些军事术语,毫不能展现烈士的思想境界……

参战前后,他在戎马倥偬中为我们留下的,就是那张血染的欠账单!

这天,我把欠账单拿到团政治处,想让团领导们看一下。然而,无独有偶。团政治处的同志告诉我,这样的欠账单并不罕见。在全团牺牲的排、连干部中,有不少烈士欠着账。五连牺牲了四个干部,竟有三个欠账的。这些欠账的烈士,全是清一色从农村入伍的。他们欠账的数额不等,其中,梁三喜欠的账数额最多。

看来,我对从农村入伍的排、连干部以及那些土里土气的士兵们的喜怒哀乐,多么不知内情啊!

时间又过去了几天,仍不见梁三喜烈士的母亲及妻子来队。我多次催团政治处打听联系。这天,政治处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已数次给山东省民政部门去过长途电话,查问的结果是:梁三喜烈士的母亲梁大娘、妻子韩玉秀,她们抱着个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女孩,起程离家已十多天了。

啊,十多天了?乘汽车、坐火车,再乘汽车……我掰着指头算行程,她们祖孙三代早该赶到连队来了呀!莫不是路上出了啥事?那可就……

我后悔自己工作不细,恨当初为啥不建议团政治处,让连里派人赶往山东沂蒙山,去接她们祖孙三代来连队……

我们连驻地不远有公共汽车停车点,我派人到停车点接了几次没接到,我更是忧心忡忡,日夜不安……

这天中午,师里的丰田牌轿车开进连里。我一看,是妈妈来了!

我忙把妈妈迎进宿舍里,给她倒了杯水:“妈……今天刚赶来?”我不知说啥是好。

“咳!坐飞机,乘火车,师里派车在车站接到我,我到师里坐了一会儿,就来了。”

我与妈妈相对而视,沉默无语。

妈妈比我临下九连回家休假见她时,明显消瘦了。她脸上失去了往常那乐悠悠的神采,眼圈周围有些发乌。

“你……怎么不给妈写信?”

“回国后事情太多。”

“你……你知道妈这些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呀!”妈妈眼泪汪汪,“妈是从报纸上……看到你们九连……妈才知道你没……”

我无言答对。

“那天晚上,妈要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才……才好不容易要到‘雷神爷’。谁知,竟挨了他一顿……臭骂,打那,妈就夜夜做噩梦,一会儿梦见‘雷神爷’用手枪指着你,让你去……去炸碉堡,一会儿又梦见你满脸是血,呼唤着妈妈……”妈妈抹着泪,“妈知道在那种时候打电话也不应该,可‘雷神爷’他……他也太不讲情面了!妈是快往六十岁上数的人了,生来也不是怕死鬼!可妈就你这么个儿子呀,要死,妈宁愿替你去死!……”妈妈伤心地抽泣起来。

我该说啥呀？我没有资格责怪亲爱的妈妈！

妈妈的老家在皖北。早年间外祖父家一贫如洗，妈妈八岁上就卖给了地主当丫头。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为躲过日寇南逃，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豫东、皖北骇人听闻的黄泛。咆哮的洪水使外祖父一家全部丧生。妈妈当时十六岁，她是抱着地主家一只洗衣的木盆，才大难未死！当年秋，她只身流浪到沂蒙山投身革命，后来当过团卫生队的卫生员、护士长、“地下医院”的指导员，师卫生科长……再后来她随大军打济南，战淮海，长驱南下……妈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满满一手帕勋章闪耀着她光辉的历程。她那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能写一部比砖头还厚的书啊！……

而我，只不过刚刚参加了一次战斗！

我感到心中燥热难挨，便摘下了军帽。

“天！这……这是怎的？”妈妈发现了我额角上的伤疤，“是……是枪伤？”

“不是。是被手榴弹片儿划了一下。”

“天呀！一点点……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妈妈的声音在发抖，“疼，还疼吗？”

我摇了摇头。

望着不时拭泪的妈妈，我心中像打翻了个五味瓶。妈妈是那样宠我，疼我，爱我，到眼下还把我当成小伢儿一般！我也曾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无比自豪、幸福、温暖！可眼下，妈妈的一举一动，竟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就连戴在妈妈手腕上那块“欧米格”坤表和那熠熠生辉的表链，过去我觉得那样受看，眼下却觉得有些刺眼了。

“蒙生呀，咱不穿军装往回调啦，省得央这个，求那个！”妈妈擦干泪说，“血，你也为祖国流了！问心，咱也无愧了！边境线上看来还安稳不了，干脆就脱了军装转业吧！”

我摇了摇头。

妈妈吃惊地望着我：“怎么？你……”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妈妈。

此时，我只是觉得：母爱是神圣的，也是自私的！

十一

我妈妈来队的第二天傍晚。

我正和妈妈一起在宿舍里吃晚饭，段雨国急匆匆地闯进来：“指导员，快，连长的一家来队了！”

我扔下碗筷，赶忙跟着段雨国来到接待烈士亲属住的房子里。

战士们正你出他进地忙乎着。见我进来,梁大娘和韩玉秀站了起来。床上睡着那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女娃。

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这是我们指导员!”

老人直朝我点头:“唔,唔。让你们操心了……”

梁大娘看上去年近七十岁了。穿一身自织自染的土布衣裳,褂子上几处打着补丁。老人高高的个,背驼了,鬓发完全苍白,面孔干瘦瘦的,前额、眼角、鼻翼,全镶满了密麻麻的皱纹。像是曾患过眼疾,老人的眼角红红的,眼窝深深塌陷,流露出善良、衰弱、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像藏着许多苦涩的东西。要是在路上遇上,我怎敢相信这就是连长的母亲啊!

我连忙双手扶着老人:“大娘,您快坐下吧。”

我把大娘扶到床沿坐下,转脸对韩玉秀:“小韩,你也坐下。”

玉秀刚坐下,床上的孩子醒了,哇哇直哭。玉秀忙转过身去给孩子喂奶,轻声哄着啥事还不知的孩子:“盼盼,好闺女,莫哭,莫哭……”

“大娘,听说你们上路十几天了。怎么才到……”

没待我说完,段雨国贴着我的耳根告诉我,大娘她们下了火车,是步行赶来连队的!

“啥?!”我心里打了个寒悸。

从火车站到连队驻地一百六十多华里,难道这祖孙三代是翻山越岭,一步一步挪来的?这时,我发现大娘和玉秀的鞋上、裤角上全沾满了南国殷红色的泥巴。昨天刚落过一场雨,路该是多难走哇!

段雨国对梁大娘说:“大娘,下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汽车能直接开到我们连的山脚下。怎么?你们没打听有长途汽车站!”

玉秀小声说:“打听着了。”

大娘接过话:“庄稼人走点路,不碍事。”

“你们在路上走了几天呀?”段雨国又问。

“四天带一过晌。”玉秀边给孩子喂奶边说,“要不是老打听路,走得兴许还快些。”

我忙给段雨国递个眼色,不让他再问了。

在邀请烈士亲属来队时,团里已寄去了足够用的路费。这祖孙三代下了火车步行而来,是将路费用在别的事上了,还是为了省出几块钱?!梁三喜留下的那六百二十元的欠账单,足以使我晓得梁大娘一家的日子过得该是有多难……

炊事班长带着几个战士,端着刚出锅的面条和四碟儿菜走进来。他们把面条盛进碗里,让大娘和玉秀坐到桌前吃饭。

这时,大娘从床上摸过一个包干粮的包袱。包袱是用做蚊帐用的那种纱布缝

的,沾满了旅途上的尘埃。大娘解开快空了的包袱,我一看,里面包着的是些黑糊糊的碎片儿,还有几个咸萝卜头。大娘用手抓着那些碎片儿,朝面条碗里放……

炊事班长上前抓住大娘的手:“大娘!别吃这烂瓜干做的煎饼了!瞧,都挤成碎渣渣了……”

“带在路上吃没吃完。孩子,吃了不疼撒了疼,用汤泡泡还能吃。”大娘说着,又把那煎饼渣儿往碗里捧……

我眼里湿了。此时,只有此时,我才真正明白,梁三喜生前为啥因我扔掉那一个半馒头而大动肝火啊!

……

大娘和玉秀安歇后,我打电话报告团政治处值班室,说梁三喜烈士一家已来到连队。

接电话的是搞报道的高干事。他告诉我,一个月前,团政治处已给梁大娘和韩玉秀去过两次信,让她们来队时一定带上梁三喜生前的照片和写的家信。高干事让我务必抓紧时间问一问照片和家信带来了没有。因为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即将开馆展出,梁三喜烈士的照片和遗物都太少,军、师政治部已多次来电话催问此事……

次日早饭后,我又去看望大娘和玉秀。

屋内已坐着几位战士和几位班、排长。玉秀去年(七八年)三月间曾来过连队,他们跟她早就认识。

玉秀显得很年轻,中上等的个儿,身段很匀称。脸面的确跟靳开来生前说的一样,酷似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扮演春妮的陶玉玲。秀长的眉眼,细白的面皮,要不是挂着哀思和泪痕的话,她一定会给人留下一种特别温柔和恬静的印象。她上身穿件月白布褂,下身是青黑色的布裤,褂边和裤角都用白线镶起边儿,鞋上还裱了两绺白布(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按古老的沂蒙风俗,为丈夫服重孝)……

见我进屋,她站起来点了点头,脸上闪出一丝笑容,算是打招呼。然而,那丝笑就像在暴风雨中开放的鲜花一样,转眼便枯萎了,凋谢了,令人格外伤感。

大家都默默地抽烟,好像都不知该对烈士的老母和遗妻说啥才好。

昨天晚上,我已对全连讲过,关于梁三喜留下“欠账单”的事,谁要是有意无意地透露给烈士亲属知道,没二话,都要受处分!大家含泪拥护我定的“土法令”……

此时,我琢磨着该怎样把话题引出来。我想应该先向大娘和玉秀介绍连长在战场上的英雄壮举,然后再问及照片和家信的事。但一看见床上躺着的那才三个多月的女娃和低头不语的玉秀,我的心就隐隐绞痛。

如果不是我下到九连搞“曲线调动”,上级派别的指导员来九连的话,梁三喜怎会休不成假啊!那样即使他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与妻子不也能最后见一面

吗？再说，战场上梁三喜如果不是为我，他也不会……

“秀哪，队伍上不是打信说要三喜的照片啥的。”大娘对玉秀说，“你还不赶紧找出来。”

玉秀忙站起身，从床上拿过个蓝地上印着白点点的布包袱，从衣服里面找出半截旧信封递给我：“指导员，别的没有啥。他就留下过这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五岁那年照的，一张是他参军后照的。”

我接过半截信封，先摸出一张照片，一看是梁三喜的二寸免冠照，这和从他的干部履历表中找到的照片，无疑是一个底版。

当我取出第二张照片看时，那变得发黄的图片使我一怔：照片上有位三十五六岁的农家妇女，墨黑的头发，绾着发髻，慈祥的笑脸，健康丰满。在她的怀前，偎依着两个一般大的小男孩。照片上方有行字：

大猫、小猫和母亲合影留念 1952年5月于上海

“啊！”我像触了电一样惊叫一声。这照片我不也有一张吗？就夹在我上高小时用的那本相册里……

我脑子嗡嗡响，转身对着梁大娘：“大娘，这照片上……”

大娘探过身来，用手指着照片：“这边这个孩子叫大猫，就是俺那三喜。那边那个孩子叫小猫，是队伍上的孩子。这照片，是大娘俺有一年到上海去送小猫时，抱着两个孩子照的……”

霎时，我觉得眼前一阵发黑，周身像处在飘悠悠的云端里！啊，命运之神，你安排过芸芸众生多少幕悲欢离合啊……

在我十几岁之前，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讲过：那是一九四七年夏，国民党向山东沂蒙山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孟良崮战役之后，为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主力部队外线出击去了。

这时，我出生了。妈妈生下我第三天，她患了“摆子病”（沂蒙土话：即疟疾），一点奶水也没有。我饿得哇哇直哭。地方政府派人把妈妈和我送到蒙山^①脚下的一个山村里。村中有位妇救会长，是当时鲁中军区的支前模范。她也生了个小男孩，那男孩比我大十天。就这样，那位妇救会长用两个奶头喂着两个孩子。为躲过还乡团的搜查，她把她的孩子取名大猫，叫我是小猫，说大猫、小猫是她生的一对双胞胎……

妈妈也曾多次对我说过：那妇救会长待人可好啦，有奶水先尽我这小猫嘞，

① 沂蒙山是由沂山和蒙山两道纵横数百里的山脉组成的。

宁肯让大猫饿得哭。妈妈在那妇救会长家中过了满月,治好了“摆子病”,接着又随军南下了……

直到我将近五岁时,那妇救会长才把我送到上海,送到爸妈身旁。当那妇救会长带着大猫悄悄走了之后,有十几天的时间,我天天哭着找娘,哭着找大猫哥哥……

“指导员,你……”

“指导员,你怎么啦?”

恍惚中,我听见战友们在喊叫我。

“大娘!”我呐喊了一声,扑进了梁大娘怀中。

大娘轻轻推开我:“孩子,你……你这是咋啦?”

“大娘,我……我就是那个小猫!”

“啥?!”大娘一下放开我,用手擦擦红红的眼角,望望我,摇了摇头。“不,不……会吧。”

“是!大娘,我真是那个小猫!”我哭喊着。

“你……你真格是当年赵司令的孩子?”

“嗯。打孟良崮时,他是纵队司令员。”

“你妈胜吴?叫……”

“嗯。她名叫吴爽。”

大娘又愣了会儿,当我又伏进她怀中时,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喃喃地说:“梦,这不是梦吧……”

我伏在梁大娘怀中,心潮翻涌:啊,梁大娘,养育我成人的母亲!啊,梁三喜,我的大猫哥!我们原本都不是什么龙身玉体,我们原本分不出高低贫贱!我们是吃一个娘的奶水长大的,本是同根生啊!……

十二

这意外的重逢,使我的心灵受到多么剧烈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当我拿着那颜色变得发黄的照片让妈妈看时,她也蓦然惊呆了。

妈妈让我领她来到梁大娘一家住的房子里。

梁大娘慢慢站起来,和妈妈对望着。显然,她俩谁也很难认出谁了!

一九五二年五月,当梁大娘把我送交爸妈身边后,头几年我们两家还常有书信往来,逢年过节,妈妈总忘不了给梁大娘家寄些钱。我家也常常收到梁大娘从沂蒙山寄来的红枣、核桃、花生等土特产。后来,妈妈给梁大娘家写信逐年减少。十年

动乱开始后,更是世态炎凉,人情如纸,两家从此便音讯杳然,互不来往了……

“梁嫂,您……”颇具“外交才华”的妈妈,此刻竟笨口结舌了。

“老吴,果真是老吴不成?”梁大娘满脸皱纹绽出了笑容,“当年,你管俺叫梁嫂,让俺喊你爽妹子,是吧?”

“是。”妈妈应着。

“老吴!”梁大娘上前挪动了两步,用枣树皮般的双手,激动地抚摸着我和妈妈的两只胳膊,“前些年那么乱腾,你能好胳膊好腿地活过来,不易哪!那帮奸臣,天打五雷轰的奸臣,可把你们整苦了哇……”

妈妈无言以对。

梁大娘上下打量着我妈妈:“一晃眼快三十年没见了。嗯,你没显老,没显老呀。赵司令(她称的是我爸爸当年的职务),他好吧?”

“嗯。好。”妈妈点头应着。往常,每当别人说起爸爸挨斗的事,妈妈可总是滔滔不绝的呀。

“只要你和老赵都好,俺和村里人也就放心啦。”梁大娘叹口气,“咳!刚乱腾那阵,有人到俺那里调查你和老赵,问你们是不是投过敌,俺当场就没给他们好颜色!沂蒙山人嘴是笨些,可不会昧着良心说话呀。在俺那一块,谁不知你和赵司令!好人,你们是天底下难寻的好人啊。打天下那阵,你们流过多少血哪……唉……唉……”梁大娘撩起衣襟擦了擦眼睛。

“梁嫂……您,坐下吧。”妈妈扶着梁大娘坐下。

我和玉秀也坐了下来。

此时,我看出妈妈的神情是极其复杂的。梁大娘对我们越是无怨言,我和妈妈越觉不是味。

妈妈望着梁大娘:“梁嫂,您一家也都……”

“这不,俺一家子都来了。”梁大娘心平气静地说,“这坐着的是儿媳妇玉秀,那睡着的是孙女盼盼。”

沉默。

“咳——”梁大娘长叹一声,对我妈妈说,“俺那老大你没见过他,可你知道他。他小名叫铁蛋,当儿童团长时起大名叫大喜。大喜八岁就给咱八路跑交通,十二岁叫汉奸抓了去……”

梁大娘不朝下说了。

这时,我想起童年时,妈妈曾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过那铁蛋送信的故事。铁蛋八岁就当小交通员,送过上百次信,没出一次差错,老交通和首长们常夸铁蛋机灵。铁蛋十二岁那年,一次送情报让汉奸发现了。当铁蛋把纸条儿搓成团吞进肚里时,让汉奸抓住了。鬼子逼铁蛋的口供,汉奸用锤子把铁蛋满口的牙一个个

全敲掉了,铁蛋没吐一点风声。鬼子把刺刀戳在铁蛋的鼻尖上,说再不开口就挑死他。铁蛋啥也没说,被鬼子用刺刀活活地挑死了……

啊,沂蒙山的母亲!你不仅用小米和乳汁养育了革命,你还把自己的亲骨肉一个个交给了民族,交给了国家,交给了战争啊!

半晌,妈妈又问梁大娘:“梁嫂,您不是还有个比蒙生他们大两岁的儿子,叫……叫栓……”

“你说俺那栓牢呀,他大名叫二喜。”梁大娘转脸对玉秀,“秀儿,二喜他是哪一年没的?”

“六七年‘反逆流’的时候,二喜哥他……”

“这流那流俺说不上来,反正是那年夏天。那阵沂蒙山中老虎拉碾,一下子乱了套!老干部一个个都挨批挨斗,越是庄户人觉得好的老干部,越是个不好。你要不是跟他们击反啥流,他们就把你往死里拽!庄户人看不过,便护着老干部,成群结队地沿着沂河往南奔,躲进了大南边的马陵山^①……

“一天深夜,当年在俺家住过的张县长躲进俺家来了。家里哪能藏住他,二喜便护着他连夜走了。他俩白天藏,夜里赶,一块上了马陵山……

“没多久,从济南府用大卡车拉来了‘棒子队’,说是要剿灭上了‘马陵山的土匪’^②。那‘棒子队’多的看不到头,望不见尾。那架势,比‘蒋该死’当年重点打咱沂蒙山半点也不差,甩了手榴弹,动了机关枪,也放了大炮。二喜是让人家用炮打死的。听说那一炮就打死了十多个庄稼汉,就地挖坑埋了。到现今,连二喜的尸首也不知埋在哪里……

“唉,不细说了。过去了,这些都过去了。唉……”

也许梁大娘的眼泪在早年间已经流尽,也许是因二喜的惨死已时隔十余年,老人轻声慢语讲这些事时,毫不像诉说她自己的命运,而像在讲述古老的《天方夜谭》。

妈妈用手帕擦了擦泪汪汪的眼。过了会儿,她声音发颤地对梁大娘说:“难道梁大哥他,他也是在……动乱中……”

① 马陵山位于鲁南和苏北交界处。

② 一九六七年,篡夺了山东大权的第一把手,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逆流”运动,首先把黑手插进了临沂地区。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上了马陵山。当权者便把这些干部和群众诬蔑为“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下令从山东各地抽调了大批武装起来的“棒子队”,开进了沂蒙山区。当权者提出的行动纲领是:“不打则已,打则必歼。”

据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日《大众日报》载:当时,临沂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惨遭毒打,其中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因不支持“反逆流”,有两千多名指战员也横遭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被打伤致残。革命老根据地沂蒙山受到空前的浩劫,成为十年动乱中山东有名的“重灾区”。

“你说三喜他爹呀。他是在杀树挖坑那一年……”

玉秀轻声打断婆婆的话：“是批林批孔，不是杀树挖坑。”

“不管是咋说法，反正是‘割尾巴’杀枣树那年春天，三喜他爹才得的气臌症。”梁大娘转脸对我妈妈说，“老吴，蒙生离开俺枣花峪时还小，记不得事。你知道俺枣花峪为啥叫枣花峪，就是仗着枣树多呀。光村南半山坡上那片枣林子，就有两千三百多棵枣树呀。每逢枣花开时，喘口气都是香喷喷的。那片枣林子是俺村的命根子，当家的打油买盐指望它，大闺女小媳妇扯块花布也指望它呀……”

“老吴，你知道，俺家三喜他爹推着小车往淮海运军粮时，腿上挨过蒋该死的炮弹片儿。办初级社后，他别的重活干不了，就一直在村南半山坡上看枣林子。那片枣林子，大炼钢铁时被伐了一些炼了铁，但还没有挖坑刨根。后来又栽上了枣苗，那片枣林子越长越喜人了……”

“可到了杀树挖坑那年，上面派来了‘割尾巴’小分队，硬逼着俺们伐了枣树修大寨田。眼看着枣树一棵棵被伐倒，三喜他爹心疼地趴在地上嗷嗷大哭。山上有棵最老的枣树，是蒋匪军当年上山伐木修工事时漏下的，村里人都叫它‘老头树’。三喜他爹搂着那棵‘老头树’，说啥也不让人家伐，说他宁可跟‘老头树’一块遭斧头。结果，人家一脚把他蹬了个大趔趄子，他滚到一边就爬不起来了。他当场气晕了……”

“左邻右舍用门板把他抬回家，打那他就得了气臌症。天天躺在炕上，‘噗——噗——’，一口一口，不停地朝外捋气……”

“转年夏天，一场大雷暴雨下来，全村老少修了一年的那大寨田，被大雨冲了个溜溜光。泥土全随着雨水流进了沂河，别说再回过头来栽枣树，山坡上连棵草也不爱长了……”

“这事，村里人谁也没敢告诉三喜他爹，他躺在炕上一个劲地捋气。他一病就是两年多，可把在队伍上的三喜拽拉苦了。三喜一心想把他爹的病治好，一次次邮钱来，让我给他爹去抓药。那阵，三喜跟玉秀还没成亲，可多亏了玉秀忙里忙外地跑呀。洋药吃了又吃中药，熬了多少中药，玉秀最清楚不过了。到头来，钱花够了，三喜他爹也咽了气……”

啊，直到眼下，我才明白，梁三喜为啥会留下那六百二十元血染的欠账单！

停了会儿，梁大娘对我妈妈说：“三喜他爹临死那阵还叨念，说杀枣树那当口，如果赵司令在就好了。按赵司令那脾气，准会给那帮人一顿匣子枪不可。”

我和妈妈都没作声。即使我爸爸当时在场，他又有啥法子呢？我清楚，这些年来，我爸爸也说过不少违心话，办过不少违心事啊！他当年那带棱角的“脾气”，早已在“大风大浪”中磨平了。像雷军长那样一次次敢“甩帽”的战将，毕竟是少见的啊！

“老吴，一见面，俺不该给你提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让你听了也伤心。”梁大娘望着我妈妈，“好啦，现在好啦！听说是毛主席过世时留下话要抓奸臣，托他老人家的洪福，共产党总算把奸臣抓起来了，一个个都抓起来了！往后，庄户人又有盼头，有盼头啦！”

这时，睡着的盼盼醒了，哭了起来。

玉秀忙起身把盼盼抱在怀里，给盼盼喂奶，盼盼仍不停地哭。

妈妈忙站起来：“怎啦，别是孩子生病吧？”

“不是生病。”玉秀说着，用手轻轻掂打着怀中的盼盼，“好闺女，莫哭，莫哭……”

梁大娘说：“是缺奶水。玉秀刚出满月，就听到了三喜的事。打那，奶水就不够孩子吃了。”

……

妈妈和梁大娘一家见面后，又看了梁三喜留下的欠账单，她难受得直掉泪。让我脱军装转业的事，她再没提起过。

对梁大娘一家，我和妈妈商量该怎样帮助她们。妈妈这次来，身上没带几个钱，因我一直想调回去，手头上也没有存款。

这天下午，炊事班长要到团后勤跟卡车进城拉菜，我便将我的“YASHIKA”照相机交给他，让他想法到委托商店里卖掉。我还让他以连队的名义先从团后勤借一千元现金，我有急用。

妈妈一再嘱咐炊事班长：“呃，别忘了，买十袋奶粉，买四瓶橘子汁，再买个奶锅、奶瓶。”

新建的烈士陵园就在我们九连驻地的山腰间。梁大娘一家来队的第三天上午，我和连里的同志们，陪梁大娘祖孙三代去瞻仰了梁三喜烈士的墓。她们婆媳俩像所有的烈士亲属来队时一样，只是默默地站在亲人的墓前，没有当着我们的面流一滴眼泪。所不同的是，梁大娘和怀抱着盼盼的玉秀，像举行仪式那样，围着梁三喜的坟，左转了七圈，右转了七圈。后来，我才明白，那是她们按沂蒙山古老的祭俗，给亲人“圆坟”……

两天后，炊事班长回来了。他把从团后勤借来的一千元现金和买来的奶粉等物全交给了我。加上手头上还有的一点钱，我留出六百二十元准备为梁三喜烈士还账，又凑够五百元，准备交给梁大娘。

我和妈妈又来到梁大娘一家住的屋子里。

妈妈拿过一袋奶粉拆开，给玉秀讲着奶粉和水的比例应是多少。然后，她往奶锅里倒一点奶粉，开始调制。弄好后，她将奶装进奶瓶，试了试冷热是否合适，便抱起盼盼，给盼盼喂奶。

盼盼大口大口地咂着……

梁大娘站在旁边,乐了:“在家时听他们年轻人说城里有这玩意儿,俺还不信哩。啧啧,这玩意儿是好……啧啧,人可真有本事,造的那奶头跟真的一样……啧啧,是好,是好……”

不大会儿,盼盼便吃饱了。妈妈把盼盼放在床上。盼盼睁着乌亮亮的眼睛望着我们,咧开小嘴,甜甜地笑了……

梁大娘更乐了,转脸对玉秀:“秀哪,这下可不愁了,不愁了!”

此时,梁大娘愈是高兴,我愈是心酸。毋庸讳言,现代文明离梁大娘她们,还是何等遥远啊!

过了会儿,我把那五百元钱拿出来,放在大娘面前:“大娘,这点钱,请您收下。”

“孩子,这……这可使不得!”梁大娘用那枣树皮样的手拿起钱,“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她硬是把钱塞回我的口袋里。

我三次把钱掏出,梁大娘十分执拗地又三次把钱塞还给我。

“梁嫂……”妈妈伤心地说,“您如果……还看得起我和蒙生,您就……把钱收下吧!”

“老吴呀,这你可就把话说远了!”梁大娘忙说,“你给盼盼买来了这么多奶粉,这就帮了俺的大忙了,哪好再花你们的钱。庄户人过日子好说,俺手头上还行,还行。不缺一钱。”

当我和妈妈离开这屋时,我又把那五百元钱放在了床上。

玉秀火急地追出屋来:“指导员,不行,这可不行。不但俺婆婆不依,俺也不能收。快,您拿着……真的,俺还有钱,有钱。”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妈妈喃喃自语:“山里人,山里人的脾气哪……”

啊,山里人!难道我们不都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吗?

前几年我曾一度把拜金主义当作圣经。此时,我才深深感到,人世间总还有比金钱和权势更珍贵的东西,值得我加倍去珍爱,孜孜去追求。

极度内疚中,我看了看另外那准备为梁三喜还账的六百二十元,我心中掠过一丝儿慰藉。然而,这慰藉很快又变为更难言状的悔恨。

是的,梁三喜烈士欠下的钱,我有财力悄悄替他偿还。可我和妈妈欠沂蒙山人民的感情之债,则是任何金钱珠宝所不能偿还的呀!

十三

这天下午,高干事骑着自行车来到连里。

一见面,他车子还没放稳,就很激动地对我说:“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文章可

做呀！”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不知他为何如此兴奋。

“战士‘北京’的亲属找到了！”

“在哪里？”我急问，“薛凯华的亲属来队了？”

“你先猜猜，你们的英雄战士‘北京’，也就是薛凯华烈士……”高干事非常神秘地望着我，“你猜他的爸爸是谁？”

我摇头不知。

“雷军长！薛凯华是雷军长的儿子！”

“啊！！”我大为震惊。过了会儿，我有些不解地问：“那么，凯华咋姓薛？”

“军长的老伴姓薛呀，凯华是姓母亲的姓！”高干事滔滔不绝地说，“我听军里一位干事说，军长有四个女儿，只有凯华一个儿子。军长的大女儿和凯华姓薛，另外三个女儿姓雷。军长的大女儿姓薛，是因为战争年代，军长老伴的家乡曾多次遭敌人的血腥屠杀，凡是军属都在劫难逃，所以他的大女儿便随了外祖父家的姓氏。至于凯华为啥姓薛，听说是因为军长对他唯一的儿子管教极严，当儿子上学取大名时，军长问儿子是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儿子毫不含糊地说喜欢妈妈。军长哈哈大笑了一阵，说：‘那好，像你大姐一样，你也跟你妈姓吧！’于是，便给儿子取名薛凯华……”说到这，高干事突然问我，“呃，军长到你们连来了。怎么，你还没见到他？”

“没有。”

“这就怪了。”高干事愣了会儿，“军长乘吉普车先到的团里，他离开团时说要到你们九连来，我是跟在他的吉普车后头，一个劲地蹬车赶来的！”

我一听，忙和高干事走出屋，围着营区转了一圈，既没见有吉普车，也没见军长的影子。

回到连部，高干事这才顾上蘸湿了毛巾，擦了擦满脸的汗。

“听说军长早就得知凯华牺牲了，但直到眼下，他还没把儿子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老伴。”稍停，高干事接着对我说，“凯华同志留下了一纸遗书，遗书是师里烈士收容队在埋葬他的遗体时，从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的。因遗书上署名只有‘凯华’两字，当时谁也没想到他是军长的儿子。遗书原件现已在军长手里，这有师宣传科的打印件。”说着，高干事拉开采访用的小皮夹，把一纸遗书递给我，“你看看吧，一纸遗书才华横溢，内涵相当深，相当深！”

我接过薛凯华的遗书，急切地读下去。

亲爱的爸爸：

我从北京部队赶赴前线，与您匆匆一见，未及细述。儿知道，爸爸战前

的时间,可谓分秒千金也。

遵爸爸所嘱,我已来到这担任穿插尖刀连的九连。等待我们九连的将是一场啥样的恶仗,现在不管对您还是对我们九连来说,都还是个“X”。

去年冬,爸爸在《军事学术》上读到写的两篇千字短文,来信对我倍加鼓励,并夸我有可能是个将才。不,亲爱的爸爸,您的凯华不瞒您说,我不但想当未来的将军,更想成为未来的元帅!

嗨,您二十一岁的凯华口气多大呀!不管此乃“野心”也罢,雄心也好,反正我极推崇闻名世界的这一兵家格言:“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诚然,绝非所有的士兵都能成为将军。举目当今世界,眼花缭乱的现代物质文明,对我们这一代骄子有何等的诱惑力呀!但是,我的信条是:花前月下没有将军的摇篮,卿卿我我中产生不出元帅的气质;恋栈北京的士兵,则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元帅!未来的元帅应出自深悉士兵涵义的士兵,应来自血与火的战场上!基于此种认识,我才请求离开京都,奔赴前线,来做一场“未来元帅之梦”。

亲爱的爸爸:您去年推荐我读的几部外国军事论著,我大都早已读过。爸爸年已五十有七,尚能潜心研究外军,儿感到可钦可佩。爸爸在写给我的信中云:“一介武夫,是不可能胜任未来战争的!”此语出自爸爸笔下,儿感到尤为振奋!有人把军人视为头脑最简单的人,错了,大错特错了!且不说张翼德的丈八蛇矛和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即使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也一去不返了!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列强又把科学尖端首先运用于军事。小小地球,日行八万里,转速何等惊人!现代战争,向我们的元帅和士兵,提出了多少全新的课题!如果我们的双脚虽已踏上波音747的舷梯,但大脑却安睡在当年的战马背上,那是多么危险呀!前些年儒家多遭劫难,但我却企望,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个个都能集虎将之雄风和儒家之文采于一身!

亲爱的爸爸,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对我的父辈们怀有隐隐怜心。新中国的礼炮鸣响之时,你们正值中年。如果从那时,你们便以攻克敌堡的精神去攻占军事科学高峰,那么,现在的你们则完全会是另一番风采!然而,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角逐,一次次“大风大浪”的漩涡,既卷走了你们宝贵的年华,也冲走了中华民族多少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啊!更有甚者,有人乱中谋私利,把人民交付的权力当作美酒啜饮,那就更令人可悲可叹了!

爸爸,我知道,用牢骚去对待昨天是无济于事的。那么,让你们老一代带领我们新一代,赶紧去抢救明天吧!

亲爱的爸爸:马上就要集合了,您戎马生涯大半生,打仗意味着什么,毋庸赘言。如果战场上我作为一名士兵而献身,当然不需举国为我这“未

来的元帅”举行葬礼。不过，能头枕祖国的巍巍青山，身盖南疆殷红的泥土，我虽死而无憾，也无愧于华夏之后代、炎黄之子孙了。

此次战争胜券稳操，凯旋指日可待

祝爸爸健康长寿！

您的爱子：凯华敬上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时

爸爸：参战前连里包的“三鲜”水饺，眼下尚未出锅，容我再赘几笔：假如我在战斗中牺牲，望爸爸缓一些日子再把我牺牲的消息告诉我最亲爱的妈妈。如果说爸爸那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严厉父爱不会使儿沦为纨绔子弟的话，那么，妈妈的拳拳慈母之情，则更使儿备觉人间的温暖。此时，一想起妈妈，儿就泪溅信笺。在爸爸蒙难之时，是妈妈带我闯过了生活的险关驿站！妈妈的心脏不太好，她实在承受不了更多的压力了

另：妈妈曾多次让我改为父姓，一旦我牺牲，儿愿遵从母命。望爸爸转告组织

再：当爸爸站在我墓前的时候，我望爸爸切莫为儿脱帽哀悼，只要爸爸对着儿的墓默默望几眼，儿则足矣！这是因为，爸爸脱帽容易使儿想起爸爸“甩帽”。“十年”中，爸爸每次“甩帽”都横遭罹祸！儿在九泉之下，祝愿爸爸永远发扬“甩帽”精神，但儿却惧怕那常常惹爸爸“甩帽”的年月会卷土重来！不过，谁要再想给中华民族酝酿悲剧，历史已不答应，十亿人民也决不会答应。看来，我的担心又是多余的。

儿：凯华又及

一纸遗书，令我荡气回肠！

“赵指导员，你……”高干事见我热泪滴滴，颇感不解！

我并非感情脆弱，我在战场上目睹了凯华的大智大勇，此时捧读他的遗书所产生的激动，是局外人压根不能体味的呀！

屋外传来吉普车响。我和高干事出屋一看，正是军长坐的吉普车，却不见军长在车中。司机告诉我们，军长从团里又到了营里看了看，他现在已到烈士陵园去了，一会儿就到连里来。

我和高干事沿着新修起的路，直奔山腰间新建的烈士陵园。只见军长站在写有“薛凯华烈士之墓”的石碑前，默默为薛凯华致哀。许是遵照儿子的遗言，他没有脱帽。过了会儿，他后退一步，庄重地抬起右手，为长眠的儿子致军礼。良久，他才把右手缓缓垂下……

我和高干事轻轻走过去,只见军长老泪横流,大滴大滴的泪珠洒落在他的胸前……

“遵照凯华的遗愿,你们给团政治处写份报告,把凯华的姓……改过来吧。”军长声音嘶哑地对我说,“另外,我拜托你们,给凯华换一块墓碑,把‘薛’字改为‘雷’字……”

我擦了擦泪眼,连连点头应着。

这时,高干事打开照相机,要为军长在烈士墓前拍照,被军长挥手制止了。

“你,是团里的报道干事?”

“是!”高干事立正回答。

“宣传凯华一定要实事求是。”

“是。”

“不要在凯华改随父姓这事上做文章,报道中还是称他为薛凯华。”

“是。”

“凯华就是凯华,文章中不要出现我的名字。半点都不要借凯华来吹捧我。”

“是。”

“关于九连副连长靳开来没有立功的问题,请你给我搞份调查报告。”

“是。”

“十天之内寄给我。”

“是。”

“战场上,靳开来打得不错嘛!”

“是!”

“你俩先回去吧。”军长对我和高干事说,“我在这里再停一会儿……”

我和高干事离开了烈士陵园。当我俩走出十几步回头望时,只见军长低头蹲在凯华的墓前,一手按着石碑,周身瑟瑟颤抖。当我们转身朝山下走时,隐隐约约听见军长在抽泣……

十四

我把凯华是军长之子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先是愕然,后是叹息,半晌没说一句话。

我从妈妈住的屋里走出来,站在营区外的路旁等候军长。不大会儿,军长从山上下来了。

军长先看望了梁大娘一家,才来到连部坐下。他让我向他汇报了梁大娘一家的遭遇,并看了梁三喜留下的欠账单。他指示让我抽空多跟梁大娘和韩玉秀

唠唠家常,连里要尽量帮助梁大娘一家解决些具体困难,有些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可通过部队组织反映给地方政府……

开晚饭时,军长亲自去把梁大娘一家请到连部里,陪着梁大娘一家吃饭。军长让我喊我妈妈一块来就餐,但妈妈推说她身体不舒服,没来……

吃过饭,军长让我带他到我妈妈住的屋里。

“吴大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呀!”军长进门便嚷道,“不过,我知道你吴大姐是有意躲开我!”

半倚在床上的妈妈忙坐起来,朝军长点了点头。

“我这次到九连来,一是想在凯华的墓前站站,但主要还是想见见你这吴大姐!不过,有言在先,我老雷可不是来负荆请罪的!”军长说罢,坐了下来。

妈妈尴尬无语。

“吴大姐,老实对你说,我老雷早有思想准备。准备打完仗后,你哭着来跟我算账,跟我来要儿子!”军长点起一支烟,重重地抽了一口,“蒙生虽没死在战场上,但也是九死一生嘛!”

“老雷,您别……”

“不。你听我把话说完。不错,我在电话上臭骂了你一通,我那是忍无可忍!你可以恨我‘雷神爷’不近人情,但我老雷至今不悔!吴大姐哪,你的胆量可真不小呀!你出面打电话,你为啥不让我那指挥千军万马的老首长跟我打交道?他可以给我下指示,让我执行嘛!但是,我谅他不会,也谅他不敢!那种时候,你竟敢占用我前沿指挥所的电话,托我办那种事,你……你,你就没想想其中的利害关系吗?!”军长激动地用手指“咚咚”敲打着桌面。压了压火,他接上说,“要是时间后退三十几年,如果我‘雷神爷’托你吴大姐办那种军人最忌讳的事,你会咋办?骂我一通,扇我两耳刮子,那是轻的!给我一粒枪子,算我活该!当年是个啥样情景?‘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嘛!那首歌,还是你吴大姐一句一拍教我唱会的,唱得热血沸腾嘛!”

“老雷,您别说了……”妈妈啜泣起来。

“不,我今晚的话多着呢!你这次来,我满足你的要求。我老雷没有忘记我当年说过的话:有恩不报非君子!没有你吴大姐把我从死尸堆里背出来,我‘雷神爷’能活到今天当军长吗?!”军长一下拧死烟蒂,站了起来,“行呀!只要蒙生本人也同意,你这遭来可以把他领回去!穿着军装回去可以,脱掉军装回去也行!我老雷办事图干脆,这次,我签字!我画圈!”

“老雷……”妈妈哭出声来了。

“但是,签字画圈之后,我的吴大姐呀,我老雷得让你扪心问一问!那么办了,是报你的恩呢,还是把你往泥坑里推呢?那么办了,死去的烈士会不会答应?”

养育我们的人民能不能答应?!别的不说,单说四三年秋在沂蒙山的那场突围战,我带的那个营是整整四百人哪!可一仗下来,当吴大姐你把我从死尸堆里背出来后,活下来的有多少?只有四十三个幸存者,刚过十分之一呀……”

军长的声音沙哑了。他掏出手帕擦了擦发湿的眼睛,又坐了下来。他又点起一支烟,轻轻地喷吐着。

妈妈不停地拭泪,军长看看她,放缓了声调:“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曾学过郭老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候体会还不深。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天下,坐天下,居功骄傲,贪安逸,图享受,会毁掉一切的!前些年我靠边站,得空啃了几本古书,我反复诵读过杜牧的《阿房宫赋》。杜牧就秦王朝的灭亡,发出这样的感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当然不可与历代农民起义相提并论。不过,两千多年封建特权的劣根性,资产阶级腐朽发霉的毒菌,在我们党内还是有些市场啊!我们还有没有‘倒退’之虞呢?是否还要让我们的后人来‘哀’我们呢?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军长抽了口烟,看看我,“经过十年动乱后,现在有人指责青年一代‘看破了红尘’。那么,我们这些老家伙中有没有所谓‘看破红尘’的?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互开后门,损公肥己……发展下去,不得了哇!老百姓有句土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这些老家伙不做出样子来,咋去教育青年一代?蒙生现在是功臣了,我不好再批评他。他过去之所以那样,固然有他自己的原因,可吴大姐呀,难道你这当妈妈的就没有责任吗?”

妈妈含泪点了点头。

军长又望着我妈妈:“你八岁卖给地主当丫头,我七岁就给东家放牛。现在给青年人忆苦思甜,怕是起不到明显作用了。但我们这些老家伙常想想过去的苦,那还是很有好处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列宁算是把话说到家了!”军长弹了弹烟灰,又吸了口烟,“六五年我到北京开会时,和陈老总进行过一次长谈。当谈到我们当年在山东时,陈老总意味深长地说,在他进棺材之前,他忘不了山东父老!当然,我们的陈老总不单是指山东父老,他指的是人民!要说报恩,我们要一辈子报答人民的大恩大德,而不是把我们当成人民的救世主!革命,是人民用小米喂大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呀!”

一弯月儿在窗棂上探出头来,投进点点银辉。屋内,静极了。

“今天见到梁大娘,别提我心里是啥滋味儿。”军长深沉地说,“吴大姐,你的蒙生是吃着梁大娘的奶长大的。可你看看梁大娘穿的那身衣裳,你再看看梁三喜留下的那欠账单,你就不难想象出,她们还过着啥样的日子啊……”

军长的眼里闪着泪光,妈妈也在抹泪。

“不错。吴大姐,十年动乱中,你我这些老家伙们都吃过苦,挨过整。可我要

说,受苦受难最厉害的不是我们,是梁大娘那样的老百姓!不必隐讳,就是我在蹲班房时,我吃的用的也比梁大娘她们好得多,甚至可以说没法比……咳!”军长喟然长叹一声,“我那凯华十五岁时和他四姐一起,到延安米脂县插队,住在我当年的一个老房东家里。七七年春那阵我还没复职,我专程去米脂县看望我那老房东。谁会相信呀,老房东全家八口人,却只有五个吃饭的碗,他们连吃饭的黑碗都买不全。当时,我……延安,那更是养育革命的圣地啊!”

“老雷,别……别说了……”

“我……不说了。说起来我真想大哭一场!前些年老百姓身上的肉早已不多,可‘尾巴’倒不少,一个劲地割,割,割!自己‘出有车,食有鱼’,过得舒舒服服的,咋就不睁眼看看老百姓?别说党性了,问问我们的良心何在?!革命,共产党因为穷才革命。治穷,本是共产党人的天职啊……”

屋内的空气又凝结了,沉重的气氛像铅块,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轻声对军长说:“这次打仗,我们团里有许多烈士留下了欠账单,他们都是从农村入伍的。”

“这件事情,我们是要向中央报告的。”军长说,“极左路线,可把老百姓害苦了。”

过了五六分钟,军长的情绪才平静下来。这时,他问起我们九连的战斗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并向他重点介绍了梁三喜和靳开来参战前后的表现……

军长听罢又站起来:“这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像梁三喜他们,尽管十年动乱给他们留下了难言的苦楚,但当祖国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都以身许国!”军长激动地挥着右手,“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这就是伟大之所在!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这就是希望之所在!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梁三喜他们,真正称得上是我们的民族之魂!”过了会儿,军长又坐下来,他看了看表,“不早了,差不多就是凌晨了。”

他又简单地问起凯华牺牲时的情况,我回答了他。但那两发臭弹的事,我却压根儿没敢告诉他。我不忍心让这位虎将再怒发冲冠地“甩帽”了。

这时,炊事班长推门进来,慌慌张张地对我说:“指导员,韩玉秀不见了!”

我一听,急忙奔出屋。见梁大娘站在院子里,我问她是咋回事,她说她打了个盹,拉开灯睁眼一看,就不见玉秀了……

边境线上时有越寇的特工队员潜进来活动。我顿时慌得六神无主。战士们也都起来了。我忙带大家在营区周围寻找,也没见玉秀在哪里。

“玉秀她,会不会到三喜的坟上去了。”梁大娘对我说,“自打听到三喜没了,玉秀怕俺伤心,她没敢当俺的面哭过……”

我忙带着几个战士赶到烈士陵园。

一钩弯月斜挂中天。当我们离梁三喜的坟还有十几米远时,见一个人趴在坟上。无疑,那是玉秀。我让大家停下来。

山崖下,竹林中,草丛里,传来虫儿的声声低吟,却听不见玉秀的哭声。

过了一大会儿,我们才轻轻走近梁三喜的坟前,只见玉秀把头伏在坟上,周身战栗着,在无声地悲泣……

“小韩,你……哭吧,哭出声来吧……”我呜咽着说,“那样,你会好受些……”

玉秀闻声缓缓从坟上爬起来:“指导员,没……没啥,俺觉得在屋里闷……闷得慌……”她抬起袖子擦了擦泪光莹莹的脸,“没啥。俺和婆婆快该回家了,俺……俺想来坟上看看……”

满天星斗像泪人的眼睛,一闪一眨,苍穹下的一切,在我面前全模糊了。

十五

次日,军长离开连队到军区开会去了。临行前他又一再嘱咐,让我们好好关照梁大娘一家。

梁大娘和韩玉秀在连里又住了一个星期,便说啥也待不住了,非要回去不可。我知道是无法挽留她们了。再说,住在连里,举目便是烈士新坟,这对她们也无疑是精神的折磨。我想,一切留待今后从长计议吧,让她们早些回去,或许还好些。团里也同意我的想法。

梁大娘一家明天早饭后就要离开连队了。

这天下午,团政治处主任来到连里,一是来为梁大娘一家送行,二是要代表部队组织,问一下梁大娘家有哪些具体困难。因为,对于像梁三喜烈士这样不够随军条件的直系亲属及子女,抚恤的事需部队和地方政府联系商量。据我们了解,在农村中,对家中有劳力的烈士父母,一般是可照顾可不照顾;对烈士的爱人及子女,按各地生活水准不同,有的每月照顾五元,有的每月照顾八元……情况不等。团里想把梁大娘一家无依无靠的情况,充分向地方政府反映一下,以取得民政部门对梁大娘一家特殊的照顾。

梁三喜烈士没有给他的亲人留下什么遗产。他的两套破旧军装被作为有展览价值的遗物征集之后,团后勤又补发了两套新军装。再就是他生前用塑料袋精心保管的那件军大衣。

我拿着那件军大衣和两套新军装,准备交给韩玉秀。

当我和政治处主任走至梁大娘一家住的房前时,玉秀正坐在水龙头下洗床单和军衣。这些天来,不管我和战士们怎样劝阻,玉秀不是帮炊事班洗涮笼屉布,就是替战士们拆洗被子,一刻也闲不住……

“小韩，快别洗了。”我对玉秀说，“快进屋来，主任代表组织，要跟您和大娘谈谈。”

玉秀不声不响地站起来擦擦手，跟我和主任进了屋。

我把那两套新军装和塑料袋里的军大衣，放在玉秀的床上：“小韩，这是连长留下的……”

玉秀用手一触那盛军大衣的塑料袋，“啊！”地尖叫一声，扭头跑出屋去。

我忙跟出来：“小韩，你……怎么啦？”

玉秀满脸泪花，把两手插在洗衣盆里，用劲搓揉着盆中的衣服。

“小韩……你？主任要跟你谈谈。”

她上嘴唇紧咬着下嘴唇，没有回答我。

“蒙生啊，你让她洗吧。”屋内的梁大娘对我说，“俺早就跟同志们唠叨过，玉秀要干活，你们谁也别拦挡她。她啥时也闲不住的，让她闲着她心里更不好受。洗吧，让她洗吧，明日她想给同志们洗，也洗不成了……”

从玉秀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女性忍辱负重、值得大书特书的传统美德！可此时，梁三喜留下的军大衣为何引起她那般伤痛，我困惑不解……

“蒙生，别喊她了。有啥话，你们就跟俺说吧。”梁大娘又说道。

我和主任面对梁大娘坐了下来。

主任把组织上的意图，一一给梁大娘讲了。

大娘摇了摇头：“没难处，没啥难处。”

我和主任再三询问，大娘仍是摇头：“真的，没啥难处。如今有盼头了，庄户日子好说。”

面对憨厚而执拗的老人，我和主任无话可说了。

过了会儿，梁大娘望着我和主任：“有件事，大娘想请你们帮俺说说。”

“大娘，您说吧。”主任打开小本，郑重地准备记下来。

“咳！”梁大娘叹了口气，“说起来，俺梁家真是祖上三辈烧过高香，才摊上玉秀那样的好媳妇呀！你们都见了，要模样她有模样，要针线她有针线。家里的事她拿得起，外面的活她拢得下。她脾气好，性子温，三村五疃都夸俺命好有福……”大娘撩起衣襟擦了擦眼，“可一说起玉秀，大娘心里就难受，俺这当婆婆的对不起她呀！她过门前，三喜他爹病了两年多，俺手头上紧……她过门时，别说给她做衣服，俺连……连块布头都没扯给她，她就嫁到俺梁家来了……”

梁大娘难受得说不下去了。

停了阵，梁大娘又断断续续地说：“……去年入冬俺病了，病了一个多月。俺本想打封信让三喜回去趟，可玉秀怕误了三喜的工作，说来回还得破费，就没给三喜打信说俺病了。那阵玉秀快生了，是她拖着那重身子，到处给俺寻方取药，

端着碗一口一口喂俺吃饭……又擦屎又端尿的……唉，大娘这辈子没有闺女，就是亲生的闺女又会怎样，也……也比不上她呀！眼下，媳妇待俺越是好，大娘俺心里越是难受……”

梁大娘不停地用衣襟擦着眼角，我心里涌起阵阵痛楚。良久，她抬起脸来看着我，和主任：“玉秀她今年才二十四岁，大娘俺不信老封建那一套。再说，三喜也留下过话，让玉秀她……可就是有些话，俺这当婆婆的不好跟媳妇说。你们在外边的同志，懂的道理多，你们帮俺劝劝玉秀，让她早……早寻个人家吧……”

“娘！您……”玉秀一下闯进屋，双膝“扑通”跪在婆婆面前，猛地用手捂住婆婆的嘴，哭喊着，“娘！您别……别说……俺伺候您老一辈子！”

梁大娘紧紧抱着儿媳：“秀哪，那话……当娘的早晚要……跟你说，娘想过，还是……还是早说了好……”

“娘！……”玉秀又用手捂着婆婆的嘴，把头紧紧贴在婆婆怀里，放声哭着。

“秀，哭吧……把憋在肚里的眼泪全……全哭出来吧……”梁大娘也流泪了，她用手抚摸着儿媳的头发，“哭出来心里就好受了……”

玉秀戛然止住哭声，抽泣起来。

主任已转过脸去不忍目睹，他手中的记事本和笔不知啥时落在了地上。我用双手紧紧捂着脸，只觉得泪水顺着指缝间流了下来……

……

炊事班长三天前便得知梁大娘一家要回去，他借跟团后勤的卡车进城拉菜的机会，买回了连队过节也难吃到的海米、海参、木耳、冰冻对虾等，准备做一餐为梁大娘一家送行的饭。

是的，世上任何山珍海味，珍馐佳肴，大娘和玉秀都有权利享用，也应该让她们尝一尝！

翌日晨。团里派来了吉普车，要把梁大娘一家直接送到火车站。

营首长来了。我妈妈也过来了。各班还选派了一个代表，和大娘一家一起就餐。桌子上摆着二十多盘子菜。炊事班长说“起脚饺子图吉利”，还包了不少水饺。我妈妈替玉秀抱着盼盼，用奶瓶给盼盼喂奶。

我们不停地把各种菜夹到大娘和玉秀碗里，让大娘和玉秀多吃点菜。但是，夹进碗里的各种菜都冒出了尖，大娘和玉秀却没动一下筷子……

在场的人谁心里都明白，这桌菜并不是供大家享用的，其作用只不过是借劝饭让菜，来掩饰大家心中的伤感罢了。

在大家一再劝让下，大娘只吃了两个饺子，喝了几口饺子汤。玉秀只吃了一个饺子，喝了一口汤，便说她早晨吃不下饭，她不饿，她饱了。

战士们已陆陆续续来到连部，要为大娘一家送行。昨晚，我已给大家讲过，

在大娘一家离开连队时,让大家把眼泪忍住……

这时,段雨国竟第一个忍不住抹起泪来。他一抹泪,好多战士也忍不住掉泪了。

梁大娘站起来:“莫哭,都莫哭……庄稼人种地,也得流几碗汗擦破点皮,打江山保江山,哪有不流血的呀!三喜他为国家死的,他死得值得……”

大娘这一说,段雨国更是哭出声来,战士们也都跟着哽咽起来。有人捅了段雨国一下,他止住了哭。大家也意识到不该在这种时候,当着大娘和玉秀的面流泪。

屋内静了下来。

“秀哪,时辰不早了。别麻烦同志们了,咱该走了。”停了停,大娘对玉秀说,“秀,你把那把剪子拿过来。”

玉秀从蓝地上印着白点点的布包袱里,拿出做衣服用的一把剪子,递给了梁大娘。

大娘撩起衣襟。这时,我们发现,大娘衣襟的左下角里面缝进了东西,鼓鼓囊囊的。大娘拿起剪子,几下便铰开了衣襟的缝……

我们不知大娘要干啥,都静静地望着。

只见大娘用瘦骨嶙峋的手,从衣襟缝里掏出一叠崭新的人民币,放在了桌上!

我们一看,那全是十元一张的厚厚一叠人民币,中间,系着一绺火红的绸布条儿。

接着,又见大娘从衣襟缝隙里,摸出一叠发旧的人民币,也全是十元一张的……

大娘这是要干啥?我惊愕了!大娘身上有这么多钱,可她们祖孙三代下了火车竟舍不得买汽车票,一步步挪了一百六十多华里……

大娘看看我,指着桌上的两叠钱说:“那是五百五十块,这是七十块。”

这时,玉秀递给我一张纸条:“指导员,这纸条留给您,托您给俺办办吧。”

我接过纸条一看,是梁三喜留给她们的欠账单!这纸条和那血染的纸条是一样的纸,原是一张纸撕开的各一半……

顿时,我的头皮嗖嗖发麻!

梁大娘心平气和地说:“三喜欠下六百二十块的账,留下话让俺和玉秀来还上。秀哪,你把三喜留下的那封信,也交给蒙生他们吧。”

玉秀把一封信递给了我。

啊,我们在此时,终于见到了梁三喜烈士的遗书!遗书如下:

玉秀:

你好!娘的身子骨也很壮实吧?

昨天收到你的来信,内情尽知。因你的信是从部队留守处转到这里的,

所以从你写信那天到眼下,已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了。

你来信说你很快就要生了。那么,我们的宝贝眼下该是快出满月啦我遥遥祝幅,祝福你和孩子都平安无事!娘看到她的小孙子(或小孙女)呱呱问世,准是乐得合不拢嘴了。

秀:从全年六月开始,我每次给你写信都说我很快就回家休假,你也天天盼着我回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眼下新的一年又过去一个月了,我并没能回去。尽管你在来信时对我没有丝毫的抱怨,但我从心里觉得,我实在对不起你!

一个月前,我给你去信时说我们连要外出执行任务,别的没跟你多说。现在我告诉你,我们连离开原来的驻地,坐火车赶到这云南边防线来了。来到一看,越南鬼子实在欺人太甚,常常入侵我领土,时时惨杀我边民!我们国家十年动乱刚结束,实在腾不出人力、物力来打仗,但这一仗非打不可了!别说我们这些当兵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来这里看看也会觉得,如再不干越南小霸一家伙,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脸是会没处放的!

当你接到这封信时,我们就已经杀上自卫还击的战场了!

秀:咱俩出生在同一个山村枣花峪,你比我小八岁,虽说不上青梅竹马,可也是互相看着长大的。自咱俩建立关系和结婚以来,只红过一次脸。你当然会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三月你来连队后的一天夜里。我跟你开了个玩笑,说我说不定哪一天会上战场,会被一颗子弹打死的。想不到这话惹恼了你,你用拳头捶着我的胸膛,说我“真狠”,“真坏”!之后,你哭了,哭得是那样伤心。我苦苦劝你,你问我以后还说不说那样的话,我说不说了,你才止住了泪。你说:“两口人,谁也不能先死,要死,就一块死!”秀:我知道你爱我爱得那样无私,那样纯真,那样深沉!

但是,军人毕竟是战争的产儿,没有战争则不会有军人!秀:现在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极有可能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

秀:咱俩结婚快三年了。连我回家结婚那次休假在内,我休过两次假,你来过一次连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总共还不到九十天!去年你来连队要回去的最后一天晚上,你悄悄抹了一夜泪。(而眼下看来,那很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在一起了。)我知道你是那样舍不得离开我,我也很想让你多住些天。但你既挂着咱娘一个人在家不行,又惦着农活忙,还是起程了。当你泪汪汪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车,我当时心里也说说不出的难受。艰苦并不等于痛苦,平时连队干部的最大苦衷,莫过于夫妻遥遥相盼,长期分居两地呀!我当时想过,干脆转业回老家算了,咱不图在部队上多拿

那点钱,那点钱还不如你来我往扔在路上的多!家中日子虽苦,咱们苦在一处,不是比啥都好吗?!但转念一想,如果都不愿长期在连队干,那么,兵总得有人带,国门总得有人守,江山总得有人保啊!

秀:我赤条条来到这个人世间,吸吮着山村母亲的奶汁长大成人。如果从经济地位来说,我这“土包子”连长同他人站在一起,实在够“寒碜”人的了!但我却常常觉得我比他人更幸福,我是生活中的幸运儿!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那是因为有了你,我亲爱的秀!每当听到战友们夸奖和赞美你时,我心里就甜丝丝的。又岂止是甜丝丝的,你,是我莫大的自豪和骄傲!但是,每当想起你,阵阵酸楚也常常涌上我的心头。一是因为我家的那些遭遇,更是因为咱的家乡还太贫穷,你跟上我,没过一天宽裕日子呀!尽管我是被人们称为“大军官”的人,又是月薪六十元的连职干部,可我却没能给你买过一件衣服,更别说什么像样的料子和尼龙了。然而,你却常常安慰我:“有身衣裳穿着就行了,比上不足,比下咱还有余呢!”……秀:此时想起这一切,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你,我只能说,你对我,你对俺梁家的高恩厚德,我在九泉之下也绝不会忘记的!

头一次给你写这么长的信,但仍觉话还没有说尽。营里通知我去开会,回来抽空再接上给你写。

玉秀: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下面的话便是我的遗嘱:

当我死后,你和娘作为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深信你们是不会给组织和同志们添麻烦的。娘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了,她本人也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一旦我牺牲,政府是会妥善安排和照顾她的。她的晚年生活是会有保障的。望你们按政府的条文规定,享受烈士遗属的待遇即可。但切切不可向组织提出半点额外的要求!人穷志不能短。再说我们的国家也不富,我们应多想想国家的难处!尽管十年动乱中,有不少人利用职权浑水摸鱼已捞满了腰包(现在也还有人那么干),但我们绝不能学那种人,那种人的良心是叫狗吃了!做人如果连起码的爱国心都没有,那就不配为人!

秀:你去年来连队时知道,我当时还欠着近八百元的账,现在还欠着六百二十元。(欠账单写在另一张纸条上,随信寄给你。)我原想三四年内紧紧手,就能把账全还上,往后咱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一旦我牺牲,原来的打算就落空了。不过,不要紧。按照规定,战士、干部牺牲后,政府会发给一笔抚恤金,战士是五百元,连、排职干部是五百五十元。这样,当你从民政部门拿到五百五十元的抚恤金后,还差七十元就好说了。你和娘把家中喂的那头猪提前卖掉吧。总之,你和娘在来部队时,一定要把我欠的账一次还清。借给我钱的同志们大都是我知心的领导和战友,他们的家境也都不是很宽

裕 如果欠账单的名单中,有哪位同志也牺牲了,望你务必托连里的同志将钱转交给他的亲属。人死账不能死。切记!切记!

秀:还有一桩比还账更紧要的事,更望你一定遵照我的话办。这些天,我反复想过,我们上战场拼命流血为的啥?是为了祖国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在人民之中,天经地义也应该包括你——我心爱的妻子!秀:你年方二十四岁,正值芳龄。我死后,不但希望你坚强地活下去,更盼望你美美满满地去生活!咱那一带文化也是比较落后的,但你是个初中生,望你敢于蔑视那什么“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遗训;盼你毅然冲破旧的世俗观念;一旦遇上合适的同志,即从速改嫁!咱娘是个明白人,我想她绝不会也不应该在这种事上阻拦你!切记!切记!不然,我在九泉之下是不会瞑目的!!

秀:我除了给你留下一纸欠账单外,没有任何遗产留给你。几身军装,摸爬滚打全破旧了。唯有一件新大衣,发下两年来我还一次没穿过,我放在一个塑料袋里装着。我牺牲后,连里的同志是会将那件军大衣交给你的。那么,那件崭新的军大衣,就作为我送给你未来丈夫的礼物吧!

秀:我们连是全训连队,听说将担任最艰巨的战斗任务。别了,完全有可能是要永别了!

你来信让我给孩子起名儿,我想,不论你生的是男是女,就管他(她)叫“盼盼”吧!是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党的三中全会也开过了,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美好的曙光,我们有盼头了,庄户人的日子也有盼头了!

秀:算着你现在已出了月子,我才敢将这封信发走。望你替我多亲亲他(她)吧,我那未见面的小盼盼!

顺致

军礼!

三喜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捧读遗书,我泪涌如注,我怎么也忍不住,我号啕起来……

我用瑟瑟发颤的手拿起那五百五十元的抚恤金,对梁大娘哭喊着:“……大娘,我的好大娘!您……这抚恤金,不……不能啊……”

屋内一片呜咽声。在场的人们都已完全明白,是一桩啥样的事发生了!

段雨国大声哭着跑出去将他的袖珍收音机拿来,又一下撸下他手腕上的电子表,“砰”一下按在桌子上:“连长欠的钱,我们……还!”

“我们还!”

“我们还!!”

“我们还!!!”

……泪眼中,我早已分不清这是谁,那是谁,只见一块块手表,一把又一把人民币,全堆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

当一片撕心裂胆的哭声渐渐沉下,我嗓音发哽地哀求梁大娘:“大娘,我是……吃着您的奶长大的……三喜哥欠的钱,您就……让我还吧……”

梁大娘用手背抹了抹眼睛,苍老的声音嘶哑了:“……孩子们,你们的好意,俺和玉秀……领了,全都领了!可三喜留下的话,俺这当娘的不能违……不然,三喜他在九泉之下,也闭不上眼……”

不管大家怎样哭劝,大娘说死者的话是绝对不能违的!她和玉秀把那六百二十元钱放下,上了车……

我妈妈已哭得昏厥过去,不能陪梁大娘一家上火车站了。战士们把东倒西歪的我,扶进了吉普车内……

走了!从沂蒙山来的祖孙三代人,就这样走了!

啊,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上帝!

尾声

赵蒙生讲述的往事,深深把我打动了。

我们啜泣着,谁也不再说话。

良久的沉默过后,赵蒙生擦了擦发红的泪眼,声音发涩地对我说:“就是因为那些,三年多来,我一直把梁大娘视为娘亲。我每月领到薪金后的第一桩事,便是给梁大娘写一封问安的家信,并汇去三十元钱。自然,我是有条件一次给大娘汇去上百元、甚至几百元的,但我没有那样做。我知道梁大娘并不稀罕别人的钱,我所以这样,是为了让大娘得到些精神上的安慰,让她老人家时时知道,边防线上还有一个她当年用奶汁喂大的儿子,还月月没忘了向她老人家尽一点点孝心呀!可眼下,大娘她……”赵蒙生拿起放在桌上的那一千二百元的汇款单,用手拍了下头,“为啥?大娘为啥把钱全给我退回来了?难道大娘一家的生活,真的不需要点添补吗?不是,不是啊……”

段雨国望着我,轻声说:“去年春天,我还在九连当文书,大家推选我当代表,让我和教导员一起,专程去沂蒙山看望过梁大娘一家。由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经济政策放宽了,梁大娘一家不再为吃犯愁了,穿得也比过去好些了。但是,我和教导员也都看到了,大娘家铺的炕席,竟有十几处补着蓝布补丁。大娘和玉秀,连领新炕席都舍不得花钱买呀!”

“为啥?这到底是为啥?”赵蒙生面对汇款单,又大声自问,“难道大娘是不宽恕我

这不肖子孙吗？不会，不会的！再说，这三年多来，我没有啥事瞒着过大娘呀……”

“那是绝对不会的！”书记段雨国对赵蒙生说罢，转脸对我说，“李干事，你回山东后快去采访梁大娘吧，梁大娘真是有颗菩萨般的慈母心啊！去年春天，我和教导员去看望她老人家时，甭提大娘对我们有多好啦。吃，她怕我们吃不好；睡，她怕我们睡不宁。顿顿尽力给我们做好吃的，还悄悄把那下蛋的母鸡也宰了两只！不然，我和教导员还会多住两天的，怕再住下去把大娘累垮了，我们才不敢多停留。”

赵蒙生对段雨国说：“小段，你再帮我琢磨琢磨，大娘她为啥把钱全给退回来啊？”

段雨国长长的睫毛忽闪了两下：“前几天，我读过一篇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说过：‘接受施舍会使人变得卑微，被人怜悯是最痛苦的事情。’梁大娘和韩玉秀是很有骨气的人，会不会……”

“啥？！”赵蒙生霍地站起来，一把抓起段雨国胸前的衣扣，“你这小知识分子，你说的啥？！你……你……”

面对骤然狂怒的教导员，段雨国结结巴巴地说：“教导员，我……我……”

赵蒙生放开段雨国，满脸火辣猩红：“施舍？怜悯？别说我小小赵蒙生，我要放声问，谁，谁有权利施舍梁大娘？！谁，谁有资格怜悯梁大娘？！天经地义，她早就应该过上好日子，顺理成章，她有权利也有资格享受幸福的晚年！”

说罢，他一下坐在椅子上，两手按着额头，又痛苦地沉默了。

段雨国低下头，自责地说：“教导员，我……我说错了。”

晚饭的时间早过了。这时，通信员送给赵蒙生几份报刊和一封信，催我们去吃饭。

赵蒙生拆开信看了会儿，把信递给我：“你，看看这封信吧。”

信是赵蒙生的母亲吴爽同志寄来的。大意是：柳岚这次超假，确系患病。柳岚患的是急性肺炎，已住院二十天，绝不是通过关系开啥病假条欺骗组织。这，她当妈妈的愿以老党员的党性来证实。信中说柳岚现已病愈，近几天便可归队。但说柳岚的思想问题仍很严重，一心想脱军装回城市。当妈妈的希望赵蒙生不要光是吹胡子瞪眼，要多做柳岚的思想工作。吴爽同志在信中还写道，她已办了离休手续，近些天她准备起程到沂蒙山，去看望梁大娘一家……

见我看完信，赵蒙生说：“去年夏天，柳岚从军医大学毕业时，一心想分配到爸妈身边。我和她进行了反复的思想交锋，甚至闹到要离婚的地步，她才不情愿地来到这边防前哨。在这件事上，我妈妈还是起了好作用的，她提前把柳岚要回城市的后门全堵死了。我对柳岚的态度，也许有些过火。别说她，就是我本人又怎样呢？我也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呀！三年多来，在脱不脱军装转业回城的

问题上,我也动摇过,彷徨过。但是,一想起牺牲的烈士们,一想起梁大娘一家,我就感到无地自容。不过,要让柳岚也在这里待下去,看来是难,难哪!”

我在营部住了一夜。九连的营房离营部只有一溪之隔。第二天,赵蒙生带我来到九连。

头午,我召开了个座谈会。过午,全连停课采集花卉,我也参加了。

明天是清明节,九连要用鲜花扎成花环,敬献到烈士墓前。

云南边陲,四季花事不败。清明前后,又是花事最盛的时节。山上山下,路旁溪边,到处是花儿绽蕾舒萼。风里飘着幽香,空气里含着甜汁。傍晚时分,采集花卉的战士们汇集到溪边来了。

晚霞映照着从深山中流来的一泓清溪,溪中溢红流彩。大家坐在溪旁,用火红的攀枝花,洁白的山茶,金黄的云槐,天蓝的杜鹃,还有一束束颜色各异的野花,扎成一个个五彩缤纷、群芳荟萃的花环。然后,大家把扎好的花环立在溪中,将一串串珍珠般的溪水,洒落在花环上……

段雨国从营部跑过来,对赵蒙生说:“教导员,梁大娘来信了!信我已看了,那汇款单的事……干脆,让李干事先看看吧!”

我接过信,读起来:

蒙生:

你身体好,同志们的身体也都好吧!

每次给你回信,都是玉秀写。这次因为大娘要说到她的事,就让俺村小学的孙老师给俺写这封信。

前两天,大娘托人到邮局把你三年多来汇给俺的钱给你寄回去了,总共一千二百元,你收到了吧?

蒙生:俺村老少没有不夸你的,说你心眼好,一直没忘了你大娘。大娘把钱给你寄回去,你可别多心呀。

一是因为大娘家的日子,现在是确实好过了。公家每月发给俺、玉秀、盼盼每人五元钱,合起来就是十五元。加上现在搞责任田,大娘一家三口的地,收的也不少。村里有拥军优属小组,你大娘家包的地,都是种时先种,收时先收,不等俺和玉秀动手,他们就抢着给干了。老解放区,有这么个传统。现在你大娘不但不欠钱了,左邻右舍急着用钱时,还常常从你大娘这里拿几块呢!

二是前线上一直还不安稳,你们风里雨里站岗放哨,多么不容易啊!三喜当连长回家时对俺说过,连里有不少战士有困难,家里遇上啥病呀灾的,有的战士就犯难。可三喜那时手头上紧巴,拿不出钱来帮他们救急。所以大

娘掂量来掂量去，还是把你三年多来寄来的这一大笔钱给你寄回去。万一哪个战士家遇上难处，你把这些钱铺排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安心保国，大娘觉得更合适。

蒙生：往后你可千万别再给大娘寄钱了。你心里有你这个大娘，大娘俺就觉得啥也有了。

另外，去年大娘打信跟你要柳岚的相片，你寄来了。大娘一瞧她那俊眉俊眼的模样，就喜得受不了。你来信说她在前线不安心，你说她的那些话，大娘俺不依你！你可别虎二呱叽地老训她。女人家比不上你们男子汉，夜里你可别让她也去站岗！别说她是城里长大的，连俺玉秀都说，让她在那深山老林里住，她夜里都害怕。这些，你可得依着大娘的话去办！

再就是，这些日子大娘遇上了顶欢喜的事，玉秀的事已有着落，见眉目了。俺村里有个民办教师小陈，两年前他父母都过世了。小陈还没成家，他和俺玉秀是同岁。小陈心眼实，人长得也受看，配俺玉秀正合适。村里人撮合着要把玉秀许给小陈，小陈挺愿意，还说要上门来养俺的老。可就是玉秀心里总还惦念着三喜，一直不点头。也算巧了，你妈最近来信说她退休了，就要来看俺。俺本不想让你妈来回破费，但眼下俺盼着你妈来，她来了让她开导开导玉秀。只要你妈一来，大娘俺不管玉秀她点不点头，由俺和你妈给她做主，立时就欢欢喜喜地把她的婚事办了。

到那时，你大娘这辈子就啥心事也没有了，没有了……

朝阳，头顶着一抹橄榄色的云冠，露出了慈祥的笑脸。霞光给青山绿水披上了斑斓的彩衣。

赵蒙生带领着九连全体同志和我，抬着一个个用鲜花编织成的花环，徐徐来到烈士陵园。

大家把花环一个个敬献在烈士墓前。

松柏掩映的烈士陵园里，到处有人工精心培育的花丛。在梁三喜烈士的墓前，是一簇叶茂花盛的美人蕉。硕大的绿叶之上，挑起束束俏丽的花穗，晨露在花穗上滚动，如点点珠玉闪光……

和梁三喜烈士的墓碑并排着的是：九连副连长靳开来烈士的墓碑、八二无后坐炮班战士雷凯华烈士的墓碑、不满十七岁的司号员金小柱烈士的墓碑……

默立在这百花吐芳的烈士墓前，我蓦然间觉得：人世间最瑰丽的宝石，最夺目的色彩，都在这巍巍青山下集中了。

……

锅碗瓢盆交响曲

● 蒋子龙

刀,怎能不碰菜板?勺,怎能不碰锅沿?我们的铁的大饭锅里,好不热闹!

——题记

序曲——从生命的低潮开始

“花儿里为王的是牡丹,人世间英俊的数青少年。”眼下——正是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二年的初夏,朝阳初升,楼前花坛里的牡丹开得正热热闹闹,姹紫嫣红。然而,风采俊逸的小青年牛宏,却正处于生命的低潮。也许是他一生中最晦暗的时期,因为他被撤职了!刚当了十九个月的基层饭店的经理,真可谓昙花一现!“昙花一现也能给人留下一点香气!”尽管他常常这样在心里自慰。尽管在中国撤职并不等于失业,其滋味却并不比失业好受,在精神上要承受无形的却又足以能把人压扁的负担。幸好人都有一种奇妙的本能:善于掩藏自己的灵魂,在特殊的时候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打扮自己的形象。智能商数越高的人,这种本领就越强大。牛宏的智能商数就不算低。

且看牛宏,从外表上谁能看出他现在成了一个倒霉蛋?他中等身材,年纪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眉眼清秀,头发不太长,发型清新、舒适,同他的长圆脸正好相配。晨风撩动着雪白短袖绸衫,银灰色派力司筒裤更衬出他身材的健美和青春的力量。在当代的青年中,像他这样神清目爽、文雅端庄的小伙子还真是不多见。他一路走来,眼睛盯着马路两旁的梧桐树,脑子又琢磨上了:这种树真好,容易栽活,长得又快,树干笔直,枝叶丰茂,东边的树枝搭在西边的树枝上,西边的树枝搭在东边的树枝上,两边一交叉,把马路都罩住了,既是吸尘器,又是空气调节机。可惜只有梧桐树,不见凤凰飞,哪怕有点鸽子、麻雀也好。春城里是新住宅区,大街两边光秃秃的什么树也没栽。别处管不了,应该在自己饭店的门前

栽上几排梧桐树,开出两个花坛。对,就是这个主意。以前只顾布置饭店里面,忽略了饭店的门脸儿。而且饭店里面的花也太淡雅了。你看这牡丹、芍药、月季、美人蕉,火爆爆地开得多热烈,种在饭店门前岂不象征着买卖兴旺,财源茂盛!

猛地,牛宏看见了花坛里面的大牌子——“饮食公司”,这四个红漆大字像鞭子一样抽疼了他的眼睛。他醒过来了,自己已经不是春城饭店的经理了,还替饭店考虑什么栽树种花,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只有在这种时候,他的脸上才会出现一种戏谑嘲弄的表情,与他那风流倜傥的外表极不相称。但牛宏有个毛病,从来不肯让自己的脑子有一分钟的清闲,当他还在烹饪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得了个十分贴切的绰号——“牛琢磨”。用他自己的话说:“人的脑子是生命物质三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晶,谁要不善于运用自己的脑子,太不合算了,无疑是浪费生命!”特别是现在,他为了不让自己老是“琢磨”被撤职这件事,必须不停顿地“琢磨”别的人和事。他把目光从花转到上班来的人流上,果然又有新发现——

你要说“十个厨师九个胖子”,谁也不会感到新鲜,就如同演员好像永远年轻有魅力一样,大家都司空见惯,其原因也心照不宣。令牛宏觉得奇怪的是,今天早晨走进饮食公司大楼的干部们,一个个也大都是圆头厚耳,熊腰象腿。公司的办公大楼并不挨着某一个自己所管辖的饭店,不要说沾不上油水,就连油烟也闻不到,怎么也会胖子多瘦子少?恐怕只剩下一个解释:社会的安定,牢靠的铁饭碗的无比优越性,工作上省力,生活上平稳康乐。不知聪明的政治工作者们注意到这个现象没有?倘是再有“形势报告”、“政治动员”之类的活动,组织十个大胖子上台去演说,其效果一定非常强烈,相得益彰。发胖——是“第一世界”里的经济发达病,谁敢说我们的经济落后呢?

可是,能按着某个单位的第一把手的胖瘦来断定他那个单位经营的好坏吗?

嘿!想谁谁到,饮食公司的经理游刚来了。注意看,他的上海牌轿车的托盘比别的轿车要矮一块,紧贴着地面,这是被他的“分量”压的。快看,他一下车托盘立刻升高了十公分。好家伙!谁还没有到大佛寺看过大肚子弥勒佛,只要看看游经理就足够了,这是活的大肚子弥勒佛。身高一米八九,体重对外界号称九十二公斤,其实际重量则是一百零二公斤。有人喜欢少报岁数,可以显得年轻,以假乱真也是一种安慰。体重为什么也要隐瞒呢?前些年世界上刮起一股减肥风,以瘦为美为福,视肥为灾难。游经理把自己的分量减掉十公斤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听说风又刮回来了,发达国家的人又以增肥为时髦了。游经理的体重是否还要改回来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他真正是头如面斗,只可惜双目不似流星,而且在两只眼睛下面堆出了两个肉坠儿,好像上眼皮移到了下面、眼泡倒长,反把真正的眼睛挤得还只剩下一韭菜叶宽。大脑袋一动,两个肉坠儿就跟着

发颤。人们看到像他这种体魄的人，很容易想到动不动就要叫喊“杀他个迷囊”的鲁智深，而游刚的面貌却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凶，感到恶。慈眉善目，六十多岁了下巴上不长一根胡须，男人女相，大福大贵。他喜欢开玩笑，喜欢算命，算卦的先生只要一看他那圆乎乎的女人脸，就断他福大命大。别人算卦要一元钱，非找他要两元钱，大命人要付大价钱。也正是这个福大命大的游经理撒掉了牛宏这个小经理的职务！

牛宏那个“生命物质三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晶”并没有走题儿，还在针对“胖子问题”进行深入地琢磨，他忽然独自笑了，左边嘴角出现了一条讥讽的纹路，活像个俏皮的感叹号：对呀！饮食公司是个旱涝保收的行业，人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不吃饭。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经济危机，经济困难，经济调整，经济改革，等等，反正嘴和肚子不会被扎起来，或者被改革掉。何况中国人口那么多，瘪肚子大汉需要把肚子撑起来，大肚子弥勒佛们需要更多的好东西塞满那个大肚子，在国家经济的大锅饭里饮食行业先吃头一勺，吃最肥的一勺。难怪从经理到科员就像从最重量级到次重量级的举重运动员一样，几乎可以按胖瘦判定其职务。自己在饮食行业干了快六年了，还没有发胖，可见被撤职是理所当然的了！

“小牛，你一个人偷偷地笑什么呢？”

牛宏一回头，禁不住更加笑出了声，又是一个胖子：“张科长，你来得够早啊！”

“小牛，我看你倒更美了，成天什么事也没有。”

“这就叫社会主义优越性，我以前干得多，每月比别的饭馆多交给国家两三万元，结果却给自己弄了一身病。现在成天什么事也不干，工资照拿，谁也不敢再说我有什么错了！”

“你呀你，和从前可真是大不一样了！从前光是闷头穷琢磨，一天到晚不吭声，现在可好，小嘴叭叭的，比谁都横。看看你，哪一点像个被撤职的样子？”

“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一不丢人，二不现眼，你叫我装成一副三孙子的样儿，我不干！这不叫横，这叫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春城饭店以前是啥样子，公司的人谁不清楚，我去了一年零七个月，别的不用说，光是利润上缴五十七万元，公司还欠着我们八万元。末了当头头的还想弄个大黑锅把我扣死。若轮上你，你干吗？这回不跟我说清楚甭想过去！反正谁也不敢说官大一级压死人也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平则鸣。牛宏在饮食公司的办公大楼前面好像对着上班来的人高声发表演说。这还了得，张科长害怕给自己惹麻烦，点点头赶紧拔腿钻进了楼道里。

牛宏——一个被撤职的很不起眼的小经理（按饮食公司的人们的习惯说

法,公司的经理称为大经理,下面各基层饭店的经理称为小经理),现在一下子成了全公司知名的人物了!人活一辈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由于一件什么事情而突然出名。谁能想到牛宏会因为被撤职而轰动全公司呢?公司的干部们,凡是碰上牛宏的人也许都会这样想。而饮食公司的人只要上班来就无法不碰到牛宏,你不找他,他找你。就连他被撤职这件事,也不是游经理最先在公司宣布的,而是牛宏自己先折腾开的。这件事本身就很奇巧,要说游经理对牛宏不满意也许是真的,但要叫他不和党委书记商量,私自到下边去三言两语就把牛宏的职给撤了,似乎也不近情理。游刚可不是莽撞的毛头小伙子,他当经理把头发都当白了,脱光了,不会干让人抓住把柄的事!很可能是他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被逼无奈,话赶话,原想吓唬牛宏,谁知这小子不吃吓唬,最后弄假成真了。如果这件事不声张,暗地里打打圆场,也许当作开玩笑就算过去了,游刚当他的经理,牛宏还当他的经理,大家都相安无事。偏偏又碰上牛宏不是个省油灯,被撤了职不是规规矩矩待在原单位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也不是老老实实等着领导找他谈话,下午被撤职,第二天一早就提着包主动到公司上班来了,先发制人,要求公司领导向他说明清楚。每天按上班的钟点来,按下班的时间走,但什么事情也不干。他的编制不在机关,谁也不敢分配他工作,领导没有跟他说清楚,有人分配他工作他也不干。他每天来了以后把书包、饭盒往游经理的办公室里一放,就在游刚的眼皮下喝茶、看报、读书,来了客人只要一问起他,他就把自己经营春城饭店的功劳以及被撤职的经过从头到尾,数说一遍,一点也不管坐在旁边的游经理脸色如何难看。当他累了,困了,腻烦了,就到各个办公室去串,去聊大天。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哪儿显眼在哪儿站。这一套,谁能做得出来?一个被撤了职的人,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名正言顺也好,名不正言不顺也好,终究是无风不起浪,脸上不大光彩,怕见熟人,羞于在大场合露面。不痴不呆的牛宏,这算演的哪一出呢?

你瞧他走进游经理办公室的那副神态,就像走进他自己的家一样。游刚也知道是他来了,故意不抬头。牛宏放下书包,从里面掏出饭盒,把盒盖错开一条缝,放到窗台上的阴凉通风处,为的不让盒里的饭菜变质。然后又为自己沏上一杯茶,拉把椅子坐在游刚对面,像播放录音一样开始重复每天早晨必须说的话(有时个别字句上会有些改动)。

“游刚同志,今天是我被撤职两个月零三天,您还没有工夫跟我谈话,对我进行批评,或者听取我对您的批评吗?”

游刚简直不能忍受,这个小子凭什么敢如此放肆,如此傲慢?他像条蛇一样缠在自己身上,甩不开,却又制不住,听他那副腔调,充满了自信和对对手的揶揄。但游刚毕竟是有身份的人,他吸收了以前的教训,不能和一个小青年一句对

一句地叮当,那样不仅会失去公司经理的身份,而且得不到便宜。他只有采取蔑视的不予理睬的态度,不哼不哈,不撩眼皮,根本就不承认眼前有牛宏这个人的存在!

“您不说话,我并不认为是看不起我。而是觉得您默认自己理亏,无言可答。这证明您的思想多么虚弱,既不能替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又没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牛宏得寸进尺,游经理被逼到了墙角上,他的忍耐力也达到了极限,双眼下的肉坠儿颤抖不已!可是,他的血压、心脏和智力,既不允许他继续这样忍耐下去,又不允许他和眼前这个无赖爆发一场冲突。他克制着自己,把文件和笔记本收进抽屉锁好,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堂堂的公司经理被挤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待不住了,而大大方方占据他办公室的正是他要处分的人,这到哪儿去说理呀!

气走了游刚,按理说牛宏应该得意,但他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浑身打战,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趴到桌子上。在游刚面前,在其他人的面前,他装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其实他的内心里十分紧张,他对自己几乎和对游刚一样厌恶。他想骂,又想哭,他想把这间屋子捣毁,也想把自己痛揍一顿。原来气别人也气自己,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他图的是什么呢?

当初他图的是——

要过一种有智慧的生活

牛宏的姐姐、一家之主牛华,送走了为她兄弟找对象的介绍人,脸色发白,嘴唇乌青,那神气就如同要起风暴的大海,而眼镜片后面的一双杏核眼则像海面上的一对航标灯,在波浪中闪着火花。她不愿意进屋去看瘫痪了十五年的老母亲流眼泪,或者是听着老人家自责自怨却又无可奈何地一声接一声叹息,就拉过一只凳子,在屋门口外面坐下来,点上了一支烟,轻轻地吸着。这个二十九岁的大姑娘,吸烟的姿势极其文雅高贵,用两只浑圆而细长的手指轻轻夹着香烟,手臂像舞蹈家一样自然而优美地弯曲着。任何一个反对女人吸烟的人,若是看见牛华在吸烟,是绝不会阻止的。对于她来说吸烟好像是一种美,是一种女人不可缺少的装饰和点缀。她只有在家里,在嫁娶的喜筵上,在联欢和庆祝之类的大场面上才吸烟,吸烟的数量要控制在不把手熏黄,不让嘴唇变青。有些凶狠的女人或是馋嘴浪声的大娘们儿,抽起烟来一口恨不得吞下半根。而牛华不论心里有多么犯愁、多么烦闷的事,绝不拿香烟解气。就如同不管肚里多饿,吃相不能粗俗一样。她举着烟,半天才吸一口,烟雾拧成了钩,挽成了套,在她眼前盘旋、

缠绕……

这已经是她为牛宏找的第三个对象了,又是女方不同意。他妈的(请原谅,我们这位雍容高雅的姑娘,一高兴或者一发怒,说话喜欢带出个把脏字)!什么家庭条件不好,床上有个瘫痪婆婆,进门就当奴隶……放屁!进门就当家,媳妇说了算,这样的主儿打着灯笼也难找。最叫牛华伤心的是女方提出的第二条理由:“他们家的大姑子太厉害,大权独揽,公公是个窝囊废,牛宏是个肉头蛋,谁嫁到他们家当媳妇谁倒霉!”好心不会有好报,谁能理解牛华的心?当她还差两个月小学毕业的时候,母亲突然瘫痪了,她凑凑合合地参加完毕业考试,就留在家里照料母亲,担起全部家务事。直到一九七一年,母亲的病情比较稳定了,当然想好是不可能的,可一时半会儿的人也坏不了,牛华再要上学年龄已过,就到汽车公司当了售票员。父亲在服装店当会计,是个一辈子做人没有傲骨的好好先生,家里大事小事全由牛华做主。她上伺候二老,下伺候二小(妹妹和弟弟),她心强好胜,泼辣干练,输理的事不做,绝不会惹得两位老人喘气不顺畅,妹妹和弟弟只要他们自己争气,就是上到大学她也供给。但是,她又常为自己抱屈,为了别人把自己的前途都搭上了,对家庭付出的牺牲太大,家里欠她的情太多。有时发起脾气来,对弟妹们敢打也敢骂,弟弟和妹妹还不许还手或者还嘴。这样也并不能慰藉她那颗年轻而好强的心。为了不让自己有闲工夫去想那些恼人的未来,她就拼命地看闲书。谁知小说里有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她被这个世界吸引了,越看越上瘾,十几年来,她没有选择地几乎读完了古今中外所有能搞到手的文艺作品。她要是钻一门有用的知识也许已经成才了,现在却仅仅是个“杂家”,关于政治,关于经济,关于社会,关于人,没有她不懂的,甚至还能说出一套自己的观点。她在汽车公司已经不当售票员了,做了调度室的统计员,同志们称她为“牛大学问”。但这一切对她的生活并没有丝毫的实际价值,顶多是增加一点谈资。在当今的世界上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工作就没有劲了,还会影响自己的情绪。牛华自从成了“牛大学问”,气质确实改变了不少,如果不是在家里,不是惹得她发脾气,谁也猜不出她仅仅是个小学毕业生。她妹妹去年大学毕业后和自己的爱人一块儿分配到东北去了,牛华也早就为自己找好了对象,男方还是市话剧团的演员。但是她必须也为牛宏物色一个靠得住的对象,并操办他们结了婚,把生病的老娘托付给兄弟媳妇,她才能离开这个家。可牛宏死眉耷拉眼,见了姑娘没有一点精神气儿,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讨好卖乖的事更不会办。陪着姑娘去看电影,买瓶汽水还得让人家姑娘花钱。他不是财迷,根本就看不出姑娘的心思,更不会抢着去付款。难道牛家的精气儿就全叫她一个人占了?牛宏越是找不上媳妇,她这个当大姐的就越是不能离开这个家,她若一走,把瘫老娘全扔给了弟弟,他再想找对象就更没有门儿了!

“大姐。”母亲在屋里说话了,自从牛华成了这个家庭里名副其实的户主以后,母亲就不再叫她小华,不管家里有没有外人,都是借着牛宏的名义尊称她为大姐,“你走吧,别等了,到年都二十九啦!全怪妈的病把你给拖累了……”

“妈,你别管,没你的事,都怪小宏自己没能耐!”牛华起身想回屋,一眼看见她那冤家兄弟回来了,她又好气又好笑,你看他那副鳊头耷拉脑的倒霉相。这三伏热天,他还穿着厚劳动布的工作裤,膝盖那儿冒出了白花花的汗碱儿,上身只穿了件发黄的老头衫,连衬衣也不穿。走路不抬头,不知脑子里又琢磨什么呢。不了解他脾气的人还以为这小子刚丢了钱包,或是刚从批判会上下来。老话说“扬头老婆低头汉”——最不好斗不好惹。她大概属于“扬头老婆”之类,连自己也觉得不大好惹。可她的属于“低头汉”的兄弟,既看不出有什么难斗难惹,更不是“鳊头上匪”,而是和父亲一样的老实窝囊。

牛华看看表,还不到十点钟,她迎住了牛宏:“你怎么半截儿回来了?”

“嗯……”这个死肉头,低着脑袋,不知是没听清姐姐的问话还是不想回答,嘴里哼哼唧唧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就进了屋子。

姐姐像旋风一样跟了进来:“小宏,你出了什么事?”

“没有。”

“怎不去上班?”

“……”

“哑巴,你倒是说话呀!”

“有事。”

“什么事值得上着班跑回来?”

“……”

又没有下文了。平常也是这样,别人问三句他顶多答一句,并且常常心不在焉,所答非所问。

牛宏把书包放在迎面桌上,转身钻进了里面的小屋。他们的住房原本是一间大屋,女儿们长大以后在屋子三分之二的地方隔开了,里边住两个女儿,外边是牛宏和父母。牛宏并不常到姐姐房里去,今天的举动更显得有点反常了,他甩掉了凉鞋,直挺挺地躺到了姐姐那张散发着幽香的绣床上,而且抻了一张报纸蒙住了自己的脸。牛华追进来,吓了一跳。

“你病了?”她赶紧撩开报纸用手去摸兄弟的脑门,并不感到发烫。她怀疑手摸不准,又俯下身子用自己的脑门去试兄弟的脑门,除去一股刺鼻的汗臭味,牛宏的脑门是凉浸浸的。她做这一切都是极其熟练和麻利,牛宏根本来不及拒绝。

“你到底哪儿不舒服?”

“没有。”

“你真的没有生病？”

牛宏连话也不说，只是摇了摇头。

“那你大白天挺的什么尸？你一定出了什么事！”

“……”牛宏不吭声，又拉过报纸盖上脸。

“哎呀，小祖宗，把汗衫和裤子脱下来我给你洗一洗。哟，该死的，瞧你这双臭脚丫子把我的凉席都弄脏了，给我滚起来……”

任大姐怎样叫，怎样骂，怎样打，牛宏是不声不响也不动。

牛华急了：“你个死肉蛋，告诉你，以后你出了什么事我也不管！刚才介绍人来了，人家李革也把你蹬了，就瞧你这个赖样儿，叫你打一辈子光棍！”

她一摔竹帘子出去了。

牛宏并没有睡觉，他那个“生命物质三十亿年发展进化的结晶”正高速运转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转得更快，旋得更激烈。今天早晨上班不多久，饮食公司党委书记钟警深找他谈话。并通知他公司党委准备派他到春城饭店去担任经理。这简直是对他整个的命运突然提出了新的挑战，他接受不接受这种挑战，将关系着他的前途，甚至会改变他全部的生活。在今天早晨之前，他做梦也想不到领导还会对他做出这样的安排，在他的一生中还会有这样的机遇。当时他对钟警深没有讲几句话，答应考虑一下，下午给党委书记一个答复。是啊，他必须认真琢磨一下，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正确的抉择。

“他们为什么看中了我呢？”牛宏必须先想透这个问题，然后才能决定干还是不干，怎样干……

钟警深在谈话时盯着牛宏的那双眼睛就像钩子一样，这对钩子能把对方的五脏六腑全钩出来，牛宏在这样一双眼光下觉得自己说出的任何一句话全是假的，而且还被书记看破了。这并不是说钟警深喜欢打官腔，或是过分严厉，不，恰恰相反。钟书记从来不打官腔，也很少发脾气，总是让人感到亲切和气，但绝不平易。他可以跟你开一个很得体的玩笑，你却不由自主地对他更加尊敬和钦佩，绝不能对他说走板儿话，更不能对他胡说八道。和游经理正相反，他是公司的一号大瘦子。游经理脾气好的时候比钟书记随和，下级干部可以毫无顾忌地同他谈笑打逗。游经理在发脾气的时候也比钟书记严厉，可是干部们心里并不怕他。对钟书记呢？说害怕太过分了，而且这说法对书记也不够敬重。但人们心里却真有一点憊他。牛宏真是猜不出来党委书记什么时候注意上他了呢？他从烹饪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饮食公司经营科，干了五年，和游经理还打过几次交道，和钟书记除去偶尔走个对面，不打招呼实在不行了，就点点头，或问一声“您吃饭了吗”，从没有一次说话超过了五句。领导上了解他什么呢？

“对，领导看中了我是个活机器人，脑瓜儿灵，能琢磨，具体工作能干好，从

来不误事。却又不惹是生非,不多说少道,老实听话,最好指挥。由我到下边去当小经理,就等于是公司大经理的小傀儡,上边拨一拨,我在下边转一转,领导放心,我从此就可以官运亨通,没有大的运动再不会把我扒拉下来了……”

牛宏吸了一口气:可是这样能把春城饭店搞好吗?“春城”是新开的饭店,底子薄,基础差,职工都是从各个基层店调来的“联合国军”,互不了解,一盘散沙。去年秋天刚开业的时候,公司武保科孙科长毛遂自荐要下去当春城饭店的经理,干了还不到一年就混不下去了,那么大的饭店月月赔钱,谁当经理脸上也得挂火!孙科长提出了辞呈,要求返回公司武保科,公司没答应。几个月前,游经理却声称把春城饭店当作自己的“点”,每周要下去蹲两天,抓了不到一个月,也不再下去蹲了,大概也怕把自己缠住。现在却选中了牛宏做“替死鬼”。牛宏只知道这些日子孙科长活动得很厉害,他一天也不想春城饭店待下去了,恨不得立刻回到公司还当他那个省心省力而又旱涝保收的武保科长。但牛宏怎么也想不通,钟书记和游经理怎敢拿一个偌大的春城饭店去叫他冒险呢?

“自己在公司经营科当个小干部,称职称心,对得起国家也对得起自己。要是戴上一顶小经理的帽子,毁了一个饭店,那就不光是当了别人的替罪羊,自己也犯了罪!不能去,这个任命不能接受!……”

要干干净净地拒绝党委的决定也没有那么容易,别的不用说,单是春城饭店经理这个职务,对他那颗年轻的心就有一种新奇的诱惑力。他一向觉得自己是没有任何野心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他不想往上爬,实实在在是不想当官。除去本职工作,其他任何事情他都不靠前,招风挨骂的事绝不干,每次科里选先进生产者他都让给别人,评奖也总是不声不响要最后一等。如果说这些都是小事,涨工资算是大事了吧?经营科三个条件一样的青年,调级的名额只有一个,牛宏真心实意地把自己那三分之一的机会让出来了。谁知那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激恼了群众,把那两个人都否决了,最后一致同意让牛宏涨了一级。这使牛宏很不好意思,好像是他耍了个手腕,又得名又得利。其实他的谦让是出自真心的,因此他在公司里几乎没有敌人。

但是,谁能把野心和雄心分得清呢?封建时代的老俗语是“胜者王侯败者贼”,那就是说“野心”用于失败者,“雄心”用于成功者。牛宏作为一个人,而且是个年轻人,怎能没有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理想?甚至还有他自己的梦想和幻想!当他知道自己没有被领导器重,根本就不可能被提升时,他不想当官是真的。当提升变为可能的了,当官已成为现实,他的心有所动,想法也随之有所改变。

不,我不应该失掉这次机会,要抓住自己命运的线索。有人一辈子都在寻找自己命运的线索,尚且不一定找得到,我为什么要放弃?人应该过一种有智慧的生活,有胆量把自己投进生活,在生活中动用全部智慧认识自己,发挥自己。我

既然不想往上爬,不怕官运不亨通,为什么不借着春城饭店这块宝地试一试?!

对,试一试!我在经营科干了五年,别的没有学会,对游刚那一套算是看透了,按他那一套无法搞好饮食行业。要想干出个样儿来,领导人必须要有新的面貌,新的风度,新的办法,新的魅力……

“噤啦”一声,头上的报纸被掀掉了。牛华把饭菜都做好了,喊他起来吃饭,只见他瞪着双眼,一点也没有刚睡过觉的样子,脸上反倒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坚定和昂扬的神采。牛华感到诧异:

“你没有睡觉哇?这是抽的什么风?八成中魔了吧!”

牛宏坐了起来:“大姐,公司叫我到春城饭店去当经理,你说干不干?”

“什么,叫你去当经理?”牛华好一会儿没有弄明白这句话的实际意义,她从兄弟的脸上看出来这不是开玩笑,就冲着外间屋高声说:“妈,咱们小宏要当经理啦!”

牛华把兄弟拉到外面:“来,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你的事业线到底怎么样。”

牛宏并不相信姐姐会看手相,他根本就不信这一套。牛华不过是看过一本《麻衣相书》和两本批判相面的小册子,她所以能把周围的青年人唬得一怔一怔的,一算一个准儿,更多的则是依靠自己的文学知识、知人的本领、对生活的经验和“实用心理学”,但牛宏不愿捅破这一点。而且今天他很愿意有人为他看看手相、算算命,不管人家对他说什么,他很可能都会相信的,就乖乖地把左手伸了出去。牛华拿起兄弟的左手端详了一会儿,又叫他伸出右手,看看他的先天条件作参考,然后高兴地说:

“傻兄弟,你的事业线清晰、明朗,而且比一般的人长,有这样一副手相的人就应该干一番事业。干,为什么不干呢?”

对儿女们的事情从来不过问,不插话的母亲,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出于对儿子的担心,轻轻地说:“他怎么能当得好经理哟!”

牛华像家庭里的权威一样摆摆手:“妈,你别管。”她说着手脚麻利地摆上饭菜,饭菜简单而清淡。两菜一汤:烧茄子、海米粉丝熬冬瓜、西红柿鸡蛋汤、粳米饭。为母亲蒸的鸡蛋羹。牛华先给兄弟盛了一碗,然后坐在床边给母亲喂饭。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还在谈论牛宏要当经理的事。当然,说话最多的还是牛华:“爹妈窝囊了一辈子,闺女儿子不应该再窝囊了,小妹是大学毕业生,过两年弄个工程师一当,是咱们家的第一股风水。小宏再当上经理,咱们家就改换门风,该翻身了,连妈妈的病也许都能好,过两年把闺女儿子聚在一块儿,扶你老到杭州玩一趟。”

母亲被她说笑了,牛宏只顾闷头吃饭。牛华唯恐这个老实木讷的兄弟再打

退堂鼓,就为他鼓气:“别怩阵,要打起精神来!”

“我决心试一试。大姐,吃过饭以后你给我理个发,然后陪我上街买身衣服,行吗?”

“好啦!”牛华响亮地答应一声,用惊喜的眼光打量着兄弟,不管将来他当经理当得如何,经理这个头衔给他身上带来的变化,使牛华高兴。她欢欢喜喜地说:“别管刷碗了,先把你这一身皮脱下来放在木盆里,等我给你推完头,到龙头那儿好好洗个澡,要打扮得干干净净,潇洒大方地去上任!”

说完她自己也笑了,从柜里拿出理发工具,牛宏已经坐在凳子上等她。前些年家庭经济困难,父亲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五口人,还要供给两个学生,从牛华一管家就不许父亲和弟弟上街理发,她花了两元八角钱买来一套理发工具,月月由她给理发。十几年下来,她不仅为家庭节省了一大笔钱,而且练就了一手熟练的理发技术。更重要的是她有文学修养,有高雅的审美观,再加上她的社会经验,她为父亲和兄弟理出的发型符合他们的脸型、身份和年龄,既时髦,又不怪里怪气,真可谓美观大方。今天她又特意为即将当经理的兄弟下了一番工夫,理完发牛宏立刻显得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她叫牛宏去洗澡,自己到里屋换衣服。

牛宏洗完澡,在门外又等了一会儿,姐姐才出来,上身穿一件使牛宏叫不出什么颜色,但极其考究和雅致的长袖夏衫,外面罩一件质地精良的湖绿色西式背心,连着下身的湖绿色西裙,脚蹬雪白的高跟皮凉鞋,身材苗条,婀娜多姿,飘飘然有一种超俗的美。头发不浓密,但柔滑乌亮,只用冷烫把发梢微微向里弯了半个圈儿,更显得优雅大方。她的脸型和牛宏极相似,只是眼睛处稍有一点瘪,她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给本来毫无毛病的眼睛配上了一副眼镜,银色细框,能变色的白镜片,这一下给她的美又加上了一种稳重和文雅。牛宏一向讨厌姐姐在穿衣打扮上过分讲究,但不敢吭声,父母都不管,他是个小兄弟,而且可以说是姐姐一手把他带大的,他怎敢对大姐说三道四,但是这一会儿,他在心里由衷地赞叹姐姐优美的风度,不禁脱口而出:

“大姐,你真漂亮!”

牛华很得意,扶着兄弟的胳膊走出了家门:“傻兄弟,你懂得什么叫漂亮,一个人的穿衣打扮标志着他的智力。男子汉关键要看他在事业上的进展,看他的身份、社会地位以及精神气质和自我感觉,平时穿着要大方随便。女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路过一个百货店,牛宏要进去,被姐姐拉住了:“这里面还能买着好衣服?跟我走。”

牛华领着弟弟来到了东方服装店,解放前这是英国人开办的,专卖西装,他

们的父亲就在这里学徒。现在这是一家专卖高档产品的大服装店,他们的父亲就在这里面当会计。但牛华并不找她的父亲,她差不多和这里的经理、店员全认识,到这儿来办事她比自己的父亲说话更管用。她领着牛宏,和店员们打着招呼,径直来到试衣间,叫牛宏先等一会儿,她去找来了服装店的几位“权威人士”,高兴地说:

“老几位,这是我兄弟牛宏,你们别看我们家的女孩长得都不怎么样,小子还算是一表人才吧?他要到春城饭店去当经理,我领他来是想给他买身官服,你们多受累给出个主意。”

“大姐,你说这个干什么!”牛宏脸红了,很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是党委任命的,又不是走后门捞的,大家早晚都会知道,再说,不讲明原因,人家怎么根据你的身份配衣服?”

为牛华这样漂亮的姑娘效劳本来就是一种乐事,何况她说话又是这样幽默、风趣和不容抗拒。店员们拿来了好几套不同样式、不同颜色的夏装让牛宏试穿。最后经牛华拍板,选中了一件米色的特立灵衬衣、一件蛋青色的凡尔丁西裤,装扮起来的牛宏如同换了一个人,精神十倍,青春焕发。牛华又领他到一家很讲究的皮鞋店配上了一双网眼牛皮凉鞋,她满意地说:“行啦,我的牛经理,这回像个样子了!”

“大姐,我到公司去答复党委书记,并把人事关系转出来。你去跟爸爸打一个招呼,今天晚上我必须把会计的基本知识弄懂,让他心里有数,拣重要的教给我,把几种主要的大账一样带一个样本回去。”

“干什么?”

“我去了应该先抓钱,要抓钱就必须堵死一切漏洞,最大的漏洞就容易出在账本上,要有靠得住的会计,有严密的财务制度。”

牛华会心地笑了:“服装店和饭店的情况可不一样。”

“隔行不隔理,天下的会计都是管钱管账的。”

牛华惊奇地扶扶自己的眼镜,一双生动妩媚的眼睛里满是赞赏和自豪的神色,她像一个工艺美术设计师端详自己满意的作品一样,反复打量着牛宏:“大姐以前没有把你看透,现在真得刮目相看!你的心已经上任了,已经在盘算上任后该怎么办了,你会干好的。过去那些浅薄的姑娘都嫌弃你,往后她们就会像苍蝇一样缠着你,大姐再也不为你的媳妇犯愁了,而且还要替我兄弟好好挑个出色的姑娘。哈哈……”

牛华竟禁不住在马路上笑出了声,牛宏碰碰她的胳膊:“大姐,你小点声不行嘛!”

“这有什么,你和小妹给咱牛家争气,大姐心里痛快!”话虽这样说,可牛华

的眼睛突然一阵发潮,大概她又想到了自己,她本来也可以很争气的。牛宏不由自主地攥紧了姐姐的胳膊,一直把她又送回东方服装店。

“我到里边去跟爸爸讲你的事,你赶紧到公司去吧。”

“我穿着这一身新衣服到公司去合适吗?”牛宏突然觉得身上有点不自在。

“合适!就要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往后你要学着改一改自己的脾性。”

“大姐,你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对吗?”

“不对,那是指懦夫而言。男子汉就是要战胜自己才能有作为。”

牛宏忽然真心佩服起姐姐来了:“我要有你的口才就好了!”

牛华用手指冲着兄弟点了一下:“什么叫口才?有思想才能有口才,想得透彻,才能说得透彻,心里明白才能表达得明白。没有头脑,说得再多也全是废话。说话不在多,要根据时间、场合、对象,掌握火候,有内容,说到点子上就起作用。当领导要有一副好口才,你会练出来的。”牛华是大姐,又像老师,鼓励的话中满含着深情和希望,她轻轻推了兄弟一下,“快去吧。”

她一直看着兄弟大步走远。

牛宏在心里也很看不起自己,上午他躺在姐姐的床上替自己拿主意,决定接受党委的任命,理发洗澡换衣服,从里到外全变,正是追求这种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为什么临阵又怯场了呢?自己的性格不适宜当领导,不能团结人,号召人,指挥人。姐姐说得对,要当好这个经理,从现在起就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先跟自己抗争,战胜了自己就是战胜了命运,战胜了生活。如果当不了自己意志的主人,就别去当经理,当个随波逐流的糊涂虫算了!牛宏抖擞精神,跨进了饮食公司的大楼。果然,整个公司都炸窝了!

本来,任命牛宏到春城饭店去当经理就是饮食公司的爆炸性新闻。谁知牛宏本人又给这一新闻加上了一层戏剧性色彩:一个邋邋遢遢的小“牛琢磨”,刚一当官就化妆打扮,改头换面,变成了一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干部们对他这一举动做出了两种解释:一、少年得志,得意忘形;二、现在的小青年除去歪瓜裂枣,就是烂酸梨,浅薄无知,不堪重用。公司上下沸沸扬扬,连精明的钟书记也被闹蒙了,难道把宝押在牛宏身上真是押错了?

这真是——

生活也把十字路口铺在了领导者脚下

麻秆打狼——两头害怕。

游刚被牛宏气得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生牛宏的气,更生自己的气,公司里堂堂正正的经理竟然惧怕一个小青年!他不愿意承认怕牛宏,甚至不愿向自

己承认这一点。但一碰上牛宏他心里确实发憊，在气势上压不住对方，嘴皮子上也占不了便宜，他的资历、地位、年龄，不仅不能帮助他得到优势，在牛宏面前这一切倒常常使他处于劣势。可见人心常常是怯懦的，黑暗和恐怖就藏在自己的灵魂里，不应该过多地埋怨外界。但是，游刚也意识到事情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已经忍无可忍，或是叫走投无路了，必须当机立断，用铁腕解决牛宏的问题。他推开了党委书记办公室的门。

钟警深面前摊着一份报社的校样，右手里的铅笔轻轻地敲着办公桌。他五十岁上下，瘦骨嶙峋，长着一双鹰眼，锐利无比。听见门响，知道进他的办公室不敲门不说话，径直推门而入的，必定是游刚。果然不错。可游刚并不看他，也不同他打招呼，一屁股坐到钟警深办公桌对面的沙发上，闷着头自己先点上一支烟。钟警深也不说话，但目光一直跟着他。他非要等对方自己开口不可，这是钟警深的老习惯。果然还是游刚耐不住了：

“老钟，我干不了啦！”

“唔。”

“老啦，该退休了！”

“唔。”

“唔”——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啊”？也不是“怎么啦？”一个字都不说，鼻子里就那么随随便便地哼了一声，难道连他也盼着我快退休？游刚抬起了头，眼睛下面的肉坠儿轻轻地跳动着，眼珠却撑开厚厚的眼皮一动不动地盯着钟警深。党委书记像往常一样、像接待其他人一样沉静地微笑着。他真会笑，这该死的笑！不虚不假，不亲不热，莫测高深，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你既不能跟他疏远，又不能向他靠近。

游刚的神色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没有逃过钟警深的眼睛，他的目光像鹰爪一样紧紧抓住了游刚，等待对方继续说下去。从游刚一进屋他就知道经理为什么而来，将要对他说些什么，对游刚刚才那一番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话，他只能回答一个不置可否的“唔”。他知道游刚喜欢听什么话，游刚希望党委书记对自己的话表示惊讶，挽留他不要退休，从此引出牛宏的问题，钟警深应该表示愤慨，并且严厉地制裁牛宏。钟警深目前还不能处理牛宏，更不能许诺不让游刚退休，虽然他无权决定这件事，可是他的意见却能起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正当盛年，又坐在党委书记的位子上，市委要给饮食公司配干部不能不听取他的意见。也正因为此使游刚的心里大不舒服。以前他是经理兼党委书记，前两年企业里搞党政分家，他成了经理兼党委副书记，从修配公司调来了钟警深担任专职党委书记。据说这位钟警深在来饮食公司之前不过是个组织科的小科长。新来乍到，情况不熟悉，饮食公司的核心人物还是游刚。谁知今年中央又下令搞机构改革，提

倡干部年轻化、专业化。起初游刚并未在意,以为这次也会和以前搞过多次的精兵简政一样,不过是喊几句口号,水过地皮干,饮食公司离开他游刚就会玩不转。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次势头不对,以年龄为限,一刀切!中青年真要忘恩负义,卸磨杀驴!他有点慌神儿,疗养院不去了,医院的高干病房不住了,身体突然变好了,过去那一大堆病也不治自愈。天天按时上班,而且经常往基层跑,不是蹲点就是调查。作风大变,精力过人,魄力非凡,公司的事情样样都管,一管到底、敢切敢断。但也常常表现得焦躁不安,高兴的时候,或理智清醒的时候,脾气非常随和,甚至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想讨好所有的人;有时别人一句话,或为一件小事,不知触动了他的哪一根神经,又暴躁异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了“牛宏事件”。他瞧不起钟警深,却又不敢过分得罪他。特别是在牛宏的问题上他不得不依赖钟警深……

两位领导人默默地用眼光进行的对峙,持续了不过几秒钟,就像两个人在闲谈过程中的停顿一样。可眼下在游刚和钟警深的心里都觉得时间很长、很难受。在这种相互进行的思想刺探中,感到不自在,首先表现出坚持不住的是游刚,他熬不过党委书记,只好说明自己的真意:

“老钟,不是我向你这个当书记的叫板,牛宏的问题再不解决我无法干啦!他占着我的办公室,软磨硬泡,胡搅蛮缠,我根本无法工作。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不是处理他,就是处理我,你干脆让我告老还家吧!”

“哪能这样说呢。”钟警深不笑了,说话还是一点不着急,心里却极不高兴:我让你告老还家,这算什么意思?你若真的退休走了难道还赖我逼的吗?其实你当真一走,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牛宏就扬言,你今天退休,他明天就回春城饭店上班。老的碍事,小的惹事,我在中间替你们挡事,还要挨你们的刺儿,我不会这样当党委书记的!

“老游,你是咱们公司的老经理,身体又没有什么大毛病,还是多干几年吧。不能和一个青年干部怄气,动不动就提告老还乡。我们每个人都会轮到那一歩的,但什么时候走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那是市委领导想的事情。我们还是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下,怎样解决牛宏的问题……”钟警深站起身,不慌不忙地为自己沏上一杯茶,举着茶叶罐问游刚,“我给你也泡一杯吗?庐山云雾茶,老朋友送的。”

游刚不愿回办公室去端自己的茶杯,免得再看见牛宏,也学着钟警深的语调很随便地说:“好吧,尝尝你的云雾茶。”

钟警深品了一口香茶:“对牛宏的问题我不是不想解决,而且希望解决得越快越好。”

“你党委书记有这种想法就好办了。”

钟警深又笑了,那笑容分明在说——没有头脑的人一切都感到简单。眼看

这位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有时办出的事、说出的话实在叫人哭笑不得,他的才能、经验和智慧都到哪儿去了?难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吗?倘若过去也是这副样子,又怎能被提上来呢?钟警深多年搞组织、管干部,但他领导的组织科只管审查提拔干部,不管使用干部,许多使用干部的部门却无权提拔干部。组织科审理提拔干部的依据是死板的材料,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有些该提升的提不上来,有些绝不该提拔的却爬上来了。他到饮食公司当了两年党委书记,却对以前自己十分得意的那一套管理干部的办法产生了怀疑。所以决心提拔牛宏。当时他对公司里所有能够到基层当经理的人选,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筛子,筛选的结果是零,他认为没有一个人能挽救春城饭店的局面。因为决定在非中层干部里寻找,最后选中了并无十分把握,也不很了解的牛宏,他对别人都看透了,对牛宏却没有看透,正因为看不透他,才觉得他有一股潜在的力量,不妨叫他试一试。钟警深在心里是把牛宏当作“秘密武器”打出去了,没想到这件“秘密武器”却打伤了自己的经理。现在他要在这两个人中间做出选择,连这位精明人也感到做难了:

“不好办,你又不是不知道,党委开过两次会,我也在下边反复征求过委员们的意见,分歧太大,统一不起来。”

“难道共产党对他就没有办法了?”游刚的火气又上来了,他怀疑钟警深暗中保牛宏。当初要提拔牛宏的时候,别人全不同意,只有他党委书记一个人坚持,死说活讲,最后还是在党委会上形成了统一的决议。现在要处理牛宏了,一拖两个多月,硬说意见不统一,这套官腔只能去骗小孩子!

“办法当然有,而且有上、中、下三套。”

“说说你的上策。”

“上策就是私下了结。你是大经理,姿态应该高,主动找牛宏谈话,或者叫赔礼道歉,承认在气头上突然宣布撤掉他的职务是不对的,先叫他回春城上班。”

“我向他赔礼道歉,谁给我这个老头子赔礼道歉?他有错误没有?”游刚眼睛下面的肉坠儿抖动得更厉害了,“牛宏事件”轰动了全公司,私下里怎么能了结!如果他向牛宏赔礼认错,那就把老脸栽了,把一辈子的名望全断送了。他必须咬定自己没有错,牛宏不配当经理,必须撤职!

“他有错。难办的是你老兄的做法也欠妥当,你私自撤掉他的职务毕竟不符合组织原则,没有跟党委打招呼。”

“紧急情况紧急处理,我是经理、党委副书记,连这点权力都没有?”

“哈哈……老游,别着急。权力当然有,可是现在仅仅靠权力并不能使青年人服气。我们总不能用强制手段压迫他们接受低水平的领导吧?像有些外国人喜欢用的军事管制的办法?我们脸上的皱纹太多了,特别是我,你脸胖还好一

点,可大脑里的皱褶是否也比他们更深一些呢?领导应该用比下级更高明更有智慧的办法使下级口服心服,如果没有这样的高水平,就得学习新东西,追上生活,掌握这一套。我们有权站在智慧一边,没权站在愚蠢和落后一边。”钟警深说话从来不带同样级别的领导人应有的那种腔调,老是带着幽默、讽刺、双关语和潜台词儿。

游刚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你不用兜圈子骂人了,我不承认,也不吃那一套。远的不说,就说这两个多月来,牛宏不干事,变相罢工,你说该怎么办?”

“不是他自己要罢工,而是你把人家罢的。”

“他不干活就该扣发他的工资!”

“可他天天上班呀!你撤掉了他的职务,又能叫他干什么呢?他不光不干活,还有一肚子道理,逢人便讲,遇到人就说,不依不饶。老游,牛宏不会留下空子让我们钻的。你什么都考虑了,就是没考虑到他的性格。这个‘牛琢磨’,果然名不虚传,要琢磨他很不容易,他要琢磨你却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如,你认为是他错了的地方,就不能公开追究,公开批评。把他的那套做法全部公之于众,就等于替他的成绩做广告,反而暴露我们自己的愚蠢,简直是自我嘲弄。他认为是你错了的地方,却咬住不放,闹得越热闹,他越不怕。经理同志,你不能光发脾气,发过脾气之后要冷静地想一想,为什么被撤职的牛宏在群众中不臭呢?光是一个牛宏好对付,要是背后有许多群众,并且代表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那就麻烦了!”钟警深始终不着急,脸上的神色既和气可亲,又莫测高深,说话不紧不慢,不软不硬,却常常让游刚感到他的话里软中有硬,弦外有音。他似乎是不偏不向,甚至还常常设身处地地替游刚考虑,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不过他善于把自己的意见藏在谈笑风生、诙谐有趣之中罢了。

游刚也听出来了,既然如此,他就豁出去了。以自己的资历,自己在饮食公司的影响,倚老卖老,钟警深又能把他怎么样?便用讥讽的口吻说:“你不是还有个中策吗?”

“如果你坚持不跟牛宏谈,只好我去谈,代表党委当众向他承认错误,宣布经理口头上撤他的职是不对的、无效的,请他回春城饭店继续担任经理。你觉得这样做怎么样?不如你自己去谈效果更好些。”

“你虽然是党委书记,要对牛宏做这样的谈话,也必须经过党委的讨论。”

“可以,如果你当经理的同意,还可以在全公司展开一场大讨论,叫大家都发表意见,牛宏的做法是错还是对。”钟警深虽然不动声色,可话里暗示着一种威胁,游刚怎能吃下这一套?这个刚爬上来的十八级的小干部,怎么这样自信?这样从容不迫?居然在他面前摆出了第一把手的架子,他的脚跟的饮食公司准站稳了吗?

游刚恼怒地又叮问了一句：“我还想听听你的下策。”

党委书记变得严肃了，瞳孔里似乎有烟雾在回旋翻滚，变幻莫测。他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再这样拖延下去不解决，事情就会闹大。”

“闹大还能大到哪里去？”游刚不信，以为钟警深在吓唬他。

“春城里街道党委、春城里居民代表，已经上书市委，也给报社写了信，告我们把一个上等的饭馆整垮了，把一个最好的经理撤职了，群众舆论很大……”

“我就不信，离开牛宏地球就不转了！”

“地球转不转咱先不用操心，反正牛宏一撤职春城饭店就玩不转了。别的不用说，单讲利润一项，牛宏在的时候，春城饭店上缴国家利润总是全公司第一，眼下连完成起码的利润指标都有困难。就这一条，我们怎么向市委、向群众做出解释？还有个情况，你不来我也正想去告诉你，桑原蓁写了一篇关于牛宏的报告文学……”钟警深把桌上的校样递给了游刚。

游刚见过世面，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心里不免一惊：牛宏果然捅到报社里去了？他表面上还是那么强硬，肚里却有点毛咕，展开了校样，小号的铅字排满了三张八开的大纸，他娘的，咋这么长，还想发社论？量他牛崽子也没有那么大的道行！人一上了年纪就不长好毛病，他一看东西眼睛里老是出水，想控制也控制不住，只好先用手背擦擦眼，才看清了标题：

对半开的人物(报告文学)

——春城饭店的经理牛宏为什么被撤职？

桑原蓁

“这个桑原蓁(他把‘蓁’念成了‘秦’)是谁？”

“你连桑原蓁都不知道？回家问问你的孩子吧，他们保准会知道桑原蓁的。这是位青年作家，小说写得相当厉害。”

“他怎么会知道春城饭店的事？还不是道听途说，胡编乱造！”

“唉，你什么也不知道，桑原蓁就住在春城里，常在春城饭店吃饭，他爱人就是我们春城饭店的服务员刘俊英，有内线，情况掌握得非常准确。老游，你惹得起牛宏，现在的这些作家可不好惹。你好好看看吧，这不是讽刺小品、群众来信，在报尾巴上占豆腐块大的一点地方，不起眼，这叫报告文学，登出来就是一大版，而且写得像小说一样，把你描绘得比你本人还更像你。这篇文章要是一发表，在群众中准会引起轰动，大人小孩到处拿你当故事讲……”

“你签字同意了？”游刚想表现得猪死架子不倒，但脸色已经不那么自然了。

“这叫报告文学，不用咱们签字也一样能发表，何况写的内容基本符合事

实。等到文章登出来,群众轰起来,市委出头干涉这件事,我们再解决就晚了,就被动了。”

游刚把校样狠命往桌上一摔:“叫他们海陆空、四面八方一块儿来吧,顶多老子不干了,还能把我怎么样?”他的牢骚话已经使党委书记厌烦了,他好像只会说一些没有味道的话,而且常常说不到点上。

“老兄,说赌气的话不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要争取主动。”钟警深的党委书记的风度这时候表现得最为出色了,不慌不乱,沉稳自信,不幸灾乐祸,也不说空洞的安慰话,既能用话压住游刚,又真心实意为他想办法。他又把校样塞到游刚手里,说,“你先把这篇文章看完,冷静地想一想,我上午找桑原蓁,劝说他把这篇文章从报社里撤回来。中午咱们碰一下头,下午找牛宏谈,怎么样?”

这才叫——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下午两点多钟,春城饭店送走了最后一批顾客,服务员们紧忙活着收拾杯盘碗筷、桌椅板凳。从现在起到五点钟开门卖晚饭,职工们有将近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以前在这个时间里多用来开会、学习、领导讲话、职工吵架,等等。自从春城饭店换了新经理牛宏,整整一个月了,职工们没有开过一次会,经理不讲话,也不向职工布置学习讨论的任务,大家都猜不透他是什么心思。他上任第三天,全饭店上上下下就都知道了他的外号叫“牛琢磨”。这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大小只要当上个头头,就连身上有几颗痞子、在家怕不怕老婆都甭想保住密。可“牛琢磨”心里到底是怎么琢磨的,谁也摸不准,上任就带来了铺盖卷儿,夜里住在饭店,晚上跟会计一块儿算账,账不弄清不放会计回家;白天跟职工一块儿上灶、一块儿去采买,跟服务员一块儿端盘子。眼睛好像只盯着业务,对钱、粮、账,死掐死抓。正因为他老也不亮相,大家摸不着他的底儿,反而不敢惹他,大家客客气气、平平安安地过了一个月。今天早晨他突然宣布:下午两点半钟饭店全体职工开会。往常一提开会大家就头疼,就骂街发牢骚,今天却盼着时针快一点指向两点半,瞧个新鲜,听听“琢磨”经理怎样训话。“琢磨经理”——这是牛宏在春城饭店获得的新雅号。根据他的年龄,大家可以叫他“牛琢磨”,但这似乎对经理不够尊重;喊他“牛经理”吧,又不甘心省掉“琢磨”这两个绝妙的中文字。于是,饭店的头号“傻小子”邱二宝首先把“琢磨”和“经理”连在了一块儿,“琢磨经理”自然而又合理地被群众接受了。

饭店里唯一的先进人物崔芬,腆着六个多月的大肚子,忙得脸上水泼汗洗。她除去走路和弯腰不大方便,两只手的动作却是十分利索和干净。她把一大摞

盘子送到厨房回来,看见地上有一只筷子,想把它捡起来,很吃力地弯了一下身子还没有够着,便直起腰,用脚尖一勾就把筷子挑起来了,一伸胳膊接在手里。背后立刻有人忿忿地哼了一声:“那是筷子,不是足球,顾客要往嘴里放的,能用脚踢吗?”

崔芬不用回头就知道说话的是孙连香,这个女人脸长得像一只大鞋底子,线条全是横的,一天到晚脸上老是假阴天,看不见笑模样。因此,她获得了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绰号——“阶级斗争脸儿”。从前崔芬和她都是渤海餐厅的服务员,那阵崔芬还没有结婚,早来晚走,争强好胜,人又老实,被评上了市级劳模。一当上劳模可就坏事了,后边老有几十双眼睛盯着她,孙连香就是盯她盯得最紧的一个,崔芬论打又打不过人家,论骂也骂不过人家,现在又怀了孕,身子不作脸,她心里对孙连香真有点愠,不知道怎样还嘴。正巧邱二宝来解了围,他蹬着一辆三轮车,停在饭店大厅的门口,得意洋洋地喊叫着:

“‘阶级斗争大姐’,你又发动阶级斗争了?赶紧熄灭吧,快来,有好事,搬大西瓜!”

春城饭店的女人们,不论姑娘还是媳妇,对邱傻子都毫无办法,他装傻卖愣,说话没轻没重,而且不分场合,你要惹了他,不知什么时候他会甩出一句叫你十分难堪的话,女人们只好迁就他,或者趁他高兴的时候骂他几句,捞点便宜解解气。孙连香来到门口,看见三轮车上果然放着七个大西瓜,有虎皮,有黑皮,还有熟得发黄的大三白,她十分惊奇:“哟,傻子,打哪儿弄来这么多大西瓜?”

二宝故作神秘:“打哪儿弄的?你有本事弄一个来叫我瞧瞧。这是买的!”

“买的?哪儿来的钱?这得好几块!”

“好几块?你坷巴坷巴吧!”二宝又臭美地招呼其他的服务员,“小石、小刘,你们不来搬西瓜,等会儿可别吃!”

又有几个姑娘叽叽嘎嘎地跑过来:“真棒!赶紧用冰镇上。”

“这都是我挑的,保证个个是沙瓤。”

“今几个是什么日子,谁肯出这么多血?”

二宝是狗肚子里盛不住二两荤油,一脸自我炫耀的神气,好像这西瓜是他出钱买的:“‘琢磨经理’请客,刚才他拿出二十块钱,叫我去买几个西瓜。头头请客,咱还能客气!我也对得起他,花了他十九块二,还给他剩回八毛。哈哈……”

“花这么多!邱傻子,你花别人的钱可真狠哪!”饭店里最丑的姑娘石心菊和最俊的姑娘刘俊英同时都吐了吐舌头。

“嘿,我邱傻子心眼傻,叫花就花,叫吃就吃。”

“牛经理今儿怎么想起请客来了?”“阶级斗争脸儿”的头脑到底是比别人复

杂,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可惜邱傻子和其他服务员对这个问题都不感兴趣,每次抱着一个大西瓜,嘻嘻哈哈来到内厅,把西瓜放到冰池里。

牛宏和“政治哑巴”正在试验新买来的洗衣机。所谓“哑巴”也不真哑,还是复员军人哩,上过越南战场。但他平时不爱说话,只爱苦笑,因而被人称做“哑巴”。他本人不但不否认,还在哑巴前面加了两个字:“政治”,遂成“政治哑巴”。试验的结果,牛宏很满意,“海花”牌洗衣机果然名不虚传,搅起的水花像海浪一样汹涌有力,滚滚翻腾。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这才发现全店的职工已经到齐了,都大眼瞪小眼地望着他,分明是在等着他讲话,他心里有点紧张。这毕竟是他第一次主持全体职工会议。他心里有许多事情要跟大伙商量,要往下布置,但对自己的口才和组织开会的能力缺乏信心,今天要是把这个会开砸锅,往后就更不好办了……

“琢磨……啊,经理,你买个洗衣机来干什么?我看你今天有点反常。”邱傻子的话引得一些人笑了,气氛轻松一点了。

“不是我反常,是你少见多怪。从今天起立一条规矩:每个人下班以后必须把自己的工作服、工作帽扔到洗衣机里,洗干净晾好以后再回家,这一条能做到吧?”牛宏有意拿出一副胆大气冲的派头。

大家立刻议论起来,有的走过去看洗衣机,没摸过这玩意儿的打听怎样使用。

邱二宝没大没小,没上没下,傻乎乎地又开腔了:“‘琢磨经理’,人家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你是上任不点火,先来个水漫金山——弄来个洗衣机,每天让大家洗工作服,可真是别开生面啊!”

多亏这个傻小子,把大厅里的气氛给搅活了,但也装疯卖傻地把牛宏的外号给公开了。经理的前面加上了“琢磨”两个字,就把经理的庄重、威严给泄了劲啦!倒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幽默和善意的嘲弄。牛宏没有恼怒,也不感到紧张了,他想起了姐姐的话,当个领导要有一副好口才,善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大姐真是了个了不起的谋士!他丝毫用不着紧张,现在他心里完全有底了,对未来信心十足。这一个月他只是摸底,用老办法,守老摊,只是堵漏,管理严格了,稍微加强了一下经营。他那些雄心大志,那些改革经营的措施,那些有着极大诱惑力的新设想,一样还没施展哪,就稳做到了不亏损,而且盈利八千一百元,往后他还怕什么!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往后他可以稳扎稳打,按自己的想法经营春城饭店。牛宏轻轻地笑了,一个月来,他是第一次舒心地发笑。想起刚上任的那一天,老孙不忍心让一个小毛孩子当他的替死鬼,主动要求留下一段时间,帮助牛宏熟悉工作。牛宏完全不领情,叫老孙上午交代工作,下午走人,而且连个欢送会也不开,搞得老孙灰溜溜的很不高兴。第二天,游刚不放心,也跑到春城饭店来蹲点,牛宏很不客气地顶住了他:“我刚一到您就来蹲点,什么意思?”

您要信不过我就叫我回去,找别人来干,叫我干,我这时候还不需要拐棍、保姆、后台、靠山等等玩意儿,您请回。如果想来蹲点,请过几个月,等我干出个样子来,或者干不出样子来,把饭店搞糟了,您再来。”游刚被堵得上不来气,只好转一圈又回去了。假使一个人坚定不移地按着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思想行事,连魔鬼也会转过来迁就他!

“牛经理,该开会了。”“阶级斗争脸儿”老想管个人,老想往前站。看样子她很想替牛宏张罗着主持会议,让牛宏不失身份地光管做报告。据说前一任的孙经理就很欣赏她,如果老孙不调走,很可能要选她顶替崔芬当劳模,或者弄个工会积极分子之类的荣誉。这也是她老和崔芬过不去的一个原因。

牛宏清清嗓子:“好吧,咱们开会。今天是立秋,按咱们民族的老传统,立秋这一天应该吃瓜,这叫咬秋。咬秋就象征着咬住一个丰收的秋天,事业兴旺,硕果累累。咱们也图个吉利,为了把饭店办好,大家集体咬秋。邱二宝、赵永利(即‘政治哑巴’),把西瓜打开,大家边吃边谈。”

原来就是开这样的会呀!大家高兴了,有切瓜的,有吃瓜的,十分热闹:

“快来,太好了,红籽沙瓤!”

“嚙,一咬一口蜜,真甜。”

“咱们咬着了这么好的瓜,预示着春城饭店一定会兴旺发财!”

“对!哈哈哈……”

牛宏摆摆手,想叫大家都静下来,听他说话。吃得正兴高采烈的人们,没有注意他的手势,邱傻子站起来喊了一声:“别说了,西瓜还堵不住你们嘴!光吃别说,听咱‘琢磨经理’训话。”

牛宏笑了,不计较邱二宝耍贫嘴,也不更正他话里的错误,显得年纪不大,肚量不小。他在人前端端正正地坐着,神色开朗,眉目清秀,厨师和服务员们第一次注意到他们的“小经理”是这样年轻漂亮,又会办事,又可爱,也许因为他会办事,才显得更可爱。同他第一天上任给大家的印象并不一样,那天他打扮得干净潇洒,风流倜傥,但没有说话,神色不够自如,大家只觉得他沉稳,并没有感觉出他英俊。一个月下来,他的的确确显得漂亮了。

“不能光我们自己在饭店里咬秋,考虑到大家下班后在路上都要给家里买瓜,所以今天发奖金。头等十八块,二等十五块,我计划下个月把奖金提高到二十块,而且希望没有二等,大家都是一等……”

发奖金,而且发这么多,大家一下子愣住了,从前在其他单位的时候,每人都领到过奖金,自从调到春城饭店,就不知奖金是什么模样儿的了,偶尔给个三块五块的,还不够塞牙缝,只会招大家的骂。牛宏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了惊讶和怀疑,不得不多说几句了:

“大家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不相信?以为我在吹牛?那好,咱们算算细账。我刚来到咱们饭店第一个印象是店好地方好,可惜没有办好,完全能够办成一、二流的饭店,却办成了五流的大锅熬菜的食堂,是郊区和县城饭馆的水平,破破烂烂,脏里脏气,满地是烟屁股、黏痰,小孩子可以跑到饭店里来打架和扔石子。我这样说可不是挖苦你们,你们不生气、不多心吧?”

一个低头吃瓜的老厨师,放下啃了一半的西瓜,挑起一双灰色的长寿眉,发亮的老眼看着牛宏,表情异常严肃:“这是实情,你讲点真话,讲点心里话让我们听听。”

“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像以前那个样子,顾客既瞧不起春城饭店,也瞧不起我们这些在春城饭店工作的人。天津饭店、北京饭店、友谊宾馆……同样也是吃饭的地方,谁能瞧不起?不要说是自己的同胞,就是外国人进去也得规规矩矩,甚至笑脸讨好服务员。如果服务员再温文尔雅,举止大方,不卑不亢,任何人都得高看一眼,恭恭敬敬。没有人敢随地吐痰或乱丢烟头。当然,他们的饭桌上都有烟灰缸,我们为什么不能一个桌摆上一个烟灰缸?几角钱一个,那能花多少钱?关键是创名牌儿,要给饭店打出一个好名声、好牌子,用饭菜的质量、服务质量、上等的卫生条件提高饭店的规格。我们这些人都和饭店绑在一起了,店荣则荣,店昌则昌,店败则败。诸位,谁还有别的前途?比如:考大学、搞科研一鸣惊人?如果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我坚决支持,给时间,给便利条件。但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得在饭店干下去了,地位、身份、荣誉,甚至人格,都可以找饭店要,而且一定能够得到……”

只关心下月奖金的数目,对大道理毫无兴趣的邱二宝打断了牛宏的话:“牛头儿,我拦你一句,人家都说你心里有事爱琢磨不爱说,没想到真要叫你讲起来,还是景德镇的瓷器——一套一套的。大道理留着以后再讲,你不是说下个月要把奖金涨到二十块吗?你心里有根吗?”

牛宏很不好意思,双颊微微有些发红。是呀,本应该谈奖金的事,一下子扯到哪儿去了呢?这些话应该装在经理心里,付诸实现,而不应当讲出来。人的口才真是奇怪,以前想多说话,可肚子没有词儿,现在想控制却控制不住,心里装着许多事情,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计划,还有对自己的信赖和对今后充满了信心,因此,好像有一肚子话想倒出来。

“傻子,你就是钱串子脑袋,光认钱!”孙连香老是不甘寂寞。

“‘斗争脸儿’,你不认钱,等会儿你那份奖金给我。”邱傻子脸皮厚,横吃竖打,全不在乎。

“对不起,刚才走题儿了。”牛宏赶紧把话接过来,“这个月奖金的数目不是随便定的,是根据饭店本月的盈利情况,并且考虑了饭店今后的发展,定的最低

基准线。也就是说,今后在饭店经营上不出现极其特殊的情况,奖金的数目不能低于这个月的标准。我是主张奖金逐步提高,逐月有所增加的……”

职工们心里噓了一口气,相互看看,经理竟敢当人对众地许这种愿,打这样的保票,真是稀罕!大家的怀疑程度也更大了。

“上个星期五,我去公司开会,顺便向公司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春城饭店所以这么破烂、不正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建没搞好,留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我请求公司拨款,由我们自己进行收尾。公司没有钱,基建科去年给春城饭店基建收尾拨出了四万元,结果是钱花光了,尾并没有收住。因此不相信我们在抓饭店经营管理的同时,还有能力抓基建收尾工程,甚至怀疑我借机向公司敲竹杠多要钱。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三个月由我们自己赔赚包干,赚了钱公司不要,用来搞基建收尾,赔了公司也不给。这个月我们净赚八千多元,下个月可达一万二千元,第三个月应该达到一万五千元。三个月内完成基建收尾,如果我想的几种措施都能上去,第四个月纯利润可以达到两万至两万五千元是不成问题的。那时,除去按计划上缴公司的以外,超额的部分提成百分之二十发奖金,我大略算了一下,每人可得二十五到三十元。”

有一多半人停止了吃西瓜,议论着经理提出的计划和数字。这些数字太有诱惑力了,如果每月能拿三十元的奖金,加上基本工资,少的可拿七八十元,多的能拿上百来元。什么地位呀,身份呀,离开了经济基础全是扯淡。口袋里有钱,自我感觉就不一样。

“经理,你可不能吹气冒泡净赚我们老百姓!”

“邱二宝,这话可说得有点没志气。我刚才说的那是保守的计划,根据有两条。第一,我们占天时。国家提倡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展自由市场、自由竞争,有风的使风,有雨的使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就看谁能为国家多赚钱。领导讲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是什么人?是有本事的人。我们要当有本事的人,研究天时,掌握社会心理学,要为广大服务。可现在的大众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众,也不是‘文革’时的大众,大家腰包里都有钱,而且现在的人们想得开了,有钱敢花,喜欢高档产品、高档食品,追求新鲜,追求刺激。过去我在公司经营科,没事干的时候喜欢了解劝业场一带的行情,高级家具抢不上,高级服装、新鲜样式的服装抢不上,劝业场的酱牛肉、烧鸡每斤比别处贵两角钱,还是抢不到。马路上卖大碗茶的人比买茶的人还多,卖一碗只赚几厘钱,可是‘康乐冷饮店’的鸳鸯冰激凌一个卖六角钱,至少可赚两角,还人山人海抢不上。我们的米饭炒土豆卖不出去,就不能想点别的办法?……”

大家“扑哧”一声全笑了。

“我并不是说光卖高档食品,不搞大路货。要研究什么是畅销的大路货。比

如：夏天气温高，许多家庭不愿意生火，想买点现成的，我们就可以大量蒸馒头卖。但不能像粮店的馒头那样，不是发黄就是发酸，连狗都不吃。我们要用鲜酵母发面，蒸出的馒头带甜头，保险会受到群众的欢迎。中秋节快到了，很多人家要下一次馆子，我们应该设立一种‘合家包桌’，要搞得新鲜有味，价钱订得不要把他们吓住，我们又有利可图。总之，赚钱的办法很多，就看我们做死买卖，还是做活买卖。第二，我们占地利。春城里是新建成的现代化居民区，有千多户，两万多人口，而饭馆就我们一家，别无分号，真是大有发展。一方面，普通的居民很多，街心有一个农副产品自由市场，靠近郊区，进城做买卖的农民比较多，这些农民的口袋里都有大把的钞票，上包子开洋荤更敢花钱。另一方面这儿有十几栋‘高知楼’，住着教授、科研人员、工程师、作家、演员等等，他们不愁没钱，只愁买不到好东西。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他们口袋里的钱给掏出来，当然不能像扒手那样去偷去抢，要把他们伺候得舒舒服服，让他们花了钱还心满意足。所以，我打算在这三个月里，把二楼和三楼收拾好，扩大营业。三楼是雅座；二楼冬天是热饮、夏天是冷饮、外带西餐；一楼是主餐厅。用一到两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春城饭店办成全市一级饭店，让结婚的、请客的、团聚的都到我们这儿来包桌，让大家以能在春城饭店吃顿饭为荣……”

邱二宝把一大块西瓜捧给牛宏：“经理，你讲了这半天啦，没有水，吃块西瓜润润嗓子。行，你真能琢磨，好家伙啦！”

“那就请会计石心菊把奖金发给大伙。”牛宏开始慢慢咬自己的西瓜。

“先发一等奖吧。头一个——崔芬。”

崔芬脸一红，站起来刚要去拿钱，孙连香叫了一声：“等等，这奖是谁评的？我怎么不知道？”

石心菊怔住了，她无法回答，这奖金不是群众评的，也不是她盘算出来的，完全是牛宏一个人定的。但她不愿意把这件事全推到牛宏的身上，造成孙连香和牛宏的当面对阵，在这种时候，这样的场合会使经理感到难堪，甚至下不来台。石心菊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保护牛宏，自从牛宏来了以后，她的工作量增加三倍，旧账重新整顿，又立了好几项新的台账。而牛宏完全拿自己当个机器人一样使唤，从不认真地看她一眼，跟她说话也是一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腔调。她不指望他会喜欢自己，但她害怕他讨厌自己。他跟刘俊英说话时腔调就不一样……尽管如此，姑娘在心里仍然向着牛宏，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能够替他打掩护，何况‘阶级斗争脸儿’也不是好对付的。只好吞吞吐吐地反问：“孙师傅，您有什么意见呢？”

“这奖评得不合理！”孙连香一见石心菊这副心虚胆怯的样子，以为是她偏向崔芬，胆更壮，火气更大了。

牛宏只好把刚咬了两口的西瓜放下,现在他不慊头对大家讲话了,但是慊头跟老娘们儿吵架,鼓了鼓气,硬着头皮说:“这奖不是大伙评的,我想以后也不用评。大家面对面坐在一起,谦让不好,起不到奖励的作用,争也不好,为了几块钱争得面红耳赤,大家都不愉快。所以每个月的奖金由我定,当然我要参考顾客的意见和每个人的出勤情况,大家要骂就骂我一个人,有事往我身上推,总比搞得大家不团结好。”

“我不赞成这个办法,这不成一个人说了算吗?”孙连香嘴上还硬,心里已经有点怯,她也不愿意和新来的领导闹翻。

“对呀,当然是我说了算。因为我是经理。我要深入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我总比你们知道的情况要全面一些。”谁也没有料到牛宏会讲得如此坦白,既不盛气凌人,也不向人低头,更不虚情假意地装出一副谦虚相,“阶级斗争脸儿”反而噎住了。

年纪最大的厨师,耸动着长寿眉表示赞成:“我看这个办法好!”

孙连香也不是好惹的,不然就不称其为“阶级斗争脸儿”了!她原本就不想跟牛宏过不去,现在调转头朝真正的敌手开火了:“反正我不同意崔芬得一等奖,上个星期上早班,她迟到了两次,工作时间戴着金戒指,刺鼻子刺眼,顾客看不惯,损害整个饭店的名声;今天看到地上有筷子,不用手捡,倒用脚去钩。她哪一点像个劳模样儿?……”

“也真是,太过分了!”

“劳模儿难道是那么容易当的?!”

居然有人响应孙连香,使局面更复杂了。这些人不一定对孙连香好,也不一定对崔芬坏,就因为崔芬是劳模儿,一提劳模儿大家就反感,有人挑头敢骂,不论骂的错与对,也一定会有人响应。崔芬可受不了啦,她还在中间站着哪,岂不等于挨批判?既然不能走过去领钱,就掉转头冲到了孙连香的眼前,急鼻快脸地也喊起来了:“就你好,奖金都叫你一个人得!你没迟到过?上个月的不说,大前天你就来晚了。一天到晚,你不是跟这个打就跟那个打!”

孙连香当然也不示弱,“呼”的一下也站起来:“你说,我跟谁打了?”

“你逮住谁就跟谁打,全叫你打遍了!”

“你非给我指出人来不可,要不跟你没完!”

“你也给我指出来,我戴戒指碍你嘛事啦?你没有就眼馋,就生气?气死你,偏戴,偏戴!”

“呸!我是不戴,要戴有的是。谁稀罕那种破玩意儿?也就是你,妖里妖气,不嫌难看,不嫌臭美!”

“你才妖里妖气,你才臭美哪!瞧你那一脸横肉!”

.....

坏了,这下可热闹啦,把挺好的一个会给搅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劝架,有人在旁边看着她们取乐儿,有人连看也不看,听也不听。“政治哑巴”赵永利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只管闷头吃自己的西瓜,眼前这一切:开会、讲话、发奖、吵架,似乎都和他无关。“长寿眉”摇头叹息,刘俊英、石心菊忧心忡忡地用眼睛瞟着牛宏,她们替新经理难受,不知他怎样收拾这个局面,有没有办法对付这两个难缠的女人。

只有邱傻子,看见老娘们儿打架就像看一场电影那样过瘾,而且在旁边加油叫号,唯恐她们光动嘴不动手。

崔芬忍不住了,一头趴到桌上哭起来了。

孙连香占了上风,仍然不依不饶:“你号什么?你号就说明你没理!”

“你有理,你没羞没臊!”

“你才没羞没臊哪!……”

牛宏躲不过去了,再不吭声也不行了,他的春城饭店占天时、占地利,就是不占人和。这个“阶级斗争脸儿”果然是个祸头,前任经理老孙正是重用了这号人,才把饭店搞得四分五裂,人心大散。牛宏站起来,声调不高,显然是强压住内心的激动:“你们二位可以告一段落了吧,这是开会时间,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哪。我决定:把崔芬和孙连香的奖金都从一等降为二等。”

不仅两个女人一怔,不再哭也不再吵了,大家也都抬起了眼睛,望着脸色通红的新经理。

“为什么?”孙连香嘟囔了一句,劲头已经不大了。

牛宏不看她,也不理她,按着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所以把她们两个人的奖金降级,不是因为她们都有迟到,按规定每月迟到不超过三次就有权获奖。也不是因为崔芬用脚钩筷子,关于这件事我真想多说几句,她身子笨重,动作不便,看到地上有一根筷子,如果装做看不见,从旁边走过去,谁也不会责怪她。她看见了,用手拾有困难,就用脚钩了一下。虽然这个动作不够文明,但证明崔芬是个老实人,有责任心。作为经理,我应该感谢她对饭店的这种责任心。那为什么还要降下她的奖金的级别?因为她们争吵,为了几块钱竟出口伤人,语言粗俗低级,不仅丢她们自己的身份,也丢我们大伙的身份,影响团结,破坏店风,理应把奖金全部扣除,念其初犯,只降一级。”

丢了人又丢了钱,孙连香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她顾不得多考虑和领导搞坏关系的后果了,张口顶了牛宏一句:“我一分钱也不要,你都扣光吧。”

“好,这不叫扣,这叫你拒领。如果有人拒绝领奖,当然就作罢,发奖者不能勉强对方。”

“我看你把这笔钱怎么处理？”

“当然是分给大伙，加到其他获奖者的身上，而且马上就加。会计你算一下。”

这一大口窝囊气，险些没把孙连香噎死，她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亏。姓牛的，咱们走着瞧！

牛宏毕竟还年轻，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上任一个月先惹翻了“阶级斗争脸儿”，往后的日子还能安生吗？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得鼓着气再打下去：“会计，你记下来，往后发奖再加一条，相互攀咬又毫无道理者，撤掉双方奖金。无端攀咬别人的，扣掉攀咬者的奖金。揭发得正确，扣掉被揭发者的奖金。大家同意吗？”

“同意！”没想到大家响应得十分干脆。

“那就发奖。”

“政治哑巴”、“长寿眉”、刘俊英……几十个一等奖很快就发完了，没有邱二宝。傻小子有点心慌，还安慰自己：沉住气，咱身上有短儿，给个二等奖就不错了。

一等奖里也没有牛宏，有人替经理抱屈。连孙连香都有点泄气，她已经想好了词儿，只要牛宏站起来接钱，她就发难：“你当领导的为什么要给自己评个一等奖？”没想到这小子倒长了后眼！

会计开始发二等奖，电话铃响，是找牛宏的，叫他明天到公司去开会。牛宏从邱二宝手里接过电话，火气十足：“张科长，你们就高抬贵手吧，一个星期要开三天会，你还叫我们干事吗？什么？我还经常逃会？就是经常逃一个月还开了八次哪！……好吧，反正我们派个人去。”

“最后一名是经理。”石心菊把二等奖的钱递给牛宏。

二等奖里也没有邱二宝，他跳了起来：“小石，你怎么把我丢了？”

“没有把你丢了，根本就没有你的奖。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由商业学校科班出来的小会计看了一眼账本，沉稳地说，“十二号早晨，你从灶上拿了四两油条送给外人，当时就提醒你，如果不交钱要按五倍罚款，扣除当月奖金。你不听劝告，并说奖金还不知有影儿没影儿呢，想那么远干什么。十七号，粮店的小胡又通过你的手拿走三两油条，没有付钱。加起来共是七两。罚你三斤半粮票，从工资里扣除二元八角钱，不发奖金。”

“这……我太倒霉了，七两油条拐走了我二十来块！我现在补交那七两粮票和五毛六分钱不行吗？”

“不行，已经晚了，钱都发下去了！”

邱傻子这回真傻眼了，别看他平常胡打胡闹有本事，要动真格的了，就显得

心眼不够用。眨动着缺神少采的大眼睛,直愣神儿,心里又悔又恨,这个当上得太大了。叫自己那几个小哥们儿给坑苦了。没办法,只好跟经理叫苦:“牛头,你手也太狠了,这不是琢磨人嘛!”

“不错,我既然外号叫‘牛琢磨’,就不光琢磨工作,还琢磨人。谁要跟我过不去,我一定要报复,一定要给他小鞋穿!我看有些人就是吃横不吃软。实情相告,我并不拿这个经理的职务当一回事,并不想以此往上爬。这就是说我不在乎,没什么可怕的!做人总该有心吧?今天我花了十几块钱请大家吃西瓜,‘咬秋’,发奖,等会儿还要量尺寸做新工作服,图什么?还不是要让大家高兴,使我们这个团体充满友爱和快乐。结果呢?却搞得大家很不愉快。这岂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牛宏似乎什么也不顾了,他对自己的职工的失望,不,是对“人”的失望,使他动摇了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因此暴躁异常。愚昧会使人糊涂,嫉妒会使友情变成仇恨,甚至使仇恨长出牙齿,和这样一些浅薄、无知、俗不可耐的人搭班子,怎能按自己的理想搞好春城饭店呢?这又使他怒不可遏,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眼前的场合,尖酸刻薄、苦辣咸甜一块儿都端出来了。但也有“借酒撒疯”的成分,借着数落邱二宝,其实是说给更多的人听。

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各人都从他的话里咂出了一点特别的意味。有些人真被他镇住了,觉得这个“牛琢磨”的确不好惹。有的人在心里积怨更深了。更多的人却是埋怨那些惹事的人不懂好歹,心里赞成牛宏。这个从来和人 not 结怨,处事没有敌人的小“牛琢磨”,当经理一个月,就有了战友、朋友和敌人。

牛宏见气氛太紧张了,大家都低着脑袋,不吃瓜,也不说话。还有人气鼓鼓的脸色很难看。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想缓和一下局面,还得拿邱傻子开嘴:“邱二宝,你是男子汉,要不当初别做,既做了现在就敢当,宁丢钱,不能丢人!”

“我认倒霉,我认倒霉!”邱傻子说完狠命地咬了一大口西瓜,好像丢了奖金要拿西瓜解气。吃完一块还觉得不够本,一看冰池子里还有两个整瓜没有动,心想:不能给“牛琢磨”留下,吃不了也全给他切开,让它烂了、臭了!他从冰池子里又抱出一个,切成二十四块,嘴里还嚷着,“快吃,快吃,大伙别客气!”

说完又去搬另一个,被长寿眉厨师拦住了:“行了,傻子,你不见大伙都吃不动了?桌上还有这么多没吃哪,都切开不就糟蹋了嘛!你呀你,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邱傻子的小心眼被捅破了,他泄气地把西瓜刀扔到桌子上。有人笑了,空气又有点活跃,多亏了有个邱傻子。其实哪个单位都有邱傻子这样的人,要想唱好一台戏,生旦净末丑一个不能缺。

“牛宏,牛宏!”随着一声清脆的呼唤,牛华陪着一个漂亮姑娘走进了春城饭店,身后还跟着一位东方服装店的服装设计师。

牛宏赶忙迎上去,牛华为他们做介绍:“这是满凤,这位是范师傅。他就是我兄弟牛宏。”

牛宏请客人坐下吃西瓜。饭店的青年人都认识牛华,也亲热地称她为大姐。牛华对饭店的姑娘们又亲热又随便,但是对身边的满凤姑娘照料得更精心更周到,大家的目光也都在满凤身上转。谁心里都明白,这就是牛宏的姐姐在一个月里为他介绍的第三个对象。牛宏不知是当了经理端架子,还是为了报复那些眼皮浅的姑娘,推说工作忙,只能在春城饭店里利用工作的间歇时间和姑娘见第一面。姑娘们还真都迁就了他,每次都是牛华带着姑娘找到他的门上来。前两个姑娘人样子长得都很好,牛华先相中的人还能错得了吗!见面后对牛宏也满意,可牛宏不满意人家。可气的是他说不出不满意的理由。就是一口咬定不同意。这第三个长得就更俏了,而且文雅庄重,饭店的姑娘们叫她一比个个都显得不大自然,手脚没处放,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牛宏对大伙说:“从十月份我们要更换店服,质量是雪白的纯毛华达呢,样式由范师傅参照北京饭店店服的样子加以改进,因为北京饭店主要招待外国人,我们主要招待中国人,既要符合现代的美,又要保持民族的风格。明年夏天再换成杭罗的。现在就请范师傅一个一个地给我们量尺寸,量完尺寸的同志,上早班的就可以走了,上中班的开始准备晚饭。”

牛宏布置完工作,领着姐姐和满凤来到自己的办公室,显然是去进行相亲的第一轮会谈。但是,还没用半个小时,牛宏又把姐姐和满凤送走了。相亲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牛宏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淡漠,大家都很纳闷,今天又赶上牛宏花钱找病,心里很不痛快,年轻人们就更关心他相亲的结果了。这不但是出于好奇,还由于他们都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这件事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引起了不同的特殊反应。小伙子们对牛宏羡慕得不得了,他们要想找个对象可难啦,不要说好姑娘,就是中等姑娘有几个能看上饮食行业?炒菜、端盘子伺候人!可牛宏居然能挑了又挑,选了又选,别说是满凤,就是前两个他看不中的姑娘,要是给别人,也还求之不得,全家都得烧高香呢。就连“政治哑巴”赵永利,见了满凤姑娘,眼睛不也突然亮了一下吗?姑娘们就不是这样了,嘴上都说满凤好,女人的优点全叫她一个人占了,从身材到脸蛋儿,真是长绝了。可心里人人对她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本能的反感,并不希望她和牛宏能谈成。只有“长寿眉”、崔芬这些人才真心希望牛宏别再挑挑拣拣的了,快点跟满凤结婚吧。而“阶级斗争脸儿”孙连香却通过这件事得到了意外的启示:“在饭店吵架你就扣人家奖金,你自己在饭店谈情说爱搞对象应该怎么办?你在饭店一个人说了算,我就不信上边没有管你的地方!”

只有傻子邱二宝与众不同,平常碰上这种事,他最爱在旁边起哄,数他闹得

最欢,今天却像霜打的茄子,一副无精打采、漠不关心的样子。他是上早班,第一个量完尺寸,把已经看不见白色布纹,变得黑不溜秋、油渍麻花的工作服脱下来,顺手往墙角一丢,推起自行车就要回家。牛宏迎面走过来抓住了他的车把,脸上挂笑,口气又认真又亲昵:“我就知道你会有一手,刚说完就忘,把工作服捡起来,放在洗衣机里洗干净,晾到绳上再走。”

邱二宝瞪瞪眼珠子,却没有说出话来。有什么办法,人家是经理,是神不是神,坐在这个位子上就灵。他只好捡起工作服来到洗衣机跟前,有两个上早班的姑娘也正在洗工作服,他把自己的工作服往里面一丢,扭头就走。嘴里嘟囔了两句:“多受累,多受累!”

“该死的,臭傻子,把我们的衣服都弄脏了!”

邱傻子连头也不回,他有经验,让女人们多骂几句,她们嘴上得了便宜就会帮你干好多事。他走回自行车旁,见牛宏正把剩下的那个大西瓜往他的后车架上架上绑,急问:“牛头儿,你干吗?”

“带回去,叫你爸爸妈妈咬个秋,他们会很高兴,说不定还要夸你两句:‘瞧,我们傻儿子多孝顺,多懂事!’”

邱二宝傻呵呵笑了,脸红了,他很少有不好意思的时候,这工夫却是真感到不好意思了:“经理,这是你的瓜……”

“行了,别你的我的分得那么清了。这个瓜是你省下来的,你刚才要把它切了,不也就扔在这儿了。你刀下留情,理应归你带回去。”

周围的人都笑了,邱二宝也笑了,他的情绪也立刻缓上来了,本来想说几句够意思的话,比如:“牛头儿,你真够哥们儿!”可那显着太没水平了,于是改口说:“经理,今儿个大姐给你领来的这个对象可真够意思,盖啦,这回你满意了吧?”

牛宏摇摇头:“不行啊,咱配不上。”

“她瞧不上你?”

“不是。”

“你瞧不上她?”全店的姑娘、小伙子的耳朵全支棱起来了。

“也不能说是瞧不上人家,总觉得不对劲儿。”

“不对劲儿? 什么劲儿,牛头儿,你是挑花眼了! 这样的对象都不要,天下没有对你劲儿的姑娘了。”

“也许我命中注定,只能找一个咱们同行业的人。”

“那就在咱们店里找一个呗。”

“邱二宝,你别戗火,这也说不定。”

“你别拿咱穷哥们儿开心了。谁不知道干饮食行业的找不上对象,把你挑剩

下不要的,照顾照顾咱们店里这些老中青光棍。”邱二宝真话当假话说,立刻得到了小伙子们的响应:

“对,经理你先给二宝介绍一个吧,他想媳妇都想傻了!”

牛宏从后面推着邱二宝的自行车:“快走吧,越说越走板儿。小心别把西瓜摔了!”

邱二宝无意间把牛宏藏得很深的心事挑明了。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刘俊英,第二天就可以说已经爱上她了,在服务员中她是那样的突出,气质温柔佳丽,谈吐不俗,神情老是那么平静清雅,秀长的披发,朦胧的甜蜜的眼神,真是美得不可思议。这是一场古典式的一见钟情的恋爱。但牛宏是个清醒的现代人,他考虑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自己所处的地位,给自己规定两三个月之内不能进行这场恋爱,不能泄露自己的感情。否则,必然会引起许多闲话,谣言纷纭,会影响和破坏自己的事业。他越是想压住这种感情,谁知对刘俊英的爱恋就变得越深、越热烈。工作时间他几乎不敢望一眼刘俊英,望一眼便会走神儿,神魂不定,每天除去拼命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完全陷入一片遐想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近在身旁又远在天边的刘俊英。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感情会是真的。他们向无接触,互不了解,至今刘俊英对他也没有丝毫特殊的暗示,他怎么会突然喜欢她呢?不管牛宏怎样想方设法地想否认自己喜欢刘俊英,却恰恰是这个刘俊英占据了他心房中某一块位置,才使他姐姐领来的那些姑娘无法打进来。今天,他把好事没有办好,心里无比懊丧,想找一个人谈一谈,放放胸中的闷气,他没加任何考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也只能是刘俊英。

招待完了范师傅,牛宏又帮助石心菊结算好了当天的账目,晚间第一批客人走了,餐厅很快就收拾利落了,上中班的职工陆陆续续都走了,只有刘俊英还没走,似乎专门为了等他。他走到女服务员的小更衣室门前,上任一个月来他还没有进过这间屋子,心里一阵紧张,真是莫名其妙,上任的头一天也没有这般心跳过!他敲了敲门:

“谁呀?”正是刘俊英的声音。

“我,牛宏。”

“请进来。”刘俊英开了门,她已经洗完了澡,换上了一件豆绿色的连衫裙,手里拿着一本书,更像一株仪态万方的玉兰树,透出一种清新的美,眉宇间却微微露出一丝惊奇。

牛宏心跳加剧,不敢看她,只好打量着这间小屋。屋子收拾得极其干净幽美,空气中飘散着花露水的清香,窗台上放着几个花盆,可惜里面种的都是仙人掌、仙人球、左旋右旋之类的植物。他不无遗憾地说:

“太可惜了,这么漂亮的房子,应该养点水仙、吊兰、茉莉之类的好花,为什

么养了一堆带刺儿的丑类？这是谁养的？”

“小石。”

牛宏心里一动，替石心菊难受，这个瘪脸、塌鼻子、长得实在不能说好看的姑娘，不敢养漂亮的花，害怕和自己形成鲜明的对照。只能养这些球球蛋蛋。

聪明的刘俊英猜出了小经理的心思，含笑反问：“你认为这些球球蛋蛋是花中的丑类吗？”

“反正不能说它们漂亮。”

“不，你错了。你要看见它们开花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在这种时候牛宏可不愿意和自己喜欢的姑娘辩论，他把话题岔开：“别人都走了，你为什么还不走？”

俊英脸色微微一红：“我想看会儿书。”

“看什么？”牛宏接过来一看，《桑原蓁短篇小说集》，“不错，这个作家有才气，思想敏锐，我最喜欢他那篇《红叶》。”

俊英聪明地反问他：“你找我好像有什么事吗？”

“哦……是有件事求你帮忙，公司又通知我明天去开会，上边的会太多，我要光出去开会，什么事也办不成，你能不能代替我到公司去开会？”

“什么？叫我去冒充经理，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吗？再说公司里也不会答应。”

“这不叫冒充经理，叫春城饭店的‘会议代表’。公司也许对这种做法不高兴，但没有办法，我们店只有两个党员，没成立党支部，还要到别的饭馆去过组织生活。上级没有派支部书记来，也没有配副经理，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摆在我面前有两条道：一、公司里随叫随到，顾上头，当个叫公司里喜欢的好干部；二、顾下头，当个好经理。你说我该走哪条道？”

“这……群众当然欢迎你走第二条道。”

“我今天讲了对饭店今后的打算，你觉得行吗？”

“行，大家都认为挺好，我们全力支持你。”

“能不能变成行动呢？也为饭店两肋插一下刀，或者就叫做帮我牛宏一下忙。”一谈起工作，牛宏变得神情自然，说话也流畅了。

刘俊英却被噎住，沉了一会儿才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党员去？”

“赵永利是党员，性情古怪，打死他，他也不去，我也还没有摸透他。崔芬是党员，那个样子能行吗？”

“有个人一定愿意当这种‘会议代表’……”

牛宏立刻把话接过来：“你想说孙连香，对吧？此人靠不住。我看你去最合适，你高中毕业，能说能写，碰到什么问题也好随机应变。你把我那个小收录机带上，会开得没有味道，你听烦了，就插上耳机，听音乐、听广播、学外语……随

你的便。”

“你这叫什么经理呀？真是‘牛琢磨’！”刘俊英开心地笑了，牛宏的信任很使她高兴，“告诉你，我就明天去一次，下次你另换别人。”

姑娘态度的改变和随随便便的一句玩笑话，使牛宏心里荡起一种无比的快乐和幸福，他掏出一个纸条递给刘俊英：“明天你受累多绕个弯儿，把这封信交给我姐姐可以吗？”

“她今天不是刚来过吗？”

“就为了今天这事。”牛宏脸红了，“明天她等着听我的意见。”

“这是成人之美的好事，我理应效劳。”刘俊英笑了，接过纸条，“这么说你是同意的了？”

“不，正相反。”

“嗨！你的眼可真高呀！满凤那样的都看不上，你想要什么样的？这样的信我不给你带，我不信你连回家的空儿也没有。”

“我跟大姐商量好了，人不回去就是不同意，人要回去就表示同意。”

“那何必再叫我去送信？”

“……”牛宏语塞，满脸涨红。他当然有自己的盘算，让刘俊英送信，大姐不仅知道了牛宏不满意满凤，而且还会猜出牛宏不满意的原因。然后认真端详刘俊英，凭大姐的口才和精明，不用半个小时就会对刘俊英的情况了解个八九不离十。下次姐弟见面，牛宏就要听取姐姐对刘俊英的看法。可这些话又怎能对刘俊英讲呢？

刘俊英见牛宏这副狼狈相，开心地笑了：“好吧，我去给你送信！”

她忽然看看表，着急起来：“哎呀，十点钟啦，我得赶快走了。”

“我送你去汽车站。”

刘俊英一怔：“不，不用。”

牛宏实心实意：“我反正没有事。天太晚了，还是防备着点好。”

刘俊英不好再拒绝，只有随着牛宏走出了饭店大门，门旁边的暗影里走出一个人，用略带四川腔的普通话说：“俊英，你怎么才出来？”

“我有点事耽搁了。”刘俊英脸上挂羞，稍有一点发窘，“老桑，这就是新来的牛经理。”

牛宏一惊，打量着这个“老桑”：敦敦实实的身材，微胖的圆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年纪有三十多岁。牛宏一时还没弄明白这个“老桑”和刘俊英是什么关系。

“老桑”却十分豪爽，上前一步握住了牛宏的手：“经理同志，你好！我是桑原蓁。”

“哦，您就是有名的作家桑原蓁？”牛宏更加惊异。

桑原蓁十分健谈：“你的部下背地里说了你不少好话，看来你出任这个饭店的经理，对我们春城里的居民来说是个福音。”

“您也住在春城里？”

“就在饭店的左边，你看，那十栋楼就是所谓的‘高知楼’。”桑原蓁把自己的住处指给牛宏看，“七栋二十五号，有空到我家去坐坐。”

“哎——”牛宏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栋高知楼的中间都是黑的，而一楼和五、六楼的窗户里却亮着灯光，就好像过节日用彩色灯泡标出大楼的天地轮廓一样。他问：“这是怎么回事？”

桑原蓁摇摇脑袋：“这名为高知楼，国家是想解决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可是知识分子都分配在一、五、六楼，全是‘五一六分子’。而二、三、四楼都叫行政人员、后勤人员和干部住了。到了晚上，二、三、四楼的人们早早就睡了，要不就坐到楼下乘凉聊闲天，所以房间里一片漆黑。而‘五一六分子’们，都是夜猫子，虽然肚里有牢骚，在工作上还想搞出点成果，不得不开夜车苦战。所以就出现了你看到的这种今占奇观！”

刘俊英被逗笑了，她的笑声以及她看着桑原蓁时的那种神色迷离的眼神都刺激了牛宏，他知道自己想护送刘俊英完全是多余的了。眼下他还清理不出自己心理是一番什么滋味，只觉得好恨哪！店里就这么一个出色的姑娘，还被别人抢走了。他恨刘俊英势利眼，为什么要找一个作家？可他突然又觉得这件事有助于提高同伴们的志气，连大名鼎鼎的作家，不是也找我们服务员做妻子吗？

“牛宏同志，你应该可怜可怜我们这些‘五一六分子’，饭店增卖夜宵，数量不一定多，质量要好。你不知道，我们干到半夜肚子饿了真难受。”

牛宏脑子一亮：“好主意，我们正要把二、三楼办成雅座。每晚有三五个人值班就够了……”

刘俊英拉拉桑原蓁的衣袖，她知道，再不提醒他，这位先生可以站着和牛宏聊上两个小时。她说：“再不走就赶不上公共汽车了。”

“好好，走吧。经理同志，再见！”作家大大方方地挽着刘俊英苗条的腰身走了。

“再见！”牛宏忽然又追上他，“刘俊英同志，你把信给我吧，我明天回家亲自跟姐姐讲。”

“哦，好！”刘俊英把纸条还给了牛宏，“恭喜你，等着听你的好消息。”

“恭喜，恭喜！”牛宏重复着这两个字，转身关上了店门。

“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是生活中常有的事。而且往往会因此改变“程咬金”和“被杀者”生活的进程。

下一章请看——

为别人挖陷阱,掉下去的常常是他自己

不要以为游刚才华已逝,现在变成一个大笨蛋了;不要以为只有党委书记钟警深才有“秘密武器”,他游经理就没有;要想在社会上站脚谋生、出头露脸儿,谁还不准备一两件“秘密武器”?!

游刚从钟警深的办公室出来,把那份该死的校样折成一个疙瘩,塞进裤口袋。然后走上三楼,来到“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他游经理的“秘密武器”就藏在这间屋子里,现在能不能救自己脱离窘境、致牛宏于死地,全靠这件武器了。在游刚看来,牛宏不可能没有尾巴,不然这个人就不可理解了。他那么胡来蛮干,撤了职也满不在乎,不怕得罪领导,不惜在政治上断送自己的前途,那么他到底图什么呢?在政治上无所求,必然在其他方面有所求。他胆大包天,鬼花活那么多,在经济上就不会做手脚吗?年纪轻轻,财权物权自己独揽,手脚就能那么干净?只要在经济上能抓住他一点尾巴,一切问题就都好办了。可是,查了两个多月,饮食公司所属的有经济犯罪问题的基层店查出了一批,有不同程度贪污受贿问题的经理也弄出了几个,为什么就揪不着牛宏的尾巴呢?现在看,有一条是他游刚当初失算了。当时钟警深看中了牛宏,大道理冠冕堂皇:春城饭店的烂摊子没人收拾,提拔新干部是时代潮流,等等。这一切他游刚都拦不住。但是他拦住了不给牛宏派副经理,没有在春城饭店发展新党员。老党员太少,成立不了党支部,因此也就不能往那儿派支部书记。这叫什么策略呢?这叫养膘儿,养够了刀再宰!你钟警深不是信任牛宏吗?你牛宏不是能干吗?就叫你一个人唱独角戏,任你跳腾,等到娄子捅大了,到了火候,再一下子把你拿掉。现在,游刚认为火候到了,牛宏的膘儿也养肥了,足可以开刀了。谁知他一刀砍下去,没有立刻把牛宏砍死,反倒被他将刀弹了起来,碰卷了自己的刀刃。这缘由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春城饭店头头只有牛宏一个,上无书记下无副手,好了没有帮忙的,坏了也没有拆台的。有头头就有派别,如果春城饭店有一个牛宏的对立面,平时也会抓住牛宏许多把柄,碰上眼下这样的机会,就会跟游经理里应外合,上下夹攻,给牛宏后院放火,釜底抽薪,他还敢牛气?撤掉了他,让他的对立面顶上去。现在可好,撤掉了牛宏,饭店无人领导,工作无人干,群众舆论才掀起这样的轩然大波。唉,悔之莫及!本来牛宏和他游经理并无半点私仇,可现在牛宏的问题却直接关系到他的毁誉荣辱,甚至是留任还是退休,这就不能不多动动心眼儿,莫怪他手下无情了!

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主任由武保科科长老孙兼任,他见游经理脸色阴沉,赶忙迎上来。

“怎么样？又有什么新情况？”

“火神庙风味小吃店的经理也有贪污问题。”

“李长田？”

“对，至少也得有千元以上。”

“查清楚，该撤的撤，该抓的抓！”

“谁说不是，可现在内查外调太困难了。李长田几乎是明吃明拿，而且在店里还培养了一帮打手，真正是搞顺者昌逆者亡。他带头大偷，别人小拿，小吃店赔本的时候多，赚钱的时候少。上个月还不错，只赚了一块钱。他儿子结婚的时候，明目张胆地从店里拿走鸡、鱼、酒、糖、火腿、酱肉等等。当班的厨师陆军奇实在看不下去说了几句话，李长田叫人把他暴打一顿。这件事全店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可我们去调查的时候，除去陆军奇别人都推说没看见。叫谁写材料谁也不写，签字摁手印儿更没门儿！你说怎么办？人心都变了，只顾自己，什么集体呀、国家呀、法律呀……与自己无关的一概不管。”老孙感慨激愤，这位搞了半辈子运动的人，现在深深感到运动难搞了。上级下文件也好，做报告也好，再也不能把人们轰起来了，人心推不动了！好事没人管，坏事也没人说。老孙真想一气之下离开武保科，到工会去当主任，组织一场足球赛，组织看一场电影，倒有很多人捧场。这个一向最严肃、最忠心耿耿的好干部，也积存了一肚子牢骚。而且发牢骚不看时候，眼下他的上级哪有心思听他讲别人的事情。

“还有什么情况？”

“东楼食堂的会计也有点问题。”

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他就是不提牛宏有什么问题！

游刚只好单刀直入了：“春城饭店里查出问题没有？”

“没有。不光没有，春城饭店的账目最清楚，最完整。不比不知道，通过这次查账，全公司数春城饭店的财会制度最严密、最认真。财务科的杨总会计师非常欣赏石心菊，要提升她为会计师。”

“会计好不等于经理好。”

“搞了这几个月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工作，我摸出一条规律，经济犯罪比较严重的单位，一般说经营管理都不好，漏洞很多，犯罪分子才有机可乘。经营管理好的单位，犯罪活动也比较少。春城在同等规模的饭店中上缴利润最多，比最差的单位高出两三倍，这些现象都说明牛宏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何况还有一个细致严格的会计管着。”

“这都是假象！你呀你……”游刚非常失望，老孙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也算是饮食公司的老人。游刚所以在饮食公司有势力，就因为下面有一批像老孙这样的“嫡系部队”。眼下自己处于困难时期，连“嫡系部队”也不帮忙、不使劲，怎

不叫游刚恼火！

其实，老孙说出上面那一番话心里也并不轻松，他在春城饭店的时候没有搞好，他一走，人家牛宏就把饭店搞上去了，他也是人，心里难道好受？他对牛宏实在是没有好印象。他整了多半辈子人，难道还怕再多整一个牛宏？他整起人来决不留情，但有个特点：得真正抓住了人家的东西。他是属于公安保卫系统的行家，伸手一摸，就知道这个坑里有没有鱼，有多大的鱼，能估摸个八九不离十。他这一套还不同于政治上耍权术和凭空陷害。他一发现有问题的，脑子里就立刻会出现许多杠杠：什么性质？有多严重？够逮捕？够拘留？够停职审查？不能乱来，这不是动乱期间了。出了娄子自己吃不了兜着走！老经理的意图他明白，老经理的难处他也知道，可到目前为止，所谓牛宏的那些问题，全是鸡毛蒜皮，哪一条也够不上。他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再说老经理现在已不是公司的一把手，上边还有党委书记。他还能干多久，谁也说不准。惹出祸来他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老资历、老干部，工资百分之百地拿着，谁还能把他怎么样？！那可就把他老孙扔在旱岸上了，领导之间的，问题越复杂，他越要多留个心眼儿。

所以，老孙反而在游刚面前说牛宏的好话，目的是想给自己减少麻烦，避免搅和到领导之间的矛盾中去。

人一没有势力，也就没有铁心的部下了。游刚压住火气，又问：“你没有找孙连香谈一谈？”

“昨天通知她了，一会儿就来。”

旁边一个干部插嘴：“她已经来了，在旁边的屋里等着哪。”

游刚已经不太沉着了：“快把她叫进来！”

孙连香进来了，恭恭敬敬地向领导打招呼：“游经理，孙科长。”

“小孙，快坐，快坐下！”游经理满脸堆笑，亲切而又随便，“你胖了，开始发福喽！今年三十几啦？”

“快四十啦。”

“好快呀，我记得你刚到咱们公司来的时候还扎着两条小短辫子哩，一晃就是二十年！”

“您的记性真好。”虽然孙连香在到饮食公司报到的前一天就把小辫子绞了，而且她参加工作两年之后才有幸在会场上见了经理一面。

“几个小孩儿了？”

“两个。”

“一儿一女？”

她点点头，看上去是在笑，脸上的横肉却不动，因为她心里很紧张。她知道

领导把她叫到公司来,一定有不寻常的事情跟她谈,她来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把各种问题都想到了。

“好命的,一男一女一枝花!”游刚嘿嘿笑了两声,没有多少热情,但声音很响亮。笑声停止以后,他把话题一转,“小孙,你们饭店的情况怎么样?”

“这……怎么说呢?”孙连香心里打个怔儿,要谈正事啦,她不能不考虑一下。春城饭店的成绩都摆在那儿,她不能红口白牙说瞎话。现在别的饭店都实行奖金“封顶”,每个职工每月的奖金不得超过八块钱,是牛宏在那儿顶着,他在的最后一个月每人拿到了三十八块。人心都是肉长的,她孙连香也有良心。可老经理把她找来是为了听她给牛宏摆功吗?再说以前她在老经理跟前没少说牛宏的坏话,现在怎么能改口?一改口岂不要得罪老经理和孙科长?那就两头全不讨好,更要倒霉。每月多拿几十块钱算什么?心里不痛快。牛宏就是宠那些个小丫头片子,他看孙连香不顺眼,孙连香看他也不顺眼。牛宏一天不走,她孙连香就甭想入党当劳模,她倒不是非要争那个玩意儿,崔芬哪一点比她强?心里出不来这口窝囊气!再说孙连香想到自己的丈夫是个一辈子受大累的脑袋,三杠子打不出一个响屁来,这辈子甭想入党提干了。将来两个孩子的前途全得靠她。如果她是党员、劳动模范,对孩子将来升学、找工作都有好处。对,这才是大事,不能叫牛宏的几十块钱堵住嘴!想在现在的社会上站住脚,上边没有人不行!应该趁这个机会标上老经理和孙科长。别听他们嘴上说得有多好听,上下一个理儿,有“派”就有“性”,派性是一辈子消除不了的!表面上消除了,记到心里,带到棺材里去。亲的向亲,厚的向厚,当个老百姓反正得靠上一头。想到这里,她恢复了镇定,露出了“阶级斗争脸儿”的真相:“老经理,您是问现在,还是问过去?”

游刚不喜欢孙连香的亲热,更不高兴她在自己职务的前面加上一个“老”字。目前正是用人之际,他顾不得计较这些了:“先谈谈现在的情况吧。”

“现在还有什么好谈的,饭店全乱套了,这都是牛宏搞物质刺激的结果,他在的时候滥发奖金,他一走,奖金降下来了,邱二宝那一伙子见钱眼开的家伙就不干了。平常跟着牛宏跑的那一帮人,也是消极怠工,成天在一起嘀嘀咕咕,商量怎么样再把牛宏请回去。牛宏前脚一走,饭店跟着就完不成利润计划,我看这是他们定好的计策,向公司示威,逼着公司承认春城饭店离不开牛宏,叫他重回春城,杀回马枪。”

“嗯,这个情况很重要,你分析得很有道理。”游刚的精神提起来了,眼睛一睁大,肉坠儿就显得小了,“牛宏在你们那儿干了快两年,经济上手脚干净吗?你知道全国都在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不能无故怀疑好人,可也不能放过有问题的人……”

游刚想尽力把话说得圆滑一点,万一泄露出去让人抓不到把柄。孙连香却

比他干脆：“牛宏的手脚干净不干净我还说不准，但我有账……”孙连香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学生用的练习本，递给了游刚。

“你也有账？”游刚打开练习本，孙科长也凑过来看。

别看字迹歪歪扭扭像蚂蚁爬的，这确实是一本“账”：

1.一九八〇年八月七日（立秋）下午，牛的姐姐领着一个姑娘叫满凤的来到饭店，躲进经理室，谈情说爱半小时。

2.当天晚上，牛宏留东方服装店的范师傅吃饭，牛宏为他要了四菜一汤，这笔钱哪儿出？

3.八月十三日，崔芬打破了一只碗，还跟顾客吵架。

4.八月十六日，牛宏领来三个老木匠安装二、三楼地板，每人每天发十块钱工钱，还管吃管喝。这笔花销肯定没有发货票，怎能报账？他还说：用国营不如用集体，用集体不如用私人。这个观点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

……

“好，这回有啦！牛宏肯定有问题，没有大问题，也有小问题。”游刚又往后翻了翻，孙连香记了一百三十多条，凡是和她不对劲的人都上账了。而且不论事情大小，只要是人家的缺点、毛病，甚至有点怀疑的地方也都记得清清楚楚。游刚在心里骂着：“这个女人不是好东西，这一手太厉害了，自己也要防备着她，往后少跟她说话。”

但是，孙连香这时候拿出了自己的小账本，对游刚的帮助可是太大了。他对牛宏事件立刻就有了主心骨，今后两三步棋都看好了，自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他转身对老孙说：“这本账就是证据，是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也可以看作是群众对牛宏的揭发和检举。你立刻给党委打报告，派专门工作组下去，一定要把春城饭店的问题彻底查清楚！”

只要工作组一派下去，就能给牛宏造成一种精神压力，也会在群众中造成一种既定事实：牛宏确实有问题，不然上边为什么派工作组下来？游经理撤掉他的职务还是撤对了！先在群众中造成轰动，工作组一下去少说三个月，多说一年半载，查出问题更好，查不出问题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工作组长就可以代替饭店经理，先把工作抓起来，把牛宏空出的位置顶上。这何尝不是解决游刚目前困境的最好办法！

老孙一听，却心里打起小鼓，生怕让自己去当这个工作组组长。他已下决心，后半辈子可再也不到基层去了。就问：“派工作组叫谁去当这个组长好？”

“这个你先别考虑，关键是上午必须把报告写好，你亲自交给老钟，中午我们就可以商量决定了。把小孙的账本也附上。”

孙连香心里不免也嘀咕开了：“老经理，我写的那些东西可不能让店里人知

道,他们要知道了,我可就没法待下去啦!”

“不会,我们怎么能那样干呢。”游刚晃着寿星老儿一样的大脑袋,心里十分得意。他的手伸进口袋掏火柴点烟,碰上了那份硬邦邦的、叠成了方疙瘩的校样,他的心里又抽紧了,必须快点把这篇该死的文章看完,好知道上面写了什么东西。然后设法通知报社,说情况有变化,这篇文章不实。他又对老孙嘱咐了几句,才走出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

他找个什么地方能安安静静地把这篇要命的文章看完呢?饮食公司的大楼不算小,可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却很困难。因为游刚有个小心眼儿,除去钟警深和自己,不愿意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人们的嘴就跟排风扇一样,幸灾乐祸、恨人不死的人不少,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很快就能在全公司张扬开来。自己的办公室叫牛宏占了,到别的办公室去看这种东西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等到中午吧,时间又不允许!

嘿,真是老糊涂!这不过是十分钟、八分钟的事,到哪儿看不完?他又返回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从桌上拿了一张报纸,转身进了厕所。那意思就是告诉人们:他是一边解手一边看报,时间可能长一点。包括孙科长在内的所有看见他走进厕所的人,也的确都是这么想的。

三楼这个小厕所是男女通用,只要从里面把插销顶好,任何人也进不来,不要说是看一篇文章,就是偷看绝密文件也不会被人发觉。游刚习惯地蹲在茅坑上面,心里不无紧张地掏出了那份该死的校样——

话还得从一九八〇年夏天说起,春城饭店来了一位年轻的“琢磨经理”。他果真有一股“琢磨劲儿”!立刻在春城里刮起一股旋风,这旋风是那样清新,那样爽人,带着强烈的经济改革的气息。他整顿饭店、改革制度、扩大经营,很快,饭店的面貌变了,人也似乎变了,连食品的规格和品种也变了。有大场面上的精美食品、名贵炒菜,也有大众食物、本地风味小吃,就连油条也比别处的个大色正、又香又脆。春节前,北方居民喜欢冻起一缸馒头,正月十五之前不做饭,春城饭店把富强面的馒头用小車送到楼底下,全部是鲜酵母发面,咬一口像掺了白糖一样甜。他们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平常俭省,多生产大路食品。过年过节则不怕花钱,要吃得舒服,显得阔绰,他们就生产高档食物,设立家庭专席。中国人太多,大家都厌恶排队,特别是知识分子,时间宝贵,宁肯不吃也不排队,春城饭店研制出了味美价廉的速食面,吃饭高峰时开十八个窗口售货,决不让顾客等得心焦发烦。他们的花样多得很,名声大振,利润逐月增加……

这是捧臭脚！他娘的，这帮摇笔杆的，把狗屎也能说成一朵花！游经理愤愤地在心里骂着，他很难耐着性子一行一行读下去，双腿也蹲得有点发麻。于是就隔三跳五，凡是吹捧牛宏和春城饭店的地方就跳过去，光看与自己有关的段落，在校样上一目十行地寻找自己的名字。这一来倒更费事，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看不明白，还得返回去从头看起。

……牛宏实行的这一套终于激怒了饮食公司的经理游刚同志，这位多年来思想同他的身体一样软弱的老同志，在精简机构、改革体制、防止干部老化的浪潮中，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作用，突然一反常态，表现出少有的大马金刀的武断气魄，不同任何人商量，凭一时的怒火中烧撤了牛宏的职务，简直就像一场儿戏，把好端端的春城饭店给断送了……

浑蛋！你说我是什么“心理作用”？什么“武断”？什么“怒火中烧”？全是人身攻击！游刚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骂起来，没有叫起来。

他脑门儿上沁出了汗珠，老花镜在鼻梁上跳动，多亏一边一个高高的肉坠儿给托住了。报告文学越到后边写得越尖锐，不时还夹有一些尖酸刻薄的话，看得游刚毛焦火辣。他不能忍受，却又无法发作。他不想看下去，担心自己的神经承受不了这种刺激，却又不能不把它看完。这篇文章不同于十几年前的大字报、大批判，叙述的内容连游刚也不能不承认基本上是事实，它的力量也正在于此。这些事实恰恰为游刚所不喜欢。

且不说厕所里的游刚。厕所外面这时候又闹翻天了。大家一上午没见到游经理，这么大一个公司，能没有事情需要请示经理吗？大家你问我，我打听你，顺着线索找到了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斗争的弦儿绷得特紧，什么事情又总爱往坏处想的孙科长，一看手表，大叫一声跳了起来：“坏啦！经理进去有一个多小时了，八成出事啦！”

众人一愣：“进到什么地方去啦？”

孙科长不答话，拨开众人，三蹿两跳奔到厕所门前，用手一推，里面果然还顶着插销。

有人还没明白过来：“上厕所能出什么事？”

“你忘了传达室的胡大爷是怎么死的了？不就是解大便的时候心脏病发作，死在厕所里，到下班的时候才被人发现……”孙科长还有半句话没有说出来，那就是：游经理也到了胡大爷的年龄，同样也有冠心病。而且还有更要命的——这几天心情不好！……

孙科长开始敲门、呼叫：“游经理，游经理！”

他这样一大呼大叫可不得了，公司里的人以为游经理真的在厕所里出了事，大家十分震惊，纷纷涌到厕所门前。七嘴八舌，你呼他叫：

“游经理！”

“游经理！”

越是听不到里面有人搭腔，大家心里越是焦急。这就证明里面确实出了问题。孙科长要准备破门而入了！

厕所里的游经理也十分紧张。一方面是叫桑原蓁的报告文学给刺激的，心还提在嗓子眼儿；另一方面不知道外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都找他？而且逼到厕所里来？牛宏又出了什么事情？桑原蓁的文章登出来啦？还是大家猜到了他躲在厕所里是在偷看那篇文章？他慌忙站起身，双腿发麻，险些没有摔倒，赶紧扶住厕所的墙壁。稳了稳神，先把校样藏好，系好裤带，当孙科长朝着厕所的门踹第二脚的时候，他把插销拔开了。

“你们干什么？拉个屎也不得清静！”

大家先是一愣，随即就松了一口气。孙科长表达了“嫡系部队”的心情：

“老经理，你可把大伙吓坏了，喊你也不应声，以为你出了什么事啦……”

“你们就不盼着我有好事！”游刚气哼哼地拨头便走。找他有事的人赶忙从后面跟上去。

不能怪游刚生气，这虽是一场虚惊，可太不吉利！为什么人们总想到他的死呢？这不明明是咒他快死吗？！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现在不能死，也不会死的。人应该会生也会死，生得其时，死得其时，才是最完美、最有福气的。

还有更重要的一条——

一个人的一生中要有个开花的时期

从那次不愉快的“咬秋”之后，又过了八个月，春城饭店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冷气、暖气、饭店必不可少的各种现代化设备，都已装备齐全。饭店里里外外也全部装修一新，墙壁贴上了图案优美的塑料布，显得堂皇高雅。在每一面墙适当的位置上，都悬挂着名人大家的字画。大部分是牛宏通过刘俊英，刘俊英又通过桑原蓁搞来的。也有一小部分是花钱买的，花钱也不过是象征性的，总共还没花一千元，这只是一张画的价钱。饭店的门口、大厅的中央，每个墙角和窗户的旁边，都摆着盆景、花木；一楼的每张餐桌上都摆着一瓶新式塑料花，能飘出一种花香，保持一年；二、三楼雅座的每张餐桌上，都摆着小巧玲珑的盆景。这一切的总设计师当然是石心菊，在她的带动下，有好几个人都对养花种草发生了兴趣。要说钱方面，牛宏更是腰大气粗了。饭店的营业额猛涨，而且能持续不断地上

升,因为他们老是能够想出赚钱的新花样。可是牛宏每月上缴利润,除去保证完成公司下达的指标外,略有一点超额,略有一点增加。为什么不像他实际赚的那样猛增猛涨呢?牛宏的精明就表现在这个“略有一点”上。公司是大锅饭,制订计划的那些人是输打赢要,专会拆东墙补西墙,对赔钱单位无计可施,对赚钱单位狠命死挤。如果牛宏赚多交多,实话实说,公司就会不断加码,直到把他勒死抠垮,鞭打快牛嘛!春城饭店再赚钱也养活不了一个公司。牛宏搞“略有一点”,既让公司说不出话来,又叫他们摸不着春城饭店的底,他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办起事情来左右逢源,不仅不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有时反而能钳制别人服从自己。

这样说来,牛宏没有什么好愁的了?

正相反,叫他发愁的事更多了,眼下最使他头疼的就是饭店里的这批人。牛宏理钱抓物神通广大、办法多得很,管理人却显得缺乏才气。他原以为饭店的规格提高了,职工的人格和思想格调也会提高,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饭店变好了,人的面貌并无大的改变。人和饭店的矛盾一下子变得十分突出了。牛宏下了好大力量为每个职工做了一套极其考究的店服,规定每个人一进饭店必须换上店服,整齐划一,美观大方,风度优雅。但是,牛宏却不能像做店服一样给每个职工做一个漂亮的灵魂。一个人的灵魂是用任何服装也遮不住的。邱二宝野性难改,粗俗不堪;孙连香脸上的横条肉还是绷得那么紧;崔芬生完小孩以后极不讲究,邋里邋遢,俗不可耐;石心菊本来脸蛋长得就不好看,还不修饰不打扮,随随便便;赵永利兼做保全工,成天沉迷在各种设备里,偶尔笑一下,仍然是个活哑巴。这些还只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无妨大局。最可气的是一个人一种心眼,不抱团儿,不以饭店为重,你跟我上不来,我跟你过不去,今天这两人吵嘴,明天那两人又不说话了,而且和顾客争吵的事也时有发生,影响饭店的声誉。他们只适合当低级饭馆的服务员,谈吐、行动、仪表与现在的春城饭店的格调极不协调。

一连几天,牛宏回到家里总是闷闷不乐,少言寡语。母亲并没有看出什么异常,因为她不知道牛宏在外面是什么样子,他回到家里几乎和没当经理的时候一个样。只是家务事干得更少了,不声不响,蔫头蔫脑的琢磨脾气并没有改变。牛宏在外边要强迫自己按照理智,按照工作需要去行动、去说话。回到家则可以放松自己,恢复自己真实的本来面目。但精细的牛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她也正好有事情要找牛宏,吃过晚饭之后她把兄弟叫到了自己的小屋里。

“小宏,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牛宏并不隐瞒,把自己的苦恼都对姐姐讲了。大姐是他的谋士。

牛华笑了,笑得很狡黠:“傻兄弟,你真是死琢磨,改变饭店是你的责任,你也能够做到。改造人是全社会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也办不到。你不

光是为这些事发愁,你心里一定还有别的事!”

牛宏不吭声了,不承认也不否认。

“你和满风的事进展得怎么样了?”

“不怎么样。”

“什么叫不怎么样?”姐姐的脸绷紧了,“相交七八个月啦,你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你陪得起,人家姑娘可耽误不起!你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

“我没有主意。”

“你要真没有主意就好了,对满风我满意,爸爸妈妈更满意。坏事就坏在你不仅有主意,而且你的馊主意还特别正!听说明天刘俊英就要结婚了,你难道还不死心?”

牛宏惊讶地抬起了头,看见姐姐锋利的目光正盯着自己,便又慌忙地把头低下。老天哪,只要是和牛宏有关的事情,不论大小,甭想瞒过他姐姐的眼。

“你别瞎说,我跟刘俊英没有什么关系。”

“哼!你还想瞒我?一见了刘俊英瞧你那个丢魂少魂的样儿,连眼神都变了,除去邱傻子看不出来,谁还不懂这个!知道人家有对象,你不死心;等到人家订了婚,你还不死心;现在人家就要结婚了,你还等个什么?”

“谁说我在等她?”对这个问题连牛宏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不承认自己是在等刘俊英,但他很难从脑子里把刘俊英的影子赶走。有时陪着满风蹿马路,心里想的却是刘俊英。他喜欢刘俊英内向的性格,因而对满风的热情、开朗、奔放就认为是缺点,认为是不深沉、没有女性的温柔。只有当他高兴的时候,或是忘掉刘俊英的时候,才能唤起对满风的热情,才能为满风灿烂动人的容貌所倾倒。但这种热情往往不能持久,不能变成一种深沉的爱恋。如果凭理智,他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这个漂亮姑娘。可是对待婚姻恋爱难道也像对待工作一样,强迫自己按理智采取行动吗?

“你不等她等谁?就凭这一点你也不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不是干大事业的。儿女情长,优柔寡断,天下好姑娘有的是,为什么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再说刘俊英哪一点能跟满风比?人才、修养、工作,刘俊英充其量不过是个饭店服务员,人家满风是体校的正牌教师。”

“大姐,你怎么也势利眼?你自己过去不也是汽车售票员?”

牛华的脸色微微一红:“正因为我是售票员,才知道服务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你当经理之前找不上对象,当了经理,对象找你。只要有社会,有人间,就有势利眼。你不势利,人家势利。”

“刘俊英就找了个作家,你怎么解释?”

“作家就比你聪明,人家找老婆就要年轻漂亮,能伺候自己,凭桑原蓁那副

尊容,当然愿意要小刘。你那个刘俊英就是势利眼,她图的是作家的名和钱,不然她就是嫁给邱二宝,也不会看上桑原蓁。”牛华两眼盯住弟弟,爽快地说,“我的理论都是真理,因为是我自己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不像你,瞎琢磨,认死理儿。快说吧,你和满风的事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同意,还不行吗?”

“瞧你这个不情愿的样儿,就好像是给我结婚。”

“本来就是为了你嘛,我不结婚,你就出不了嫁。”

“死小宏,我拧烂你的嘴!”牛华说完扑哧一声笑了。

牛宏仍然心事重重:“大姐,你说饭店的人都知道我跟刘俊英的事?”

姐姐用手指点了他一下:“放心吧牛大经理,知道的人不多,不会影响你的威望。”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从石心菊嘴里问出来的。”

“她是怎么知道的?”牛宏更加惊奇不安了。

“姑娘的心是感情的雷达,你们男人那点小伎俩是瞒不住的。”

“大姐,我有一件难事……我已经答应明天在饭店为刘俊英、桑原蓁举行婚礼,想借机教育一下我们那些不争气的职工。来参加婚礼的肯定会有一些名人,不仅能扩大饭店的影响,对服务员的精神气质也有一定的熏陶作用。可是我现在不想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又怕引起别人的怀疑……”

“别那么没出息,我不愿见你这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别说你跟刘俊英没有什么事,就是真有事也结束了,过去了。大大方方的,拿出经理的派头,按照自己的设想充分利用这次婚礼。”牛华真是人一份,嘴一份,可惜她没有跟兄弟换个位置。

牛宏点点头,姐姐讲的有气派,他在心里为自己鼓了鼓勇气。沉了一会儿他又说:“还有件事要求你,你明天能不能再到汽车上卖一次票?”

“干什么?”

“我带着我们那帮瞧不起自己的服务员去看看你是怎样工作的。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最爱坐在汽车上看你卖票了,你在我的眼里就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你工作的时候最美,最有风度,大家对你都很恭敬。我们店的人都把你当成了大知识分子,至少也是演员、教师。叫他们开开眼界,服务员也可以像有教养的人那样生活。”

“你是想叫姐姐出丑!”牛华变脸了。

“大姐,我……”

“甬说了,你这个废物蛋!自己无能,却想出一些不争气的怪点子,把全家人

都拉出去为你帮忙,不害臊!”

牛宏被骂得满脸羞红,低头退出了姐姐的闺房。原来妈妈也在外屋支着耳朵偷听,看见他出来,妈妈也生气地冲他撅嘴。

第二天上午,牛宏带领着本店的一批职工参观了天津饭店、友谊宾馆、起士林餐厅,快到中午时搭十三路公共汽车赶回饭店。乘客本不是很多,突然增加了他们二十几个人,汽车里一下子变得非常拥挤,有两个歪眉斜眼的小伙子说着粗话:

“今儿个怎么抽风了?”

“山西老核桃——满仁!”

发车铃响了,车门口响起了售票员的声音:“乘客同志,这是十三路汽车,由中心公园开往春城里,沿途经过百货大楼、南市、东北角、北洋桥,有上错车的没有?司机同志,请关门。”

“是大姐!”牛宏心里又惊又喜,她昨天晚上发了脾气,今天还是来了,姐弟终究还是姐弟。她并不喊叫,但是声音圆润悦耳,吐字清脆,车厢里立刻安静下来,每个人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这趟车比较拥挤,请大家互相谦让,不要出事故,或者发生不愉快的事情。现在就请两边的同志往里走,目前刚是早春,天气不热,请大家尽量往车厢中间站,里边的同志可以把脸扭向两边的窗户,位置排列得好,大家都会感到轻松。”她的语调中透着热情和固执,乘客们果然在按照她的话向里挪动,她的话并无特别之处,却有一股神奇的效力。车门前腾出了地方,她从容地坐到售票员的位子上。

乘客们都想看看这位说话颇有教养、谈吐不带俗气的售票员长得什么模样,她娴雅,聪明,白丝眼镜后面一双秀长动人的眼睛,勇敢、大方、亲切地迎着众人的目光:“哪位同志买票?好,请这位同志帮忙递一下,谢谢!”

“大姐!是你?”邱二宝几乎叫了出来。

“你好!”牛华已经看见了他们,冲他们点头打了一声招呼,但是不攀谈,只忙自己的工作,“还有哪位同志买票?”

不和任何一个乘客过分亲热,也不和任何一个乘客过分疏远,态度庄严并不傲慢,姿势正规却不呆板。春城饭店的年轻人简直快看呆了,他们没有想到像牛华这样有身份的、要在人前说说道道的人,竟然是个汽车售票员!而且她把卖票的工作做得跟其他一切上等职业一样让人尊敬。她在汽车上碰见了自己的兄弟和他的部下,没有丝毫不好意思的表现。她有一股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让人感动,又使人肃然起敬,不能不对她客客气气。连那两个歪眉斜眼的小伙子,也听从她的劝告,轻轻地往车厢里边走。一边走一边小声嘟囔:“这个售票员

怎么没见过,够意思!”“茬子够硬的!”(天津话:“茬子”指嘴巴)车厢里很多人听到了,牛华也听见了,她并不假装没听见,也不直接拾他们的话茬儿,眼睛看着他们,露出锐利和智慧:“你们二位到哪儿下?”

“前一站。”

“买票了吗?”

“有月票。”

“请拿出来看一看。”

“告诉你有月票,还不相信!”两个小子露出了野性,有人为漂亮的售票员捏一把汗,惹他们干什么,就是没有月票,国家也不在乎那几分钱。现在聪明的售票员,碰上这种斜眉歪眼的人都假装看不见,不理不问。牛华就不怕当着这么多人让自己吃亏下不来台?

她很镇定,脸上还挂着笑:“对不起,这是我的工作,也请你们不要怕麻烦,因为你们乘的是公共汽车。”

两个年轻人无奈,只好掏月票,为了不让她看清,在手里一晃又装进口袋。按理说这就叫给了牛华一个台阶,一个面子,她应该见好就收。她却偏不,仍然和气而又认真地说:

“你们这样成心不让我看清,只好请你们再拿出来一次。”

“你的眼睛了!”其中一个光头的小子骂了一句。

牛华脸色一沉,声调仍然不急不快:“同志,张口骂人先脏自己的嘴,你即使不尊重别人,也应该尊重自己吧?请把月票打开!”

“是啊,你的月票到底是真是假,为什么不敢叫人看?”乘客中有人说话了,有这样的售票员,群众不可能不向着她。

两个年轻人把月票拿出来,举到牛华的眼前:“你看,你看!这回看清了吧?”

“看清了,谢谢!”牛华的端庄宽厚立刻显得比那两个人高出一大截。什么地方高呢?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力量。

车上人都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看着那两个年轻人,他们十分懊丧,打又打不起来,骂也骂不起来,只好一声不吭,车一到站立刻跳下去了。

汽车又开动了,又上来许多新乘客,牛华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文雅大方,明明是穿着一身普通的汽车公司的工作服,却显得姿容优美而堂皇。

汽车到了终点站,邱二宝挑起了大拇哥:“大姐,你真有一套,要叫我早跟那俩小子打起来!”

牛华并不满意这次“下海”(指已经提升为干部的老售票员偶然跟车为别人顶班卖票),平淡无奇,表现不出自己紧急应变的能力。她接着邱二宝的话茬儿

说：“没有道理的人才愿意打架，干我们服务行业的，要想打架就会成天到晚也打不完。”

崔芬摸着牛华身上那件米黄色的工作服，由衷地赞叹着：“牛姐，什么衣服一穿到你的身上就显得特别精神。”

“你别拿我取笑了，还是你们春城饭店的店服讲究、有气派。”

邱二宝到处都要卖傻相，又插进来说：“可我穿上就不好看，小石说像熊猫穿西装。”

牛华笑了：“小邱，刚才车上的那个小光头穿的够讲究吧？牙黄色的大喇叭裤多漂亮，可有人说他好看吗？因为他的道德水准和喇叭裤不是一致的。衣服只是外表，好看不好看关键在气质和智力，一脸俗气，一身痞相，浅薄庸俗，穿上什么也不好看。肚里有东西，脸上文静，穿着再朴素，也会有风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小石，对不对？你为什么光笑不说话？”

石心菊：“我最羡慕您工作的时候那种从容自信，这才是最美的。”

牛华亲热地抱着小石的肩膀头，一边送他们出车站，一边说：“工作——就应该是智慧加上美。特别是干我们这一行，千万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只有不懂得生活意义的人，才会自暴自弃，丧失进取精神。”

牛华有意放慢脚步，看别人都走远了，在石心菊的耳边小声说：“牛宏跟我说过好几次了，叫我找个好理发店帮你烫个发，明天是星期天，你去找我，我带你去南京理发馆，让他们根据你的脸型为你设计一个新发型，包你好看。”

“不，不，我不烫。”石心菊羞得满脸通红，从牛华的怀里挣出来，“谢谢您的好心，大姐。刘俊英还让我通知您，欢迎您参加她的婚礼。”

“谢谢她想着我，我下午还要顶车，实在去不了，你替我向她道喜！”

“好吧。大姐，再见！”石心菊赶回饭店，刚一进门就碰上要当新娘的刘俊英，她两眼发红，显然是刚掉过泪。石心菊心里一惊，忙拉着刘俊英来到饭店的会议室，问：“俊英，你怎么啦？”

刘俊英不说话，看见自己的好朋友却忍不住又想哭。

“你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不在家里收拾打扮，又跑到店里来干什么？”

“公司不让我们在饭店里举行婚礼，可是早就通知了亲友，再重新联系其他饭馆改换地点已经来不及了，叫我们怎么丢得起这个脸！”

“这是谁说的？”

“刚才孙连香到家里给我送信，她说是公司政工科打来的电话，连游经理都知道这件事。”

“公司里怎么会知道？你请了公司的人参加婚礼啦？”

刘俊英摇摇头。这个漂亮姑娘愁云满面，没有一点要做新娘的喜气，格外招

人疼怜。

“牛宏是什么态度？”

“不知道，我还没有见着他。”

“走！去找他，听听他怎么说。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他建议你们在饭店里举行婚礼吗？”

“我就是来找他的，求他给想个主意。可现在又不想找他了，找他也没有用。”

“为什么？”

“这会使他为难。再说……他心里也许并不赞成我在咱们饭店里举行婚礼。”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他跟你好没有好成，就嫉妒你，就生气，就报复？他会是这样的人吗？”

“不，不……我没有说他是那种人，可他也是人……”刘俊英自己也不知道想说些什么。

年轻人们看见了刘俊英也都围上来，尤其是姑娘们，她们对刘俊英的态度是各种各样的，有的眼热，有的瞧不起，有的亲亲热热想帮她点忙，有的就盼着她的婚礼举行不了，看着她闹点笑话。因此就七嘴八舌，说出的话各有各的味。

石心菊却趁机把牛宏找来了，并且简要地向他说明了情况。牛宏什么都知道了，他原打算不声不响，让桑原蓁和刘俊英的婚礼照样在春城饭店举行。事后公司若追问这件事，就说来不及通知新郎新娘，饭菜已经投料，无法更改。想不到“阶级斗争脸儿”孙连香已经先他一步通知了刘俊英，刘俊英也竟然傻乎乎地又找到饭店里来，这场戏不得不明敲明打，责任一下子全压到他牛宏身上了。不同意，对不起刘俊英；同意吧，要代人受过。而且这个“过”受得多么窝囊！

他假装什么事也不知道，高声说：“刘俊英，你准备好了吗？老桑跟我讲，三点钟客人们来，三点半派车去接你，四点钟准时举行婚礼，婚筵五点钟开始。这些你都知道了吧？”

刘俊英惊讶地望着牛宏一本正经的脸说：“牛经理……婚礼还能在咱们饭店举行吗？”

牛宏也故作惊奇，而且口气强硬：“哎，已经定好的事情不能再变卦了！你告诉老桑，谁变卦由谁包赔损失，饭菜已经投料，而且由我和郑师傅亲自上灶，好好卖两手。因为你是咱们店的职工，婚筵必须办出咱们店的最高水平，对得起春城饭店的声誉，这也是宣传咱们饭店的一个好机会。”

孙连香一见这么多人围着刘俊英，早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也凑过来，一听牛宏这样讲，便忍不住插嘴了：“牛经理，公司不是有话，不许在饭店大吃大

喝、讲排场办婚事吗？”

牛宏心里很生气，这个“阶级斗争脸儿”有什么资格，以这样的口气对他说这样的话？她好像是政委、是支部书记！但牛宏的脸上却嘻嘻一笑：“你刚才不是告诉我的吗？可我不相信公司会那么傻，要搅散自己的买卖，有钱不叫自己赚，让给别人去赚，有这样干企业的吗？人们反对大吃大喝，这当然是对的。我们开饭店的不能念这本经，假如大家都不吃不喝，我们只好关门，开饭店的还怕大肚汉？领导也只是叫大家不要拉账欠债去大讲排场，并没有把这一条写进法律，说谁办婚筵就是犯法。人家有钱，愿意在办婚事时，亲友欢聚一堂，热热闹闹，这不光是图形式、讲面子，大家欢聚一堂，无拘无束，三天无大小嘛，不要任何掩饰，也是为了恢复人的善良美好的天性，充分享受一下做人的快乐，生活的快乐，这也在情理之中！我们管不着，公司要想管，先得包赔我们的损失，每桌五十，五五二百五十元。”

孙连香很不服气，这个琢磨经理真是太不像话了，反对大吃大喝、大讲排场，这是政治，他却用一套生意经来搪塞，把脑袋扎到钱眼里出不来。她又抢白了一句：“不能因为搞了个作家，腰里有钱就在自己的饭店里臭美，要臭美到别的饭馆去。”

刘俊英受不了啦：“孙师傅，你把话说明白，谁臭美啦？”

“我没说你，反正有个臭美的，谁臭美谁心里明白。还有人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心里那点事谁还不清楚？拿着公家的东西送人情！”孙连香把心里话甩尽，拨头走了。

这就是老娘们儿吵架的水平，又想说，又不敢全说清楚，指鸡骂狗，胡搅蛮缠，吵得赢就吵，吵不赢就走。孙连香自知刘俊英人缘儿比自己好，牛宏又向着她，再吵下去自己没有便宜可占，她边走边说：“买好谁不会，大家都来买好，那么多活叫谁干？我们这多干活的多咱也买不了领导的好！”

刘俊英又哭了，今天对她来说并不是个喜庆的日子，而是个倒霉的日子。她心里没有一点欢乐，她不结婚了，她不需要这种排场。她也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眼泪，掉头想走，被几个姑娘拉住了。她们望着经理，那神色分明是在问牛宏：你说怎么办吧？

牛宏眨眨眼，嘴角出现了一条带有强烈嘲弄意味的直纹，显得他又嘎又坏。那双一贯露出诙谐神气的眼睛，看着刘俊英那副委屈难过的样子，也变得悲哀起来。他振作了一下精神，故意用轻松的口气说：“你们姑娘在出嫁前是不是都得哭一场？高兴过分了眼泪就特别多，特别需要哭……”

“牛琢磨，人家都急成这样了，你快说点真格的吧！”一个年纪稍大的服务员亲昵地骂了一声。

“说真格的这叫好事多磨，越是这样越要把婚礼办得像个样子。这不叫臭美，这叫香美！作家追求我们店的服务员，这是全店的喜事，今天的婚礼上会来不少文艺界的名人，我们要举止优雅，说话大方，对得起饭店，对得起自己，不给刘俊英丢脸，这是第一。第二，外人结婚可以在我们店里办婚宴，本店职工为什么反倒不可以？我宣布：以后不论咱们店的哪一位结婚，都欢迎在本店举行婚礼、包办筵席，而且只收工本费，利润少算，花同样的钱保证比外边吃得好。只要我当经理，我就主张饭店靠大家，大家靠饭店。第三，李娟、梁彩，你们两个去换衣服，跟刘俊英一块儿走，帮她收拾打扮，当伴娘，一直保着她进了洞房才算完成任务。第四，晚上石心菊负责接待作家、画家、名人名流，领他们看看饭店，准备好笔墨宣纸，叫他们为我们店留点字画。大伙看这样行不行？”

“太好了，你这个经理够意思！”有几个也快要结婚的青年人首先表示支持。

这时候，石心菊却像变戏法一样，突然端来一盆仙人球，放在刘俊英的面前。

“哎呀，真好看！”许多人惊得叫了起来。

牛宏也看呆了，他没有想到这个刺刺拉拉的植物，开花竟会如此漂亮！仙人球像一个直立的哑铃，栽在土红色的宜兴泥盆里，顶端长出两个对称的刺球，如小儿拳头一般大。每个刺球上都斜着朝天开出一朵奇异的黄花，挺拔、俏丽、清雅。像小姑娘头上的两个朝天髻儿，又像两个灿灿放光的金星。

石心菊说：“俊英，今天你结婚喜庆，本应该送给你花色艳丽、气味芳香的一品红、牡丹花，可我只会种这些球球蛋蛋的丑花。植物不论长得多丑，开花的时候总是逗人喜爱的，仙人球开花象征着团圆和睦、永久相爱，送给你放在新房里，不知你喜欢不喜欢？”

“我喜欢，非常喜欢！谢谢你，小石。”刘俊英抚摸着花盆，显出十分珍爱，又十分感动的样子。

牛宏的眼睛看看石心菊，又看看仙人球。石心菊的话在他的心里引起震动，这个瘪脸、塌鼻子、小眼睛的姑娘，一下子变得并不那么丑了，显得洁净、善良、刚强，身上似乎有一种深藏不露的吸引力，就像这仙人球开花。

对，人也应该像花一样，一生中总要有个开花的时期！作家写出好作品是开花，运动员得了冠军是开花，钟警深开过花，游刚年轻的时候说不定也开过花，任何人都可以开出自己的花。自己在春城饭店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开花期，如果这段时间开不了花，往后就更难开花了。最好能像石心菊培养仙人球一样，施肥浇水得当，让每一个人都开花，已经开过去的重开，那春城就会成为群芳争妍的大花圃了。

“牛宏，你是不是恨我？”

牛宏从仙人球上收回目光,发现会议室里只剩下他和刘俊英了。他没有听懂刘俊英刚才的话,用惊异的目光望着对方。刘俊英美丽的眼光也正大胆而热烈地盯着牛宏:

“你瞧不起我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刘俊英异样的眼光把牛宏的心头搅乱了。

刘俊英低低头,两腮泛红,面带羞容:“……我很佩服老桑,他好像什么都懂,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跟他在一起总是听他讲,我插不上话,感到拘束。跟你在一起就没有那种感觉。也许我不该嫁给他,可是他说他爱我。牛宏,我心里真是矛盾极了!今天结婚,可我并不感到很幸福,很快乐……”

这一番话把牛宏闹蒙了,他不敢说对,也不能说错,这个爱动脑筋的牛琢磨,不能为眼前的姑娘提出一个有价值的建议。

刘俊英的眼里又蒙上了一层泪水,她靠近牛宏,声音低低地说:“我不是一个好姑娘,牛宏,以后你就彻底把我忘掉吧!”

刘俊英披散的长发,期待的目光,鲜艳的嘴唇,使牛宏周身火烧着了一般,血液冲动,感情激荡。

刘俊英轻轻叹了口气,满面羞红,一声不响地抱起仙人球向门口走去。牛宏怔怔地望着她的背影。他有些后悔,甚至咒骂自己不是个男子汉。可,可……事情已无可挽回,留恋这些往事,只会把自己搞得更尴尬、更难受,既对不起别人,也对不起自己。他默默地望着刘俊英走出房门,自己还站在会议室里发怔。赵永利突然推门走进来,那种神情仿佛是有话要说。呀,他不是“政治哑巴”吗?从来没有主动地跟别人说过话,难道真是——

逼得哑巴说话

“叮铃铃……”经理办公室的电话铃又响了。

牛宏抬起头来,看着电话却不想去接。他知道这电话一定是找游刚的,游刚不在房间,他又不愿意去找,不如不接。可是电话铃很有耐性地持续不断地响着,吵得牛宏心烦,他不得不抄起了话筒。

“喂——”

对方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声音,十分高兴:“你是牛经理吗?”

牛宏却只想着游刚,把话听错了,而且口气很不耐烦:“我不是游经理,他不在!”

他说完就想放掉电话,耳机里突然传出来一阵笑声:“你这家伙怎么搞的?才几天不见面就把自己的老部下全忘了!我不找游刚,我要找牛宏牛经理。”

牛宏举着听筒呆住了，对方是谁？声音陌生，口气随便，春城饭店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被撤职两个多月，他已经不习惯在自己的“牛”字后边加上“经理”两个字了。

“喂，牛经理，你怎么不说话？”

“你是谁？”

“你真的听不出我的声音？太不像话了！我是赵永利。”

“你？哑——”

“‘政治哑巴’！”

“永利，你好！”

“我不好，而且很糟糕，我们都觉得是叫你骗了！你叫大家开花，你叫我别当哑巴，我们都听了你的话，有的正在开花，我也开始说话，你却拍拍屁股扔下我们逃跑了，我们能饶过你吗？”

“政治哑巴”居然以这样亲热戏谑的语调取笑他，挖苦他，使他心里感动而又惭愧：“永利，那天正好轮上你休息，没有看到我是怎么被撤职的，我不是逃跑……”

“得啦，得啦，我全都知道，咱们见面再谈，你赶快到康乐冷食店来，我在三楼雅座等你，请你吃冷食。”

“这……”

“什么这个那个，你快来，我有话跟你说。如果等二十分钟还看不到你，我就到公司去找你。你别太不够哥们儿了！”赵永利不等牛宏再解释就放下了电话。

牛宏自从离开了春城饭店，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他说不清自己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不愿意见到春城饭店的同伴。他在饭店里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事都做得出，撒得开，收得拢，可独独害怕亲人和好朋友。被撤职的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向大姐倾吐积愆，他软了，他厌烦了，他感到精疲力尽，他不愿再强鼓着劲干下去了，要成就一番事业太难了，他是凡夫俗子，不是那种有作为的人，他不愿意再演戏，想恢复自己本来的面目，羡慕过一种平稳的、安全的、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以为大姐一定能理解他，关心他，谁知大姐把他臭骂一顿，骂他不争气、窝囊废！半途而废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群众，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人格，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自己的责任！他完全可以过一种有智慧的生活，现在却又倒退回愚蠢的泥坑。只有傻瓜才不懂得运用策略和手腕。在人的生活中有些失误是一生也不能挽回的！要千方百计防止发生这种失误。大姐鼓励他继续干下去，利用被撤职这件事公开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那一套办法，纵然不能重回春城饭店，也要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让群众明白是非曲直，牛宏虽然是昙花一现，也能留下点香气！

于是,牛宏采取了现在的这种方针。但他尽量躲避着春城饭店的伙伴,害怕听到他们同情和鼓励的话。他现在不怕讥讽和嘲骂,却讨厌别人的可怜和安慰。只有弱者、可怜虫才愿意接受别人的安慰。今天,“政治哑巴”赵永利一反常态,不到公司来找他,不到家里去看他,却邀他到“康乐”吃冷食,天气还不算太热,吃的什么冷食?显然是那儿清静,说话方便。他不能不去。

牛宏站起身,稳了稳心,从里到外都恢复了常态,才走出了经理办公室。他神态潇洒,举止机敏,步行还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了康乐冷食店。眼下刚是初夏,吃冷食的人不多,楼下的大厅里却坐了喝红豆粥、吃西式糕点和购买有名的康乐什锦元宵的人。牛宏暗暗佩服康乐冷食店的经理会做买卖,冷热齐备,冷有冷的名牌货,热有热的名牌货,一年四季买卖都兴旺。他走上了二楼,赵永利已在楼梯口等候。

“你可来了,大驾真难请!”赵永利迎上一步,没有跟牛宏握手,却扳住了对方的肩膀头,他的手劲很大,眼睛盯着对方,“好家伙,这两个多月我们都瘦了,你倒关在屋里闷得又白又胖。听说你在公司里大闹天宫呀!”

“政治哑巴”果然变了,牛宏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赵永利,记得去年春天,刘俊英结婚的那天中午,赵永利闯进来似有话要说,结果只说了句公司来电话找牛宏,如果牛宏不愿接,他可以代替接这个电话。牛宏猜到了电话里可能会说些什么,他不能把责任推给下边的职工,就一声不吭走出会议室去接电话。从此,哑巴还是哑巴,再也没见赵永利有说话的欲望。想不到他一离开春城饭店,哑巴立刻会说话了。

赵永利没有理睬牛宏疑问的目光,领他来到一个优雅的单间小餐室,石心菊和刘俊英早就坐在里边等他们哩。牛宏突然感到一阵羞愧,不敢看她们,尤其不敢碰刘俊英那双好看的大眼睛。两个女的倒很大方,站起来和他握手,四只眼睛从他一进屋的时候就不错眼珠地望着他,好像要从他的眼睛里挖出点什么秘密来。

刘俊英:“牛宏,你是吃冷的,还是吃热的?”

“给他吃冷的,败败心火!”赵永利抢先替他回答,“今天不是我请客,是老桑和俊英请客。老桑说好了先来,不知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不到。”

“准是又写得上了劲忘了时间,别管他,咱们先吃先谈。”刘俊英为丈夫误了大家的事感到不好意思,也很生气。她叫服务员端来了四喜雪球、鸳鸯冰激凌、橘子水、啤酒、红豆粥、热元宵,还有两盘糕点,满满摆了一桌子。

两个多月来,牛宏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不管他表面装得如何满不在乎,内心却是十分痛苦。今天见朋友们对他这样,心里发热,他说:“要的东西太多了,吃不了。”

“没关系，俊英不怕花钱，今天就是要换你一颗人心，试试你对春城饭店到底变没变心。”赵永利一下子变得十分严肃了。

牛宏抬起头，迎着赵永利的目光：“有话就直说吧，饭店里怎么样？”

“不怎么样，很不怎么样！一切全乱套了，再这样拖上半年，饭店就彻底垮了。你虽然花了很多心血，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毕竟是底子不厚，基础不牢，怎经得住别人冠冕堂皇地打着上级指示来冲击？”

牛宏露出满不在乎的神色：“没有办法，眼不见心不烦，谁有办法就叫谁去干吧。”

“你的心里真的不烦？”赵永利却逼住他不放，“你的事业被别人夺走了，能不烦？你心爱的东西被别人砸碎了，也不烦？你的心血被别人糟蹋了，还不烦？”

牛宏的脸色变了，讲实话他的心里很烦，他留恋春城饭店，留恋在那里的工作，能够主宰自己和饭店的一切，凭自己的智慧和责任可以去办一切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并不看重经理这个头衔，他在春城饭店那样干，愉快比对自己前途的担心更来得强烈，那几乎是不可抑制。因此，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把被撤职当作一回事，丢了经理这个头衔并不觉得太重要，可是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智慧，他的才能，如果不依附在这个头衔上面，对自己、对饭店都毫无用处。但他必须对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朋友，掩盖这种心理，要装得坦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避开赵永利钉子一样的目光，说：

“我说心里不烦是有道理的，我天生不是个能当官的人，大官更甭提，芝麻大的小官也当不好。我从小就不喜欢出头露脸，愿意一个人躲起来胡思乱琢磨，默默地过平静日子。谁知咱们这一代人命运都不太好，像河心里的一块木头，水流的方向就是我们的方向，忽而被冲上基层店经理的位置，忽而又被刷了下来。大小当个官儿，就得用两副嘴脸去应付社会上的虚伪，我讨厌作假，心里很苦。现在被撤了职，我可以恢复自己的天性，踏踏实实地做人，轻松地愉快地活着，再也用不着紧张，用不着犯愁。我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

石心菊和刘俊英的脸上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赵永利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仿佛有一种痛苦发出的光在他脸上闪了一下：

“你不用来这一套，这说明你对自己都不敢诚实。人活一辈子总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开花时期，常引以为荣，希望第二次、第三次重新开花。你也永远不会忘记在春城饭店的生活，而且不会为那段生活后悔。那不到两年的时间，胜过你像现在这个样子生活二十年。人总是有追求，有欲望的，只要活着心就不会死，世界上没有真正看破红尘的活人。关于这一点，咱们四个人中数我感受最深了……”

另外的三个人果然把惊异的目光都转向了赵永利，这个一向冷冰冰，不动

声色的“政治哑巴”，突然变得感情激动，语言热烈。大家都没有插话，等着他慢慢说下去。

赵永利喝了一口橘子水，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感情，接着说：“我当过兵，打过仗，受过伤，还立过一个三等功。复员回来，我胸膛里还装着一颗学雷锋的心，可是睁眼一看，社会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哪里都有不合理，哪里都有不公平，早知如此，我何必拼死拼活地傻干呢？叫我当服务员不要紧，可是有谁配享受我为他的服务呢？我有一肚子牢骚，我也跟别人一样有资格发发牢骚，但我不愿意发，不是不敢，是不愿意，我好赖是个党员，好赖当过功臣，胳膊断了往袄袖里吞，只有装哑巴！我的心冷了，对社会看透了，不说不笑，不哭不骂，混吃等死。你到春城饭店里来了，我一看、二看、三看，我的心慢慢又热了，只要我们自己不灰心，完全可以干出个样子。我看着公司钟警深这个人行，还给他写了封信，要求春城饭店成立党支部，用选举的办法产生党支部书记，不要由公司派遣。把话说得再明白点，就是我想当支部书记，占住这个位子，不叫公司再派一个拆台的来，或者来一个‘阶级斗争脸儿’之类的人物，由我跟你搭班子，全力支持你，就靠我们这伙年轻人把春城饭店办出个样子。也就是在这时候，你却落荒而逃了！……”

牛宏被赵永利的話深深打动了：“不是我逃，是人家赶我。”

“赶你也可以不走。游刚用戢火的办法撤你的职，违犯党的组织原则，你可以不服从，当场抗议，为什么要上他的当，也用戢火的办法卸职？”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赵永利不需要牛宏做出回答，话锋一转，拉到正题上，“不管你高兴也罢，痛苦也罢，也不管你有几副嘴脸，我们喜欢你当经理时的那副嘴脸，大家都盼着你快回去。现在就要你一句痛快话——回去，还是不去？”

牛宏面对着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情谊，不能装假，只有实话实说：“事情已经闹到了这步田地，回去不回去不取决于我了。别说是丢了那顶一钱不值的小帽子，就是丢了命也不能丢这么大的人！”

“当然得是公司里名正言顺地让你回去。这两个月我们也没闲着，向市委、公司党委写信、告状，老桑还把这件事写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事情的确闹大了。我估计公司党委会吃不住劲，肯定还想让你回去，不然不会两个多月不派新经理去。现在的关键是你，总不能老是死硬到底。”

刘俊英把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豆粥推到牛宏面前：“你吃了那么多凉的，再喝碗热的吧，让凉热在肚子里打打架有好处。”

石心菊也插进来说：“有个哲学家说，人类愚昧的典型表现就在于过分热衷手段，而忘记了目的。你的目的是什么？要把春城饭店办好。你是全公司唯一的一个三十岁以下的经理，带有对青年人的试验性质，你干好了会带起一批，往后也许还会提升新的年轻经理，你垮了就会影响一大片，什么青年人靠不住呀，不

堪重用呀,我们有嘴难辩。”

“小石果然内秀,她这个说法太对了,这不是你一个人怄气争脸的事,你学这个学那个,就是不学韩信,光想伸不想屈。党还搞灵活性哪,你就一点灵活性不讲?公司领导要是找你谈话,叫你回春城,你一定要有台阶就下,见好就收。”

.....

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引经据典,感情真挚,每个人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牛宏后悔以前没有真正了解他们,更好地取得他们的合作与支持。和这样一些有头脑,有独立见解,又是志同道合的人共事,是一种愉快。赵永利谈吐机敏,精明干练,身上看不出一点“政治哑巴”的痕迹了。更使牛宏感到新奇的,是石心菊身上突然闪现出来的思想的力量、个性的魅力。这一切像奇迹般地改变了她的容貌,显得性情敦厚,举止娴雅,就连那张略扁的平脸也透出一种稳重和善良,不但不丑,甚至有些漂亮了。坚强的人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空洞的同情。牛宏决定接受朋友们的劝告,争取一切机会重返春城饭店。

刘俊英焦急地看看表,又把眼睛贴上玻璃窗望望下面的大街,盼望能看见丈夫那矮墩墩的身影,他的失约太叫人扫兴了,何况是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

服务员又走进来:“哪位同志姓牛?”

牛宏一怔:“什么事?”

“去接电话。”

“电话?谁会找到这儿来?”

“一个姓桑的同志。”

“桑原蓁!”三个人都跟着牛宏来接电话。

“喂,老桑吗?我是牛宏。”

耳机里传来桑原蓁那响亮有力的声音:“牛宏同志,今天上午你们公司的党委书记老钟找到我家里来了,刚把他送走,所以不能赴约了,非常抱歉。”

“唔,钟书记找你干什么?”

“就一个目的,劝我不要发表那篇报告文学,理由是,他说党委书记和作家是同行,职责都应该是净化人们的关系,净化人们的灵魂,不要让已经十分复杂的人事关系变得更复杂,火上浇油,扩大事态的发展。他说,当代不少作家的悲剧就是好心帮倒忙,写一篇报告文学去支持一个先进人物,结果反而使那个先进人物的处境更狼狈,更困难。如果我真的爱护你,爱护春城饭店,就撤回那篇文章,相信他会处理好‘牛宏事件’……”

“你怎么回答的?”

“我答应考虑一下。小牛,这位钟书记头脑十分清楚,可以信赖。我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叫你赶快回公司,他们说不定立刻要找你谈话。谈话时你千万不要

意气用事,头脑要冷静,以事业为重。明天中午,我私人掏钱在春城饭店雅座款待你,欢迎你官复原职。见面再细谈。”

“再见!”牛宏放下电话,那三个人追问他桑原慕在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牛宏简要地重复了几句,他的脑子里已经在盘算怎样对付和钟警深或者游刚的谈话,自己应该持什么态度,提什么条件。

赵永利不放心,他叫石心菊和刘俊英先回饭店,自己保镖跟到了饮食公司。如果是钟警深和牛宏谈还好,倘若是游刚谈,他生怕再重演两个月前的那一场——

敲山镇虎反被虎咬

“牛宏,牛宏!牛宏来了没有?”游刚恼怒地扫视着会场。

“来了,来了。”崔芬拉下耳塞,急忙站了起来。

“你是牛宏吗?!简直是胡来!”

会场上爆发出一阵哄笑,各基层店的经理、副经理们非常开心。有些人私下向游经理的耳朵里灌了不少关于春城饭店的坏话,根据老头子的神色、说话的腔调,可以断定今天有好戏可看了。

崔芬满脸通红,急忙解释:“牛经理没有空,我是这个季度的开会代表。”

“哈哈,春城饭店尽是新鲜事,还有专门来开会的代表!”

“老经理,这个经验不错,应该大力推广。我回去也选个开会代表,得省去我多少事!”

“对,大家都这么办,以后公司再开会别找经理,找开会代表就行了。”

“哈哈……”

这些有身份的老年人、中年人,当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和一群普通的职工并没有两样。特别是当他们心里有了某种情绪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身份高、胆子大,有恃无恐,其表现并不比一般的群众更文明、更高雅、更有水平。

崔芬感到恐慌,手足无措,走也不好,留也不好,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游刚强压住火气:“开会代表算个什么职务?谁承认你?公司召开的是各分店的经理会议,且不说你该不该进来,你即便坐在这儿,能做得了牛宏的主吗?”

“牛经理说了,谁当开会代表就有权对饭店的事做主,实在主不了的事,再回去商量。不是我自己要来的,是大家选的。游经理,您不必把公司的会说得那么神秘,那么高级,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当这份代表,给头等奖都不干,这是受洋罪的事!”崔芬也不是两年前那个受气包了,生完小孩儿以后的那一段邋遢时期已经过去了。身子早就恢复起来了,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牛宏去了以后她心气顺畅,干活拔尖,敢跟任何人比。当过劳动模范,在工作上到底

有几乎真功夫。做人没有短儿,就不甘忍受别人随意的欺侮了。她冲着公司经理甩完几句冷腔,提起小包掉头就走。

游刚有个毛病,一向对女人都比较客气,还喜欢和她们开个玩笑。他放缓了口气:“小崔,你回去马上叫牛宏来。不,等你回去就来不及了,你在公司先给他挂个电话,叫他立刻来!”

“我管不着,你们自己通知他吧。”崔芬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公司的小礼堂。

“嘢,好家伙,春城饭店的人一个个都这么横!”

“老经理也是吃软怕硬,对我们有能耐,对牛宏毫无办法,连牛宏手下的人这样当众顶撞他,他也只好吃下去。”

游刚虽然没有全部听清中层干部们的小声议论,可是他猜到了,发过这种议论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一次两次。牛宏成了他最大的障碍,管不了牛宏,往后他就当不好这个饮食公司的经理。他叫手下的干部给春城饭店接通了电话,游刚拿过话筒:

“你是牛经理吗?”他打起了官腔,“我是游刚,你为什么不到公司来开会?”

“我们的代表没去吗?”

“什么代表不代表,公司不承认,我打发她回去了。今天召集的是基层店经理会议。”

“在我们店没有副经理,没有支部书记的情况下,由大家推选出来的开会代表,就可以行使副经理的职权,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而且我认为是个很不错的办法。您不应打发崔芬同志回来,伤害我们选出来的代表。”

“公司是叫你来开会,不是叫你再派个替死鬼来!”

“替死鬼?你认为开会是和死同样难受吗?”

“你不要胡扯,小崔能把公司的精神带回去吗?能代替你进行传达贯彻吗?”

“完全能够,这本来就是开会代表的事情。何况我们还专门买了个开会用的录音机,可以把会议内容全部录下来,回来播放。”

“别提你那个录音机了,开会的时候她插上耳塞听音乐。”

“这只能怪会议的内容不能吸引她。”

游刚受不了牛宏这种不慌不忙、冷静沉着的腔调,他提高了声音:“你不要胡搅蛮缠,立刻到公司来!”

“对不起,我被工作缠住了,实在走不开。”

“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还承认不承认公司是你的上级?”

“我都承认,而且还承认公司党委派我到春城饭店来主要任务是把饭店搞好,并不是光为公司服务,每会必到。”

“你不了解上级精神,能把饭店搞好吗?工作要干,会也得开!”

“我一个人顾不了两头儿,远的不说,就说这个月,打击经济犯罪每周学习两天,学习新宪法集中讨论三天,讨论买国库券儿的意义每周两个半天,机构改革每周—三五下午,主人翁教育每周半天,还有计划生育,节水节电,五讲四美,新事新办,口号无穷,会议不断,经理同志,你算算,还给我们留下多少干工作的时间?”

不能再这样一句对一句地丁当下去了,游刚说:“我通知你了,来不来看看着办吧!”

他用力地挂上了电话,回到小礼堂却极力装得心平气和,对大家说:“牛宏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到,我们先议着。现在时兴民主,公司也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然后就改革机构,党委改选。我把手工作报告的草稿早就印发给你们了,今天就是征求你们对这个报告的意见……”

“老经理,咱们公司有十几年没盖房了吧?职工意见很大。”

负责基建的沈副经理把话接过来:“盖不了房,没有钱!”

“有人反映春城饭店的职工每人分了一套新房,可有这事?”

“那是附近一个小研究所盖房,研究所里要房的人不是很多,牛宏出了一半钱,盖好的楼房就分给他一半。”

“嘿,牛宏哪儿来的钱?”

“这你得去问他。”

“春城既然有钱,公司为什么不调上来?”

“凭什么?他各项指标都完成了,而且都有点超额,该缴的全缴了,你凭什么调人家的钱?”沈副经理也是一脑门官司,“别说调,我找他借都不借给我,他说——你们正副经理加起来够一打,都找我借钱我应付不过来。你们商量好了,由一个人出面跟我谈。你们赚了钱就盖房,赚不来钱拉倒!”

“牛宏这小子也太狂了!”

负责生产的陶副经理一向支持牛宏,慢条斯理地说:“这不能怪牛宏狂,只能怪我们这些人太无能了。又连续三个月没有完成利润指标,元旦、春节,这是我们饮食行业的黄金季节,你们各个饭馆却赚不上钱来。叫公司怎么办?”

“你们把奖金都卡死了,每月不许超过八元,下边的人谁还干!”

游刚摇摇头:“这是市里的精神。”

“得了吧老经理,你就会唬我们,整治老实人,你的文件下去有半年了,春城饭店的奖金根本就没改,上个月每人还发了将近四十元。我的职工都不干了,哭着喊着要去春城当服务员,现在的人们谁不见钱眼开?哪儿给钱多就愿意往哪儿去。你们公司的头头要搞一个章程,别搞两套,别像广东跟深圳似的把春城办成个特区。要管都管,要不管就都别管,不能管得了的管,管不了的不管。搞邪门

歪道很容易,光为了捞钱谁都会!”

“牛宏能干,为什么不叫他到公司当经理?破格提拔嘛!”

……

大家攻击的目标不约而同又对准了春城饭店。牛宏——这个害群之马!如果没有他,大家都平平安安地各在自己的小单位当官坐天下,吃官饭,干官事,坐山为王。有了他就打破了平衡,破坏了安静。这小子好像灵机一动就把别人都超过了。有了差距群众就会比较,就会要求向高的看齐,就会对“当官坐天下”的干部产生不满意。说买卖话,牛宏这叫砸了别人的饭碗。说干部话,牛宏这叫破坏了别人的官运。怎能不叫这些中层干部们发火呢?他们一是学不了牛宏,不能冒那个风险,干工作可不能把身家性命都搭上。二是能学也不学,学牛宏岂不太栽跟头、大失身份!他们根本就瞧不起牛宏那一套。因此他们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咒骂牛宏,把他骂倒,骂臭,骂垮!恢复全公司的平静。

游刚被吵得耳根子发疼,头脑发昏。大家有的真生气,有的假生气,无法引导,又不能清理出几条像样的意见,会议在争吵中开始,在争吵中结束。大家对公司的意见集中在春城饭店和牛宏的身上。牛宏成了扎在游刚嗓子眼儿里的一根鱼刺,如果承认他这一套是对的,那么游刚经营饮食公司的那一套就全错了。这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不解决牛宏的问题,游刚就要得罪一大批自己的老部下,这对他在党委改选和机构改革中的地位是大有妨害的。因为他还不想引退,还不想撒手闭眼。他似乎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办,各种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强烈了。年轻时开玩笑,说能活六十岁就满足了,现在活到了六十六岁,却很满足。

吃过午饭,游刚坐车来到了春城饭店。牛宏和饭店的职工们不可能不认识他的小汽车,认不得汽车也认得人,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打招呼,这使游刚心里好生不快,他到其他基层店去都不会碰到这样的冷遇。他走下汽车,看见饭店门前还停着三辆小轿车,心里为之一动:坐小汽车的人物还有到这儿来吃饭的?难怪这个店的人都这样大气哩!

游刚正要推门而进,门却自动开了,穿着笔挺的邱二宝迎上前来,口齿伶俐地说:“经理同志,您好!是视察,还是吃饭?要视察请到经理室暂坐,要吃饭请到楼上雅座,只剩下五个外国客人还没吃完。”

“我找牛宏。”

“牛经理正给待业青年讲课,您请到经理室稍坐,我去叫他。”

这不就是邱傻子吗?完全像换了一个人。虽然有一点装模作样,但比过去那种浑身野气、满嘴粗话要强多了,待人大方,彬彬有礼。凡是认识游刚的服务员们,都过来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再去忙自己的工作。虽然不是一群一伙地围着

他,说着讨好的笑话,仰着巴结的媚脸,但都很懂礼貌。游刚不经常到这儿来,每次一次都发现一些新的变化。牛宏这小子倒真有一些怪招,把手底下的这帮人玩得花花转,他好像有一种善于驾驭人的特殊的力量。

按理说,一个大公无私的经理,或者是一个资本家的经理,看到下边的基层店办成这个样子都应当高兴。可是游经理不仅不高兴,反而觉得不舒服,心里不是滋味。他想的是什么呢?既不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功”,又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钱”,然而他确实又是吃我们的大锅饭活着的。

游刚没有到牛宏的办公室去,他在一楼的各个房间里转着,有时亲切地和职工交谈几句,有时则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使人摸不清他是为什么事情来的。只有崔芬心里多少明白一点,他很可能是为牛宏没能参加公司召开的会议而来。因此崔芬在打扫餐厅的时候故意把电镀铁椅子弄得乒乒乱响,碗筷哗啦啦,连走路也像旋风一样带着一股火气,脚步咚咚响。孙连香听说游经理来了,从洗碗间出来,鞍前马后围着游刚转,主动介绍饭店的情况。

游刚问:“牛宏给待业青年讲什么课?”

孙连香说:“唉,别提了,我们饭店赚了点钱,他被这点钱烧得难受,拿出来投资、办代销点,就像我们的分店一样,卖我们的产品,打我们的旗号。他就不想想待业青年有几个是好小子,赔了钱、砸了招牌,职工有意见,牛宏也被缠得拔不出腿来了!”

“你们店敢私自向外投资?”

孙连香放低声音:“牛宏是个贼大胆,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她突然又收住话头,因为牛宏已经朝这边走过来了

牛宏脸色很难看,显然也是闷着一肚子火气。但不是因为游刚来到饭店兴师问罪,他是生自己的气,恨自己无能。饭店越办摊子越大,问题更复杂,困难更多,比他的估计还要复杂十倍、困难十倍,他处处感到力不从心,智穷才尽。更为可悲的是人心从不满足,大了还想大,好了还想好,大概只有天才才会把握时机,急流勇退,见好就收。

“游经理,叫您久等了,真抱歉!”

“你架子大,请不动你,我只好上门来看你。”

牛宏的脸刷一下涨得通红:“到办公室坐吧。”

游刚故意装得很随便,一屁股坐在电镀椅子上:“这儿不挺好吗?清静,凉快。”

“游经理,你们谈吧,我去刷碗。”孙连香识趣地走了。

“牛宏同志,你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吗?”游刚亮开了架势,打起了官腔。

牛宏望着自己的上司没有搭腔。他不能说没有意见,可也不想在这种时候

向游刚提什么意见,对方的神色显然也不是征求意见来的。这几乎是我们队伍里的一种惯例,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问题之前,总要先打官腔,他控制着自己,忍受着这可恶的官腔。

“有意见就敞开谈嘛!”

牛宏本想说:现在的时间、地点、心情都不适宜交换意见。可话到嘴边也变成了一句官腔:“没有。”

他只有也打官腔,才能引出对方要说的话。

“那为什么公司召集会议你不参加呀?”

“我在电话里已经跟您说清楚了。”

“噢……听说你们店把赚来的钱又拿到外面去投资?”

“有这回事。我们不能像过去的土财主一样,把赚来的钱放在瓦罐里,再埋到地下藏起来。应该让钱生钱,钱变钱,我把饭店看做是活细胞,而不是死砖头。”

“先不说这样做是对是错,你不觉得在办这件事之前应该跟公司打个招呼吗?”

“跟公司打招呼当然也可以,可是并没有一种条文规定非打招呼不可。如果我事前请示公司,十有八九会办不成,公司会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无限期地拖下去,因为谁批示同意,将来出了问题就要担一部分责任,哪个领导愿意冒这种风险呢?我自己决定,出了问题由我自己负责,公司领导可以理直气壮地当批评者,这正是我对公司领导的爱护和体贴。”他的话很对,但说得太损了!

游刚一开始想漫天撒网,不让牛宏摸着自己此行的真实目的:“全国正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你们店的进展如何?”

“打击的是犯罪活动,我们这里没有。有人多吃几口,小拿小摸,还称不上是坏人。”

“你们这里没有?财贸、饮食行业成天和钱粮物打交道,是重点,你敢打保票?”

“我是经理,当然敢打保票!”

“你好像对上级派下来的中心任务有一股对立情绪!”

“不是对立,而是要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管单位大小,当一个领导要是以上级的脑子当作自己的脑子,那是最危险的!”

游刚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这么说你可以不要上级领导,不听党的指挥了?”

“游经理,你不要用这么大的帽子吓唬我,我这个人可胆小。我的意思是说,基层店的小经理不能老跟着公司大经理的屁股转。今儿个您说东,我们向东;明儿个您说西,我们向西;后天您又说东,我们再向东;大后天您又说西,我们返回

去。这受得了吗？”

“我是大草包、大笨蛋、瞎指挥？你要拿出证据来！”

“您不要生这么大的气，我没说这种话。七九年您说可以多发加班费，八〇年又下令一分钱的加班费也不许发。八〇年规定奖金随便发，去年又说奖金不许冒顶，最多不许超过八元钱。您指挥小经理是很容易的，可小经理再去指挥群众就不那么容易了。政策没有个连续性，没有个永久性，怎么取得群众的信赖？领导不能老是左右打自己的嘴巴！”

牛宏深深地刺伤了游刚的自尊心。饮食公司的老人跟游刚说话心里都有个界限：不能触犯老经理的权力、尊严。资格老的人最忌恨别人瞧不起他，牛宏恰恰给自己的上级造成了这种印象。

“好吧，你既然谈起了奖金，咱就把话说明吧。从下月起，你们店的奖金也必须按公司的统一规定改过来。这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根据市里精神，党委讨论通过的。”

“我不能执行这个规定，那样会破坏职工的情绪，失去群众的信任。表面上看国家是节省了几千元的奖金，实际上国家将要损失几万、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公司只应该按八项指标考核我，我保证每一项指标都不会低于同规模的饭店。至于怎样办饭店，请不要干涉太多。”

“什么？什么？这是国家的饭店，不是你私人的买卖！”

“您叫我当这个饭店的经理，我就要按自己的想法干！”

“好啊，你也太狂妄了！从现在起我撤掉你的经理职务，写出检查再说！”

“什么？这可是您说的？将来可别赖账？谢谢您把我解脱了。”牛宏突然给游刚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站直身转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对游刚说：

“实话对您说，从一上任那天起，我就不想当个完人，不想当个让您满意的人。像斯大林那样的大人物还三七开哪，我是个凡夫俗子，只要五五开就行！但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群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责任。再见！”

邱二宝躲在屏风后面偷听了这场谈话的全部内容，当他感到形势不妙，跑到后面把石心菊和长寿眉师傅找来，两个经理全不在了。

这才叫真戏假唱，弄假成真。下一章请看——

话不投机也要谈

公司党委书记钟警深在楼道里碰上了赵永利，十分高兴地喊住了他：“小赵，你来得正是时候，赶紧坐我的汽车回春城饭店，把你们店的共产党员和会计都叫到公司里来，要让会计带上这两年来你们店的全部账目。快去快回，我等你

们。”

赵永利心里暗吃一惊,知道事情有变,却又不便多问。他只好掉头往楼下跑。

钟警深路过财务科的时候又叫上了总会计师杨森,这个老头儿白发白眉,却脸色红润,精神矍铄,一副老派知识分子的味道。两个人走进党委书记的办公室,钟警深请老会计坐下。

“杨总,春城饭店的账目是您亲自核对的吗?”

“是的。”

“没有发现什么漏洞?”

“绝无差错,他们的会计和账目是全公司最出色的。”

“您不要把话说得太绝对,您看,他们饭店还出了这样一个账本——”钟警深把孙连香那个小账本递给了总会计师。

杨总感到很新鲜,摘掉眼镜,认真看了一会儿,哈哈笑了:“这是黑账本、小报告,不是正大光明的人所为,不足为凭。”说着一扬手,把那个账本扔到党委书记的办公桌上,不屑地耸耸眉毛,重新戴上眼镜。

“杨总,不要小瞧这个黑账本,它记载的两笔账值得注意,一是修地板,二是安装锅炉,牛宏都是请私人干的,私人哪来的发票呢?没有发票怎能报账呢?倘若牛宏用白条报账,这难道不是漏洞吗?怎能证明他清白呢?”……

“等等,让我想想。”杨总把雪白的头发向后抹了抹,好像他的记忆和智慧都储存在头发里,用手抹上两抹,记忆的大门就开了,智慧就放出了火花,“对,有这回事。我查账的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两张白条,而且找沈副经理核对过。春城饭店基建没有收尾,牛宏去了以后找公司要钱,公司的基建费早就花光了,沈副经理叫他自己想办法。每张白条上都写着承包人的姓名、地址、过去的单位和职业以及他们的签字盖章,联系人、主办人盖章,还附有正式的合同书,最后经牛宏和沈副经理的签字才能上账。无懈可击,无懈可击。”

“唔……”

游刚推门走进来,他早就看见钟警深已经和桑原蓁谈过话回来了,他想知道谈话的结果,还想知道老钟对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那份报告的态度,他等着钟警深找自己。可是从上午等到吃午饭、吃过午饭又等到下午上班老半天,还不见党委书记的动静,他沉不住气了,不能再傻等下去了,主动找到钟警深的屋里看看虚实。钟警深让他坐下,把老孙的报告和孙连香的账本都递给他:

“你来得正好,先看看这个。”

游刚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又把这两样东西草草翻了一遍,然后用一种夸大了的口气说:“这就严重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也变了。你的意见哪?派不派工作

组？”

杨总抬起眼睛，用莫名其妙的目光望着游刚。

钟警深说：“我刚才征求了一下杨总的意见，他核对过事实，好像并不像孙连香的账本上记载的那样。是吗，杨总？”

“首先是没有问题，因此，‘性质’、‘严重’之类的话根本用不上。”

在杨总说话的时候，钟警深又给沈副经理打了个电话，叫他马上来一趟。他手里的话筒还没有放下就响起了敲门声，杨总起身拉开门，门口站着赵永利、崔芬和抱着一个大皮包的石心菊：“啊，请进！”

杨总格外喜欢自己的小同行，拉着石心菊坐在自己身边的沙发上。这时候沈副经理也脚挨脚地进来了。

钟警深说：“因为事情紧急，来不及提前打招呼就把大家找来了。有人告牛宏同志有经济问题，我想核实一下……”

春城饭店的三个人心里都吓了一跳，虽然他们不相信牛宏会有问题，可是闹不清发难者的来头有多大。

党委书记那钩子似的目光看着他们三个：“小石同志是会计，当然要介绍真实的情况，赵永利、崔芬两个同志是共产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如实地反映情况……”

杨总把孙连香的账本递给他们三个，崔芬看了两页就气得叫了起来：“这是孙连香记的，她一贯爱整别人的黑材料，全是诬蔑！”

钟警深严肃地说：“崔芬同志，你要以党性保证，不对群众讲出这件事，不准对孙连香同志进行报复。”

“哼，这个害人精！”

石心菊心里的一块石头反倒落地了，她坦然地打开账本，取出那两张白条，从从容容地说：“牛经理提出我们饭店的二、三楼改成雅座，铺人字形木地板，又好看又结实，找到国营安装公司，他们提出要等一年之后再说，安装费七千元。由我们店的李师傅介绍了三个退休老木工，每人每天给十元钱，中午由饭店管吃，干了七天就完成了，总共花了三百六十元。每天中午陪着吃饭的是李师傅，牛经理只抓质量和进度，从来不陪吃陪喝。安装锅炉也是一样，邱二宝的父亲是发电厂的副厂长，他给我们找了五个安装工人，管了一天饭，每人发了十元钱，当天就把锅炉安装好了。”她说完就把白条递给党委书记。

沈副经理肝火很旺地插了一句：“这事我都知道，真是没病找病，有这个工夫干点正事不好嘛！”

赵永利说：“但是孙连香记的那两句话——找国营不如找集体，找集体不如找私人，这是真的。牛宏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先干后讲，或者只干不讲，一说

走嘴就被人抓住了,不如闷头干出成果来,用成果说话就有说服力。我认为牛宏已经是一位非常成熟的基层店的经理了。”

钟警深说:“好吧,你们三位同志先到杨总会计师的办公室里等一下,我也许还有事情要找你们。”

赵永利他们三个人退了出来,也迫不及待地想议论一下孙连香的账本,商量以后怎样提防这个人,怎样提醒牛宏知道孙连香的底细。他们声音很低,却无不咬牙切齿。

钟警深打破惯例,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查证牛宏的经济问题,孙连香写的黑材料,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送来的报告全不攻自破,往春城饭店派工作组一事连商量的价值都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堵住游刚的嘴,不让他再节外生枝,按自己想好的办法赶快解决“牛宏事件”。他说:“老游,你说怎么办?”

游刚闷头抽烟,没有吭声。

“我们姿态越高就越主动,最好你亲自找牛宏谈一下,承担责任,叫他明天回春城上班。”

杨总说:“应该如此,应该如此。”

沈副经理说:“什么事都是开场容易收场难,越拖越被动,现在大家的闲话太多了,有人说牛宏可能要留在公司当经理……”

游刚心头一颤,还是沉住气不吭声。

钟警深又将了一军:“你实在不愿意谈,只好由我代表党委出面了。”

“好吧,我去谈!”游刚掐灭了烟头,站起身来。

钟警深说:“稍等一下,我还有个建议,春城饭店不能再让牛宏一个人跳独角舞了,让他们单独成立支部,由赵永利担任支部书记,他是从部队下来的三等功臣,很有点政治头脑。然后再给他们派一个,或者干脆叫他们自己再选一个副经理。你看行不行?倘若你没有意见,就只管去找牛宏谈话,我召集常委们碰一下头,如果大家都同意,立刻就办。”

此时此景游刚又能说什么话?他只能表示同意:“好吧,我没意见!”

他走出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想好好考虑一下怎样对牛宏开口。可是脑子发胀、发麻,零件似乎全部失灵了,无法考虑正事。老钟的办公室和他的办公室只隔着几步远,容不得想出眉目他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门前,不能再“三过其门而不入”了,他推门进去,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这回该轮上牛宏不抬眼皮了,他明明知道进来的是谁,却装作没看见,嘴里哼着小曲儿,专心地摆弄一台很小的收录两用机,他的兴致倒蛮高!一见牛宏这副神态,游刚的心里就气得冒烟。但又不能发作,忍了忍气,用不着拐弯抹角,谁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干脆直话直说吧。

“牛宏同志,看来我得向你赔礼道歉哪!”

“游经理,这是从何说起?”牛宏抬起头望着游刚,这小子不动声色,装傻卖呆,实在不好斗。

“我们都不要装假了。没经党委研究我就撤掉了你的职务,不符合组织手续,是无效的,你应该回去上班,继续工作。”姜是老的辣,他不提牛宏有没有问题,也不说自己私自撤掉牛宏的职务是错误的,只说“不符合组织手续”,这就给将来翻案留了退身步。

牛宏毕竟年轻,没有听出来,只顾往外放气:“不论大小,我也是公司任命的春城饭店的经理,就那么不值钱,你舌头一动,说撤就撤,叫回去就回去?”

牛宏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游刚,神色不恼也不笑。他年纪轻轻不知从哪儿学得这么沉得住气!

“好吧,谁叫您是公司的领导呢?我们的老前辈。今天能主动向我赔礼道歉已经很难得了,但也应该有个仪式。您撤掉我职务的时候,我给您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现在您要恢复我的职务,也得向我还一个礼吧!”

“你——”游刚的老脸憋得通红,他凭什么要受这个小鬼崽子的耍笑和侮辱?可又无言以对。

“哈哈……游经理,架子放不下来,脸面拉不开,是吗?可是别人一旦触犯了您的尊严,就丝毫不顾及别人的脸面了。动不动就说‘我撤你的职’!这个公司要是您私人开的买卖就可以这样干,您撤了谁的职,谁就得失业、挨饿,那撤职才有威胁力量。现在咱们吃的是大锅饭,您又最欣赏这一套,因为这一套可以省心省力省麻烦,保官保命保职权,在您的领导方法里除去私心,还有多少是您自己的东西?我不过是想在大锅饭里多少搞一点小灶,就惹得您暴跳如雷。别忘了吃大锅饭是不怕撤职的,您说‘我撤你的职’,就如同说‘我叫你去休养’一样。今天您又找我来,显然是想结束我的休养期啦……”

牛宏一席话东盘西绕,连挖苦带损,说得游经理走也不好,留也不好,恼又恼不得,气又气不得。

牛宏这下可出了气啦,杀人不过头点地,他立刻改换成一副谈工作的严肃认真的口气:“好吧,您既然把话说到这里,明天一早我就回春城饭店上班,回去后先开两个会,一个是春城饭店的全体职工座谈会,一个是春城里居民代表座谈会,题目是一个:春城饭店今后应该怎么办?请您务必参加。”

游刚不知道牛宏这是又搞什么鬼,闹不好这两个会就会开成对游刚的批判会,牛宏手下的那帮小青年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可是身为公司的经理,拒绝参加这样的会是说不过去的,他只好答应下来:“好,我去。”

“还有,我把今天咱俩的谈话录了音,我想您是不会反对的。”

游刚怔住了，桌上那个不起眼的收录机的磁带果然还在轻轻地旋转着。他心里怒气往上攻，为了不发作出来，没有答理牛宏，径直走出了办公室。

这都是：开场像一次玩笑，结束也像一场笑话。最后请看——

尾声——生活不会给人以大团圆的结局

当牛宏走出饮食公司的办公大楼，看见赵永利、崔芬、石心菊正站在对面的马路边上等他。他紧走几步，握住了赵永利伸出的手：

“赵书记，我是先表示欢迎你哪，还是先感谢你？”

“你就把这一套全免了吧！我只希望你经过这次事件不要把锐气都磨没了。”

“你和崔芬先回饭店布置明天那两个会，我跟石心菊再去办点别的事。”

赵永利一怔，然后转身冲着石心菊偷偷地挤挤眼：“那好吧，我们先走了。”

牛宏接过石心菊的大皮包，扶了一下她的胳膊，两个人信步沿着大街往前走。

“你叫我跟着办什么事？”石心菊问了一声。

“到南京理发店给你烫头，保证好看！”牛宏不敢看石心菊的眼睛。

石心菊停住了脚步：“哎呀，这算什么事，我是不烫头的，谢谢你的好意，我回饭店去了。”

“等等。”牛宏拉住了小石，“试试嘛，烫完了要好看呢，就留着，不好看再改过来。”

“脸长得不好看，单是把头发烫成花有什么用！”

“你的脸也很好看，甚至可以说很漂亮。”牛宏已经慌不择话，不知说什么好。

“牛经理，你今天是怎么啦？这明明是假话，叫人多不好意思，你不嫌肉麻？”

牛宏心里更慌了，石心菊是个实实在在的姑娘，不应该跟她说假话，改口说：“对，你是不漂亮，也可以说比较丑，可是我喜欢你，看你好……”

“你说的什么呀！”石心菊快步向前走去，离开了牛宏。

牛宏以为是小石听自己表白了心意，感到害羞，他又追上去，小声说：“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石心菊也低低地说：“我早就和赵永利订婚了。”

牛宏怔住了，满脸通红，又羞又愧：“我该死！我实在不知道，对不起！”

石心菊非常可怜他：“满凤哪？”

“我被撤职以后就散了。你和永利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

牛宏把皮包塞给石心菊，掉头跑了。

石心菊站在大街上，怔怔地望着牛宏远去的背影。

美食家

● 陆文夫

一、吃喝小引

美食家这个名称很好听,读起来还真有点美味!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不妙了:一个十分好吃的人。

好吃还能成家!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想到的事情往往不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常常就在身边;硬是有那么一个因好吃而成家的人,像怪影似的在我的身边晃荡了四十年。我藐视他,憎恨他,反对他,弄到后来我一无所长,他却因好吃成精而被封为美食家!

首先得声明,我决不一般地反对吃喝;如果我自幼便反对吃喝的话,那末,当我呱呱坠地之时,也就是一命呜呼之日了,反不得的。可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是讲究勤劳朴实,生活节俭,好吃历来就遭到反对。母亲对孩子从小便进行“反好吃”的教育,虽然那教育总是以责骂的形式出现:“好吃鬼,没有出息!”好吃成鬼,而且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羞孩子的时候,总是用手指刮着自己的脸皮,“不要脸,馋痨坏;馋痨坏,不要脸!”因此怕羞的姑娘从来不敢在马路上啃大饼油条,戏台上的小姐饮酒时总是用水袖遮起来的。我从小便接受了此种“反好吃”的教育,因此对饕餮之徒总有点瞧不起。特别是碰上那个自幼好吃,如今成“家”的朱自治以后,见到了好吃的人便像醋滴在鼻子里。

朱自治是个资本家,地地道道的资本家,决不是错划的。有人说资本家比地主强,他们有文化,懂技术,懂得经营管理。这话我也同意。可这朱自治却是个例外,他是房屋资本家,我们这条巷子里的房屋差不多全是他的。他剥削别人没有任何技术,只消说三个字:“收房钱!”甚至连这三个字也用不着说,因为那收房钱的事儿自有经纪人代理。房屋资本家大概总懂得营造术吧,这门技术对社会也是很有用的。朱自治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连自家究竟有多少房屋,

坐落在哪里,都是稀里糊涂的。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很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抗日战争之前在上海开房地产交易所,家住在上海,却在苏州买下了偌大的家私。抗日战争之初,一个炸弹落在他家的屋顶上,全家有一幸免,那就是朱自治,他是到苏州的外婆家来吃喜酒的。朱自治因好吃而幸存一命,所以不好吃便难以生存。

我认识朱自治的时候,他已经快到三十岁。别以为好吃的人都是胖子,不对,朱自治那时瘦得像根柳条枝儿似的。也许是他觉得自己太瘦,所以才时时刻刻感到没有吃够,真正胖得不能动弹的人,倒是不敢多吃的。好吃的人总是顾嘴不顾身,这话却有点道理。尽管朱自治有足够的钱来顾嘴又顾身,可他对穿着一事毫无兴趣。整年穿着半新不旧的长袍大褂,都是从估衣店里买来的;买来以后便穿上身,脱下来的脏衣服却“忘记”在澡堂里。听说他也曾结过婚,但是他的身边没有孩子,也没有女人。只有一次,看见他和一个妖冶的女人合坐一辆三轮车在虎丘道上兜风,后来才知道,那女人是雇不到车,请求顺带的,朱自治也毫不客气地叫那女人付掉一半车钱。

朱自治在上海的家没有了,独自住在苏州的一座房子里。这房子是二十年代末期的建筑,西式的,有纱门、纱窗和地毯,还有全套的卫生设备。晒台上有两个大水箱,水是用电泵从井里抽上来的。这座两层楼的小洋房坐落在一个大天井的后面,前面是一排六间的平房;门堂、厨房、马达间、贮藏室以及佣人的住所都在这里。

因为我的姨妈和朱自治的姑妈是表姐妹,所以在抗战后期,在我的父亲谢世之后,便搬进朱自治的住宅,住在前面的平房里。不出房钱,尽两个义务:一是兼作朱自治的守门人,二是要我的妈妈帮助朱自治料理点家务。这两个义务都很轻松,朱自治早出晚归,有家没务,从来也不要求我妈妈帮他干什么。倒是我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要帮他拆洗被褥,扫扫灰尘,打开窗户。他不仅不欢迎,反而觉得不胜其烦,多此一举。因为家在他的概念中仅仅是一张床铺,当他上铺的时候已经酒足饭饱,靠上枕头便打呼噜。

朱自治起得很早,睡懒觉倒是与他无缘,因为他的肠胃到时便会蠕动,准确得和闹钟差不多。眼睛一睁,他的头脑里便跳出一个念头:“快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这句话需要作一点讲解,否则的话只有苏州人,或者是只有苏州的中老年人才懂,其余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诱惑力。

那时候,苏州有一家出名的面店叫做朱鸿兴,如今还开设在怡园的对面。至于朱鸿兴都有哪许多花式面点,如何美味等等我都不交代了,食谱里都有,算不了稀奇,只想把其中的吃法交代几笔。吃还有什么吃法吗?有的。同样的一碗面,各自都有不同的吃法,美食家对此是颇有研究的。比如说你向朱鸿兴的店堂里

一坐：“喂！（那时不叫同志）来一碗××面。”跑堂的稍许一顿，跟着便大声叫喊：“来哉，××面一碗。”那跑堂的为什么要稍许一顿呢，他是在等待你吩咐吃法的——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面；重青（多放蒜叶），免青（不要放蒜叶），重油（多放点油），清淡点（少放油），重面轻浇（面多些，浇头少点），重浇轻面（浇头多，面少点），过桥——浇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要放在另外的一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筷子撩过来，好像是通过一顶石拱桥才跑到你嘴里……如果是朱自治向朱鸿兴的店堂里一坐，你就会听见那跑堂的喊出一大片：“来哉，清炒虾仁一碗，要宽汤、重青，重浇要过桥，硬点！”

一碗面的吃法已经叫人眼花缭乱了，朱自治却认为这些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吃“头汤面”。千碗面，一锅汤。如果下到一干碗的话，那面汤就糊了，下出来的面就不那么清爽、滑溜，而且有一股面汤气。朱自治如果吃下一碗有面汤气的面，他会整天精神不振，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不如意。所以他不能像奥勃洛摩夫那样躺着不起床，必须擦黑起身，匆匆盥洗，赶上朱鸿兴的头汤面。吃的艺术和其他的艺术相同，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时空关系。

朱自治揉着眼睛出大门的时候，那个拉包月的阿二已经把黄包车拖到了门口。朱自治大模大样地向车上一坐，头这么一歪，脚这么一踩，叮当一阵铃响，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吃罢以后再坐上阿二的黄包车，到阊门石路去蹲茶楼。

苏州的茶馆到处有，那朱自治为什么独独要到阊门石路去呢？有考究。那月大茶楼上有几个和一般茶客隔开的房间，摆着红木桌、大藤椅，自成一个小天地。那里的水是天落水，茶叶是直接洞庭东山买来的；煮水用瓦罐，燃料用松枝，茶要泡在宜兴出产的紫砂壶里。吃喝吃喝，吃与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凡是称得上美食家的人，无一不是陆羽和杜康的徒弟。

朱自治登上茶楼之后，他的吃友们便陆续到齐。美食家们除掉早点之外，决不能单独行动，最少不能少于四个，最多不得超过八人，因为苏州菜有它一套完整的结构。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冷盆，接下来是热炒，热炒之后是甜食，甜食的后面是大菜，大菜的后面是点心，最后以一盆大汤作总结。这台完整的戏剧一个人不能看，只看一幕又不能领略其中的含意。所以美食家们必须集体行动。先坐在茶楼上回味昨天的美食，评论得失，第一阶段是个漫谈会。会议一结束便要转入正题，为了慎重起见，还不得不抽出一段时间来讨论今日向何方？是到新聚丰、义昌福，还是到松鹤楼。如果这些地方都吃腻了，他们也结伴远行，每人雇上一辆黄包车，或者是四人合乘一辆马车，浩浩荡荡，马蹄声碎，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去吃鲃肺汤，枫桥镇上吃大面，或者是到常熟去吃叫花子鸡……可惜我不能把苏州和它近郊的美食写得太多，深怕会因此而为苏州招来更多的会议，小说的副作用往往难以料及。

二、与我有涉

如果朱自冶仅仅自我吃喝而与我无关的话，我也不会那么强烈地厌恶他。他当他的美食家，我当我的穷学生，本来是能够平安相处的。可是我在前面的一节中只说到朱自冶吃早点，吃中饭，他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哪！

朱自冶吃罢中饭以后，便进澡堂去了。他进澡堂并不完全是为了洗澡，主要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去消化那一顿丰盛的筵席，俗话说饿了打瞌睡，吃饱跑勿动。朱自冶饱食一顿之后双脚沉重，头脑昏迷，沉浸在一种满足、舒畅而又懒洋洋的神仙境界里。他摇摇晃晃地坐上阿二的黄包车，一阵风似的拉到澡堂里，好像是到医院里挂急诊似的。

朱自冶进澡堂只有举手之劳，即伸出手来撩开门帘。门帘一掀，那坐账台的便高声大喊：“朱经理来哉！”天晓得，朱自冶哪一天当过经理的，对资本家应该喊一声老板才对。不过，老板这种尊称那时已经不时髦了。一是缺少点洋味，二是老板有大有小，开月夫妻老婆店也能叫做老板的。经理就不同了，洋行经理，公司经理，买卖大，手面广，给起小费来绝不是三块两块的，五十元的关金券用不着找零头！所以那跑堂的一听到朱经理来哉，立刻有两个人应声而出，一边一个，几乎是把个朱自冶抬到头等房间里。这头等房间也和现在的高级招待所有点相似，两张铺位，一个搪瓷澡盆，有洗脸池，有莲蓬头。只是整个的面积较小，也没有空调设备。不碍，冬天有蒸气，夏天有一只华生老牌的大吊扇，四块木板在头顶上旋个不歇。

朱自冶向房间里一坐，就像重病号到了病房里，一切都用不着自己动手。跑堂的来献茶，擦背的来放水，甚至连脱鞋也用不着自己费力。朱自冶也不愿费力，痴痴呆呆地集中力量来对付那只胃，他觉得吃是一种享受，可那消化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美，必须潜心地体会，不能被外界的事物来分散注意力。集中精力最好的方法是泡在温水里，这时候四大皆空，万念俱寂，只觉得那胃在轻轻地蠕动，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甜美，这和品尝美食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他就这么四肢不动，两眼半闭地先在澡盆里泡上半个钟头。泡得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时候，那擦背的背着一块大木板进来了。他把朱自冶从澡盆里拉出来，把木板向澡盆上一盖，叫朱自冶躺上“手术台”，开始了他那擦背的作业。读者诸君切不可把擦背二字作狭义的理解，好像擦背就是替人擦洗身上的污垢。不对，朱自冶天天一把澡，有什么可擦的？这擦背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种古老的按摩术，是被动式的运动。饭后百步走被认为是长寿之道，但是奉行此道者需要自己迈开双腿。擦背则不同，只消四肢松弛地躺在“手术台”上，任人上摩

下擦,伸拳屈腿,左转右侧,放倒扶起,同样收到运动的功效,却用不着自己花力气。真正的美食家必须精通消化术,如果来个食而不化,那非但不能连续工作,而且也十分危险!

朱自治的此种运动时间也不太长,大体上不超过半个钟头。然后便在卧榻上躺下,开始那一整套的繁文缛节,什么捏脚、拿筋、敲膀、捶腿。这捶腿是最后的一个节目,很可能和催眠术有点关系,朱自治在轻轻的拍打中,在那清脆而有节奏的响声中心旷神怡,渐渐入睡。这一觉起码三个钟头,让那胃中的食物消化干净,为下一顿腾出地位。

当朱自治快要醒来时,我也从学校里下学归来。书包一放,妈妈便来关照:
“今天还在元大昌,快去!”

妈妈的话只有我懂,那朱自治还有一顿晚饭没有吃哪!

朱自治吃晚饭也是别具一格,也和写小说一样,下一篇决不能雷同于上一篇。所以他既不上面馆,也不上菜馆,而是上酒店。中午的一顿饭他们是以品味为主,用他们的术语来讲,叫“吃点味道”。所以在吃的时候最多只喝几杯花雕,白酒点滴不沾,他们认为喝了白酒之后嘴辣舌麻,味觉迟钝,就品不出那滋味之中千分之几的差别!晚上可得开怀畅饮了,一醉之后可以呼呼大睡,免得饱尝那失眠的苦味,因此必须上酒店。

苏州的酒店卖酒不卖菜,最多备有几碟豆腐干、兰花豆、辣白菜之类。孔乙己能有这些便行了,君子在酒不在菜嘛。美食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比君子有钱,酒要考究,菜也是马虎不得的。既不能马虎,又不能雷同,于是他们便转向苏州食品中的另一个体系——小吃。提到苏州的小吃,我又不愿多写了,除掉如前所述的原因外,还因为它会勾起我一段痛苦的回忆,我被一个我所厌恶的人随意差遣!

苏州的小吃不是由哪一月店经营的,它散布在大街小巷,桥堍路口。有的是店,有的是摊,有的是肩挑手提沿街叫卖的。如果要以各种风味小吃来下酒的话,那就没有一个跑堂的能对付得了,必须有个跑街的到四下里去收集。也许是我的腿长吧,朱自治便来和我妈商议:

“你家高小庭蛮机灵,阿好相帮我做点事体,我也勿会亏待伊。”

妈妈当然答应啰,她住了人家的房子不给钱,又没有什么家务可料理,心里老是过意不去,巴不得能为朱自治做点事,以免良心受责备。可怜的妈妈不知道剥削二字,只承认一切现存的社会法规。她教育儿子不能好吃,却对朱自治的好吃不加反对,她认为那是一种“吃福”,好吃与吃福是两回事体。可我却把它当作一回事,怎么也不愿意去替朱自治当跑街的。堂堂的一个高中生怎么能去给一个好吃鬼当小厮呢!

妈妈又哭了,父亲谢世后家境贫困,是靠我的大哥当远洋水手挣点钱:“去吧小庭,我们头顶人家的天,脚踏人家的地,住了人家的房子不出房租,又不交水电费,算起来相当于全家的伙食费。只要朱经理说个不字,你就念不成书,我们一家就会住在露天里。只怪你爸爸走得早啊,我求求你……”

我只好忍辱负重,每天提着个竹篮去等候在酒店的门口。等到华灯初上,霓虹灯亮满街头的时候,朱自治和他的吃友们坐着黄包车来了。一长串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当当地响着铜铃,哇哇地揪着喇叭,像游龙似的从人群中夺路而来,在酒店门口徐徐地停下。他们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浑身散发着香皂味,满面红光,春风得意。朱自治的黄包车总是走在前面,车夫阿二也显得特别健壮而神气。阿二替朱自治掀掉膝盖上的毡毡,朱自治一跃落地,轻松矫捷。在酒店门口迎接他们的不是老板,也不是跑堂的,而是两排衣衫褴褛,满脸污垢,由叫花子组成的仪仗队。乞丐们双手向前平举,嘴里喊着老爷,枯树枝似的手臂在他的左右颤抖。朱自治似乎早有准备,手一扬,一张小票面的钞票飞向叫花子头:“去去。”

叫花子们呼啦一声散开,我这个手提竹篮、倚门而立、饥肠辘辘的特殊叫花子便到了朱自治的面前。这个叫花子所以特殊,是因为他知道一点地理历史,自由平等,还读过三民主义;他反对好吃,还懂得人的尊严。当叫花子们呼啦一声散开而把我烘托出来的时候,我满腔怒火,汗颜满面,恨不得要把手中的竹篮向朱自治砸过去!可是我得忍气吞声地从朱自治的手中接过钞票,按照他的吩咐到陆稿荐去买酱肉,到马咏斋去买野味,到采芝斋去买虾子鲞鱼,到某某老头家去买糟鹅,到玄妙观^①里去买油余臭豆腐干,到那些鬼才知道的地方去把鬼才知道的风味小吃寻觅……

我提着竹篮穿街走巷,苏州的夜景在我的面前交替明灭。这一边是高楼美酒,二簧西皮,那霓虹灯把铺路的石子照得五彩斑斓;那一边是街灯昏暗,巷子里像死一般的沉寂,老妇人在垃圾箱旁边捡菜皮。这里是杯盘交错,名菜陆陈,猜拳行令;那里却有许多人像影子似的排在米店门口,背上用粉笔编着号码,在等待明天早晨供应配给米。这里是某府喜事,包下了整个的松鹤楼,马车、三轮车、黄包车在观前街上排了一长溜。新娘子轻纱披肩,长裙曳地,出入者西装革履,珠光宝气;可那玄妙观的廊檐下却有一大堆人蜷缩在麻袋片里,内中有的人也许就看不到明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众所周知的诗句常在我的脑海里徘徊。

朱自治倒是不肯亏待我,常常把买剩的零钱塞在我的口袋里:“拿去!”那情和给叫花子是差不多的。

我睁眼、僵立。感到莫大的侮蔑。

^① 苏州玄妙观亦称元妙观。

“拿去吧,是给你奶奶买肉吃的。”

侮蔑被辛酸融化了。我是有个老祖母,是她把我从小带大的,那时已经七十六岁,满嘴没牙,半身不遂,头脑也不是那么清楚的。可是她的胃口很好,天天闹着要吃肉,特别是要吃陆稿荐的乳腐酱方,那肉入口就化,香甜不腻。她弄不清楚物价与货币的情况,在她的头脑中一切都是以铜板和银元计算的。她只知我的哥哥每月要寄回来几千块钱(能买一百多斤米),为什么不肯花二十六个铜板给她称一斤肉回来呢?三百个铜板才合一块钱!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的妈妈,骂她忤逆不孝,克扣老人,而且牵牵连连地诉述着陈年八代的婆媳关系,一面骂一面流眼泪。妈妈怎么解释也没用,只好一面在配给米里捡石子,一面把眼泪洒在淘米箩里。我在这两条泪河之间把心都挤碎了!

当我用朱自治的零钱买回几块肉来,端到奶奶的床前时,她一面吃,一面哭,一面用颤巍巍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好孙子,还是你孝顺,奶奶没有白带你……”

我一听这话眼泪便簌簌地往下流,我想大哭,大喊,想问苍天!可是我拼命地哽住喉咙,俯伏在奶奶的床头,把头埋在棉被里。既然在侮蔑中把钱接过来了,为什么不能让奶奶得到一点安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这句老话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而且大言不惭地把苏州放在杭州的前面。据说此种名次的排列也有考究,因为杭州是在南宋偏安以后才“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而苏州在唐代就已经是“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了。到了明代更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十万水东西”。近百年间上海崛起,在十里洋场上逐鹿的有识之士都在苏州拥有宅第,购置产业,取其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苏州不是政治经济的中心,没有那么多的官场倾轧和经营的风险;又不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吴越以后的两千三百多年间,没有哪一次重大的战争是在苏州发生的;有的是气候宜人,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历代的地主官僚,富商大贾,放下屠刀的佛,怀才不遇的文人雅士,人老珠黄的一代名妓等等,都欢喜到苏州来安度晚年。这么多有钱有文化的人集中在一起安居乐业,吃喝和玩乐是不可缺少的,这就使苏州的园林可以甲天下,那吃的文化也是登峰造极!风景不能当饭,天天看了也乏味,那吃却是一日三餐不可或少的。苏州所以能居于天堂之首,恐怕主要是因为它的美食超过了杭州。这也许是苏州人的骄傲吧,可我那时简直觉得这是一种罪恶,是人间最最不平的表现!我不知道地狱里可有“天堂”,可我知道“天堂”里确有地狱,而且绝大多数的人都在地狱的边缘上徘徊。说老实话,当我开始信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没有读过《资本论》,也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多半是由朱自治他们促成的;他们使我觉得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主义都没有用,只有共产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共掉了朱自治的房产,看他还神气不神气!

我偷偷地唱着一支从北平传来的歌：

山那边呀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呀，
没人为你作牛羊。

.....

这支歌的曲调很简单，唱起来也用不着尖起嗓门儿费死力，可它却使我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找到了出路，出路就在山那边！

我决定到解放区去了，那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不知道解放区的形势，总以为国民党还很强大，还有美国的原子弹什么的，无产阶级要夺取全国胜利，恐怕还要经过几年、几十年的浴血奋斗！我读过《铁流》与《毁灭》，知道革命的艰难困苦，知道那是血与火的洗礼。所以当时的心情很悲壮，准备去战死沙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时的心情很有点像荆轲离别高渐离。

我的高渐离便是苏州，是这个美丽而又受难的城市叫我去战斗！临行之前，我上了一趟虎丘山，站在虎伏阁上把这美丽的城市再看一遍：再见吧，你的儿子将用血来洗尽你身上的污垢！傍晚，我照样去替朱自治买小吃，照样买了一块乳腐酱方送到奶奶的床前：吃吧，奶奶，孙子从屈辱中接过钱来为你买肉，这恐怕是最后的一回！我的判断没有错，当奶奶发觉最孝顺的孙子失踪之后，她哭喊了三天便与世永别。

年轻时的记忆多么深刻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挂牌、游街、屈辱、受罪，如今已经淡忘了，仿佛那是一场不屑一顾的游戏。可是三十多年前离家别井，暗中告别亲人，向着黑暗猛冲的情景却点滴不漏地保存在记忆里。也许我是欢喜记着光荣而忘掉屈辱吧，可又为什么不把三四十年的屈辱也忘记？每当我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受伤的战士从血泊中爬起来，举起枪，高喊着报仇的口号向敌人猛扑过去的时候，我的心便会向下一沉，两眼含着泪水。虽然这种镜头看得太多了也觉得老一套，可是这种话我不许孩子们说，孩子们一说我就要骂：“小赤佬，你懂什么！”

三、快乐的误会

没想到我进入解放区已经太晚了，淮海战场上的硝烟已经消散，枪炮声已

经沉寂。解放区的军民沉浸在欢乐的高潮中,准备打过长江去!我们这些从蒋管区去的学生被半路截留,被编入干部队伍随军渡江去接管城市。我从苏州来,当然应该回到苏州去,因为我熟悉那里的大街小巷以及那种好听而又十分难懂的语言,带个路也方便。至于回到苏州去干什么,谁也没有考虑,如果那时有人提出什么前途、专业、工资、房子等等,我们这一伙“小资产”便会肯定他是国民党派来的!革命就是革命,干什么都可以,随便。我们的组织部长却不肯随便,一定要根据各人的特长和志趣来分配,因此就出现了十分快乐的场面:

组织部长把我们二十多个学生兵召集到一个祠堂里。祠堂的正中摆着方桌,桌上放着档案和纸笔,二十多人分坐在两边。

组织部长是个大知识分子,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机械系。他对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十分熟悉:“现在要给大家分配工作了,组织上尽量照顾各人的特长和志愿,希望你们在回答问题之前好好地考虑,分定之后就不许犯自由主义。”

当时的气氛本来很严肃,却被我的老同学,浑名叫丁大头的人弄得豁了边。丁大头的头其实也不大,可是他的知识很广博,天文、地理、历史、哲学他样样都懂一点。因为他的脑子里包容的东西太多,所以看起来他的头好像比平常的人大了点。他第一个被部长叫起来:

“你想干什么呀?”

“随便。”丁大头回答得很爽气。

部长翻了翻眼睛:“随便是个什么东西?说得具体点。”

“具体点……那也随便。”

人们哄堂大笑了:“他什么都懂,可以随便!”

部长也笑了,翻翻档案:“什么都懂的人到什么地方去呢?……我问你,你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

“看书。”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到新华书店去。”

丁大头被一句定终身,后来在某地的新华书店当经理,而且是个很称职、很懂行的经理。

第二个被叫起来的是个女同学,苏州姑娘,长得很美,粗布的列宁装和八角帽使得她在秀丽中透出矫健的气息。

部长向她看了一眼便问:“你会唱歌吗?”

“会。”

“来一段《白毛女》试试。”

“北风那个吹……”女同学拉开嗓子便唱。那时我们天天唱歌,谁也不会扭捏。

“好了,好了,到文工团去!”

这位女同学的命运也不坏,“文化大革命”前唱民歌,很有点名气。如今听不见她唱了,这小老太婆也可能是在哪里教徒弟。

轮到我的时候便糟了,我怎么也想不起最喜欢什么,除掉反对好吃之外,我好像对什么都欢喜。我没有任何特长,连唱起歌来都像破竹子敲水缸。

部长等得不耐烦了:“难道你一件事情都不会干?”

“会会,部长,我会替人家买小吃,熟悉苏州的饮食店。”我绝不能承认万事不通呀,可这一通便出了问题!

“挺好,干商业工作去,苏州的食品是很有名的。”

“不不,部长,我对吃最讨厌!”

“你讨厌吃?很好,我关照炊事班饿你三天,然后再来谈问题!下一个……”

完了,命运在一阵哄笑声中决定了。可我当时并不懊丧,也不想犯自由主义,扬子江在怒号,南岸的人民在呼喊,要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推翻那人吃人的旧社会,再也不能让朱自治他们那种糜烂的寄生虫式的生活延续下去!朱自治呀,朱自治,这下子可由不得你了。我们决不会让你饿肚子,至少得让你支起个炉灶来烧东西。也不能老是让阿二拉着你,你自己有两只脚,应该是会走路的。

风萧萧兮江水寒,壮士一去兮又复还。我又回到苏州来了,几经转折之后又住在朱自治的门前。朱自治对我刮目相看了,他称我同志,我喊他经理;他老远便掏出三炮台香烟递过来,我连忙摸出双斧牌香烟把它挡回去。别跟我来这一套,你那高级烟浸透了人民的血汗,抽起来有股血腥味。朱自治在解放之初有点儿心虚,深怕共产党会把他关进监牢,那牢饭可不是好吃的!

隔了不久,朱自治便镇静自若了,因为我们取缔妓女,禁大烟,反霸,镇反,一直到“三反”“五反”都没有擦到他的皮。他不抽大烟不赌钱,对妓女更无兴趣,除掉好吃之外什么事儿也没有干过。镇反挨不上他,他不开工厂不开店,谈不上五毒俱全和偷税漏税。所以他经常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共产党好,如今没有强盗没有小偷,没有赌场没有烟铺,地痞、流氓、妓女都没有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定,好得很!”他说的可能是真话,可我把他上下打量,心里想,你为什么不说没有赌吃嫖谣呢?赌和嫖你沾不上,吃和谣你是少不了的。等着吧,现在是新民主主义!

朱自治并没有消极地等待,还是十分积极地吃东西,照样坐着阿二的黄包车上面店,上茶楼,照样找到另一个人帮他跑街买吃的。

那时候我的工作很紧张,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时间,也没有星期天,没早没晚地干,运动紧张的时候便睡在办公室里。可那朱自治比我还积极,我起床的时候

他已经坐着黄包车走了；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才听见他的黄包车到了门前。他每逢到家的时候都要踩一下铃铛，那铜铃的响声在深夜的小巷里像打锣似的。他有时候也不回家，仲夏之夜吃饱了老酒，干脆就睡在公园的凉亭里，那里风凉，还有一阵阵广玉兰的香气。他渐渐地胖起来了，居然还有个肚子挺在前面。妈妈对他说：“朱经理，你发福了，人到了四十岁左右都会发胖的。”可他却说：“不对，我这是心宽体胖。现在用不着担心那些强盗和流氓了，别看我有几个钱，从前的日子也是很难过的。生日满月，四时八节，我得给人家送礼，一不小心得罪了人，重则被人家毒打一顿，轻则被人家向黄包车上掷粪便。就说那个上饭店吧，以前也是提心吊胆的。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吃得正高兴，忽然有个人走到我们的房间里来，要我们让座位。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拌了几句嘴，结果得罪了流氓头子，被他的徒弟徒孙们打了一顿，还罚掉了四两黄金的手脚钱！现在好了，那些家伙都看不见了，有的进了司前街（苏州的监狱所在地），有的到反动党团特登记处登了记，一个个都缩在家里。饭店里也清净得多了，人少东西多，又便宜，我吃饱了老酒照样可以在公园里打瞌睡，用不着防小偷！”朱自治拍拍小肚子：“你看，怎么能不发胖呢！”

我听了朱自治的话直翻眼，怎么也没有想到，革命对他来说也含有解放的意义！

当我深夜被朱自治的铃声惊醒之后，心头便升起一股烦恼，这苏州怎么还是他们的天堂？劳苦大众获得解放的时候，那寄生虫也会乘汤下面，养得更肥！我没有办法触动朱自治，可我现在有了公开宣传共产主义的权利，便决定首先去鼓动拉黄包车的阿二。

阿二住在巷子的头上，在那口公井的旁边。他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却比我生得高大、漂亮、健壮。小时候我和他在巷子里踢皮球，皮球踢上房顶之后总是他去爬屋顶。他的老家是苏北，父亲也是拉车的；父亲拉不动了才由儿子顶替。阿二每天给朱自治拉三趟，其余的时间可以另找生意。他的那辆车是属于“包车”级的，有皮篷，有喇叭，有脚踏的铜铃，冬春还有一条毡毯盖住坐车者的膝头。漂亮的车子配上漂亮的车夫，特别容易招揽生意。尤其是那些赶场子的评弹女演员，她们脸施脂粉，细眉朱唇，身穿旗袍，怀抱琵琶，那是非坐阿二的车子不可。阿二拉着她们轻捷地穿过闹市，喇叭嘎咕嘎咕，铜铃叮叮当当，所有的行人都要向她们行注目礼；即使到了书场门口，阿二也不减低车速，而是突然夹紧车杠，上身向后一仰，嚓嚓掣动两步，平稳地停在书场门口的台阶前，就像上海牌的小轿车戛然而止似的。女演员抱着琵琶下车，腰肢摆扭，美目流眄，高跟鞋橐橐几声，便消失在书场的珠帘里。那神态有一种很高雅的气派，而且很美。试想，如果一个标致的女演员，坐上一辆破旧的硬皮黄包车，由一个佝偻蹒跚的老人拉着，

吱吱嘎嘎地来到书场门口,那还像个什么样子呢!人们由于在生活中看不到、看不出美好与欢乐,才甘心情愿地花了钱去向艺术家求教的。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所以那阿二虽然是拉黄包车,家庭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我去动员的时候,他们一家正在天井里吃晚饭。白米饭,两只菜,盆子里还有糟鹅和臭豆腐干,他的老父亲端着半斤黄酒在吱吱嘎嘎的。我寒暄了几句之后便转入正题:

“阿二,现在解放了,你觉得怎么样呢?”

阿二是个性情豪爽的人,毫不犹豫地说了他的体会:“好,现在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了,没有人敢随便地打骂,也没人敢坐车不给钱。”

我听了把嘴一撇:“哎呀,你怎么也只是看到这么一点点,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绝不是给人家当牛做马的!”

“我没有给人家当牛做马呀!”

“还没有,你是干什么的?”

“拉车。”

“好了,从古到今的车子,除掉火车与汽车之外,都是牛马拉的!”

“小板车呢?”

“那……那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人人都有两条腿,又没病又不残,为什么他可以架起二郎腿高坐在车子上,而你却像牛马似的奔跑在他的前面!这能叫平等吗?你能算主人吗?还讲不讲一点儿人道主义!”

阿二吸了口气:“唏,这倒是真的。”

阿二的爸爸叹了口气:“没有办法呀,他给钱。”

“钱……”我把钱字的音调拉了个高低,表示一种轻蔑:“你可知道朱自治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榨取了劳动人民的血汗,你拿了一点血汗之后又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的!”

阿二的眉毛竖起来了:“可不,那家伙坐车很挑剔,又要快,又怕颠。”

我趁热打铁了:“问题还不在于朱自治哪,我们年轻人的目光要放远点,你看人家苏联……”我滔滔不绝地讲起苏联来了,就和现在的某些人谈美国似的,“苏联的工人阶级,一个个都是国家的主人,不管什么事儿,没有他们举手都是通不过的。他们的工作都是开汽车,开机器,开拖拉机,没有一个是拉黄包车的。”我向阿二爸爸的酒杯也了一眼:“拉车弄几个钱也作孽,仅仅糊个嘴。人家苏联的工人都是住洋房,坐汽车,家里有沙发,还有收音机!半斤黄酒有什么稀奇,人家都喝伏特加哩!”我的天啊,那时我根本不知道伏特加是什么,若干年后才喝了几口,原来是像我们在粮食白酒里多加了点水!

阿二和他的爸爸更不知道伏特加了,他们听到这个名词还是第一回。那老

头儿还咂咂嘴,他以为伏特加总是和茅台差不多的。

阿二也心动了:“哦……呃,那才有奔头。爸爸,我们也不要拉车了,你也当了一世的牛马啦!”阿二当然不是为了伏特加,我知道,他是想开汽车。那时候,年轻的人力车工人最高的理想便是当司机。

阿二的爸爸把酒杯向起一竖:“唏……快吃饭吧,吃完了早点睡,明天一早要去拉朱自治上面店。”白搭,我说了半天,他等于没听见。老头儿的思想保守,随他去!

我抓住阿二不放,约他到我家来玩,继续对他讲道理,而且现身说法,拿自己作比:“你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个同学约我到西山去当小学教员,每月三担米,枇杷上市吃枇杷,杨梅上市吃杨梅,不要钱。还有个同学约我到香港去上大学,他的爸爸在香港当经理,答应每月给我八十块港币,毕业以后就留在他的公司里当职员。我为什么不去哪,人活着不都是为了吃饭,更不能为了吃饭就替资本家当马牛!”除了讲道理以外,我还借了一大堆“苏联画报”给他看,对他进行形象化的教育,说明我们青年人要为这么一种伟大的理想去奋斗。说实在的,我所以能讲苏联如何如何,也都是从画报里看来的,画报总是美丽的!

阿二的觉悟果然提高了,也和他的父亲闹翻了,坚决不再拉车,另找职业。我在旁边使劲儿打气:“好,你这一步走得对,最好是进厂,当产业工人去!”

隔了不久,阿二垂头丧气地来找我:“我把苏州都跑穿了,别说工厂啦,连饭店里都不收跑堂的!”

我连忙说:“千万要坚持,不能泄气。”

“气倒没有泄,可是肚皮不争气,没饭吃了!”

我听了也着急:“啊,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再克服一下,我去帮你想想办法。”

我给了阿二几个钱,立刻到民政局去找一位同志,他是和我一起渡江过来的。

那位同志一听就撇嘴:“你这位老兄毛里毛糙的,做事也不考虑考虑,现在有些资本家消极怠工,抽逃资金,不关门就算好的了,你还想到哪里去找职业?”

“好好,我检讨。可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呀,想想办法吧。”

那位同志沉吟了一下:“这样吧,我正在搞失业工人登记,准备以工代赈,先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以工代赈的项目是疏浚苏州城里的小河浜,这个工作很辛苦,但也很有意义。旧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污泥浊水,我们要把浊水变清流,使这个东方的威尼斯变得名副其实,使这个天堂变得更加美丽,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方面。

阿二听说这也是革命工作,二话没说,不讲价钱,天天去挖污泥,抬石头,工

作比拉车辛苦几倍,但是每天只有三斤米。

阿二的爸爸也没有办法,为了吃饭,只好在门口摆起一个卖葱姜的小摊头。因为他家就住在公井的旁边,人们往往在洗菜的时候才发现忘了在菜场上买葱姜,所以生意还是不错的,只是那一碟糟鹅和半斤黄酒从此绝迹。那老头儿每天见到我时总是虎着眼睛把头偏过去。我的心里也有歉意,总是在暗中安慰着老头:“老伯伯,你别生气,总有一天会喝上伏特加的!”我把老头儿的虎眼当作一根鞭子,每天抽一下自己:“下劲儿干,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胜利!”每当我深夜拖着沉重的双腿走过这空寂无人的小巷时,都要看一看阿二家的窗口,默默地叨念:“老伯伯,我高小庭总算对得起你,我没有怕苦,也没有怕累,我和你家阿二都在为明天而奋斗!”

为了阿二的事情,妈妈可生了我的气:“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朱经理哪一点亏待过我们?人家花钱坐车碍你个屁事呀,你硬要和人家作对,弄得阿二家衣食不周,弄得朱经理出入不便,早晚都要到街上去叫车,有时候淋得像个落汤鸡,你这个缺德的东西!”

我决不和妈妈争辩,解放以后再也不能让她流眼泪,何况她的道德观点和我也没法统一,她还相信三从四德,还认为京戏里的那种老家奴十分了不起。只是我听了妈妈的责骂以后,再也不敢去鼓动那个为朱自治跑街买小吃的人了,那人是个老头,抬不动石头。

朱自治对我也有感觉了,再也不喊我高同志,再也不请我抽香烟,在门口碰到我时便把头一低,擦身而去。看不出他的眼神,不知道他对我是恨呢,还是忌?不管怎么样,他的手里总算有了一样东西,一个草提包,包里有双套鞋,包口上横放着一把洋伞。他黎明出门时估不透天气,所以都带着雨具,以免叫不到车时淋成落汤鸡。我看了暗中兴:“你迟早得自食其力,应该一样样地学会。”

四、鸣鼓而攻

也许是组织部长在我的档案里写了点什么,所以我的工作转来转去都离不开吃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派不出那么多的公方代表,我也只好滥竽充数,被派到某个有名的菜馆里去当经理。

这个菜馆我很熟悉,但在解放前从来没有进去过,只是在门口看见有许多阔绰的人进进出出,看见有许多叫花子围在门前,看见那橱窗里陈列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在霓虹灯的照耀下使人馋涎欲滴。我读过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总觉得那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死在这个菜馆的橱窗前。我进店的时候正是冬天,天也常常飘雪,早晨踏着积雪跑到店门口时,我的心便突然紧缩,深怕

真的有个卖火柴的女孩倒在那里,火柴梗儿撒满了一地。

我在店里也坐不稳,特别看不惯那种趾高气扬和大吃大喝的行为。一桌饭菜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浪费的,泔脚桶里倒满了鱼肉和白米。朱门酒肉臭倒变成是店门酒肉臭了,如果听之任之的话,那我还革什么命呢!

我首先发动全体职工讨论,看看我们这种名菜馆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到我们店里来大吃大喝的人,到底有多少是工人农民,有多少是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用不着讨论,这不过是一种战斗的动员而已。每个职工都很清楚,农民根本不敢到我们的店里来,他们一看那富丽堂皇的门面就害怕,不知道一顿要花几十石米!还不如到玄妙观里去坐小摊,味道也不错,最多三毛钱。工人一生之中能来几回?除非他有特殊的事体。可是谁都认识朱自治,都知道他们的吃法和胃口。每一个服务员都背得出一大串老吃客的名单,在那长长的名单中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其中有几个高级职员成分难以划定,据老跑堂的张师傅反映,他们有的是老板的亲戚,有的是老板手下的红人,而且都有股份。当然,每天来吃的人并不全是老顾客,你也不能叫所有的吃客都填登记表,写明前六项。可是,老的服务员对判断吃客的身份都很有经验,他们能从衣着、举止、神态,特别是从点菜的路数上看得出,来者绝大部分都不是工人农民,至少曾经有过一段并非工农的经历。

实行对私有制改造的那段时间,资本家的心情并不全是兴高采烈,也不都想敲锣打鼓,有些人从锣鼓声中好像看到了世界的末日,纷纷到我们的店里来买醉。他们点足了苏州名菜,踞案大嚼,频频举杯。待到酒酣耳热时便掩饰不住了:“朋友们,吃吧,吃掉他们拖拉机上的一颗螺丝钉!”这话是一种隐喻,因为那时候我们把拖拉机当作社会主义的标志。一讲到社会主义的农业便是像苏联那样,大农场,拖拉机。“吃掉他们拖拉机上的——颗螺丝钉!”当然是对社会主义不满,气焰嚣张,语气也是十分刻毒的!

我把收集来的材料,再加上我对朱自治他们的了解,从历史到现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足有两万字的报告,提出了我对改造饭店的意见,立场鲜明,言词恳切,材料生动确凿,简直是一篇可以当作文献看待的反吃喝宣言!

领导上十分欣赏我的报告,立即批准在本店试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行业。

我放手大干了!

首先拆掉门前的霓虹灯,拆掉橱窗里的红绿灯。我对这种灯光的印象太深了,看到那使人昏旋的灯便想起旧社会。我觉得这种灯光会使人迷乱,使人堕落,是某种荒淫与奢侈的表现。灯红酒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何必留下这丑恶的陈迹?拆!

店堂的款式也要改变,不能使工人农民望而却步。要敞开,要简单,为什么要把店堂隔成那么多的小房间呢,凭劳动挣来的钱可以光明正大地吃,只有喝血的人才躲躲闪闪。拆!拆掉了小房间也可以增加席位,让更多的劳动者有就餐的机会。

服务的方式也要改变。服务员不是店小二,是工人阶级,不能老是把一块抹布搭在肩膀上,见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跟着人家转来转去,抽下抹布东揩西拂,活像演京戏。大家都是同志嘛,何必低人一等,又何必那么虚伪!碗筷杯盏尽可以放在固定的地方,谁要自己去取,宾至如归嘛,谁在家里吃饭时不拿碗筷呀,除非你是当老爷!

以上的三项改革,全店的职工都没有意见,还觉得新鲜,觉得是有了那么一点革命的气息。可是当我接触到改革的实质,要对菜单进行革命时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认为最最主要的是对菜单进行改造,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主义。什么松鼠桂鱼、雪花鸡球、蟹粉菜心……那么高贵,谁吃得起?大众菜,大众汤,一菜一汤五毛钱,足够一个人吃得饱饱的。如果有人还想吃得好点,我也不反对,人的生活总要有变化,革命队伍里也常常打牙祭,那只是一脸盆红烧肉,简单了点。来个白菜炒肉丝、大蒜炒猪肝、红烧鱼块、青菜狮子头(大肉圆)……够了吧,哪一个劳动者的家里天天能吃到这些东西?

反对的意见纷纷而来,而且都是从老年职工那里来的。

跑堂的张师傅反对了。他说话有点嬉不溜溜地:“啊哈,这下子名菜馆不是成了小饭铺啦!高经理,索性来个彻底的改革吧,每人发两块木板,让我们到火车站去摆荒饭摊。”

我听了把眼睛一抬:“同志,有意见可以提,态度要严肃点,这是革命工作,不是和吃客们打哈哈的!”我知道他和资产阶级的老爷太太们周旋了几十年,说话不上路,所以特地点了他一点。

“好好,没意见,这样做我们也可以省点力。”张师傅服了。

管账的也提意见了:“高经理,我的意见也可能不正确,只是我有点担心……喏,这样做当然是对的,可那赢利是不是会有问题?”他说起话来咿咿缩缩,因为他和原来的老板是亲戚,“三反”“五反”时曾经擦破点皮。

“你的担心我也考虑过,可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是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像资本家那样唯利是图!”

“对对,对对对。”管账的马上服帖。

死不服帖的是那几位有名的厨师,如果用现在的职称来评定的话,他们不是一级便是二级。他们可以著书立说,还可以到外国去表演。可我那时并没有把

这种宝贵的技术放在眼里,他们也可能没有把我这样的外行放在眼里,特别是那个杨中宝,好像我剝了他的肉似的。

“这不是都卖点儿家常便饭了吗?”

“家常便饭有什么不好呀?”

“家常便饭家家会做,何必上饭店?”

“出门的人哪有背着锅子走路的?”

“出门的人都想尝尝天下的名菜,噢,苏州的名菜就是红烧狮子头?”

“那要看是什么人?”

“什么人都有,包括像你这样的干部在内!”

“我出差每天三毛钱伙食,两毛钱伙补,一顿吃掉五毛钱,还有早晚两顿没有着落哩!”

“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他们自己贴。”

“贴,拿什么贴?不少人就是因为出差时嘴馋,才贪污了公款。”

“如果人家请客呢?”

“为什么要请客,拉拉扯扯的。‘三反’‘五反’的教训还不够吗?不少人被资本家拉下水,就是从请客吃饭开始的,说不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就是在我们楼上的小房间里干出来的!”

“人家结婚呢?”

“结婚更不能铺张浪费,买几斤糖,开个联欢会,我们机关里就是这样干的。”

杨中宝火了:“高经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机关是机关,饭店是饭店。请你把我调到机关里去当炊事员吧,保证没意见!”

我看着杨中宝直翻眼,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去。我不能对一个老工人发脾气,他的工龄和我的年龄差不多,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而我本人的成分是学生,属于小资产阶级,再怎么革命也是革不掉的,只好暂时忍耐一点。何况他们之所以反对也有道理,因为这一改他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白菜炒肉丝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手艺,连我都会……是呀,他们的技术不能发挥,也很可惜。调到机关里去当炊事员虽然是气话,调到交际处去当炊事员倒是很合适的……

会场沉寂。

我要设法打开僵局,目光便向青年人投射过去。那时候我已懂得,如果遇事打不开局面,最好是鼓动青年人起来带头。他们不保守,有闯劲,闯过了警戒线也无妨,然后再向回拉一点。矫枉必须过正,也许就是这个道理。

“青年同志们谈谈嘛,你们也是店里的主人,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谈谈。”

年轻的职工们只是笑,看看老师傅又看看我,两边都为难,一时拿不定主

意。内中有个小伙子,名字叫做包坤年,跑堂的,虽然还没有满师,讲话却是很有水平的:

“同志们,我们的店必须改革,必须彻底地改革!再也不能为那些老爷们服务了,要面向工农兵。面向工农兵绝不是一句空话,要拿出菜单来作证明。烧什么菜,就是为什么人。蟹粉菜心不仅工农兵吃不起,而且还要跟着老爷们受罪!为什么,菜心都给他们吃了,菜帮子都到了工农兵的碗里!生炒鸡丁要用鸡脯,鸡头鸡脚都卖给拉黄包车的,这分明是对工农兵的瞧不起。农民进店来只点豆腐汤,有人竟然回生意:‘嘿,吃豆腐汤到玄妙观去吧,那里的豆腐汤又好又便宜。’玄妙观只卖豆腐脑,分明是捉弄乡下人的。要是朱自治他们来了就不得了,从堂口到厨房,都是忙得飞飞的。鱼要活的,虾要大的,一棵青菜剥剩了手拇指那么一点点……”

包坤年这么一带头,人们就跟着发表意见,纷纷揭露我们的浪费,以及重视筵席而看不起小生意。这些情况我以前都不了解,听了十分生气,把手指在桌面上敲敲:“你看,你们看,不改革怎么得了呢!”

跑堂的张师傅低头不语了,回掉农民的生意可能就是 he 干的。几个厨师也不讲话了。苏州名菜选料精细,浪费肯定是有;围着朱自治之类的人转也不假,名厨要靠吃家,要靠他们扬名,要靠他们品出那千分之几的差别。最好能碰上孔夫子,孔子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改革方案就这么定下来了,包坤年是立了功的,他后来表现得也十分积极,我指向哪里他打向哪里。我也为他的进步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至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打得半死,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当时把全部精力都扑在改革上,每晚回家都在十一点之后。我改了店堂,换了门面,写了大红海报张贴街头,还向报馆里投了稿,标题是:名菜馆面向大众,大众菜经济实惠!

开张的那一天,景象是十分壮观的。老头老太结伴而来,还搀着小孙子、小妹妹。那些拉车的、挑担的、出差的,突然之间都集中到店门口。门前的黄包车、三轮车、马车停了一长溜。这种车水马龙的情景解放前我也曾见过,可那是拉着老爷太太们来的;老爷太太们美酒高楼,拉车的人却瑟缩在寒风里。如今瑟缩的人们都站起来了,昂首阔步地进入店堂,把楼上楼下两个像会场似的堂口都挤得满满的。一时间板凳桌子乒乓响,人声鼎沸如潮水,看起来有点混乱,可那气氛实在热烈!服务员上菜也很迅速,大众菜,大众汤都用不着现做,汤装在木桶里,菜装在大锅里,一勺一大碗,川流不息地送出去。店门口的行人要靠右走,进出连成两条线,如果用门庭若市来形容,那是十分贴切的。

朱自治和他的吃友们居然也来了,很好,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想吃点什么

东西！谁知道他们先在门口看看广告，再到店堂里瞧瞧热闹，俯下身去看看大众菜，鼻子吸了那么几吸，然后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情走出去，还相互拍拍打打地地笑哩！我见了义愤填膺：“反对吧，先生们，我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叫你们反对！”

老头老太的反应可就不同了：“啊哟，以前只听说这家菜馆有名，越有名越不敢来，今天可算见了世面！”

挑菜的农民也说了：“这菜馆我以前来过几回，都是挑着青菜进后门，一直送到厨房里，从来不敢向店堂里伸头！”

多么深刻的写照呀，多么自豪的语言，人民的称赞使我忘记了疲劳，感动得心都发抖。不管将来的历史对我这一段的工作如何评价（放心，它无暇顾及），可我坚信，当时我决无私心，我是满腔热忱地在从事一项细小而又伟大的事业！

当时，我们的领导也到了现场，看了也很满意，虽然秩序有点混乱，那也是前进中的缺点，要我们好好地总结提高，然后推向全行业。

五、化险为夷

这一下朱自治可就走投无路了！尽管我们的经验很难推开，许多名菜馆都是敷衍了事，弄几只大众菜放在橱窗里装装门面。可是风气一开那苏州名菜便走了味，菜名不改，价钱不变，制作却不如从前那么精细。朱自治有一张什么样的嘴啊，他能辨别出味差的千分之几哩！一吃便摇头，便皱眉，便向人家提意见。朱自治看错皇历了，这时候再也没有人把他当作朱经理，资本家三个字也不是那么好听的。有钱又怎么样，不许收小费，你爱吃便进来，嫌丑请出去，反正营业额的大小和工资没有关系。如果依了你朱自治的话，还要落得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臭名气！

朱自治怎么受得了呀，他每吃一顿便是一阵懊丧，一阵痛苦，一阵阵地胃里难过。每天都觉得没有吃饱，没有喝够，看到酒菜又反胃。他精神不振，毫无乐趣，整天在大街上转来转去，时常买些糕点装在草包里，又觉得糕点也不如从前，放在房间里都发了霉，被我的妈妈扫进垃圾堆。那个很有气派的小肚子又渐渐地瘪了下去。

有一天晚上，朱自治居然推门而入，醉醺醺地站在我的面前：“高小庭，我……我反对你！”

资产阶级开始反扑了，这一点我早有准备：“请吧，欢迎你反对。”

“你把苏州的名菜弄得一塌糊涂，你你，你对不起苏州！”

“这是你的看法，菜碗没有打翻，一塌糊涂是谈不上的。是的，我对不起苏州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对苏州的人民我可以问心无愧！”

“你你……你对不起我！”

“是的，应当对不起你，因为你自己也是资产阶级！”

“小庭啊，人可要凭点儿良心，这些年来我可没有亏待过你！”

朱自冶语无伦次了，他竟然想揭下伤疤当膏药贴，这就惹得我火起：“朱经理，我是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朋友；你的朋友中有三个是地主，有两个是在反动党团特的册子上登过记的，还有三个是拿定息的，包括你自己在内。别以为定息可以拿到老，这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被消灭的！”

朱自冶吓了一跳，以为我们的政策又要改变。对他来说吃当然很重要，消灭却是性命攸关的。他的酒意消掉了一半，不由自主地向后退，掏出一根前门牌塞过来，被我用飞马牌挡回去。他乘势把香烟一叼，吸了一口：“该死，今天托人到常熟去买了一只叫花子鸡，味道还和从前一样，不免多喝了几杯，这就糊里糊涂地跑到你家来了。咦，我是从哪个门里进来的呢！”朱自冶想夺门而走了。

“慢点！”

朱自冶站住了。

“朱经理，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话，那就是我没有告诉你一句最要紧的话：你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要逐步地学会自食其力！”

“是是，我一定铭记。”

从此以后，我很少碰到朱自冶，他当然也不会再来向我表示反对。我对他倒是十分关心，常常向妈妈问起。妈妈说她也不清楚，经常不见朱自冶回家，房间里一股霉味。我想，朱自冶也许是去干什么了吧，吃是终身的必需，总不能是终身的职业。

隔了不久，包坤年来向我汇报——他经常向我汇报。

“不得了，杨中宝他们开地下饭店了，是专门为资本家服务的，每天晚上赚大钱！”

“可当真？”

“一点不假，是我亲眼看见的，地点就你家东面的五十四号里，天天晚上有许多资本家在那里聚会，杨中宝烧菜，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

包坤年说得有根有据，我怎能不问不理？立刻到居民委员会去调查，找杨中宝来谈话，一问一查又找到了朱自冶的踪迹。

朱自冶开始隐退了，他对饭店失望之后，便隐退到五十四号的一座石库门里。这门里共有四家，其中一家的户主叫做孔碧霞。孔碧霞原本是个政客的姨太太，这政客能做官时便做官，不能做官时便教书，所以还有教授的头衔。苏州小巷里的人物是无奇不有的。据说，年轻时的孔碧霞美得像个仙女，曾拜名伶万月楼为师，还客串过《天女散花》哩！可惜的是仙女到了四十岁以后就不那么惹人

喜爱了,解放前夕,那政客不告而别,逃往香港,把个孔碧霞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儿遗弃在苏州。

孔碧霞年轻的时候打扮惯了,也可能是由于登过台的关系,所以举手投足、顾盼摆扭等等都讲究个形体美。讲究得过了分便变成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特别是在无姿可弄而要硬弄时便有点怪里怪气。苏州话骂人也不是那么好听的,人家暗地里叫她“干瘪老阿飞”。

朱自治一贯的不近女色,为什么突然之间和孔碧霞混到一起呢?很简单,那孔碧霞烧得一手好菜!

孔碧霞数十年的风流生涯,都是在素手做羹汤中度过的。她丈夫的朋友都是政界、实业界、文化界的高雅得志之士,像朱自治这样的人是休想登堂入室的。什么美食家呀,在他们看起来,朱自治只不过是个肉头财主,饕餮之徒,吃食癞皮。哪有一个真正考究吃的人天天上饭店?“大观园”里的宴席有哪一桌是从“老正兴”买来的?头汤面算得什么,那隔夜的面锅有没有洗干净!品茶在花间月下,饮酒要凭栏而临流。竟然到乱哄哄的酒店里去小吃,荷叶包酱肉,臭豆腐是用稻草串着的,成何体统呢!高雅权贵之士,只有不得已时才到饭店里去应酬,挑挑拣拣地吃几筷,总觉得味道太浓,不清爽,不雅致。锅、勺、箴篱不清洁,纯正的味儿中混进杂味,而且总有那种无药可救的、饭店里特有的油烟味!朱自治念念不忘的美食,在他们看起来仅仅是一种通俗食物而已。他们开创了苏州菜中的另一个体系,这体系是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素养的结晶,它把苏州名菜的丰富内容用一种极其淡雅的形式加以表现,在极尽雕琢之后使其返乎自然。吃之所以被称作艺术,恐怕就是指这一体系而言的。

孔碧霞的烹调艺术,就是得之于这一派的真传。她在当年的社交界是个极其有名的姨太太,会唱戏,会烧菜,还会画几笔兰花什么的。二十多年间她家的庭院里名流云集,两桌麻将让八个男人消遣,一桌酒席由她来作精彩的表演。她家有一个高级的厨娘,这高级的厨娘也只能当她的下手!

朱自治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后,偶尔听他的一位吃友谈起,说是五十四号里有个孔碧霞,此人当年如何如何,如何身怀绝技。

朱自治一听便笑了:“你老兄是说说解馋的吧,好菜怎么能家里做呢。你没有那么多的作料、高汤,没有那么大的炉火与油镬,办不成的。”

“不信?那也没有办法,我请不动那位尊神。她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解放前我想尽办法也没有打得进去……对了,近几年来听说她的家境不好,手头拮据,也许看了孔方兄的面上,能为我们操办一席。你家和她的靠近,去试试。”

朱自治病急乱投医了,他为了吃总会干出一些冒冒失失的事体;他冒冒失

失地去敲五十四号的大门,径直说明来意。

如果是在解放前的话,孔碧霞不把朱自治赶出来才怪哪!可那孔碧霞不如朱自治,她没有那么多的存款和定息,已经把房子租给了三家,还得靠变卖家具和首饰度日。同时她也多年不操此道,有点技痒难熬,很想重新得到别人的称赞,再现昔日的风流。她内心已经许诺,表面上还要搭搭架子:

“啊呀,朱先生,僚(你)是听啊里(哪里)一位老先生活嚼舌头根,僚尼(我们)女人家会做啥格(什么)菜呢,从前辰光烧点小菜,是呒没(没有)事体弄弄白相(玩儿)格!”这女人的一口苏白像唱歌似的好听,可惜的是写出来却并不美观。

朱自治当然理解啰,涎皮搭脸地恳求着:“行行好吧,不管你办什么我们都吃,总归要比饭店里好点。”

“饭店!……”孔碧霞十分轻蔑地拉长了声音,“你们男人家真没出息,闻了饭店的那股味道之后居然还吃得下东西!”

朱自治目瞪口呆,饭店里有什么味道?有的是美食的香味,闻了以后才胃口大开哩!“啊,是是,我们这些人都是凡夫俗子,吃了一世什么也不懂,赏个光吧,让我们开开眼界”。

“好吧,那就献丑了,你们几个人呢?”

朱自治默算了一下,把食指一环:“九个。”

“不行,最多只能七个,人多是没好食的。”

“那就八个,正好一桌。”

孔碧霞笑了:“朱先生,你不懂规矩,那下手的一个位子是给烧菜的人留着的。”

“好好,对不起。”朱自治嘴里叫好,心里犯疑,哪有厨师上桌的?为了吃也只好迁就了,随即从身边掏出一叠钞票,数了五十元放在桌子上,心里盘算,这十块钱就算是小费。

孔碧霞面有难色了:“哎呀,这几个钱吃点什么呢?”

朱自治把心一横,八十块全部豁出去,买个面子。

孔碧霞迟疑了半晌,好像在那里算账,最后也了朱自治一眼:“好吧,不够的地方我也凑个份子。唉,你这人也实在可怜!”

事情就这样定下了,孔碧霞足足地准备了五天。据说还有一只红焖鳗没有来得及做,因为买回来的鳗鱼必须先用特殊的方法养一个星期,而那朱自治又馋得等不及。

至于这一顿到底吃了些什么,我没有参加,不能乱吹。

杨中宝是参加了的。那一天他正好休息,在大街上碰到了朱自治。朱自治是

去通知他的吃友们准时上阵的,没想到有位老友因病不起,需要另找候补的。看见杨中宝便说:“走走,跟我去见见世面。”接着便把如何找到孔碧霞等等说了一遍。连说带吹,借以发泄对我们饭店的怨气。

杨中宝从来不服人,艺高人总有那么点傲气。名厨师都是男人,哪来这么个女的!可是他也听他师傅说过,在清末民初的时候,苏州有一种堂子菜,是从高等妓院里兴起来的。做这种菜的全是聪敏漂亮的女人,连丑丫头都不许帮道,那做工细得像绣花似的。他反正闲着没事,那朱自治又不用他出钱,何不趁此去见识见识,如果真有可取的话也可学点技术;如果言过其实的话也可把朱自治揶揄一顿,煞煞他的锐气!

杨中宝只向我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他没有开地下饭店,同时对这种捕风捉影的小报告十分恼火,说是有人和他过不去。他一气之下就不谈孔碧霞了,而是缠着我把他调到交际处去。这事儿很快就办成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那天晚上孔碧霞如何大显身手,究竟吃了些什么稀世的美味!读者诸君也不必可惜,在往后的年月里我们还会见到她表演。“文化大革命”可以毁掉许多文化,这吃的文化却是不绝如流。

我当时只能从朱自治的行动上来进行推测,肯定那天晚上的一桌菜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朱自治一吃销魂,从此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他再也不像没头苍蝇似的在街上乱转,再也听不到他清晨开门去赶朱鸿兴;他不食人间烟火了,一日三餐都吃在孔碧霞的家里。一个会吃,一个会烧;一个会买,一个有钱。两人由同吃而同居,由同居而宣布结婚,事情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朱自治终于成家了,一个曾经有过无数房屋的人,到了四十五岁上才有了家庭!家庭是个奇妙的东西,他会使人变得有了关栏,言行举止也规矩了点。朱自治稳重些了,注意言谈,也注意外表。衣着和过去大不相同。笔挺的中山装,小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颇有点学者风度,这恐怕是孔碧霞参照她前夫的形象加以塑造的。

那孔碧霞不仅会烧菜,治家也是能手。结婚以后她千方百计地调整住房,让朱自治搬过去,把五十四号里的三户人家搬过来。三户人家的住房面积都有了扩大,她自己也不蚀本。因为那五十四号是个中式的庭院,有树木竹石,池塘小桥,空间很大,围墙很高,大门一关自成天地,任他们吃得天昏地黑也没人看见。那时候,像我这样的反吃战士比较多,还有反穿的;谁要是考究饭菜,讲究衣着,那就有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危险,或者说是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沾了边。所以有钱的人也不得不稍加隐蔽,关起门来吃,吃到肚子里谁也看不见!当然,完全看不见也不可能,人们每天早晨都看见朱自治夫妇上菜场。两个人穿着整齐,一个

拎篮,一个拎包,一个人的膀子套在另一个人的膀子里,惹得行人侧目而视,哧溜一声:“干瘪老阿飞!”

我的妈妈从来不说孔碧霞的坏话,她认为这个女人是行了件好事,使得一个败子回头。她买菜回来常常对我说:“又碰到朱经理啦,现在变好了,夫妻两个亲亲热热,像个过日子的。”

我听了只是哼哼,心里想:这叫变好?这是关起门来逃避改造!

六、人之于味

朱自治逃避改造,我对他也无可奈何。他不到我们的店里来吃饭,我也不能冻结他在银行里的存款;说他有资产阶级的思想也白搭,他本来就是资产阶级。让他去吃吧,革命不是一次完成的,只要他规规矩矩,不再叫喊什么苏州菜不如从前,不再闯到我的房间里来提意见。

朱自治当然不会提意见啰,偶尔碰到我时也是陌若路人,头也不点,挺着那重新凸起来的肚子扬长而去,像个得胜的公鸡,气得我两肺直扇!

更为气愤的是居然有人和朱自治唱着一个调子,说我们的饭店是名存实亡,饭菜质量差,花色品种少,服务态度恶劣!而且说这种话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资产阶级。有干部,有工人,还有老头老太什么的。我听了很不服,改革才进行了一年多,你们怎么会从赞扬变成反对?两片嘴唇翻得倒快哪!我只好耐心地加以解释:

“老太太,少说两句吧,一年前你能到这里来吃饭,还算见了世面!”

“世面已经见过了,现在要吃好东西!”老太太晃着几张大钞票,“喏,儿子寄来的,他再三关照我要增加营养,高兴的时候便到你们店里来改善改善,改善个屁,还不如我自己烧的!”

“那就自己烧吧,自己烧的东西合口味。”我想起孔碧霞来了,不觉说漏了嘴。

老太太火了:“你……你这话像是开黑店的人说的,我能烧还要你们干什么,白养着你们拿薪水!”

包坤年挺身而出:“什么叫开黑店,你嘴里放干净点!社会主义的企业是黑店?你诬蔑……”

我连忙拦阻:“好了。算了算了。老太太,你别生气,这菜如果没有动过的话,我们退钱。”

对干部模样的人我就不太客气了:“同志,你是出差的吧?”

“对,咱从北京出差到苏州,听说苏州菜名扬四海,你们的店很有名气,特地

来品尝品尝,可你们却拿出这玩意儿!”

“同志,有这样的玩意儿已经不错了,你的伙补一天才几毛钱?”

“咱自己就不能补?现在不是包干儿的时代了,咱花得起!”

“艰苦朴素的作风还得保持。”

“对对,谢谢您的教导,早知如此应该背一袋窝头上苏州,你们这家饭店嘛,存在也是多余的!”袖子一甩,走了。

我叹了口气,觉得这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很严重的,才拿了几天薪金制,就这么财大气粗地当老爷!至于我们这家饭店的存在……唉,确实有了点问题。这两年国民经济大发展,农村连年丰收,工人调资定级,干部拿了薪水……那人民币又特别见花,肉才六毛多一斤,五香茶叶蛋五分钱一个,二两五的洋河大曲连瓶才两毛二分钱。许多人都阔绰起来了,看到大众菜便摇头,认为凡属“大众”都没有好东西,“劳动牌”也不是好香烟。我想为劳动大众服务,劳动大众却对我有意见。有人把意见放在桌面上,更多的人是不愿费口舌,反正有名的菜馆多的是,他们的改革本来就不彻底,临时弄点大众菜装装门面的。时过境迁连门面也不装了,橱窗里琳琅满目,各种名菜赫然在焉!他们乘着市面繁荣时拼命地掏人家的口袋,掏得人家笑嘻嘻的,那营业额像在寒暑表上哈热气,红线呼呼地升上去!我们也曾有过黄金时代啊!想那改革之初,营业额也曾一度上升,我还以此教育过管账的,说他是杞人忧天。隔了不久便往下降,降,降……降掉了三分之一,再降下去确实会产生能否存在的危机!

好吃的人们啊!当你们贫困的时候恨不得要砸掉高级饭店,有了几个钱之后又忙不迭地向里挤,只愁挤不进,只恨不高级。如果广寒仙子真的开了“月宫饭店”,你们大概也会千方百计地搭云梯!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个骚动不安的季节,到处都在鸣放,还有闹事的。店里的职工开始贴我的大字报了,废报纸上写黑字,飘飘荡荡地挂在走廊里。我看了以后倒也沉得住气,无非是大众菜和营业额等等的问题。只有一张大字报令人气愤,说我是拿饭店的名声,拿职工的血汗来换取个人的名利,说那杨中宝是被我打击、排挤出去的!署名是“一职工”,可从那语气和那么多的形容词来看,肯定是包坤年写的。你这小子也太不应该了,当初改革时你也曾热情支持,说杨中宝开地下饭店也是你汇报的,怎么能把一堆屎都甩到我的头上来呢!当然,我也没有必要对此加以解释,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正确性,都是应该接受的。

正当我惶惑不安,心情烦躁的时候,却来了我的老同学丁大头!

丁大头到北京开会,路过苏州,特地下车来看看我。转眼八年啦,真叫人想念!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老伙计,我要好好地请你吃一顿,走,上我们的饭店去!”我叫过以后也觉得奇怪,这话可不像我说的,怎么见了面就想请客呢!

丁大头摇摇头：“罢啦，你们的饭店我已经领教过了，还把大字报浏览了一遍。老伙计，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呢？”

“干了点什么？等等，你等等。等会儿我会全部告诉你。”我连忙把我的爱人叫出来，向丁大头介绍：“喏，这就是我的爱人。这就是我常常对你说起的丁大头。”

丁大头欠了欠身子：“丁正，绰号大头……哎哎，这个雅号再也不能扩散了，我和你一样，大小也是个经理！”

我爱人掩着嘴笑，盯住了丁大头看，好像要弄清楚那头是否比平常人大点。

我说：“你别呆看了，快到小菜场去看看，买点儿什么东西。”丁大头对我们的饭店已经领教过了，带他到人家的饭店里去更是制造口舌。所以我想叫爱人随便弄点菜，晚上就在家吃一点。

谁知道我的爱人没手抓了，结婚两年多她还没有弄过饭哩！她只会替丁大头倒茶、递烟。说：“你们先谈会儿吧，妈妈到居民委员会开会去了，等她回来再替你们准备吃的。”

我一听便急了，居民委员会开会是个马拉松，又拉又松，等到他们开完会，那小菜场肯定已经关门扫地。便说：“你就烧一顿吧，不能样样事情都依赖妈妈。”

我爱人来话了：“怎么，你把说过的话都忘啦，你说年轻人如果把业余时间都花在小炉子上，肯定不会有出息。”她把双手一摊，“你看，我这个有出息的人还不知道油瓶在哪里！”

丁大头哈哈地笑起来了：“对，我可以证明，这话肯定是他说的，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我连忙摆摆手：“好了，你到居民委员会去一趟，就说家里来了人，让妈妈早点儿拔签。”

爱人出去之后，我便滔滔不绝地倒苦水，从头说到尾：“……那些大字报你都浏览过了，进行人身攻击的不谈，那是一个年轻人跟着人家起哄的。可是我的改革有什么错？旧社会的情景你也见过的，就是为了消灭那种不平才去战斗。我不会忘记，临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曾经对她发过誓言。当然，那只是一种壮志，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可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决不能让那些污泥浊水再从阴沟里冒出来，决不能让那些人还生活在他们的天堂里！他们可以关起门来逃避，但是不能让我们的同志在吃的方面去向资产阶级学习。当年我们遥望江南，为的是向旧世界冲击；曾几何时，那些飘飘荡荡的大字报却对着我冲击了！冲吧，我问心无愧！”

丁大头沉默了，直抽烟，他的心情大概也是很平静的。

“说话呀，你的知识比我广博，这些年又在新华书店工作，整天埋在书堆里，你可以随便抽出一本书来敲敲我的头，最好是那些布面烫金的，敲起来有力！”

丁大头笑了：“那不行，敲破了头是很难收拾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奇怪的生理现象，那资产阶级的味觉和无产阶级的味觉竟然毫无区别！资本家说清炒虾仁比白菜炒肉丝好吃，无产阶级尝了一口之后也跟着点头。他们有了钱以后，也想吃清炒虾仁了，可你却硬要把白菜炒肉丝塞在人家的嘴里，没有请你吃榔头总算是客气的！”

我跳起来了：“你你……你也不能天天吃清炒虾仁呀！”

“谁天天到饭店里吃炒虾仁的，他有那么多的工资吗？”

“可也不少呀，同志，你不能低估这种潮流！”

“是你把大众低估了。大众是个无穷大，一百个人中如果有一个来吃炒虾仁，就会挤破你那饭店的大门！你老是叨念着要解放劳苦大众，可又觉得这解放出来的大众不如你的心意。人家偶尔向你要点炒虾仁，不白吃，还乐意让你赚点，可你却像沙子丢在眼睛里。”

“不不，我对大众没意见。”

“我知道，你是对那个朱什么冶有意见，他闭门不出了，你到哪里去揪他呢！”

“也不是全躲在家里。”

“当然，肯定会有许多人跟着劳动大众去吃炒虾仁。告诉你吧，即使将来地主和资本家都不存在了，你那吃客之中还会有流氓与小偷，还有杀人在逃的，信不信由你。”

我信了。我早就发觉过这一点，住旅馆需要工作证和介绍信，吃饭只要有钱便可以。我只好叹了口气：“唉，你的话也不无道理，可我总觉得勤俭朴素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何必在吃的方面那么顶真呢？”

“说得对，这对你个人来说是一种美德，希望你能保持下去。可你是个饭店的经理，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带到工作里。苏州的吃太有名了，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文化，如果把这种文化毁在你手里，你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我一听便凉了。我在学校里读过历史，知道那玩意儿可不是好惹的，万一被它钉住了，死都逃不脱的！可我也怀疑，这吃的艺术怎么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呢，说得好听罢了，这发明权分明是属于朱自治和孔碧霞他们的。

也怪我的妈妈太热情，这天的晚饭竟然是五菜一汤，汤是用活鲫鱼烧的，味道鲜美。

丁大头眉花眼笑了：“你看，这社会风气已经渗透到你的家庭中来了，注

意！”

七、南瓜之类

丁大头走后,我仔细地检查了我的行为。一个老朋友来了,为什么立即想到要去买菜呢?很简单,这是一种乐趣,也含有尊重与慰劳的意味。过去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呢?记得渡江后和他在无锡分手时,我也曾为他送行,花了五分钱在摊头上吃了一碗小馄饨,他十分满意,我也情意绵绵。今天为什么不能那样做,一顿花掉五块多钱!也很简单,那时的五分钱是我全部流动资金的十分之一,而我今天的工资是七十五,加上我爱人的工资,再扣去家庭的开支,那五块钱也就等于五分钱。物质和精神的砝码一样大,情谊的天平是平平的。如果我今天还请丁大头吃小馄饨,即使他不介意,我又有什么必要让他忆苦思甜!如果让妈妈和爱人知道的话,肯定要把我一顿臭骂:“这些年你一直惦记个丁大头,来了以后只肯花五分钱,你还像不像个人呢!”

我当然像个人,而且自以为像个很好的人,不随波逐流,不见异思迁……可我没有感到时间在流去,生活在变迁?我只知道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叛,却不知道忘记了变化也和背叛是差不多的,同样是违反了人民的心意。不去管什么朱自治了,让他在小庭院里快活几天!

正当我想转弯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了。这个运动没有碰到我,我差点儿还成了英雄哩。谁都承认我立场坚定,方向对头,早就以实际行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今不如昔”。只是由于我的心中有鬼,说话吞吞吐吐,行动也不积极,白白错过了一个提拔的机会,是个扶不起的刘阿斗。

我想转弯也来不及了,因为跟着便是大跃进,大跃进之后便是困难年。大跃进的时候人人都顾不上吃饭,困难年人人都想吃饭了,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酱油都要计划供应了,谁还会对大众菜有意见?连菜汤都是一抢而空,尽管那菜汤是少放油,多放盐。凡是能吃的东西人们都能下肚,还管它什么滋味不滋味!

这就苦了朱自治啦!他吃了四十多年的饭,从来就不是为了填饱肚皮,而是为了“吃点味道”。这味道可是由食物的精华聚集而成的。吃菜要吃心,吃鱼要吃尾,吃蛋不吃黄,吃肉不吃肥,还少不了蘑菇与火腿。当这一切都消失了的时候,任凭那孔碧霞有天大的本领也难以炊。

人也真是个奇怪的动物,有得吃的时候味觉特别灵敏,咸、淡、香、甜、嫩、老,点点都能区别。没得吃的时候那饿觉便上升到第一位,饿急了能有三大碗米饭(不需要上白米)向肚子里一填,那愉快和满足的感觉也是难以形容的。朱自

治尽管吃了一世的味道,却也难逃此种规律。他被饥饿从小庭院中逼出来了,又拎着个草包成天在街上兜。这一次不是寻找美味了,只要看见哪里围着人,便拼命地向里钻,企图能买到一点红薯、萝卜或花生米之类,不管什么价钱。无奈,他经常总是提着个空包回来,神情沮丧,疲惫不堪地走过我家的门前。我第一次见到他财大并不气粗,他也许是第一次感到金钱并不是万能的。照理说那朱自治也饿不了,城市不比农村,他有定量供应。大跃进之前他家的定量吃不了,经常向外调剂,现在虽说捐献掉两斤,那也不至于饿肚皮。奇怪,一旦缺少了副食品和油之后,那粮食就好像是棉花做的,一天八两一顿下肚,还不知道是塞在哪个角落里!何况那思想也有问题,一顿不饱十顿饥,眼睛一睁便想吃东西。朱自治以前是眼睛一睁便想吃头汤面,现在却老是睁着眼睛看住桌上的饭碗,总觉得他碗里的饭要比孔碧霞女儿少了点。孔碧霞也没好气:

“是你的肚子里有鬼!”

“我有鬼还是你有鬼?一个是空的,一个是实的!”

孔碧霞一把夺过女儿的饭碗:“给你,都给你,反正女儿也不是你养的!”

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夫妻俩吵得不可开交。吵到后来实行分食制,一只煤炉两只锅,各烧各的。在吃上凑合起来的人,终于因吃而分成两边。再也看不见他们两个套着膀子走路了,再也听不见孔碧霞嗲声嗲气地叫喊:“老朱啊,你来噍!”

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本来就是建筑在金钱上的,当金钱处于半失效的状态时,那关系也就会处于半破裂。我倒有点为朱自治庆幸了,这下子他可以不再迷信金钱,也可以知道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不要那么无休止地去寻求美味。

我这样想并不是幸灾乐祸,因为我和朱自治同处于一个灾祸之中,他饿我也饿,同样地饿得难受。按说,我是一个饭店的经理,在吃的方面还是有点儿办法的,在这种特定的时刻,权力的作用会明显地超过金钱。可我一贯自认为是个很好的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去搞那些鬼把戏。老实说,也没有饿到真的爬不起来的地步。况且我的家庭很巩固,妈妈和我的爱人拼命地保证重点。妈妈总是让我先吃:“快吃吧,吃了上班去,我反正没事,等一歇。”我知道这“等一歇”是什么意思,总是偷偷地把饭拨掉点。我的爱人重点保证女儿,孩子读小学,正在长身体,放学回家等不及放书包,便喊肚子饿,不管给她多少,她都会呼呼啦啦地吃下去,哪像现在的孩子,吃饭都要大人逼!

我爱人的身体本来就不好,不久便发现腿也肿了,脸也膀了。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病,谁都会医,药方也很简单:一只蹄膀、一只鸡,加四两冰糖煎服便可以,到哪里去找呢!

我有点心事重重了,走路也闷着头。走过阿二家门前时,他在门内向我招

手。

阿二早已不挖河道了。当年以工代赈时,每天只拿三斤米,他积极工作,毫无怨言,不愧为工人阶级。领导上十分器重他,安排他到搬运站去工作,现在是基层工会的主席。他对我很信任,总以为我说的话都是对的。可不,那黄包车已经进了博物馆,三轮车也不多见,他虽然没有当上司机,却也是司机的领导哩。

我进了阿二家的门,见阿二的爸爸也坐在天井里。这老头儿有好几年对我不予理睬,后来儿子当了干部,定了工资,讨了媳妇,阿三、阿四也都就了业。老头儿也不卖葱姜了,在那摆摊头的地方摆张小桌子,天天晚上弄点老酒抿抿,看见我总是笑嘻嘻地打招呼:“来来,弄一杯!”如今的日子又不太好了,小桌子又搬到了天井里。我喊他一声老伯伯,他想笑却没有张开嘴。

阿二把我拉到一边:“怎么样,我看见阿嫂的脸色有点不对!”

“是啊,有点浮肿。”

“这样吧,我们有两辆汽车到浙江去拉毛竹,毛竹没有拉到,却在哪个山沟里弄来两车南瓜。你准备一辆小板车,天不亮便到码头上,我弄一车给你。”

“不不,我又不是你们单位里的人,怎么好分你们的东西,再说……”

“别说啦,我决不会做那种‘狗皮捣灶’的事情,那南瓜有我一份,你先拉去吃。我们经常有车子在外面跑,总比你活络点。”

“那……”

“那什么呀,去拉吧!”老头儿在旁边插话了,“南瓜有什么稀奇,大农场,拖拉机,我还等着喝你的伏特加哩!”老头儿咧开嘴笑了,他是在挖苦我的。

我也笑了:“老伯伯,你别挖苦我,我还没有翻你的老底呢。那时候阿二去挖河泥,你看见我连头也不点。后来怎么样啦,天天喊我弄一杯。别着急,目前是暂时的困难,好日子会回来的!”

老头儿真心地笑了,连连点头:“对对,我相信,相信。”

千千万万个像阿二爸爸这样的人,所以在困难中没有对新中国失去信心,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旧社会,经历过五十年代那些康乐的年头。他们知道退是绝路,而进总是有希望的。他们所以能在当时和以后的艰难困苦中忍耐着,等待着,就是相信那样的日子会回头,尽管等待的时间太长了一点。我很后悔,如果当年能为他们多炒几盘虾仁,加深他们对于美好的记忆,那,信心可能会更足点!

我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谢天谢地,连忙四处奔走,去借小板车。

小板车借回来了,可那朱自治却像幽灵似的跟着小板车到了我的家里!他的样子很拘谨,也很可怜。叫他坐也不坐,痴痴呆呆地站在门角落里。我暗自稀

奇,现在来找我干什么,难道还对大众菜有意见!

妈妈对朱自治一直很尊敬,硬拉朱自治坐下,还替他倒了杯水:

“朱先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是不是又和孔碧霞吵架啦!”

“哪有力气吵啊,你们看,瘦的!”朱自治叹了口气,拍拍他那曾经两度凸出来的肚子,他那肚子是生活的晴雨表。

是呀,朱自治那个颇有气派的肚子又瘪下去了,红油油的大脸盘也缩起来了,胖子瘦了特别惹眼,人变得像个没有装满的口袋,松松拉拉地全是皮。我说:“忍耐一下吧朱先生,这对你也是一种磨炼!”

“啊……也对,也对。”朱自治迟疑着,想站起来,又坐下去。

妈妈是个饱经沧桑的人,她从朱自治的神态上就已经看出,这是一种有求于人而又难以启口的表现。她在解放前被逼得无路可走时,也曾向朱自治借过钱。她曾经对我说过,向人借钱的日子最不好过,失魂落魄地跑进门,开不出口来又跑出去,低声下气地不知道要兜几个圈子。她大概是不想让自己受过的罪再让别人受,便替朱自治壮胆:

“朱先生,有什么话就说吧,说出来也好让我们帮助。人生一世,谁还没有个为难之处!”

“南瓜。”朱自治没头没脑地开了口,“听说你家去拉南瓜,能不能分点给我,我……给钱。”

妈妈虽然知道朱自治绝不是来借钱的,却没料到他是来讨南瓜,这事儿她不好做主,因为南瓜和我爱人的浮肿病有点关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那就说不过去。不答应朱自治吧,她也觉得说不过去,因为她知道许多公子落难、义仆救主的故事,只好抬起头来看看我:“小庭,你看哪!”

用不着看了,朱自治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在眼前。从他趾高气扬地高踞在阿二的黄包车上,大摇大摆地出入茶馆酒肆,直到今天抖抖缩缩地向人家讨几只南瓜,天意的惩罚也是够受的啦!

我点了点头:“好,分点给你。”

朱自治双手一合:“谢谢,谢谢,我给钱!”说着便把手伸进口袋,他并没有忘记钱的魔力。

我突然产生了反感:“不要钱,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朱自治又慌了。

“跟我一起去拉板车。不劳动者不得食,总不能再叫人把南瓜送到你家里!”

“当然当然,我一定劳动!可……可我不会拉板车,弄不好会把车子拉到河里。”

我一想,这倒也是个实际问题:“你总会推吧,我在前面拉,你在后面推。”

“会，我一定用力推。”

“那好，明天早晨四点钟，你在巷头上烟纸店的门口等我，过时不候！”我给他把时间定死了，劳动者总要守点儿劳动纪律。

第二天早晨三点五十五分，我把小板车拉出了大门，在空寂的小巷里唧唧唧唧地向前滚。

果然不错，朱自治站在那里哩。我本来的意思是叫他站在烟纸店的屋檐下，那里可以避一避深秋黎明时的寒露。可他却紧紧地裹着一件旧雨衣，像个电线木杆似的站在路灯的下面，为的是能让我一眼便看见。我看了很高兴，劳动是能改造人的，起码叫他懂得了准时准点。

“早啊，朱先生，叫你久等了吧。”

“可不是，我已经抽掉了五根香烟！”朱自治说着便脱雨衣，弯下身来帮我推。

我连忙说：“穿上，空车是用不着推的。”我存心要教会朱自治一点儿劳动的本领，便把车杠向上一提：“你看，只要前高后低，重心在后，它自己会向前滚的，费不了多少力。等会儿装了南瓜，也只要你在上坡下桥时帮我一把。到了平地，你只要一手搭住车帮，弯腰向前，把体重压到车帮上，跟着跑跑便可以。”

朱自治嘘了口气，原来这推车也不费力！他把雨衣向手弯里一搭，甩打甩打地走在我的身边。朱自治东张西望，兴致勃勃，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黎明前的苏州，第一次看到清洁工人在路灯下扫地，第一次听到那粪车在巷子里辘辘地滚过去。

“高经理，现在几点啦，我怎么觉得还是在半夜里。”

“四点零三分。怎么，你没有表吗？”我有点奇怪了，朱自治的时间怎么是用抽几支香烟来计算的？

“不瞒你说，读大学的那一年家里给了我一只浪琴金表，我戴了三天就不想要了，总觉得手腕上多了个东西，很不舒服。”

我差点儿笑出来了，那只浪琴金表大概早已下肚，放在肚子里是最舒服不过的。

“那你不要准时上课吗，迟到了也是很不舒服的。”

“迟到，嘿嘿，我根本就不到。野鸡大学，文凭也可以卖的。唉，书到用时方恨少呀，现在想看点儿书了，还有许多字不识呢！”

我对朱自治刮目相看了，不会拉板车也罢，能看点儿书总是好的，开卷有益。

“都看点儿什么书呢？”

“喏，当然是关于吃的，食谱。这些时没有什么吃的了，晚上睡不着，想起自

己一生吃过的好东西,好像那些大盘小碗,花花绿绿的菜肴就在眼前。不瞒你说,我在这方面的记忆力特别好,我能记得几十年前吃过的名菜,在什么地方吃的,是哪个厨师烧的,进口是什么味道,余味又是怎样的……你别笑,吃东西是要讲究余味的,青橄榄有什么吃头?不甜不咸,不酥不脆,就是因为吃了之后嘴里有一股清香,取其余味。人真是万物之灵啊,居然能做出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从天上吃到地下,从河里吃到海里。人要不是会钻天打洞地去吃的话,就不会存在到今天!恐龙只会吃草,那么巨大的东西如今又在哪里?……你别叹气。是的,我也觉得很可惜,当年吃过了也就算了,没有写日记,现在回想起来就不那么全面,所以想看食谱,复习复习,还可以熬馋呢!……哎哎,你慢点走啊,听我说,那些食谱看了叫人生气,记载得很不详细,我认为最好吃的里面都没有,特别叫人生气的是看不起我们苏州的菜,都是些奇里古怪的东西,什么皇帝吃过的。皇帝有什么了不起,每天一百只菜,摆摆场面,还不知道有几只是可以吃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三下江南呀,就是到苏州来吃的……”

我实在熬不住了:“快走吧,拉南瓜去!”我把南瓜二字说得特别响,目的是让他的头脑清醒点。

“对对,我们决不能忽视南瓜,用南瓜照样可以做出上等的美味。你们的店里过去有一只名菜,名叫西瓜盅,又名西瓜鸡。那是选用四斤左右的西瓜一只,切盖,雕去内瓢,留肉约半寸许,皮外饰以花纹,备用。再以嫩鸡一只,在气锅中蒸透,放进西瓜中,合盖,再入蒸笼回蒸片刻,即可取食。食时以鲜荷叶一张衬于瓜底,碧绿清凉,增加兴味。”朱自治背完了食谱,又摇摇头:“其实那西瓜盅也是假的,鸡里并没有多少瓜味。瓜甜鸡咸,二者不配,取其清凉之色而已。我们可以创造出一只南瓜盅,把上等的八宝饭放在南瓜里回蒸,那南瓜清香糯甜,和八宝饭浑然一体,何况那南瓜比西瓜更有田园风味!……”

够了。这一大篇吃经念下来,已经快到码头了。我也不想打断他的话,也不再希望他有什么转变,这人是本性难移!让你去画饼充饥吧,我可要改变主意。我本来想把南瓜分给他一半,现在重新决定:分给他三分之一!

八、殊途同归

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好吃的人和一个反好吃的人居然站到一起来了!“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走资派,朱自治成了吸血鬼,两个人挂着牌子,一起站在居民委员会的门口请罪。

朱自治成为吸血鬼犹可说也,我成了走资派……也有道理。因为在困难年过去之后,我觉得时机已到,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加以检讨,再也不能硬把白菜炒

肉丝塞到人家的嘴里了。何况当时的形势和人们的要求也逼着我的转变。领导上提出要开高级馆子、卖高价菜,借以回笼货币。我们本来就是名菜馆,更是义不容辞的。人们在困难年中饿坏了,连我这个素以不馋而自居的人,也想吃点好东西。妈妈也到自由市场上去游转,五块钱一斤豆油,十块钱一只鸡,看了摇头惊呼,还是笑嘻嘻地拎一只回来,加水煎熬,放在我爱人的面前:“吃吧,孩子,这两年苦坏了你!”老人说这话的时候眼泪都掉下来了,其实我爱人的浮肿病早已消退。只有小女儿兴高采烈,到处宣扬:“我们家今天吃了一只鸡!”好像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高价菜又把朱自治吸引到我们的店里来了,而且是和孔碧霞一起来的。两个人虽然没有套着膀子,却是合拎着一只大草包,一个抓住一个拎襟,相视而笑,十分亲热。那包里装满了高级糖、高级饼,两人刚刚剃过高价头,容光焕发,喜气洋溢,一股子高级香水味。金钱又发生作用了,那垂老的爱情当然是可以弥合的。

二十元一盆的冰糖蹄膀,朱自治一下子便买了两只,分装在两个饭盒子里。我和朱自治自从拉了那趟南瓜之后,见了面都要点头,说两句天气,以纪念那一段共同的经历。困难终于过去了,店里有了东西卖,我也觉得增添了几分光彩。看见朱自治来买蹄膀便和他搭话:“好呀,老顾客又回来啦!”

朱自治也高兴,笑着,拉拉我的手,可那话却是不好听的:“没有办法呀,蹄膀和冰糖自由市场上没有,只好到你们店里来买老虎肉!”

“噢……那你为什么不趁热吃,带回去给孩子?”

“不不,你们的蹄膀没烧透,不入味。我们带回家去再烧一下,再用半斤鸡毛菜垫底,鲜红碧绿,装在雪白的瓷盘里,那才具备了色香味。你们的菜呀,还差得远呢!”

我听了有点懊丧,当时不该把南瓜分给他三分之一。可我也接受了教训,决不把这股气扩散到别人的头上去。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的供应情况又和大跃进之前差不多了,我要致力于炒虾仁,使人对这美好的日子留下更深刻的记忆,人总不能老是后悔。可这恢复工作比我当初的改革要困难百倍,从精细到粗放,从严格到马虎,从紧张到懒散,从谦逊到无理,都是比较容易的,要它逆转可得费点劲儿哩!

包坤年早就不当“店小二”了,这是在我的启发下改变的。他的行政职务虽然还是服务员(对此他很有意见),服务的时候却像个会议的主持人,高坐在那会场似的店堂里。吃客拥进店堂时他便高声大喊:“喂喂,不要乱坐,先把前面的桌子坐满!听见没有,你为什么一个人溜到窗子口?”

“同志,请你来一下。”

“要点菜吗？看黑板，都写着咧。”

“同志，我想要两只苏州名菜。”

“名菜？每一只菜都有名字，写得清清楚楚的。”

几乎每天都有吃客吵到我的面前：“我们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受气的！”我忙着给人家赔不是，同时抓紧时间开会，做思想工作，订服务公约，批评别人，检查自己。还得感谢我们苏州的滑稽艺术家张幻尔（愿他安息）。他那时编演了一个滑稽戏，名叫《满意不满意》。这戏还真帮了我不少忙，我还请他到店里来做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比我的报告有效，所以便招待了他一顿，没有收钱，是在宣传费用中报销的。

以上种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成了罪孽，说我是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伤天害理地强迫革命群众去服侍城市里的老爷！张幻尔的那一顿饭也不是好吃的，陪着我狠狠地被斗了一整天！

包坤年成了头头了，对准着我造反。他那时有一种错觉，认为打倒了局长便可以当局长，打倒了经理便可以当经理。局长已经被人家抢先打倒了，他也只好屈就点。他确实也具备了各种对我造反的条件：历史清白，一贯拥护革命路线，最最难得的是在一九六三年便抵制过我的复辟行为，遭到过我的残酷打击！这话也并非完全捏造，一九六三年我是批评过他，他那名菜都有名字的妙语，还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引用过，虽然没有点名，总会有点压力。所以他在控诉我的罪行时总是义愤填膺，热泪盈眶：“那时候黑云压城城欲摧，我势单力薄，孤军奋斗，只好暂时屈服在他的淫威下面，我盼啊，盼啊……”包坤年经常在店堂里看小说，词儿是不少的，也不空洞，他对我的情况十分熟悉，重磅炸弹都捏在他手里。那时候他老是跟着我转，我也把他当作左右手，可算是无话不谈的。诸如我小时候曾经帮朱自冶买过小吃，住了他家的房子不给钱等等。有些话是为了说明旧社会的不平，有些话纯属闲聊，并无目的。包坤年把这些事儿都串起来了，批道：

“这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从小便被资本家收买，眼看蒋家皇朝的末日已到，便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入我解放区。解放初期伪装积极向上爬，攫取了权力；一有机会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为他的主子效力！”这些话虽然不合事实，却也很有逻辑性。我是在蒋家皇朝末日已到时到解放区去的，解放初期我是很努力，当了经理当然有了权力，一有机会是改变过经营管理！任何事情只要先把它性质肯定下来，怎么说都有理，而且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白马非马”，如果我首先肯定了他是只马，那就不管你是白的还是黑的，你怎么玄也休想滑得过去！要不然的话，世界上的黑白为什么会那样容易被颠倒了呢？

也有人出于一种好奇心理：“是呀，哪有房屋资本家是不收房钱的？不是

一天两天啊，一住几十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人并无恶意，只是想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包坤年可要抓住这些关系做文章了，立刻通过居民委员会去外调。

这个朱自治呀，没说头。他除掉好吃之外还有个致命的弱点——怕打。当包坤年把袖管一捋，桌子一拍，他就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说，你有没有收买过高小庭？”

“收……收买过的。”

“怎么收买的？”

“经常给他钱。”

“在什么地方给的？”

“在酒店里。”

“总共给了多少？”

“大……大约有几十万。”

“啊！这么多的钱你是怎样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用，用不着取，是零钱，对对，是伪币。”

幸亏包坤年要比我的老祖母明白得多，如果他也只知道铜板和银元的话，很可能要闹笑话。

“伪币？……伪币也是钱！快说，解放以后你们是怎么勾结的？”

“没有。解放以后他对我不大客气。”

“胡说，把他带走！”

“啊啊，我该死，我忘了，困难年他还给了我一车南瓜哩！”该死的朱自治呀，他忘了说三分之一，为了这个数字，还害得我多挨了几拳头！

这下子不得了啦，证据确凿，罪行累累！更不得了的还在后面呢，三转两绕把个孔碧霞也牵出来了。她的前夫解放前夕逃往香港，困难年还从香港给她寄过罐头，秘密指令就藏在罐头里！她是潜伏特务，我和特务内外勾结，窃取国家机密……包坤年看的都是反特小说，看多了自己也会编。你看：天亮前的三点五十五分，朱自治穿着一件美制的雨衣（那件破雨衣确实是美国货），歪戴着一顶鸭舌帽（没有戴），站在电灯柱下徘徊，连续不断地抽了五支香烟。准四点，高小庭拉着板车从巷子里出来，左右这么一看，轻轻地说了一声：“走……”故事的开头很有吸引力，因而十分畅销，到处请他去作批判发言。他没完没了地讲着，我弯成四十五度角站在那里，还要不时地回答问题：

“你有没有罪？”

“有罪，我有罪！”我确实承认自己有罪。当年包坤年听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吃饭，便编造出杨中宝开地下饭店，而且还有个妖里妖气的女人收钱。我不但没

有批评他,却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对他重用,加以鼓励。如果编造谎言能得到好处的话,那他为什么不编呢?好处越大,他就会编得更加离奇!

“回答,你是不是罪该万死!”

我拒不回答。我不想死,我要活。我有错误要纠正,还有那愿意为之牺牲的共产主义事业……

拳头又落到我的身上来了,打得并不重,却像刀尖刺在心头,我总觉得包坤年握着的刀柄,有一半儿是我做成的!

居民委员会也不能没有表示,可那批斗的事儿都给包坤年包了,他们捞不到,只好勒令我和朱自治、孔碧霞早晨到居委会的门口请罪。我和朱自治终于站到了一起!

挂着牌子站在居委会的门口请罪,那滋味比“押上台来”更难受。押上台去向下看,黑压压的一大片,也不知道有几个人是我认识的。站在居委会的门口就不同了,巷子里早晨进出的都是熟人。那拎着菜篮的老太是看着我长大的,那阿嫂结婚的时候曾经请我坐过席,那孩子嘛……前几天见了我还喊叔叔哩!我低着头不敢看人,人们也不忍看我。好端端的一个人,又不偷又不抢,怎么突然之间像个吊死鬼似的,一动不动地竖在那里!有人绕道走了,绕不掉的人便匆匆地奔过去,装着没看见。偏偏我又能从他们的脚步和鞋袜上看得出是谁。看得最准确的当然是我的妈妈了,她小时候缠过足,后来才放开,那双半大的脚围着儿子转过多少回啊,如今是那么沉重而零乱,歪斜而迟疑。

只有阿二满不在乎,他走到我身边便高声咳嗽,轻轻地说:“别着急,先熬着点。”

孔碧霞可熬不住呀,她是个爱打扮而又讲风度的人,如今剃了个阴阳头,挂着个女特务的牌子站在那里。特务而加女字,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和非议,因为谁都不会想到女特务会做菜,总是想到女特务会搞一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再加上那个该死的朱自治,居然交代他曾经看到孔碧霞从外国罐头上剥下商标纸,一直压在玻璃台板下,破四旧的时候才烧毁。使得包坤年的故事里又多了一个情节。那密码就在商标纸的背后!孔碧霞又羞、又恨、又急,站了不到半个小时便怦然一声倒地,满脸鲜血,人事不省。亏得居委会主任并不存心要和谁作对,便叫人把她搀了回去。

我对朱自治更加反感了,请罪的时候都离他远点,表示我和他并非同类。你朱自治好吃倒也罢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好吃根本就算不了一回事体。可你为什么那么怕打,为了一时的苟安,竟然不顾夫妻情义,提供那种不负责任的细节。由此我也得出结论,好吃成性的人都是懦弱的,他会采取一切手段,不顾任何是非,拼命地去保护、满足那只小得十分可怜而又十分难看的胃!

第二天一早,阿二带着二十多个搬运工人来了,一个个身强力壮,头上戴着柳条帽。队伍由一部大榻车开路,榻车上装着杠棒、绳索和铁钎。车子到了我们的面前时便往下一停,有人大喝一声:“是谁叫你们站在这里的?”

朱自治又吓了,慌忙回答:“是居委会主任。”

阿二把手一挥:“去几个人,把主任找来。”

五六个人同时拥进大门,把主任拉到了大门口。

“是你叫他们站在这里的?”

“是的,请问你们是哪一派的?”居委会主任感到有些来者不善。

“我们是杠棒派,告诉你,这里不许站人,妨碍交通!”说着便有人到榻车上抽杠棒,拿铁钎。

居委会主任连忙摆手:“革命的同志们,这件事情可以商议,可以商议。”

阿二说:“这样吧,如果你觉得不好交代的话,那就叫他们到拐弯的弄堂里去扫地。”

居委会主任是个很有社会经验的人,他立刻明白了阿二的用意,也没有必要冒挨打的风险,便对我们挥挥手:“回去,各人回家去拿扫帚。”

阿二高兴地膘了我一眼:“不许偷懒,扫得干净点!”

我听了暗自发笑,那拐弯的弄堂是条死弄堂,总共不到三十米,划不了几扫帚。

可是我却无法和朱自治分开,我扛着扫帚进弄堂,他也紧紧地钉在我后面,我扫他也扫,我歇他也歇,还要找机会向我表示谢意:“还是你的朋友好,够交情!”

我忍不住叫出来了:“我的朋友是不讲吃喝的!”

九、士别三日

其实并不是别了三日,三三得九,整整九年我没有见到过朱自治。他大概还住在五十四号里,我与全家下放到农村去了九年。

九年的时间不算太短了,所见所闻再加上亲身的经历,足够我进一步思考吃饭的问题。在思考中度过了五十大寿。

过生日的那一天,妈妈杀了一只老母鸡,开后门弄来一斤洋河大曲,闷闷地喝了几杯。三杯下肚之后突然惶恐起来,怎么搞的,什么事儿还没有干哪,却已经到了五十岁!解放初期我和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一起开会,上下台阶都得看着他点。在我的印象中,年过半百已经是老人了;在农民的生活中,五十岁的人如果有儿有女而且儿女都很孝顺的话,他是不挑重担的。“一事无成两鬓斑,常使

英雄泪满衫！”我虽然不是英雄，却也流下了几滴眼泪。我在泪眼与醉意中胡思乱想：如果能让我重新工作的话，我第一要……第二要……简直像在做梦似的。梦也是一种预感吧，它有时候也能实现，只是实现起来不如梦中那么容易。

灾难过去之后，我又回到了苏州。这一次可不是背着背包回来了，一家大小，瓶瓶罐罐，台凳桌椅，农具家什装满了一卡车。我对苏州城有点不习惯了，觉得它既陌生又熟悉。大街小巷都没有变，可是哪来的这么多人哩！苏州人没有事儿并不是游园林，而是荡马路。如今，你连过马路都得当心点！在大街上碰到多年不见的熟人时，只能站在人行道的边上讲话，讲话要提嗓门儿，还不停地有人从你的肩膀上擦来擦去。大批下放并没有能减少城市的人口，却把个原来比较安静的城市涨得满满的。涨得我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了，只好借住在亲戚的家里。也好，这下子可以和那朱自冶离得远点，他在城东，我在城西。

组织部的同志找我去谈话，那位同志也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当年要饿我三天的老部长早已不在了，愿他安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另外一个城市里“自动跳楼”。什么都懂的丁大头也不在了，他就死在“什么都懂”的上面，而我这个什么都似懂非懂的人却活到了今天……

“组织上考虑，你还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有什么意见？”

我什么意见也没有，只是感到一阵心酸，忍不住自己的眼泪。如果坐在我面前的还是老部长的话，我会和他抱头痛哭的！老部长啊，你再也用不着饿我三天了，我已经深深地懂得了吃饭的意义；放心吧，丁大头，我再也不会硬把白菜炒肉丝塞到人家的嘴里。我要拼命地干，我要把时间放大三倍，一份为了老部长，一份为了你……

“不要激动，过去的都过去了，困难还在前面。”

我点点头。这是用不着说的，每次灾难都是首先影响到吃饭；灾难过去之后第一个浪头便是向食品市场冲击，然后才想到打扮，想到电风扇和电视机。

我的估计没有错，但是还有两点没有估计在内。十年动乱以后乱是停止了，可那动却是大面积的！人们到处走动，纷纷接上关系，访战友，看亲戚，老同学，老上级，有的被关押了十年，有的从反右以后便失去了联系。人们相互打听，谁谁有没有死，谁谁又在哪里。“好呀，看看去！”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会发生一次惊呼：“啊呀，你怎么来啦……”我虽然反对好吃，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反对请客。我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如果丁大头还能来看我的话，我得好好地请他吃三天！

还有一点没有估计在内，那就是旅游的兴起。旅游这个词儿以前我们不大用，一般地都叫做“游山玩水”，含有贬义。现在有新意了，是领略祖国的山河之美。不管是什么意思，我都不反对，人是动物，应该到处走走。特别是欢迎外国朋

友们来走走,请他们看看我们民族的文化,顺便赚点儿外汇。别以为苏州的园林都是假山假水,人工造的,试问:世界上哪有一种文化不是人为的?真山真水虽然伟大,但那算不了文化,是上帝给的。何况苏州的园林假得比真的还典型、集中、完美,全世界独一无二,不是吹的!

苏州的饭菜呢?经理。在这个古老的天堂里吃和玩本来是并驾齐驱的,你既然不反对请客,不反对旅游,还欢迎外国朋友,那就不能落后,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可不是,开始的那阵子人们意见纷纷,什么吃饭难呀,品种少呀,态度坏呀。有人提意见,有人发牢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骂山门。那包坤年还和一帮青年人打了起来,真的挨了几拳头!没有办法,包坤年也需要有个恢复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是服务员,而是司令员,到时候哨子一吹,满堂的吃客起立,跟着他读语录,做首先……然后宣布吃饭纪律:一号窗口拿菜,二号窗口拿饭,三号窗口拿汤;吃完了自己洗碗,大水槽就造在店堂里,他把我当初的改革发展到登峰造极!

别人对我发牢骚,我也对别人发牢骚,我的牢骚只能私下里发:“现在的事啊,难哪……”不能在店堂里发,如果伙着大家一起发的话,那不是要把店堂吵炸啦!我得注意点,年岁也不小了,不能那么毛毛糙糙。特别是对包坤年,得讲个团结,他整天都在等着我打击报复呢!不错,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打过人,但也只是打过我,没有打过别人。朱自冶招得快,没有挨过打,孔碧霞也不是他打的。他自己也是上当受骗,又没有能当上经理,牢骚要比我多几倍!

包坤年挨了人家几拳之后,便到办公室里来找我,面部的表情是很尴尬的:“高经理,我……过去,对不起你……”

我连忙摇手:“算了算了,过去的事情别提,那也不能完全怪你。如果是来检讨的话,那就到此为止;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那就直说,不必顾虑。”

包坤年翻翻眼睛,半信半疑:“我想……我这个人不宜当服务员,说话的嗓门儿都是两样的,容易惹人家生气。过去的那些年胡思乱想,都是不切实际。今后再也不能靠吵吵喊喊了,要凭本事吃饭,技术第一。所以我想好好地学点儿技术。”

“你想离开饭店?”

“不,那也是不现实的。我想去当厨师,学烧菜。不管怎么样,我学起来总比别人方便。”

“噢……”我的脑子悠转着,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包坤年的服务态度恐怕一时难改,很难保证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和人家打起来;二是厨房里确实也需要人,培养年轻的厨师已经成了大问题。我二话没说,马上同意。

包坤年十分满意,到处宣扬:“放心,这个走资派是不会打击报复的,我那么打他,他都没有记仇,你贴了张把大字报,发过几次言有什么关系!”

别小看了包坤年的宣扬,还真起了点稳定人心的作用。人心思治,谁也不想再翻来覆去。牢骚虽多,可那牢骚也是想把事情做好,不是想把事情弄坏,只不过性急了一点。性急也是一种动力,总比漫不经心好些。

我和同志们仔细地研究了吃客的意见,发现除掉有关服务态度之外,要求也很不统一。有的要吃饱,有的要吃好;有的要吃得快(赶着去玩儿),有的不能催(老朋友相聚);有的首先问名菜,有的首先问价钱;有人发火是等出来的,有人发牢骚是因为价钱太贵。不能把白菜炒肉丝硬塞在人家的嘴里,可那白菜炒肉丝也是不可少的,只是要炒得好些。

我的思想也解放了,不搞一刀切,还引进了一点洋玩意儿。不叫大众菜,叫“快餐”,一菜、一汤、一碗饭,吃了快去游园林,否则时间来不及。其实那快餐也和大众菜差不多,只是听起来还有点儿效率。否则的话,人家一看“大众”便上楼,谁都欢喜个高级。我们把楼下改成快餐部,一律是火车座,皮靠椅,坐在那里吃饭也好像是在旅行似的。青年人特别满意,带劲儿,又新鲜,又花不了他们几个钱。我年轻的时候只知道拖拉机,他们现在比我当年懂得多,还知道外国有种餐厅是会转的。怎么个转法我也不知道,反正在火车座儿里吃饭也有动的意味。当然,快餐的味道也不错,如果要添菜也可以,熏鱼、排骨、油爆虾、白斩鸡都是现成的。有个青年朋友吃得高兴起来还对着我打响指:“喂,最好来瓶威士忌!”这一点我没有同意,我担心那威士忌和伏特加也是差不多的。

楼上设立炒菜部,把会场似的店堂再改过来,分隔成大小不同的房间,一律是八仙桌,仿红木的靠背椅,人多可加圆台面,墙角里还放几盆铁树什么的。老年人欢喜怀旧,进门一看便点头:“唔,还是和过去一样的!”其实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如果真和过去一样的话,他们也会有意见:“怎么搞的,二十多年了,还是这样破破烂烂的!”

当我忙得满身尘土、焦头烂额的时候,背后也有人说闲话:“都是这个老家伙,当年拆也是他,现在隔也是他,早干什么的!”我听了心往下沉,什么,我也成了老家伙啦!老……老得还可以嘛,那家伙二字是什么含义?也罢,干活儿不能动手抓,总得使几样家伙的。何况我从拆到造也不是简单的重复,内中有改进,有发展,这就叫不破不立。遗憾的是从破到立竟然花去了二十多年,我的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改造店堂和引进一点洋玩意儿都好办,要恢复传统的名菜,全面地提高质量就难了,难在缺少人才。杨中宝和他的同辈人都纷纷退休了,有的是到了年龄,有的是想尽办法提早退休,好让子女顶替。名菜虽然都有名字,有些菜名青

年人连听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心里也很急,纷纷要求学习,而且对杨中宝十分想念。许多人虽然没有见过杨中宝,但都听师傅说起过,说杨中宝的手艺如何如何,肯定也会说我当年对杨中宝是怎样怎样的。历史不仅是写在书中,还有口碑世代流传!

我决定去求见杨中宝,希望他不计前隙,来为我们讲课,按教授待遇,每课给八块钱。

我去的那天,天下大雨,大雨也要去!

杨中宝见我冒雨而来,十分感动:“啊……你还没有忘记我!”他确实老了,行动蹒跚,耳朵也有点不便。当我说明来意并作了检讨之后,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拍拍我的手背:“你呀,还说这些干什么呢,那些事我早就忘光了。我只记得那里是我的娘家,我在那里学徒,在那里长大。我发过几次狠了,临死之前一定要回娘家去看看兄弟姐妹。你请也要去,不请也要去,听说你们现在忙得不错哩!”

我听了很感动,这是一个老工人的胸怀,也是一个老工人的心意,他对我们的事业是有感情的,那感情比我深厚。

杨中宝来了,是由他的孙子陪同来的。他先把我们的店里里外外看了一遍,不停地点头叫好,说是和过去简直不能比。特别是那宽大的厨房,冰箱,排气风扇,炊事用具,雪白的灶头,他当年在交际处也没有这种条件。我把所有菜单都请他过目,他看得十分仔细。

杨中宝开讲的时候,全店上下都来了,把个小会场挤得满满的。我请他解放思想,放开来讲,多讲缺点。可是杨中宝讲得很有分寸,入情入理:

“我看了,你们工作得蛮好。要说苏州的名菜,你们差不多全有了,烧得也好。缺点是原料不足和卖得太多引起的。这事很难办,现在吃得起的人太多,十块八块全不在乎。据讲有些名菜你们连听也没有听说过,这也难怪,一种菜往往会有很多名字。比如说苏州的‘天下第一菜’,听起来很吓人,其实就是锅巴汤……”

下面轰的一声笑起来了。

“就是锅巴汤,你们的菜单上天天有。有些名菜你们应该知道,但是不能入菜单,大量供应有困难。比如说鲃肺汤,那是用鲃鱼的肺做的。鲃鱼很小,肺也只有蚕豆瓣那么大,到哪里去找大量的鲃鱼呢?其实那鲃肺也没有什么吃头,主要是靠高汤、辅料,还得多放点味精在里面。鲃肺汤所以出名,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到木渎的石家饭店吃了一顿,吃后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多谢石家鲃肺汤。’从此石家饭店出了名,鲃肺汤也有了名气。有些名菜一半儿是靠怪,一半儿是靠吹。”

我向椅背上一靠,深深地透了口气。

“你们的缺点也不少,为什么把活鱼隔夜杀好放在冰箱里?为什么把青菜堆在太阳里?饭店里的东西除掉酒以外,其余的都得讲究新鲜。过去有一只菜叫活炒鸡丁,从杀鸡到上菜只有三分多钟,那盆子里的鸡丁好像还在动哩!”

包坤年举手发言了:“杨师傅,请你说说,这么快都有什么秘密?”

“也没有什么秘密,主要手脚快,事先做好一切准备,乘鸡血还未沥干时便向开水里一蘸,把鸡胸上的毛一抹,剃下两块鸡脯便下锅,其他什么也不管。这……这主要是供表演用的,也可以为厨师增加点名气。”

杨中宝为我们讲了两个多钟头,又到厨房里去实地操作表演;老人的兴致又高,不肯休息,回家后便犯老病,睡了十多天。

我本来想打报告,把杨中宝请回来当技术指导,补足他的原工资,外加讲课津贴。现在再也不敢惊动他了,让老人安度晚年。青年人的学习热情很高,不肯罢休,说是刚刚听出点味道来,怎么能停下呢!这话很对,我过去没有重视人才,更没有想到培养的问题,现在悔之未晚,得加倍努力!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主意:出招贤榜!谁熟悉哪个烧菜的名手,都可以推荐,不管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讲一课都是八块钱,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叫出租汽车去接。

这一下可坏了,一张招贤榜又把个朱自治引到了我的身边!

十、吃客传经

不知道是谁首先想起了朱自治,一经宣扬以后,人人都很同意。这使我十分吃惊,原来好吃也会有这么大的名气!

是的,请朱自治来讲课的理由是很充分的。他在一九三八年开始便到苏州来吃馆子——这还没有把他在上海的“吃龄”计算在内,不间断地吃到了“大跃进”之前。“三年困难”之间虽然一度中断,但他从未停止在理论上的探讨,据外间流传,就是在那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写成了一本食谱。“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什么都肯交代,唯有这份手稿却用塑料纸包好埋在假山的下面。此种行为的本身就可以跻身于科学家、理论家、文学家的行列,且不说他到底写了点什么东西。包坤年说得好:“只要他讲讲一生都吃了哪些名菜,就可以使我们大开眼界!”我同意了。我再也不能把个人的好恶带到工作里。何况我不见朱自治已经整整十年,十年寒窗还能中状元,你怎么能把个朱自治看死呢?可是我没有亲自登门求教,是包坤年叫了一部出租汽车去的。朱自治六十八岁,符合我所说的坐车条件。包坤年说他想借此机会去向朱自治和孔碧霞检讨,过去的事情是一时昏了头。我想也对,这个检讨由他去做比较适宜,谁欠的账谁还,我也不能包揽。

朱自治讲课的那一天,也是我主持会议。他的吃经我已经听过一些了,特别

是关于南瓜盅,我的印象是很深的,我要听听这些年他到底有了哪些发展。

朱自治并不是很会讲话的人,尤其是到了台上,他总是急急巴巴、抖抖合合的。讲起吃来可大不相同了!滔滔不绝,而且方法新颖。他一登台便向听众提出一个问题:

“同志们,谁能回答,做菜哪一点最难?”

会场活跃,人们开始猜谜了:

“选料。”

“刀功。”

“火候。”

朱自治一一摇头:“不对,都不对,是一个最最简单而又最最复杂的问题——放盐。”

人们兴致勃勃了,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吃家竟然讲起了连一个小女孩都会做的事体。老太太烧菜的时候,常常在井边上,一面淘米一面喊她的孙女儿:“阿毛,替我向锅子里放点盐。”世界上最复杂和最简单的事情都有最大的学问,何况我们的几个老厨师都在频频点头,觉得是说在点子上面。

朱自治进一步发挥了:“东酸西辣,南甜北咸,人家只知道苏州菜都是甜的,实在是个天大的误会。苏州菜除掉甜菜之外,最讲究的便是放盐。盐能吊百味,如果在鲃肺汤中忘记了放盐,那就是淡而无味,即什么味道也没有。盐一放,来了,鲃肺鲜、火腿香、莼菜滑、笋片脆。盐把百味吊出之后,它本身就隐而不见,从来也没有人在咸淡适中的菜里吃出盐味,除非你是把盐放多了,这时候只有一种味:咸。完了,什么刀功、选料、火候,一切都是白费!”

我听了大为惊讶,这朱自治确实有点道理!

朱自治的道理还在向前发展:“这放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因人、因时而变。一桌酒席摆开,开头的几只菜要偏咸,淡了就要失败。为啥,因为人们刚刚开始吃,嘴巴淡,体内需要盐。以后的一只只菜上来,就要逐步地淡下去,如果这桌酒席有四十个菜的话,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就不能放盐,大家一喝,照样喊鲜。因为那么多的酒和菜都已吃了去,身体内的盐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水,水里还放了味精,当然鲜!”

朱自治不仅是从科学上和理论上加以阐述,还旁插了许多有趣的情节。说那最后的一只汤简直不能放盐,是一个有名的厨师在失手中发现的。那一顿饭从晚上六点吃到十二点,厨师做汤的时候打瞌睡,忘了放盐,等他发觉以后拿了盐奔进店堂时,人们已经把汤喝光,一致称赞:在所有的菜中汤是第一!

整整的两个小时,朱自治没有停歇,使人感到他的学识渊博,像冰山刚刚露了点头。他在掌声中走下台来,挺胸凸肚,红光满面,满头的白发泛着银光,更增

加某种庄重的气息。包坤年从人群中挤上去,紧紧地拉住了朱自治的手:“朱老,你讲得太好了,我都作了记录,只是记录得不全面,我想带只录音机到府上去拜访,请你再讲一遍。”

“这个嘛……可以,不过最好请你在下午三点以后,我吃了饭得睡一会儿。”

“当然当然,你以后的报告我一定当场录下来,不再麻烦你。我想根据录音再加整理。”

“不必了吧,我是随便讲讲的。”

“哪里,你的讲话太珍贵了,不留下来太可惜!”

“好吧,整理好给我看看。”

“一定,一定要请你过目的。”

朱自治到底在野鸡大学里混过,老来颇有点教授风度;包坤年一贯重视收集材料,热情也是可掬的;我也向朱自治发出邀请,请他下个星期继续讲下去。

朱自治连续为我们讲了三课,包坤年借来一只四喇叭,把朱自治的讲话全部录下。可惜的是讲到第二课大家便有点着急,讲了半天的盐,这盐怎么还没有放下去呢!厨师们不像我那么外行,放盐的重要性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更想知道朱自治在放盐上有哪些绝技。朱自治不像杨中宝,他只肯在台上讲,不肯到厨房里去表演。讲到第三课的时候便开始说故事了,说是哪一年和哪几个人去游石湖,吃了一顿船菜如何精美;哪一年重阳节吃螃蟹,光是那剔螃蟹的工具便有六十四件,全是银子做的。而且讲来讲去只有一个观点,现在的菜和过去不能比,他以前说皇帝不懂吃,现在又说清朝是如何吃的。我当然不能说他是宣扬今不如昔,却也产生了一点怀疑,饭菜不比文物,文物是越古的越值钱。如果在山洞里发现了一幅原始社会的壁画哪,了不起!可那山洞里的烤野牛是否也算是最好吃的?厨师们打哈欠了,有的干脆回家去睡觉,说是不听他吹牛。讲到第四课味道就不正了,把什么大姑娘唱小曲儿,卖白兰花,叫堂会等等都夹在菜里面。

我决定叫暂停,可那包坤年有意见,说是这样珍贵的材料如果不及时抢救,那是要对历史负责的!

我听到对历史负责就发憊,心里就没有个底。很难说啊,万一那朱自治还有许多货真价实的东西没有讲出来,或者说他已经讲出来的东西我们并不理解,那倒真是要负责的!好在这一类的难题现在已经难不倒我了,我也学会了一套,即遇事拿不准时,千万不能说死,这里打一个坝,那里要留一个口,让他走着我瞧着,到时候再说话,总归是我对。

“这样吧,朱自治的报告必须暂停,因为人们已经听不下去。抢救材料的事情当然不能停,反正你已经开始了,那就由你负责到底,我可以提供一定的条件。”

包坤年雀跃了：“买个四喇叭！”

“四喇叭不能买，那是属于集团购买力，要上面批。录音磁带你可以买，宣传费用中可以报销，也不要全买TDK，买点儿国产的。”

包坤年十分满意：“高经理，谢谢你的信任，我一定把这个任务好好地完成。”

讲课就这样结束了，朱自冶前后讲了三课，三八二十四，外加出租汽车费。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另外的一个口子还开着哩，那录音磁带不停地向外流。

包坤年每隔一个星期便要报销两盒磁带，而且全是TDK，我在批发票的时候便问他：“你的任务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包坤年神气活现：“啊呀经理，现在的事情闹大了，到处都来请朱自冶作报告，而且都是找我联系，不会有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不想结束，决定成立一个烹饪学学会，对外联络可以有个正式的名义。朱自冶当会长，我当副会长，你也是发起人之一。考虑到你的工作忙，所以请你当理事长，挂挂名的。”

“啊！”我的脑袋嗡了一下，立刻产生了一种条件反射，那包坤年要成立战斗队！

“不不，我不能参加，我对烹饪学是一窍不通！”

“不需要你通，表示赞助而已。”

“不不，我赞助不起，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费，当年请张幻尔吃顿饭，也不过花了一盘磁带的钱。”

包坤年笑了：“经理呀，你也真是……赞助不等于要钱，钱我们有办法，可以印讲义。你看地摊上卖的《缝纫大全》，一本一块多，成本才几毛钱？穿的有人要，吃的还愁没有生意！何况我们可以趁作报告的时候往下发，用不着私人掏腰包，人家也有宣传费。”

我看着包坤年直翻眼，佩服。他实在比我还会做生意，我只想到掏私人的腰包，没想到要挖公家的宣传费。可以预料，那比掏私人的腰包更容易。我无权反对他们这样做，只好提一点忠告式的意见：

“讲义也不能瞎编呀，不能把那些大姑娘唱小曲儿等等的东西也编进去。”

“不不，讲义是我执笔的，它和小说不同，全谈学术，牵不到男女关系。”

我笑笑，在发票上签了个名：“拿去吧，下次请买国产的。”

包坤年拎起发票抖了抖：“放心吧，下次用不着你批了，我们还要买四喇叭，买计算机！”

说实在，我没有把包坤年的话全当真的，他们想得起劲罢了，成立个学会谈何容易！就凭包坤年这点儿烧菜的本领，再加上朱自冶讲放盐，又有多少学术可以研究呢，弄不成的。包坤年喜欢赶时髦，赶那么一阵子就要回头。

我想得太简单了,过分低估了包坤年的活动能力。不错,包坤年在烧菜方面的本领还没有学到家,可是他在估量形势,运用关系方面却很老练。饭店是个公共场所,什么人都有;有名的饭店当然会有有名的人物前来光顾,只要主动热情,多加照顾,帮着订菜订座,那关系便可以搭上去。老的搭不上便搭小的,通过小的也可以牵动老的,包坤年便可由此而登堂入室,看准时机,帮助人家操办家庭宴会。儿女婚事,老朋相聚,用得着酒席的地方很多,花几个钱也不在乎,唯一困难的是缺少技术与劳力。包坤年精力充沛,技术虽然不太好,但他能请动技术很好的老师傅。老师傅会烧,朱自治会吹,包坤年能跑腿,酒席价廉物美,包你满意。趁人家吃得高兴时,他们便宣传烹饪学学会的宗旨,请求赞助。如果他们是成立营养学学会的话,赞助的人可能不多,营养学虽然可以防病健身,延年益寿,但是很难懂,而且也不如烹饪学实惠,烹饪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是有一桌丰美的筵席放在你的面前!“学会”二字也很有吸引力,反动学术权威早已打倒了,现在人人都知道,任何学术总比不学无术好,赞助学术不会犯错误,即使错了,学术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讨论得越多越有名气!

朱自治的名气越来越大了:一个老专家,在十年浩劫中写了一本书,某某经理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用小汽车接他去作报告,出两百块工资请他当顾问,他不去……

包坤年在外面活动的风声,朱自治那越来越大的名声,呼呼地吹到我的耳朵里。“让他走着我瞧着,到时候再发表意见。”现在时候已经到了,我也无话可说了。我不能说朱自治讲课是吹牛,大家别去听,听一次讲放盐还是可以的。我也不能揭朱自治的老底,说他一贯好吃,死不悔改……正中,一个人要做出点学问来,必须终身不渝,坚持到底!对于包坤年我也不好说什么,我不能说他是开地下饭店,他再也不找我在发票上签字。唉,一切实用主义的工作方法都是自搬石头自砸脚,有的随搬随砸,有的从搬到砸要隔几十年!

十一、口福不浅

过了不久,我的老朋友阿二到店里来找我。我们两个人虽然不再住在一条巷子里,可是两家人家却经常来往。当我搬进新大楼的时候,他们一家都来道喜,连阿二的爸爸也由孙子们搀扶着爬上楼。他对我的妈妈说:“恭喜你呀老嫂子,你活了一生一世,从今以后再也不必担心房东会把你赶出去!”我的妈妈老迈了,回不出话来,只是擦眼泪。阿二更是经常到我家来,说说老话,坐一坐。有时候觉得老话也重复得太多了,便抽烟喝茶,无言相对,好像也是一种享受。他直接到店里来找我,这还是第一次。

阿二见了我便把手一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件事情求求你。”

“什么事？”

“我家大男要结婚了，就在这个星期天。我想到你们店里订两桌酒席，可你们要排到三个星期之后！经理呀，能不能帮帮忙呢？”

我为难了：“哎呀，你何必来凑这种热闹，人家在饭店里摆酒是图排场，收人情，省事情。你也准备收人情吗，我应当送几十块呢？”

“去，我也不准备大请客。你家、我家、亲家，还有几个小朋友，总共不到二十人。”

“那好，两桌酒席你家摆不下吗，不能摆在天井里吗？你到店堂里去看看，闹哄哄的，想说几句高兴的话谁也听不见；到时候服务员要下班，拿着扫帚站在旁边，你能吃得安逸？”

“啧啧，哪有卖瓜的说瓜苦的。”

“瓜倒不苦，不是吹的，现在的几只菜都不推扳，表扬信收到了一大堆，可我总觉不如家宴随便。还有一个问题不好解决，我们有店规，凡属本店的工作人员，一律不得在本店与熟人同席，以免吃客们产生误会。你叫我怎么办，站在边上看！”

“嗨，那不能。这一次我要好好地请你喝两杯，当年如果不是你动员我参加失业登记，今天的情况也许就是两样的。”

“行，自家办。我可以帮助你请个好厨师，呱呱叫的手艺。”

阿二笑了：“那倒不必，我们家人手多，个个能动手。鸟枪换炮啦，伙计，人人都有一两样拿手菜哩！”

“更好，一人烧一只，我烧最后的一只汤。”

阿二拱拱手：“免了，你的汤我已经领教过了。星期天晚上早点来，等你。”

我的心里喜滋滋的，真的等着这桌酒席。我给他家惹过麻烦，害得阿二的爸爸摆葱姜摊头；也就是在那个天井里，阿二叫我去拉过南瓜，如今在那里摆上两桌酒啊！不吃也美！

正当我美的时候，包坤年蹦跳着进来了，看样子他也很美；我美他也美，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

包坤年高高地叫了一声：“经理，给！”把一张印着金字的大红请柬塞到了我手里。我把请柬翻过来一看：“为庆祝烹饪学学会成立，特订于二十八日中午（星期日）假座××巷五十四号举行便宴招待各界人士，务请大驾光临。”好，又是一顿酒席来了！我对这桌酒席的反应很快，不假思索地便说了出来：“抱歉，我星期天有个约会，要到人家吃喜酒去。”说着便把请柬向桌上一丢。

包坤年搔搔头皮：“你那是什么时候？”

“晚上六点。”我又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好极了,不冲突,我们是中午十二点。”

我再把请柬拿起来看看,果然不错,中午二字明明白白地印在那里。我只好摆观点了:“不行,我没有参加你们的学会,也算不了是哪一界的人上,去是不合适的。”

“经理呀,正是因为你肯当理事长,才使得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空出一个理事长的位子来,解决了大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早就吵散啦,学会到今天也不能成立!”

“噢!”原来如此,参加是一种赞助,不参加还是更大的赞助!事物的因果关系实在微妙之极!

“去吧经理,某某某都去了,你不去是不像话的。又不是开大会,也不要你发言,纯粹是吃,一顿美餐,不去很可惜。”

“我不大欢喜吃。”

“那就少吃点,见识见识,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业务学习。老实告诉你吧,这一桌酒席是百年难遇。朱自治指挥,孔碧霞动手,我们几个人已经忙了四天。所有的理事都想参加,挤不进来的大有意见。没有办法,孔碧霞有规矩,最多不得超过八人,再三商量才同意改用圆台面,连你十个。”

包坤年的话使我动摇了。当年杨中宝到孔碧霞家去吃饭,只听说吃得好上天,却一直不知道究竟吃了些什么东西。如今有了机会,不去见识一下是会终身遗憾的。何况我参加不参加都是赞助,如果再空出一个位子来,还不知道会引出什么后果哩!

“好吧,我去。”

“一言为定,不来接你了,五十四号你是熟悉的。”

“太熟悉了,我闭上眼睛也能摸到。”

五十四号我是很熟悉,读中学的时候我每天都要从那里经过,常常看见有许多油光锃亮的黄包车停在门口,偶尔还有一辆福特牌的小轿车驶过来,把巷子里的行人挤得纷纷贴上墙头。那两扇黑漆的大门终日紧闭着,门上有一条缝,一个眼。缝里投信件,眼里装有玻璃,据说这是一种窥视镜,里面能看清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叫花子是敲不开门的。那时候沿门求乞的人很多,差不多的人家都装有这种东西。我从来不知道那门里是什么样子,只是看见那高高的围墙上长满了爬墙虎,每到秋天便飘送出桂花的香气。如今的桂子又飘香了,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各界人士”,又到了五十四号的门前。

那扇黑漆斑驳的大门敞开着,有一位年轻而漂亮的妇女站在门里面。她的穿着很入时,高跟皮鞋,直筒裤,银灰色的衬衫镶着两排洁白的蝴蝶边,衬衫也

是束腰的。她笑嘻嘻地迎了上来,我以为是收入场券的,连忙把请柬掏出来给她看。她掩嘴,深深一鞠躬,左手向前一伸:“请进。”跟着便高声地叫喊:“妈妈,高经理来啦!”

噢……对了,她就是孔碧霞的女儿,是那个政客兼教授留下来的。姑娘也应该有这么大了,连我的女儿都有了孩子。我再回过头来看看她,活像孔碧霞,孔碧霞年轻的时候,也该是一代风流!

孔碧霞从那条铺着石子的花径上走过来了。我抬头一看,简直不认识了,她好像已经把原来的脸型留给了女儿,自己变成了一个半老的贵妇。现在不会有人喊她干瘪老阿飞了,她也发了胖,胖得丰满圆润,比站在居委会门前请罪时年轻得多。她的头发向上反梳着,在后脑上高高隆起。这种高,正好抵消了因发胖而造成的横向发展,所以不会造成人们视觉上的错误,好像发了胖的女人都比以前矮了一点。她的衣着并不花哨,时间已经使她懂得了打扮的真谛:年轻而漂亮的人不管穿什么衣裳都好看,淡妆浓抹都相宜。年老的人如果要打扮的话,主要是用衣着来表示某种风度和气质而已。所以孔碧霞的衣着很素净,一件普通的蓝色西装外套,做工考究,质地高贵,和她的年龄、体形都很相配。

孔碧霞对我很热情,像她这样精细的人,很难忘记细小的事情。

“高经理呀,就怕你不来哪。唷,也老了,当阿爹了吧?”

“没有,刚当上外公。”

“好,都是一样的。快请进,就等你开席。”

我跟着孔碧霞往前走,一个幽雅而紧凑的庭院展现在面前。树木花草竹石都排列在一个半亩方塘的三边,一顶石桥穿过方塘,通向三间面水轩。在当年,这里可能是那位政客兼教授的书房,明亮宽敞,临水是一排落地的长窗。所有的长窗都大开着,可以看得清楚,大圆桌放在东首,各界人士暂时都坐在西头。

包坤年从桥上走过来了,把我向各界人士一一引见。其中有两位是朱自治的老吃友,我当年替他们买过小吃的。有一位是我的老领导,我年轻时便听过他的报告。其余的三位我都不熟悉,一个沉默寡言,两个谈笑风生,谈吐间流露出一股市侩气。

朱自治穿着一套旧西装,规规矩矩地系着一条旧领带,领带塞在西装马甲里。这套衣裳不知道是从哪个箱子的角落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浓重的樟脑味,可是朱自治穿着并不显得滑稽,反而使我肃然而有敬意。好熟悉,这种装束是在哪里见过的?对了,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老师们的衣着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一派是长袍蓝衫,一派是西装革履。国文教员总是穿长袍,物理教师都是穿西装的。烹饪学属于科技,穿长袍蓝衫显得太陈旧,穿制服又没有特点,穿崭新的西装又显得没有根基,西装而是旧的,妙极!好像是一个潦倒多年的老科学家刚被重视,

刚被发现！这一身打扮肯定是出于孔碧霞的大手笔，朱自治穿衣裳一贯是很拆烂污的。

朱自治多年不穿西装了，行动很不自然，碰碰撞撞地越过几张椅子，把一本烹饪学讲义塞到了我的手里。我拿着讲义在我的老领导的面前坐下，也觉得十分拘谨。解放初期当我还在工作队的时候，曾经和这位领导同志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不苟言笑，要求严格，对知识分子有点不以为然的人。我们那一伙“小资产”在他的面前都装得十分规矩而谨慎。今天在此种场合中相遇，还使我感到有点手足无措，最主要的是找不出话来说，只好把手中的讲义慢慢地翻阅。

“小高。”

“哦。”

老领导叫了我一声小高以后，也发现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立刻改了口：“老高呀，你要好好地看看这本书，多向人家学习学习。”

“是，我一定好好地拜读。”

“现在不能靠外行领导内行了，要好好地钻进去。”

“是的，我在这方面过去犯过错误。”

“知道错误就好，现在还来得及。”

我点点头，继续把讲义翻下去，发现这本由朱自治口述、包坤年整理的大作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是从几种常见的食谱中抄录而来的，而且错漏很多，不知道是抄错的还是印错的。我抬起头来看看朱自治，想向他提出一点问题，可那朱自治却避开我的目光，双手向前划着，好像赶鸭子似的请大家入席。

人们鱼贯而出，互相谦让，彬彬有礼，共推我的老领导走在前面。

人们来到东首，突然眼花缭乱，都被那摆好的席面惊呆了。洁白的抽纱台布上，放着一整套玲珑瓷的餐具，那玲珑瓷玲珑剔透，蓝边淡青中暗藏着半透明的花纹，好像是镂空的，又像会漏水，放射着晶莹的光辉。桌子上没有花，十二只冷盆就是十二朵鲜花，红黄蓝白，五彩缤纷。凤尾虾、南腿片、毛豆青椒、白斩鸡，这些菜的本身都是有颜色的。熏青鱼、五香牛肉、虾子鲞鱼等等颜色不太鲜艳，便用各色蔬果镶在周围，有鲜红的山楂，有碧绿的青梅。那虾子鲞鱼照理是不上酒席的，可是这种名贵的苏州特产已经多年不见，摆出来是很稀罕的。那孔碧霞也独具匠心，在虾子鲞鱼的周围配上了雪白的嫩藕片，一方面为了好看，一方面也因为虾子鲞鱼太咸，吃了藕片可以冲淡些。

十二朵鲜花围着一朵大月季，这月季是用钩针编结而成的，很可能是孔碧霞女儿的手艺，等会儿各种热菜便放在花里面。一张大圆桌就像一朵巨大的花，像荷花，像睡莲，也像一盘向日葵。

人们从惊呆中醒过来了,发出惊讶的叹息:

“啊……”

“啧啧。”

还没有入席我就受到批评了:“老高,你看看,这才是学问哪!看你们那个饭店,乱糟糟的。”

我没有吭气,四面打量,见窗外树影婆娑,水光耀廊,一阵阵桂花的香气,庭院中有麻雀吱吱唧唧。想当年那位政客兼教授身坐书房……

朱自治又把两手向前划着,邀请大家入席。同时把领带拉拉松,作即席讲说:

“诸位,今天请大家听我指挥,喝什么酒,吃什么菜,都是有学问的。请大家不要狼吞虎咽,特别是开始时不能多吃,每样尝一点,好戏还在后面,万望大家多留点儿肚皮……”

人们哈哈地笑起来了,心情是很愉快的。

“……吃,人人都会,可也有人食而不知其味,知味和知人都是很困难的,要靠多年的经验。等会儿我可以一一介绍,敬请批评指教。开席,拿酒杯。”

包坤年立即打开酒橱,拿出一套高脚玻璃杯,两瓶通化的葡萄酒。这一套朱自治不说我也懂了,开始的时候不能喝白酒,以免舌辣口麻品不出味。可我就想喝白酒,我学会喝酒是在困难的时刻,没有六十四度不够味。

包坤年替大家斟满了酒,玻璃杯立刻变成了红宝石,殷红的颜色透出诱人的光辉。葡萄美酒夜光杯,那制作夜光杯的白玉之精也可能就是玻璃。

包坤年是副会长,斟完了酒总要讲几句的,为了要突出朱自治,多讲了也不适宜,便举起筷子来带头:“同志们请吧,请随意……”

朱自治也不想为别人留点面子,煞有其事地制止:“不不,丰盛的酒席不作兴一开始便扫冷盆,冷盆是小吃,是在两道菜的间隔之中随意吃点,免得停筷停杯。”说着便把头向窗外一伸,高喊:“上菜啦!”

随着这一声叫喊,大家的眼睛都看住池塘的南面,自古君子远庖厨也,厨房和书房隔着一池碧水。

电影开幕了:孔碧霞的女儿,那个十分标致的姑娘手捧托盘,隐约出现在竹木之间,几隐几现便到了石板曲桥的桥头。她步态轻盈,婀娜多姿;桥上的人,水中的影,手中的盘,盘中的菜,一阵轻风似的向吃客们飘来,像现代仙女从月宫饭店中翩跹而来!该死的朱自治竟然导演出这么个美妙的镜头,即使那托盘中是装的一盆窝窝头,你也会以为那窝窝头是来自仿膳,慈禧太后吃过的!

托盘里当然不是窝窝头,盖钵揭开以后,使人十分惊奇,竟然是十只通红的番茄装在雪白的瓷盘里。我也愣住了,按照苏州菜的程式,开头应该是热炒。什

么炒鸡丁、炒鱼片、炒虾仁等等,从来没见过用西红柿开头!这西红柿是算菜还是算水果呢?

朱自治故作镇静,把一只只的西红柿分进各人的碟子里,然后像变戏法似的叫一声:“开!”立即揭去西红柿的上盖:清炒虾仁都装在番茄里!

人们兴趣盎然,纷纷揭盖。

朱自治介绍了:“一般的炒虾仁大家常吃,没啥稀奇。几十年来这炒虾仁除了在选料上与火候上下工夫以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发展。近年来也有用番茄酱炒虾仁的,但那味道太浓,有西菜味。如今把虾仁装在番茄里面,不仅是好看,请大家自品。注意,番茄是只碗,不要连碗都吃下去。”

我只得佩服了,若干年来我也曾盼望着多给人们炒几盘虾仁,却没有想到把虾仁装在番茄里。秋天的番茄很值钱,丢掉多可惜,我真想连碗都吃下去。

唔,经朱自治这么一说,倒是觉得这虾仁有点特别,于鲜美之中略带番茄的清香和酸味。丁大头说得不错,人的味觉都是差不多的,不像朱自治所说有人会食而不知其味。差别在于有人吃得出却说不出,只能笼而统之地说:“啊,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吃!”朱自治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说得出来,虽然歪七歪八地有点近于吹牛,可吹牛也是说得出来的表现。在尽情的享受和娱乐之中,不吹牛还很难使那近乎呆滞的神经奋起!

“仙女”在石板曲桥上来回地走着,各种热炒纷纷摆上台面。我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只知道三只炒菜之后必有一道甜食,甜食已经进了三道:剔心莲子羹,桂花小圆子,藕粉鸡头米。

朱自治还在那里介绍,这种介绍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他开头的一笔写得太精彩了,往后的情节却是一般的,什么芙蓉鸡片、雪花鸡球、菊花鱼等,我们店里的菜单上都有的。

人们的赞叹和颂扬也没有停歇:

“朱老,你的这些学问都是从哪里得来的?”

“很难说,这门学问一不能靠师承,二不能靠书本,全凭多年的积累。”

“朱老,你过了一世的快活日子,我们是望尘莫及。”

“哪里,彼此彼此,‘文化大革命’和困难年也是不好过的。”

“算啦,那些事情都过去了,吃吃!”

“是呀,将来到了共产主义,我们大家天天都能吃上这样的菜!”

我听了肚里直泛泡,人人天天吃这样的菜,谁干活呢,机器人?也许可以,可是现在万万不能天天吃,那第五十八代的机器人还没有研制出来哩!

“老高。”

“哦。”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像朱老这样的人才你以前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知道，我很早便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请他去指导指导，把你们的饭店搞搞好。”

“请……请过，我们请他讲过课。”

“那是临时的，没有个正式的名义。”

人们突然静下来，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凝神了。在今天的这顿晚餐里，似乎要谈什么交易？！

“名义……这名义就很难说了。”

“也是一种专家嘛！”

“叫什么专家好呢？”我等待着人们的回答。科学家、文学家、表演艺术家，你哪一家都靠不上去！

“吃的……”说不下去了，“吃的专家”是骂人的。

“会……”会吃专家也不通，谁不会吃？

包坤年把筷子一举：“外国人有个名字，叫‘美食家’！”

“好！”

“对！”

“美食家，美食家！”

“来来，为我们的美食家干一杯！”

朱自冶踌躇满志了，忍不住把那旧西装敞开，举杯离座，绕台一周，特别用力地和我碰了碰杯，差点儿把那薄薄的玻璃杯都碰碎了。是呀，他那吃的生涯如今才达到了顶点；辛辛苦苦地吃了一世，竟然无人重视，尚且有人反对，真正的价值还是外国人发现的！

我只恨自己的孤陋寡闻，一下子就败在包坤年的手里。我只知道引进“快餐”，却没有防备那“美食家”也是可以引进的。好吃鬼、馋痨坯等等都已经过时了，美食家！多好听的名词，它和我们的快餐一样，也可以大做一笔生意。如果成立世界美食家协会的话，朱自冶可当副主席；主席可能是法国人，副主席肯定是中国的！

人们在欢乐声中拨动了第十只炒菜，这时候孔碧霞走了进来，询问大家对炒菜的意见。人们纷纷道谢，邀请孔碧霞同饮一杯。我站起身来为孔碧霞斟满酒，举起杯：

“谢谢朱师母，你的菜确实精美，谢谢你，也谢谢孩子，她为我们奔走了半天。”我对孔碧霞也没有多少好感，但是我得承认，她确实是做菜的能手，二级厨师的手艺，应该由她来当烹饪学学会的主席或者是副主席。世界上的事情是会做的往往不如会吹的，会烧的也不如会吃的！

孔碧霞很高兴：“哪里，能得到经理的称赞很不容易。”她举起杯来划了个大圈子：“怠慢大家了，几只炒菜连我也不满意，现在没有冬笋，只好用罐头。”

“啊，没说的。”

“来来，为美食家的夫人干一杯！”

一杯干了以后，包坤年开始收酒杯了，别以为宴会已经结束，早着呢，现在是转场，更换道具的。

朱自治又拿出一套宜兴的紫砂杯，杯形如桃，把手如枝叶，颇有民族风味。酒也换了，小坛装的绍兴加饭、陈年花雕。下半场的情绪可能更加高涨，所以那酒的度数也得略有升高。黄酒性情温和，也不会叫人口麻舌辣。我向那酒橱也了一眼，看见还有两瓶五粮液放在那里，可能是在喝汤之前用的。我暗自思忖，这桌饭不知是谁出钱，是朱自治的银行存款呢，还是人家的宣传费？

孔碧霞告辞以后，下半场的大幕拉开，热菜、大菜、点心滚滚而来：松鼠桂鱼，蜜汁火腿，“天下第一菜”，翡翠包子，水晶烧卖……一只“三套鸭”把剧情推到了顶点！

所谓三套鸭便是把一只鸽子塞在鸡肚里，再把鸡塞到鸭肚里，烧好之后看上去是一只整鸭，一只硕大的整鸭趴在船盆里。船盆的四周放着一圈鹌鹑蛋，好像那蛋就是鸽子生出来的。

人们叹为观止了：

“老高。”

“欧。”

“你看看，这算不算登峰造极？”

“算。”

“就凭这一手，让朱老到你们的店里去当个技术指导还不行，每月给个百二八十的。”

我明白了，这恐怕是今天的中心议题，连忙采取推挡术：“不敢当，我们的庙小，容不下大菩萨。”

“你们的庙也不小呀，就看庙主的眼力啰……”

幸亏那只三套鸭帮了忙，当它被拆开以后人们便顾不上说话了，因为嘴巴的两种功能是不便于同时使用的。

我看了看表，这顿饭已经吃了将近三个钟头，后面还要喝五粮液（我很想喝），还会有一只精彩的大汤作总结，还会有生梨或者是菠萝蜜。可我不敢终席了，因为终席之后便是茶话，那圈套便会绕到我的脖子上面。

“实在对不起，我下面还有一个约会，不能奉陪到底。谢谢朱先生，谢谢诸位，谢谢……”我不停地说道谢谢，不停地向后退，退了五步便转身，径直奔石板桥

而去。过得桥来回头看,见那长窗里的人都呆在那里。

我觉得今天的举止很不礼貌,也不光彩,好像是逃出来的。如果不向女主人打个招呼,那孔碧霞会伤心,她是很要场面的。

孔碧霞和她的女儿还在忙着,听说我要走,有点儿扫兴:“啊呀,大概是我做的菜不好吧,不合你的胃口!”

“哪里,你的菜做得确实不错,什么时候请你到我们的店里去讲讲,交流交流。”

孔碧霞笑了:“有什么好交流的,这些菜你们都会做,问题是你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细模细样地做,还得准备个十几天……哎,你不能再坐会儿吗,还有一只大汤咧。”

“知道……”我突然想起件事情来了,“朱师母,今天的甜菜里面怎么没有南瓜盅?困难年朱先生和我一起去拉南瓜的时候,说是要创造出一只南瓜盅,有田园风味!”

孔碧霞咯咯地笑了:“你听他瞎吹,他这人是宜兴的夜壶,独出一张嘴!”

十二、巧克力

出了五十四号向西走,到阿二家去。天啊,那里还有一桌酒席等着我哩!我什么也不想吃了,三套鸭不好消化,那一番谈话也值得回味。可我想和阿二、和他的爸爸干几杯,当然是白酒,六十四度,喝下一口之后像一条热线似的直通到肚里,哈地一声长叹,人间无数的欢乐与辛酸都包含在内。

秋天对每个城市来说,都是金色的。苏州也不例外,天高气爽,不冷不热,庭院中不时地送出桂花的香气。小巷子的上空难得有这么湛蓝,难得有白云成堆。星期天来往的人也不多,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忙家务,家务之中吃为先,临巷的窗子里冒出水蒸气,还听到菜下油锅时噉啦一声炸溜。

从五十四号到阿二家,必须经过我原来住过的地方,这地方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石库门,白粉墙,一排五间平房向里缩进一段,朱自治住过的小洋楼就在里面。我仿佛看见阿二的黄包车就停在门前,朱自治穿着长袍从门里出来,高踞在黄包车上,脚下铃铛一响,赶到朱鸿兴去吃头汤面。四十年来他是一个吃的化身,像妖魔似的缠着我,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还在无意之中决定了我的职业。我厌恶他,反对他,想离他远点。可是反也反不掉,挥也挥不走,到头来还要当我的指导,每月给个百二八十的。百二八十是多少?加起来除以二,正好是一百元人民币!如果杨中宝能来当指导,我情愿在一百之外再加二十,奖金还不计算在内。可这朱自治算什么,食客提一级最多是个清客而已,他可以指导人们去

消遣,去奢靡,却和我们的工作没有多大的关系。美食家,让你去钻门子吧,只要我还站在庙门口,你就休想进得去!

一直走到阿二家,我心中的怨气才稍稍平息。这里是个欢乐的世界,没有应酬,没有虚伪,也谈不上奢靡。天井里坐满了人,在那里嗑瓜子,吃喜糖。我的一家都来了,包括我那个刚满周岁的小外孙在内。这孩子长得又白又胖,会吃会笑,还会做眯眼,捏捏小拳头和人表示再会。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娃娃可以有六个大人在他的身上花费物力和精力。满天井的人都以娃娃为中心,给他吃,逗他笑,从这个人的手里传到那个人的手里。

有人把硬糖塞到我那小外孙的嘴里,他立刻吐了出来。

“怎么,他不吃糖吗?”

“他呀,要吃好的!”

“试试,给他巧克力。”

有人拿了一条巧克力来,剥去半段金纸,塞到孩子的手里。果然,这孩子拿了就往嘴里送,吃得嗞嗞咂咂地流口水。

人们哄笑起来了:“啊呀,这孩子真聪明,懂得吃好的!”

我的头脑突然发炸,得了吧,长大了又是一个美食家!我一生一世管不了个朱自治,还管不了你这个小东西!伸手抢过巧克力,把一粒硬糖硬塞在小嘴里。

孩子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满座愕然,以为我这个老家伙的神经出了问题。

附言:本文是小说,纯属虚构,不得已而借用苏州风物,此亦文学之惯技,务请读者诸君不必一一查对。

——作者再拜

迷人的海

● 邓 刚

蓝色的海,黄色的岸。

他像一个酱褐色的海参,慢慢地爬着,从冷如冰窖的海水里,爬向暖和和的岸。在他前面十几米的地方,有一堆救命的柴草堆,一盒半打开的火柴——这是他下水以前细心准备好的。细小的柴枝在最下面,粗一些的在上,一层层地重叠成人字形;火柴盒用一块鹅卵石压住,以防海风吹跑,精选出来的三支质量最好的火柴棍,半截露在外面——这完全是为冻僵的人准备的。此时他用双肘支撑着身躯挣扎地爬着,一寸一寸地与柴堆缩短距离。他的身后,拖着一个沉重的网包。渔叉和渔刀当当唧唧地撞击着地上的石蛋子;里面肥大的,肉乎乎的海参,还有贝壳上闪着七色彩光的鲍鱼、光滑似玉的大海螺。它们随着这个人每前进一步而紧张地蠕动着,并发出咕咕的吐水声。它们离开海就是死,他爬向岸就是生,显然,他战胜了它们,获得了胜利。

他是个身形魁梧的老海碰子,像棵苍劲的松树那样挺拔。但他的脑袋仿佛在滚水中烧炼过,面部的肌肉扭曲,皮肤褶皱,给他添上了几分粗犷的气息。据说,当年他在水下,突然被一条大鱼吞进肚里,他用刀刮开鱼肚钻出水面,但两只耳朵在鱼肚里化掉了,面孔也就模糊了。可是,他在海碰子中间,这张面孔却给他增添了光彩,使他在这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享有盛名。

他能凭着一口气量潜进深深的水下,在那静静的蓝色世界里,在那刀锋箭簇般的暗礁丛中,游鱼一样钻来窜去,捕捉价值昂贵的海珍品,享受着迷人的猎获趣味。但这毕竟是凭一口气量,因为,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稍不慎,尖削的牡蛎壳会轻易地划开皮肉,曼舞的海藻会无情地缠住身躯,狭窄的礁洞会突然截住出路,还有刺骨的、湍急的暗流、冷流、底流,会把人突然在水下冻僵、冲昏,拖向老洋深处。这一切,全凭着一口气量去对付,去周旋,去撞击。因此,人们赋予干这个行当的人,有个粗野、勇猛,甚至有些文理不通的称号——海碰子。千百年来,人们这样呼着、叫着,什么意义呢?谁也不知,也许是将生命抛进浪涛里

碰大运吧。

终于,他挨进了这救命的柴草堆。但他并不是迫不及待地去抓那三根火柴。他是极有经验的,否则就会坏了大事。这就像一个饿枯了胃肠的人突然见到丰美的食物,必须抑制狼吞虎咽一样。他艰难地忍受着,用两肘支着地面,一点一点地收缩两条腿,一直到盘起双腿,渐渐坐稳。此时,他用哆嗦的手在干鹅卵石上反复地蹭着擦着,直到上面的水迹大部分消尽,才伸出手抓住了火柴杆。嚓——一束光亮送进柴草堆里,旋即漫出一缕淡淡的烟气。那突兀而生的火舌开始是懒散地在柴草里游动了一阵,然后呼地蹿起几尺高的火苗子。“啊啊!”那人从地面一跃而起,将整个身子向火堆倾去,就像一条活蹦乱跳的牙偏鱼,在火苗上反复烧烤。那火舌像无数枚炽热的钢针,穿透他的皮肤,扎进肉里、骨缝里,驱除使他激烈战栗的寒气。这种灼烫的疼痛不仅不使他感到一丁点痛苦,反而使他觉得说不出的舒适和快活。他的酱条石般的硬板板的身子变得柔软起来,黑黝黝的皮肤开始显出一块块红斑。“啊啊,烤出花来了!”他惊喜地喊道。这是海碰子的行话,就是烤到数了。火舌渐渐地往地面回缩,他的身子也跟着伏了下去,直至把肚皮烤得火辣辣地疼(这时他才有疼的感觉),然后,再慢慢地翻过身,将四肢反支起,烤脊梁。烤痛了再翻过去,就像一个杂技演员在反复做高难动作。身上的红斑渐渐扩大,连成云状的一片片,并放出光来。他这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恋恋不舍地放弃了那堆苟延残喘的炭火,随手从网兜里抓出几个大海螺扔进去,那海螺立即发出啾啾的声响,并冒出带着焦糊味道的鲜香气来。此时,潮流还没回涨,他赶紧将网兜里的猎物倒在地上,并摆好再次生火的柴草,抓起那铁青色的渔叉和渔刀,朝奔涌的大海走去。

他在冰冷的海水里和灼烫的火烟中泡磨炙烤了五六十年来,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牛筋般扭紧的肌肉,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伤痕累累的身躯。浪花砸上去,立即摔碎成千百滴油珠子,不剩一丝水迹。他对远近百里海域,水面上每一支暗流,水下每一处暗礁,都了如指掌。他曾是个浓眉大眼、浑身乌亮的汉子时,俊俏的闺女们也朝他瞄过眉眼。但他不屑一顾,拥抱绸缎般的浪涛已使他精疲力尽和心满意足了。后来,在漫长的碰海生涯里,曾有过一闪即灭的失悔,特别是当他偶尔看到乱石丛中伸出的一朵干枝梅,淡蓝色的海面上游着一对海鸭子时,他的心尖就异样地颤动了几下,但立刻就过去了。因为那汹涌的浪涛给了他更丰富的内容和乐趣。他是这个世界最穷和最富的人,穷得每一文钱的来源,都得使他把整个生命抛进浪涛里换取;富得一日三餐,他都大口地嚼着海参鲍鱼。他的一生都在搏击,拼杀,夺取和寻求,尤其这“寻求”二字给他腾波踏浪的一生,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迷人的魅力。他却寻求到五垄刺儿的海参(一般海参身上只有四排小肉刺儿),这是奇迹!这奇迹不仅是多出一刀菜(海参做菜时,

一垄刺儿切一刀),而是给人一种美好的想象和诱惑。是啊,只要敢于寻求,五垄刺、六垄刺儿算什么!他要寻找最珍贵的,世代代海碰子终生寻找过但始终未寻找到的东西。当他还蹒跚学步时,老一辈海碰子们讲到这个神物时,声音都颤抖着:“那是宝啊!没有福气的人是得不到它的,有错鱼守护呢!”错鱼什么样?谁也没看见,但是谁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钢刀一样的身子,一公一母交错立在那里。“厉害呀,嚟——齐刷刷把人切成两段!……”老海碰子的爷爷不安分,强求过,结果他死在浪涛里;老海碰子的父亲强求过,结果他也同样惨死在浪涛里。老海碰子没见过爷爷的尸体,但见到父亲的尸体,虽然血糊糊的,但是完整的,并没有被错鱼切成两半。是根本没有那可怕的错鱼,还是父亲没有潜到错鱼守护的地方?老海碰子终生都在用行动揭这个谜。

山那面的海,叫半铺炕,那是个平静的海湾,即使是涌起风浪,也伤不了筋骨的。但也没有五垄刺儿的海参,更不用说那神秘的宝物了。老海碰子在那样的海里,可以横冲直撞,如走平地,但是他离开了那里。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力气和收获是等价交换的。他选择了这边的海。

这边的火石湾,才是真正的大海,刀一样直切下来的陡岸,全是坚硬的火石(因为这种橙黄色的石头受撞击就会迸出火花,所以海碰子称为火石),像一道金灿灿的屏障,贴着这陡岸直拔上去的是高高耸立着的火石山。在这刀削的陡岸中间,有一道豁口,下面有五十步长,五十步宽的小天地,铺着黄澄澄的鹅卵石。尽管这里天地狭小,但老海碰子却很满足,因为他的用武之地是豁口外的一铺万里的大海。他还满足的是背后那陡削的高山,隔开了那个烟雾萦绕、噪噪营营的世界。豁口两侧的石壁轰轰地响着,迸碎的浪花从两面齐往豁口处喷洒,透着白光,现出一闪即灭的七彩光环。老海碰子兴奋了,这才是男子汉的海,只有他才会享受这种乐趣!就是死在这里也值得!可是,他哪里知道,现在,恰恰有另一个人,也悄悄地来到火石湾,要分享他的这种乐趣:与他一样寻找那迷人的希望!这个人已经来到火石湾,他却没有发现,浸沉在自己的欢乐里……

“我会得到的!”他执著地自语,高高地扬起手臂,将系着网兜的葫芦头扔进水里,一手攥着渔叉,一手攥着渔刀,一个鱼跃,扎进翻滚的浪涛里。身子便箭样地钻进黑绿色的水中。他手中的渔叉渔刀也朝前直竖,那闪着寒光的锋刃劈着水,一直向下沉去。这段行程只能用三分之一的气量,这是严格计算好的,因为必须保证三分之二的气量在水下工作。在这一团模糊的水层里,也会出现奇丽的景色。有时,一大群丁鱼(只有一根钉子长短的小鱼),铺天盖地而来。仿佛千万支金针银线,在黑沉沉的空间流曳,把老海碰子团团织在其中。这使他感到快活,也有些慌。因为他知道,凡是这种鱼的后面,往往会跟着一些追食的大鱼。他根据鱼的外形来叫名的。有一种鲨鱼,它的头部高高隆起,两腮很滑稽地向两旁

凸出,很像古代的相公帽,这种鳌鱼似乎也像相公那样文雅礼貌,见人频频点头,然后,从左面蹭你一下,又从右边蹭你一下,好像亲昵地缠着你。其实它这是在试探人的能力,因此它蹭你的速度越来越快,直到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时,才猛地露出狰狞相,恶狠狠地扑来。但也有那种直率的,毫不讲客气的鲨鱼。那是一种有尖削的头颅,火箭般身形的箭鲨,一排锯齿般的尖牙闪着白粼粼的光。它的凶狠远超过山中的虎狼,它那对阴沉的小眼睛能在几里以外的水下看见人肉闪光。当它在百十米之外发现目标,便像炮弹一样射来,饥饿使它的凶猛、残忍和智力增强了数倍,它不仅在水下横冲直撞地扫荡鱼类,而且会自动地跃出水面,攻击站在船头和礁边的渔人。它那飞跃在半空中的身子灵巧地横扫一下,刀片式的长尾将人扇进水里,然后,再去吞噬。海碰子最提防这种鲨鱼。

老海碰子潜到海底一两米处,那水色便豁然亮堂了,五彩斑斓的礁石尽收眼底。在那一片白花花牡蛎丛中,撒满了孔雀蓝色、玫瑰色、橘红色的五角海星,像艳丽的花朵,闪着莹莹的光。这些漂亮的海星并不是装饰海底景致,而是在残酷地吸噬牡蛎肉。一大群老态龙钟的黑鱼游过来,瞪着博士眼珠,在研究老海碰子是什么动物。然而老海碰子连看也不看这些肥美的大黑鱼,这些家伙是水层中间鱼,灵得很,渔叉是弄不到的。但对付底鱼(贴近沙滩活动的鱼),他的渔叉便显出神功来。多年的碰海生涯使他练就一对灼亮的神眼。只要他略一扫视,便会看出货色来。那些像一张树叶似的浮在沙地上的牙偏鱼,牛舌头鱼,石蜚子鱼(背面上长些石斑状保护色,极难辨认)和胖头鱼。它们总是紧贴在沙子上一动不动,一旦遇到不妙的情况,周身花边般的鱼翅就急速扇动,一股沙烟泥雾立即翩然而起,降落在鱼背上,渐渐就盖得严严实实。但是,鱼尽管伪装得巧妙,却要露出两个咕哩咕噜的眼珠子观察动静。老海碰子最会识别这种假象的。这时,一条烟叶似的大牙偏鱼飘然而至,老海碰子稳住不动,等它伏沙伪装后,准备动手擒拿,谁知这鱼夺路而逃,攀礁而上,游过了横在它头前的一排围墙般的暗礁。老海碰子惊呆了,虽然他成千上万次潜进水下,却很少看见牙偏鱼侧着扁扁的身子,扇动着周身花翅,飞快地升到礁石的顶端,像一片金叶在湛蓝的空间翩然而下,顺着礁背面的斜坡逃遁了。老海碰子垂着渔叉,眯着友善的目光,欣赏着那条牙偏鱼的精彩表演。他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充实,虽然在冰冷的水下,他的心胸却炽烈地燃烧起来。这种燃烧常常使他有些神经质。有时,一块奇形的石子儿,一蹲玲珑的暗礁,一片磨亮的贝壳,都使他精神振奋,也许这就是一个海碰子寻求美好愿望的激情。

他沿着狭窄的礁缝急速地游动,一个长长的大海参躺在那里,酱褐色的身子缀满了一行行小肉刺儿,刺儿尖泛着淡白色,像密密麻麻的花点,远远看去那样迷人。海参最熊,不会跑也不会蹦,只有老老实实地束手就擒。但它对付鱼类,

有一套本领,当鱼张口扑向它时,它便来一个特殊反应,刷地将肚里的肠子喷出去,那鱼一口衔住,以为猎物到手,立即摇摆而去。海参这时早借着喷吐肠子的反作用,退出半尺远,保全了性命。但在人的面前,这一切伎俩就等于零了。老海碰子在一道礁缝里就捕捉了五个大海参,装进腰间的小网兜里,双脚照地猛地一蹬,身子嗖地升起,等脑袋蹿出水面,已是气力殆尽。他大声地呼吸了一阵,便又扎进水下。腰间的网兜装满了海参,他便浮出水面,踩着水,寻找漂浮的葫芦头,然后将海参转装进葫芦头上挂的大网兜里。渐渐地,他喘气的声音和活动的姿势不那么从容了,在水下待的时间越来越短,升浮的速度越来越快,嘴巴露出水面的喘气声越来越大。但他还是继续拼命地扎着猛子,不断地寻找猎物,一个劲地呼吸、憋气、扎猛、升起,机械地重复这一系列动作。

终于,他感到冰冷的水泡透了他的皮肤,进而进肉里、骨头里。他开始慢慢地失去了活力,变得麻木了,眼球里的火花也逐渐熄灭。水、礁石、海参和鱼全融成模糊的一团,他这才推着被网包压得半沉下去的葫芦头,艰难地朝岸边游去。再度去烤火,再度去补充热量,再度去积蓄力气,再度攥着渔叉渔刀,把自己抛在冰冷的海涛里。

在一个潮流不到半天的时间里,海碰子一般是下三次水。就是说他们的肉体在灼烫的火苗里加热半个小时,然后在冰冷的海水里冷却半个小时,这种加热和冷却要反复六次。当老海碰子最后一次游向岸去,才发现豁口处多了一个小黑点。那小黑点渐渐变大,终于,他看清了,是一个小海碰子。

那小海碰子虽然块头小,却很神气地站在那里,默默地审视着老海碰子出水、上岸、点火和烤身的每一个动作,俨然是个小监考官。老海碰子有些不快,他不愿意在这个最狼狈的情况下被别人这样注目,而且还是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孩子!于是他尽力控制着全身的颤抖,故意装作不在乎,虽然烤火时照样翻来覆去地做着滑稽动作,但决不叫出声来,在小辈人面前呻吟,可真不像话了。当他在激烈的炙烤下恢复正常功能时,便把目光朝小海碰子那边瞥过去。小家伙看样子不到二十岁,还是个孩子,他在海碰子队伍中还没有见过这么个幼嫩的小东西。那翘起的鼻头和红嘟嘟的小嘴,勾勒出一条温柔的曲线,脸蛋上还毛茸茸的,像一个注满汁水的小香瓜。但脖子下面那套衣服却使老海碰子生出火气,小挽领,紧贴身,显得挺括利索。海碰子穿那种摆浪的衣服,逛海吗?就这身衣服也不合格!当海碰子应穿那种厚、肥、大、结实、保暖的衣服,白天烤火能遮风兜热;晚上睡觉能当被做褥。然而小海碰子根本没理会他的怒气,竟然仔细地将全身衣服脱下叠好。按规矩,应该过来拜上两句,用海碰子话说“借借风”。但小海碰子毫不理会,就地摆开架势,立了门户。老海碰子有一种被冷落之感,不禁怒气

横生：太放肆了！方圆百里的海碰子，还没见过这个样的！不过看到赤身裸体的小海碰子时，他倒几乎要笑了。这麦面捏似的身子也能下海？没有棱角的骨架在圆润的嫩肉里包裹着，小肚皮溜光溜滑的，纤细的小脚被沙窝里的冷水泡了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粉红色。这样的小脚能蹬水？他撇了一下嘴，心想：差远啦！肚皮上的汗毛还没烧光呢！他的气消了大半。浪有些大了，豁口处不时地迸散着七彩光环的浪花，小海碰子有些惊奇，不时地张大嘴，露出一口小白牙，更显出嫩相来。看着这个柔嫩的小东西，老海碰子不由得想起那有力的蟹钳，锋利的鱼牙，尖削的牡蛎壳和那狭窄的暗礁缝。

“会弄碎的！”老海碰子揉搓着浑身烤出盐末的皮肤，竟在心下为这个不顺眼的小东西叹息了。

小海碰子也许看出了老海碰子的神情，便故意晃着身子走过来，显示其老练。还盯着地上的一堆海参，说道：“货挺厚呀！”老海碰子惊奇地扬起脑袋，他没想到小家伙会说出这么老成的一句海碰子的行话，便不由细细打量他一番。这时，他才看得清楚，那张小香瓜似的脸上呈现出一圈水镜压出的印痕，胳膊和大腿处已划出一道道稀疏的伤口，光滑的肚皮上面的汗毛，开始烧得焦卷起来。看来，有点来历！他问道：“半铺炕那边来的吧？”

小海碰子脸似乎一红，但老实地点点头。

“怎不在那儿待着？”

“那什么货色，四垒刺儿！”小海碰子露出很自负的样子。

老海碰子一怔，但没动声色，心里在冷笑，瞧不起四垒刺儿，哼，没看看你自己几垒刺儿！小嘴鱼吃蟹子，也不量量自己多大牙口！他轻视地扫了一眼小海碰子，谁知小家伙正朝他眯睁着眼，并突然喊道：“你是从鱼肚子里钻出来的？”嫩嫩的小脸上充满了又惊又喜的神情。

老海碰子却闭上眼睛，不屑一顾，这正是老辈对少辈表示骄傲的一种方式。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海碰子中间，谁不知道！

“那大鱼呢？”小海碰子并不是一味地敬仰，也不等他回答什么，却问起那鱼了，好像是几百年前就准备好的问号，终于盼到今天问了。

这个问号可大大地伤了老海碰子的自尊心，从那九死一生的鱼腹中逃出性命来，已是千幸万福了，已是天下第一了不得了的事了，还要那鱼！真不知天高地厚！黄口小儿，不值一驳！老海碰子根本就没睁开眼皮。谁知小海碰子竟叹了一口气，为那条跑掉的大鱼惋惜，好像在说，你这事做得太缺心眼了，太欠考虑了，太不完美了，太不值得那么多的海碰子敬重了！老海碰子终于按捺不住，抬起眼皮，却见小海碰子正从裤衩后面拔出闪光的渔刀，挥舞了一下，那气势，也要钻进鱼肚子一次，并豁开它，但不只是逃命，还要把那大鱼拖上来！

老海碰子终于什么话也说不出，他有些疲倦，便就势往沙滩上一躺，闭上眼睛。但是他睡不着，小海碰子正在那边甩臂劈腿，做下水前的运动。“哼，海猫子不知潮流，涨潮下水！”老海碰子冷笑着自语，又投过一瞥——他被一道灼亮的东西刺了一下，不由得睁开眼睛。只见全身披挂整齐的小海碰子，手里正攥着一支亮铮铮的渔枪。他近来模模糊糊地听说这个新玩意儿，是半铺炕那边的海碰子们用好钢打造的，上面安着一些巧妙机关，一勾扳机，枪头就会戳透鱼身，据说瞄哪儿打哪儿，极有准的。但是老海碰子并不认真听别人夸这家什儿，他从心里根本就不屑一顾。尤其是半铺炕那边的产物，他就更瞧不起。世世代代的海碰子都使渔叉，叉的鱼还少吗？那可是腕子上的硬功夫，练不出来，便想新花样，懒人懒招儿，想不出力气弄鱼，笑话，不会使叉算什么海碰子！

小海碰子却走过来，嘻嘻地笑着，朝他那渔叉踢了一脚，说道：“该扔了，这破玩意儿！”老海碰子差点儿跳将起来，说我这渔叉是破玩意儿，别闪了牙帮子！他这铁青色的渔叉啊，爷爷用过它，父亲用过它，是一块车轴钢打出来的，什么样的车轴，拉两千斤石头的车轴！这渔叉什么样的鱼没叉过？牙偏鱼、牛舌头鱼、胖头鱼……它还叉过一条十七斤八两的大鱼呢！别看它浑身锈迹斑斑的，这是鱼血和盐水咬的，是业绩，是资格！你那渔枪算什么，叉过十七斤八两的鱼吗？他想起那条麻袋大小的牙偏鱼，在渔叉上扇动时的重量，使他在海里翻了好几滚儿……他充满感情地瞅了一眼横在地下的渔叉，心里却忽地一下发虚了，这条立下过丰功伟绩的渔叉此时竟那样难看，尽管他时时霍霍打磨，叉尖总闪着一簇寒光，但与那支机关巧妙、亮光光的渔枪一比，简直就像废铁条一样毫无颜色，畏畏缩缩地躺在地上，没有一丝威风。老海碰子终于没跳将起来，突然，又被一件什物定住了。原来小海碰子那窄窄的小脚上正套着两只大胶皮脚（橡皮鸭蹼）！那胶皮脚又宽又扁又大，颤颤的，鲇鱼尾一样，扇起水来，比他乒乓球拍子似的脚有力多了！小海碰子身上的现代化武器多着哪，他也根本不使用老海碰子那个碍事绊脚的葫芦头做漂子，而是从衣兜里取出一小卷东西，鼓着腮帮子吹一阵，便凸起一个比葫芦头还大得多的圆气球，当然比葫芦头轻飘多了。“真他妈的！”老海碰子不知是恨还是爱地骂了一句，有些颓丧起来。但是，当小海碰子转过身去，小脚后跟闪出两块绑得紧紧的红布条时，他这才恢复了一丝元气，轻轻一笑。这也是半铺炕那边的胆小鬼发明的玩意儿，据说能防鲨鱼，哈哈，那凶猛的大鲨鱼会怕这小小的红布条吗？再说，怕鲨鱼还当什么海碰子，在家老老实实地待着吃海菜得了！老海碰子得意地坐起来，这时，他觉得小海碰子身上的一切都暗淡无光了。

大海涨潮回流了。那城墙般的排浪“啊啊”地吼着，朝岸边压来，豁口两边交叉喷过来的浪花更猛烈了，犹似两扇白花花的水帘，遮住整个豁口，轰击的涛声

夹带着咸味的海风又不断地朝豁口里灌，顺着他们背后狭窄的山径寻找出路。那小海碰子像故意演给老海碰子看，头戴水镜，腰挎渔刀，足蹬脚蹼，手攥渔枪，全副武装，雄赳赳地走向浪涛轰鸣的海。

“看不出潮流吗？！”老海碰子终于在后面发声喊，亮出老一辈海碰子的威风。

小海碰子却回过头来嘻嘻笑着：“染染身子（试试水）！”

这又一句老练的海碰子行话，不仅使老海碰子站立起来，并使劲地揉搓了一下眼睛。

这是一个莽撞的、毫无经验的小海碰子，但他却高傲而自负得很，他觉得世界就像晴天的海那样平坦，任他遨游。因此，他不相信什么艰难困苦，也不崇拜任何英雄，他觉得他会同那些英雄一样，当然要比他们更强些。其实他也有崇拜，那就是崇拜自己。半铺炕那温柔的海使他更坚定了“藐视一切”的信念。终于，他听到五垄刺儿的海参，听到了刷鱼肚子的老海碰子，听到了比这一切更美好和更可怕的，有错鱼守护的东西。他开始有些吃惊，有些思索，进而有些不服气，这种不服气使他不甘于同半铺炕的海碰子们为伍，于是他来到火石湾。青春的热血在他心胸里沸涌，他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老海碰子默默地注视着小海碰子的每一个动作，他感到这是一个冒失鬼。下水之前，只是胡乱地蹦跳一阵，把烤火的柴草随便地往沙滩上一扔，任它散堆在那里；甚至连海都不看一眼，就扑通一声扎下去，泥鳅一样钻进绿色的浪涛里。下水之前要观察一下海，这是老海碰子最注意的事，在内行的海碰子眼里，海不是一块蓝色的平面。细细看去，在闪动的波纹里有几道颜色略异的带子，那就是海流子。海流子是海中的河流，有着湍急的流速，但海参、鲍鱼和扇贝最喜欢生活在海流子里，因这流动的水时刻保持新鲜、清凉、干净。这海流子的速度也是随着潮流的涨落而变化着的。坐南朝北的海，涨潮时，水流从西朝东奔走；退潮时，水流又掉过头来朝西流；潮终时，水流子稳住不动近半个钟头。多大多急的流子，老海碰子都能从里边捞出货来，这就是他抹住了稳流的时间和规律。小海碰子哪懂这个，只凭自己的力气和热情干，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拍动脚蹼，在身后啪啪地打出两朵雪白的水花，拖着长长的浪道，身子挺得像一艘小炮舰，灼亮的渔枪在头前开路，煞是威风。但这威风不一会儿就丧失殆尽，他扎了几个猛子，就被哗哗流淌的海流子拖得远远的，这样，他大半的精力全用在挣扎着上岸。海底也不是到处都有暗礁（只有暗礁处才有东西），一个猛扎下去发现暗礁有货，要浮上来“定位”。这“定位”也是极有讲究的，游泳技术再高的人，只要漂在水上，就会被浪推流拖，暗暗移了位，再扎下去决不是原来的位置。小海碰子

就吃这个亏,他刚刚扎一猛是暗礁,捕捉了几个海参,正想高兴,可第二个猛扎下去,却是一片白茫茫沙地。只好浮上来再扎猛找,连扎几个空猛,气力全部消尽。海碰子最怕扎空猛,同样是扎猛,手抓不上货来就觉得气力格外消损,常言道:“好汉架不住三个空猛!”老海碰子是决不吃这个亏的,每当他发现一处暗礁有货时,先不急于干,而是赶紧浮上水面“定位”。他“定位”的方法既简单又高超,这就是看岸边的目标。俗话说“风吹浪打山不动”。老海碰子就是看准那稳坐四方的火石山峰。看准了火石山那金灿灿的尖顶,定住自己的位置,那浪下的暗礁怎么也不会丢的。

小海碰子毕竟太年轻了,他还没有这么多的经验,甚至他也根本不相信什么经验。他只相信自己那支亮灼灼的渔枪、脚蹼和目空一切的想象。他看到老海碰子的那鱼刺状的骨架、锈斑斑的渔叉和那可笑的葫芦头,完全像上一个世界的古物,就断定自己比老海碰子强一百倍。人们把老海碰子说得那样威风,那样神能,可真使小海碰子奇怪得不行,他嘲笑还来不及呢!但是,他被湍急的水流拖来拖去,又连连扎了几个空猛以后,终于精疲力尽,浑身哆嗦起来,他这才感到火石湾的厉害,怪不得半铺炕那边的海碰子一提火石湾就脸色突变。他拼命地拍打着脚蹼,挣脱海流子的冲击,拖着空空如也的网漂子朝岸上奔命。他像小叭狗一样爬出水面,战战抖抖地朝柴草堆连爬加跑,因为他背后拖着的网兜只装几个可怜的海参,所以爬得速度更快些。老海碰子不声不响地盯着小海碰子,他倒要看看这个毛头小家伙怎样点燃这胡乱堆在地上的柴草。他毕竟是老人,感情还是细腻的,当看到这个稚嫩的小叭狗爬上岸时,心里就有些不忍。他虽然想看看这个狂妄的小海碰子的狼狈相,但同时又暗暗摆好一堆柴草,好让小家伙在点不旺火的急难之时,马上能得到温暖的火。谁知他白操了这份老心,人家小海碰子更有招儿。只见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小瓶汽油,朝柴草上转圈一浇,啪地按了一下打火机,那火苗轰然而起,竟蹿得一人多高。小海碰子欢快地蹦着跳着,那火舌也张牙舞爪地乱飞,似乎在嘲弄老海碰子,你那堆火算什么,萤火虫一样!老海碰子生气了,觉得受了委屈,看着自己刚刚尽心尽意摆的那堆柴草,不由得气哼哼地踹了一脚。

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一次又一次空着网兜上岸,终于使小海碰子垂头丧气了。尽管他年轻,有脚蹼,有亮光光的渔枪,有吹气儿的水漂子,有汽油,有打火机,但他拿不上货来。当一次次看到老海碰子拖着沉甸甸的网兜,满载而归。他服气了,渐渐地变得聪明起来。他不再频频下水,凭自己的一腔热血蛮干了,而是垂手站立,将一对稚气的大眼睛投向老海碰子。他开始感到,那一身伤痕累累的老皮,那鱼刺状的骨架,那锈渔叉,那葫芦头,都不那么简单了。他几乎是不眨眼地盯着老海碰子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像一个最优等的见习生。

小海碰子的这一明显的变化,当然逃不过老海碰子的眼睛,他暗暗感到一股满足:这会儿知道厉害了吧?哼,差远哩!于是,老海碰子表现得更老练和稳重了,甚至有些高兴地在这个小海碰子面前表演自己的精彩技巧。

老海碰子扎进黑蓝色的水下,一大群肥胖的黑鱼照例友好地围上来,它们认熟了这个面孔模糊的人,知道他没有能力伤害自己,于是毫无顾忌地跟在他身后转悠,一旦见到他去掀那橘红色的扇贝时,便一拥而上,去吞食扇贝根带起的一些毛毛茸茸的小生物。老海碰子不耐烦地挥动渔叉吓唬这些贪吃的家伙,但它们只是稍微摆动一下尾巴,照样簇拥在刚刚掀下的扇贝根处。有的鱼干脆连尾巴也不摆动。老海碰子叹了一口气,对付这些灵活的、浮在水层中间鱼,他那柄渔叉连个渔夫的小鱼钩都不如。但是,老海碰子突然听到一个异样的声响,噗——一条大黑鱼在那里扑腾起来,并溢出一股淡淡的血雾,这血雾还没来得及漂散,就被水流冲走。那鱼不动了,原来一支亮灼灼的枪刺正穿透了它黑硬的鳞片。顺着枪刺、枪杆和握着枪杆的手臂,他看到了小海碰子。这鬼东西,竟尾随他而来。小海碰子倾斜着身子,漂浮在蓝色的水层里,两只大脚蹼有节奏地摆动,控制着身子的平衡,却显得身子又细又小,像条小黄鱼。但此时,小家伙很惬意,他一次又一次拉紧枪栓,一次又一次地穿透那些无知的黑鱼。噗——又一条大黑鱼在闪亮的枪刺上打旋,翻动,并涌着血雾。老海碰子看见小海碰子那一对大眼睛在水镜里笑成两道缝,心里不知怎么有些不舒服。黑鱼冒出的股股血腥气,招来了别的鱼类,一条大牙偏鱼急急地赶过来,伏在暗礁根处。小海碰子灵巧地一个猛子扎下去,噗——几乎不用瞄准,也根本不用什么“鱼头往前半尺”的提前量,一下就把那牙偏鱼打个透心凉。速度之快,把老海碰子都惊呆了,他只见小海碰子将渔枪朝牙偏鱼头上一指,那鱼随即就在沙地上挣扎翻动。尽管他睁大眼珠,也看不到枪刺从枪杆里射向鱼身的行程。“太快了,什么鱼也跑不了的!”老海碰子竟自言自语地赞扬起来。但他又忽地感到一阵痛楚。这可是他第一次赞扬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海碰子;第一次看到他奈何不了的东西,别人却轻易拿到手了;第一次看到,别人也有比他强的地方!而这个人,竟是个肚皮上还没烧净汗毛的孩子!

那小海碰子找到了用武之地,一上一下地扎着猛子,身子如飞似的游动,蹿得水上水下一片水花烟雾。

老海碰子下意识地躲开了,他扎进更深的水下暗礁里,在那里寻找海参和鲍鱼。尤其那鲍鱼,凭借着暗绿色的外壳,紧紧吸在暗绿色的礁缝里,很隐蔽,弄鲍鱼,不同于捕捉海参海螺,得有极高的功夫,一叉下去,就得铲下来,决不能拖泥带水地重叉第二下,因为这鲍鱼身下长个吸盘,吸附在礁石上,叉它必须冷不防,否则它便立即死死吸住,任你将鲍鱼身上的壳叉得稀碎,那肉也牢牢地死贴

在礁石上。老海碰子有意在这儿露一手,让小海碰子看看,打条黑鱼算得了什么,有本事再扎深点看看!但小海碰子此时根本不看,他正兴高采烈地追逐着黑鱼群。弄得老海碰子满耳朵都是“噗噗”的打鱼声,有些心烦意乱。

上岸时,小海碰子推着满载黑鱼的水漂子,得意洋洋地游在前边,身后的两只脚蹼像唱歌似的打着拍节,拍得水花“嘭嘭”响,伸出水面的那支枪刺,一闪一闪的,仿佛在向老海碰子炫耀它的威力和功绩。烤火的时候,小海碰子手舞足蹈地蹦来蹦去,并故意大声地“啊啊”着,好像刚刚完成了一个极其伟大的任务。他朝老海碰子这边嘻嘻着嘴:“那鱼……真笨!”

老海碰子没吱声,一直阴沉着老脸,把腰勾在火堆上。

小海碰子突然沉默了,满脸的欢喜倏地一下消尽。老海碰子网兜里的“货”使他目瞪口呆,一个个巴掌大的鲍鱼在那里蠕动着,迎着阳光,壳碗里闪着迷人的彩光,似乎在笑他:狂什么?这才是上等货呢!

小海碰子愣怔怔地站在火堆旁,又开始垂头丧气了。

微微熏人的西南风转成略带凉意的小北风,轻轻地扫拂着海面。火石湾呈现出一片少有的平静,上面铺满一层金辉辉的阳光,显得那样平坦、敞亮,俨然是一个宽阔的大舞台。但是,这个舞台不再是老海碰子一个角色表演了,不再使他随意地驰骋腾跃了,那个才登上来的小角色使得他紧张并谨慎起来。他看出,那个攥着渔枪的小海碰子在暗暗同他比试,大有要撵上他、超过他的架势。小海碰子扎猛的深度也越来越增加了,他有时竟和老海碰子并膀齐扎下去。这就使老海碰子拼足了全部气力,他是决不会让小海碰子超过他的。每次上岸,他的网兜里总是沉甸甸的,他要在重量、质量和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他要永远是强者。但是,他发现小海碰子一次又一次朝更深的水下冲击时,他开始感到,这个小家伙不仅是要超过他,而有着一个不露声色的目的,这目的是什么呢?老海碰子突然醒悟了,小海碰子也在寻找这个最珍贵的世世代代海碰子始终未寻找到的东西。如果不是这个迷人的希望,他决不会这么执著地拼命。为了寻求,老海碰子不断地扎深猛子,朝更深的深处探望。他总觉得那里就有……也许就有错鱼,那里就有那个他终生寻求的东西!于是他越扎越深。然而他的肉体终于以各种痛苦的感觉向他宣告,它们无法完成意志的要求:当他向更深处扎下去时,两个耳朵眼里像有两支钢针插将进来,水压似乎要击穿他的耳膜;水镜也突地压紧在脸上,把鼻子都压得扁扁的,两个眼珠子被抠出来一样痛。最受不了的是一股透骨凉的水朝身上袭来,这是底流。底流的水是从老洋里、从那阳光永远晒不透的地方流过来,因此底流比水面上的流子还多一个可怕点,那就是温差。当你一接触底流,就像掉进冰窖里,四肢立时僵硬麻木,就是鱼游进底流里,也显得

不那么灵活了。海碰子称这为两层水,最憊不过的。现在,小海碰子就朝这种底流试探。在上浮到水面上换气时,老海碰子往往发现小海碰子从脖梗往上一片赤红,并冒着一缕缕冷气。他知道,这小家伙已把脑袋触进了底流,但是他发现,那赤红的色痕正一次次从小海碰子脖梗往下伸延,有一次竟齐刷刷红到胸部以下。他深信,小海碰子终将会把他全身投进底流里。于是他感到问题严重,感到一种力量的威胁,感到一种可怕的挑战。

一连几天,老海碰子紧封着嘴唇,默默地做着每一个动作。小海碰子开始还嘻嘻地同他寻话说,但渐渐地被他这种阴沉的情绪感染了,也跟着沉默起来。但他并没有看出老海碰子在故意对他冷漠,只是感到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人,他反而逐渐习惯并欣赏这种沉默,这种沉默给人带来一股潜在的威严感。呼啸的浪涛砸在小海碰子身上,他就不由得咧开嘴“啊哈”地叫几声,可是砸在老海碰子身上,他却一声不吭,甚至连眉眼也不眨动。小海碰子完全被这种沉默的威严和力量慑服了,他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模仿老海碰子。例如从冰冷的海水爬上来时,他再也不像小叭狗那样轻快了,而是沉着地爬行,显出一种历尽艰难的样子,烤火时,他也不欢快地蹦跳了,而是学着老海碰子的动作。突如其来的浪击和尖削的牡蛎壳划割,他也决不哼一声。渐渐地,火石湾除了单调的涛声,就像死一般寂静。退潮前这一老一少默默地分坐在豁口两端,各自把鲜嫩的鱼肉串在一根铁丝上,擎在火堆上烧烤,然后就是无声地咀嚼。下水时,他们各自错开时间和位置,这一堆火刚刚熄灭,那一堆火又呼呼燃起,这一个才艰难地爬上岸来,那一个又雄赳赳地跳进水里。但总有在水下相遇的时分,这时,便看出老海碰子的手段厉害了。碰到那黑糊糊的狭窄礁缝时,小海碰子犹疑地探一下头,便一掠而过,老海碰子却满不在乎地径直潜进去,捕捉着肥大的海参、鲍鱼。小海碰子漂在水层里,惊奇而钦佩地观望着老海碰子,脸上露出微红的愧色。这时,老碰子的嘴角上便撇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其实他每分每秒都在窥测小海碰子的不足之处。

海参有一个奇特的习性,它一离开水就要“熔化”,变得黏糊糊,稀溜溜的。这时必须将它肚里的肠子迅速清除掉,否则加速“熔化”。清除的方法是用渔刀在海参屁股上割一个口,那肠子便会自动流出来。但这刀口却极有讲究的,海碰子有句行话,叫“春三秋四”。春天的海参瘦,割三分刀口放肠子,秋天的海参肥,割的刀口要大一些,所以说“春三秋四”。小海碰子却不懂其中道理,只是胡乱地用刀在海参屁股上一副完事。这刀口大小很重要,弄不好,不仅肠子放不干净,而且制出的海参干也外形难看。老海碰子看小海碰子胡乱地割,惋惜那一堆肥大的海参。这可是力气换来的!于是他忍不住,便喝道:“春三秋四,刀口再大些!”有时,海参已化得稀溜溜的发滑,小海碰子抓来捏去拿不住,没法下刀,干

瞪两眼着急。这时老海碰子便又喝道：“使劲摔几下！”小海碰子便把海参朝石板上摔去，果然，没几下，那海参变戏法似的变得登登硬了。小海碰子便朝老海碰子感激地笑了，老海碰子却早把脸板着转向一边，根本不理睬。心下当然得意极了，因为他那呵斥式的帮助，本意是显示自己的高强。

尽管老海碰子故意显示自己的高傲，但小海碰子也不在意，因为在摆弄海参这一套技术，他对老海碰子已甘拜下风了。但他也想把他那一套“现代化”推广给老海碰子。老海碰子撅着屁股在霍霍地打磨渔叉，小海碰子走过来，说：“我给你弄支渔枪吧，这玩意儿……”老海碰子横了他一眼，没好气儿地说：“咱使不惯那洋货，走了火，别穿了自家的脚丫子！”“不会的。”小海碰子哗啦哗啦地拽着枪栓，说道：“保险得很！”老海碰子一歪头，又格外用力去磨他那渔叉，尽管他也看到用渔枪打那黑鱼，啧啧，灵得很！……但却不愿承认。终于，他这宝贝渔叉为他争了一次光，使小海碰子的渔枪黯然失色。

火石湾底下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它底下的缝隙是海参藏身的窝穴。石头越大，货越多，只消把石头掀翻，就会看到下面聚满了海参，简直可以用手大把抓。但讨厌的是在这些石块下面，往往栖居着蛇一样形状的鳐鱼。这家伙有尖锐的牙齿，而且不怕人，任你掀得石块翻滚，也决不会惊慌失色地逃走。不仅如此，那个蛇形脑袋上的一对阴森森的绿豆眼一直瞄着你，要多可怕就多可怕。一般的海碰子宁肯舍弃那成堆的海参，也决不碰这家伙一下的。何况火石湾里大多是狼牙鳐，牙里有毒液，能咬死人的。小海碰子哪料到这一着凶险，只见老海碰子掀石块抓海参，很是丰收，心下羡慕，于是暗暗学下这一招。他在水下平坦的沙地上一气潜了几十米，连个礁石影儿也看不见，正要升出水面，却见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块躺在那里。他乐坏了，因为越是在这样孤零零的石头下面，东西就格外多。他浮到水面上长长地吸足了一口气，便一猛子扎到石块跟前，然后双脚蹬地，两手猛力一掀，借着水的浮力，把大石块翻动，露出黑糊糊的沙窝（石头下面压出的沙窝全是黑色），小海碰子急切地刚伸出手又缩了回去，因为黑沙窝里卧伏着的一条擀面杖粗的大狼牙鳐正蜿蜒而出，在那灰白的尖头上，两粒小眼珠子泛着死光。它含着一股隐藏的恼怒，寻找毁掉它窝巢的仇敌，终于找到了。它瞄着小海碰子逼近过来，使小海碰子感到毛骨悚然，竟忘记了这是水下，张嘴惊叫了一声，立即呛了一嗓眼儿苦咸的海水，呼通一声冒出水面，脸色惨白，浑身战抖，踩水的步子也乱了路数，摇摇晃晃的。

老海碰子在旁边看得清楚，他小心地摸过去，一猛子扎近鳐鱼，把所有的力量都运到攥着渔叉的手臂上，等到挨近鳐鱼的跟前时，出其不意，猛地一叉下去。那狼牙鳐欲发怒为时已晚，锋利的钢刃早已刺透它的脖子，把它紧紧按在沙地上。但狼牙鳐并不认输，它疯狂地卷动一阵，尖削的尾巴打得泥沙翻腾，老海

碰子尽力憋住气,死按着渔叉不动,单等那鳝鱼缠他。果然,狼牙鳝那蛇一样的身子顺着渔叉一直狠狠地缠到他的胳膊上,而那鱼头也强力地扭过来咬老海碰子的手,因脖子被渔叉扳住,咬不着,更凶了,张着嘴,咯噔咯噔地咬起渔叉来。这时,老海碰子就势托起这条凶狠的鳝鱼,腾跃而起,浮出水面。他哗哗地踩着水,擎鱼的手高高举着,另一只手抽出渔刀,用刀背朝鱼头猛击几下,那狼牙鳝才慢慢耷拉下脑袋。

这一系列动作,老海碰子干得那样从容、准确、果断,不动声色。小海碰子从头至尾看个清楚,惊诧极了。他踩着水靠上来,不知该对老海碰子说些什么话才好。

从打那条鳝鱼以后,小海碰子老是沮丧地垂着脑袋,并不时地瞅着那支亮光的渔枪发愣。老海碰子虽然还像往日那样不动声色,心里却痛快极了,嘲笑我这渔叉是破玩意儿!口气太大了!你那渔枪再高级有啥用,见了鳝鱼干瞪眼!

但没几天,小海碰子又神气起来,在他脚下,居然也躺着一条长长的,青白色的大鳝鱼。鱼头上血斑淋淋,看样子是被渔枪打了个透心。“好家伙!”老海碰子看着差点叫出声来,渔叉是没有这个准头的。但他赶紧收回目光,继续保持不动声色。

小海碰子在火堆上转了一阵,走过来,用渔枪挑着一条冒着热香气的大鳝鱼,嘻嘻笑道:“尝尝鲜!”老海碰子哼了一声:“那什么味道!”他用渔叉又从火堆里叉出一只烧得焦黄的大鲍鱼肉,也高高挑着,“这才是上品,不塞牙!”他知道,小海碰子还没有弄到大鲍鱼的功夫。谁知小海碰子毫不在乎地说:“等我弄个比这还大的尝鲜!”他回头扫了一眼那条死鳝鱼,言外之意这么凶恶的家伙我都打上来了,鲍鱼算什么!

第一场凛冽的寒风扫过,进入初冬的大地,肃杀了的金色的山林,一夜之间消瘦了,露出了一条条弯曲的筋骨。火石湾变得严峻起来,滚动的浪涛似乎也冻凝了,缓慢地起伏着,偶尔泛起的白浪沫,却像一簇簇寒光闪烁的冰碴儿。豁口下面的沙滩上镶了一层薄冰,鹅卵石变成了亮晶晶的冰蛋蛋。

两个海碰子咯咯吱吱地踩着这些冰硬的鹅卵石,走向水边。冷飕飕的小北风扫过来,使他们不由得打一个冷战。这水能否下得去,是决定一个海碰子整个初冬季节能否干下去的考验。老海碰子首先走进了这个寒冷的蓝色世界,紧接着小海碰子也跟了进去。当温热的肉体一接触冰冷的水时,它的感觉并不是冷,恰恰相反,倒像被火燎一下或是感到一把烧热的刀子在全身狠狠一刮,这个感觉倏地一过,那种透骨的凉意才刷地一下浸过来;紧接着像有千万支冰针穿皮肉而进,在骨头上啃着、锯着、钻着,这是最难忍受的第一关,两个海碰子默默地

忍受着。但不一会儿,小海碰子开始颤动了,那柔嫩的脊骨一阵扭动,便“啊啊”地叫着,被什么东西咬了似的逃出水面。他仿佛从开水锅里跳出来,浑身烫得紫红,冒着热气。然而老海碰子没有丝毫反应,像一块石头,一块酱褐色的石头浸在水里。小海碰子有些茫然地瞪着惊讶的大眼睛,他下意识地揉搓着变了色的皮肤,又颤抖着走下水里。又是千万束冰针扎透皮肉而来,“啊啊!”他哀号着,扭动着,但不得不重新跳上岸。老海碰子还是纹丝不动,就像死了。小海碰子望着老海碰子,有些迷惑了。他立了一会儿,终于咬紧牙关又走下水里。“啊啊!”他又尖叫起来,但声音不那么尖了,也没有跳出去,他望着石块一样浸在水中的老海碰子,终于坚持住了。一老一少在水中痛苦地熬着。老海碰子是有数的,他紧闭双眼,在等待着疼痛消失。小海碰子此时也学着他,闭着眼,咬着牙,佝偻着身子,死死地挨着。初冬的阳光羞羞答答地照着这两尊石像,没有一丝温意。但奇迹来了,约摸一袋烟的时间,那扎在身上的千万支冰针突然开始熔化了,不那么尖锐了,整个身上的皮肤出现一股微妙的“辣辣”的感觉,开始发热了。用海碰子的行话说“开始发烧”。这种难以置信的发烧只持续了一阵儿,便忽地消失了,这时他们开始缓慢地摆动胳膊,伸蹬两腿,像一条冻僵的鱼刚刚复苏,随即他们大动作地运动四肢,迅速游起来,现在,两个海碰子的感觉舒服极了,因为此时皮肤什么感觉也不存在了,没有冷的感觉,没有热的感觉,没有痛的感觉,甚至没有接触水的感觉。身子仿佛在一个莫名其妙的空间浮动,即使皮肤蹭到尖硬的礁石上也丝毫没有感觉,但这种“舒服”只能持续半小时,再次“返痛”就可怕了。海碰子就是抓住人体对寒冷的第一次“麻木”反应,而敢于潜进冰冷的水下。

他们飞速地游向火石湾深处。

整个大海犹如冻凝了的蓝色固体,被这两个酱褐色的长条切碎了,划出两股白花花的碎末来。猛然间,两个酱褐色的长条不见了,钻进了这蓝色固体的深处。

海碰子下水第一口气量是最长的,老海碰子的第一口气量总是先朝最深处扎,他猛力地蹬着那扁平的脚板,直挺在前面的渔叉尖闪着一簇寒光,像一颗流星朝黑沉沉的水下划去。猛地,他腰骨一抖,一股更彻骨的凉意从伸在最前面的指尖,刷地一下扩展到全身,底流到了。老海碰子咬住牙,继续蹬下去,但实在难以忍受了,他的整个身子好似一点点往一个固体冰块里钻,而还没完全钻进去的两只脚,却觉得温乎乎的了,这说明底流的水冷到什么程度!一刹那间,老海碰子闪出个返回去的念头,但他看到身旁亮灼灼地一闪,攥着渔枪的小海碰子竟扎了进来。于是老海碰子突地涌上来了力量,一直朝更深的暗礁扎下去,因为那里的海参几乎全是五垄刺儿的,而且个儿特别大。接近暗礁时,他脸上的水镜滋滋地压紧了,两个眼珠子往外鼓。他咬住牙,看准一个肥大的海参,尽全力抓

上去,然后一个急返身,箭一样钻出水面。他“啊啊”地喘着气,踩着水,欣赏着手里肉乎乎的五垄刺儿的大海参,又长、又大、又肥,浑身布满了小奶头似的肉刺儿,真喜煞人,一只手几乎抓不过来。“啊!小猪崽儿!”他兴奋地叫起来。城里人形容大海参总是用“大灌肠,大黄瓜”,但他总觉得不妥,城里人从没有亲从水里抓一下这海参,懂什么,竟瞎形容!还是叫小猪崽儿好,肉乎乎的,多像!但是,老海碰子突然感到一阵空虚,他陡地转身四顾,海面平静无声,一股恐怖感刷地涌上全身——小海碰子没上来!老海碰子的脑袋立时涨得老大个儿,他赶紧朝水里探望,依旧是黑沉沉的寂静。这不祥的寂静使他的恐怖变成一幅可怕的画面:小海碰子那柔嫩的身子正死死地夹在黑糊糊的暗礁缝中,并溢出一股鲜红的血沫沫……不可能!老海碰子在水面上疯狂地旋转了一下,希望在这静静的水面上蹿出个小脑袋,然而一切都是悄然无声,那蓝色的平面无穷无尽地伸延到茫茫的天际。他真正害怕了,一个翻身扎进水里——但他的动作在水层空间收住了。一个红色的小脑袋正飞也似的从水下降腾,冲出水面。一出水,小海碰子就疯狂地大口喘气,嘴里却溢出一口口血水。而且他的水镜里面也喷满了血沫子。第一次扎深水,都会出现口鼻冒血的现象,老海碰子年轻时下海,也有过这种现象,但没这么严重过。这说明小海碰子心太好胜,想一下子就干出个惊天动地来。

“快摘下水镜!”老海碰子大声喊。

小海碰子似乎没听见,他高高地举着渔枪,为自己的胜利欢呼,因为枪尖上牢牢地插着两个肥大的五垄刺儿海参!此时,他什么也看不见(水镜里只是一片红色),却骄傲地踩着水,兴奋地喊着:“两个!两个!我扎了两个!……”

老海碰子一把摘下他脸上的水镜,用海水冲洗着上面的血沫子,喝道:“洗脸!漱口!”小海碰子把头扎进水里使劲晃着,然后大口喝那苦咸的海水,咕噜咕噜地漱着嘴里的血水。可是他接过老海碰子洗干净的水镜后,却不舍气地又要往下扎猛。“上岸!”老海碰子更严厉地呵斥他,并一把拽住他,朝岸边游去。

两个火堆并在一起燃烧了,老海碰子和小海碰子一齐扯着手,拥抱着火堆,那火堆因为燃料增多而呼呼地烧着,火苗子欢快地往上蹿,交织着,扭结着,飞舞着,显示出一股友好的情绪。老海碰子从一个最大的鲍鱼壳上剥下肥嫩的肉来,擎在火上滋滋地烤,然后送到小海碰子的手里。“吃!”下了一声充满感情的命令。

火石湾的夜是美的,黑蓝色的夜幕罩得海天浑然一色,远处,灼亮的海火与星光交织闪烁,流动的暗云同微涌的浮浪搅在一起,躺在铺得厚厚的柴草堆上,看着这奇妙的景色,是一种享受。潮流按照日升月落地推移,已转到早潮了。“早潮快似马”,海碰子不在海边过夜是赶不上好潮流的。黑暗中,那堆还未燃尽的

炭火红红的,熠熠闪光。豁口外面的海浪累乏了,正在轻轻地摩挲着岸礁,发出低低的鼾声。老海碰子睡不着,天幕上的星光正在他眼睛里变幻着色彩,一忽儿变成海参那泛着白光的肉刺儿,一忽儿又变成迷人的花点,一忽儿又变成刺眼的光团,像渔叉尖,像渔枪刺。甚至像那交叉而立的错鱼。这光团越来越近,终于垂下来,变成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老海碰子蓦地一愣,发现小海碰子正站在他的身前。

“你……见过错鱼吗?”他的一口小白牙在黑暗中显出来。

老海碰子没吱声。

“也许再扎深点就会看见的……”小海碰子还站在那里。

老海碰子坐起来,望着眼前这瘦小的身影。想到他毛茸茸的小香瓜脸,那柔嫩的小肚皮,那窄窄的脚板,那被狼牙鳢惊吓的一瞬间,想到在水里冻得啊啊尖叫着往外跳……他笑了。

小海碰子被他笑得不好意思,转过身,回到他那堆柴草上,但他临躺下还自语道:“再扎深点,我就能全看见……”

“全看见?”老海碰子望着他,“全看见什么?”

黑暗中,小海碰子两只眼睛眯起来,狡猾地笑了:“错鱼呗!……还有那个……”

老海碰子现在更加明白了,这个小海碰子所炽烈追求的,正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他会得到的!”老海碰子心里火燎似的默默想着。他想起那虽然柔嫩却已划出伤口的皮肤,想起虽然犹存但已烧得焦卷的汗毛,想起那灼亮的渔枪,那脚蹼,那两只五垄刺儿的海参,那冒着血沫沫的小脑袋。……他似乎看到小海碰子已捧起那美好的东西,浮出蓝色的水面,向半铺炕的海碰子,向山那边的世界,兴奋地炫耀着:“我得到啦!”啊,人们再也不会觉得老海碰子有什么能耐了,再也不会对他惊讶地瞪大眼睛,再也不会感到他的存在了!是的,尽管他拼杀寻求了将近一生,但他的时间毕竟不多了,他的力气毕竟消尽了,他的家什儿显然落后了(他的心里已对那亮光光的渔枪有感情了),他一天一天衰老下去,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就像傍晚的太阳,虽能烧红满天云霞,绘出壮丽的景色,但终于要落下去的!小海碰子虽然稚嫩,但正是开始。一种痛苦的绝望情绪涌上来,使他霍地站起来,朝小海碰子那儿望去,黑暗中只有一束细长的光亮,那是渔枪。他陡地感到,他那铁青色的渔叉和亮灼灼的渔枪,那扁平的脚板和橡胶脚蹼,烧光汗毛的老皮和烧卷汗毛的嫩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看到这两种东西正扭结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这力量是错鱼切不断,浪涛冲不垮的。一种全新的充实感觉涌上来,老海碰子走过去。小海碰子睡着了,但紧紧地搂着渔枪,老海碰子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轻轻盖在小海碰子身上,然后坐在旁边,长久地注视着豁口外面,黑糊糊的海。

阴沉的东南风从茫茫的海天之间涌来,豁牙湾开始微微晃动。那些纷飞的碎浪突然像听到号令,排成一道长长的浪队,这长浪甚至几里长不断线,整齐而有节奏地向岸边推来。有经验的老海碰子对这异样的长浪是极有研究的。“碎浪两日静,长浪三天风”,这表示深海老洋里正风浪升腾。就像在水湾的中间投进一块石头,岸边就会荡来一道道涟漪一样,这是个狂风巨浪来临的讯号。坐南朝北的火石湾最怕东南风,长浪过后,火石湾就是一个倒海翻江、惊天动地的世界。它的到来几乎是一刹时,所以,一些没有经验的海碰子,往往被这整齐而有节奏的长浪所迷惑,毫不在意地游进去而突然遭难。但老海碰子却是不会上这个当的,在傍晚从豁口后面的山路分手时,他对小海碰子说:“明天坏海,别来了。”小海碰子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心下却在反问:“怎么会呢?这海多平!”他毫不在乎地昂头走了。小海碰子此时正热血沸腾,他觉得自己就要冲到胜利的终点。还能有什么难关呢?凶狠的狼牙鲂,他敢于射杀了;冰冷的考验,他经过了;深奥的底流,他钻下去了;五垄刺儿的海参,他捕到了。剩下的就是错鱼了。

第二天小海碰子迈着雄赳赳的步伐来到火石湾。望着白花闪闪的海面,一种即将获得惊人收获的感觉,在他的胸中燃烧。他高高扬起渔枪,坚定而欢快地跃进冰冷的海湾里。

东南的天际升腾着一股灰雾般的云,难道它能染黑整个天穹吗?小海碰子全力地拍动脚蹼,向海里疾游而去。

仿佛一切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一旦等小海碰子游进火石湾深处,平静的海面突然露出狰狞的嘴脸,像一锅烧滚的开水,猛烈地沸动起来。那张牙舞爪的浪头,就像因锁了八百年的妖魔鬼怪,解脱出来了。顷刻,大海兜底荡动了,狂风驾着奔涌的浪头,哇哇地叫着扑向火石山岩。蓝湛湛的海水骤然变了颜色,暗礁下的灰沙黑泥乘机腾烟起雾,搅浑一切。小海碰子开始并不当一回事,当他潜进水下时,发现水镜外面一片漆黑,奔涌的浪涛即使在水下也激烈地摇摆他。他这才有些慌了,因为平时,海面上的风浪无论多大,只要一潜入水下,就稳如泰山。而现在,水下水上一齐动,他现在才明白老海碰子常说的那句话:“看着都是浪,浪和浪不一样!”也许现在他才有些感觉:原来他对世界还没看透。小海碰子钻出水面,我的天!各种形状的浪块拥挤着,撞击着,铺天盖地地向他头上压来,他慌忙拍动脚蹼,朝岸上奔去。但是,纷涌的浪头像无数只手掌,在后面既拖着,又推着,既扭挤着,又撕拽着,尽管他用尽气力地拍水奔游,却只能原地踏步。

狂风呼啸犹似号角齐鸣,巨浪奔涌就像万马飞奔,陡削的岸墙炸着一道又一道四处喷沫的开花浪,轰隆隆的涛声此起彼伏,漫空回响。东南角的阴云已占领了整个上部世界,铅色的天空垂下冷漠的面孔,布满皱纹裂痕的山岩在默默

地忍受。在这大风大浪轰击的劣势下登岸,是需要高超的技术和惊人的胆力,这对没有任何经验的小海碰子来说,将是一次可怕的考验。他疯子似的向岸边挣扎着,终于挣扎到离岸边几十米的地方,现在这几十米的短距离,也许是一个人永远走不完的路程。他想试探着朝岸边冲刺,但看到山一样高的浪头呼叫着扑向岸边时,他完全惊呆了,那黑色的浪块仿佛带着金属的硬度,高耸着,挺进着,驾着呼啸的风威,像一道移动着的黑色城墙,漫空压过去,那架势完全是要把豁口,把火石山,把火石山那面的世界一齐推平砸翻。在小海碰子前面高高地竖立着,豁口不见了,火石山不见了,整个世界被这道黑压压的城墙盖住了,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豁口,没有火石山。突然,一声巨烈的轰响使整个天地震动了,那道黑压压的城墙破碎了,炸裂了,霎时,变成一片白花花的粉屑碎沫,一落千丈地败下去,与此同时,那道金色的火石岸墙,那豁口,豁口下面的暗礁,像突然从地面升起,连同豁口外面水下犬牙般的礁峰,齐根露出,刀剑一样林立,但随即又沉下去,被第二道黑压压的浪头盖住。这种大起大落的浪涛使小海碰子畏惧了,他的体内热量一点点被海水淘尽,四肢开始发硬,他明白,再待下去就会活活冻死在水里。他后悔了,因为他想起老海碰子……而凶恶的风涛连后悔的时间也不给予他,更猛烈地颠簸着他。于是,他不顾一切地拼出全力向岸边冲刺,可是那道大浪撞在岸岩上,而产生的巨大的反作用力,猛烈地将岸底的沙土石块和小海碰子一齐卷拖了回去,还没等他来得及反应,后面的浪头又扑过来了。于是,两股巨流把小海碰子狠狠地按进水下,在那布满刀锋枪刺般的牡蛎礁上反复揉搓。等小海碰子被割得浑身血肉模糊,但风浪并不到此结束,而是继续把他抛来抛去地戏耍。此时小海碰子完全无能为力了,但他还有一丝知觉,这一丝知觉使他还紧握着渔枪,在一个浪涛把他抛向半空时,还能睁一下眼睛。他觉得这是最后一眼看那个金色的火石山,那个小小的豁口,那个……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看到那个老海碰子。真的,他看到了!——在那陡削的岸壁上,贴着一个酱褐色的身影,正手搭着凉棚,朝海湾里观望着,小海碰子猛地一震,他想哭,他想笑,他想喊,但他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于是,他用尽全身最后一点力气,将那支渔枪举起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忽忽悠悠地感到身下触着一个硬实的东西,难道又撞在礁石上?他一惊,清醒了,却又觉得那物体是平坦的,柔和的,并有些温热的。他觉得自己正在升起,于是,他努力睁开眼睛,终于看清,一个熟悉的脑袋在水面浮动,而他的整个身子正伏在这颗脑袋下面的脊梁上。小海碰子一下抱住了老海碰子的脖梗,像一个孩子扑进母亲的怀中,他感到整个世界稳定了……

一个不祥的感觉把老海碰子驱赶到火石湾来。当他看到涌进豁口里的浪涛正在撕揪着打湿的柴草,蓦地看到小海碰子的棉袄在浪尖上翻腾。他愤怒了!这个小家伙太狂妄!但是他那充满怒意的脸随即又变成惊恐、绝望和痛苦。他贴着

陡削的岸壁站立,焦急地观望着火石湾。在开锅般沸滚的浪从里寻找那个小脑袋。他疯狂地在陡削的山岩上爬着,移动位置和角度,睁裂眼角,寻找着,寻找着。他扯着苍老的嗓门儿吼叫着,像一头老牛在呼唤丢失的小牛犊。老海碰子独身闯荡浪涛大半辈子,除了与风浪搏击而带来的收获而喜悦,而痛苦外,剩下的感情全枯萎了。今天却全部萌发而出。他吼着、叫着,一个巨大的开花浪差点把他砸下岸壁,但他全然不顾。他不相信,那个曾喷着血沫的小脑袋,那个套着胶皮脚的小海碰子,会这么快在世界上消失!现在他才发觉自己不能失去他。因为只有他和他在一起,才能寻求到那个迷人的希望。他知道,如果自己死了,这个小海碰子也会沿着他踏着的浪头干下去……

他终于在那黑色的浪从里发现一道灼亮的闪光,那是小海碰子最后举起的渔枪。于是,他不顾一切地纵身跃下岸岩。

老海碰子驮着小海碰子,漂浮在浪涛里。他观望着、等待着,最高最大最可怕的浪峰的来临。这正是他与众不同的硬功夫。因为正是这样的浪头才能把他举得最高,送得最远,才能越过豁口前那些枪刺般的暗礁峰。同时,他选择了陡削的岸攀登,因为浪涛在这样的岸上撞得虽猛烈,但没有回旋的余地。但登岸者必须一下子就抓住岸壁,绝没第二次的机会。海碰子叫这一手为“抢硬滩”。今天,老海碰子决心拿出全身“抢硬滩”的本领。

终于,一道黑压压的巨浪从后面遮天盖地而来。老海碰子看准机会,紧驮着小海碰子,腾跃而上,保持着身子在浪峰尖顶上的位置,就像跳上一匹奔腾的烈马背上,那浪头确实像一匹从没驯过的烈马。它焦躁着、飞蹦着、嘶叫着,高高地举着这一大一小两个肉体,狂怒地朝豁口侧面的陡壁上摔去。轰——浪砸在石壁上粉碎了,无可奈何地栽下去,但那摔上去的肉体却像一块泥巴似的粘在石壁上,并没随浪头栽下去。老海碰子这种驾驭浪头登岸的能耐是远近闻名的,此刻,他的手指脚掌,完全是钢钩鹰爪,牢牢地抓住石壁上每一道裂纹。但这仅仅是度过一半危险,因为第二个浪头随之就到,如果不在几秒钟的间隙时间往上爬出几米,就会被紧跟而上的第二个浪头拍下水去,那就前功尽弃。平常日子,老海碰子这一手登礁抢上的功夫,玩儿得相当干净,但今天不同过往,他身上驮着一百来斤的小海碰子。于是,他大叫一声,拼出老命往上又扒又蹬,随之而来的浪头贴着他那扁平的脚掌下炸裂了,冲着他在石缝里留下的血珠散落下去……

伤痕累累的小海碰子像死鱼一样躺在那里,老海碰子几乎是一根根手指掰着,才把渔枪从小海碰子僵勾着的手掌里挣脱出来。一阵阵咸味的冷风扑过来,老海碰子开始浑身打哆嗦了。但是小海碰子一点感觉也没有,他冻透了,黑紫色的嘴唇紧闭着,两只半睁的大眼睛失去了光彩,整个身子呈现出一片模糊的殷红色,犹如一块冰冷的石条,纹丝不动。老海碰子焦急地四顾,他想寻找一块

木片,一缕柴草,一丝火星,但火石湾边沿已被风浪洗劫一空。在这初冬的大地和天空,到处泛着阴风冷气,没有一丝温暖来拯救这个生命垂危的小东西。风浪还在火石湾里呼呼隆隆地,发疯地唱着粗野的歌。浑身打冷战的老海碰子只得把小海碰子紧紧抱在怀中依偎着,并用两手急速地摩挲着小海碰子全身。但是这太不够了,可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老海碰子睁着赤红的双眼,瞪着这个可怜的小肉体。突然,他猛地站起来,用自己的棉衣把小海碰子包好,放在背风的凹地上。然后他像疯子一样朝陡坡上狂奔,狂跳,拼命地活动四肢。他那久经风浪的老骨头由于不断地扭动而发出嘎叭嘎叭的声响,终于,他的热血在冰冷的皮肤下面奔涌,脑门儿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浑身开始热气四溢了。于是他发出“啊啊”的欢快叫声,猛扑到小海碰子身上,掀开棉袄,把他热乎乎的身子紧贴上去,亲热地摩擦着。小海碰子冰块一样的身子使他浑身一战,那点疯狂蹦跳出来的热量立即消尽,并又开始哆嗦起来。他只得又站起来疯狂地蹦跳,然后又扑上去搂紧那个冰块。这样反复地做着,温着,老海碰子终于将自己一次次生发的热量,传给了那个奄奄一息的小海碰子。那个小冰块开始在老海碰子身上融化了,颤动了,并像吸吮奶汁一样在吸吮着温暖。一股打着冷战的喜悦从老海碰子心胸里涌上来,他仰卧在冻着冰碴儿的地上,把这个开始蠕动的小肉体放在自己身上,再把所有的衣物盖上,尽最大可能不丢失一点热量。静静地挨着、盼着。

小海碰子终于睁开了眼睛,两滴冻凝的泪珠融化了,滴进老海碰子干枯的眼窝。

两个海碰子站在岸上。小海碰子经过一场生死考验,已经恢复了元气,充满了自信,因为他感到海碰子所能遇到的最艰苦、最凶险的考验,几乎全走过来了,想象不出还会有什么样的磨难使他退却。当他又攥着渔枪扎进暗礁丛时,甚至曾为自己在老海碰子面前哭过而难为情。老海碰子还是那样沉着和不动声色,但他的眼睛里含有一丝忧虑,每扎一个猛子前,他都要仔细地扫视一下平静的海面,因为那些难忘的经历时时在提醒他,风浪过后还会有更大的凶险。但他没有对小海碰子讲出这个忧虑,只是暗暗地观察着,提防着,保护着。他从心眼儿里喜爱这个莽撞而勇敢的小东西,无论多么可怕的打击,只要一过去,就毫不在乎,精神百倍。他相信小海碰子到了他的岁数,将会比他更老练,更有本领。

他们又跃进蓝色的海湾里。

小海碰子抢在前面,兴奋地拍打着水花,他的动作更熟练,更勇猛了,他认定前面只有最后一道难关,那就是错鱼。

小海碰子过分乐观了,老海碰子的忧虑是有根据的。海碰子的敌人不只是寒冷、激流、风浪和暗礁,还有前头说过的那凶如虎狼的鲨鱼。在这一场狂风恶

浪后,一条凶恶的箭鲨窜进了火石湾。它在躲避风浪的日子里饿坏了。那对闪着凶光的眼睛在疯狂地扫视着,寻找着,终于,一道柔和的光线引起它的注意,并嗅出一股异样的肉香,它兴奋地加快了速度,流线型的身子哗嗤嗤切开水面,箭一样地飞射而来。

火石湾一下变了颜色,所有的游鱼嗖嗖地逃进礁洞,连牡蛎和扇贝也咯咯地关闭两扇贝壳,海水竟变得清了,冷了,静了,更恐怖了。

远处的海面刚刚翻腾异样的白花,老海碰子便大喊一声不好,拽着小海碰子就朝岸上游。小海碰子懵头懵脑地跟着游了一阵,有些不服气,快到岸边时,他转身回头看看,谁知刚一转头,却见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避着浪花已到跟前,他“啊”的一声滚到岸上,绑着红布的脚步蹒在空中一闪,那箭鲨竟从水中腾跃而起。

两个海碰子在岸上愣住了。这是一条极漂亮又凶残的箭鲨,黑蓝色的背在阳光下闪着一道寒光,刀刚似的豁嘴在空中半张着,露出白森森的牙,金黄色的尾巴飞旋着甩过来一片水花。他们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没说一句话。刚才发生的这场可怕景象,使整个火石湾变得深不可测了,小海碰子怔怔地瞪着两眼,脸上的余惊还未退尽。老海碰子站了一会儿,便顺着豁口后面的陡坡爬上高高的火石山,从那儿俯视整个海湾,能隐约看出那箭鲨的行踪。他看到那个黑糊糊的长影在蓝色的水面下时隐时现,这个家伙还不死心地在转悠。老海碰子坐在山岩上,静静地等着,等着那条箭鲨游走。是的,有了这个世界就有火石湾,就有箭鲨,就有海碰子,就有死亡,但海碰子从没断过根。他的父辈们就是这样同凶险拼杀、搏击和躲避。

天渐渐暗下来,老海碰子走下山岩,但他一愣——小海碰子走了!他感到一丝惆怅,也许小家伙害怕了,回到半铺炕那边去了。老海碰子呆立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夜幕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他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躺在铺着柴草的沙滩上。火石湾这边的海曾吞噬过多少血气方刚的海碰子,他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常常跟在村里送丧队伍的后面胡乱哭啼。但他还是勇敢地扎进了这个浸着父辈们血水、凶险而迷人的海湾!这里是好汉撵不走的地方!他深信,那个伤痕累累的小海碰子会回来的,如果他不回来,也丝毫不值得留恋,因为他不是好汉!

老海碰子安然地入睡了。

光是没有声音的,但却把鼾睡的老海碰子吵醒了。豁口外面,一道亮亮的丝线划出了海天的分界。他赶紧跳起来,爬上黑黢黢的火石峰朝东方眺望,那里的天空开始泛出暗红色的光,预示着一个金色的火球将在那儿升腾,红光在渐渐扩大,黑暗在悄悄退却。

风停止了吹拂,浪停止了波动,鸟不语,山无声,老海碰子屏住了呼吸——一切都在庄严地等待。

一个金红色的圆边冒出来,世界变得清晰了;那圆边升腾着,扩展着,变成大半个金红色的圆,于是,大海被煮沸了,火球在升腾,她要剥离和跳出大海的母体,飞向广阔的天穹。大海母亲恋恋不舍地拥抱着这个刚分娩的婴儿不放,于是这金红色的圆球的下半部被拉长了,变形了,像一个巨大的、站立着的金卵。最后的粘连剥离了,那伸长的下体渐收拢,脱开了母体,腾地跳向空中,骤然射出万道金线。

这金色的火球越升越高,越炽烈耀眼,那万道金光给山川大地和海洋,给火石峰顶上的老海碰子,注满了为生命而燃烧的活力。

老海碰子长长地吸了一口凉丝丝的,有点鲜味的空气,正要走下山来,却觉得脚上有异样的感觉,低头一看,两个脚脖子上正结结实实地绑着两块鲜艳的红布。这是小海碰子绑的,预防鲨鱼!他马上就意识到,小海碰子根本没走,他只是回去给他拿这红布,在他睡觉时给绑上的。他赶紧朝山下望去,小海碰子早已全身披挂,站立在火石湾前。那支渔枪像柄长剑,在他手上亮光光的晃眼。老海碰子看了看那两块红布,他原本是瞧不起这胆小者发明的玩意儿,但此刻,他却觉得这两块红布似两股火苗,在他脚脖子上灼灼地烧,而且顺着小腿、大腿、胸脯一直烧上眉梢,他的整个身子发热了。老海碰子陡地飞下山来,直扑到小海碰子跟前,他想说“好样的!”但他的胸部剧烈地起伏一阵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迅速地抓起铁青色的渔刀渔叉,大步朝海边走去。

迎着冉冉升腾的红日,一老一少两个海碰子又并肩扎进了浪涛滚滚的大海……

短篇小说

西线轶事

● 徐怀中

—

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额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的生活基调。

一讲要缩减部队编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们。如果人们到九四一部队去,了解一下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的情况,就会感觉到,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缩减”对象,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狭隘了。

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六名战士,人们称为六姐妹。作为连队里一个正正规规的建制班,她们完全适应了从早到晚整齐划一的紧张生活。适应了随时随地面对各种严格的要求,适应了多少条成文不成文的纪律规定。当然,要把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要把平均年龄二十岁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女兵班刚刚编起来那段时间,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总是嘴不闲着,坐在床上吃葵花子,从窗户里吐皮儿出去。男兵送了她们一个外号,叫“五香嘴儿”。给人起外号是一种不良倾向,连里批评了他们。不过,自从叫出了这个外号,女兵班窗户里再没有葵花子皮儿飞出来了。又比如另一位女战士,在幼儿园就是个爱哭出了名的。老师说她眼窝太浅,存不住泪水。现在穿上了正二号女军服,还是照常爱哭。芝麻大的一点事儿,绝对用不着哭的,她可以大哭一场。一次,正要出发去野外训练,她忽然抹起眼泪来了。为了什么事情?天晓得。连长见她没完没了地哭,在她面前放了一个小板凳说:“你坐下慢慢哭,哭够了我们再去训练。”她倒不哭了,仰起头,站到队列里去了。可见泪水要存是存得住的,不在乎眼窝是深是浅。

照部队规定,当战士的是不准谈“个人问题”的。这一条历来很明确,没有任

何含糊的余地。干部常在队前讲话说：

“有空余时间，你宁肯去看看蚂蚁搬家，也别往那一方面去动心思。动也白动。”

令行禁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服兵役的年龄，正是怀着大胆的幻想，而又战战兢兢开始去探索“个人问题”的年龄。如同鸡雏儿要冲破蛋壳，天数足了，怎么能阻止得了呢？总机班就曾经有人想要试试，能不能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比别人先走一步。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严厉批评了这件事。他只讲是“个别同志”，没有点出名字来。这位“个别同志”在知青点的时候，和一位男同学一起担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务。他们搭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棚，坐在上边向四外瞭望。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湖水，那草棚正如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那些日子里，给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啊！片片断断的，正像是一节节熟透的甘蔗。她应征入伍了，约定了要常写信。谁知对方来信太勤，她觉得不大好，让他不要总用一种信封。落款地址也要变换着，让人看见不是一个人写来的。这一下弄巧成拙，信封和寄信地址虽然变换不定，可是信上的邮戳始终没有变。指导员找她谈话了，说个人之间通信是宪法保护的，别人无权过问。问题是信件的内容超没超出一般范围，这就全靠自觉了。组织上没有把有关规定讲清楚，那是组织的责任。三令五申讲了，偏偏还要违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此后，那种神秘的书信就完全断绝了。这件事情，给了女兵班全体战士一个明确的警告，她们私下里议论说：

“算了，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

脱了军装再讲，显然是说等到复员以后。穿上了皮鞋再考虑，这个话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部队规定，战士只准穿胶鞋、布鞋、塑料凉鞋，提升了干部才准穿皮鞋。这就是说，在没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个人问题”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边去。

九四一部队医院和业余文艺宣传队，也都有一部分女兵。因为工作上无法分开，男女同志之间接触很平常。连队里就不是这样了。工作、训练、学习、课外活动，女兵班总是自成格局，几乎和其他班排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男兵们随时都意识到了六名女电话兵的存在。明显的是他们很注重服装整洁，再热的天，不打赤膊。还有些细微的情形，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觉。编到这个连里来的兵，活泼的更见活泼，庄重的越发要显示自己的庄重。有线电连和无线电连赛篮球，本来实力差着一大截，可是运动员们一个比一个要强，总是全场人盯人，一拼到底。拼下来看，输也输不了几分。他们倒不是一定要 and 无线电连争个高低，明知是拼不赢人家的。主要是谁也不甘心在本连留下一种过于窝囊的印象。总之可

以这样说,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生活的基调。像是电话线路上加了“增音”,音量扩大了好多倍。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女兵班在全连都算是靠前的。理论考核不用讲,电工学、电话学,难不住这六名高中生。内务卫生是女同志的擅长,队列也蛮像一回事的。劳动种菜又不比男兵差劲,在知青点打下了底子,两大桶粪,挑起来颤颤悠悠地在田埂上走。就说训练吧,五百公尺的放收线,不敢说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可是论起收线的均匀、紧密、垂直和平整,女兵班要更符合教范的要求。军区召开的有线电全程协作经验交流大会,邀请女子总机班作过表演的。不过,假如你和有线连的男同志谈论起女兵班来,他们往往是笑一笑,颇有点不便评论的样子。说自己心服口服,他们不乐意,说不服气吧,多不合适,只好笑笑。还是有个别嘴快的,忍不住说:

“女同志嘛!电话上声音绵绵的,口齿又清楚,谁不欢迎。等打起仗来再看吧!”

二

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为的让他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寸六寸去放大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九四一部队也奉命完成了一级战备,随时可以开赴前线。

中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这次还击从时间到作战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国无意占领越南一寸土地。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不过是在古往今来战争史的长河中,归入一支小小的细流。但这是一次震动了世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乐谱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两国军队在面对面的严重时刻,只能是借用对方的语言,大吼“缴枪不杀”!

女子总机班听到了“路透社”的消息,说上级已经决定不让她们上前线去。大家急了,吵吵嚷嚷要去问连长,凭什么不让去。班长严莉不主张去问。她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正式宣布,说不让去,是小道透露出来的。连里要问,怎么会知道不让你们去的呢?倒还不好回答。不管他的,反正女兵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先抓紧轻装准备。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都说,还是班长有主意。

其他班排都去理发,一律推了光头,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也推光头。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原来她们多数留的

是两个小髻髻,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脑袋,像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们上街,每人花了两角钱,变了一个样子回来,都剪成了“运动头”。以后早上起来,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女兵班轻装很彻底,干部都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像纸呀什么的,可以多带一点,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哪儿找去!小镜子那些,能不带就不带了。”

干部们一走,六姐妹高兴得一个个拍着手跳。既然这么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轻装情况,说明不让女兵班上前方的话,纯粹是谣言。

很快就要上火线了,总机班的女战士在想些什么呢?她们先是在自己心里搁着,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想的全都一样。用一个字说,死!至于各人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一死,谁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设想。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谁都不想还可以活着回来。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不是太丧气了。在部队里,谁也不会笑话谁的。大家都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要牺牲。虽然如此,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情都是那么自然,语调是那么平静,随随便便,连说带笑的。

班里有几个人,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妈妈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妈妈,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

“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噢!我已经想到了,看报上的动向,知道部队可能要出去。你们哪天出发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边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要保证电话通畅,不要像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那么多首长和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至少你可不能让我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来的,响声不一样……”

“妈!你别啰嗦,不能老占着线。”

“你等等,还有……”

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颤,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着的抽泣。随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显然是妈妈把送话器捂起来了。

“喂，喂！妈妈！你看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就挂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务回来，赶忙先来个信。”

和妈妈通过了话，几个人一交换情况，禁不住笑了。这几位妈妈岗位不同，互不相识，却像是用了一份统一的电话稿，她们的话几乎一句也不差。几位妈妈无一例外，都在电话上哭出了声。要不怎么是妈妈呢？

只有陶珂没有给妈妈挂“长途”。小陶的妈妈劳动改造八年，把身体彻底改造垮了，放出来直接就进了医院。最近刚刚出院，还在全休，说定了这一两天到部队来看望女儿。所以小陶用不着打电话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她带来一大包麻辣胡豆，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来队亲属带的吃食，向来都是当众公开的，谁赶上有谁的份儿。总机班的姑娘们一起围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亲说呀笑的。小陶不做声，在一边待着。指导员对母亲说：

“你看，好像这一大群都是你的亲生女儿，只有小陶是一个外人。”

小陶就是这样，喜爱沉默。她高兴起来，什么都忘了。一张粉团团的脸儿，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久久地遥望天边。她在追寻着什么？她在探求着什么？她在迎接着什么？这时候那张粉团团的脸就变得十分严正，十分深沉，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怒气。开始，同班战友们不了解她的习性，嘀嘀咕咕议论她说：“就像是谁借了她米还了糠。”

谈起“九四一”的行动，小陶妈妈问连长：

“现在领导上怎么说，是不是已经定了总机班全体到前边去？”

连长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一起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

“反正我们心里有数，让去也要去，不让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个也不干。”

母亲笑了，说：“你们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替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

前天，九四一部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到省城去参加作战会议，抽空去看望了陶珂的妈妈曾方同志。谈到对女子总机班，通信部门有几种方案：第一种是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第二种是全不上去；第三种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去，其余有几个干部子女，体质较差，就留守了。

曾方问：“照第三种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珂在内？”

回答说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专门照顾干部子女。反正后方需要留人守总机的，连里的猪也得有人看，谁体力差就留下谁。

曾方说：“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准请客，照样请，说不是请客，是加菜。不

准走后门,照样走,说不是后门,是前门儿。该有什么手续办下来了,该有什么图章盖上去。不让陶珂她们到前边去,还怕找不出几条现成的理由?”

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曾方又说:“我看第一种考虑是正确的,后两种方案恐怕欠妥当。当然,部队的事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不过我也有点发言权的,至少我那个不能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是为的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寸六寸去放大吗?现在要打仗了,把这一个战士拉下来,让另一个战士顶上去,想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哪一个战士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真的这样,等欢迎部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们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啦!”

这位老同志态度是那么诚恳,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九四一”的几个干部都说,有必要确定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位置上,作战期间还应当到什么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

三

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

小陶妈妈不愿意住招待所,在连里住下了。严莉告诉小陶,晚班不用上机,陪妈妈睡,和妈妈说说话。等屋里只剩了母女二人,曾方才有时间上下打量着小陶。拉住了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小陶一边搭话,不好意思地抽回了手,女儿大了。

妈妈说:“我原讲是来看看你,现在是送你上前方了。”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让你别来了。还是想见见妈,就没有打。”

“要是姥姥能和我一起送你,你就该高兴了。她上了年纪,怕路上不方便,我没有让她来。”妈妈似乎是带了一些妒意说:“陶珂!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我,不及喜欢姥姥的三分之一。”

“妈!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在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之间,很难说小陶跟谁更亲近。她在外祖母身边比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还要长些,无形中对外祖母更熟些,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对某些事情不必说长道短,留给后代去作出评价好了。这是可以的。不过,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不知要以几位数字计算的那么多干部,阴阳头一剃,成了“牛鬼蛇

神”。有的人还可以说是让抓住了几条什么。曾方是毕业于太行山抗日中学的一个农家女,历史清白无瑕。她既没有在高呼口号的时候精神不集中,喊错了什么话,又没有在旧报纸上随意写画,不提防墨水渗过去,弄脏了背面的照片。可是,查出了她丈夫一九五九年在病故前不久曾经攻击过“小上群”,和彭德怀的言论很相似。丈夫死了,便宜了他,妻子不能再白白放过去。于是曾方进了“牛棚”。随后被转送监狱进行劳改,一改就是八年——整整是抗日战争所耗用的时间。以后放出来又挂了三年——够进行一次解放战争的。曾方有思想准备,进“牛棚”前写了信给母亲,请老人来把七岁的外孙女儿接到农村去了。

小陶初次见到姥姥有些害怕。城里的孩子,没有接触过农村装束的老年妇女,她看着姥姥很像小人书上的“狼婆婆”。现在妈妈顾不得她了,不跟“狼婆婆”走,到哪里去呢!

公社起先不知道情况,以后外调回来,立即宣布撤销了这位老人贫协委员的资格,让她交代和女儿女婿的关系。外孙女儿原来是有临时口粮的,也宣布取消。

取消口粮,姥姥倒也没有当一回事。就是不取消,反正也别想能拿回一粒粮食来。公社通知说,因为两年大旱,田里无收,返销粮也早完了,今冬的问题由社员自行解决。外出找生活,可以给出证明。连年旱灾害苦了群众,同时也搭救了另外一些人。这样,可以顺手把造成大面积饥荒的罪过完全推给老天爷,他们则仍然可以心安理得,也仍然悟不出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革命高调不能当饭吃。

一天,姥姥用白布口袋装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拿给陶珂,打发她和队里一些半大孩子一同出门。小外孙女儿愣住了,迷惑不解地望着老人,她问:

“姥姥!我们现在不是在新社会吗?”

一个似懂事不懂事的孩子,她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她天真地向外祖母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换了别人,也许根本不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只是喝叫她不要胡说。姥姥觉得应该对外孙女把话讲清楚,尽管这话是很难讲清楚的。老人顺理着外孙女儿的头发说:

“孩子!姥姥怎么跟你讲呢?要说我们不是新社会,不对!要说新社会就是如今这样子的,也不对。新也罢旧也罢,肚子饿得咕噜咕噜那种滋味是一样的。这就得要你挺着些了,姥姥就是这么挺过来的。这也有好处,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没饭吃。那年你烧破了衣服,你妈骂你说:‘再这么胡闹,没有你的饭吃。’你说:‘没饭吃我吃包子。’孩子!不过你也不用总那么愁眉苦脸的,该高兴还是高兴。眼面前的事情,你全当是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不怕的,这阵子风就要刮过去了。你去吧,姥姥等着你回来。你们沿着铁路走,听见火车响,早点靠边等等。”

陶珂和一群小伙伴们上路了,结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树枝上的小鸟唧唧啾啾欢乐地叫着。它们看见,和它们很熟识的这群孩子,沿着铁路只管往前去,越走越远了……

孩子们来到一个疗养地,看见一所庭院的铁栏杆里边,有一位白头发的解放军坐在躺椅上晒太阳。这是一位将军,不过当地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养病的老头。其实,将军本来没有多大的病,林彪把持军委期间,不明不白地叫他靠边疗养。林彪完了,他可以出去工作了。不想,住疗养院几年,真的住出了几样要紧的病来,只好仍然留在这里。将军无可抱怨,在他这一茬穿军装的“老家伙”里,他算是够幸运的了。

陶珂隔着栏杆,远远向将军伸出一只干瘦的小手。这样的事将军经过得多了,他知道这小姑娘要什么。他一面在衣袋里翻找零钱和粮票,一面问小姑娘叫什么,哪里人。小姑娘低着头,始终不说话。将军又问她:

“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上学搞生产,自己跑出来?”

“我有证明。”小姑娘终于开口了。

小姑娘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张纸,将军接过来看,上面写着:

兹有我队社员陶珂(女)因事外出,望沿途有关单位放行为荷。此致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一两行字,将军反复在读。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美援朝,几次战争都在这位老战士身上留下了纪念。他抖抖索索看着那封证明信,心里在说:我这是为什么?就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以后,还照样让我们的孩子“因事外出”吗?两行热泪扑扑答答掉在信纸上。

陶珂忙收回了信,她像在哄小孩似的对军人说:

“解放军爷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我姥姥说了,全当这是在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

小姑娘安慰白发将军的话,实在让他受不了。已经有些人开始围过来,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将军觉得他就要痛哭失声,双手掩面,连忙离开了。他忘记了把零钱和粮票拿给小姑娘。

说到陶珂在姥姥家度过的几年艰难生活,妈妈又心酸起来。她原以为把小女儿送到乡下去会好一些,不料想却让孩子吃了更大的苦头。用一句严谨的话说,是让孩子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曾方为了排遣自己的伤感,她洗了脸,随后以愉快的语调对女儿说:

“算你们运气,人家也当兵,一茬一茬地复员了,都没有赶上打仗,偏偏让你

们这一茬的赶上了”。

“我们班已经向上送了三次决心书，政治部还把我们的决心书摘了一段登在简报上了。”小陶自豪地说。

母亲笑笑说：“决心书有写得好的，有写得一般的。不过，上简报是一回事，上了战场又是一回事。”

“那倒是。”小陶同意说。

“陶珂，你们弄没弄懂，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一仗？你在姥姥家经历过那样的几年生活，你更应当懂得，我们不能再丧失时间，不能再没有一个平静的建设环境了，只讲这一点，这一仗就非打好不可。”

陶珂庄严地向母亲点点头。

曾方从旅行袋里取出一个纸包，对女儿说：“现在报上讨论干部子女应不应该继承父母的遗产。你爸爸给你的遗产全在这儿，我给你带来了。”

小陶打开纸包，是一副草绿色粗布绑腿。

这副绑腿是爸爸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发的，妈妈一直保存着。造反派抄家，抄出了爸爸和妈妈许多来往书信，用绑腿捆着拿走了。那些书信要归档，剩回了这副绑腿。

“这是爸爸留给我们的纪念，我怕弄坏了，还是妈妈保存着吧。”女儿说。

“你到前方去，打在腿上，这才是实际的纪念哩。”母亲又说：“你怕还没有学过怎么打法吧，来！你看着。”

曾方踩着床边，把裤脚裹紧，开始熟练地打起绑带。每绕一圈，或正或反打一个褶儿，小腿外侧打出一排“人”字儿。妈妈讲解说：

“我打的这是单‘人’字，还有打双‘人’字的。有人喜欢打花，有人不加花儿，各有所爱。要领是脚脖上可以紧些，到了腿肚松紧要适当。松了往下吐噜，太紧走起来腿疼。”

曾方兴致勃勃地讲解着，已经打好了绑腿。顺手扎上了小陶的皮带，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转给女儿看。小陶惊奇地发现，妈妈一下变了一个人。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那么明亮，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胸脯挺起来，腰身自然地扭动着，那步伐姿态是别人学不来的。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妈妈这样子的？是在相册上。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八路，短短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皮带一扎，鲜明地勾勒出了苗条的身材，绑腿打得那样规整自然。看上去既有着严正的军人风度，又充分保留了女性的魅力。

陶珂欣赏着妈妈，上前抱住妈妈说：“妈！你怎么还是像照片上那样好看。”

母亲推开小陶说：“滚一边去，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拿自己亲娘老子开心。”

曾方侧过身，在窗户玻璃上看到了一张忧伤苍老的面容，看到了那染霜的

鬓发。如果来谈论，一场迫害夺去了我们许多女同志的美丽俊俏，未免不够严肃。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还说谁的容颜外貌。不过，有多少人在骤然之间变得那么苍老不堪了，一头青丝在短短几天之内，以致是在一夜之间变化为霜雪。这也是对十年浩劫所作的忠实的记录之一。可以平反昭雪，可以恢复名誉，但是人们外形上留下的这种明显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了，正如内心受到的创伤很难平复一样。

晚上，小陶和妈妈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床边帮了一条长板凳。吹熄灯号很久了，母亲还在讲话，小陶熬不住了，迷迷糊糊地搭着腔，翻个身睡着了。曾方在昏暗中望着女儿侧身睡卧的姿态。圆圆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臀部高高隆起，小时候瘦得两条腿像麻秆儿，正长个儿的那些年一直缺营养，不想几年来发育得这么好。母亲疼爱地望着女儿，她将怎样去迎接战火纷飞的考验呢？

“红河！红河！过红河了！”小陶在睡梦中欢乐地呼喊起来。

母亲笑了，这孩子够性急的，刚合上跟，已经跨过了红河天险。

四

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

红河发源于云南省崇山峻岭间，在中国境内叫做元江。红河从老街地方进入越南，流经越南北方腹地，向东南入海。

九四一部队在老街附近渡舟桥，跨过了红河。几天以前，兄弟部队过河开辟了战场，现在他们可以驱车向前开进了。

越南北部边境，和我们的滇南河口一线，都属于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自然环境本来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河口地区是我国橡胶产地之一，三叶树环绕山丘，一行行，一层层，郁郁葱葱。胶林深处，可以望见国营农场的楼房，红瓦白墙，烟囱耸立。米轨小火车沿着溪流隆隆驰过，留下一缕烟云。这遥远的边疆，向战士们展示了它的富饶美丽。一过红河，就是另一番风光了。六姐妹挤在电话车窗口留意观察着，她们明显地感到，已经置身于异国的土地。

虽是旧历正月，到中午颇有点盛夏的味道。电话车闷热得要命，几个人吐了，愉快的笑声停止了。不一会儿，浓雾漫卷过来，热风里带着雨丝，灰蒙蒙的。十多公尺以外，听见汽车响，却看不见。班长严莉查了地图，说此地是黄连山山脉。山脊又高又陡，有的地方突然形成断裂，下边是乱石嶙峋的深渊。公路两旁覆盖了灌木竹林，茅草刺藤相互盘绕，密不透风。女电话兵们不免有些犯愁了，

要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执行架线任务,从哪里下手呢?

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原地宿营待命。一路上没有下车的机会,现在停下来了,战士们都就地在解手,并不避讳。弄得总机班的女兵一直不敢抬起头来,她们小声地骂道:

“这些家伙,没脸没皮的!”

她们很快就知道了,男同志们挨骂实在是冤枉。这里公路的内侧是悬崖,外侧是深谷,要上上不去,要下下不得,窄窄的一条路,到处是人,谁也躲不开谁。女电话兵们团团打转,只好去问连长,要上厕所怎么办。连长笑一下,就把脸背转过去,不再看她们,这就是给她们的一种切实的答复了。严莉叫两三个人在电话车旁遮挡着,大家轮流上了厕所。谁也没有意料到,到前线来遇上的第一个困难竟是这样一个问题。

有线电通信连保持着行军序列,原地宿营了。女兵班夹在男同志当中,在公路上占据了几公尺地段。雨淅淅沥沥下着,她们盖着防雨布,鞋也不脱,枕着背囊和衣睡下。谁能睡得着呢,不知哪个部队还在往前去。她们感觉到,那急促的脚步,总像是踩着自己的头发。

通信科一位参谋来传达首长命令,要求迅速架设下属各部队线路。连里决定开用电话车总机,指挥机关内部线路由总机班负责架通。

总机班的女战士们,忘记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在听候班长严莉下达任务:

“陶珂、吴小涓、杨艳,跟我去架线。肖群秀、路曼守机,注意机线装设,搞好固定。今晚的口令是‘山茶’,回令是‘海棠’,执行吧!”

严莉、陶珂各负责架一条线,五分钟以内都架通了。杨艳和吴小涓两人负责首长的一条线,遇到了麻烦。她们正往前走,闻到一股臭味,是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特别的气味。天快亮了,可以模模糊糊看见,小路上横的竖的倒着三具越军的尸体。肚子膨胀起老大,周围是一摊黑血。不要说见到死人,平时看见一只死老鼠她们也怕,肉唧唧的,让人头发根儿发炸。她们向旁边试探,想找地方绕过去。在刺藤草棵里钻进钻出,帽子刮掉了,脸也划破了,无论如何也钻不过去。想到自己架的是首长专用线,登时觉得一身都在冒汗,再耽搁不得了。只好横了心,还是由原路过去。吴小涓望着几具尸体问杨艳:

“你怕不怕?”

杨艳说:“要是三个活的,我倒不怕。”

吴小涓说:“要真是死的,总还好办。我怕他们是装死,等我们到了跟前,一下坐起来了。”

“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流了那么多血,就是活着也剩不下多少力气了。不等他坐起来,拿手榴弹在脑袋上敲他几下。”

“好！我们分个工。看着不对，我上去按住他们，你用手榴弹猛砸，不要让他们抱住了我们的腿。”

她们相互为对方壮了胆，从三具尸体上跨步过去了。至于三个越军是不是有过要坐起来的意思，她们不清楚。她们沉着地迈过了最后一具尸体，撒腿就跑，没有再回头去看。

突然是哪里一声喝：“口令！”

两个女电话兵冷不防的，一紧张，早把口令忘得一干二净。对方不见回答，哗的一下冲锋枪上了膛。

吴小涓连忙说：“别打，别打，是我们。”

“什么你们我们，口令！”

“干吗那么凶，你听不出我们是总机班的！”杨艳厉害起来了。

隐蔽在树丛里的哨兵压低声音笑了。哨兵一指，原来已经来到了首长的掩蔽部门口。

她们撩开门上的雨布钻进去。掩蔽部里点了几支蜡烛，还是昏昏暗暗的。几位首长正跪在地铺上，查看拼起来的作战地图。吴小涓和杨艳把单机摆在一个压缩饼干箱子上，手脚麻利地接好了线。一摇，通了。一号首长见两个女电话兵淋得全身透湿，缩着身子，他取过一个军用水壶说：

“冻惨了吧？来，一人喝一口，这是‘气死茅台’——习水大曲。”

“不！不！我们不冷。”杨艳和吴小涓往后退缩着。

“叫喝就喝，服从命令听指挥。”

她们两个推托不过，对着壶嘴呷了一小口。她们品味不出，习水大曲何以能“气死”茅台，只辣得打哆嗦。

这是吴小涓和杨艳到前方来第一次完成架线任务，而且是“九四一”最高指挥员架的线，她们对自己感到相当满意。两个人已经说定，将来参加文科高考，就把这次出境作战第一次执行任务作为自选的写作题目。这个题目算是选对了，很有可写的哩。

吴小涓虚岁十九，是从学校应征入伍的。有些同学劝她说，“当兵热”过去了，现在正是“大学热”，何必再到部队上去绕一个大弯子呢！吴小涓终于没有能克制住想穿国防绿女裙服的那股“狂”劲儿。她中学功课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师，有得天独厚的补习条件，所以她有把握在复员后的当年考入大学。杨艳的情况不同，她在学校是全班最能死用功的一个，考试名次却往往成反比。爸爸对她的学业抓得很紧，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打，没头没脑地打。隔壁邻居都看不下去，批评他身为公安干部，抓住小偷流氓尚且讲教育，这么大的女孩子了，动不动就打，未免太不像话。他争辩说，是个小子倒可以随他去，女娃儿不

严一点不行,等她耍上了男朋友,打也来不及了。杨艳没少挨揍,功课还是老样子。不过她并不悲观,和吴小涓一起补习,她相信准能上去。她们抓紧了一切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还买了麦乳精,补充营养。她们希望到时候能够一举攻克复旦新闻系。

两个女电话兵军帽在树丛里刮丢了,还是向首长行了举手礼,欢欢喜喜退出了掩蔽部。出门不远,听见一号首长在电话上说:

“喂!你是有线连连长吗?怎么搞的,指挥所离你们没有几步路,整整二十六分钟才把线架来。以后这样不行,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吴小涓和杨艳失神地往回走去。她们心里又是委屈,又是丧气,感到负疚难过,悄悄流泪了。她们开始体会到,在战场上,一切都是用最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讲任何宽容,不作降格以求。对于女战士们也如此,并无不同。

五

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了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拂晓时分,九四一部队继续开进。这条路上还有几个部队同时往前去,步兵、坦克兵、自行火炮、辎重车队、民工担架队,交错在一起。发生了堵塞,互不相让,彼此威胁说,要把对方的车子顶下山沟去。交通哨戴着红袖箍,前后奔走,哪里有问题急忙去解决。新战士们以为,打仗本来就应当是这样红红火火的,不知道是地理条件所限,没有第二条路,只好都挤着一条公路用。离前沿越来越近了,可以清楚地听得见枪声。道路堵塞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九四一部队干脆提前下了车,急行军赶上去。

行军速度很猛,总机班六姐妹一个个走得歪歪倒倒的了。虽然经过严格轻装,除了穿在身上的,吃进肚里的,个人的东西几乎全都“轻”下去了,平均负荷还在三十斤以上,压得够戗。加之发的防刺鞋又是男式的,太大,像是穿了一对箩筐,脚都打泡了。六姐妹没有一个掉队,也没有一个愿意接受男同志的“互助”。

走得最狼狈的要算路曼了,主要是遇上她来例假。她每次来,肚子疼几天,像大病一场。昨天夜里,她想到只有身上的一条军裤,怕睡着以后弄脏了穿不出去,就脱下长裤,裹着雨衣睡下。想是受了风寒,一下子发起烧来。肖群秀摸她脸,滚烫滚烫,本来要报告班长的,路曼不让她讲。

“你讲了,以后不和你好啦!”路曼威胁说。

“可你这么硬撑怎么行哪。”小肖着急地说。

“你和班长讲了,还不是她悄悄替我值机。你看不出,班长也来了。”

小肖只好替路曼打着掩护。

路曼家乡在山区,能用上这种软绵绵的经过了消毒的卫生纸,觉得够好的了。可是连续几小时急行军,腿磨得受不了,迈出一步,都得拿出点决心来。

部队到达了位置,谢天谢地!女电话兵们全副武装就地一歪,觉得再也爬不起来了。连长却不得不以毫无同情心的语气命令她们起来,立即开设电话站。

总机刚开不久,一号首长从前沿部队要回电话来:

“喂!总机班,找你们连长讲话。怎么搞的,我和指挥部刚通两句话,线就没有了。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

一查,原来通往指挥部的线,有一段是明放在公路上的,被坦克轧得一节一节的。有的地方被民工队的骡马和着青草嚼烂了,粘在一起,成了饼饼。连里决定这条线改为高架。是路曼、肖群秀架的这条线,还是由她们来完成这项任务。

她们两个一路把线改架在竹子上,或是挂在岩石上,让骡马够不着。来到公路边,敌人正从对面山上向公路射击。来势很凶,又是轻重机枪,又是八二迫击炮、四〇火箭筒、反坦克榴弹,又是高射机枪打平射。抗美援朝期间中国援助的武器全都用上了。由于武器弹药充足,构成了越军作战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把武器弹药分散藏在各处,这里打一阵,顶不住了,空着手就跑,枪啊炮的全不要了。换一个地方,就地又有现成的,抄起来就打。早上我们部队搜索过去,这股敌人化军为民,隐藏到丛林里去了。现在又冒出来,居高临下封锁了公路。我们的后续部队和担架民工,被压制在公路排水沟里不能动。路曼和小肖焦急万分,想尽快改架好这条线,保障指挥,狠狠教训一下敌人,不能由着他们狂。不凑巧的是近处没有高大的树木,无法把电话线高架跨过公路。好不容易发现一棵木棉树可以利用,正要过去,隐蔽在茅草中的部队喊她们趴下,说木棉树那里太暴露,去不得。她们俩只管猫着腰跑过去了。

如果有悬线杆,事情很简单,把线挑到树杈上就行了。如果带了脚扣和护腰带,要上树也好办。她们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这就难了。女兵班没有学过四肢攀登,连里把这个项目给取消了。她们试了几次,怎么也爬不上去,又搭人梯,路曼蹲下,让小肖踩着她的肩膀上去。一个人站在肩上,本来不算什么,谁知路曼身子软得像面条,忽忽悠悠刚要起来,又缩下去了。只见她脸上直冒虚汗。肖群秀这才想起来,路曼有特殊情况。

换了小肖蹲下,让路曼上去。按规定要求,高架线路必须在四米以上。她们搭的两节人梯,高度达不到。小肖拼命向上踮脚尖,差着老高的一截,踮脚尖顶

什么呢。

隐蔽在路边草棵里的一个战士,跳起来扑向木棉树。他很不礼貌地拍拍小肖的腿,叫她分开腿站好。战士弯下腰,让小肖骑在他脖子上,他猛地挺身站立起来。现在变成了三节人梯,高度足够了。

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拼命向这边扫射,殷红殷红的木棉花纷纷扬扬落下来。小肖觉得下边战士身子忽然一抖,差点倒下去,随后又稳住了。路曼忙把电话线在树枝上绕了两圈,打了一个双环结,欢快地叫道:

“好啦!”

两个女电话兵下了地才看到,这个战士高高大大的,身材很匀称,像个跳高运动员。皮肤那样白净,两道浓密的眉毛黑黢黢的。

“同志!你太好了,帮了我们大忙。”电话兵表示感激。

“用不着你们表扬,表扬不过是两句空话。”战士大胆地望着两个姑娘说。

“那,我们应当怎么感谢你呢?”

“也不需要感谢,我只要求赔偿损失。”

战士扯起他的军服给她们看。军服下摆穿了几个洞,军用水壶的背带也被子弹打断了,断头处燎得黑黑的。路曼和小肖明白了,刚才她们觉得他一哆嗦,要倒下去,原来是这位战士险些被打中。他没有做声,也没有躲闪,一直等她们把线架好了。

“怎么样?伤着没有?”路曼、小肖顿时紧张起来。

“我觉得腰上烫了一下,一摸,没事儿,是吓唬我的。”

肖群秀拿过军用水壶,放出了富余的一节背带,把两个断头一并,打了一个丁字结,交还给了战士。那结儿打得又牢靠又好看,电话兵受过这种专门训练的。彼此问起来才晓得,原来这个战士也是“九四一”的,在营里当步话机员。路曼亲热地说:

“弄了半天,还是同行。只不过我们是有线儿的,你是无线儿的。”

步话机员说:“怎么敢和你们相提并论呢,你们是‘九四一’的中枢神经,我是神经末梢。好了,回去请代问总机班各位同志好。”

“你认识我们班谁吗?”

步话机员支吾了一下,随后说:“认识不认识,问候一下总得罪不了人吧。”

“怎么替你问好呢?我们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就说一名‘无线’战士,向‘有线的’战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还是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吧!”

“告诉你们有什么意思,反正你们也不会给我写信的。”

两个女电话兵没想到对方会这样说话,不由得脸红了。接着咯咯咯地笑起

来,没有回答是不是会给他写信。

指挥部调上来一个坦克中队,打掉了半山腰敌人的火力点。公路恢复通行,长长的车队不停地向前流动起来。路曼、小肖站在路边,看见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步话机员,高高地坐在一辆弹药车上。弹药车是严禁抽烟的,他抽着烟。她们高声地向步话机员打招呼:“喂!再见,再见!”

“得啦!再见面怕你们就认不出我是哪一个了。”

两个女电话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明白过来,这是他在说笑之间为自己作出的一个不祥的预言。汽车开出好远了,步话机员还扭回头来望着她们。尘土飞扬中,一张白净的面孔现出坦然愉快的笑容,那笑容是让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六

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疑有蓝天彩霞。

我们应当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去覆盖地上的沙漠。

几天以后,这位步话机员为自己所作的预言竟成了事实。

九四一部队基地指挥所,设了伤员和烈士遗体转送处。烈士遗体要在这里进行登记,清洗过了,换过新军服,然后上汽车送回国。转送处人员不多,主要是九四一部队文艺宣传队的女同志担任这项工作。总机距离这儿不远,女电话兵们下了机也常来帮助照料伤员,清洗烈士遗体。

这天,陶珂、路曼、小肖几个人又到转送处来了。见刚抬下来一位烈士,他的担架上放着一个军用水壶。水壶背带是断过的,打了一个电话兵们所熟悉的丁字结。路曼和小肖一惊。烈士的脸几乎整个缠着绷带,无法辨认。跟担架的一个小战士,失神地蹲在旁边。路曼问小战士:

“这个水壶,是他的吗?”小战士点点头。路曼又问:“他是不是当步话机员的?”

“怎么,你认识我们步话机员?”小战士反问道。

路曼和小肖抚弄着水壶背带,好久不言语。随后她们向小战士问起这位烈士姓名。

“他叫刘毛妹!”小战士回答说。

听到这个名字,站在后面的陶珂禁不住倒吸一口气,几乎叫出声来。大家连忙让开,陶珂扑上去,凑近脸去看,极力要在这张缠满了绷带的面孔上,辨认出她所熟悉的某些特征来。

陶珂和刘毛妹从小住一个院,相互看着长大的。在户口本上,刘毛妹登记的并不是这样一个十足女性的名字。因为生得白净,头发髻髻的,又是那么文静,活活像个小姑娘,院里的人都喜欢喊他“毛妹”,喊来喊去成了正式的名字了。同院还住了几个干部,几家的孩子都很要好,连小人书都是一起商定了买的,交换来看,决不会买了重样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小陶和妈妈到原先住过的院子里去看,住户们全都不认识。一群孩子用惊疑的目光瞪着她们,问她们找谁,母女俩没说话,回身走了。

以后打听到,毛妹的爸爸刘伯伯死得很惨。让他烧锅炉,他从几十米高的烟囱上跳下来,五脏俱裂。刘伯伯搞过白区工作,在国民党监狱里表现很英勇,是党组织想办法营救出来的,如今他们硬要打他是叛徒。其实,刘伯伯的问题,只要他自己能撑下来,也就没事了。问题出在毛妹的妈妈苏阿姨身上,苏阿姨不但安慰刘伯伯,鼓励他坚持斗争,她还以毛妹两兄弟的名义写标语贴出来,表示坚决和“大叛徒”划清界限。严刑拷打可以忍受,骨肉亲人加给的打击和侮辱,是难以忍受的。不是这样,或许刘伯伯还不至于走上绝路。陶珂小时候觉得苏阿姨一向待人和气可亲,早晚见面总是笑着,不想她是这么一个人……

陶珂同幼年的朋友一直没有联系,入伍到了新兵团,意外地遇到了刘毛妹。第一次见面,部队在集合,只匆匆握了个手。小时候他们多少次脊背贴着脊背比过个儿,始终不差上下。现在毛妹一下蹿到了一米八二。小陶觉得,刘毛妹除变得人高马大以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变。和她握手,涨红了脸,还像个怯生生的女孩子。随后又有几次见面,小陶才感觉到,同她一起长大的这个年轻人变得完全陌生了。那一对眼睛,朦朦胧胧的,失去了原有的明澈光亮。当孩子的时候,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现在倒很不讲军风纪,常常是解开两个纽扣,用军帽扇着风。抽的是五角以上一包的烟,一连串地吐着烟圈儿。无论说起什么事情,他都是那样冷漠,言语间带出一种半真半假的讥讽嘲弄的味道。不像小时候,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强烈的兴趣,有着十足的热情。谈起小学的同学,某人某人现在搞什么工作,刘毛妹说:

“无所谓,我的看法是干什么都行。因为什么都不干好像是不行。”

小陶问他:“既然这样,你何必一定要到部队上来呢?”

“既然你可以来,为什么我不能来呢?”

他们谈起了争取入团、入党的事情,刘毛妹感叹地说:

“‘一年团,二年党,三年复员进工厂’。在知青点上的人和那些没有着落的社会青年看来,这当然是很够羡慕的了。其实又有多大的意思,没劲!”

小陶有几次试着给她幼年的朋友一些劝告,她说:

“我看见一篇文章上讲,‘不能因为第一次飞翔遇到了乌云风暴,从此就怀

疑有蓝天彩霞’。你就是这样,因为不相信有蓝天彩霞,干脆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毛妹!别太悲观,我们需要振作起精神来。”

“我也在报上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说:‘请正视现实,不必以海市蜃楼里的绿洲,覆盖地上的沙漠。’”刘毛妹逼视着小陶。

“毛妹!瞧你的眼睛,别那么盯着我好不好。我不是样板戏里穿一身大红的女主角,‘站在高坡上,伸手指方向’,教导你‘向前看,再向前看!’我并不是让你缩成一团,胳膊肘拐一下,生怕碰着了谁。你心里有岩浆,喷出来好了……”

刘毛妹打断了小陶的词:“恐怕现在需要的不是岩浆,是温吞水,六十来度,还赶不上二锅头的度数。看来,我们这些小字辈的还是尽可能‘正统’一些好。”

“经常听人讲到‘正统’这个词,究竟你是指的什么呢?”陶坷问。

刘毛妹想了想说:“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没考证过。所谓‘正统’思想,别人一定可以作出种种美好的解释。不过照我看,这似乎是意味着服服帖帖,得意于迷信愚昧的一副精神枷锁,意味着一本正经,拿腔作调,俨然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岂不知这种人够多么可怜,等于一个有血有肉有毛孔的机器人就是了。”

他们谈到小时候一起读过的那些小人书,陶坷愉快地回忆说:

“小人书上面的那些英雄人物,有些连胳膊腿都安得不是地方,我们总一篇一篇过细地看,翻完了又从头看。有几本现在拿来看,我还是很喜欢。”

刘毛妹嘲弄地笑笑说:“你还是依赖于幻想生活,需要从童话里吸取营养。我不再需要依赖于什么。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需要,我希望能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陶坷越来越感到很难和他谈得拢。可是,每次见面以后,她总是怀着急切的心情,在等待着下一次见面的机会。

一天晚上,部队在广场看电影。放映中间等跑片,解散休息。刘毛妹悄悄约陶坷去走走,小陶觉得不大好,还是跟他去了。转悠到营房背后,他们避开路灯,走在浓密的树荫下。刘毛妹一下抓住了小陶的手。他一双大手热乎乎的,那么有力,像两把铁钳。小陶心慌意乱之中,已经感觉到抽烟人口里的那种气息。她极力向后仰着脸,躲避不开,双手被紧紧抓住,就用头在刘毛妹宽大的胸脯上嘭嘭地撞击着。刘毛妹只好放开了她。陶坷跳到灯光下面去,整了整衣服,沉静地说:

“我可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温暖了。毛妹!难道我们相互温暖一下,或者说是让我来温暖温暖你,一切就会好起来了吗?”

陶坷扭头走了。从此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也没有通过信……

陶坷竟能忍住了眼泪,默默地听那个跟担架的小战士讲述刘毛妹牺牲的经过。

“昨天攻打三号高地,我们二连是主攻,营里要配一个步话机员给我们连。别的几个步话机员都争着报名,刘毛妹不做声,在一边卷着烟抽。他心里有数,配属给主攻连,肯定是要过硬的,报名不报名也是他的事儿。可不是吗,最后营里派了他,跟我们突击排上去了。

“本来决定偷袭,到了高地下面,踩响了地雷,副连长只好命令我们强攻。这个垭口高地,是316A师的重点设防阵地,修了三道环形堑壕,两侧十多个山包的火力都可以支援这里。冲过第一道堑壕的时候,副连长牺牲了,一句话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发前副连长指定了一排长做他的代理人。刘毛妹找到一排长,跟上他继续往上冲。不一会儿,一排长又受伤,流血过多,不行了。他指定的代理人是副排长,刘毛妹又跟上副排长继续战斗。副排长拿着话筒,正和指挥所通话,重机枪一阵风地扫过来,他当下牺牲。步话机也被打坏,不能再用了。由于指挥中断,部队开始有些稳不住了。三班有几个战士,把钢盔压得低低的,遮住了自己的脸,要往下撤。步话机员虎势地上去,一脚把走在前头的一个踹倒了。他直直地瞪着他们,火光下看见,那两只眼睛好惨人哪!三班的几个人不敢再动了。步话机员跳到堑壕上面,大吼一声说:

“‘大家不要慌,现在听我指挥!’

“当时我们嘴上不说,心里嘀咕着。你能行吗?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

“看样子硬冲是不行。刘毛妹分派了两个战斗组,从两侧佯攻,故意弄得竹子哗哗啦啦响,吸引敌人火力。他带着部队,顺环形壕绕到高地背面,突然发起攻击,冲过了最后一道堑壕。

“不想刘毛妹胸部和腹部受伤,右腿膝盖骨也打断了,小腿活活甩的。用了七个救急包,才包住了他那些伤口。同志们要背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干。我强把他背起来,他老实不客气,在我肩膀上狠咬了几口,我只好把他放下来。讲好了让他在原地休息,等我们一离开,他就拖着一条断腿向山顶上爬。后来我去看,他爬过的地方茅草铺倒了,草叶上挂着一珠珠鲜红的血。

“连长和指导员带着二、三排支援上来,占领了三号高地。这时候听见,什么地方有人用越南话在连声地呼叫。翻译说,他呼叫的是‘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原来这是越军的一个报话兵,他看高地已经完全失守,隐藏在一蓬竹子里,呼唤他们的炮群,想把我们主攻连全部盖在高地上。正赶上刘毛妹爬到这里,他悄悄过去,冷不防一下卡住了那个报话兵的脖子。那家伙抡起手榴弹,砸在刘毛妹下巴骨上。可他硬是不松手,等我们赶上去,敌人报话兵已经完了。越军装备的报话机也是中国给的,和我们部队用的是一个型号的。刘毛妹把敌人的机子调了一下,拿起话筒想要呼叫。下巴骨和牙床砸得稀粹,哪里还能叫出声来。他发出唔唔呵呵的声音,可以猜得出,他在向指挥所报告:

“‘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占领三号高地！二连……’

“他丢下话筒，正了正军帽，把长头发掖进帽子里，又扣好了风纪扣。认真地整过了自己的军容以后，他闭上了眼睛，像是过于疲劳，一下睡着了。”

七

《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沉默了好大一陣，小战士又接上说：

“我们步话机员这个兵，不是这次到前方来，恐怕人们是不容易真正了解他。只在平时看，你可能觉得他有些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说不出，你只能说，他就是他那么一个人。要讲聪明，人可真是够聪明的。在报话机训练班，别人都发愁密语背不会，白天黑夜地背。他呢，从来不怎么用心去背，到了密语考核，一二名里总少不了他。

“出发之前，别人都忙着订杀敌立功计划，写决心书，他不写，说没时间。可是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写一封长信，不许人看。牺牲以后，在他身上找出来了，是写给他妈妈的。”

“信呢？给我看看好吗？”陶珂伸出手要。

小战士从衣袋里取出信来，说连里特别交代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给烈士的母亲。信是步话机员原来包好的，怕湿了雨水，包了两层塑料纸。

陶珂捧着字迹潦草的信，急切地读下去。

亲爱的妈妈：

我以前很少写信，现在想好好写封信给妈妈，可是时间紧张，我只能抓空子陆陆续续写一点。一过红河，恐怕就一个字也不能写了。

前年入伍，我是有过犹豫的。听人说，批准我入伍有照顾的因素在内。我一想到自己在享受照顾，心里很不舒服，这是爸爸用他的惨死替我换来的呀！不过我还是到部队来了。我当时也没想到在我服役期间可以捞到打仗，只是觉得在知青户太闷人了，想换个环境，新鲜新鲜。现在马上要开赴前线，我才清楚意识到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了。这次出去，比起你和爸爸经历过的几次战争，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总算参加了战争。

在吹哨子，要讨论动员报告，暂时止笔。

我接着昨天写。营长一再讲，要保证睡眠，准备参加战斗。可是这几天

我一直睡不好。不知怎么,好像总有人翻来覆去在我耳朵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支歌曲写在中华民族几乎被日本人蛇吞的历史危亡关头。现在越南人在边境地区整我们,情况不像那时候严重。不过,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于如此,竟觉得欺侮一下十亿人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实在是值得想一想的。同志们谈起来,都说内心隐隐的有一种危亡之忧。这种感觉并不完全出于神经过敏。“四人帮”粉碎了,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了,说中华民族还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似乎是说不通的。其实,力争四化,这本身不正是回答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吗?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险的地位上。同时别忘了,有人曾经对周总理和一些老同志说过,“十年以后见”,这才过去了几年?我很担心,不要在“高举”的名义下,又来个几个月风暴,把人们一切美好的希望给吹个无影无踪。谁知道呢!我怕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经不起再一次被推到这种危险的边缘了。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一次“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歌,为了填写新国歌的歌词,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能。《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曲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前些年,“四人帮”任意歪曲宣传党史和军史,已经出了不少文章批驳他们。我想,无论从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观点去看,有一个事实总没有疑问,那就是除去自然死亡之外,先烈们是在两种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一种是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一种是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看来这是一条规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爸爸在第二种情况下离开了我们,我这次则有条件占据第一种情况。我的好妈妈!如果这样,您一定不要难过,不必像哭爸爸那样为我流泪。您的泪水早流尽了,再为我哭,眼睛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妈妈!您可能觉得我写这些,口气不小,似乎一定可以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这样,在火线上这很难讲,也许我的心脏正巧碰上一颗流弹,一秒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随便一个小小的任务也来不及去完成。这就是战争,在意想不到的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有人付出他最大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心安了。

妈妈这次来信,又一次说爸爸等于是您害死的。为什么您总是把我们家的不幸归罪于自己呢?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愿和妈妈谈及这些,使您误解了,以为做儿子的直到现在还不愿意谅解母亲。

营长要求再检查一下机器,我晚饭后再来写。

好妈妈!您不必这样。别人议论,讲些难听话,那是自然的,莫非我也不

了解爸爸的“案”情吗。您对爸爸的那些做法,无非是表示划清了界限,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不至于受到无可挽回的影响。爸爸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当然,最好是妈妈不那样做,不给爸爸那样的刺激。您来信中引用了鲁迅的几句话谴责自己:“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箭,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如果可以这样比喻,我认为那是您自己服下了一种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的慢性毒药,同时也误进给了爸爸。这种慢性毒药,就是我们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封建传统的旧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培育了我们人民许多美好的品德,善良温顺,忠实敦厚,谦恭忍耐。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些品德发出了新的光辉。这就是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观念,维护领导,信任同志,讲团结,讲让步,讲顾全大局。这如同古老的中国宫灯,将蜡烛改换了明亮的碘钨灯泡。这些美德既然是带着古老历史的光照雨露,它和两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绝缘。在我看来,两者不过是相隔着一道细细的田埂,这边是温顺,迈一步过去,就是屈辱。妈妈!在对待爸爸的问题上,您迈过了田埂。我并不特别责怪自己的母亲。你们这一辈人里,固然有敢于拍案而起的。但有很多比妈妈革命历史更长,职务更高的人,包括我们一向尊敬的某些老同志,由于那种慢性毒药在他们身上起着作用,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也不免是那样软弱顺从。他们仿佛是在雪线以上的稀薄空气中生活久了,已经适应了不民主的缺氧状况。妈妈可以说是彻底划清了界限,在您的“结论”里仍然写的是“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些人说到这个结论,觉得拗口,往往简单地说成“现行的老婆”。我因为受不了人们这样侮辱母亲,和别人家孩子打过多少架,鬓角落下了一道伤疤。假如这次我在前方被炮弹地雷炸着,那不算是受伤,那叫做挂花,只有我鬓角的疤痕,才真正是受伤留下的。

亲爱的妈妈!我一个晚生后辈,也许不合适给您写这些的。我是想让您相信,您不见得比别人应当受到更多的内心谴责,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唯独您不能得到谅解。

就写这些了,我并不打算寄出,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那一定是战友们替我收检遗物找出来的。

代问弟弟好,已经没有时间,不另外写信给他了。

祝妈妈愉快,再见了!我希望能像外国电影里那样,跪下来吻别您,生我养我的母亲。

您的儿子 毛妹
于登车出发前

刘毛妹留给母亲的信,陶珂看了两遍。信的内容对她不成为主要的了,主要的一点是信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她。这对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沉重的打击。小陶终于忍不住伤心落泪了。不过她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宣传队的两个女同志为步话机员刘毛妹清洗遗体,她们默默地退后,让小陶上前去。小陶用纱布蘸着清水,先擦洗刘毛妹的脸。她时不时停下来,注视着死者的眼睛。她觉得刘毛妹是怨恨她,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她。在擦洗手的时候,陶珂几次痴痴呆呆地停下来,别人催她,她才又开始擦洗。她想起小时候他们手拉着手过马路。赶上看什么热闹,人挤得凶,刘毛妹始终紧紧拉着她的手。他是男孩子,自然地负起了保护女伴的责任。陶珂又想起在新兵团看电影那天晚上,刘毛妹大胆地抓住了她的手。在刘毛妹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亲吻一个异性。他一双手是那样有力,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欲望的,他还是失败了……

步话机员的军服、绑带、鞋袜,没有一处是洁净的。泥水和着血,凝结在肉体上,没法子脱下来。小陶用剪刀完全剪碎了,花了很长时间,轻轻地一块块把衣服鞋袜撕下来。她不让别人动手,似乎是怕别人手脚毛糙,触痛了步话机员。清洗过遗体之后,数过了伤口,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龄乘以二。

八

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音。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

送走烈士遗体,陶珂她们回到电话站,才知道敌情有些紧张。侦察连抓到了一个越南人,他自称是附近班通林场的工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个铅笔头,一张草草画出的地图,图上标明了九四一部队指挥所的位置。审讯结果,他承认自己是青年冲锋队员,供出敌人准备当天夜里来偷袭指挥所。司令部通知说,机关留的警卫部队很少,不能分散使用,要求各小单位加强警戒。还特别通知了总机班,电话站一定要严格控制声音灯光,避免暴露。

连部干部都下去了,总机班一切只能靠自己应付。不过女电话兵们并不显得那么着慌。不怕,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班长在哪!

在人们印象中,严莉似乎是经过专门培训,预先为女兵班准备好了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成熟的班长。严莉今年二十二岁,是总机班的大姐。她脸微微有点黑,黑翠黑翠的。她在班里的地位,多少像是她在家庭里所处地位的延续。严莉

弟妹多,快够一个班了,爸爸妈妈管不过来,干脆撒手交给老大来管着。爸爸是一个团职干部,按规定应该吃中灶的,他除了偶尔陪陪客人,总也不到中灶食堂去。从将近二十年前第二个儿子出世,爸爸的薪金再没有长了,生活上不能不精打细算。在大女儿的统筹安排下,他们家竟然并不比谁家显得紧张到哪儿去。弟妹们都很懂事,从不和别人家孩子比吃比穿,不过该有什么也还是少不了他们的。人家的孩子穿衣服,老二接老大的,老三接老二的。严莉的衣服谁也接不上,她脱下身的,就实在不能再补再改了。每次分到各人名下的糖块冻柿子什么的,大姐总是留着自己的一份,过后说不定会便宜了哪一个小的。严莉在家庭中的作用,形成了她实际上的一家之长的权威。弟妹们不怕爸爸妈妈,全都怕着大姐几分。严莉把管理弟妹们的艺术运用到总机班长的职务上来了。别人遇事可以耍点小脾气,她不行,她必须把自己的气性掩盖起来,从不发火。班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分派公差勤务公平合理。赶上谁当班的时候有点私人的事,悄悄向她请个假,她就悄悄顶上去,多值一班。发生了什么纠纷摩擦,她拿出当大姐的权威,先把事态平息下来。然后召开班务会,民主一番,谁对谁不对当面“吵”清,决不马虎了事。说严莉显得特别成熟,完全是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人们知道,当得下女兵班班长可不那么简单。在连队里,这算得上是一个特种兵团了。

越南人可能来袭击,电话站当然是一个突出的目标,情况不能说不严重。总机原是设在一个用茅草竹子搭起的棚子里,人来人往都看得见的。同志们建议,要赶快转移到隐蔽的地方去。

“不用动,照常工作!”严莉沉着地说。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了,严莉才悄悄地布置,人员全部撤出草棚子,把总机转移到一个防炮洞里。洞是就着上坎挖的,挖进两三尺,向左右发展,对称构成了像猫耳朵一样的两个藏身的窝窝,战士们习惯叫做猫耳洞。这个猫耳洞有茂密的树丛遮掩着,严莉又叫把电话线从老远就开始埋设下去。所以,就是走到了跟前,指给你看,你也看不出这里是一个电话站。

总机班派出了自己的巡逻哨。有人主张,除了值机的人,其余人全部去站哨。严莉说:

“用不着,该睡的还是睡,换着班来。仗不是打一天两天,日子长了。”

她只派了陶珂和杨艳两个人担任警戒。班里唯一的一支冲锋枪交小陶使用,杨艳拿着两颗手榴弹。班长交代两名哨兵说:

“你们就绕着总机附近游动,不要乱走,以免和其他单位的巡逻哨发生误会。要找暗处站着,不要总在月光下面。有什么动静先问口令,可别慌慌张张的就开枪。问口令嗓门儿尽量粗一点,别让人听出来是女的。”

严莉确定由她自己担任守机。完成今晚的守机任务不比平常,要准备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坚持通话。猫耳洞里直不起腰来,只能把二十门交换机摆在地下,窝憋着工作。机子上不能开灯,号牌掉了看不见,全靠用手指不住地去触摸几排号牌,接转通话。为了完全控制声音,严莉用两层军毯,连人带机子一起蒙了个严严实实。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息。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严莉不停地在高声呼喊,呼喊。部队向敌人侧背穿插过去,发展很快,电话线路一再延伸,已经远远超出了有效通话距离,虽然加了“增音”,通话质量还是很差。往往下达的命令指示,向上报告的重要战况,要由严莉从中传送。她讲了一遍。怕有什么不准确,又复述一遍。严莉忽然觉得喉咙里咸咸的,有股腥味,知道嗓子出血了。这几天,几个女电话兵嗓子全都喊坏了,带来的清音丸已经吃完,没有什么防治的办法。多喝水会好一些,偏偏附近山地没有活水,找到一片积水,尽是小虫子在翻上翻下的,放几片净水剂澄清一下,那种怪味让人打哆嗦,喝不进去。部队里有一种奇妙的发现,凡是折断了青竹子,靠根部的几节里准定会聚存了水分。在竹节的地方穿通一个洞洞,就可以接到几口又纯净又清凉的水。这是很珍贵的,不容易弄到。严莉晃了晃她的水壶,还存有一点青竹的水。拧开壶塞儿,想喝几口润润喉咙。但她只是漱了漱口,吐出带血的水,又拧紧了壶塞儿。女兵班班长想到,水得留着,说不清班里谁又发高烧,或是受伤,一点水没有哪能行呢。

这天特别闷热。严莉一整夜钻在猫耳洞里,又蒙在两层毯子里,她热得什么样子,可以想象。摘下耳机,简直可以倒出水来了。第二天别人来换严莉的班,吃惊地看见,她像是刚刚参加了泅渡训练上来,人已经瘦了一圈儿。是谁发现严莉额头上爬着一条旱蚂蟥。经人这么一说,严莉尖叫起来,她跺着脚,紧张得不知怎么是好。同志们叫她别乱动,帮她脱下衣服来找,找到十多条。手指头缝里还隐藏了一条,她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吸饱了血的蚂蟥,圆鼓碌碌的,拍打几下就掉了。还没有吃饱的,怎么也弄不掉,又不敢硬扯硬拽,怕扯断了,留下一半更难办。忽然想起来,出发前连里介绍过对付蚂蟥的办法。跑去找人要了一支纸烟来,点着了对着蚂蟥熏,不一会儿,它们就曲卷着掉下去了。蚂蟥叮过的地方,渗出血来,这也有一种妙法对付,捏一点树干上的青苔丝丝按上去,很快就不再出血了。几个女电话兵只顾帮着严莉止血,往地下一看,太可怕了,一条条大蚂蟥身子一曲一伸,正从四面八方向她进军。她们赶忙用树枝扫荡了一番。旱蚂蟥天生有这种本能,大老远的能够感受到人的气息,找着你来。它们还有空降的本领,可以从树叶上滚落下来,正好掉在人身。

因为人太少,巡逻哨也是一整夜没有替换。拂晓,陶珂模模糊糊看见几个人,弯着腰向这边摸过来。她忘记了应该装成男人的声音,尖着嗓子喊了几声口

令。对方不应口令,还在往前走,小陶开了枪。她没有打过冲锋枪,不知道控制快慢,手指头一动,一梭子弹出去了一大半。警卫部队的一位排长,听到枪声,带着几个战士赶来了。在树棵里搜索了好久,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埋怨陶珂说:

“怎么搞的,乱打枪!”

“我看得清清楚楚,像是有几个人……”陶珂为自己辩解。

“算了,肯定是你自己紧张过度。”

“既然看得清清楚楚,嘟嘟了大半梭子,怎么连一个也没有撂倒?”

杨艳护着自己的人,说真是听到了有响动。打着没打着敌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开枪还是对的,不能说是乱打枪。等别人走了,班里悄悄议论,杨艳也倾向于小陶是看花了眼。

第二天早上,把总机从猫耳洞搬回棚子里去。忽然,是谁“啊”地惊叫了一声,原来总机棚背后有一具越南人的尸体。这是一张孩子脸,最多十六七岁。他胸部完全浸在血泊中,两手紧攥着四枚揭掉了盖子的手榴弹。很明白,他是中弹以后坚持冲过来的,已经到了离总机棚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如果他还有剩余的一点点气力,一定会把四枚手榴弹扔进棚子里去的。陶珂没有看错,和这个年轻的越南人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他们撤出战斗很及时,丢下一名英勇的同伴不管了。

九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班通林场青年冲锋队的任务是袭扰中国边防部队指挥机关和后勤,其中一项,就是窃听电话,破坏电话线。这给九四一部队有线通讯造成了很大麻烦。

总机上又传来了一号首长焦急的声音:“喂,总机班吗?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不是这里不通就是那里断线。命令你们连长、指导员,亲自给我查线去。”

不用首长讲,连长、指导员已经带着查线组出去了。总机站也派出了三名女电话兵,和男兵打乱编组,去协同维护哨巡查路线,尽快恢复畅通。

陶珂和架设排的两个新战士编成了一组,她是老兵,技术又强,自然担任了组长。为了不让人看出三个查线兵当中有一个是女的,小陶特意要了一个钢盔戴着。他们手捂着电话线往前跑,手心摩擦得火辣辣的,出了血泡,生疼生疼。跑出一段路,搭上单机一试,开端终端都不通。有鬼了,这一段线路是刚刚手捂着过来的,明明好好的,怎么开端也不通呢?陶珂想了想,她把通过水田里的一节

线提起来,离开了水面,一试,通了。放下去,又不通了。这节线有好几处绝缘皮裂开,和大地接触,短路了。这是暗断,不容易察觉。小陶仔细查看,胶皮是新割开的。破坏电线的人巧妙地使用了自己的知识。

把水里的一节线换过了,又往前去,发现明晰,线剪得一节一节的。他们一面骂着越南人,一面迅速接线。小陶十个手指那样灵活,像在水里翻腾的小鱼儿,看不清是怎么两绕三绕,一个蛇口结打好了。她顾不得用钳子剥掉线头的绝缘皮,就用牙咬。平时总机班的姑娘们是极力避免这样做的,牙用多了,会向外凸出,难看死了。小陶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嘴被电话线钢丝扎烂了,牙根在出血。她忽然发现,旁边有敌人的一条电话线,和我们线路平行拉过去,看来是撤退得慌张,没有来得及收。这是一条中型线,三钢四铜,通话质量很好,肯定是过去中国支援他们的。她不再费力去接碎线,把敌人的电话线用上了两公里。

再往前去,接上了其他小组负责的地段。开端终端都摇出来了,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谁知正试着线,开端又不通了。返回复查,刚刚利用的敌人的中型线又被剪断了。显然是有人在和他们玩“躲猫猫”,见他们巡查过来,躲避一下,等他们过去又出来破坏。重新接好了线,陶珂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她悄悄对两个同伴说:

“你们俩继续往前去,装着什么也没发现。我留在这儿,看看是怎么回事。”

“分散行动怕不大好吧,我们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两个新战士有些担心。

“没关系,周围都是我们大部队,敌人是小偷小摸,他们才心虚哩。”

“要留,我们两个谁留下好了。”一个战士提议说。

“你们只管走,不怕。如果他们人多,我先不动。如果是一两个人,我一喊,你们马上返回来,收拾了他。”这是小陶的战斗部署。

两名新战士执行了陶珂的命令。他们脚步很重,故意弄出声响,让人知道查线兵已经继续前进了。

小陶隐蔽在一蓬竹子后面静候着,忽然发现右边不远的灌木丛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在动,越来越近。先是一只手分拨开叶子,随后一个人探出头来,左右观察。小陶把手榴弹弦套在指头上,随时准备投出去。那人已经从灌木丛里走出来,是一个身材小巧的越南姑娘。长长的头发披在腰间,在后脖梗用手绢束着。披了一块美国军队的伪装尼龙布,穿的是没有领子的紧身月白色上衣,宽大的黑绸裤,光着脚丫子,自动步枪挂在左肩上。不用说,这是一个青年冲锋队员。陶珂注意看看后面,再没有别的人跟上来。照说,她应当按事先约定的,喊叫几声,通知两个战士包抄敌人。小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战斗部署。她想,既然对方也是一个女的,在身个上又是占着绝对的劣势,为什么我不能捉一个活的?

那个女冲锋队员取出一把钳子,就要动手去剪电话线,同时侧目向竹丛里

看去,忽然看见在绿色的钢盔下面,一对明亮的眼睛正注视着她。越南姑娘闪过第一个念头就是她走进了伏击圈,周围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她。她转身要逃,不想枪皮带挂在树上,树枝弹性很大,自动步枪被弹出老远。待她要去拣,发现枪已经端在竹丛里那个中国人手上。在她的眼中,这位中国军人长得是那样高大,加上一顶闪耀着红五星军徽的钢盔,越发显得威武雄壮。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她木木地站在那里,知道不能再动。又转念一想,开枪就开好了,我还等什么,她撒腿就跑。

小陶并没有开枪,她们一前一后,像两只蝴蝶儿在追逐着,一时在林中空地上出现,一时又飞进密林中。青年冲锋队员回头看看,她十分惊异,为什么在她背后紧追不舍的竟是一个女孩子呢?她即刻明白过来,刚才看见的那位威武的中国军人,主要就威武在那顶大钢盔上。钢盔跑掉了,露出短短的头发,原来是个女的。这当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机灵地闪在一棵树后,屏住气等候着。只待追赶的人错过身去,就可以突然从背后抱住她。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动静,只觉得冰凉的枪管已经触到脊背上来了。她一回手抓住枪,拼命抢夺。越南姑娘双臂向上,高高的胸脯完全暴露给了对手。陶珂闪念想到,她可以腾出一只拳头,猛击对方的胸部。她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说女人的乳房是一个致命处,经不起打的。小陶没有这样做,她竭尽全力扭动几下,拖着越南姑娘旋转了几圈。横过枪,当胸一推,对方连连倒退十多步,仰面摔倒在地上。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她随后从衣袋里取出几张代言片扔过去。上面用中越两种文字印着:“告诉你的同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赶快出来投降,保证你们生命安全。”女冲锋队员拣起一张,装作在看,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抓起一把土,冷不防向陶珂脸上撒过去。趁着陶珂抬起胳膊肘去遮挡,她转身钻进了丛林。陶珂揉搓几下眼睛,又去追赶。

逃命的只想逃命,追赶的只想着捕获自己的猎物,都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全被扯烂了。她们的头发散乱不堪,沾满了草叶,脸上和肩头尽是一道道的血痕。

眼前出现一条清澈的河水,河面不宽,夹在两山之间,水相当深。上游一带,正是九四一部队穿插分割越军316A师的战场,不时有越军的尸体漂流下来。女冲锋队员看见水流得那么急,又看见一具具泡得发胀的越军尸体,本来不敢下水的。可是背后人追得紧,不容她犹豫,她擎着野藤从岩头上滑下去,横了心,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她水性不强,一进入激流,几个浪头盖下来,就有些发晕了。自己感觉还在奋臂游向对岸,其实只是随着波浪一高一低漂流下去了。

陶珂把自动步枪背起来,紧跟着跳下了水。经过两年泅渡训练,她全副武装,加上一拐子线,可以横渡几公里宽的江河。陶珂注意到,顺着弯弯的河道,再往下游去,便是一道巨大的瀑布,河水陡然折断,整个儿跌落下去,在深谷里激

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她很快游到前面去,拦截住女冲锋队员。对方还是极力挣扎,不让陶珂靠近。陶珂猛扑过去,把她按在水里,趁她被呛得不由自主,扯住她的长发,向岸边划去。陶珂一只胳膊拦腰抱住越南姑娘,一只胳膊紧紧勾住了从岸边弯到水面上来的粗大的树枝。回头一看,好险哪!她们已经到了瀑布将要向下跌落的地方。

越南姑娘精疲力竭,完全瘫软了,任凭陶珂拖带着游过去。她们刚爬上河岸,浑身的水还在往下流,只听有人用越南话喝令道:

“不许动!举起手来。”

陶珂忙要取枪,一看,围上来用枪逼住她们的,是连里派出来查线的几个电话兵。

战士们先都没有认出,从水里上岸来的是总机班小陶。两个姑娘的衣服一片片一条条留在树枝刺藤上了,剩下的不足遮体。几个战士不免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小陶气愤地说:“这些死人!只管看着干什么,还不把你们的雨衣扔过来。”

大太阳当顶照着,陶珂和她的俘虏严严实实地穿着雨衣,回到了指挥所。

十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水

三月五日,我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达到了惩罚越南侵略者的目的,决定撤回边界线我方一侧。西线的九四一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重创越军“E牌”316A师,圆满完成任务以后,采取倒卷帘的办法,梯次撤回国内了。

从红河浮桥一上岸,总机班的同志就把军用水壶里剩下的水倒掉,在“迎亲茶水站”灌满了凉茶,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喝了个够。她们说:

“半个多月没有喝到我们自己的水了,好甜哪!”

在外面大家都说,一回国先倒头睡它三天三夜再讲。不想,现在谁也没有一点倦意。她们踏上了自己的国土,心里充满了对于祖国的亲切感,充满了一种往常不大容易体验得到的新鲜感,早把劳累困倦忘到一边去了。电线上落了一排麻雀,唧唧喳喳地在叫,是谁说:

“我们这边的小雀子叫的,比那边的要好听多了。”

九四一部队在边境一线停留了一段时间,进行作战总结和评功庆功。陶珂参加转送女俘虏,提前回到祖国,在战俘管理所帮助了一段工作,也从俘管所回来了,总机班六姐妹全体会合在一处了。

一号首长是随后卫部队撤下来的，一回来，先跑到电话站来看望总机班的同志。连长、指导员陪着，大家都坐在线拐子上。一号笑呵呵地逐个儿望着六个女电话兵，使她们在那样亲切爱抚的目光下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才开口说：

“你们这些冒领男式大号鞋的，这半个多月怎么样？够受了吧？”

女战士们低下头，只是轻声地笑着。她们一向是用无缘无故的笑声来回答首长问话的。

一号兴奋地说：“别的不敢吹，我可以这么说，‘九四一’没有一匹不能上阵的马。行！真行！算我错看了你们。不知道通信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你们请功。没关系，他们忘了。我和二号为你们请功，提到党委讨论。”

大家简直不敢相信一号的话。她们觉得，出国作战以来，一号对总机班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的。他几次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可是，看样子首长是从心里在夸赞她们，不是随便说一说的。

杨艳嘴快，她故意说：“我们班任务完成得不好，一号别讽刺人。”

一号说：“谁想找我这么讽刺他一下，我得考虑考虑咧，我这人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要是说我们任务完成得还可以，那也多亏了一号，是一号刮鼻子刮出来的。”

杨艳这话引得大家一起笑起来。

“我是不是骂了你们什么难听话？我可不记得了。”一号连忙表示了抱歉。

班长严莉说：“不！线路出了问题，首长在电话上讲几句气话，我们心里倒还好受一点。如果首长一句话不讲，扔下‘有线’，全用‘无线’去了，那我们才受不了哪。”

一号嘿嘿地笑着说：“你们听听，到底是当班长的，同样几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总机箱子上，放了路曼和肖群秀刚刚填写好的两张入党志愿书。一号拿起来看看，祝贺了她们。一号说：

“听！红河沿岸炮还在响。你们能在炮声里。来填写入党志愿书，这是难得的。不比平时，谁在班里多扫了几次地，就算是过硬的条件，可以优先吸收入团入党。我晓得的，一个班就那么一两把笤帚，你早一点拿到了手，我就拿不到，不见得我的劳动观念就比你差。当然，抢着搞卫生总是个优点，我并不反对。”一号问严莉：“你们班就是她们两个填了表吗？”

严莉说：“在国外，支部就发给了小陶入党志愿书，她一直拖着，没有填。”

“为什么？”一号问小陶。

陶坷笑笑，总不做声。

“小陶以前写过申请的。现在总说自己条件不够,愿意过一段时间再讲。”严莉替小陶回答。

指导员说:“这次到前方来小陶是比较突出的,可是小陶总拿自己和刘毛妹烈士比。说既然刘毛妹都还没有能入党,那她就更……”

提起步话机员刘毛妹,一号首长立时现出了沉重的神色。他带着对于这位烈士深深的敬意说:

“大家都向党委提意见,说应该追认刘毛妹同志为正式党员。我们当然希望能这样,可是,他生前没有向党组织表示过这种要求。无论他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总是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

陶珂解释说:“这个情况我知道。我是想着,既然自己各方面差得太远,就是勉强入了党,一想起他,心里会觉得过不去的。我们党内缺少的是他这样的人。”

一个战士,出于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宁肯先留在外面,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战争年代里倒是常见的。当初一号本人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本来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填表的,他主动推后了一年。那时候在部队里,大家都以刚够年龄就加入了组织为骄傲。一号虽然失去了这种骄傲,却从不感到遗憾。今天又看到有人这样,使这位有将近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内心十分激动,感慨万端,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三千多万在各种情况下吸收进来的党员之后,再吸收一个党员,正如在激荡的湖水里又注入一滴水。这一滴水,即或是很不洁净的,也不至于给湖水里增添更多的沉淀物了。可是,女电话兵陶珂并不因此宽容自己,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水。

一号告诉连长,放总机班半天假,让她们下河去洗个澡。司令部在河里为女同志们划分出了一个地段。女电话兵们是迫切地需要洗涮洗涮了。出境作战以来,白天黑夜就是那么一身儿,又是雨又是汗,湿了干,干了湿。坐在一起,彼此闻得见的,除了和男同志们身上一样的酸臭,还多了一种男同志所没有的气味。

六姐妹在河湾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派人站上哨,轮流下河去洗。她们轻装很彻底,现在可怜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只好先把衣服和小东西全部洗出来,晒在草地上,然后洗头洗澡。完了,扯几片芭蕉叶铺着,坐下来梳拢着水淋淋的头发,等着衣服干。

太阳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她们洗了个痛快,一个个头发蓬蓬松松,夕阳照耀下那红润的脸皮儿像是透亮似的。驻地生产队的妇女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上看,她们议论说:“九四一部队招女兵,怕尽是要挑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 张 弦

—

尽管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在天堂公社的青年们心目中,爱情,还是个陌生的、神秘的、羞于出口的字眼。所以,在公社礼堂召开的“反对买卖婚姻”大会上,当报告人——新来的团委书记大声地说出了这个名词的时候,听众都不约而同地一愣。接着,小伙子们调皮地相互挤挤眼,“呵呵呵”放声大笑起来;姑娘们则急忙垂下头,绯红了脸,吃吃地笑着,并偷偷地交换个羞涩的眼光。

只有墙角边靠窗坐着的长得很秀气的姑娘——天堂大队九小队团小组长沈荒妹,没有笑。她面色苍白,一双忧郁的大眼睛迷惘地凝望着窗外。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切都与她无关。但突然间,她的睫毛抖动起来,竭力摆脱那颗沾湿了它的晶莹的东西。——“爱情”这个她所不理解的词儿,此刻是如此强烈地激动着她十九岁的少女的心。她感到羞辱,感到哀伤,还感到一种难言的惶恐。她想起了她的姐姐,那使她永远怨恨而又永远怀念的姐姐存妮。唉!如果生活里没有小豹子,没有发生那一件事,一切该多么好!姐姐一定会并排坐在她的身旁,毫无顾忌地男孩子般地大笑。散会后,会用粗壮的臂膀搂着她,一块儿到供销社挑上两支橘红色的花线,回家绣枕头……

在五个姐妹中,存妮是最幸运的。她赶在一九五五年家乡的丰收之后来到世上。满月那天,家里不费力地办了一桌酒。年轻的父亲沈山旺抱起小花被裹着的宝贝,兴奋地说:

“……我把菱花送到接生站,抽空到信用社去存上了钱,再回来时,毛娃儿就落地了!头生这么快,这么顺当,谁也想不到哩!有人说起名叫个顺妮吧,我想,我们这样的穷庄稼汉,开天辟地头一遭儿进银行存钱!这时候生下了她,该

叫她存妮。等她长大了,日子不定有多好呢!”

他发自内心的快乐,感染了每一个前来贺喜的人。当时,他是“靠山庄合作社”的副社长,乐观、能干,浑身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和力量。山坡上那一片经他嫁接的山梨,第一次结果就是个丰收。小麦和玉米除去公粮还自给有余。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人人都同他一样快乐,同他一样充满信心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等到五年以后,荒妹出世时,景况就大不相同了。“靠山庄合作社”已改成天堂公社天堂大队九小队。“天堂”这个好听的名字,是县委书记亲自起的。取意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当时,包括队长沈山旺在内的所有社员,都深信进“天堂”不过咫尺之遥,只须毫不痛惜地把集体的山梨树,连同每家房前屋后的白果、板栗统统锯倒,连夜送到公社兴办的炼钢厂。仿佛一旦那奇妙的、呼呼叫着的土炉子里喷出了灿烂的钢花,那么,他们就轻松地步过“桥梁”,进入共产主义了。但结果却是那堆使几万担树木成为灰烬的铁疙瘩,除了牢牢地占住农田之外,没有任何效用。而小麦、玉米又由于干旱,连种子也没有收回;锯倒梨树栽下的山芋,长得同存妮的手指头差不多粗细。菱花怀着快生的孩子从外地讨饭回来,沈山旺已经因“攻击大炼钢铁”被撤了职。他望着呱呱坠地的孱弱的第二个女儿,浮肿的脸上露出了苦笑:“唉,谁叫她赶上这荒年呢?真是个荒妹子啊!……”

也许是得力于怀胎和哺乳时的营养吧,存妮终于泼泼辣辣地长大了。真是吃树叶也长肉,喝凉水也长劲。十六岁的生日还没过,她已经发育成个健壮、丰满的大姑娘了。一条桑木扁担,代替了又一连生下三个妹妹的多病的妈妈,帮助父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一年一度最苦的活——给国营林场挑松毛下山,她的工分在妇女中数第三。每天天不亮下地,顶着星星回来,吞下一钵子山芋或者玉米糊,头一挨枕边就睡着了。尽管年下分红时,家里的超支数字总是有增无减,连一分钱的现款也拿不到手,但她总是乐呵呵地不知道什么叫愁。高兴起来,还搂着荒妹,用丰满的胸脯紧贴着妹妹纤弱的身子,轻轻地哼一曲妈妈年轻时代唱的山歌。

生活中往往有一些蹊跷的事,十分偶然又根源显见;令人惊诧又平淡无奇。比如畸形者,多么骇异的肢体也都可以找到生理学上的原因,只是因为人们的少见而多怪罢了。存妮和小豹子之间发生的事,就是这样。

小豹子是村东家贵叔的独生子,名叫小宝,和存妮同年。这个体格彪悍的小伙子,干起活来有一股吓死人的拼劲。有一次挑松毛,赶上一场冬雨,家贵婶在前面滑了一跤,扁担也掰折了。小宝过来扶起母亲,把两担松毛并在一起,打了个赤膊,咬着牙,吭哧吭哧挑下了山。一过秤,三百零五斤!大家吃惊地说,小宝

子真能拼,简直是头小豹子!就这样喊出了名。

七四年的初春,队上的干部清早就到公社去批孔老夫子了,壮劳力全部上了水库工地。保管员祥二爷留下存妮帮他整理仓库。老头儿一面指点着姑娘干活,一面唠叨着:

“干部下来走一圈,手一指:‘这儿!’这就开山劈石忙乎一年。山洪下来,嗨!冲个稀里哗啦!明年干部又来,手一指:‘那儿!’……也不看看风水地脉!”

“不是说‘愚公移山’吗?”存妮有口无心地搭讪说。

“移山能填饱肚子那也成!……来,把这堆先过筛,慢点,别撒了!……瞧这玉米,山梨树根上长的,瘦巴巴的,谁知出得了芽不?”老人又抱怨起玉米种子来。

“不是说‘以粮为纲’吗?”姑娘仍有口无心地答着。心想,跟老头儿干活,虽然轻巧,却远不如在水库和年轻伙伴一起挑土来得热闹。

这时,仓库门口出现了个健壮的身影:“派点活我干吧!祥二爷。”

“小豹子!”存妮高兴地喊,“你不是昨天抬石头扭了脚吗?”

祥二爷说:“回家歇着吧!”

“歇着我难受。”小豹子憨厚地微笑着,“只要不挑担子,干点轻活碍不着!”说着,他抄起木锨就帮存妮过筛。

祥二爷高兴地蹲在一旁抽了支烟,想起要喊木匠来修犁头,便交代几句,走了。倒仓库、筛种子这些活儿,在两个勤快的十九岁的青年手里,真不算一回事儿。不多久,种子装进了麻袋,山芋干也在场上晾干。小豹子说了声:“歇歇吧!”就把棉袄铺在麻袋上,躺了下来。

存妮擦擦汗,坐在对面的麻袋上。她的棉袄也早脱了,穿着件葵绿色的毛线衣。这是母亲的嫁妆。虽然已经拆洗过无数次,添织了几种不同颜色的线,并且因为太小而紧绷在身上。但在九队的青年姑娘中,仍不失是件令人羡慕的奢侈品。

小豹子凝视着她那被阳光照耀而显得格外红润的脸庞,凝视着她丰满的胸脯,心中浮起一种异样的、从未经验过的痒丝丝的感觉。使他激动,又使他害怕。于是,他没话找话地说:

“前天吴庄放电影,你没去?”

“那么老远,我才不去呢!”她似乎为了躲开他那热辣辣的目光,垂下头说,一面摘去袖口上拖下来的线头。

吴庄是邻县的一个大队,上那里要翻过两座山。像小豹子那样的年轻人也得走一个多钟头。它算不上是个富队,去年十个工分只有三角八,但这已使“天堂”的社员啧啧称羡了。青年们尤其向往的是,沿吴庄西边的公路走,不到三十

里,就是个火车站。去年春节,小豹子约了几个伙伴到那里去看火车。来回跑了半天,在车站等了两钟头,终于看到了穿过小站飞驰而去的草绿色客车而感到心满意足。九队的社员们几乎都没有这种眼福。至于乘火车,那只有外号叫瞎子的许会计才有过这样令人羡慕的经历。

“我也不想去!《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看了八百次啦!每句话我都会背!……”小豹子伸了个懒腰,叹着气说:“不看,又干啥呢?扑克牌打烂了,托人上公社供销社开后门,到现在也没买到!”

除了看电影、打百分外,这里的青年,劳动之余再也没事可干了。队里订了一份本省的报纸,也只有许瞎子开会时用得着。他总是把报上的“孔子曰”读成“孔子日”,当然不会有人来纠正这位全队唯一的知识分子。过去,这里还兴唱山歌,如今早已属于“黄色”之列,不许唱了……

忽然,小豹子兴奋地坐起来:“喂,听许瞎子说,他以前看过外国电影。嗨,那才叫好看哪!”他喷着嘴,又哧的一声笑了,“那上面,有……”

“有什么?”存妮见他那副有滋有味的模样,禁不住问。

“嘻嘻嘻,……我不说。”小豹子红着脸,独自笑个不停。

“有什么?说呀!”

“说了……你别骂!”

“你说呀。”

“有——”他又格格地笑,笑得弯了腰。存妮已经料想着他会说出什么坏话来,伸手抓起一把土粒儿。果然,小豹子鼓足勇气喊:“有男人女人抱在一起亲嘴儿!嘿嘿嘿……”

“呸!下流!”存妮顿时涨红了脸,刷地把手中的土粒撒过去。

“真的,许瞎子说的!”小豹子躲闪着。

“不害臊!”又一把撒过来。带着玉米碎屑的土粒落在他肩膀上、颈项里。他也还了手,一把土粒准确地落在存妮解开的领口上。姑娘绷起了脸,骂道:“该死的!你!……”

小豹子讪讪地笑着,脱了光脊梁,用衬衣揩抹着铁疙瘩似的胸肌。存妮也撇着嘴开始脱毛衣,把粘在胸上的土粒抖出来。……刹那间,小豹子像触电似的呆住了。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呼吸突然停止,一股热血猛冲到他的头上。原来姑娘脱毛衣时掀起了衬衫,竟露出半截白皙的、丰美而富有弹性的乳房。……

就像出涧的野豹一样,小豹子猛扑上去,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不顾一切地紧紧搂住了她。姑娘大吃一惊,举起胳膊来阻挡。可是,当那灼热的、颤抖着的嘴唇一下子贴在自己湿润的唇上时,她感到一阵神秘的眩晕,眼睛一闭,伸出的胳膊瘫软了。一切反抗的企图都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一种原始的本能,烈火般地燃

烧着这一对物质贫乏、精神荒芜,而体魄却十分强健的青年男女的血液。传统的礼教、理性的尊严、违法的危险以及少女的羞耻心,一切的一切,此刻全都烧成了灰烬。……

二

瘦巴巴的玉米长出了稀疏的苗子。锄过头遍,十四岁的荒妹开始发现姐姐变了:她不再无忧无虑地大笑,常常一个人坐在床边发呆。同她讲话,好像一句也没听见;有时看见她脸色苍白、低头抹泪,有时却又红晕满面地在独自发笑。……最奇怪的是一天夜里,荒妹一觉醒来,发现身边姐姐的被窝是空的。第二天问她,她急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还硬说荒妹是做梦。

这一阵,妈妈的腰子病发了。爸爸忙着去吴庄的舅舅家借钱,张罗着请医生。家里乱糟糟的。谁也顾不上注意存妮的变化。只有荒妹,在她稚嫩的心灵里,隐隐地预感到将有一种可怕的祸事要落到姐姐的头上。

祸事果然不可避免地来临了。而且,它远比荒妹所能想象的要可怕得多。

那是玉米长出半人高的时节,累了一天的社员,晚饭后聚集在队部,听许瞎子凑着煤油灯念“孔子日”。荒妹没等开完会,早就溜回了家,照应三个妹妹睡下,自己也去睡了。但不一会儿就被一阵喧嚣惊醒:吵嚷声、哄笑声、打骂声、哭喊声、诅咒声,夹杂着几乎全村的狗吠和山里传来的回声,从来也没有这样热闹过。荒妹惊慌地捻亮了灯,可怕的喧嚣越来越近,竟到了大门外面。突然,姐姐一头冲进门来,衣带不整、披头散发,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接着,光着脊梁、两手反绑着的小豹子被民兵营长押进门来。在几道雪亮的手电光照射下,荒妹看到他身上有一条条被树枝抽打的血印。他直挺挺地跪下,羞愧难容,任凭脸色铁青的父亲刮他的嘴巴。母亲这时已经瘫坐在凳上,捂着脸呜咽着。门外,黑压压地围满了几乎全村的大人和小孩。七嘴八舌,詈骂、耻笑、奚落和感慨。……吓得发抖的荒妹终于明白了:姐姐做了一件人世间的丑事!她忽然痛哭起来。她感到无比地羞耻、屈辱、怨恨和愤懑。最亲爱的姐姐竟然给全家带来了灾难,也给她带来了无法摆脱的不幸。那最初来临的女性的自尊,在她幼弱的心灵上还没有成形,因而也就格外地敏感,格外地容易挫伤。荒妹大声地哭着,伤心的眼泪像决堤的河流。一面用自己也听不清的含混的声音,哼着:“不要脸!丢了全家的人!……不要脸,丢了全队的人!……不要脸!不要脸!!……”

事情闹腾到半夜。

后来,她昏昏地睡了。朦胧中,又听到队长驱散众人的声音、家贵叔家贵婶向父母恳切道歉的声音、祥二爷劝慰和提醒的声音,“千万别难为孩子家,防备

着她想不开!……”妈妈的责骂也渐渐变成了低声的劝慰。荒妹终于贴着泪水浸湿的枕头睡去,又不断地被噩梦所惊扰。在最后一个噩梦中,她猛然听到从远处传来两声急促的呼喊:

“救人哪!救人哪!……”

荒妹猛地跳了起来。东方已经大亮。床上不见存姐,也没有了守着她的母亲。她忽地爬起来,赤着脚就往外奔,跟着前面的人影奔到村边的三亩塘前,啊,姐姐,已经被大伙儿七手八脚捞了上来,直挺挺躺在那里。这么快,这么轻易地死了!

母亲抱着姐姐嘶哑地哭号着,发疯似的喊着。多少次被乡亲们拉起来,又瘫倒在地上。父亲呆坐在塘边,失神地瞪着平静的水面,一动也不动,仿佛是一尊枯干的树桩。

朝霞映在存妮湿漉漉的脸上,使她惨白的脸色恢复了红润。她的神情非常安详,也非常坦然,没有一点痛苦、抗议、抱怨和不平。她为自己盲目的冲动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现在她已经洗净了自己的耻辱和罪恶。固然,她的死是太没有价值了。但是生活对她来说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吗?在纵身于死亡的深渊前,她还来得及想到的事,就是把身上那件葵绿色的破毛衣脱下来,挂在树上。她把这个人世间赐予她的唯一的财富留给了妹妹,带着她的体温和青春的芳馨。

……

事情还没有完。大约过了半个月吧,家贵叔家里又传出了凄凉的哀哭,——两个公安员把小豹子带走了。全村又一次受到震动。他们从田野里奔来,站在路旁,惶恐地、默默无言地注视着小豹子手腕上那一双闪闪发光的東西。只有家贵夫妇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跟在他们的独生子后面。

“同志,同志!”沈山旺放下锄头追了上来。这位五十年代的队长是见过点世面的。虽然女儿的死使他突然老了十年,而且对生活更冷漠了。但此刻,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能沉默。他向公安员说:“同志,我们并没有告他呀!”

公安员严峻地瞪他一眼,轻蔑地说:“去,去,去!什么告不告!强奸致死人命犯!什么告不告!……”

小豹子却很镇静,抬起头,两眼茫然四顾。突然,他略一停步,就猛地飞奔起来,向对面的荒坡冲去。

“站住!往哪儿跑!”公安员吆喝着,连忙追了上去。

但是小豹子不顾一切地奔着,杂乱的脚步踏倒了荒草和荆丛。最后,他扑倒在存妮的那座新坟上,恸哭起来,两手乱抓,指头深深地抠进湿润的黄土里。公安员跑来吆喝了几声,他才止住泪。然后,直跪在坟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散了会,荒妹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公社礼堂的大门。天堂公社是本县的角落,天堂九队又是角落的角落。她望了望低垂在西边松林里的夕阳,担心天黑以前赶不到家了,就断然放弃去供销社逛逛的计划,从后街直穿麦田,快步奔小路上山。

“沈荒妹,等等!一块儿走吧!”身后传来团支部书记许荣树的喊声。他家住八队,与九队只隔着个三亩塘。荒妹当然很希望有人与她同行这段漫长的山路,冬天的傍晚,这山坳是十分荒凉的。但她不希望同路的是个小伙子,特别不希望是许荣树。所以略微迟疑了一下,反而加快了脚步。在麦田尽头荣树赶上来时,她警惕地移开身去,使他俩之间保持四步开外的距离。

存姐的死,绝不仅仅给她留下葵绿色的毛衣。还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无法摆脱的耻辱和恐惧。她过早地接过姐姐的桑木扁担,纤弱的身体不胜重负地挑起家庭的担子,稚嫩的心灵也不胜重负地承受着精神的重压。她害怕和憎恨所有青年男子,见了他们绝不交谈,远而避之。她甚至鄙视那些对小伙子并不害怕和憎恨的女伴们。她成了一个难以接近的孤僻的姑娘。

但是,青春毕竟不可抗拒地来临了。她脸上黄巴巴的气色已经褪去,露出红润而透着柔和的光泽;眉毛长得浓密起来;枯涩的眼睛也变得黑白分明,水汪汪的了。她感到胸脯发胀,肩背渐渐丰满,穿着姐姐那葵绿色的毛线衣,已经有点绷得难受了。她的心底常常升起一种新鲜的隐秘的喜悦。看见花开,觉得花儿是那么美,不由得摘一朵戴在头上;听到鸟叫,也觉得鸟儿叫得那么好听,不由得呆呆地听上一会儿。什么都变得美好了,树叶、庄稼、野草以及草上的露珠……周围的一切都使她激动。她常常偷偷地在妈妈那面破镜子里打量自己,甚至在塘边挑水时,也忍不住对自己苗条的身影投以满意的微笑。她开始同女伴们说笑,过年过节也让她们挽着手一起逛一逛公社的供销社。尽管对小伙子仍保持着警惕,但也渐渐感到他们并不是那么讨厌的了。……就在这时,许荣树在她的生活中出现了。

还是她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荣树。那是她到设在八队的小学上一年级,男孩子们欺侮了她,一个同存姐差不多年龄的高班男同学,跑来打抱不平,还用袖口擦掉了她的眼泪。后来因为妈妈生下了最小的妹妹,她二年级还没上完就辍了学。当她背着小妹妹在三亩塘附近割猪草时,荣树看到了总是偷偷离开伙伴们,抢过她手上的镰刀,飞快地割上一大抱,扔在她的筐里,就急急走开。过了不多久,八队传来锣鼓声,荒妹带着妹妹们去看,只见他穿着过大的新军装,戴着

红花,沿着三亩塘边上的小路,去当兵了。

直到去年的一次团支部会上,她才又一次见到荣树。他几天前刚从部队复员。进了大队会议室的门,羞涩地向大家一瞥,就像荒妹她们那批刚入团的姑娘们一样,悄悄在屋角坐下了。这时几个同他相熟的活跃分子围过来,硬要他讲讲战斗生活。只见他窘得满脸通红,忙腼腆地推辞着说:“当了几年和平兵,又没打过仗,说啥呀!……”全然没有青年人心目中那种革命军人的威武气派。但不知为什么,这却引起了荒妹的好感,当选举团支部委进行表决,念到许荣树的名字时,她勇敢地把手举得笔直,以此表达她真诚的愿望。

到下一次的团支部活动时,新上任的支部书记许荣树却提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主张,并因此引起了曾当过民兵营长的党支部副书记的不满。

过去,天堂公社青年团的活动,除开会之外,只有一个内容:劳动。——事先准备了些积肥、抬石块之类的重活,先开会,再干活。这种无偿的劳动往往进行到很晚,称之为“共青团员的模范作用”。但荣树破了这个规矩,他说:“青年人有自己的特点。我建议:今晚看电影!”大家乍一听,愣了。接着便轰笑着鼓起掌来。他想得真周到,事先已经在公社附近一家工厂订了票(他有个战友复员到这家工厂),开了个短会,就领着大家出发了。小伙子 and 姑娘们三五成群,欢天喜地,笑语喧哗,有人大胆地哼起了山歌。简直像过节一样。荒妹这才生平第一次坐在有靠背、有扶手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地看了一场电影。而且当天夜里,也是生平第一次,一个青年男子走进了她甜蜜的梦境。他有点像电影里那个带领青年修水库的男主角,更像她的团支部书记。他憨厚地笑着,同她说了些什么,离她很近。醒来时,月光照在她的床边,温柔而明净。她的心里,生平第一次泛起了一片甜丝丝的柔情。但又立即因此而感到惶恐。“这是怎么回事?”她懊恼地想:“唉,唉!幸亏只是个梦!……”

然而当她担任团小组长之后,荣树就真的常来找她了。荒妹的态度一如既往地严肃而冷淡。从不请他进屋,一个门外,一个门里,保持着四尺开外的距离。谈的不过是通知开会之类的事,一问一答,公事公办。讲完荣树走了,荒妹总要装出做事的样子,到门外偷偷目送他远去。她多么希望他多谈一会儿,进来坐一坐,谈些别的。又多么害怕他这样做。随着接触的增多,这种矛盾的心情越加发展起来。有一天,她回家晚了,十一岁的小妹妹对她说:“荣树哥来过啦!”正好母亲也刚回来,忙问:“他又来干什么?”父亲说:“他来找我的。问我嫁接山梨的事,几年能结梨?一亩山地能收多少钱?我说,那不是资本主义的路吗?他说,这不叫资本主义,报上就这么讲的!这孩子!……”

父亲似乎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但荒妹却觉察到他对这个青年是有好感的,心中暗暗感到高兴。然而母亲的脸色却很难看,她皱着眉头说:“他,可是个不大

安分的人！……”

荒妹早就听说过荣树为限制社员养鸡的事同八队队长(他的叔父)吵起来,有人说他太狂,不服从领导等等。但她从没在意。今天母亲这样说,使她生起气来。想分辩几句,又看到母亲狐疑的眼光总在盯住自己。只好闷闷地低头吃饭,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晚饭后,母亲在房里嘀嘀咕咕,她听到门缝里传出了这样一句:“已经有闲话啦!要当心她走上存妮的路!……”

荒妹只觉得心头被扎了一刀似的,扑在床上哭了。她怨恨姐姐做了那种死了也洗刷不净的丑事;怨恨妈妈不明白女儿的心;她更怨恨自己,为什么竟然会喜欢一个小伙子?这是多么不应该、多么可耻呀!“不要脸!喜欢上了一个男人!……不要脸!!”她恨恨地骂自己,把脸深深地埋在被子里,不让伤心的哭声传出来。

她下定决心,从明天起,再不理睬他!有什么事,让他找副组长去!他会觉得奇怪,觉得委屈吗?随他去吧!谁让他是个男人呢!……

过不了多久,她真的恨起荣树来了。那是偶尔在队部听到许瞎子说:“荣树这孩子真不知天高地厚,又跟大队副书记吵起来了!”有人问:“为了什么?”许瞎子说:“哼!他要为小豹子申冤呢!”

“什么?!”荒妹大吃一惊,几乎喊出声来。小豹子被判刑,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并不是什么冤、假、错案,翻不了的。——这几乎是人们共同的想法。荒妹不可能有别的看法。由于姐姐的死,她只有对小豹子更多一份仇恨。可是荣树,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她所尊敬的团支部书记,怎么会为小豹子这样的坏人讲话呢?他同情小豹子?还是得了家贵夫妇的什么好处?……她气得发抖,要去当面质问荣树。但当她在三亩塘边,看见荣树憨笑着向她迎面走来时,那股勇气又倏然消失了。那件事怎么说得出口?又怎么好对他说呀?于是忙转过身,装作到别的地方去,绕了个大圈子回到了家。接着,她又后悔起来。……

就这样,气他、恨他、不睬他、害怕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念他……交替地变化着、矛盾着。这就是十九岁的农村姑娘的心。

如果把这说成是爱情,那么,对于生活在别的地方的青年男女们是难以理解的。但荒妹是在天堂九队这个本县角落的角落里。这里的姑娘,在荒妹的这个年龄,也多半有过像荣树和荒妹那样隐秘的爱情、矛盾和痛苦。然而不久就会什么都消失了,平静了。——来了一位亲戚或者什么人,送了一件葵绿色或者玫红色的毛线衣,进行一番大体相似的讨价还价而达成协议。然后,在某一天,由这位亲戚或者什么人领来了一个小伙子,再陪同这相互不敢正视一眼的双方一起去吴庄或者什么地方,照一张合影相片。到了议定的日子,她就离开了父母,离开了这个角落。……

这是一条这里的人们习以为常并公认为正当的道路,却被今天大会的报告人说成是“买卖婚姻”。他还说什么“爱情”!姐姐和小豹子,那叫“爱情”吗?不,不!那是可耻的、违法的呀!那么,难道还有什么别的路吗?——荒妹感到茫然。她不能不想到荣树。此刻,他就在她的身后,默默地陪她同行。同来开会的女伴都去供销社了。寂静的山路上,只有他们俩。她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

忽然,荣树站住了脚,放眼四顾,用浑厚的嗓音唱起歌来: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祖国的海疆多么宽广!

.....

荒妹吓了一跳。但听着听着,热情奔放的歌声感染了她。不由自主回过头,露出赞许的微笑。

“看着山上的这片松林,我想起了大海啦!想起了在军舰上的日子!……”他自语似的微笑着说,“看着海,心里就会觉得宽阔起来。要是乡亲们都能看看海,该多好啊!”

荒妹微笑地听着。她的警惕在悄悄地丧失。

“荒妹,你去前街了吗?集上卖鸡蛋、卖蔬菜的,没人撵了!知道吗?农村政策要改啦!山坡地一定得退田还山,种梨树。山旺大叔这位好把式又要发挥作用啦!先在你家自留地上栽起树苗来!……”他说得很凌乱,也很兴奋,“山旺婶身体不好,可以砍些荆条在家编篮子,换点零花钱。你大妹妹明年可以出工了吧!两个小妹妹可以放几只羊!……我有个战友在公社当干事。他告诉我,中央很快就要下文件,要让农民富裕起来!……真的。你不信?”

他两眼闪着乐观的光芒,声音像淙淙溪水,亲切感人。荒妹没有相信这些话。对于富裕起来,她从没有抱过希望,甚至根本没有想过。从她懂事以来,富裕之类的话总是同资本主义连在一起遭受批判的。使她激动的是荣树这样清楚地知道她的家庭,并且这样关心。他就是用这个来回答她的冷淡、戒备和怀恨的!她愧疚了,觉得脸上在发烧。……

“是啊!不富裕起来,一辈子过着穷日子,就什么也谈不上!”他深为感慨地摇摇头,“就拿小豹子来说吧,能全怪他吗?穷、落后、没有知识、蠢!再加上老封建!老实巴交的小伙子,下了大牢!你姐姐,就更冤啦!……”

一听他说起这个,姑娘顿时觉得受了羞辱。她愤愤地瞪他一眼,吼道:“不许你说这个!不许你说我姐姐!……”

她竭力忍住快要流出来的眼泪,猛地冲上山顶,放开大步向下奔去。弄得荣

树莫名其妙。

四

走近家门,天已经完全黑了。她的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小妹妹老远就喊她,向她扑来。紧接着母亲也迎了出来,脸上挂着喜气洋洋的笑容。这使荒妹感到奇怪。贫困、操劳和多病的母亲过早地衰老了。特别是姐姐的死,使她的脸上除了愁苦之外,只有木然的发愣的神情。发生了什么值得她这样高兴的事?

“快,快去看看你的床上!”母亲几乎笑出声来。

床上放着一件簇新的毛线衣,天蓝色的。在幽暗的煤油灯下发出柔和的诱人的光泽。

荒妹抓在手里,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它那轻柔和温暖,就立即像触了电似的甩开了。她吃惊地喊:“谁的?”

“你的!”母亲正从锅里盛出热气腾腾的玉米粥。神采飞扬地瞟她一眼说,“你二舅妈送来的。……”

“二舅妈?!……”荒妹打了个寒噤,两腿发软,颓然坐在床沿,呆住了。二舅妈前不久来过,同母亲嘀咕了老半天,一面不断地上上下下打量着她。她当时就敏感到那眼光里好像有什么神秘的意味。果然,现在送了毛线衣来!……

母亲挨着她坐下,用难得的柔声说:“是二舅他们吴庄三队的,比你大三岁。他哥哥在北关火车站当工人,一月拿五十多块!……”

荒妹感到冰冷的汗水在脊背上缓缓地爬。她浑身颤抖,耳边“嗡嗡”直响,什么也听不清了。

“我不要!”她挣扎地喊,“不!我不要!”

她把毛线衣扔向母亲,母亲却仍然微笑着拉住她说:“又不是现在就要你过门!端午节来见见面,送衣裳来。十六套!……订了婚,再送五百块现钱!”

“不,不,不!”一种耻辱感陡然升上荒妹的心。她感到窒息的恐怖。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让委屈的泪水急速地流出来,只有愤愤甩开母亲抚慰的手臂,跑开去。

门口,站着心情沉重的父亲和三个睁大眼睛呆望着她的妹妹。她捂住脸,冲出了门,站在院子里,倚着倒塌了的猪圈的半截土墙,大声地哭起来。

“怎么啦?怎么啦?”母亲急急地跟出来,拉起她的手,“荒妹,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咱家有啥?妈有病,三个妹妹光知道张着嘴要吃。养猪没饲料,喂了半年多,连本也没捞回来!攒几个鸡蛋拎上街,挨人撵来撵去,心里慌得像做了贼。去年分红,又是超支,一分现钱也没到手。我想给你买双袜子都……”

母亲也啜泣起来,数落着:“你姐姐不争气,这个家靠谁?房子明年再不翻盖实在不行了。欠着债,哪有钱?二舅妈说,五百块钱一到手,就……”

“钱,钱!”姑娘激动地喊,“你把女儿当东西卖!……”

母亲顿时噎住了。她浑身无力,扶着半截土墙缓缓地坐倒在地上。“把女儿当东西卖!”这句话是那样刺伤了她的心,又是那样地熟悉!是谁在女儿一样的年纪,含着女儿一样的激愤喊过?是谁?——唉唉!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呀!……

那是在土改工作队进了吴庄的那个冬天,菱花去看歌剧《白毛女》的那天晚上,认识了憨厚、英俊的青年长工沈山旺。从那一刻起,她突然明白了平时唱的山歌里“情郎”一词的含义。十九岁的菱花不仅勇敢地参加了斗地主的大会,而且勇敢地在夜晚去玉米地同她的情郎相会了。可是她原先是父母作主同北关镇杂货铺的小老板订了婚的。男方听到风声送了五十块银元来,硬要年内成亲。菱花大哭大闹,一反常态。公然承认她自己看中了靠山庄的穷小子,公然宣布跟他进山里去受苦,一辈子不回“老封建”的娘家门!把父母气呆了,关起房门又骂又打。她哭着,闹着,在地下滚着,把银元抛撒一地。激愤地嚷:“你们,是要把女儿当东西卖呀!”

那是反封建的烈火已经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连同地主的地契债据一起烧毁了的时代。宣传婚姻法的挂图在乡政府门口的墙上贴着。舞台上的刘巧儿和同村的童养媳都是菱花的榜样。憨厚、英俊的沈山旺捧着美好、幸福的前途在等待着她。菱花有的是冲破封建囚笼的勇气!

“他们,要把女儿当东西卖!”第二天,在刚刚粉刷一新的乡公所里,不需要任何别的,只凭她菱花这一句话!土改工作队就含着鼓励的微笑,发给她和山旺一人一张印着毛主席像的结婚证。……

万万想不到今天,时隔三十年的今天,女儿竟用这句话来骂自己了!

“这是怎么回事?日子怎么又过回头了?……”她感到震惊而惶惑,慢慢抬起了头,仰望着暮冬的夜空。几颗寒星发出凄清、黯淡的光,讽刺似的向她眯着眼。她仿佛忽然得到什么启示似的一颤,捶胸顿足痛哭起来。一面喃喃地自语:

“报应,报应!这就叫报应呀!”

她干枯的双眼里涌出了浓浊的泪。里面饱含着心灵深处的苦恨。她恨荒妹,恨存妮,恨她们的父亲。她恨自己的苦命,恨这块她带着青春和欢乐的憧憬来到的土地,这块付出了大半生辛勤劳动、除了哀愁什么也没有给她的土地!……

荒妹反而镇静起来,劝慰母亲说:“妈!公社街上,卖鸡蛋、卖菜的没人撵啦!你可以砍些荆条编土篮拿去卖。妹妹可以去放羊。山田改了种果树,爹是个好把式!……要让我们农民富裕起来!荣树说的,中央有这个文件!……”

“文件,文件!今天这,明天那!见多啦!见够啦!俺们不照样还是穷!荒妹,妈不愿意叫你像妈这样过一辈子呀!”母亲抽泣着,也渐渐平静起来,“孩子,你是个懂事的姑娘。妈看出来,荣树对你有心,你也看着他中意。可你想想,吃不饱饭,这些都是空的哟!你妈悔不该当初……唉!如今得了报应啦!……”

风停了。妈妈衰弱的身子倚着荒妹。母女俩无声地呆坐着,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之中。

“妈,你回去吧!”荒妹低声说。她的眼睛向八队的那一片村舍凝视着,探寻着其中的一间房子,“我还有点事!……”

然后,她倔强地向三亩塘的方向走去。刚才发生的事,使她突然聪明了,成熟了。一切成见,包括要小豹子申冤这样使她强烈反感的事情,现在都觉得合理了。她相信荣树是会讲出他的道理来的。那么,他知道得很多很多,甚至连大海都知道!他所深信不疑的要让农民富裕起来的文件,荒妹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一定还会给她出个最好的主意,告诉她该怎么办!

三亩塘的水面上,吹来一阵轻柔的暖气。这正是大地回春的第一丝信息吧!它无声地抚慰着塘边的枯草,悄悄地拭干了急急走来的姑娘的泪。它终于真的来了吗,来到这被爱情遗忘了的角落?

陈奂生上城

● 高晓声

—

“漏斗户主”^①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②。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把，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

① “漏斗户主”：系作者写的另一篇小说《漏斗户主》（发表于《钟山》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主人公陈奂生的外号。漏斗户，意指常年负债的穷苦人家。

② 油绳：一种油煎的面食

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免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吗?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囤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免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捉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索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刨碎泥块”、“蒔秧一蔸蒔六棵”,……谁也不要听。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喂!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搭话,所以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搭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于是,他又惭愧了,觉得自己总是不会说,又被人笑,还是不说为好。他总想,要是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

当然,陈免生的这个念头,无关大局,往往蹲在离脑门儿三四寸的地方,不大跳出来,只是在尴尬时冒一冒尖,让自己存个希望罢了。比如现在上城卖油绳,想着的就只是新帽子。

尽管放慢脚步,走到县城的时候,还只下午六点不到。他不忙做生意,先就着茶摊,出一分钱买了杯热茶,啃了随身带着当晚餐的几块僵饼,填饱了肚子,然后向火车站走去。一路游街看店,遇上百货公司,就弯进去侦察有没有他想买的帽子,要多少价钱。三月店查下来,他找到了满意的一种。这时候突然一拍屁股,想到没有带钱。原先只想卖了油绳赚了利润再买帽子,没想到油绳未卖之前商店就要打烊;那么,等到赚了钱,这帽子就得明天才能买了。可自己根本不会在城里住夜,一无亲,二无眷,从来是连夜回去的,这一趟分明就买不成,还得光着头冻几天。

受了这点挫折,心情挺不愉快,一路走来,便觉得头上凉飕飕,更加懊恼起来。到火车站时,已过八点了。时间还早,但既然来了,也就选了一块地方,敞开包裹,亮出商品,摆出摊子来。这时车站上人数不少,但陈免生知道难得会有顾客,因为这些都是吃饱了晚饭来候车的,不会买他的油绳,除非小孩嘴馋吵不过,大人才会买。只有火车上下车的旅客到了,生意才会忙起来。他知道九点四十分、十点半,各有一班车到站,这油绳到那时候才能卖掉,因为时近半夜,店摊收歇,能买到吃的地方不多,旅客又饿了,自然争着买。如果十点半卖不掉,十一点二十分还有一班车,不过太晏了,陈免生宁可剩点回去也不想等,免得一夜不得睡,须知跑回去也是三十里啊。

果然不错,这些经验很灵,十点半以后,陈免生的油绳就已经卖光了。下车的旅客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伸手来拿,把陈免生搞得昏头昏脑,卖完一算账,竟少了三角钱,因为头昏,怕算错了,再认真算了一遍,还是缺三角,看来是哪个贪小利拿了油绳未付款。他叹了一口气,自认晦气。本来他也晓得,人家买他的油绳,是不能向公家报销的,那要吃而不肯私人掏腰包的,就会耍一点魔术,所以他总是特别当心,可还是丢失了,真是双拳不敌四手,两眼难顾八方。只好认了吧,横竖三块钱赚头,还是有的。

他又叹了口气,想动身凯旋回府。谁知一站起来,双腿发软,两膝打颤,竟是浑身无力。他不觉大吃一惊,莫非生病了吗?刚才做生意,精神紧张,不曾觉得,现在心定下来,才感浑身不适,原先喉咙嘶哑,以为是讨价还价喊哑的,现在连口腔上丹都像冒烟,鼻气火热;一摸额头,果然滚烫,一阵阵冷风吹得头皮好不

难受。他毫无办法,只想先找杯热茶解渴。那时茶摊已无,想起车站上有个茶水供应地方,便强撑着移步过去。到了那里,打开龙头,热水倒有,只是找不到茶杯。原来现在讲究卫生,旅客大都自带茶缸,车站上落得省劲,就把杯子节约掉了。陈奂生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双手捧起龙头里流下的水就喝。那水倒也有点烫,但陈奂生此时手上的热度也高,还忍得住,喝了几口,算是好过一点。但想到回家,竟是千难万难;平常时候,那三十里路,好像经不起脚板一颠,现在看来,真如隔了十万八千里,实难登程。他只得找个位置坐下,耐性受痛,觉得此番遭遇,完全错在忘记了带钱先买帽子,才受凉发病。一着走错,满盘皆输;弄得上不上、下不下,进不得、退不得,卡在这儿,真叫尴尬。万一严重起来,此地举目无亲,耽误就医吃药,岂不要送掉老命!可又一想,他陈奂生是个堂堂男子汉,一生干净,问心无愧,死了也口眼不闭;活在世上多种几年田,有益无害,完全应该提供宽裕的时间,没有任何匆忙的必要。想到这里,陈奂生高兴起来,他嘴巴干燥,笑不出声,只是两个嘴角向左右同时嘻开,露出一个微笑。那扶在椅上的右手,轻轻提了起来,像听到了美妙的乐曲似的,在右腿上赏心地拍了一拍,松松地吐出口气,便一头横躺在椅子上卧倒了。

三

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陈奂生肢体瘫软,头脑不清,眼皮发沉,喉咙痒痒地咳了几声;他懒得睁眼,翻了一个身便又想睡。谁知此身一翻,竟浑身颤了几颤,一颗心像被线穿着吊了几吊,牵肠挂肚。他用手一摸,身下贼软;连忙一个翻身,低头望去,证实自己猜得一点不错,是睡在一张棕绷大床上。陈奂生吃了一惊,连忙平躺端正,闭起眼睛,要弄清楚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他好像有点印象,一时又糊涂难记,只得细细琢磨,好不容易才想出了县委吴书记和他的汽车,一下子理出头绪,把一串细关节脉都拉了出来。

原来陈奂生这一年真交了好运,逢到急难,总有救星。他发高烧昏睡不久,候车室门口就开来一部吉普车,载来了县委书记吴楚。他是要乘十二点一刻那班车到省里去参加明天的会议。到火车站时,刚十一点四十分,吴楚也就不忙,在候车室徒步起来,那司机一向要等吴楚进了站台才走,免得他临时有事找不到人,这次也照例陪着。因为是半夜,候车室旅客不多,吴楚转过半圈,就发现了睡着的陈奂生。吴楚不禁笑了起来,他今秋在陈奂生的生产队里蹲了两个月,一眼就认出他来,心想这老实肯干的忠厚人,怎么在这儿睡着了?若要乘车,岂不误事。便走去推醒他;推了一推,又发现那屁股底下垫着个瘪包,心想坏了,莫非东西被偷了?就着紧推他,竟也不醒。这吴楚原和农民玩惯了的,一时调皮起来,

就去捏他的鼻子；一摸到皮肤热辣辣，才晓得他病倒了，连忙把他扶起，总算把他弄醒了。

这些事情，陈奂生当然不晓得。现在能想起来的，是自己看到吴书记之后，就一把抓牢，听到吴书记问他：“你生病了吗？”他点点头。吴书记问他：“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就去摸了摸旅行包。吴书记问他：“包里的东西呢？”他就笑了一笑。当时他说了什么？究竟有没有说？他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吴书记好像已经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和驾驶员一同扶他上了车，车子开了一段路，叫开了一家门（机关门诊室），扶他下车进去，见到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晓得是医生了。那医生替他诊断片刻，向吴书记笑着说了几句话（重感冒，不要紧），倒过半杯水，让他吃了几片药，又包了一点放在他口袋里，也不曾索钱，便代替吴书记把他扶上了车，还关照说：“我这儿没有床，住招待所吧，安排清静一点的地方睡一夜就好了。”车子又开动，又听吴书记说：“还有十三分钟了，先送我上车站，再送他上招待所，给他一个单独房间，就说是我的朋友……”

陈奂生想到这里，听见自己的心扑扑跳得比打钟还响，合上的眼皮，流出晶莹的泪珠，在眼角膛里停留片刻，便一条线挂下来了。这个吴书记真是大好人，竟看得起他陈奂生，把他当朋友，一只有关，能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救了他一条性命，实在难得。

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私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闯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

陈奂生想罢，心头暖烘烘，眼泪热辣辣，在被口上拭了拭，便睁开来细细打量这住的地方，却又吃了一惊。原来这房里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顶（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墙，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红闪光，照出人影子来；紫檀色五斗橱，嫩黄色写字台，更有两张出奇的矮凳，比太师椅还大，里外包着皮，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再看床上，垫的是花床单，盖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崭新的绸面，呱呱叫三层新^①。陈奂生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

① 三层新：被面、被里、被絮都是新的。

到了走廊里,脚底已冻得冰冷,一瞧别人是穿了鞋走路的,知道不碍,也套上了鞋。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一向听说招待所的住宿费贵,我又没处报销,这样好的房间,不知要多少钱,闹不好,一夜天把顶帽子钱住掉了,才算不来呢。

他心里不安,赶忙要弄清楚。横竖他要走了,去付了钱吧。

他走到门口柜台处,朝里面正在看报的大姑娘说:“同志,算账。”

“几号房间?”那大姑娘恋着报纸说,并未看他。

“几号不知道。我住在最东那一间。”

那姑娘连忙丢了报纸,朝他看看,甜甜地笑着说:“是吴书记汽车送来的?你身体好了吗?”

“不要紧,我要回去了。”

“何必急,你和吴书记是老战友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大姑娘一面软款款地寻话说,一面就把开好的发票交给他。笑得甜极了。陈免生看看她,真是绝色!

但是,接到发票,低头一看,陈免生便像给火钳烫着了手。他认识那几个字,却不肯相信。“多少?”他忍不住问,浑身燥热起来。

“五元。”

“一夜天?”他冒汗了。

“是一夜五元。”

陈免生的心,忐忑忐忑大跳。“我的天!”他想,“我还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

“你的病还没有好,还正在出汗呢!”大姑娘惊怪地说。

千不该,万不该,陈免生竟说了一句这样的外行话:“我是半夜里来的呀!”

大姑娘立刻看出他不是一个人物,她不笑了,话也不甜了,像菜刀剁着砧板似的笃笃响着说:“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横竖到今午十二点为止,都收一天钱。”这还是客气的,没有嘲笑他,是看了吴书记的面子。

陈免生看着那冷若冰霜的脸,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哪里还敢再开口,只得抖着手伸进袋里去摸钞票,然后细细数了一遍,数定了五元;交给大姑娘时,那外面一张人民币,已经半湿了,尽是汗。

这时大姑娘已在看报,见递来的钞票太零碎,更皱了眉头。但她还有点涵养,并不曾说什么,收进去了。

陈免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愤愤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

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愤愤想

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他饿了，摸摸袋里还剩一块僵饼，拿出来啃了一口，看见了热水瓶，便去倒一杯开水和着饼吃。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便安心坐着啃饼，觉得很舒服。头脑清爽，热度退尽了，分明是刚才出了一身大汗的功劳。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

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二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山^①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因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要做一天工，贵死人！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

这陈免生确是个向前看的人，认准了自然就干，但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

可是他睡不着，他想起了吴书记。这个好人，大概只想到关心他，不曾想到他这个人经不起这样高级的关心。不过人家忙着赶火车，哪能想得周全！千怪万怪，只怪自己不曾先买帽子，才伤了风，才走不动，才碰着吴书记，才住招待所，才把油绳的利润搞光，连本钱也蚀掉一块多……那么，帽子还买不买呢？他一狠心：买，不买还要倒霉的！

想到油绳，又觉得肚皮饿了。那一块僵饼，本来就填不饱，可惜昨夜生意太好，油绳全卖光了，能剩几袋倒好；现在懊悔已晚，再在这床上困下去，会越来越饿，身上没有粮票，中饭到哪里去吃！到时候饿得走不动，难道再在这儿住一夜吗？他慌了，两脚一踹，把被头踢开，拎了旅行包，开门就走。此地虽好，不是久恋之所，虽然还剩得有二三个钟点，又带不走，忍痛放弃算了。

他出得门来，再无别的念头，直奔百货公司，把剩下来的油绳本钱买了一顶帽子，立即戴在头上，飘然而去。

一路上看看野景，倒也容易走过；眼看离家不远，忽然想到这次出门，连本搭利，几乎全部搞光，马上要见老婆，交不出账，少不得又要受气，得想个主意对付她。怎么说呢？就说输掉了；不对，自己从不赌。就说吃掉了；不对，自己从不

^① 沈万山：民间传说里的大富翁。

死吃。就说被扒掉了;不对,自己不当心,照样挨骂。就说做好事救济了别人;不对,自己都要别人救济。就说送给一个大姑娘了,不对,老婆要犯疑……那怎么办?

陈免生自问自答,左思右想,总是不妥。忽然心里一亮,拍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

果然,从此以后,陈免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公社农机厂的采购员有一次碰着他,也拍拍他的肩胛说:“我就没有那个运气,三天两头住招待所,也住不进那样的房间。”

从此,陈免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

丹凤眼

——谈天说地之二

● 陈建功

都说北京女的比男的多,可京西不少的小伙子就是搞不着对象。

怎么,他们都没个模样儿,歪瓜裂枣似的?要不,就是不争气,都是吃饱混天黑的主儿?错啦。不信你就去看看。出了三家店,漂亮小伙儿有的是!身高膀圆的,眉清目秀的,拨拉脑袋就是一个!这里面,有劳动模范,有革新能手,也有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的。要是在北京城里,也能把姑娘们迷得魂飞神散呢。可他们是在京西,他们是井下挖煤的,是矿工。这就糟啦!姑娘们一听说干的是这一行,十有八九皱眉头,哪怕面前站的是十全十美的小伙子,回答也是两个字:“不成!”

就因为这个,矿区的小伙子们搞对象不知碰了多少钉子。一来二去的,有的小伙子开始恨上身上这件工作服了。变着法儿也得把上面印着的“××矿”这几个字给抹了——走大街上怕人笑话,寒碜呀。有的小伙子还总结出一条“恋爱经验”:“先不能让她知道你是矿工,等把她‘俘虏’了,再亮‘番号’!”于是就有那么一位,在城里的一次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姑娘。人家问他在哪儿工作,你猜他回答什么?他说:“在黑色冶金粉末研究所工作。”多妙!……这笑话多啦。我可不敢再说了,京西的小伙子得向我提抗议:别净糟践我们!京西净是这号自轻自贱的人?有血气的小伙子也有的是!

没错儿!有血气的小伙子有的是。“人家看不起咱,咱自己还看不起自己?挖煤怎么了?比别人矮半截儿?就欠给他们来次‘能源危机’,都把咱矿工当宝贝了!”说这话的,是燕南煤矿的采煤工辛小亮。他最容不得别人说他干的这一行不好。据说有一回有几个姑娘下井参观,领她们下来的工会干事一边走,一边抱歉似的说井下条件如何如何不好,让她们留神。辛小亮听不入耳了,说:“这儿又不是万寿山,不怕崴了西太后的脚!”把那位伙计憋了个大红脸。工友们笑他说:“你呀,甭想得人家姑娘的欢心,就抱着井下这些风锤电钻的过一辈子吧!”可不,别人给他介绍了四五回对象,全是第一面就吹了。至于人家一听说是矿工,

连面都不见的,那就没数啦。辛小亮呢,挺挺儿地戳在那儿,还是个一米八的大汉!甚至比从前越发骄傲,越发牛气起来了!特别是见了姑娘们,眼皮抬都不抬。食堂里卖饭的姑娘们,矿灯房里发灯的姑娘们,没有不怕他的。他太损呀。到开饭时间了,你窗口晚开了一步,他就外面敲开盆儿了:“卖饭呗!卖饭呗!……真他妈白吃饱儿!矿上养着你们干什么!干不了趁早回家抱孩子去!……”从井下出来,矿灯房的姑娘收他的灯,常来常往的,有时冲他笑笑。他反倒瞪人家:“谁跟你笑,瞅你漂亮?!”一句话能把小姑娘噙出眼泪……这还不算什么。最气人的是,他给矿上的姑娘们起了不少“雅号”。这家伙聪明,外号一起就准。食堂卖炒菜的姑娘老板着脸,斜着眼睛翻人,他背后管人家叫“憎恨”。卖馒头的姑娘新近把头发烫成了“大花”,他就管人家叫“花卷儿”。四号卖饭窗口的姑娘其实是很漂亮的一位,特别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眼角微微向额上翘着,标准、美丽的丹凤眼。这位辛小亮倒好,偷偷叫人家“吊眼儿”……食堂的姑娘们早有耳闻,气得咒他“找一个丑八怪!”这可咒不着他,反正他是决心打一辈子光棍儿啦。其实小伙子漂亮,乱蓬蓬的刺儿头下面一副白净的方脸庞,老爱眨巴着眼睛高声说笑,潇洒又粗犷。他干活儿不惜力不说,拿起什么活计都有点机灵劲儿。要是不犯“嘎”,怎么也能交上女朋友的。谁知别人介绍了好几个,他死活不肯去见面了。这可把他妈急坏了。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眼瞅着连孙子也抱不上了。每次介绍人登门,总让辛小亮给噎走。他妈不知为这跟他抹过多少回眼泪,生过多少回气。有一回,他烦了:“妈,您别说啦,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我去见一面还不行!”他妈说:“你早明白一点,我给你准备八抬大轿!”他说:“那我可跟人家来实在的。”他妈说:“我让你拐骗人去去了?”得,他这“实在的”可真够“实在”啦。一见面,女方说:“听说你在矿上工作?”他说:“是啊。”女方又问:“下井吗?”他说:“当然下井。”女方下一句话还遮遮掩掩的哪:“那……现在井下安全搞得不错了吧?”这位辛小亮倒好,嘎劲儿上来啦:“不安全。净死人!我们矿上,净是寡妇!”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他这招儿真灵,不但对象吹了,打这以后,介绍人也不大上门儿了。他妈不更抓耳挠腮了?有什么办法!整天找茬儿跟那个退休的老伴儿生气:“就知道喝茶喝茶,找那些糟老头子‘敲三家儿’,‘拱猪’……儿子的事你就屁也不放一个!还像个当爹的?……”辛师傅过去也是个老走窑的,少不了那份幽默劲儿:“那你说咋办吧。我这就准备绳子。你指点着,相中哪一位了,后半晌我给你捆一个回来……”

辛大妈心急火燎,见了家属区里“他婶”“他姨”的,少不了唠叨儿子的“对象问题”。这嘴皮子是不会白磨的。这不,这天傍晚,热心肠的乔奶奶又上门儿啦。

乔奶奶住柳花台家属区,离工人新村好几里地远,一双“白薯脚”(雅称“解放脚”)一颠一颠地赶来也真不易。辛大妈见乔奶奶一身新,心里就明白了几分,

高高兴兴地招呼她进里屋喝茶。两个老太太在里面嘀咕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辛小亮叫进来了。

“小亮,乔奶奶特意为你事跑来一趟。我听着,那姑娘挺不错……”

“哪儿的呀?”辛小亮举起双掌,按住两边的眼窝,使劲儿揉着,又上上下下在脸上搓了好几把,撇嘴笑着,那样子活像开始犯困了。

乔奶奶说:“那姑娘过去在京棉三厂。这不,家里只剩一个老母亲了。调回矿上上班,照顾她妈。现今在食堂卖饭哪……”

“哦。倒近。”辛小亮还是一副睡眼朦胧的样子。辛大妈恨不得过去给他一条帚疙瘩。

乔奶奶笑了:“近还不说。那姑娘真不赖呢。听说在食堂得算顶漂亮的。双眼皮儿,细皮嫩肉……”

“得,得,谢谢您了!”辛小亮耷下眼皮,摆手把乔奶奶的话截住了。“乔奶奶,您快别说了。老远的,您跑这一趟也不易……真对不起您,我得扫您的兴了。我呀,您就找那些猪不吃,狗不啃,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介绍给我得嘞。您说的这位,咱消受不起。那是给矿上的小科长们啊,写材料的小白脸儿们啊,头头脑脑的儿子们啊预备的。咱可没那个福分……”

“你还不知道是谁,就……就把人家回啦?!”辛大妈火了。

“甭问。问也白搭。人家肯定看不起咱们。咱也不高攀人家。一见面准崩。让乔奶奶再白受累,咱也不落忍……”说着,他站起来,冲乔奶奶笑笑,走了。

“瞧我这孩子!瞧我这孩子!……”辛大妈气得直哆嗦,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没啥!没啥!搞对象嘛,还不得由着他们?谁不得挑个可心的!强扭的瓜不甜……”乔奶奶是个开通人,咯咯笑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话是这么说,她这一路可犯愁啦,回去怎么回女方的话呀。姑娘是她老邻居孟家的闺女孟蓓,二十四岁了。前几个,孟家老太太托她给闺女张罗,她一口应承下来了:“行,行啊大妹子。别人家的闺女咱不敢说,您这姑娘还愁找不着婆家?我包你得个满意的姑爷!”谁承想,第一个,就撞上了辛家那么一个嘎小子!怎么跟孟老太太说呢。说辛小亮连名儿也不打听,就一口回绝了?那可太伤面子了。人家闺女那么漂亮,漂亮姑娘脸皮子全薄啊……乔奶奶到底是乔奶奶,来到孟家,倒也没什么为难的了。她告诉孟老太太那小伙子并不合适,个头儿不高,脸庞儿也不精神,和孟蓓站一块儿不般配!“赶明儿我给您找个合适的!把咱家小蓓介绍给那个辛小亮,太亏!闹不好,见第一面下来,咱小蓓就得气得背过气去!”三言两语,把孟老太太说得乐散了架儿,既开心,又熨帖。等闺女下班回来还当笑话唠叨个没完。没想到闺女听了,却撇了嘴,气夯夯地把手里的茶杯往桌上一推,说:“都是

您都是您！多管闲事！”闹得孟老太太忽然摸不着头脑了。以前，她也给闺女张罗过，虽说闺女也不乐意让她管，可从来也没发过这么大的火呀。

孟蓓回到自己屋里，也奇怪刚才为什么要发那么大的火。慢慢的，她明白了，自己是在生辛小亮的气。俗话说，吊眼的姑娘难斗。这话不好听，可有点儿道理——丹凤眼的孟蓓确实不是那么好唬弄的！听妈妈一讲，她就明白乔奶奶在瞎说。辛小亮，她太认识啦！个头儿绝不低，脸庞儿绝不难看。哼，那家伙肯定说出了什么难听的话，乔奶奶回来不好一五一十地转达，找个话茬儿搪塞罢啦。她哪想到，孟蓓还没调回来时，就见过这位辛小亮。岂止见过，他肚子里憋什么坏水，对姑娘们抱什么态度，她都知道！

那是去年春节前，她从城里坐火车回矿，陪妈妈过节。车还没从永定门站开出的时候，她就听见靠背那边的座位上，两个小伙子在聊天。和自己一板之隔坐着的，是个高声大嗓的大块头，坐在椅子上很不老实。聊得高兴了，爽性用膀子一下一下地撞靠背，好像浑身有劲儿没处使。有时，他仰面大笑，把那支棱着又粗又硬头发的后脑勺倒过来，头发触到孟蓓的头上，气得她躲了好几回。他对面坐着的一位，是个“活宝”，岁数小，声音细，不断和自己的朋友开玩笑。开始，孟蓓倒不注意他们聊些什么，只听他们讲什么“到北京钓鱼”啦，“鱼没钓着，惹一肚子气”啦。孟蓓心里奇怪：“大冬天的，到北京钓什么鱼！”听着听着，她捂着嘴偷偷笑了：什么“钓鱼”啊！敢情这是矿工的“行话”，说的是“交女朋友”！孟蓓倒是从小在矿区长大的，还没听过这么个讲法儿哪！再听下去，那粗声大嗓的小伙子在讲“钓鱼”的经过。那个“活宝”呢，不时地插科打诨，逗他。他们的话，惹得孟蓓好几次险些笑出声儿来。有一次，她实在忍不住了，装作取开水，跑到车厢间的过道儿里，笑了好一会儿！——

“瞧瞧，为这么一趟，我妈忙活得骨头都酥啦！逼我穿上这么一身不说，还教我哪；到了北京，别露怯，显出咱没见过世面。记着，人家爸爸是煤炭部的干部，你可别叫人家‘大爷’，得按城里的规矩，叫‘伯父’……”

“嘻嘻……”大概是“大块头”学他妈的口气学得太像了，“活宝”笑起来：“结果怎么样？一进人家门，舌头就转筋了吧？”

“瞧你，咱窑工让人瞧不起，可并不是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到了她家，咱也不卑不亢，人模狗样的哪！”

“得得得，牛气不小，怎么灰溜溜回来了？”

“灰溜溜？告诉你，别说她长那模样儿咱不待见，就是天仙似的，我也不要！”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

“烂葡萄！哼，见一面不要紧，得做几天噩梦，折我十年寿！……八成是城里找不着人家了，处理给我啦。可她家老头儿老太太还觉着便宜了我这个傻小子

哪！亏那老头子还是煤炭部的，把咱窑哥们儿挤对得够馊。说什么‘过了三家店，家雀儿都是黑的’，还说‘你样样都好，就是工种不好’。又吹！说马上要想法子把我调出井下……把我气得鼓鼓儿的，心说：你们倒样样都好，就是心眼儿不好！良心大大地坏了！要不得着介绍人的面子，不损他两句才怪！……”

“对！”“活宝”也不禁义愤填膺了。“老弟上刀山下火海，也得给你奔个大嫂子来。明儿还给他们送喜糖去，气他！”

“算啦，别气我了！我打一辈子光棍也不找啦！……那些女的，没几个不势利的！”

“你还是认熊了！熊！熊！”

“熊？我出气了！临走，趁屋里没人，顺手把身边的暖气给他关了！把旋钮摘下来，出门又扔回他家报箱了！别看你是煤炭部的，冻一宿吧！……”

“哈哈……”

两个人又笑起来。座位的靠背又让那个“大块头”撞得“砰砰”响。

就这么着，两个小伙子简直像在说相声，你一言，我一语，聊了一路。孟蓓呢，也偷偷听了一路。她挺爱听，常常忍不住想笑。可有时却又气不过——他们也太伤众了，常把那些轻蔑的话推而广之，对女同志有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偏见。要是在自己工厂里，熟人中间，孟蓓肯定要站起来，唇枪舌剑地回击了。哼，你们男的就那么好？她也可以举出好几例，证明有不少趾高气扬的小伙子，瞧不起她们纺织姑娘呀！想是这么想，她还是蔫蔫儿地靠在那儿听着——甚至靠背被撞得最厉害的时候，她也没有什么抗议的表示。

车到燕南煤矿，孟蓓下车了。没想到他们也在这儿下车。听到有人和他们打招呼，孟蓓一下子就记住啦。那个“一肚子坏水”的“大块头”，叫辛小亮。那“活宝”呢，叫赵涛。

这以后没多久，孟蓓就从城里调到矿上了。辛小亮在矿上是个人人瞩目的人物。他的大名经常在矿上的广播喇叭里被喊出来。超什么纪录呀，战什么险情呀，这就不必说了。就是在工会组织的摔跤比赛场地上，他也是观众们崇拜的勇士。更何况他净在卖饭窗口外喊“白吃饱儿”，孟蓓能不一下子认出他来！

孟蓓是个自尊心极强的姑娘。一瞧见辛小亮，她就想起火车上那一段，心里一直气不过——他太狂了！太看不起女同志了！可她还是原谅了他。谁让姑娘们中间，确实有那种势利眼呢。在矿上时间长了，从女伴们那里听说了好多矿工搞对象的“趣闻”，其中当然也有辛小亮的事，心里对他倒有几分敬畏啦。以致听说自己也被起了外号，她还是微微一笑，只是心里说：“哼，你这就算男子汉啦？也就给人起个外号，出出气。连个知心的人都找不到！”……可这一次，孟蓓是大大生气了。她坐在床上，靠着被子垛，猜想着乔奶奶怎样去辛家，辛小亮怎样冷

言冷语。哼,他那一翻一翻的眼皮子怎么动,孟蓓都猜得出来!……这天晚上,辛小亮躺在床上,倒还和往常一样,鼾声如雷。他根本不知道,并且也不想知道自己一口回绝的,是食堂的哪一位姑娘。“真是那么漂亮?她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念头他闪都没闪。高高兴兴地去看了一晚上电视,十点钟回来,宽衣上床,进入梦乡。他更不可能想到,几里地以外,柳花台家属区,有个姑娘为了他直到半夜还没睡着。别看她眼角向上翘翘着,嘴角也向上翘翘着,笑模笑样儿的。她在咬嘴唇,小酒窝一跳一跳的——气得够呛呢!

孟蓓这姑娘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别瞧他辛小亮气粗如牛,买饭之前还是敲盆敲碗,没心没肺地捣蛋,孟蓓反正盯上他啦。结果怎么样?没过几天,孟蓓站在窗口里就把辛小亮给治了,治得服服帖帖!你说邪不邪?

第一次,就是辛小亮害得孟蓓半宿没睡着觉的第二天,中午开饭的时候,辛小亮排在四号窗口买米粥和炸糕,巧巧儿赶上卖饭的是孟蓓。

“二两粥,四个炸糕。”辛小亮把大搪瓷碗递进了窗口。

“当……当……”铁勺碰得碗底脆响。二两米粥盛上了。“砰”,放在窗口台儿上,热腾腾的米粥一涌,险些溢出来。

“拿着!”四个炸糕捏在孟蓓手里,伸了过来。

辛小亮只拿来一个碗,已经盛上了粥。如果接过炸糕,又怎么腾出手来交饭票?“搁这儿!”他把两根筷子架在粥碗上。

孟蓓眼帘一挑,瞪了他一眼,把炸糕往两根筷子中间重重一搁。筷子“啾当”滚下粥碗,四个炸糕一下掉进了粥里。

“啧啧啧,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辛小亮急得把脑袋伸进了窗口,用嘴吮着稀粥漫出的碗沿儿,烫得他不时吸嘘着。

“你干什么吃的!……我不要了!不吃了!……这叫炸糕吗?成元宵了!……”辛小亮气得喊起来,“退你吧,我不要了!”

看着他那狼狈样儿,孟蓓扑哧一声笑了。又抿起嘴,丹凤眼里闪着开心的光:“得啦得啦,凑合吃吧,下次多拿个碗来……”

“真是白吃饱儿!连个炸糕都不会放!我不要了!……”辛小亮还是怒气冲冲地喊着。

孟蓓呢,眼角也像在笑,嘴角也像在笑,还是轻轻的声音:“谁让你用的是圆筷子。要用方筷子,也接住啦……吃吧,去吃吧,吃到肚子里还不一样了?……”

唉,再发火,有什么意思呢。辛小亮气得咽下一口唾沫,端着“粥泡炸糕”,走了。

食堂就那么几个窗口,卖饭的也就那么几个姑娘。想买饭,又不想碰上哪一位,这是不可能的。何况辛小亮根本没想到孟蓓会成心治他。这么着,在窗口遇

见,可不止这一次啦,孟蓓对辛小亮的怨气,这一次也没出够哪。得,这以后,辛小亮只要买饭撞上孟蓓,不是豆腐脑里多搁了卤,咸得没法儿下嘴,就是要吃白菜,她给盛了西红柿,进了饭碗,不端走还不行。有时候,辛小亮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有时候呢,站在窗口,七窍生烟地嚷嚷一通。可气的是,孟蓓还是第一次那个劲儿,不跟你发火,反倒挺得意,笑模笑样儿,细声细气的。辛小亮还是只好一走了事。

辛小亮哪受过这个呀!三次两次,他坐到饭桌前嘀咕开啦:“我怎么她了?她干吗净跟我过不去!……”

“你净喊人家‘白吃饱儿’,又叫人家‘吊眼儿’,不治你才怪!”赵涛——就是孟蓓在火车上也见过的那个“活宝”,眨巴眨巴眼搭话了。

“可前几天还挺顺的哪,怎么……”辛小亮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行啦行啦,包在我身上。‘情报局长’给你调查调查去。”别看赵涛人不大,猴精猴精的,几十里矿区,几乎没有他不认识的人,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自封“情报局长”,是当之无愧的。

果不其然,两天以后,赵涛的“情报”回来啦。

“你得罪人家了。”他绷着脸,神色严肃地说。

“狗屁!我看都没多看她一眼!”

“嘿嘿,就为这个!……是俱乐部老杨头儿告诉我的,你把人家晾啦!……”

天哪!辛小亮一下子明白了。俱乐部老杨头儿就是乔奶奶的老伴儿。敢情乔奶奶那次要给他说的,“食堂最漂亮的姑娘”,就是孟蓓!哈哈,自己当初连个名字都没问,现在才知道!他拍拍脑门儿,嘿嘿笑起来,捶了赵涛一拳,把座椅晃得“吱吱”响。可慢慢的,他不笑啦,心里总有点疙疙瘩瘩的,一肚子心事。说实在的,这也是个聪明小伙儿。他寻思着,我那就得罪她了?至于吗?我当时说啥来的?说啥了?哦,——我说她“是给小科长,写材料的小白脸儿,头头脑脑儿的儿子预备的”。是为了这句话?不,乔奶奶不会把这话传给她呀!哦,是因为说了“人家看不起咱,咱也不高攀人家”?……总之,辛小亮心乱啦。“敢情是为了这,得罪她了?那怎么才算不得罪她?”他想这些的时候,眼前闪出一个卖饭窗口,里面有孟蓓那含嗔带怪的眼梢嘴角,又有孟蓓“治”了他以后那得意的笑……这里面,好像都包含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深意啊!

小伙子们哪,你们谁也别夸口自己有“坐怀不乱”之勇,看看你们的血性男子汉辛小亮吧,当他从疑惑中恍然大悟,又渐渐品出一点儿味来的时候,竟也忘了自己所固守的对女同志的偏见,从吃“粥泡炸糕”开始,回味起每一次被“整治”的细节来了。虽说只有那么三两次,却被他反复咀嚼。他骂了自己多少遍“没出息”也没用……

这天,他又去四号窗口买馄饨。看见孟蓓在窗口里面,隔着五六个人,他的心就开始怦怦跳了。他要了二两馄饨。虽然还是装出平常那种不经意的样子,眼睛却偷偷瞟着窗口里那颀长的身影。雪白的工作服很合体,衬出那圆圆的肩头。松润的鬓发被身边电扇的风吹得飘飘忽忽,有一绺搭在她上翘的眼角上,她抬起右臂弯,灵巧地向上一抹,然后把手里的铁勺一挥,“当”,馄饨盛在左手的搪瓷碗里。

“两毛五。二两。”她和以往一样,重重地把碗放在窗口台上,眼睛毫不躲藏地盯着辛小亮,紧抿着小嘴,下唇轻轻地一努一努。

辛小亮慌慌张张地找出三毛钱饭票。她接过来,找回五张“一分”,往窗台上一扔。“呼”,电扇吹来一股风,把三张饭票吹进了辛小亮的馄饨碗里。“哎呀!”她肩膀一耸,眼睛一闪,做了个怪样,又扑哧一声笑了。脸红红的,伸手把饭票捏出来。“不脏,不脏!……”她的眼睛还是大胆地朝小亮望着,“你骂我吧!”那眼睛好像在祈求。“你才不会骂呢!”那眼睛又有几分得意。

要是以往,辛小亮不又得暴跳如雷才怪!可现在……

“唉,也就是赶上你了!”辛小亮瞪着她,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苦笑着接过换给他的干净饭票,端起了饭盆。

身后,传来那姑娘的笑声,这是从心里冲出来的笑。吃馄饨的时候,他几次把勺子送到鼻尖上,心里又暗骂起自己“没出息”来啦!

这往后,辛小亮真的“没出息”啦。排队买饭,不喊了,不闹了,老实得像根木桩子。赶上孟蓓卖饭,一站进队,脸就红。这些,瞒谁也瞒不过赵涛——他老跟在他后面呀。得,这小家伙故意用话撩拨他啦:“小亮,怎么如今老实了?不喊‘白吃饱儿’了?”“你没喝酒啊,脸红什么?”……到了饭桌上,赵涛更少不了拿他开心了。小亮端起了粥盆,赵涛问“香不香”;小亮摘下帽子,赵涛问“热了吧”;小亮吃完了,赵涛指着盆底儿说:“还不刮干净点儿,多香甜的棒子面儿呀!”……辛小亮把他推一边去了:“滚滚滚。”赵涛还有“杀手锏”哪:“怎么,过河拆桥啦?你还有用得着我‘情报局长’的时候!……”

可不是!这天上早班,汽笛快响的时候,赵涛来了,兴冲冲地跳进小亮坐的人行车里,得意洋洋地说有“最新情报”,然后,忍不住举起手里的镐把儿,往小亮的玻璃钢帽盔上敲:“太开心啦!太开心啦!……‘吊眼儿’……哈哈,真妙!……”往常,赵涛有了那么一点点关于孟蓓的“情报”,且卖关子呢,非憋得辛小亮心痒难熬才说出来。可今天,他根本没心思卖关子啦:“这是第一号‘情报’,第一号!”

“得得得,今晚夜宵店不开门啊。”——赵涛平常净拿孟蓓的一颦一笑当“情报”,拉小亮去夜宵店敲竹杠。

“我请客!”赵涛举手打了个响指。“孟蓓给胡连国来了个大窝脖儿!……你

当只是你的胜利？这是咱窑哥们儿的胜利！”

胡连国是劳资科长胡玉通的儿子。本来和小亮他们一样，是燕南矿的井下工人。可他爸爸让他“支援”了燕北矿。一换了单位，就成了科室干部，不再下井啦。兄弟矿嘛，劳资科也互相协作得不赖。

胡连国追孟蓓了？辛小亮还是第一次听说。

“他托膳食科的一位副科长去说合。还说矿长办公室的打字员考上大学走了，正要补一个。透出那口风不说你也明白啦！……你猜孟蓓怎么回答？你猜不着！”

“还不美得屁颠屁颠儿的，”辛小亮说。

“去去去！”赵涛一挥手。“人家孟蓓问了一句：‘他爸爸今儿晚上要是咽气了，我靠谁去？！’哈哈……”

“呜——”汽笛响了，人行车“咣当咣当”启动了。赵涛凑到小亮耳边，在轰隆隆的巨响里高声喊道：“她还说啦，科长的儿子，又是科室干部，咱可攀不起，要是个井下工人嘛，差不多……这可是重要信号，重要信号啊！”说完，他又向后一躺，双腿掀起老高，开心地笑着。

“真是笨蛋！放着打字员不干，还挺爱卖豆腐脑……放着白脸儿不爱，爱黑脸儿！”辛小亮摆出一副漠不相干的神情，冷冷地笑着。

其实，赵涛早把他琢磨透了：“别猪鼻子插葱，装象了啊！”他捶了小亮一拳，放开喉咙，反复唱着《解放军进行曲》的第一句：“向前向前向前”，在奔驰行进的人行车里晃着。

平常下班以后，辛小亮的眼窝里，鼻翼边，总带着黑印儿，这是他在浴室里用十几分钟“结束战斗”的标志。可今天，他足足在喷头下面耗了半个小时。下午回到了家，按惯例，晚饭应该在家吃的。可今天呢，他没魂儿了似的，终于跑到邻居家，给妈妈留下话，说矿上有事，走了。什么事啊？就是到矿上食堂吃晚饭——孟蓓在四号窗口卖饭哪。吃完了晚饭，心神不定地在山谷里转悠了好久，十点多钟，又进食堂吃了一顿夜宵——也就是说，这一天，他吃了四顿饭。食堂要是不关门，恐怕他还得去吃第五顿！害得他妈白白往商店转悠了一下午，买回来那么多好菜，预备着给他过生日！

用赵涛的话来说，自从辛小亮接到了“重要信号”，就有了十大变化。第一，绝口不提“吊眼儿”这个外号了。第二，晚饭也在食堂吃了。第三，专爱买四号窗口的饭。第四，吃饭愣神儿。第五，也不提什么“打一辈子光棍儿”了。第六……赵涛真不愧是“情报局长”，算是把小亮的心思摸透了。“伙计，咱平常挺冲的啊，这会儿还等什么呢！没胆儿就说一声，老弟撕破脸皮，帮你上门问她愿意不愿意！”这话不假。辛小亮平常对女同志要横犯嘎，真到了这节骨眼儿上，什么招儿也

没啦。赵涛看着费劲儿,倒比小亮还急三分:“咱矿工搞对象,是‘集体’搞哪!找着一个有眼力的姑娘,不易!”他捋胳膊挽袖子,“反正我是完啦。倒八字的眉毛,绿豆眼儿,又摊上干的这行当,一辈子没人跟!可我小亮哥该有个好爱人啊,多精神的小伙儿,谁看不上他谁瞎了眼!……”这小伙子在井下干了几年,讲起话来总是充大,学老窑工的口气,未免粗俗。可他确有一种为了他小亮哥两肋插刀的侠气。

几天以后,辛小亮休假。这天赵涛也歇了。午饭时,他来得很晚,卖饭窗口前,已经没什么人了。赵涛到四号窗口买了饭,靠在一边,歪着脑袋,对里面的孟蓓说:“给你们食堂提个意见,行不?”

孟蓓一看是他,心想:“你也是提意见的人?憋什么坏哪!”她说:“有意见找科长提去。”

赵涛说:“我专给你提的!听说你还得头等奖金呢,我们班的辛小亮病了好几天,想吃点可口的东西都没有!你没见他一天往食堂跑好几趟!”

孟蓓的脸红了:“去去去!谁病了都管,就他病了活该!”

“当真?”

“当真当真当真!”孟蓓的声音又甜又脆,“告诉他去吧,活该!”

赵涛端起饭碗,“咳”了一声,装一副丧气样儿,心里却偷偷发笑。三口两口扒完了饭,他又到了辛小亮家。

“辛小亮,今儿下午别出门啊。在家等着,有重要的事。”

“什么事啊?”

“党委书记找你谈话。”

“我?我怎么了?……”

“你好哇!……一会儿就知道啦!”

他穿着白背心,手里摇着脱下的衬衫,风车一样地转着,跑了。他跑进家属区的小酒铺,买了一升啤酒,一碟香肠:“哼,今儿要不是他得在那儿等着,非逼他请客不可!”……

且说孟蓓轰走了赵涛,站在卖饭窗口里愣神儿。你可不知道,姑娘们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从小伙子的一缕眼神里,也能看出此中的深意。更何况孟蓓这样的,从纺织厂的姑娘堆儿里出来,又精明得不饶人的姑娘!辛小亮心里哪怕打起一个浪花,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开始,她多开心哪,降伏了这个狂气的小伙子,出了一口气,真是太棒了!到现在,她忽然明白:天哪,到底谁降伏了谁啊!你为什么老希望他站到你四号窗口的前面?你为什么在“治”了他以后,总后悔自己太泼辣,总在想:“人家不讨厌你?”……爱情这东西,真是太神秘了。我敢说,不管是诗人还是心理学家,他们给爱情下的定义远没有真正的生活来得微妙。孟蓓

当然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大块头”辛小亮，可到底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她也说不上。也许，是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听了那些让人笑破肚皮的谈话之后？……可是刚才，听了赵涛一番话，孟蓓的心里又“骂”上辛小亮啦！她知道赵涛是辛小亮的“哥们儿”。哼，鬼知道是真病假病！真病，找我干什么？想吃可心的东西？回家去呀……一天往食堂跑好几次，不是心病才怪！……想着想着，她的脸一直红到眉梢，抿嘴儿想乐：这会儿就不充好汉了，还得派个传话的来。我非去给你治治这个“病”不可！

这天下午，辛小亮真听了赵涛的话，老老实实地在家等党委书记啦。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孟蓓，这才明白赵涛那家伙把自己骗了。当然，这比门口站着党委书记可招人高兴多了。可这……这也太突然了。他心慌意乱，舌头打不过卷儿来。

“……哦，是你！……你，干什么来了？”问完这句话，心里一个劲儿后悔。这样问，太失礼啦。

孟蓓呢，望着他，一笑，不答，坐到椅子上，眼睛往四处打量：“听说你病啦，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是真的吗？……”

“胡说！”虽说辛小亮这两天真的茶饭不思，他才不会嘴软呢。“我睡得香着呢。一天吃一斤六两，活得舒坦着呢！”

孟蓓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亮晶晶的眸子往他身上一闪：“可是你哥们儿赵涛说的。还把责任推我们食堂的人身上，说是吃得不可心儿啦什么的……说你一天进五六回食堂，还是不可心儿……”孟蓓忍不住从嘴里喷出笑来。

“你听他的？听他的……”他说了半句，把后半句咽下去了。他本想说“听他的两口子都得分家”，又觉得这么说好像有点儿那个，他“呃呃”了两声，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真的没病？”孟蓓就差过去捶他了。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得自在，过得滋润！”

该死的！孟蓓气得哭笑不得！过去在纺织厂里听姑娘们议论，到这个份儿上，再硬的小伙子也得露点儿声气儿了，说自己“睡不着觉”啦，“吃不下饭”啦。可他……有什么办法！孟蓓几乎拔腿要走了！哼，过得滋润、自在，一个人过去吧！过一辈子！……姑娘的心还是硬不过小伙子，你信不？这不，孟蓓没走。坐在那儿，挺尴尬，她还是红着脸，东问一句，西扯一句。她心里想，哼，再坐十分钟，你要是还装傻，我就走，再也不理你，看你怎么办！……十分钟到了，她又想：再给你五分钟，该死！……

辛小亮和孟蓓在屋里坐冷板凳。这屋子对面，辛家的小厨房里，可紧张着哪。孟蓓刚进屋没多久，辛大妈就买菜回来了，还从菜市场拽回来一位，就

是上回要把孟蓓介绍给小亮的乔奶奶。一路上，辛大妈搀着老太太，千般感谢，万般道歉，骂自己的“犟头”儿子，最后无非还是那句话：请乔奶奶别见怪，再给小亮张罗一个。两位老太太你搀我扶地到了辛家，正待进门，听见里面有姑娘的声音，隔玻璃窗一看，乔奶奶忙把辛大妈拉一边去啦。

“可了不得啦，大妹子！……咱们操的哪门子闲心呀，你们家小亮这不都搞上啦……”

“搞上了？谁呀？”

“就是上次我要说给他的孟家闺女呀！……啧啧，人家敢情是秘密接头……”乔奶奶咯咯笑着，用手捂着腰，生怕笑岔了气。

辛大妈还想凑窗户上看个仔细，让乔奶奶拽到小厨房去了：“别添乱！咱们七老八十的，一边待着去！”

这么着，两位老太太在小厨房里躲了老半天啦。

小厨房里还生着火炉，又赶上夏天，闷在这里可不算个事儿。这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辛大妈着急呀，开始还听见那姑娘在笑，怎么一会儿没什么声儿了？辛大妈一个劲儿催乔奶奶一块儿看看去：“您可不知道，我那嘎小子动不动就犯犟，咱们在旁边待着，别让他把人家姑娘给欺负了……”三说两磨的，等到乔奶奶经不住厨房的热劲儿，也就跟她一块儿去了。

两位老太太进了门，算是把屋里的别扭劲儿冲开了。可乔奶奶三句闲话没扯完，就点上正题啦，这可把两个小年轻的臊个大红脸！

“好小亮！我看你上次扬脖子挺胸的，也是个发誓打一辈子光棍儿的好汉，敢情瞒着你乔奶奶哪！你不是要那猪不吃、狗不啃的主儿吗？我们孟家的姑娘可金贵哪，人家跟你？！……”

“乔奶奶，您……您扯哪儿去啦！”辛小亮一个劲儿挤眼睛。

“甭做鬼脸儿！那我也得揭发你！……”乔奶奶又转脸对孟蓓说：“话又说回来。这个小亮呀，除了犟，样样都好。你看看，我跟你妈说得不错吧，个头儿又高，脸庞儿又精神……你们站一块儿，真是好好的一对儿呢！……”

孟蓓气得直瞪对面的辛小亮。谁让她天生一副笑模样儿呢，像生气，又像笑。

这么着，这层窗户纸让乔奶奶给捅破啦！辛大妈根本没听见乔奶奶唠叨啥，只是上上下下起劲儿地端详眼前的姑娘，乐得拢不住嘴。

“搞对象有闷在屋里搞的？这么好的天儿，俱乐部又有电影……”乔奶奶俨然是权威的介绍人的口气了：“去！到俱乐部去。跟我们家老头子说，是我让你们去的，给找两个座儿，看电影！”

不知是乔奶奶的命令有威力，还是人家两个年轻人各自有心。他们红着脸，

一人撑一把伞，走啦。乔奶奶真会说话：多好的天儿——凉丝丝的雨点儿漫天飘着哪……

看着两个年轻人走了，乔奶奶的得意劲儿还没过去：“昨儿矿上李书记见了我啦。问我：‘乔老太，听说你净忙活着给青年人拴对儿啦。’可把我吓坏了。我说：‘李书记，这没啥错误吧？’李书记乐了：‘怎么是错误！那么多安心为四化挖煤的好小伙儿没人认，你给引荐引荐，让那些姑娘们知道，小伙子们心里都有宝啊！’……嘿嘿，我这个人呀，越说我胖，我越鼓腮帮子。达不，昨儿晚上就跟我那老头子说了：‘你那俱乐部得给我配合！凡是我介绍去的小伙子和大姑娘，你得保证人家两个人看上电影！’谁想到，小亮他们成第一对儿啦……”

乔奶奶一边说一边乐，转脸一看，辛大妈竟笑着抹上眼泪儿了。“哟，大妹子，这是怎么啦？”

辛大妈说：“我先寻思着，小亮这行当真干错了，得打一辈子光棍儿啦，谁承想找着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两位老太太闲扯这当儿，孟蓓和辛小亮已经走上永定河畔的马路了。

“这个乔老太太，真没治！”辛小亮嘿嘿笑着，又偷偷斜眼瞟孟蓓。

孟蓓瞪他：“你才没治呢！”

“哟，我怎么啦？”

“你干的坏事还少？”

“我干什么坏事啦？”

“自己想想！”

辛小亮挠挠后脑勺，好像想不起来。

孟蓓站定，把自己举的伞收了，说：“过来。”

辛小亮乖乖儿地举着伞站过去了：“你今儿成心给我摆什么谱啊。瞎折腾！”

孟蓓说：“不让你请罪就美了你了！”

“我到底怎么啦？”

“你都说了我什么坏话？老实交代！”

“没有哇。”

“装得多像！”

“我说什么来着？你倒给我提个头儿。”

“你说我眼睛来着……”

“眼睛？眼睛……”辛小亮脖子一缩，眼睛一眯，鼻子一耸，坏笑起来。他瞟着孟蓓那俊俏的微翘的眼角。“我说你是丹凤眼啊……要不，要不怎么看着我那么……顺眼呢。”

“鬼！谁看着你顺眼！鹰鼻鹧眼，长脖鹿的个头儿……”孟蓓好像不把难听的

话全发泄出来不足以平“吊眼儿”之恨。终于,她也忍不住笑了:“也就是啊,有一点还像个人!”

“哪一点?”

孟蓓挨他近近的,轻声说:“你呀,也还算个男子汉。”

.....

灵与肉

◎ 张贤亮

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

许灵均没有想到还会见着父亲。

这是一间陈设考究的客厅，在这家高级饭店的七楼。窗外，只有一片空漠的蓝天，抹着疏疏落落的几丝白云。而在那儿，在那黄土高原的农场，窗口外就是绿色的和黄色的田野，开阔而充实。他到了这里，就像忽然升到云端一样，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再加上父亲烟斗里喷出的青烟像雾似的在室内飘浮，使眼前的一切就更如不可捉摸的幻觉了。可是，父亲吸的还是那种印着印第安酋长头像的烟斗丝，这种他小时候经常闻到的、略带甜味的咖啡香气，又从嗅觉上证实了这不是梦，而是的确的现实。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父亲把手一挥。三十年代初期他在哈佛取得学士学位以后，一直保持着在肯布里季时的气派，现在，他穿着一套花呢西服，跷着腿坐在沙发上。“我一到大陆，就会了一句政治术语，叫‘向前看’。你还是快些准备出国吧！”

房里的陈设和父亲的衣着使他感到莫名的压抑。他想，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但又怎能忘记呢？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他捏着母亲写的地址，找到霞飞路上的一所花园洋房。阵雨过后，泛黄的树叶更显得憔悴，滴滴水珠从围墙里的法国梧桐上滴落下来。围墙上拉着带刺的铁丝，大门也是铁的，涂着严峻的灰色油漆。他揪了很长时间门铃，铁门上才打开一方小小的窗口。他认得这个门房，正是经常送信给父亲的人。门房领着他，经过一条两旁栽着柏树的水泥路，进到一幢两

层楼洋房里的起居室。

那时,父亲当然比现在年轻多了,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羊毛坎肩,手肘倚在壁炉上,低着头抽烟斗。壁炉前面的高背沙发上,坐着母亲成天诅咒的那个女人。

“这就是那个孩子?”他听见她问父亲,“倒是挺像你的。来,过来!”

他没有过去,但不由自主地瞥了她一眼。他记得他看见了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有什么事?嗯?”父亲抬起头来。

“妈病了,她请你回去。”

“她总是有病,总是……”父亲愤然离开壁炉,在地毯上来回走着。地毯是绿色的,上面织有白色的花纹。他的眼睛追踪着父亲的脚步,强忍住不让泪水流出来。

“你跟你妈说,我等一下就回去。”父亲终于站在他面前。但他知道这个答复是不可靠的,母亲在电话里听过不止一次了。他胆怯而固执地要求:“她要您现在就回去。”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把手搭在他肩膀上,轻轻地把他推向门口。“你先回去,坐我汽车回去。要是你妈病得厉害,叫她先去医院。”父亲送他到前厅,突然,又很温存地摸着他的头,嗫嚅地说,“你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你就懂得,懂得……你妈妈,很难和她相处。她是那样,那样……”他仰起脸,看见父亲蹙皱着眉,一只手不住地擦着额头,表现出一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又反而有点可怜起父亲来。

然而,当他坐在父亲的克莱斯勒里,在滚动着金黄落叶的法租界穿行的时候,他的泪水却一下子涌出来了。一股屈辱、自怜、孤独的情绪陡然袭来。谁也不可怜!只有自己才可怜!他没有受过多少母亲的爱抚,母亲摩挲麻将的时候比摩挲他头发的时候多得多;他没有受过多少父亲的教诲,父亲一回家,脸就是阴沉的、懊丧的、厌倦的,然后就和母亲开始无休无止的争吵。父亲说他要再大一点就好了,就能懂得……实际上,十一岁的他已经模模糊糊地懂得了一些;他母亲最需要的是他父亲的温情,而父亲最需要的却是摆脱这个脾气古怪的妻子。不论是他母亲或父亲,都不需要他!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而已。

后来,父亲果然没有回家。不久,当他母亲知道父亲带着外室离开了大陆,不几天也就死在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

而正在这时,解放大军开进了上海。……

现在,经过了三十年漫长的岁月,经过历史上任何三十年都从未容纳过的那么多变故,这个父亲却突然回来了,并且还要把他带到国外去。整个事情是那

么不可思议,以致他都不能完全相信坐在他面前的是他的父亲,坐在他父亲面前的就是他自己。

刚刚,在父亲的女秘书密司宋打开贮藏室给父亲拿衣服的时候,他看见大大小小的箱子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旅馆商标:洛杉矶的、东京的、曼谷的、香港的,还有美国环球航空公司印着波音747的椭圆形标签。从这个小小的贮藏室里掀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而他呢,只不过是三天前得到领导转来的国际旅行社的通知,经过两天两夜汽车和火车的颠簸才到这里的。他提来的灰色人造革提包放在长沙发的一角。这种提包在农场还算是比较“洋气”的,但一到这间客厅也好像忸怩起来,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提包上面放着他的尼龙网袋,里面装着他的牙具和几个在路上吃剩下来的茶叶蛋。他看着那几个诧异得咧开了嘴的、畏缩地挤在一起的茶叶蛋,想起临走那天晚上,秀芝还叫他多带些茶叶蛋给父亲吃,不禁苦笑了一下。

前天,秀芝一定要带着清清到县城的汽车站去送他。自他们结婚,他还没有离开过农场,他这次远行简直成了他们小家庭的一次划时代的壮举。

“爸爸,北京在啥子地方?”

“北京在县城的东北边。”

“北京有好多好多县城大吗?”

“有好多好多县城大。”

“有马兰花?”

“没有。”

“有沙枣子吗?”

“没有。”

“唉——”清清像大人似的长叹一声,用手托着下颏,显得非常非常失望,她认为好地方是应该有马兰花和沙枣子的。

“傻丫头,北京可是个大地方咧!”赶车的老赵逗她,“你爸爸这回可要远走高飞喽!说不定要跟你爷爷出国哩。是不是,许老师?”

秀芝蜷着腿坐在老赵背后,向他微微一笑。她没有说话,但仅仅这一笑,就表现了她的信赖和忠贞。她不能想象他会到别的国家去,就和清清不能想象北京有多大一样。

车辙交错的土路坎坷不平,牲口在上面颠蹶地踏着碎步。路北边是一片整齐的条田,路南边,在雾霭蒙蒙的远方,就是他原来放马的草场。这里的一切都像是有股磁性的吸力,三匹马拉着一辆车也显得那么费劲。是的,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绵绵不尽的回忆,要离开它们了,他陡然感到更加亲切。他知道三棵紧挨着的白杨树后面,有一棵粗壮的沙枣树。他下车折了一枝,几个人在车上

一颗颗地吃起来。这是西北特有的酸涩而略带甜味的野果，六〇年饥荒的年代，他曾经靠这种野果度日。很多年没有吃了，现在吃起来却品出了一种特别令人留恋的乡土味，怪不得清清要问北京有没有沙枣呢！

“她爷爷保险没有吃过沙枣！”秀芝把核吐到车外，笑着说。这是她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来想象这个从国外回来的公公了。

其实并不需要想象，父子两人是如此相似，就是秀芝在街上碰见也会认得出来的。两个人都是细长的眼睛，线条纤细的、挺直的鼻梁，轮廓丰满的嘴唇，甚至举手抬足之间都表现出基因的痕迹。父亲并不显老，虽然肤色和儿子一样黝黑，但那一定是在洛杉矶或是香港的海滨浴场上晒出来的，一点也不憔悴。父亲仍然是那样讲究，那样注意仪表，头发尽管花白却一丝不乱，手背上虽然出现了老人斑，但指甲却修剪得十分光洁。茶几上，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散乱地放着B牌烟斗、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

他怎么会吃过沙枣呢！

二

“啊，这儿还能听到丹尼·占德门的《恒河上的月光》！”密司宋能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长得高大丰满，身上散发出一股素馨花的香气，一头长长的黑发被一条紫色的缎带束在脑后，不时像马尾一样甩动着。“董事长，您看，北京人跳迪斯科比香港人还够味，他们现在也现代化了！”

“任何人都抵御不了享乐的诱惑。”父亲像把一切都看透了 of 哲学家似的笑着。“他们现在也不承认自己是禁欲主义者了。”

吃完晚饭，父亲和密司宋把他带到舞厅。他没有想到北京也有这样的地方。小时候，他也曾跟父母到过上海的“梯梯斯”、“百乐门”和“法国夜总会”，现在应该像是旧地重游，但是，当他看到在柔和的乳白色的灯光中，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他身边像月光中的幽灵似的游荡的时候，却感到不安起来，就像一个观众突然被拉到舞台上当演员一样，他无法进入要他扮演的角色。刚才在餐厅里，他看见有的菜只动了几筷子就端了回去，竟从肠胃里发出一阵痉挛似的反感。在他那儿，上县城的国营食堂都要带一个铝制饭盒，把吃剩下的饭菜带回家去。

大厅里响着乐曲，有几对男女跳起奇形怪状的舞蹈。他们不是搂抱在一起，而是面对面像斗鸡一样互相挑逗，前仰后合。这些人就这样来消耗过剩的精力！他想起现在正在热得发烫的稻田里收割的人们。他们弯着腰，从右到左，又从左到右不停地摆动上肢。偶尔，他们抬起头向远远的担子嘶哑地喊着：

“喂，水，水……”啊，要是他现在能够躺在那一片绿荫下，在汨汨的黄色的渠水边，闻着饱含稻草和苜蓿香气的微风，那该有多好……

“您会跳舞吗？许先生。”忽然，他听见密司宋在旁边问他。他刚捕捉到的一点味儿马上消失了。他掉过头瞥了她一眼：她也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和两片涂得很红的嘴唇。

“不，不会。”他心不在焉地向她笑笑。他会放马，会犁田，会收割，会扬场……为什么他要会跳舞呢？

“你别为难他了。”父亲笑着对密司宋说，“你看，汪经理来请你了。”

一个穿灰色西服的漂亮男子绕过桌子走来，笑嘻嘻地向密司宋一弯腰，两人翩翩下了舞池。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嗯？”父亲又燃起烟斗，“你比我还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经常变的，现在办签证还比较容易，以后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我也有我所留恋的。”他转过身来面对着父亲。

“包括那些痛苦吗？”父亲意味深长地问。

“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

“嗯？”父亲凝视着他，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他心头突然掠过一阵惆怅。这才想起父亲也是属于这个陌生的、不可理解的世界的。形体上的相似消除不了精神上的隔膜。他也像父亲凝视他那样望着父亲，而两个人的目光都不能透过对方的视网膜看到深处的东西。

“是还……还怨恨吗？”最后，父亲低下眼睛。

“不，完全不是！”他把手一挥。这个动作也完全像他父亲。“正如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完全是另外的事……”

舞曲变换了，这次是低沉的、缓慢的，像渠水经过长长的渠道。灯光好似暗淡了一些，他看不清舞池里幢幢的人影。父亲低下头，用手不住地擦着额头，又表现出那种软弱的、痛苦的神情。“是呀，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可是回想起来，还是痛苦的……不过，我的确很想念你，尤其到了现在……”

父亲喃喃的低语配上这支比较典雅的舞曲，也使他动了感情。“是的，这我相信。”他沉思地说，“我也想念过你的。”

“是吗？”父亲抬起头来。

是的。二十年前，在那个秋天的夜晚，月光穿过窗纸被大雨淋破的窗棂，洒在一群像一堆堆破布的人们身上。十几个人睡在一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他紧贴着墙根，带着上碱味的潮气浸透了他的衣服。他冷得直打寒战，干脆从湿漉漉的稻草上爬起来。外面，泥泞在月光下像碎玻璃一样闪光。到处是残存的雨水。空

气里弥漫着腐败的水腥气。他找到马圈。那里还比较干燥,马粪尿蒸发出一股熏人的暖气。马、骡子、毛驴都在各自的槽头上吭哧吭哧地嚼着干草。他看到有一段马槽前没有拴牲口,就爬了进去,像初生的耶稣一样睡在木头马槽里。

月光斜射进来,在马棚的山墙上划出一条分开光与影的对角线。一匹匹牲口的头垂在马槽边,像对着月亮朝拜似的。这时,他陡然感到非常凄怆,整个情景完全象征性地指出了他孤独的处境:人们抛弃了他,使他来和牲口为伍!

他哭了。狭窄的马槽夹着他的身躯,正像生活从四面八方在压迫他一样。先是被父亲遗弃,母亲死了,舅舅把母亲所有的东西都卷走,单单撇下了他。以后他搬到学校宿舍,靠人民助学金上学。共产党收留了他,共产党的学校教育了他。在五十年代那种开朗的气氛中,虽然他具有一副在畸形的家庭中养成的孤僻、敏感和沉默寡言的性格,但也慢慢地溶化在一个大集体里;和五十年代所有的中学生一样,他对未来也有一个美丽的梦。毕业了,梦成了现实。他穿着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他有了自己生活的道路。但是,就因为学校支部书记要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就又把他推到父亲那里去。好像肉体上的血缘关系必然决定阶级的传种接代,他又成了资产阶级一分子。过去,资产阶级遗弃了他,只给他留下一个履历表上的“资产”,后来,人们又遗弃了他,却给他头上戴了顶右派帽子。他成了被所有的人都遗弃了的人,流放到这个偏僻的农场来劳教。

一匹马吃完了面前的干草,顺着马槽向他这边挪动过来。它尽着缰绳所能达到的距离,把嘴伸到他头边。他感到一股温暖的鼻息喷在他的脸上。他看见一匹棕色马掀动着肥厚的嘴唇在他头边寻找槽底的稻粒。一会儿,棕色马也发现了他。但它并不惊惧,反而侧过头来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这阵抚慰使他的心颤抖了。他突然抱着长长的、瘦骨嶙峋的马头痛哭失声,把眼泪抹在它棕色的鬃毛上。然后,他跪爬在马槽里,拼命地把槽底的稻粒扒在一起,堆在棕色马面前。

啊,父亲,那时你在哪里?

三

现在,这个父亲终于回来了!

这不是梦,父亲就睡在他隔壁;这不是梦,他自己也的确确是睡在一张柔软的席梦思床上。他摸着身下的床垫,和那硬梆梆的木头马槽多么不同!月光透过薄纱窗帷,在地毯上、沙发上、床上投下一块块边缘模糊的菱形方格。在朦胧的月光中,这一天获得的印象这时又鲜明地呈现了出来,而他所得到的总的感

觉,则是他完全不适应、不习惯这一切。父亲回来了,但这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人。父亲的回来不过是勾起他痛苦的回忆。打破了他的平静而已。

尽管已到秋天,但房间里好像越来越闷热。他索性掀开毛毯,翻身坐起来,扭亮台灯,用漠然的眼光环顾四周。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躯体上。他看到肌肉突起的胳膊,看到静脉曲张的小腿肚,看到趾头分得很开的双脚,看到手掌、脚跟上发黄的茧子,他想起了下午父亲对他的谈话。

下午,喝完咖啡,父亲支使开密司宋,对他谈到公司在海外的发展,谈到他的几个异母弟弟的无能,谈到对他和故土的思念。

“……有你在身边,我能得到一点安慰。”父亲说,“三十年前的事,我后来越来越觉着不安。我知道大陆上讲究家庭出身,老搞阶级斗争,你的日子不会好过,甚至以为你已经不在了,心里总是惦记你。你小时候的模样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尤其是你生下来,你爷爷为你在南京外交部旁边的华侨招待所设汤饼筵的那天,你在奶妈怀里的样子,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昨天一样。那天,申新的荣家、先施的郭家、华纺的刘家、英美烟草公司的郑家都从上海来了人。你知道,你是我们家的长房长孙……”

现在,当他在罩着淡绿色灯罩的灯光下,看着自己裸露着的强健的肌体的时候,他突然获得了一个极其新奇的印象。因为他还是第一次在父亲口里听到他记忆的史前时期——他儿时的情景,于是,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终于,他发现了他们父子之间隔膜的真正所在:他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曾经裹在锦缎的襁褓中,在红灯绿酒之间被京沪一带工商界大亨和他们的太太啧啧称赞的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了!而在这两端之间的全部过程,是糅合着那么多痛苦和欢欣的平凡的劳动!

他解除劳教以后,因为无家可归,于是被留在农场放马,成了一名放牧员。

清晨,太阳刚从杨树林的梢上冒头,银白色的露珠还在草地上闪闪发光,他就把栅栏打开。牲口们用肚皮抗着肚皮,用臀部抗着臀部争先恐后地往草场跑。土百灵和呱呱鸡发出快乐的和惊慌的叫声从草丛中蹿出。它们展开翅膀,斜掠过马背,像箭一样地向杨树林射去。他骑在马上,在被马群踏出一道道深绿色痕迹的草场上驰骋,就像一下子扑到大自然的怀抱里一样。

草场上有一片沼泽,长满细密的芦苇。牲口们分散在芦苇丛中,用它们阔大而灵活的嘴唇揽着嫩草。在沼泽外面,只听见它们不停的喷鼻声和哗哗的蹚水声。他在土堆的斜坡上躺下,仰望天空,雪白的和银白的云朵像人生一样变化无穷。风擦过草尖,擦过沼泽的水面吹来,带着清新的湿润,带着马汗的气味,带着大自然的呼吸,从头到脚摩挲遍他全身,给了他一种极其亲切的抚慰。他伸开手

臂,把头偏向胳肢窝,他能闻到自己的汗味,能闻到自己生命的气息和大自然的气息混在一起。这种心悅神怡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它能引起他无边的遐想,认为自己已经融化在旷野的风中;到处都有他,而他却又失去了自己的独特性。他的消沉、他的悲怆,他对命运的委屈情绪也随着消失,而代之以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

中午,马匹一头头从芦苇丛中蹿出来,带着滚圆的肚皮,抖擞着鬃毛,甩动着尾巴驱赶马虻和牛蝇。它们信赖地、亲昵地聚在他周围,用和善的大眼睛望着它们的牧人。有时,长着白色花斑的七号马会绕过几头瘦乏的牲口,悄悄地溜到瘸腿的一百号旁边,用耷着稀疏胡须的嘴唇掀动它、戏弄它。一百号也不示弱,调过屁股,用本来就没有着地的瘸腿使劲地向后一弹。七号马急速躲开,高昂起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丢手帕的游戏一样,在马群中转来转去,溅起闪着银光的水花。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拿起长鞭,严厉地吆喝几声。于是,所有的马都会竖起耳朵,并向七号马投去责怪的眼光。七号马也安静下来,像一个受了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站在水深到膝的沼泽里,掀起嘴唇,无聊地锉着长长的门牙。这时,他会感到他不是生活在一群牲口中间,而是像童话里的王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通灵的神物。

在正午的阳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种叫“水牛”的水鸟也感到了炎热,开始用嘴对着芦根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水的纤丽。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她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

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它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悦目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脚慢慢地随风飘拂,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放牧的马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马上,拿着长鞭,迎着雨头风,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在马群周围奔驰,叱呵和指挥离群的马儿。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蚊蚋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对自己的信心。

各队的放牧员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在草场上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蒙蒙的雨雾中。窝棚里凉爽潮湿,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粗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感情,和对劳动、对生活的那些敏感的新体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始终抱着愉快的满足。他开始羡慕他们

有一次,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

他羞愧地低下头,讷讷地说:“右派……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

“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七队的放牧员说,“那一年,整的是读书人。”七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人们都叫他“郭骗子”。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七十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

“所以你下辈子还得劳动!”“郭骗子”笑着打断他的话。

“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老放牧员郑重地说,“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朴拙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变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他。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折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就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呼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使。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啦!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厉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嘚嘚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

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过去把他错划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得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它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

“你去吧,到隔壁房里找潘干事拿调令,明天到学校报到。”苍蝇终于落在办公桌上,杂志“啪”地一下,但苍蝇却狡猾地飞跑了,董副主任又失望地坐在椅子上。“以后可要好好干了,再不能犯错误了。哎!”

他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在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在认识上,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次改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对他本人生活的根本性改变;他过去甚至也没有敢想象有这样一天。但是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地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兴奋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地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这副情景,使庄重得毫无表情的董副主任也感动了,竟向他伸出手来。他两手捧着董副主任的手,这时,才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个朦胧的希望。

从此以后,他又穿上了蓝布制服,夹着备课本,拿着粉笔走进教室,重续了二十二年前那个美丽的梦。农场的职工都不富裕,孩子们大都穿得破破烂烂,教室里混合着汗味、尘土味和干燥的阳光味。孩子们在简陋的课桌后面瞪大了天真的眼睛惊异地瞧着他,想不到一个放牲口的人成了他们的老师。可是不久,他就使孩子们信服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特殊的贡献;他甚至还没有敢想象他就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四化”服务,他认为那是英雄们的业绩。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尽到了他的本分。然而,就是这样,他也受到了孩子们的尊敬。临来北京的那个早晨,他看见孩子们一伙一伙地站在上学的小路上望着他的马车。大概他们也听说他找到了在国外的爸爸,要跟有钱的爸爸出国了吧。他们一个个都压抑着惜别的冲动,带着沮丧的神情,默默地目送他的马车过了军垦桥,过了白杨树林,消失在荒地的那边……

有时,放牧员们还会从十几里外来看他。那位老放牧员现在已经八十出头了,腿脚依然强健。他坐在炕上,捧着灵均的《现代汉语词典》摩挲着:“还是有学问的人能,看这么厚的书,这怕要看一辈子哩!”“这是字典,是查字的,”“郭骗子”告诉他,“你真是,活糊涂了!”“是呀,活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睁眼睛,看电影连个名字都不认得,光看个人影儿动弹。”放牧员们感叹着,在这崭新的时代里产生了对文化的需求。“干啥都得有文化。上次我给牲口拿药,差点把外用的

喂了牲口。”“郭嘛子”说：“‘老右’，你可是从咱们堆里出来的。咱们这些人完了，咱们的孩子可托付你了……”“是呀，”老放牧员说，“你要是教得我那小孙孙能看这么厚的书本本子，也不负咱们穷哥们儿在草场上滚出来的交情……”

这些毫无文采的语言，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他工作的意义，使他对未来的希望更加明确起来。他们在他们身上闻到马汗味，闻到汁水饱满的青草味，闻到浓烈的大自然的气息；他们给他带来那么熟悉的、亲切的感觉，这和跟父亲与密司宋在一起时所有的那种压抑感迥然不同。

他们在他们眼里，在学生们眼里，在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们眼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什么能比在别人眼里看到自己的价值更宝贵、更幸福呢！

四

上午，他和密司宋跟父亲逛王府井大街。他发觉他已经不适应城市生活了。这里的地面铺着水泥和沥青，完全不像乡村的土地，踏上去是那么松软湿润；大街上川流不息地来往着互不相识的人，既热闹而又冷漠。而且，四处不停地响着的噪音，不一会儿就使他神经紧张得疲乏了。

在工艺品商店，父亲开出了一张六百块钱的支票，订了一套工艺精细的景德镇青花餐具。他却在瓷器商店里挑了一个两块多钱的泡菜坛子。坛子小巧玲珑，转圈用黄色和棕色的花纹组成古色古香的图案，就和汉墓的出土文物一样。这样漂亮的家庭用具，是西北的小县城里没有见过的。秀芝早就想有一个像样的泡菜坛子，老是说她家乡的泡菜坛如何如何好。现在家里的一个，还是别人从陕西抱来的瓦制品，是秀芝花了好几晚上给人纳了五双鞋底换来的，周围早已渗出了盐渍，白花花的，实在难看得很。

“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回到饭店，密司宋妩媚地对他笑着说，“您这样爱她，真叫人嫉妒哩！”她今天又换了衣服，红黑相间的丝衬衫上罩了件淡紫色的开襟毛衣，下面配了一条灰色薄呢裙子。经秋天的阳光蒸烤，素馨花的香气更浓烈了。

“婚姻总是一种条约和义务。”父亲在一旁叹了口气，慢慢地搅动着杯里的咖啡，也许是联想到自己，仔细地斟酌着词句说，“不管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个条约和义务恪守到底，不然就会使良心不安，引起痛苦的懊悔。这次我叫你出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你要把你妻子和孩子都带上。”

“那么，许先生，您谈谈您的罗曼史好吗？”密司宋又说，“您的恋爱一定很动人。我不相信像您这样英俊的男人没有女人追求您。”

“我哪有什么恋爱，”他像是抱歉地笑了笑，“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还不认识，更谈不上什么罗曼史了。”

“啊！”密司宋顿时表示出一种夸张的惊奇，而父亲又一次不解地耸了耸肩膀。

他想把他和秀芝结婚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他们，但是这种反常的婚姻方式的背景却是一场大灾难，而这场大灾难又是民族的耻辱。他怕告诉他们以后，反而会引起他们嘲笑那在他心中认为是神圣的东西。他踌躇地考虑着，默默地呷着咖啡。咖啡苦中有甜，而且甜和苦是不能分开的。二者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这种特殊的、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香味。父亲和密司宋能品出咖啡的妙处，但他们能理解生活的复杂性吗？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婚姻也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完全脱离了常轨，纯粹靠盲目的偶然性来排列组合。他们只会从偶然性中看到荒谬的一面，不能体会到偶然性也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把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突然赏赐给人。而且，越是在困苦的环境，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就越是珍贵。他和秀芝奇特的结婚，后来在他们共同回忆时每次都会引起既悲凉又热烈的感情，这怕是其他任何人难以理解的。

那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他和往常一样，给牲口饮了水，拦好马圈，回到小屋。刚放下鞭子，“郭瘸子”就闯进门来。

“喂，‘老右’，你要老婆不要？”“郭瘸子”兴冲冲地说，“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晚上就给你送来。”

“那你就送来吧，”他笑着回答他。他以为“郭瘸子”是在给他开玩笑。

“好！咱们君子一言。你准备准备。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刚跟你们书记说了。你们书记说只要你同意，他立刻开证明。好，我给你开了证明，回家路过场部就把证明交给政治处，转回来就把人带来，你今晚上就洞房花烛夜吧！”

天刚黑，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看《解放军文艺》，就听见外面一群孩子喊：“‘老右’的老婆来了！‘老右’的老婆来了！”接着，门框哪一声，“郭瘸子”又像下午那样闯了进来。

“好了！我酒不喝你一口，水你总得赏一口吧？真够钱！一下午脚不沾地来回跑了三十里路。”他伸手从铝桶里舀了瓢井水，咕咚咕咚地喝光，然后用袖子一抹嘴，长长地“嗨”了一声，才朝门外叫道，“喂！你怎么不进来？进来，进来！这就是你的家。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说的‘老右’，大名叫许灵均。啥都好，就是穷点，可是越穷越光荣嘛！”

这时，他才看见门外的一群孩子面前真的站着个陌生的姑娘，穿着一件皱皱巴巴的灰上衣，拎着一个小白包袱，冷淡而又仔细地打量着这间满布灰尘和锅烟的小土房，好像她真准备在这里住下似的。

“这……这怎么行！”他大吃一惊，“你这个玩笑简直开得太大了！”

“这怎么不行？你别马虎，”“郭瘸子”从口袋里掏出张纸，“啪”地一声往炕沿

上一拍，“证明都开来了，这可是法律，法律，你懂不懂？我可是跟政治处说你去放马了，叫我代领的。你要是撒手不干，就太不够意思了。听见吗，‘老右’？”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他摊开双手，连连问“郭骗子”。姑娘可是进来了，坦然地坐在他刚刚坐的小板凳上，好像他们两人说的话与她无关一样。

“怎么行？你们两口子的事来问我，我问谁去？”“郭骗子”又把“法律”放回炕上。“好了，好好过吧！明年有了胖小子，可别忘了请我喝喜酒。”他走到门口，叉开两手，像轰小鸡一样轰走孩子，“看啥，看啥？没见过你们爹跟你们妈结婚？回去问问你们爹跟你们妈去，走、走、走！”

“郭骗子”就这样一甩手走了。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悄悄地端详姑娘。她并不漂亮，小小的翘鼻子周围长着细细的雀斑，一头黄色的、没有光泽的头发，神情疲惫，面容憔悴。不知怎么，他对她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于是倒了杯水放在木箱上说：“你喝吧，走了那么远路……”

她抬起头，看到他诚挚的目光，默默地把一杯水喝完，体力好像恢复了一些，就跪上炕叠起了被子，然后拉过一条裤子，把膝盖上磨烂的地方展在她的大腿上，解开自己拎来的小白包袱，拿出一小方蓝布和针线，低着头补缀了起来。她的动作有条不紊，而且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这股生气好像不能在她自身表现出来，而只能在经过她手整理的东西上表现出来似的。外表委顿的她，把这间土房略加收拾，一切的一切都马上光鲜起来。她灵巧的手指触摸在被子、褥子、衣服等等上面，就像按在音阶不同的琴键上面一样，上房里会响起一连串非常和谐的音符。

突然，他想起了那匹棕色马，心里顿时感到一阵酸楚的甜蜜。他觉得他不仅早就认识了她，而且等待了多年。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心荡神移的感觉袭倒了他，使他不能自制地跌坐在姑娘旁边。他两手捂着脸，既不敢相信他真的得到了幸福，担心这件侥幸的事会给他带来新的不幸，又极力想在手掌的黑暗中细细地享受这种新奇的感情。这时，姑娘停住了手中的针线。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能依托终生的人。她对他竟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非常自然地把手轻轻地搭在他伛偻着的脊背上。于是，两个人就坐在铺着破麻袋的炕沿上，一直歔歔地说到天明。

秀芝原来是四川人。那几年，天府之国搞得连红苕都吃不上，饥饿的农民不得不大量外流。姑娘们还比较好办，在外地随便找个对象就嫁了出去。一个村里只要有一个姑娘在外地成了家，就一个一个提携家乡的姐妹妹妹。这样，成串成串的姑娘就拎着她们可怜的小包袱离开巴山蜀水，闯出阳平关，越过秦岭，穿过数不清的长长短短的隧道，往陕西、往甘肃、往青海、往宁夏、往新疆去奔她们的前程。家里能紧得出钱的就买张车票，没有钱的就一站一站偷乘火车。她们的小

包袱里只包着几件补缀过的衣服、一面小圆镜子和一把木梳,就靠这些装备,她们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当作赌注,押在这个人生的赌场上。也许会赢来幸福,也许会输个精光。……

在灵均这个地区的农场,早就风行这种八分钱的婚姻。没有结婚的小伙子和老光棍们,付不起娶当地姑娘的彩礼,就去求四川来的妇女。这些四川妇女都像是随身带着一沓子人事卡片,她们随便想出一个,只要一封信回去,就召之即来,来之能婚。秀芝就是被召来的一个。她来找的是七队一个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但等她揣着大队的证明,风尘仆仆地一站一站挪到这个农场,小伙子却在三天前翻了车,不治身亡了。她连火葬场都没有去,也不必去,谁也不欠谁的情。她也不好意思到那一个同乡家里去,她知道那个同乡也很困难,丈夫是个残废,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孩子。她只得呆呆地坐在七队的马圈前面,像日晷似的看着自己慢慢移动的影子。

“郭嘛子”中午提着水壶回马圈灌开水,知道了她的情况,就把一群马扔在草场上,挨家挨户地为她寻找出路。七队现在只有三个单身汉了,他们一个一个到马圈前面观看了一番,可是这个身体干瘦的矮个子姑娘引不起他们兴趣。最后,“郭嘛子”想起了已经有三十四五岁的灵均。

他就是这样结的婚。这就是他的罗曼史!

“‘老右’结婚了!”这在生产队竟成了大事。这些疲于“抓革命”的人也乐于从派性纠缠中暂时解脱出来,全都对这个从来也不属于哪一派的、对谁也没有损害的、一直老老实实“促生产”的“右派分子”表示了同情。人毕竟是有人性的,他们在给灵均的温暖中自己也悄悄地感到了温暖,觉得自己还没有在损失最小最小的革命中损失掉全部的人性。他们有的给他一口锅,有的给他几斤粮,有的给他几尺布票……而且又由一个年轻的兽医发起每家送五毛钱,给他凑出一笔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会议上也出现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统一: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按制度给了他三天婚假。人,毕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黑暗的日月里!

他们俩就靠人们施舍的这点同情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

秀芝原来是个乐观的、勤快的女人。她只在家乡坝上的小学读过两年书,不能对生活抒发诗意的感受。她来的第二天晚上,放映队在晒场上放映了《列宁在一九一八》。从此,华西里的一句台词就成了她的口头禅。“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她老是笑嘻嘻地这样说。她生得细眉小眼,一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像月牙儿似的弯弯的细缝,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倒也有一种特别的动人之处。

灵均放马,白天不在家。她一个人在中午顶着烈日又和泥又掌模子,脱了一

千多块土坯。然后,把晒干的土坯一车车拉回来,在他们门前围起三面围墙,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她突然划出了十八平方米土地归自己使用。她说:“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有树,哪有出门就见天的啦!”于是,她又在野地里刨了两棵碗口粗的白杨树,以惊人的力气拖了回来,栽在院子的两边。院子围好,她就养开了家禽。她养鸡、养鸭、养鹅、养兔子,后来又喂了几对鸽子,在人们中间博得了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外号。国营农场不许工人自己养猪,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她常躺在枕头上对灵均说,她梦见她养的猪已经长得多大多大了。

他们所在的这个偏僻的农场,是像一潭死水似的的地方,领导对正确的东西执行不力,对错误的东西贯彻得也不积极,尽管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压力,但秀芝也能像一株顽强的小草一般,在石板缝中伸出自己的绿茎。她养的小动物们,就和在魔术师的箱子里一样,繁殖得飞快。“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果然,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活就大变了样。他们的工资虽然还是那样微薄,但是已经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了。秀芝真有逆转社会发展规律的本领,在别人高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她在他们家里完成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经济的复辟。一切都是从秀芝手里生产出来的。她收工回来,鸡、鸭、鹅、鸽子也都跟着她回来。清清背在她背上,鸡鸭鹅围在她脚下,鸽子立在她肩头;柴火在炉膛里燃着,水在铁锅里烧着,她虽然没有学过“运筹学”,可是就像千手观音一样,不慌不忙,先后有序,面面俱到。

这个吃红苕长大的女人,不仅给他带来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家庭温暖,并且使他生命的根须更深入地扎进这块土地里,而根须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她和他的结合,更加强化了他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使他更明晰地感觉到以劳动为主体的生活方式的单纯、纯洁和正当。他得到了他多年前所追求的那种愉快的满足。

董副主任宣布他的问题得到改正的那天,当他开好证明,又从财务科领出按政策规定给他补助的五百块钱回到家,把经过原原本本告诉秀芝时,秀芝脸上也放出了奇异的光彩。她在围裙上擦干净手,一张张地点着崭新的钞票。

“喂,秀芝,从今以后我们就和别人一样了!”他在屋里洗脸,朝小伙房里的秀芝高兴地叫道,“喂,秀芝,你怎么不说话?你在干什么?”

“哪个搞起的哟!”秀芝笑着说,“我数都数不清罗!数了好几遍,这么多钱!”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钱算得了什么?值得高兴的是我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啥子政治新生、政治新生!在我眼睛里你还是个你啦!过去说是右派,隔了大半辈子又说把你搞错了;说是把你搞错了,又叫你二天莫再犯错误,晓得搞的啥子名堂哟!到底是哪个莫再犯错误啦?我们过去哪个子过,二天还哪个子过。

有了钱才能安逸。你莫吵我,让我再好好数数。”

是的,比他小十五岁的秀芝从来没有把他看得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永远保持着庄稼人朴实的理智。什么右派不右派,这个概念根本没有进入她小小的脑袋。她只知道他是个好人,老实人,这就够了。她在干活的时候常跟别的妇女说:“我们清清她爹可是个老实巴交的下苦人,三脚踢不出个屁来,狼赶到屁股后头都不着急。要是欺负这样的人,真是作孽,二辈子都要背时!”

是的,秀芝爱钱,平时恨不能把一分钱镍币掰成两半花。区区五百块钱,也就使她大大地满足了,使她的手指颤抖了,使她眼里闪出喜悦的泪光。可是,当她知道他父亲是个有钱的“外国资本家”时,却没有提一个钱字,只是叫他多带些五香茶叶蛋去给父亲吃。她常常对只有七岁的清清教育道:“钱只有自己挣来的花得才有意思,花得才心里安逸。我买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得来的钱;我买辣子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割稻子得来的钱;我给你买本本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场得来的钱……”她没有什么抽象的理论,没有什么高深的哲理,然而这些朴素的、明白的、心安理得的话语,已经使他们家庭这个最小的成员也认识到:劳动是高贵的,只有劳动的报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剥削或依赖得来的钱财是一种耻辱!

秀芝不会唱歌。清清满月时,他们一家三口乘进县城的卡车到全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照了一张“全家福”。县城的街上有卖冰棍的,拖长了嗓子喊着:“冰——棍!冰——棍!”以后,“冰——棍”就成了秀芝的催眠曲。她一面拍着清清,一面学西北人的口音轻轻地唱着:“冰——棍!冰——棍!……”那单调的、悠远的、而又如梦幻般甜蜜的歌声,不仅把清清引入梦乡,也使在一旁看书的他感到一种朴拙得近于原始的幸福,进入一种纯粹的美的境界。

王府井大街上也有卖冰棍的,但是他们不喊,坐在铺子里板着面孔,这多没有意思!他思念那如梦幻般甜蜜的催眠曲,思念那抱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乐观精神的笑靥。

不,他不能待在这里。他要回去!那里有他在患难时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在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那里有他生命的根!

五

他终于回来了,终于又回到这熟悉的小小的县城。汽车站前面横着全县唯

一的柏油马路,那上面仍然蒙着层薄薄的黄尘,风一吹,就在商店、银行和邮局门口打旋。马路对面的那架弹花机仍然响着单调的嘣嘣声,好像自他走后就没有停过似的。汽车站门前仍然拥挤着卖醪糟的、卖油饼的、卖瓜子的农民;两边,仍然是东倒西歪的土房,有的门上还能看到古老的雕花门楣。那座新盖的戏院仍然困在横七竖八的脚手架当中,一群工人还在它四周忙碌着。

但是,他一下车,就有一种像是从降落伞落到地面的感觉,他的脚又踏着实地了。他爱这里的一切,连同她的瑕疵,就像他爱自己的生活,包括过去的痛苦一样。

黄昏,他搭乘的马车路过原来住的生产队。残阳正从西山上斜射过来,村庄和村庄里的人们都罩在一片模糊的玫瑰色之中。只有秀芝栽的两棵白杨树高耸在一片上房子的屋顶上面,静静的,一点也不摇曳,仿佛正对他全神贯注地凝望着一样。

牲口回来了,横穿过土路,它们好像认出了他,呆呆地立在路两旁,睁大眼睛望着他。马车远去了,它们才掉过头,懒洋洋地向自己的圈棚踱去。

他的心里泛起了一股温暖的柔情。他想起临回来之前父亲和他的谈话。那天晚上,父子两人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父亲穿着丝质睡衣,佝偻着背,神情懊丧地抽着烟斗。

“这么快就走吗?”父亲问他。

“是的,学校准备期中考试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次我回来,看到了你,很高兴。”父亲虽然努力保持平静,但下唇却轻轻地抖动着。“我发现你非常非常成熟了。这也许是你有坚定信念的缘故吧。这样也好!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信念。老实说,过去我也追求过,可是,宗教并不能给人什么……”说到这里,父亲表示厌倦地挥了挥手,又继续说下去,然而却跳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年在巴黎,我看到一本英文版的《莫泊桑选集》,里面有一篇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那个儿子后来成了一个白痴。我看了,一晚上没睡着觉。以后,我经常好像看到你一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我也放心了。你的确出乎我意外,你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变得像一个什么,父亲始终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概念,但是他从父亲眼睛里看到了欣慰的眼神。他觉得他们父子都对这次重逢和分别感到满意,他们各自得到了各自需要的东西。父亲在良心上得到了安慰;他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回顾了自己的半生,从而领悟到一点人生的意义。

太阳完全隐没在西山后面了。她射出的几束剑似的橘黄色的强光映着山顶的晚霞,又从晚霞上折射下来,散在山坡的草场上、山下的田野上、田野的村庄上,最后变成了一片柔和的暮色。离学校越来越近了,远远地已经能看到那一片

操场,就像一泓明净的湖水在泛黄的茈萆草滩中间。在晚风的吹拂下,他胸中的柔情也逐渐荡漾开去,终于形成了一股暖流在他全身回旋。他感到,父亲说他有坚定的信念,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现在的精神状态。任何理性上的认识如果没有感性作为基础就全部是空洞的。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时候,感情要比理念更重要。而他这二十多年来在人生的体验中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正是劳动者的情感。想到这里,他眼睛濡湿了。他是被自己感动了:他没有白白走过那么艰苦的道路。

他终于看到了学校。他家门口正站着几个人向大路上这辆马车眺望。秀芝围的白布围裙,在柔和而苍茫的暮色中就像一点皎洁的星光。很快地,那里人越聚越多,最后,他们看出了是他,全都向大路上奔跑。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她就像迸射出的一团火,飞也似的向他扑来。她越跑越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受戒

● 汪曾祺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明海在家叫小明子。他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劊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人家弟兄多,就派一个出去当和尚。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这地方的和尚有的走得很远。有到杭州灵隐寺的、上海静安寺的、镇江金山寺的、扬州天宁寺的。一般的就在本县的寺庙。明海家田少,老大、老二、老三,就足够种的了。他是老四。他七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哪个庙里都是管饭的。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伽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当和尚也不容易,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他舅舅给他相了相面,叫他前走几步,后走几步,又叫他喊了一声赶牛打场的号子:“格当嘭——”,说是“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要当和尚,得下点本,——念几年书。哪有不认字的和尚呢!于是明子就开蒙入学,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四言杂字》、《幼学琼林》、《上论》、《下论》、《上孟》、《下孟》,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舅舅按照约定的日期又回了家,带了一件他自己穿的和尚领的短衫,叫明子娘改小一点,给明子穿上。明子穿了这件和尚短衫,下身还是在家穿的紫花裤子,赤脚穿了一双新布鞋,跟他爹、他娘磕了一个头,就随舅舅走了。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舅舅说,不用改了。于是“明海”就从学名变成了法名。

过了一个湖。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月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舅舅一劲地推他:“快走!快走!”

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明子听见有人跟他说话,是那个女孩子。

“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吗?”

明子点点头。

“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

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

“明海。”

“在家的時候?”

“叫明子。”

“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

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许!哗——许!”

.....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是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迎门供着弥勒佛。不知是哪一位名士撰写了一副对联: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过穿堂，是一个不小的天井，种着两棵白果树。天井两边各有三间厢房。走过天井，便是大殿，供着三世佛。佛像连龕才四尺来高。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

一花一世界
三藐三菩提

进门有一个狭长的天井，几块假山石，几盆花，有三间小房。

小和尚的日子清闲得很。一早起来，开山门，扫地。庵里的地铺的都是笊底方砖，好扫得很，给弥勒佛、韦驮烧一炷香，正殿的三世佛面前也烧一炷香、磕三个头、念三声“南无阿弥陀佛”，敲三声磬。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明子这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然后，挑水，喂猪。然后，等当家和尚，即明子的舅舅起来，教他念经。

教念经也跟教书一样，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舅舅一边唱，一边还用手在桌上拍板。一板一眼，拍得很响，就跟教唱戏一样。是跟教唱戏一样，完全一样哎。连用的名词都一样。舅舅说：念经，一要板眼准，二要合工尺。说：当个好和尚，得有条好嗓子。说：民国十年闹大水，运河倒了堤，最后在清水潭合龙，因为大水淹死的人很多，放了一台大焰口，十三大师——十三个正座和尚，各大庙的方丈都来了，下面的和尚上百。谁当这个首座？推来推去，还是石桥——善因寺的方丈！他往上一坐，就跟地藏王菩萨一样，这就不用说了；那一声“开香赞”，围看的上千人立时鸦雀无声。说：嗓子要练，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不要贪玩！舅舅这一番大法说得明海和尚实在是五体投地，于是就一板一眼地跟着舅舅唱起来：

“炉香乍爇——”

“炉香乍爇——”

“法界蒙薰——”

“法界蒙薰——”

“诸佛现金身……”

“诸佛现金身……”

.....

等明海学完了早经，——他晚上临睡前还要学一段，叫做晚经，——荸荠庵的师父们就都陆续起床了。

这庵里人口简单，一共六个人。连明海在内，五个和尚。

有一个老和尚，六十几了，是舅舅的师叔，法名普照，但是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很少人叫他法名，都称之为老和尚或老师父，明海叫他师爷爷。这是个很枯寂的人，一天关在房里，就是那“一花一世界”里。也看不见他念佛，只是那么一声不响地坐着。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

下面就是师兄弟三个，仁字排行：仁山、仁海、仁渡。庵里庵外，有的称他们为大师父、二师父；有的称之为山师父、海师父。只有仁渡，没有叫他“渡师父”的，因为听起来不像话，大都直呼之为仁渡。他也只配如此，因为他还年轻，才二十多岁。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却叫“当家的”，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确确实实干的是当家的职务。他屋里摆的是一张账桌，桌子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账簿共有三本。一本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是债账。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常做的法事是放焰口。正规的焰口是十个人。一个正座，一个敲鼓的，两边一边四个。人少了，八个，一边三个，也凑合了。荸荠庵只有四个和尚，要放整焰口就得和别的庙里合伙。这样的時候也有过。通常只是放半台焰口。一个正座，一个敲鼓，另外一边一个。一来找别的庙里合伙费事；二来这一带放得起整焰口的人家也不多。有的时候，谁家死了人，就只请两个，甚至一个和尚咕噜咕噜念一通经，敲打几声法器就算完事。很多人家的经钱不是当时就给，往往要等秋后才还。这就得记账。另外，和尚放焰口的辛苦钱不是一样的。就像唱戏一样，有份子。正座第一份。因为他要领唱，而且还要独唱。当中有一大段“叹骷髅”，别的和尚都放下法器休息，只有首座一个人有板有眼地曼声吟唱。第二份是敲鼓的。你以为这容易呀？哼，单是一开头的“发插”，手上没功夫就敲不出迟疾顿挫！其余的，就一样了。这也得记上：某月某日，谁家焰口半台，谁正座，谁敲鼓……省得到年底结账时赌咒骂娘。……这庵里有几十亩庙产，租给人种，到时候要收租。庵里还放债。租、债一向倒很少亏欠，因为租佃借钱的人怕菩萨不高兴。这三本账就够仁山忙的了。另外香烛灯火、油盐“福食”，这也得随时记记账呀。除了账簿之外，山师父的方丈的墙上还挂着一块水牌，上漆四个红字：“勤笔免思”。

仁山所说当一个好和尚的三个条件，他自己其实一条也不具备。他的相貌只要用两个字就说清楚了：黄，胖。声音也不像钟磬，倒像母猪。聪明么？难说，打牌老输。他在庵里从不穿袈裟，连海青直裰也免了。经常是披着件短僧衣，袒露着一个黄色的肚子。下面是光脚趿拉着一对僧鞋，——新鞋他也是趿拉着。他

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唔——唔——”。

二师父仁海。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因为庵里凉快。庵里有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和尚的家眷。仁山、仁渡叫她嫂子,明海叫她师娘。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地洗涮。傍晚的时候,坐在天井里乘凉。白天,闷在屋里不出来。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账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赢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胡。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他不但经忏俱通(小庙的和尚能够拜忏的不多),而且身怀绝技,会“飞铙”。七月间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焰口,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铙。飞铙就是把十多斤重的大铙钹飞起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全部法器皆停,只几十副大铙紧张急促地敲起来。忽然起手,大铙向半空中飞去,一面飞,一面旋转。然后,又落下来,接住。接住不是平平常常地接住,有各种架势,“犀牛望月”、“苏秦背剑”……这哪是念经,这是耍杂技。也算是地藏王菩萨爱看这个,但真正因此快乐起来的是人,尤其是妇女和孩子。这是年轻漂亮的和尚出风头的机会。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他还会放“花焰口”。有的人家,亲戚中多风流子弟,在不是很哀伤的佛事——如做冥寿时,就会提出放花焰口。所谓“花焰口”就是在正焰口之后,叫和尚唱小调,拉丝弦,吹管笛,敲鼓板,而且可以点唱。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仁渡前几年一直在外面,近两年才常住在庵里。据说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他平常可是很规矩,看到姑娘媳妇总是老老实实的,连一句玩笑话都不说,一句小调山歌都不唱。有一回,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一伙人把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唱完了,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

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

仁山吃水烟，连出门做法事也带着他的水烟袋。

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收鸭毛的担一副竹筐，串乡串镇，拉长了沙哑的声音喊叫：

“鸭毛卖钱——！”

偷鸡的有一件家什——铜蜻蜓。看准了一只老母鸡，把铜蜻蜓一丢，鸡婆子上去就是一口。这一啄，铜蜻蜓的硬簧绷开，鸡嘴撑住了，叫不出来了。正在这鸡十分纳闷的时候，上去一把薅住。

明子曾经跟这位正经人要过铜蜻蜓看看。他拿到小英子家门前试了一试，果然！小英子的娘知道了，骂明子：

“要死了！儿子！你怎么到我家来玩铜蜻蜓了！”

小英子跑过来：

“给我！给我！”

她也试了试，真灵，一个黑母鸡一下子就把嘴撑住，傻了眼了！

下雨阴天，这二位就光临荸荠庵，消磨一天。

有时没有外客，就把老师叔也拉出来，打牌的结局，大都是当家和尚气得鼓鼓的：“×妈妈的！又输了！下回不来了！”

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念，神情很庄重：

“……一切胎生、卵生、息生，来从虚空来，还归虚空去。往生再世，皆当欢喜。南无阿弥陀佛！”

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

.....

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葚，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院墙下半截是砖砌的，上半截是泥夯的。大门是桐油油过的，贴着一副万年红的春联：

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庆有余

门里是一个很宽的院子。院子里一边是牛屋、碓棚；一边是猪圈、鸡窠，还有个关鸭子的栅栏。露天地放着一具石磨。正北面是住房，也是砖基土筑，上面盖的一半是瓦，一半是草。房子翻修了才三年，木料还露着白茬。正中是堂屋，家神菩萨的画像上贴的金还没有发黑。两边是卧房。隔扇窗上各嵌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玻璃，明亮亮的，——这在乡下是不多见的。房檐下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顶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

这家人口不多。他家当然是姓赵。一共四口人：赵大伯、赵大妈，两个女儿，大英子、小英子。老两口没有儿子。因为这些年人不得病，牛不生灾，也没有大旱大水闹蝗虫，日子过得很兴旺。他们家自己有田，本来够吃的了，又租种了庵上的十亩田。自己的田里，一亩种了荸荠，——这一半是小英子的主意，她爱吃荸荠，一亩种了茨菇。家里喂了一大群鸡鸭，单是鸡蛋鸭毛就够一年的油盐了。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罩鱼、洗磨、凿碓、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春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筐。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磁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子孙万代”呀、“福寿绵长”呀。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她：“大娘，好日子是十六，你哪天去呀？”——“十五，我一大清早就来！”

“一定呀！”——“一定！一定！”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这里的风俗，十五六岁的姑娘就都梳上头

了。这两个丫头，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姐妹俩长得很像，性格不同。大姑娘很文静，话很少，像父亲。小英子比她娘还会说，一天咕咕呱呱地不停。大姐说：

“你一天到晚咕咕呱呱——”

“像个喜鹊！”

“你自己说的！——吵得人心乱！”

“心乱？”

“心乱！”

“你心乱怪我呀！”

二姑娘话里有话。大英子已经有了人家。小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已经下过小定，日子还没有定下来。她这二年，很少出房门，整天赶她的嫁妆。大裁大剪，她都会。挑花绣花，不如娘。她可又嫌娘出的样子太老了。她到城里看过新娘子，说人家现在绣的都是活花活草。这可把娘难住了。最后是喜鹊忽然一拍屁股：“我给你保举一个人！”

这人是谁？是明子。明子念“上孟下孟”的时候，不知怎么得了半套《芥子园》，他喜欢得很。到了荸荠庵，他还常翻出来看，有时还把旧账簿子翻过来，照着描。小英子说：

“他会画！画得跟活的一样！”

小英子把明海请到家里来，给他磨墨铺纸，小和尚画了几张，大英子喜欢得不得了：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就可以乱摹！”——所谓“乱摹”是绣花的一种针法：绣了第一层，第二层的针脚插进第一层的针缝，这样颜色就可由深到淡，不露痕迹，不像娘那一代绣的花是平针，深浅之间，界限分明，一道一道的。小英子就像个书童，又像个参谋：

“画一朵石榴花！”

“画一朵栀子花！”

她把花掐来，明海就照着画。

到后来，风仙花、石竹子、水蓼、淡竹叶、天竺果子、蜡梅花，他都能画。

大娘看着也喜欢，搂住明海的和尚头：

“你真聪明！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

小英子捺住他的肩膀，说：

“快叫！快叫！”

小明子跪在地下磕了一个头，从此就叫小英子的娘做干娘。

大英子绣的三双鞋,三十里方圆都传遍了。很多姑娘都走路坐船来看。看完了,就说:“啧啧啧,真好看!这哪是绣的,这是一朵鲜花!”她们就拿了纸来央大娘求了小和尚来画。有求画帐檐的,有求画门帘飘带的,有求画鞋头花的。每回明子来画花,小英子就给他做点好吃的,煮两个鸡蛋,蒸一碗芋头,煎几个藕团子。

因为照顾姐姐赶嫁妆,田里的零碎生活小英子就全包了。她的帮手,是明子。

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子。这几茬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

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

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

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

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透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个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打场的时候,明子能替赵大伯一会儿,让他回家吃饭。——赵家自己没有场,每年都在荸荠庵外面的场上打谷子。他一扬鞭子,喊起了打场号子:

“格当啍——”

这打场号子有音无字,可是九转十三弯,比什么山歌号子都好听。赵大娘在家,听见明子的号子,就侧起耳朵:

“这孩子这条嗓子!”

连大英子也停下针线:

“真好听!”

小英子非常骄傲地说:

“一十三省数第一!”

晚上,他们一起看场。——荸荠庵收来的租稻也晒在场上。他们并肩坐在

一个石碾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个地方以为蟋蟀叫是蚯蚓叫,而且叫蚯蚓叫“寒蛇”,听纺纱婆子不停地纺纱,“吵——”,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

“呀!我忘了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小英子说。

这里的人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一个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

.....

“掐”荸荠,这是小英子最爱干的生活。秋天过去了,地净场光,荸荠的叶子枯了,——荸荠的笔直的小葱一样的圆叶子里是一格一格的,用手一捋,哗哗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伸手下去,一个红紫红紫的荸荠。她自己爱干这生活,还拉了明子一起去。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

明子常搭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去,划船的是明子。

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

“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

明海到善因寺去受戒。

“你真的要去烧戒疤呀?”

“真的。”

“好好的头皮上烧八个洞,那不疼死啦?”

“咬咬牙。舅舅说这是当和尚的一大关,总要过的。”

“不受戒不行吗?”

“不受戒的是野和尚。”

“受了戒有啥好处？”

“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

“什么叫‘挂褡’？”

“就是在庙里住。有斋就吃。”

“不把钱？”

“不把钱。有法事，还得先尽外来的师父。”

“怪不得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凭头上这几个戒疤？”

“还要有一份戒牒。”

“闹半天，受戒就是领一张和尚的合格文凭呀！”

“就是！”

“我划船送你去。”

“好。”

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

善因寺是全县第一大庙，在东门外，面临一条水很深的护城河，三面都是大树，寺在树林子里，远处只能隐隐约约看到一点金碧辉煌的屋顶，不知道有多大。树上到处挂着“谨防恶犬”的牌子。这寺里的狗出名地厉害。平常不大有人进去。放戒期间，任人游看，恶狗都锁起来了。

好大一座庙！庙门的门槛比小英子的肘膝都高。迎门矗着两块大牌，一边一块，一块写着斗大两个字：“放戒”，一块是：“禁止喧哗”。这庙里果然是气象庄严，到了这里谁也不敢大声咳嗽。明海自去报名办事，小英子就到处看看。好家伙，这哼哈二将、四大天王，有三丈多高，都是簇新的，才装修了不久。天井有二亩地大，铺着青石，种着苍松翠柏。“大雄宝殿”，这才真是个“大殿”！一进去，凉飕飕的。到处都是金光耀眼。释迦牟尼佛坐在一个莲花座上，单是莲座，就比小英子还高。抬起头来也看不全他的脸，只看到一个微微闭着的嘴唇和胖墩墩的下巴。两边的两根大红蜡烛，一搂多粗。佛像前的大供桌上供着鲜花、绒花、绢花，还有珊瑚树、玉如意、整棵的大象牙。香炉里烧着檀香。小英子出了庙，闻着自己的衣服都是香的。挂了好些幡。这些幡不知是什么缎子的，那么厚重，绣的花真细。这么大口磬，里头能装五担水！这么大一个木鱼，有一头牛大，漆得通红的。她又去转转罗汉堂，爬到千佛楼上看了看。真有一千个小佛！她还跟着一些人去看了看藏经楼。藏经楼没有什么看头，都是经书！妈哟！逛了这么一圈，腿都酸了。小英子想起还要给家里打油，替姐姐配丝线，给娘买鞋面布，给自己买两个坠围裙飘带的银蝴蝶，给爹买旱烟，就出庙了。

等把事情办齐,晌午了。她又到庙里看了看,和尚正在吃粥。好大一个“膳堂”,坐得下八百个和尚。吃粥也有这样多讲究:正面法座上摆着两个锡胆瓶,里面插着红绒花,后面盘膝坐着一个穿了大红满金绣袈裟的和尚,手里拿了戒尺。这戒尺是要打人的。哪个和尚吃粥吃出了声音,他下来就是一戒尺。不过他并不真的打人,只是做个样子。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她看见明子也坐在里面,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就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

第四天一大清早小英子就去看明子。她知道明子受戒是第三天半夜,——烧戒疤是不许人看的。她知道要请老剃头师傅剃头,要剃得横摸顺摸都摸不出头发楂子,要不然一烧,就会“走”了戒,烧成了一片。她知道是用枣泥子先点在头皮上,然后用香头子点着。她知道烧了戒疤就喝一碗蘑菇汤,让它“发”,还不能躺下,要不停地走动,叫做“散戒”。这些都是明子告诉她的。明子是听舅舅说的。

她一看,和尚真在那里“散戒”,在城墙根底下的荒地里。一个一个,穿了新海青,光光的头皮上都有八个黑点子。——这黑疤掉了,才会露出白白的、圆圆的“戒疤”。和尚都笑嘻嘻的,好像很高兴。她一眼就看见了明子。隔着一条护城河,就喊他:

“明子!”

“小英子!”

“你受了戒啦?”

“受了。”

“疼吗?”

“疼。”

“现在还疼吗?”

“现在疼过去了。”

“你哪天回去?”

“后天。”

“上午? 下午?”

“下午。”

“我来接你!”

“好!”

.....

小英子把明海接上船。

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边插着一朵梔子花，——边插着一朵石榴花。她看见明子穿了新海青，里面露出短褂子的白领子，就说：“把你那外面的一件脱了，你不热呀！”

他们一人一把桨。小英子在中舱，明子扳艄，在船尾。

她一路问了明子很多话，好像一年没有看见了。

她问，烧戒疤的时候，有人哭吗？喊吗？

明子说，没有人哭。有个山东和尚骂人：

“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

她问善因寺的方丈石桥是相貌和声音都很出众吗？

“是的。”

“说他的方丈比小姐的绣房还讲究？”

“讲究。什么东西都是绣花的。”

“他屋里很香？”

“很香。他烧的是伽楠香，贵得很。”

“听说他会做诗，会画画，会写字？”

“会。庙里走廊两头的砖额上，都刻着他写的大字。”

“他是有个小老婆吗？”

“有一个。”

“才十几岁？”

“听说。”

“好看吗？”

“都说好看。”

“你没看见？”

“我怎么会看见？我关在庙里。”

明子告诉她，善因寺一个老和尚告诉他，寺里有意选他当沙弥尾，不过还没有定，要等主事的和尚商议。

“什么叫‘沙弥尾’？”

“放一堂戒，要选出一个沙弥头，一个沙弥尾。沙弥头要老成，要会念很多经。沙弥尾要年轻，聪明，相貌好。”

“当了沙弥尾跟别的和尚有什么不同？”

“沙弥头，沙弥尾，将来都能当方丈。现在的方丈退居了，就当。石桥原来就是沙弥尾。”

“你当沙弥尾吗？”

“还不一定哪。”

“你当方丈，管善因寺？管这么大一个庙？！”

“还早哪！”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支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

.....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 冯骥才

一

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它单调、乏味、简易，像根棍子！其实，它不过恢复最初的模样，你何以又别扭起来？

这是习惯吗？嘿，你可别小看了“习惯”！世界万事万物中，它无所不在。别看它不是必须恪守的法定规条，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不过，你也别埋怨给它死死捆着，有时你也会不知不觉地遵从它的规范。比如说：你敢在上级面前喧宾夺主地大声大气说话吗？你能在老者面前放肆地发表自己的主见吗？在合影时，你能叫名人站在一旁，你却大模大样站在中间放开笑颜？不能，当然不能。甭说这些，你娶老婆，敢娶一个比你年长十岁，比你块头大，或者比你高一头的吗？你先别拿空话餂火，眼前就有这么一对——

二

她比他高十七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们中间算做鹤立鸡群了；她丈夫只有一米五八，上大学时绰号“武大郎”。他和她的耳垂儿一般齐，看上去却好像差两头！

再说他俩的模样：这女人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像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五官还算勉强看得过去，却又小又平，好似浅浮雕；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瘪下去，活像一块硬挺挺的搓板。她的丈夫却像一根短粗的橡皮滚儿：饱满，结实，发亮；身上的一切——小腿啦，脚背啦，嘴巴啦，鼻头啦，手指肚

儿啦,好像都是些溜圆而有弹性的小肉球。他的皮肤柔细光滑,有如质地优良的薄皮子。过剩的油脂就在这皮肤下闪出光亮,充分的血液就从这皮肤里透出鲜美微红的血色。他的眼睛简直像一对电压充足的小灯泡。他妻子的眼睛可就像一对糊里糊涂的玻璃球儿了。两人在一起,没有谐调,只有对比。可是他俩还总在一起,形影不离。

有一次,他们邻居一家吃团圆饭时,这家的老爷子酒喝多了,乘兴把桌上的一个细长的空酒瓶和一罐矮墩墩的猪肉罐头摆在一起,问全家人:“你们猜这像嘛?”他不等别人猜破就公布谜底,“就是楼下那高女人和她的短爷们儿!”

全家人轰然大笑,一直笑到饭后闲谈时。

他俩究竟是怎么凑成一对的?

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大楼,楼里的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不过,有人爱把问号留在肚子里,有人忍不住要说出来罢了。多嘴多舌的人便议论纷纷,尤其是下雨天气,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矮男人去拾便是最方便了。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儿的婆娘们,就对着他俩这不相称的背影指指划划。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大人的无聊最能纵使孩子们的恶作剧。有些孩子一见到他俩就哄笑,叫喊着:“扁担长,板凳宽……”他俩闻如未闻,对孩子们的哄闹从不发火,也不搭理。可能为此,也就与大楼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冷淡的关系。少数不爱管闲事的人,上下班碰到他们时,最多也只是点点头,打一下招呼而已。这便使真正对他俩感兴趣的人,很难再多知道一些什么?比如,他俩的关系如何?为什么结合在一起?谁将就谁?没有正式答案,只有靠瞎猜了。

这是座旧式的公寓大楼,房间的间量很大,向阳而明亮,走道又宽又黑。楼外是个很大的院子,院门口有间小门房。门房里也住了一户,户主是个裁缝。裁缝为人老实;裁缝的老婆却是个精力充裕、走家串户、专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私事和隐秘。这大楼里家家的夫妻关系、姑嫂纠纷、做事勤懒、工资多少,她都一清二楚。凡她没弄清楚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这种求知欲能使愚顽成才。她这方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甭说察言观色,能窥见人们藏在心里的念头;单靠嗅觉,就能知道谁家常吃肉,由此推算出这家的收入状况。不知为什么,六十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使得他们的能力、兴趣和对别人的干涉欲望合法化并得到发挥。看来,造物者真的不会荒废每一个人才的

尽管裁缝老婆能耐,她却无法获知这对天天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怪夫妻结合的缘由。这使她很苦恼。好像她的才干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她凭着经验,苦苦琢磨,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

否则谁也不会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她的根据很可靠：这对夫妻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呢！于是团结大楼的人都相信裁缝老婆这一聪明的判断。

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它打败了裁缝老婆！高女人怀孕了。人们的眼睛不断地瞥向高女人渐渐凸出来的肚子。这肚子由于离地较高而十分明显。不管人们惊奇也好，质疑也好，困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堕地了。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出门，高女人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然不减当初。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依旧都有，但从这对夫妻身上却得不到印证。这些说法就像没处着落的鸟儿，啪啪地满天飞。裁缝老婆说：“这两人准有见不得人的事。要不他们怎么不肯接近别人？身上有脓早晚得冒出来，走着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缝老婆听见了高女人家里发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她赶忙以收大院扫地费为借口，去敲高女人家的门。她料定长久潜藏在这对夫妻间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她要亲眼看见这对夫妻怎样反目，捕捉到最生动的细节。门开了，高女人笑吟吟迎上来，矮丈夫在屋里也是笑容满面，地上一只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缝老婆只看到这些。她匆匆收了扫地费出来后，半天也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碎碟子，没有吵架，反而像什么开心事一般快活。怪事！

后来，裁缝老婆做了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她在协助户籍警察挨家查对户口时，终于找到了多年来经常叫她费心的问题答案。一个确凿可信、无法推翻的答案。原来这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资达一百八十元之多！高女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出生在一个辛苦而赚钱又少的邮递员家庭。不然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比自己矮一头的男人？为了地位，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对！她立即把这珍贵情况，告诉给团结大楼里闲得难受的婆娘们。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把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于是，裁缝老婆的话被大家确信无疑。多年来留在人们心里的谜，一下子被打开了。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矮男人是个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个见钱眼开、命好有福的穷娘们儿。当人们谈到这个模样像匹大洋马、却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时，语调中往往带一股气。尤其是裁缝老婆。

三

人，命运的好坏不能看一时，可得走着瞧。

一九六六年，团结大楼就像缩小了的世界，灾难降世，各有祸福，楼里的所

有居民都到了“转运”时机。生活处处都是巨变和急变。矮男人是总工程师,迎头遭到横祸,家被抄,家具被搬得一空,人挨过斗,关进牛棚。祸事并不因此了结,有人说他多年来,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家把研究成果偷偷写成书,打算逃出国,投奔一个有钱的远亲。把国家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那时,世道狂乱,人人失去常态,宁肯无知,宁愿心狠,还有许多出奇的妄想,恨不得从身旁发现到希特勒。研究所的人们便死死缠住总工程师不放,吓他、揍他、施加各种压力,同时还逼迫高女人交出那部谁也没见过的书稿,但没效果。有人出主意,把他俩弄到团结大楼的院里开一次批斗大会;谁都怕在亲友熟人面前丢丑,这也是一种压力。当各种压力都使过而无效时,这种做法,不妨试试,说不定发生作用。

那天,团结大楼有史以来这样热闹。

下午研究所就来了一群人,在当院两棵树中间用粗麻绳扯了一道横标,写着有那矮子的姓名,上边打个叉;院内外贴满口气咄咄逼人的大小标语,并在院墙上用十八张纸公布了这矮子的“罪状”。会议计划在晚饭后召开,研究所还派来一位电工,在当院拉了电线,装上四个五百烛光的大灯泡。此时的裁缝老婆已经由街道代表升任为治保主任,很有些权势,志得意满,人也胖多了。这天可把她忙得够戗,她带领楼里几个婆娘,忙里忙外,帮着刷标语,又给研究所的革命者们斟茶倒水,装灯用电还是从她家拉出来的呢!真像她家办喜事一样!

晚饭后,大楼里的居民都给裁缝老婆召集到院里来了。四盏大灯亮起来,把大院照得像夜间球场一般雪亮。许许多多人影,好似放大了数十倍,投射在楼墙上。这人影都是肃然不动的,连孩子们也不敢随便活动。裁缝老婆带着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红袖章,这袖章在当时是最威风的了。她们守在门口,不准外人进来。不一会儿,化工研究所一大群人,也戴着袖章,押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着口号,浩浩荡荡来了。矮男人胸前挂一块牌子,高女人没挂。他俩一直给押到台前,并排低头站好。裁缝老婆跑上来说:“这家伙太矮,后边的革命群众瞧不见。我给他想点办法!”说着,带着一股冲劲扭着肩上的两块肉,从家里抱来一个肥皂箱子,倒扣过来,叫矮男人站上去。这样一来,他才与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对这对大难临头的夫妻不成比例的身高发生兴趣了。

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施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尖声叫,粗声吼,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些颇攻心计的人,想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地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虎头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着高女人问:

“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神情。

“好啊!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没钱,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根底的。

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好像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气!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你心里是怎么回事,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还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点。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

“他总共给你多少钱?他给你买过什么?说!”

“你一月二百块钱不嫌够,还想出国,美的你!”

“邓拓是不是你们的后台?”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会开得成功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了一连串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掀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待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住在大院门房的

裁缝家虽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了院门,向西走过了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轻敲几下门板。裁缝老婆躲在街这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像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人,自己反而比要捉的人更紧张。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

“完事了?”

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

“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

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儿俩的脚步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快快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院里没人敢和她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四

矮男人自批判会那天被押走后,一直没放回来。此后据消息灵通的裁缝老婆说,矮男人又出了什么问题,进了监狱。高女人成了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自然不配住在团结大楼内那种宽敞的房间,被强迫和裁缝老婆家调换了住房。她搬到离楼十几米远孤零零的小屋去住。倒也不错,省得经常和楼里的住户打头碰面,互相不敢搭理,都挺尴尬。但整座楼的人们都能透过窗子,看见那孤单的小屋和她孤单单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才接回家住几天。她默默过着寂寞又沉重的日子,不过三十多岁,从容貌看上去很难说她还年轻。裁缝老婆下了断语:

“我看这娘们儿最多再等上一年。那矮子再不出来,她就得改嫁。要是我啊——现在就离婚改嫁,等那矮子干吗,就是放出来,人不是人,钱也都没了!”

过了一年,矮男人还是没放出来,高女人依旧不声不响地生活。上班下班,走进走出,生着炉子,就提一个挺大的黄色的破草篮去买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但有一天,矮男人重新出现了。这是秋后时节,他穿得单薄,剃了短平头,人大变了样子,浑身好似小了一圈儿,皮肤也褪去了光泽和血色。他回来径直奔楼里自家的门,却被新户主、老实巴交的裁缝送到门房前。高女人蹲在门口劈木柴,一听到他的招呼,刷地站起身,直怔怔看着他。两年未见的夫妻,

都给对方的明显变化惊呆了。一个枯槁,一个憔悴;一个显得更高,一个显得更矮。两人互相看了一忽儿,赶紧掉过头去,高女人扭身跑进屋去,半天没出来;他蹲在地上拾起斧头劈木柴,直把两大筐木块都劈成细木条。仿佛他俩再面对片刻就要爆发出什么强烈而受不了的事情来。此后,他俩又是形影不离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切如旧。大楼里的人们从他俩身上找不出任何异样,兴趣也就渐渐减少。无论有没有他俩,都与别人无关。

一天早上,高女人出了什么事。只见矮男人惊慌失措从家里跑出去。不一会儿,来了一辆救护车把高女人拉走。一连好些天,那门房总是没人,夜间灯也闭着。二十多天后,矮男人和一个陌生人抬一副担架回来,高女人躺在担架上,走进小门房。从此高女人便没有出屋。矮男人照例上班,傍晚回来总是急急忙忙生上炉子,就提着草篮去买菜。这草篮就是一两年前高女人天天使用的那个。如今提在他手里便显得太大,底儿快蹭地了。

转年天气回暖时,高女人出屋了。她久久没见阳光的脸,白得像刷一层粉那样难看。刚刚立起的身子左倒西歪。她右手拄一根竹棍,左胳膊弯在胸前,左腿僵直,迈步困难,一看即知,她的病是脑血栓。从这天起,矮男人每天清早和傍晚都搀扶着高女人在当院溜两圈。他俩走得艰难缓慢。矮男人两只手用力端着老婆打弯的胳膊。他太矮了,抬她的手臂时,必须向上耸起自己的双肩。他很吃力,但他却掏出笑容,为了给妻子以鼓励。高女人抬不起左脚,他就用一根麻绳,套在高女人的左脚上,绳子的另一端拿在手里。高女人每要抬起左脚,他就使劲向上一提绳子。这情景奇异,可怜,又颇为壮观,使团结大楼的人们看了,不由得受到感动。这些人再与他俩打头碰面时,情不自禁地向他俩主动而友善地点头了……

五

高女人没有更多的福气,在矮小而挚爱她的丈夫身边久留。死神和生活一样无情。生活打垮了她,死神拖走了她。现在只留下矮男人了。

偏偏在高女人离去后,幸运才重新来吻矮男人的脑门儿。他被落实了政策,抄走的东西发还给他了,扣掉的工资补发给他了。只剩下被裁缝老婆占去的房子还没调换回来。团结大楼里又有人眼盯着他,等着瞧他生活中的新闻。据说研究所不少人都来帮助他续弦,他都谢绝了。裁缝老婆说:

“他想要什么样的,我知道。你们瞧我的!”

裁缝老婆度过了她的极盛时代,如今变得谦和多了。权力从身上摘去,笑容就得挂在脸上。她怀里揣一张漂亮又年轻的女人照片,去到门房找矮男人。照片

上这女人是她的亲侄女。

她坐在矮男人家里，一边四下打量屋里的家具物件，一边向这矮小的阔佬提亲。她笑容满面，正说得来劲，忽然发现矮男人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在他背后挂着当年与高女人的结婚照片；裁缝老婆没敢掏出侄女的照片，就自动告退了。

几年过去，至今矮男人还是单身鳏居，只在周日，从外边把孩子接回来，与他为伴。大楼里的人们看着他矮墩墩而孤寂的身影，想到他十多年来一桩桩事，渐渐好像悟到他坚持这种独身生活的缘故……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像有长长一大块空间，空空的，世界上任什么东西也填补不上。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 梁晓声

—

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覆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暗褐色的凝滞的水面,呈现着虚伪的平静。水面下淤泥的深渊,沤烂了熊的骨骼、猎人的枪、垦荒队的拖拉机……它在百里之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们叫它“鬼沼”。

我到北大荒后,听了许多关于“鬼沼”的传说: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深夜,荒原在静谧的黑暗中沉睡的时候,可以看见那里有绿莹莹的忽闪的“鬼火”飘动,可以听到当年被“鬼沼”吞陷的熊的巨吼、猎人求救的枪声和其他不幸遇难者们绝望悲惨的哀呼……还可以听到一种怪异的鸟叫声,那声音仿佛一个女人在凄凉地哭号着:“多可怜、多可怜……”然而谁也没有见过这种鸟什么样子。鄂伦春人把这种鸟叫做“收魂鸟”,说它们是大地之神变化的精灵,在深夜招收并抚慰那些丧命于“鬼沼”的人和动物的幽魂。“鬼火”是它们打的灯笼。

“鬼沼”像希腊神话传说中令人恐怖的九头恶龙,霸占着它身后的万顷沃土一马平川,只要春天播下种子,秋天便能收回千万吨粮食。然而没有人敢涉过“鬼沼”,去播下一粒种子。据说当年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对那片沃土发生了兴趣,幻想在那里创建个农场,将来做个大农场主,曾亲自率领一个勘察小队在冬季越过了“鬼沼”。他们如泥牛入海,一去未返。北大荒的老人们,有说他们被狼群吃掉了的,有说他们被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冻死了的,有说他们给养不足饿死了的,有说他们被鄂伦春部落消灭了的,也有的说他们春天回返时,连人带车陷没在沼底……鄂伦春人把那万顷沃土叫做“满盖荒原”。“满盖”是鄂伦春语魔王的意思。冬季他们偶尔也出现在那荒原上,但绝不猎杀那里任何一只动物,惧怕受到“满盖”的惩罚。

恐怖的“鬼沼”！神秘的“满盖荒原”！

我到北大荒的第三年冬季，我们连队由十几个知识青年组成了一支垦荒先遣小队，向那里进发了！

我们这个连队，由于当初选点错误，耕地有限，低洼，麦收时一碰上雨季，收割机就陷在麦地里，像一只只瘫痪的大蛤蟆，无法作业。因此，连年歉收。那一年更惨，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团里决定解散我们这个连队。全连二百多朝夕相处的知识青年，将被分插到各个兄弟连队去。这意味着，我们不但不能向国家贡献粮食，而且也养活不了自己了！我们刚到北大荒三年呀！许多人还要在战天斗地中大有作为呢！屯垦戍边的信念还没有动摇呢！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热情还没有泯灭呢！

还有什么能比团里这个决定更令我们感到耻辱？！许多人听老连长羞惭地宣布了决定后，当场哭了。副指导员李晓燕，首先站起来激烈地坚决地反对接受这个耻辱的“解散令”。

她说：“连队绝不能解散！我们可以去开垦‘满盖荒原’！我们离它最近，早就应该想到开垦它了！我们要把连队重新建设在那里！要在‘满盖荒原’上留下第一行垦荒者的足迹！要向团里提出保证，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第二年建新点！我们立军令状！”

我们听惯了甚至听厌了副指导员在任何场面说出的豪言壮语。可她说出的这番话，是怎样地激动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啊！我觉得那是她说出的最豪迈最有力量的话！许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团里收回了已经下达的决定，接受了我们的军令状。

几天之后，我们连队的两台最新的五十四马力的拖拉机，披红戴花，拽着赶制的木爬犁，在全连人的列队送行下，驶向茫茫雪原。

希望、信赖、寄托、无言的叮嘱，从一双双默默注视着我们的眼睛里表达出来。我们每一个垦荒队员都从这些眼睛里体验到了责任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哭了。

哦！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们是多么珍重责任感啊！

我们是多么容易激动和被感动啊！

第一辆爬犁装载着粮食和行李。第二辆爬犁上搭着帐篷。我们十几个垦荒队员，一个紧挨一个地挤在帐篷里。我坐在扣着的破脸盆上，用膝盖夹着一本翻开的《虹南作战史》。我猜想，它是我们这一行人唯一的精神食粮。不过我并不靠它充塞头脑和思想。我两眼注视着书页上的铅字，却在回忆我所读过的《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悲惨世界》、《红与黑》……内心深处被书中人物的

命运暗暗感动。

身旁坐着我妹妹,她怀里抱着一个柳条编的小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只小松鼠。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像个哑巴。她的脸色那么苍白,表情那么呆滞,眼神那么凄凉!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姐,就只有这一个妹妹。我从小爱她,可是我当时可怜她又恨她,不久前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令我丢尽了脸。

对面坐着副指导员李晓燕,身旁坐着铁匠王志刚。他黑,健壮魁梧,有一张线条粗犷的脸,给人一种意志坚定、力大无穷的堂堂男子汉的印象。他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奥赛罗,因此获得了一个“摩尔人”的绰号。他性格孤僻,为人正直,敢于主持公道,不喜欢出风头,但一言一行都在知青中具有潜在的影响力。我嫉妒他在我们知青中那种无形的任何人不能匹敌的威信。他暗暗爱着我们的副指导员李晓燕。这一点许多男知青都知道,他自己也在大宿舍里公开承认过。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在这一点上开他一句玩笑。我钦佩他公开承认爱情的勇气和惊人的坦率。从那天起,我把他看成了我的对头。因为我也暗暗地爱着我们的副指导员。他参加到我们这支垦荒队,是副指导员指名道姓点的将。这尤其使我嫉妒极了!而更加使我嫉妒的是,李晓燕此刻竟将头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似睡非睡地打盹!

我瞧着她,心中不禁又一次暗问自己:我为什么会爱她?她身上究竟具有什么吸引我的魅力?是因为她美吗?不错,她美。她是个上海姑娘,有一张清秀妩媚的脸,脸上的皮肤白净,五官俊俏,一双眼睛很大,很明亮。眉毛又细又长,和眼睛之间的距离略宽了些,这就使她的脸上永远呈现了一种扬眉凝睇,惊诧不已的表情。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再也不能不注意她。她太自然地使我联想到了意大利画家包尔第尼杰作《玛尔波公爵夫人肖像》。我甚至不能判断究竟是那幅肖像更酷似她,还是她更酷似那幅肖像。她的身材也很优美,修长,苗条,亭亭玉立。据说她是上海芭蕾舞学校小班的尖子学员,许多部队文艺团和地方文艺单位争着招收过她,她都拒绝了,却自愿报名来到北大荒。我见过、接触过、结识过的容貌美丽的姑娘,绝不仅只她一个。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姑娘们的外表美所迷惑、所倾倒、所动心的人。越是在美丽的姑娘们面前,我越会表现出一种孤傲的清高来。我的座右铭是:绝不轻率地做爱情的俘虏。那么,是不是她那严肃庄重的性格引起了我的好感呢?也不。我更喜欢性格热情爽朗的姑娘,我甚至认为她那种严肃和庄重是做作的虚伪的,我曾因此而极端地轻蔑过她。她一到北大荒就立下了誓言,为了自觉考验自己扎根边疆的坚定性,三年之内不探亲。她对全连女青年提出倡议:不照镜子、不抹香脂、不穿花衣服。她的倡议得到了一致的响应,是否真诚,大可怀疑。据女青年们透露,她经常深为自己的脸那么白嫩而苦恼,夏天里,曾偷偷地跑到小河边,独自躺在僻静的河滩曝晒过,但却只能

使她的脸色白里透红,而不能进一步红里透黑。因此她故意在穿着方面比所有的姑娘更男性化,以弥补在“晒黑了皮肤才能炼红了心”这一“接受再教育”标准上的先天不足。她还有意干和男青年们同样劳累的活,想使自己的体形改造得更符合“劳动者的美”。遗憾的是成效甚微,三年来虽然健壮了些,还是那么修长、那么苗条、那么亭亭玉立,像一株挺拔的小白桦。她果真三年没有探家。第一年里她当上了排长,第二年里她入了党,第三年里她当上了我们的副指导员,成了全团知识青年扎根边疆的光荣榜样。

就在第三年的夏季,团里任命她为副指导员不久后的一天傍晚,我支着自制的简易画夹在河边写生,忽然听到小河上游有人在轻轻地唱歌: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嗨哟,
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小河旁

.....

这首歌当时是列入“黄色歌曲”一类,绝对禁止唱的。是哪一个姑娘在唱呢?她也太忘情太大意了!如果让我们的副指导员听到,少不了又要开展一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斗争”。然而她唱得多好听啊!嗓音那么甜、那么圆润、那么婉转。我完全是出于好奇心,收起画夹,悄悄地顺着河沿朝上游寻声觅去。在一株歪脖子老柳树下,在一丛蒿草的掩蔽处,隔着小河我瞧见了唱歌的姑娘,竟是我们副指导员!她坐在河边一块光滑的大青石上,两只赤脚探入水中,裤筒卷在膝盖以上,裸露着一段洁白的小腿。她正在洗衣服,那好听的甜而圆润的歌声,就是她一边洗衣服一边唱出来的: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嗨哟,
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

我,痴痴地隔岸望着她,完全呆住了。

她三搓两揉,一淘一漂,洗完了最后一件衣服,拧干,从大青石上站起身,踏上河岸,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走过一片鹅卵石,将衣服晾在灌木枝丫上。由于她怕卵石硌脚,因此她的脚抬得高,放得轻,步子很碎,使她小心翼翼地走的那几步路,很像芭蕾舞《天鹅湖》里的一段小天鹅舞。她晾好衣服,又以那样的步子走回河边。她随手在河边摘了几朵野花,闻了闻,欣赏地玩弄了一会儿,左三朵右二朵,插进鬓发里了。她蹲下身去,久久地注视着水面。她在欣赏她自己!她在

欣赏她的美！她对她自己欣赏了那么久才缓缓地直起身。忽然，她轻盈地跃到那块光滑平坦的大青石上，伸展双臂，优美地旋转了半圈，竟跳起节奏欢快热情而急促的墨西哥民间舞来！

画夹从我手中脱落，掉进河里，顺水漂流！画夹落水发出的轻微声响，令她倏然停止了舞蹈，警觉地朝对岸看来，发现了我，便顿时僵立在大青石上。那姿态像一头疑惑的小鹿，又像一只受惊欲飞的仙鹤。

隔着小河，她望着我，我望着她。

我们都呆愣住了。

我首先恢复了常态，跳到河里，把我的画夹抢救到手，涉着浅浅的河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蹚到了对岸。这时，她插在鬓发里的几朵野花已经不见了，卷起的裤筒也放了下来。

“你，你到河边干什么来了？”她主动问我，分明想在心理上先发制人，显出非常自然的样子，竭力掩饰着窘态，竭力保持一个庄重的姑娘在小伙子面前的矜持，竭力保持一个副指导员的尊严。然而，她却来不及扣上她那件洗白了的兵团服的衣扣，敞露出了短小而紧束的浅粉色的衬衣。那是一件鸡心领的质地很薄的衬衣。我无意地瞥见了她那雪白的颈子，雪白的一部分前胸和同样雪白而浑圆的肩膀，瞥见了她那在紧束的衬衣下高耸的双乳的优美轮廓。我迅速地移开了目光。在那一瞬间我的心怦怦跳动，脸一阵火热，我竟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可耻的罪过感，我竟觉得我亵渎了她、也亵渎了我自己。虽然我可以对天发誓，那一瞬，我心里绝没有萌发一点点邪念，哪怕是一个小伙子对于一个动人的姑娘那种可以原谅的倏忽间的本能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对夏娃也曾萌发过的。

她太敏感了！我的目光仅仅从她身上一掠而过，她就像接受了电子讯号的仪器，立刻下意识地用两只手掩上了衣襟，并且马上转过身去。当她再转过身来的时候，站在我面前的，又是我所熟悉的一位副指导员了。她连外衣的领钩都勾上了，只不过还赤着一双脚。就连这双赤脚，她也在使劲踩陷到河边的泥沙里去，用泥沙掩埋住。

她这些接连的举动，令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

我想找一句话打破这尴尬的局面，但说出口的却是一句愚蠢之极的话：“你……太美了！”

“什么？……”她的脸红得像一朵彤云。由于我的意外出现，使她从刚才那种自我陶醉的忘情境界之中，陷入眼前这种无法掩饰的窘迫地步，我顿感内疚，也从内心深处对她可怜起来。

“我……我是说，你刚才跳的那段舞，真美极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那该是

一段墨西哥的民间舞吧？”

“跳墨西哥舞？我？！别开玩笑了我不过是做了一套中学生广播体操！”她伪装出一种迷惑的模样，用那么严肃那么认真的口气加以解释。

“这么说，你也要否认你刚才唱过歌啦？”

“唱歌？我刚才才是唱过歌的。这有什么必要否认哪？”她脸上的表情，在伪装的迷惑之外，又增添了伪装的坦率。

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
大寨就在那个山那边

.....

她又唱了两句，说：“我刚才就是唱这支歌，怎么，你听到了？……”

这时，她脸上的绯红已消失，神态也变得自然了。

我感到她简直是在把我当成一个瞎子一个聋子加以公然的愚弄！

我愠怒了，冷冷地说：“不！我听到你唱的不是这支歌！你唱的是‘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

“十八岁的哥哥？什么小英莲？你别瞎说！我听都没有听到过这支歌！”她那两条又细又长的眉毛扬了起来，使她本来有一种诧异表情的脸，显出不但诧异而且惊愕的表情来。仿佛我当面说她是一个贼！

这么富有魅力的动人的一张脸，几次虚伪的变化的表情就浮现在这张脸上。

我惊怪地凝视着这张脸，在她面前僵立了。我对她再也无话可说。她在我眼中仿佛是埃及的狮身人面怪物斯芬克司(Sphinx)，斯芬克司也要比她坦白！因为斯芬克司对所有的人都说同一句话：“猜不中我的谜，我将吃掉你！”斯芬克司也要比她知道羞耻！因为斯芬克司被俄狄浦斯猜中了谜语后，毕竟从巍峨的岩石上跳下去摔死了！

而她，竟要使一个神经正常的人相信自己大白天活见鬼！

我几乎是恶狠狠地对她说出这两个字：“虚伪！”

我猛转身，怀着对她似乎永远也无法消除的鄙视，悻悻地大步走了。

“等等！”她叫住了我。

我站下，并没有转过身，但却想象得出她是怎样慌张急促地追到了我身后，也感觉到了她那惴惴不安的呼吸。

“你，你要汇报给连里知道吗？……”她讷讷的语调中，带着难于明言的苦苦哀求。

我心软了,背对着她,摇摇头。我走出很远,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一下。她,她仍站在小河边,像一尊石雕,一动也不动……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我还不至于那么卑劣!

从那以后,过每一次团组织生活,当她诲人不倦地对我们进行种种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时,一接触我的目光,语调和神态就不自然起来……

这倒使我觉得有些对不住她了。

不久,我收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连里没有批假,理由很简单——正值夏收季节,我是康拜因手。其实我知道,主要的原因是,连长不相信这封电报的真实性。某些想父母想得厉害的知识青年或者他们的父母,曾用父母病重、病危,甚至病故之类的电报,使我们的连长上了好几次当。连长是个典型的经验主义者,对这样的人,解释和哀求都是没有用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但我却不能对这封电报无动于衷。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是街道小五七厂的工人。她在困苦的生活中把我和妹妹拉扯大是多么不容易!谁也不能比我更体谅她为我们兄妹操碎了的那颗心。如今我和妹妹都来到了北大荒,将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撇在了家里。她是个刚强的女人,无论多么想念我和妹妹,她都不会采取欺骗手段的……

我必须立刻回到母亲身边!

我在当天就悄悄地离开了连队……

啊!我的母亲!这一辈子受尽了生活的辛酸磨难的女人!她太刚强太爱她的孩子了!她明明已经病得奄奄待毙,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了,却只给她的儿子拍了一封“病重”的电报,她怕“病危”这样严峻的字眼儿会惊吓她的孩子。

母亲活在人世的最后五天,我给予了她老人家一个儿子所能给予的最大限度的爱和孝心,也代替我的妹妹,报答她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并抚养成人的恩情。

五天,短短的五天啊!无论我在这五天内给予她老人家多少爱多少孝心,那也只能仅仅算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象征性的报答啊!而这种报答却成了永恒的抵消!

母亲死前给我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好你妹妹!她就你一个亲人了!”

我带着一颗悲哀得麻木的心回到了连队。

回去当天,团支部按照连长的指示,讨论给我这个“逃跑主义者”以什么样的处分。事先有人向我透露,要拿我当典型,杀鸡给猴看;处分早已确定——开除团籍。讨论不过是走个组织形式。

而我,却根本对任何处分都无所谓了。

副指导员主持讨论。我想,她这下子该称心如意了!可以堂而皇之地对我实

行报复了。我准备一言不发地听她大发一通议论，一言不发地接受她对我的批判。

她让我先谈谈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

我，谁都不看，只漠然地喃喃说了一句：“我母亲……死了……三天前……”说完这句话，便低下头，用双手捂住了脸。我凭感觉肯定，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一下子投注到了我身上。

刹那间，似乎每一个在场的人都停止了呼吸，宁静得令人窒息，好像空气都凝固了！许久许久，我听到副指导员用极其低微的刚刚能使人听到的声音说了两个字：“散会……”

她第一个起身离开了。

当我迈动机械的步子经过连部时，听到里面传出了副指导员和连长激烈的争吵声，她对连长的“指示”从来是奉若神明的，我不禁停下了脚步。

“我是一连之长，难道没有处分一个战士的权力？！”是连长恼怒的四川口音。

“我是团支部书记，如何处分一个犯了错误的团员，这是团组织的权力！”副指导员的声音也那么激动。

“你这样做，是袒护一个逃兵！”

“逃兵？他是从战场上逃跑的吗？他逃到黑龙江对岸去了吗？你知道吗？他母亲已经死了！他在母亲死后第二天就回到了连队！……”

“哦！死了？……”

“连长！我也是一个知识青年，我也有老父老母，他们日夜思念我，我也日夜思念他们。要不是我受自己誓言的约束，我也想立刻就回到父母身边去，但……我不能够！我不同意开除他的团籍！连长！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

我听到了她的哭声。

我站在连部外面，顿时泪如泉涌！

我心里对她充满了感激！不是因为她替我辩护，而是因为她说的这句话：“我也是一个知识青年……”

这一句话，完全消除了在此之前我对她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凭这一句话，就足以令我心甘情愿地去为她赴汤蹈火。

这句话，使我看到了一个姑娘高尚的本性！一颗富有同情的心！然而，又是她，亲口告诉了我一件如雷轰顶的事，在两天后……

“我们一块儿走好吗？”

收工之前，她接着我锄完了最后一条漫长的田垄。当我们锄碰锄的时候，她对我说了上面那句话。这是三年来她第二次主动跟我说话。第一次，就是不久前

在那条小河边。她脸上阴沉的严峻的表情,令我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所有的人都扛着锄头列队时,她又当众大声对我说了句:“你留一步,我们一块儿走!”男女青年,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也看着我。

当他们走远,她盯着我说:“我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把你妹妹调到我们连队来了。”

“啊!她……她怎么了?快告诉我!”

“在你回家期间,她……”

“说!”

“她做了一次人工流产……”

我的身子摇晃了一下,险些栽倒!

她上前一步,双手扶住了我。

我粗暴地推开她,大吼:“你胡说!”

她踉跄着倒退一步,恐惧地瞧着我,从颤抖的嘴唇间挤出两个可怕的字:“真的。”

我觉得自己朝脚下的土地陷了进去!我想可怕地喊叫出什么,却似乎又有团东西堵住了喉咙!我张大了嘴,只发出一种嘶哑的类似呻吟的声音。我瞪大了眼睛怪异地看着她,她却在我眼前模糊起来

我突然发了疯似的朝连队飞跑……

那天夜里,当大宿舍响着此起彼伏的鼾声时,我将头蒙在被子里,咬着被角无声地哭了一夜。我想起了母亲弥留之际的叮嘱,而我还没有将母亲的死告知妹妹,她却做出了这种身败名裂的事,还有脸调到我所在的连队来,企图得到我的庇护,不!我要严惩她,以一个哥哥的权力!替死去的母亲!

第二天,我被副指导员叫到连部,在那里见到了妹妹。我当时一定是恶魔附体了!我像凶猛的豹子一样朝妹妹扑过去,双手抓住她的头发,使劲把她的头接连地朝土墙上撞、撞、撞……

“住手!”我听到副指导员变了调的嗓音喝止,冲上前来掰我的手。

我对她大吼:“滚开!”

我折磨的是妹妹,但又像是我自己,我在这种歇斯底里的发作中感到了一种痛快。

“啪!”我脸上挨了一记狠狠的耳光。

我终于松开了手

第二记耳光比第一记耳光更狠。

这两记耳光顿时把我打清醒了,我不禁倒退数步,下意识地摸着火辣辣的脸颊。

妹妹,从始至终,一声没有吭,没有呻吟,没有叫喊,没有哀求。被我抓得凌乱的头发,遮掩了她那张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那张泪水涟涟的脸,那忍辱吞声的深陷在眼窝中的大眼睛。

副指导员的脸色像妹妹的脸色一样苍白,她紧紧地把妹妹搂在怀里,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欲以命相搏地瞪着我。

“畜生!”

这是我第一次从她口中听到的一句骂人话。

从那一天起,我爱上了她……

她现在就坐在我对面。搭着帐篷的爬犁,被疲倦的铁牛拖着,在茫茫雪原上挺进……篷帘卷着,灌进来被西北风扬起的雪粉,我们冻得缩手缩脚,但谁也不想把帐篷帘放下来。从帐篷口望出去,始终是白色……白色的大地,白色的山峦,白色的河,白色的林。“大烟泡刮起来了”,如万千头发发了疯的野牛齐头奔突,示威地追逐在大爬犁后面。

副指导员默默环视着每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谁来讲个故事?要不就大家一块儿唱支歌!”

没有谁对她的提议做出任何反应。大家疲劳了。

副指导员把目光停在我脸上。

我清了一下嗓子,唱起了《兵团战士之歌》: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
一手拿枪,一手拿镐
……………

没有一个人随声附和,我只得唱了开头两句,便知趣地打住了。

这时,“摩尔人”王志刚吹起了口哨。他唱歌不行,口哨却吹得相当好。令我暗吃一惊的是,他吹的竟是著名的俄罗斯民歌《三套马车》,这个“摩尔人”!简直不把副指导员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可他那口哨声真令人着迷,像黑管,又像小号,拍节、曲调吹得准确无误,流露出淡淡的感伤和深沉的忧郁。

不知是谁,竟低声和着口哨唱了起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终于,非常自然地形成了小合唱。

我的妹妹抬起头,瞪大了黑眼睛,愕然的目光不安地瞧瞧这个,瞅瞅那个,又很快地垂下了头。她暗暗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使我的心灵惻然一动。

我,面对面地注视着副指导员,猜想她立刻就会严肃地加以制止了!

她,却无动于衷。头,仍靠在“摩尔人”肩上。

她竟闭上了眼睛,装出睡意蒙眬的样子。我发现,她放在腿侧的手,分明在偷偷点着拍子!

我的自尊心被刺伤了,紧紧地咬住了嘴唇。

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唱歌的是那……

夜幕悄悄降临了,暴虐的“大烟泡”不知是自甘屈服,还是被全速挺进的拖拉机远远甩到了后面,荒原那么沉静!

黑暗完全替我们垂下了篷帘……

二

我们的拖拉机像远迁的鄂伦春部落,在茫茫的雪原上奔驰了整整两天两夜。当我们打开地图,一致确信拖拉机履带已经碾在积雪覆盖的“鬼沼”的冰面上时,正是荒原庄严而肃穆的黎明时分。

啊!“鬼沼”!它并非像传说中那么恐怖,也许因为它处在冬眠状态,雪被罩住了它那狰狞的真实面目吧。我们看到了什么?仿佛看到了世界最大的湖泊被冻结在眼前,“满盖荒原”——它平坦得令我们这批垦荒者难以置信,直铺到遥远的地平线。

“魔王!你在哪里?你出来!”我们的一个伙伴大声呼喊。

“魔王”没有出现。

铁匠王志刚突然朝不远处一指:“你们看!”——一根从正中间劈开的圆木桩钉进土地,倾斜地立在那里。

我们都好奇地走了过去。副指导员拂掉木桩上的雪,我们看到了一块木碑,累累斧痕粗糙砍平的劈面上,刀刻的字迹被风雨所侵蚀,只能依稀认出“死于此……”三个歪扭的字。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当时都和我一样,倒吸了一口冷气。

“那里,还有一个!”我的妹妹又发现了同样的不祥之物,她第一个朝拖拉机退去。

副指导员低声说:“我们走吧,别搅扰他们安息了。”

.....

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北大荒感到最艰苦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垦荒。”

如果有人问我：“你在北大荒感到最自豪的是什么？”

我的回答还是：“垦荒。”

为了寻找有水源有林子的理想地点，我们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满盖荒原”。我们发现了一条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的小河，它是“满盖荒原”上唯一洁净的水源，被我们命名为“流浪者”。我们发现它之前，它像流浪汉在荒原上不知徘徊了多少岁月，现在我们在它身边扎下了帐篷。

当冰雪消融的时候，当“流浪者”唱起了《拉兹之歌》的时候，我们闪亮的犁头劈进了“满盖荒原”的胸膛。若非垦荒者，谁能体会拖拉机翻起第一垄处女地时那种喜悦？这荒原上有那么多的狼，光天化日之下，它们三五成群，大模大样地尾随在我们的拖拉机后面，捕食被犁头翻出的肥大的土拨鼠。夜晚，它们就在我们的帐篷四周嗥叫。创业的艰苦，使垦荒队的每一个小伙子都变成了圣徒。副指导员跟我的妹妹，和我们同住在一顶帐篷里。一块毯子分隔开了她们的狭小天地，毯子后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巴黎圣母院”。

一天深夜，我从睡梦中偶然醒了一次，却没有听到拖拉机翻地的轰响。我一下子跳起，来不及多想，只穿着短裤，就闯进了“巴黎圣母院”，将副指导员从被窝里拽了起来。

“你！你要干什么？！”

“拖拉机不响了！‘摩尔人’在翻地！”

“啊！”副指导员顺手就操起了步枪。

拖拉机不响，意味着“摩尔人”出了事。所有的人都惊醒了！正当大家要奔出帐篷，“摩尔人”从外面钻了进来。马灯光下，我们见他身上背着一只狼，两手拽着狼的两只前爪，头顶住狼脖子；那只狼朝天张大着嘴，两只后腿抓在他的腰膀上。

“摩尔人”大声说：“快动手！它还活着！”

我们各自操家伙，棍棒齐下，将那只狼在他背上打死了，好大的一只白毛老苍狼！

“摩尔人”一下子坐在地铺上，喘息了半天，才说：“拴大犁的钢丝绳断了，我回来换钢丝绳，这东西跟上了我，出其不意地将两只前爪搭在我肩上……”他的脸上、手上尽是血痕，棉衣被撕成碎片。他拧着眉脱下棉衣，里面的绒衣和皮肉被狼的后爪抓得稀烂！

副指导员命令我的妹妹：“快，拿医药箱来！”

这时,我们才发现,她仅穿着衬衣衬裤,光着一双脚。她也意识到了什么,在我们的目光下一时显得不知所措。随即,她镇定了下来,从容地说:“都瞪着我干什么?没你们的事了,全睡觉去!”

大家都一个个顺从地钻进了被窝,我没有。我将马灯举在“摩尔人”头顶

副指导员第一次那么柔情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立刻从妹妹手中接过医药箱,替“摩尔人”小心翼翼地包扎伤处……

我妹妹是垦荒队员的“内务大臣”,给我们做饭、洗衣服。从连队带来的冻菜吃光了,任何一种野菜还都没有从荒原上生长出来。为了使我们能吃得稍微满足点,她对剩下的两袋面粉发挥了充分的创造性:馒头、发糕、花卷、烙饼;甜的、咸的、又甜又咸的、先蒸后烙的……

如果说我是因为副指导员而参加垦荒队的,妹妹则是因为我才来到“满盖荒原”上的,我是她唯一的亲人。我走到天边地角,她会追随我到天边地角。我那么凶狠地对待过她,她却依然在心理上对我希求着荫庇和保护。我表面上对她仍旧冰冷异常,可感情上早已彻底饶恕了她。

只有自己罪恶深重的人,才不肯饶恕别人

何况她是我的妹妹,唯一的妹妹!

我有责任保护她。无论在那件可耻的事情发生之后或者之前,我对她尽过一个哥哥的责任了吗?没有!到北大荒的第一天,当我们经过鹿场,她被鹿群迷住了,她请求我和她一块儿留在鹿场。只要我愿意,那是完全可以的,我却没有留在她身边。为什么?我不愿和妹妹在一个连队。我觉得她太娇气又太任性,同在一个连队会给我添无尽的麻烦。为洁身自好,我逃避一个哥哥的责任,而在她成为舆论和道德严厉谴责的对象后,我首先想到的又是她败坏了我的名声,因此我憎恨她,不肯给予她半点怜悯和同情……

在“满盖荒原”上无数个不眠之夜里,我内心进行着深刻的反省,我认识了自己的真实面目。我忏悔我是一个多么自私的哥哥,一个多么可鄙多么卑劣的人!

有一天,当帐篷里只有我和妹妹的时候,我叫了她一声:“小妹!”

她正在案板上揉面,听到我叫她,立刻抬起头。她怔怔地望着我,脸上浮现出无比激动的表情,一双黑眼睛里顿时充满了泪水。

“小妹,你还生我的气吗?”我轻轻走到她身边。

泪水,大颗大颗的泪水,慢慢从她的黑眼睛里淌出来,顺着她苍白的脸颊滴落到案板上,被她的双手一下一下地揉进了面团里。

“小妹!……”我的声音哽咽了。

她倏地转过身,扑在我身上,沾满面粉的双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头偎在我

怀里，放声大哭起来。

泪水从我眼中簌簌而落。

许久，她才止住了哭声。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妈妈的病好了吗？”

我的心像被捅了一刀！

哦，母亲！如果你在九泉之下听到了妹妹这句话，肯定也会老泪纵横的吧！

但愿你听不到这句话，但愿你不再为你的儿女们伤心，可我又多么希望你能够听到这句话呀！妹妹比我更爱您啊！

我没有勇气实告小妹，母亲已不在人世了！她那脆弱的情感、脆弱的心灵是经不起重击的。

我低声回答小妹：“妈妈没有生病，妈妈太想念太惦记我们了，我告诉她我们都很好，她就放心了。”

妹妹嘴角挂上了一丝笑容，一丝苦涩的笑容，几天来的第一次笑，如果那种惨然的表情也能算是笑容的话。

“告诉我，那个人是谁？我要教训他！”

妹妹坚决地摇了摇头。

“你……爱他？……”

妹妹无语地点了一下头。

“他呢？……他也爱你吗？……”

妹妹又点了一下头。

我注视着妹妹。她脸上呈现出一种天使般圣洁的表情，那是心灵的反射。我茫然了。

妹妹忽然肯定地问：“哥哥，你爱她？”

“谁？！……”

“副指导员。”

“你听什么人胡说的？”

“我看出来了，她……也挺喜欢你的！”

“真的？……”我双手紧紧抓住了妹妹的两条胳膊。

“真的。”

“不，我知道她喜欢的是‘摩尔人’！”

“她只是信任他，我也信任他，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任何一个姑娘都会信任像他那样的人。但她喜欢的是你！她说你是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小伙子，是个雪莱型的小伙子。她说她喜欢雪莱，不喜欢拜伦，虽然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她还说拜伦只能评定一个女性外表的美丑，而雪莱却能窥察一个女性内心的善恶。她也知道你在爱她……”妹妹突然住口了。

我们几乎同时发现副指导员不知何时呆呆地站在帐篷门口,她显然听到了我和妹妹的谈话内容。

“哎呀,我晾在河边的衣服还没收回来!”我找了个借口逃出帐篷,在荒野上盲目地奔跑,我觉得“满盖荒原”成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当天,吃过晚饭以后,我们又围聚在帐篷里,讲起故事来,这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唯一方式。我们什么故事都讲:神、鬼、荒诞的、恐怖的、风趣的……我们每个人,包括副指导员在内,都摆脱了在连队的种种束缚,真正成了“满盖荒原”上“顶天立地”的人。

副指导员娓娓动听地讲了希腊神话《奥德赛》中的一段故事:伟大的俄底修斯攻打下了特洛伊城以后,率领他手下的勇士们从海上返回家乡伊塔克,结果被逆风吹到了一个孤岛上。岛上的居民专靠吃一种“忘忧果”度日,他们热情地把“忘忧果”捐送给俄底修斯和他的勇士们吃。勇士们吃了“忘忧果”,完全被那种诱人的果实的甘美迷惑住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家乡和父母,忘记了兄弟姐妹和妻子,忘记了一切朋友,竟无忧无虑地长久留在了孤岛上……

我惊讶地发现,她讲故事的水平超过我们所有的人,她并不绘声绘色,只是娓娓道来。但那语调中流露出来的感情,是能够打动到人的心灵深处的。

她讲完了,我们都陷入沉思。只有妹妹叹息了一声,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想获得许许多多那种‘忘忧果’……”

副指导员,又是和“摩尔人”坐在一起,又是那样地将头靠在他的肩上。大铁炉子里的火光,将她的脸映照得那么红。火光一闪一闪,她那张美丽的脸忽明忽暗,浮现着一种虚幻的憧憬和淡淡的愁思。

我不禁对她充满了同情。如果不是三年前她立下的誓言束缚了她,她早该回家探家了,三年啊!她一定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思念她的父母和亲友。

我打开画夹,说:“别动,‘摩尔人’,我给你们画张像!”我的本意是,要给她画一张肖像。因为此时此刻的她,那么美丽那么楚楚动人,但我没有勇气坦白说出。“摩尔人”显然错误地认为我的话是对他的当众揶揄,他顶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所以,当副指导员下意识地将从他肩上移开时,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冷冷地盯着我,说:“别动!叫他画,别扫他的兴!”语势中隐含着挑衅。副指导员,又顺从地将头靠在了他肩上,微微一笑,也注视着我。

我再没说什么,认真地画了起来。我看她一眼,画一笔,暗想,我一定要画得十分像。我从来没有画得那么好过,真的!最后一笔,我存心一顿,把笔尖顿折了

“没画好!”我把画夹递给了副指导员。

大家都围拢来欣赏,赞叹:

“像！像极了！”

“嘿！没看出来你还有招不露！什么时候也给我画一张？”

“噢，你就画了我自己呀！”副指导员看了“摩尔人”一眼。

“我的笔尖断了。”我脸上微微一红。

副指导员拿着肖像端详了一会儿，问：“送给我？”

“送给你！”我大胆地盯着她。

她垂下了眼睑，说：“我会仔细保存它的。”

这时，“摩尔人”站了起来，一声不响地钻出了帐篷。从那一天起，他更加沉默寡言了……

然而，什么都可以转让，唯独爱情。

我要执著地追求，绝不弃她别爱，绝不……

三

第一场春雨降临了。

我们开垦的乌油油的沃土，贪婪地吸吮着大自然母亲的乳汁。人们都习惯把春天比作花枝招展的少女，可是当她在“满盖荒原”上旅行时，却更像一位庄重的夫人，脚步懒散而从容，带着唯一的颜色——淡绿，所到之处，漫不经心地随意点染，画出了绿的世界。

副指导员有一天昏倒在“流浪者”河边，她病了。她接连两天昏迷不醒。在昏迷中，她时时念叨着两个字：“麦种，麦种……”医药箱里所有的药，都不能减退她的高烧。第三天，她稍微清醒了一些，首先把妹妹唤到地铺前，问：“还有多少粮食？”

妹妹回答：“只剩一点点了！”

她亲切地环视着我们，微笑了，说：“伙计们，我代表连队谢谢大家。我要建议党支部，给大家都记一功，放进档案里。现在，这里留下几个人就够了，其余的全部回老连队去，帮助老连队迁移来……一定要赶在‘鬼沼’开化之前！”她轻轻地拉着妹妹的一只手，“你留下吧，没有你在身边，我会寂寞的。”

妹妹说：“副指导员，我留下！”

我说：“我也留下。”

“摩尔人”看着副指导员，问：“如果你同意，我也留下。”

副指导员默默地点了点头。

“满盖荒原”上就留下了我们四个人。

一天，两天……四天过去了，连队没有到达。整整一个连队，几百口人，搬迁

到这里来不是一次简单的行动,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在这四天之内,“鬼沼”彻底开化了!“流浪者”河,这条我们在“满盖荒原”上信任的朋友河,它出卖了我们!它跟“鬼沼”卑鄙地联合了起来,向我们示威!当我、妹妹、“摩尔人”第四天早晨走出帐篷时,都被惊吓得呆住了!清可见底的“流浪者”河,不知从哪里汇集了那么多水,隔夜之间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浊流湍急,打着漩涡,夹杂着雪坨、冰块儿、枯枝断树,甩了一个直角弯,奔泻而下,河水溢出河床,灌进沼地,“鬼沼”一片汪洋!

妹妹忧愁地说:“今天连队再不到达,我们就一点吃的也没有了。”

我和“摩尔人”同时看了她一眼,都没说什么。我们担心着更严峻的事情——连队将如何涉过“鬼沼”?

妹妹一声不响地又钻进帐篷里去了,我和“摩尔人”也跟进帐篷,见她坐在副指导员的地铺旁,瞧着昏迷中的副指导员垂泪。我们进来,她赶紧抹去眼泪站起来,拿上一把镰刀和一个小土篮,说:“我去挖野菜。”

将近中午,妹妹的喊声突然从远处传进帐篷:“哥哥,哥哥,快来呀!……”

我和“摩尔人”同时跳了起来,奔出帐篷,但见妹妹像一只小猎犬,在追赶一头弱小的孢子。她一扬手,将镰刀飞抛出去,砍中了孢子后腿,孢子一头栽倒。她猛扑上去,却捕了个空。那小动物挣扎着跳了起来,带着伤向沼地里逃窜,妹妹跟在后面紧追不舍。小孢子在沼地边沿停了一下,似乎还回头看了她一眼,跃进了沼地,一拐一拐地向沼地深处逃去。

“站住!”

“小妹!”

我和“摩尔人”对妹妹大声喊。

妹妹追到沼地边,欲罢难舍,焦急地来回奔跑。她终于停住了,望着陷住四蹄寸步难移的孢子,迟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鬼沼”迈出了一步。

“回来!危险!……”“摩尔人”高吼一声,我和他同时朝妹妹跑去。

妹妹回过头来望了我们一眼,挥动了一下手臂,好像是在任性地说:“你们别管我!……”她跑进了“鬼沼”。

当我和“摩尔人”追到沼边时,她已捕住了小孢子。她和那小动物在沼泥中扑斗了几下,一眨眼间,忽然深陷了下去,一下子被吞陷到胸部!还没等我和“摩尔人”有所反应,沼泽中便只露出了她的一只小手。那小手也只得及在空中抓了几下,倏忽间便从眼前消失了!

“哥哥!别过来……”她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敲响我的耳鼓!

“小妹!……”我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不顾一切地向沼泽冲去。

“摩尔人”两条有力的手臂,从后面紧紧将我搂抱住了。我挣动了几下,眼前

一黑，昏倒在他怀里。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帐篷里了。妹妹的那只小手像电影中的叠印镜头一样，重复地在我眼前出现。我耳边又响起了母亲临终的叮嘱，泪水刷地一下子淌了出来。我硬撑起身，看见“摩尔人”那高大的身躯，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帐篷外。惨白的月光照在大地上，将他的身影衬托得格外分明。“鬼沼”那边，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异的鸟叫，也许是“收魂鸟”将妹妹的魂灵收走了吧？我虽然并不迷信，但这种迷信的思想却在我头脑中闪过。我盯着“摩尔人”的身影，心中突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憎恨！甚至思路狂乱起来。如果不是他搂抱住我，我相信我是一定可以救出妹妹的！对小妹的死他是有罪过的！

我站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出帐篷。“摩尔人”听到我的脚步声，缓缓地转过身来。他骇然地瞪大了眼睛，也许他看到了我怒不可遏的狂乱的脸色，本能地朝后退了一步。

我霍然对他扬起了拳头。

“你！……”他惊愕地朝后退了一步。

“我恨你！”我咬牙切齿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他的目光，盯在我脸上，低沉地说：“如果是因为你的妹妹，那我有权替自己辩护。你以为我有一颗魔鬼的心吗？你以为我就不为你妹妹的死难过吗？如果当时我的生命能换取她，甘愿躺在沼底的是我！如果你是因为她……”他朝帐篷里看了一眼，“那你尽管动手！只要我活着，只要她还没有宣布做你的妻子，我就有权爱她，并且追求她！”

他的话，令我的双手发抖了。好像为我的小妹志哀，我垂下了头。宁静的夜晚，荒原显得更加沉寂，连“收魂鸟”那种怪异的叫声也听不到了。

“摩尔人”注视了我一瞬间，慢慢朝我背转了高大的身躯，朝荒原黝黑的深处走去，消失在黑夜的巨口中。

“你们吵嚷什么？”

我扭回头，见副指导员站在帐篷口。四天内，她病得虚弱不堪，如果她松开拽着帐篷帘的那双手，一定会无力地瘫软在地。

我半天才从双唇间挤出了一个字：“狼……”

“狼？……”她怀疑的目光久久地审视着我，追问，“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摩尔人’呢？你妹妹呢？他们到哪儿去了？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妹妹……她、她、她死在‘鬼沼’里了！……”我双手捂住脸，克制不住巨大的悲痛，失声号啕了。

副指导员像被猛击了一锤，发出短促的一声“啊”，昏倒在帐篷口。

深夜，“摩尔人”还没有回来，他到哪里去了？在我缺乏理智地对待了他之

后,他会不会也恨我呢?他还会回来跟我同住在一顶帐篷里吗?他会不会遭到什么不幸呢?如果他真遭遇到了什么不幸,那杀害他的就是我了……

我忏悔极了,不安极了,我感到黑夜的漫长。我守护着昏迷中的副指导员,第一次体验了在这广袤无垠的荒原上,孤独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处境。我整夜没有合眼。

黎明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我奔出帐篷,“摩尔人”已经在帐篷外跳下了马背。

“马?哪来的马?……”我忘记了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不愉快的事,亲切地跟他说话。

他说:“前几天,我曾在树林中发现了被猎刀砍断的树枝,断定这附近可能有鄂伦春猎人。昨天夜里我找到了他们,向他们借了这匹马。副指导员怎么样?”

“还是昏迷不醒。”

“鄂伦春猎手们说,可能染上了出血热。”

“出血热?!……”

我的心顿时冷却了。我听说过这种病,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像秋风吹落一片树叶。

“摩尔人”又说:“你立刻骑上这匹马,顺着我们的来路护送副指导员回去!你一定能迎到我们的连队,副指导员就有救了!”他完全是命令的口气。

“不!你护送她,我留在这里!”

“我的身体太重,半路上非把这匹马压垮不可,它已经跑得够累了!由此向西五十里,可以绕过‘鬼沼’,你们沿沼地向西走吧!”

再争执就是卑劣的虚伪。

“摩尔人”用行李绳将昏迷中的副指导员缚在我后背,扶我跨上了马鞍。

“把枪带上。”他把步枪递给了我。

“你留下!”

“你带上,以防万一。”他将步枪挂在马鞍上,拉着马缰掉转马头,用充满信赖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在马屁股上猛插了一拳。

那马嘶叫一声,撒开四蹄,朝西疾驰而去。

朝西虽然比朝东少绕三十里路,但却要经过一片“塔头”甸子。幸亏那马是纯种鄂伦春猎马,在“塔头”地里也行走如飞。这种马体形矮小,其貌不扬,但能吃苦耐劳,是猎人之友,是荒原上的骆驼。

绕过“鬼沼”,仍一路不停地踢着马腹。那马仿佛体谅我的心情,速度毫不懈怠。又疾驰了大约三十里路,我的棉裤被马身上的汗湿透了。突然它打了几个响鼻,四腿发抖,蹄步摇摆起来,它似乎还想全力奔驰,但前蹄却跪倒了。我的双腿

刚刚离开马鞍,在地上站稳,它便侧身一卧,伸长了脖子——它彻底累垮了!马腹忽起忽落,鼻孔喷出热气,嘴里吐出白沫来。这有灵性的动物,在倒下时,也绝不用身子压住骑者的腿,它那双琉璃眼,歉意地、悲哀地望着我。

“放下我,放下我!这是什么地方?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

副指导员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她在我背上挣动着被缚住的身子。

我解开绳子,将她轻轻放在地上,让她的头和肩靠在我的胸前。

我轻轻地对她说:“副指导员,我要护送你迎接连队,你病得很严重!”

她喃喃地问:“我要死了,是吗?”

听我所爱的人说出这种话,我如万箭穿心,难受极了!我大声回答她:“不,你不会死的!”

她吃力地微笑了一下:“我不怕死,真的。你忘了,我们的扎根誓言中,不是有这样两句话么,埋骨何须故土,荒原处处为家。遗憾的是,我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回家探望我的爸爸妈妈了,我真想他们啊!他们想我,大概都想疯了呢。我已经给他们写了信,保证我们在‘满盖荒原’上秋收之后……”

我呜咽了,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她脸上。

“别哭”,她轻轻握住了我的一只手,“如果我真的死了,就把我埋在‘鬼沼’旁,我要和你的妹妹做伴。她是个好姑娘,我喜欢她。我只有点请求,在我的碑上,在我的名字前面,刻上‘垦荒者’三个字……”一大滴泪水,从她的眼角慢慢淌了出来。

我紧紧搂抱着她,放声大哭。

“你看,那是什么?多像书上写的那种忘忧果!你给我折一枝来,好吗?”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忽然闪亮闪亮的,盯着附近的什么东西。

我顺着她的目光,发现了一丛紫红的尚未开放的达子香花。我将她靠在马鞍上,站起身去折那丛达子香。待我折了一束花回到她身边时,她已经闭上了眼睛。

她和那匹鄂伦春猎马同时停止了呼吸!

大地在我脚下旋转,蓝天变成了黑色。

我擦干了眼泪,将那束达子香别在她衣扣里,跪了下去,在她渐渐消失着血色的双唇上,长久地亲吻着。我相信,她若有灵,是不会嗔怪我的。

我又背起她,继续朝前走。

这时,在地平线上,我看到了我们搬迁的连队的带状的影子……

全连队为副指导员默哀了许久许久。

每一个人都流出了真诚的眼泪。

.....

当我们全连队的马车、爬犁、拖拉机和团里支援我们搬迁的卡车所组成的车队行进到“鬼沼”前，冥冥的暮色开始在荒原上织成了韩幔。有人发现了一顶棉帽子，挂在倾斜的作为坟碑的木桩上，还压着一块石头。我首先走过去取下那顶帽子，认出是“摩尔人”的狗皮帽。帽兜里有一张纸，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我探出了一条涉过‘鬼沼’的路，以树枝为标记，由此向东，一里远处……”

当天晚上，我们将可能陷没的车辆停在了原地，全连队的人都平安地涉过了“鬼沼”。可是我们却到处也寻找不见“摩尔人”。

第二天黎明，在“流浪者”河边，发现了“摩尔人”的血迹斑斑的衣片，一柄大斧，三只死狼……周围的一切，都无声地向我们作证，这里曾进行过怎样触目惊心的人与兽的搏斗！可以想见，强壮勇猛的“摩尔人”是怎样拼搏尽了最后的气力才倒下去的……

我们在悲痛的日子里，开始在“满盖荒原”上播种。

按照副指导员的遗嘱，我们将她埋葬在“鬼沼”旁。我们从百里外的驼峰山上运回了一块大青石，连队的老石匠将它凿成了石碑，碑文上刻着：垦荒者李晓燕和她的战友王志刚、梁珊珊长眠于此。

我们从驼峰山上伐下了上千棵义气松，沿着“摩尔人”做的标记，在“鬼沼”上铺了一条垦荒者之路。第二年，又有好几个连队建点在“满盖荒原”上。

“鬼沼”，它终于被征服了！

当我带着垦荒者的胜利，在一个黄昏默默走到“垦荒者”墓前凭吊的时候，一个陌生的青年也在那里。我发现墓碑上放着一束达子香花；那是妹妹生前最喜爱的花。

我立刻明白，他是妹妹生前所爱并爱过妹妹的那个人！

他脸上的表情令我深信，他是永远也不会离开“满盖荒原”的了！

我们对望了一眼，他便掉头缓缓离去了。

我没有叫住他，没有问他的姓名，甚至没有想到问问他是哪一个城市的青年……

他是我们那一代中的一个，这一点足够了。

我们经历了北大荒的“大烟泡”，经历了开垦这块神奇的土地的无比艰辛和喜悦，从此，离开也罢，留下也罢，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决不会在我们心上引起畏惧，都休想叫我们屈服……啊，北大荒！

哦,香雪

● 铁 凝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得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留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驰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也不能不停下来。总之,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得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

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拥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边,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那个妇女头上别的金圈圈,那叫什么?”凤娇拉过香雪,扒着她的肩膀问。

“怎么我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说。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唉!你看她那块手表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哟,我的妈呀!你踩着脚啦!”凤娇一声尖叫,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位姑娘。她老是爱一惊一乍的。

“你咋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搭话了吧?”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

“我撕了你的嘴!”凤娇骂着,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

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北京话”双手抱住胳膊肘,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哟,我们小,你就老了吗?”大胆的风娇回敬了一句。

姑娘们一阵大笑,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搽,弄得她差点撞在他身上,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喂,你们老待在车上不头晕?”她又问。

“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厢里的电扇。

“烧水在哪儿？”

“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

“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边小声问了一句。

“真没治！”“北京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快开车了，她们才让出一条路，放他走。他一边看表，一边朝车门跑去，跑到门口，又扭头对她们说：“下次吧，下次告诉你们！”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接着一阵叽里呱唧，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们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总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那几个金圈圈是绑在一块儿插到头上的。”

“不是！”

“就是！”

有人在开风娇的玩笑：“风娇，你怎么不说话，还想那个……‘北京话’哪？”

“去你的，谁说谁就想。”风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意思是叫香雪帮腔。

香雪没说话，慌得脸都红了。她才十七岁，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

“我看你是又想他又不敢说。他的脸多白呀。”一阵沉默之后，那个姑娘继续逗风娇。

“白？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的。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有人在黑影里说。

“可不，城里人就靠捂。要论白，叫他们和咱香雪比比。咱们香雪，天生一副好皮子，再照火车上那些闺女的样儿，把头发烫成弯弯绕，啧啧！风娇姐，你说是不是？”

风娇不接茬儿，松开了香雪的手。好像姑娘们真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不知怎么的，她认定他的脸绝不是捂白的，那是天生。

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风娇手心里，她示意风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风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风娇受了委屈。

“风娇，你哑巴啦？”还是那个姑娘。

“谁哑巴啦！谁像你们，专看人家脸黑脸白。你们喜欢，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风娇的嘴很硬。

“我们不配！”

“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

.....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明天,火车还要经过,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和它相比,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她们又在这一分钟里增添了新的内容。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姑娘们喜爱的发卡、纱巾,甚至花色繁多的尼龙袜。当然,换到后面提到的这几样东西是冒着回去挨骂的风险的,因为这纯属她们自作主张。

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北京话”的,每次都是她提着篮子去找他。她和他做买卖很有意思,她经常故意磨磨蹭蹭,车快开时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他还没来得及付钱,车身已经晃动了,他在车上抱着篮子冲她指指划划,解释着什么,她在车下很开心,那是她甘心情愿的。当然,小伙子下次会把钱带给她,或是捎来一捆挂面、两块纱巾和别的什么。假如挂面是十斤,凤娇一定抽出一斤再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所区别。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火车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姑娘们围住香雪,当她们知道她追火车的原因后,便觉得好笑起来。

“傻丫头！”

“值不当的！”

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她的肩膀。

“就怪我磨蹭，问慢了。”香雪可不认为这是一件值不当的事，她只是埋怨自己没抓紧时间。

“咳，你问什么不行呀！”凤娇替香雪挎起篮子说。

“也难怪，咱们香雪是学生呀。”也有人替香雪分辩。

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尽管不爱说话是她的天性，但和台儿沟的姐妹们总是有话可说的。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地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

“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香雪指指桌角。

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咣咣乱响。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呢，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咣咣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们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值肯定非同寻常。三十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四十个、五十个？这时她的心又忽地一沉：怎么想起这些了？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叫她乱打主意啊！可是，为什么那诱人的咣咣声老是在耳边响个不停？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可以穿起花棉袄了，凤娇头上别起了淡粉色的有机玻璃发卡，有些姑娘的辫梢还缠上了夹丝橡皮筋。那是她们用鸡蛋、核桃从火

车上换来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接受检阅。

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抱怨台儿沟的寒冷。今天,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车窗全部紧闭着,旅客在昏黄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向窗外瞥一眼。那些眼熟的常跑这条线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台儿沟的姑娘。

凤娇照例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系紧头上的紫红色线围巾,把臂弯里的篮子换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一直向前走去。她尽量高高地踮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车上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她却在一堆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抓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如果不是隔着玻璃,她一伸手就可以拿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挎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谁也没提醒香雪,车门是开着的,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攥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应该赶快下车时,列车已经缓缓地 toward 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到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火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着:“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

三十里,对于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却只有一位旅客。车上好像有人阻拦她,但她还是果断地跳了下来,就像刚才果断地跃上去一样。

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把它悄悄塞在女学生座位下面了。在车上,当她

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香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徽,上面果真“矿冶学院”几个字。香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香雪收下了铅笔盒,到底还是把鸡蛋留在了车上。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后来,当旅客们知道香雪要在西山口下车时,他们是怎么对她说的?他们劝她在西山口住一夜再回去,那个热情的“北京话”甚至告诉她,他爱人有个亲戚住在站上。香雪并不想去找他爱人的亲戚,可是,他的话却叫她感到一点委屈,替凤娇委屈,替台儿沟委屈。想到这些委屈,难道她不应该赶快下车吗?赶快下去,赶快回家,第二天赶快去上学,那时她就会理直气壮地打开书包,把“它”摆在桌上……于是,她对车上那些再次劝阻她的人们说:“没关系,我走惯了。”也许他们信她的话,他们没见过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叫她惧怕,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他们搞不清山里的女孩子究竟有多大本事,她的话使他们相信:山里人不怕走夜路。

现在,香雪一个人站在西山口,目送列车远去。列车终于在她的视野里彻底消失了,眼前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香雪感受过各种各样的害怕,小时候她怕头发,身上粘着一根头发择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长大了她怕晚上一个人到院子里去,怕毛毛虫,怕被人胳肢(凤娇最爱和她来这一手)。现在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害怕叫人心惊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三十里,一路走回去,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的林子啊!

一轮满月升起来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漫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她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她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地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从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她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唧唧”地

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成人的山谷、台儿沟是这样的吗？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对了，今晚台儿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火车拉走了香雪，为什么现在她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回忆呢？对了，四十个鸡蛋也没有了，娘会怎么说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吗？那时他才有干不完的活儿，他才能光着红铜似的脊梁，不分昼夜地打出那些躺柜、碗橱、板箱，挣回香雪的学费。想到这儿，香雪站住了，月光好像也黯淡下来，脚下的枕木变成一片模糊。回去怎么说？她环视群山，群山沉默着；她又朝着近处的杨树林张望，杨树林窸窣窸窣地响着，并不真心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是哪儿来的流水声？她寻找着，发现离铁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小溪。她走下铁轨，在小溪旁边蹲了下来。她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和风娇在河边洗衣裳，碰见一个换芝麻糖的老头。风娇劝香雪拿一件旧汗褂换几块糖吃，还教她对娘说，那件衣裳不小心叫河水给冲走了。香雪很想吃芝麻糖，可她到底没换。她还记得，那老头真心实意等了她半天呢。为什么她会想起这件小事？也许现在应该骗娘吧，因为芝麻糖怎么也不能和铅笔盒的重要性相比。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

小溪的歌唱高昂起来了，它欢腾着向前奔跑，撞击着水中的石块，不时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香雪也要赶路了，她捧起溪水洗了把脸，又用沾着水的手捋光被风吹乱的头发。水很凉，但她觉得很精神。她告别了小溪，又回到了长长的铁路上。

前边又是什么？是隧道，它愣在那里，就像大山的一只黑眼睛。香雪又站住了，但她没有返回去，她想到怀里的铅笔盒，想到同学们惊羨的目光，那些目光好像就在隧道里闪烁。她弯腰拔下一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娘告诉她，这样可以“避邪”。然后她就朝隧道跑去。确切地说，是冲去。

香雪越走越热了，她解下围巾，把它搭在脖子上。她走出了多少里？不知道。只听见不知名的小虫在草丛里鸣叫，松散、柔软的荒草抚弄着她的裤脚，小辫叫风吹散了，她停下来把它们编好。台儿沟在哪儿？她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人，是迎着她走过来的人群。

第一个是凤娇，凤娇身后是台儿沟的姐妹们。当她们也看清对面的香雪时，忽然都停住了脚步。

香雪猜出她们在等待，她想快点跑过去，但腿为什么变得异常沉重？她站在枕木上，回头望着笔直的铁轨，铁轨在月亮的照耀下泛着清淡的光，它冷静地记载着香雪的路程。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迎面，那静止的队伍也流动起来了。同时，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战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 史铁生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这么说吧,现在要是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窖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儿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唏溜唏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

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①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巍巍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扭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②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刷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ì chuī”。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作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近三千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荽”;“骗人”也不说“骗人”,叫做“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

① 受苦人,即庄稼人的意思 陕北方言

② 窑里,即家里之意 陕北方言

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再说……”这“酝酿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屎事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作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们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从绥德。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那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请去，“呜里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

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上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作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臼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掰一根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嗞——嗞——”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镰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口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瞟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趑趄趑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哧呼哧”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待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疙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嗞嗞”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黢黢的。留小儿把红薯或者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

树枝拨来拨去，“啪”地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很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

“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①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咯咯”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②犍牛、花生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③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④了。”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蚰蚰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嚎。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嗞嗞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闯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照着^⑤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生^⑥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趴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餓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得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行。喂牛，苦不重^⑦，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

① 解：陕北方言中读hai

② 猴：小

③ 难活：病

④ 熬：累

⑤ 照着：望见

⑥ 生：住

⑦ 苦不重：活儿不重

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个冷战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尽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做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尿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尿毛擗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辰儿要是不回来,这辰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要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尿!要不,我的留小儿这辰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几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想着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吗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噢!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也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①,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

① 危险:严重、厉害之意。

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①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掏，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下山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山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圪塔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棱棱”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捕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作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褻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不闲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代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小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②那辰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③！”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辰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明知故问。他

① 大：爹。

② 才红了：指红军刚到陕北

③ 做过啦：弄糟了

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一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说:“没麻搭,它想儿了,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话。牛不老^①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头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葛得很,再小的牛冲它伸伸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它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车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掰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

① 牛不老:牛犊

点,酸极了,倒牙。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春,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①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噢!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戗。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儿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儿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是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艾艾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汨汨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他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

① 夜来黑喽:昨天晚上。

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他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正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的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愈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刨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支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只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瞄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矫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里,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嚎。他想起了一头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

“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哪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

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儿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头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扑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

“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黑肉^①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

“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

“流哩嘛！”留小儿“咯咯”地笑。

“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

“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是没买到。

“你爷爷还爱唱吗？”

“一天价瞎唱。”

“还唱《走西口》吗？”

“唱。”

“《揽工调》呢？”

① 黑肉：瘦肉或精肉 白肉：肥肉。

“什么都唱。”

“不是愁了才唱吗？”

“噢?! 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编后记

创刊于1980年1月的《小说月报》即将迎来她三十周岁的生日。古语云：三十而立。这份凝聚了几代同仁心血、负载了各方关爱、寄托了众人期许的文学选刊，虽说早已于文学期刊之林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在而立之年，同样需要反躬自省，回望来时路径。而作为一份始终居于时代潮头的文学选刊，《小说月报》总是在第一时间向读者报告小说现场的实况，及时保存下“小说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三十岁的《小说月报》，三十年的小说记忆，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收获，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小说月报三十年”丛书正是源自而立之年的“反躬”与“回望”，承担了盘点三十年小说记忆的使命。

将《小说月报》三十年来选载过的数以千计的作品加以整理筛选，无疑是件繁重艰巨的工作，从策划立意、确立原则，到具体操作、确定篇目，历时近一年之久。其间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反复推敲，最终编选完成了这套共计六册、总字数近四百万字的丛书，作为对《小说月报》创刊三十周年的纪念，并回馈一贯支持、关爱我们的各界读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套用三十年时间来完成的小说选本。因为我们是基于当年编选者的“现场报告”进行二度筛选。借用时间赋予我们的“后见之明”看来，《小说月报》于第一时间做出的判断与选择，每每是精准的——虽然每个时期均难免有其遗珠之憾——大批传颂一时的名篇佳作当初正是通过《小说月报》的及时选萃而走向全国，众多声名卓著的小说名家最早也是经由《小说月报》的有力推介而登上文坛。在此坚实基础之上，我们试图兼顾作品的时代性与经典性，加以平衡，既收录了那些一经发表便造成轰动效应的名篇，又发掘了不少艺术魅力历久而弥新的佳构；书中收入的有不少是当代小说名家的成名作、代表作、获奖作，也有那些平凡写作者厚积薄发的力作；其作者阵容更涵盖了多个世代，从1949年之前便投身文坛的耆宿，到新世纪以来崭露头角的新锐，堪称当代小说界的“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而在编选过程中亦未囿于一人一篇

的成例,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小说家不同时期的创作风貌。简言之,作为编选者的我们,立足点既在时间之中,又在时间之外,唯一保持不变的主轴是“《小说月报》的立场”。但为篇幅与体例所限,不少符合我们编选原则的作品最后仍不得不忍痛割爱,在编辑过程中每一轮筛选后都会为此感到遗憾,无论如何,我们相信那些未曾收入本丛书的作品同样代表了三十年来国内小说创作的成就。对于我们来说,从一开始就未曾奢望能将《小说月报》选载过的佳作一网打尽,只是希望能忠实记录这本刊物三十年来所留下的一串串脚印、一点点记忆,这套丛书所提供的,与其说是当代优秀中短篇小说的“范本”,不如说是一本文学刊物三十年来与当代小说创作及当代文学史互动的“样本”。

“小说月报三十年”丛书以时间为序,收录1980年至2009年《小说月报》所选载的中短篇小说,共分六卷。编辑所有作品,均以当年《小说月报》的版本为底本(其中有些篇目日后出版时有所改动,因而本书所收录者也具有一定的版本学价值)。因为三十年中出版物依据的文字与标点使用规范有所不同,为求统一,在不影响原文的情况下略加整理,其余均按照原文照录,其中个别表述与提法带有明显时代色彩,未必为今日读者所认同,为保存原貌亦未加改动,希请留意。丛书每卷均分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两大板块(中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分类标准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此次均以本刊发表时分类为准),作品均按本刊发表时的顺序排列,书后附有该卷作品总目,供读者查阅。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承蒙各位作者的大力协助,值此机会表示我们最诚挚的谢意。有个别作者或版权继承人出于种种原因未能联络到,在此亦表示歉意,万望见书后及时与本刊联系,我们将寄送样书、稿酬。感谢各界朋友多年来对本刊始终如一的厚爱与支持,真诚期望您对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小说月报》编辑部

2009年12月

小说月报三十年总目录

(1980~1984)

1980年第1期

将军的故事

大海作证

解脱

铁疙瘩

问号

表姐

雕花烟斗

但德尔斯的一家

最后一幅肖像

天堂的虚惊

安 静

李宏林

蒋子龙

陈椿年

林斤澜

王 蒙

冯骥才

阮 朗

陈 放

白景晟

结婚现场会

悠悠寸草心

说客盈门

我是谁?

犯忌

收电费

老二黑离婚

珊珊,你在哪儿?

游子回归心

牌

新房

马 烽

王 蒙

王 蒙

宗 璞

季冠武

高文铨

潘保安

聂华苓

黄绍武

李建纲

金光泽

1980年第2期

小镇上的将军

第五个穿大衣的人

爱,是不能忘记的

土地的主人

盼

流水弯弯

周华英求职

献给医生的玫瑰花

这里有黄金

杨柏的“污染”

柳泉居士和柳泉

西江月

王赤生、果红星

李 黎

徐怀中

蒋金彦

陈世旭

刘宾雁

张 洁

张 宇

戴 晴

陈建功

高晓声

从维熙

刘心武

徐乃建

人到中年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她好象明白了一点点

交换

笑

蛇仙

跑步

接官记

弗洛恩堡之夜

月食

老处女

红烛

炉台上的美学家

立春

湛 容

张 弦

刘 真

於梨华

苏支超

祖 慰

恽建新

余松岩

建 安

1980年第4期

1980年第5期

李国文

李惠薪

汪 洋

王 江

李德复

1980年第3期

西线轶事

三人行

鬼姐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风雪茫茫
寒夜里的哭声
如果雨下个不停……

1980年第6期

空巢
陈奂生上城
说话
绿色的山岗
黑豆队长
心
在上面和在下面
印有金锚的飘带
勿忘草
同志啊,冲上去
悠悠东流水
寂静的小院
情书的真情
喊亮月吞
在彩色电视机里

1980年第7期

手杖
推销员
煎饼
生活从这里开始
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
乡魂
寻根记
三乘客
蛋蛋
燕子啁啾
肖虹访友
孕育在大地之中

陈树荣
张贤亮
牛正寰
王润滋
岑 桑

冰 心
高晓声
贺梦凡、张新奇
成 一
张永龙
湛 容
韶 华
叶 楠
周克芹
张志彤
徐恒进
祝正祥
王浙滨
吴慧泉
章以武

京 夫
赵大年
白 文
张蒂远
蒋子龙
赵峻防
黄庆云
郭绍珍
颜 屏
榴 红
丁家桐
孟左恭

绿色钱包

1980年第8期

奥依曲爱克
最后的冲刺
双猫图
春雪
少校之死
审判
接到讣告之后
雨,沙沙沙
上书
李有才之死
要留清白在人间
三凤告状
月夜
牺牲

1980年第9期

笨人王老大
扶我上战马的人
活佛的故事
人不是含羞草
彩色的夜
立身篇
坟草青青
我的哥哥和爸爸
宝石
一个年轻的乡下医生
帐

1980年第10期

南湖月
镊柄韩宝山
燃烧
龙池
花桥荣记

刘厚明

哲 中
张石山
邓友梅
余易木
杨汝申
李 栋、王云高
何琼纬、何琼崖
王安忆
韶 华
王希坚
张永龙
田澍中
贾平凹
赵克文

锦 云、王 毅
张映文
玛拉沁夫
甘铁生
王群生
陈忠实
贾庆军
杨少衡
刘汉君
王 拓
绍 六

刘富道
张石山
中杰英
江 流
白先勇

丹凤眼
飘飞的大雪
风筝飘带
典型
往后的日子
萨拉姆
痴人之恋

1980年第11期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小贩世家
老涩外传
归宿
远天远地
你是共产党员吗?
第一级火箭即将脱落
美国专家“为什么”
浓雾
小年之夜
送药
幸存者
慈母心

1980年第12期

灵与肉
天山深处的“大兵”
受戒
梦魇
沟
灶火的故事
面对共同的世界
战俘
秋夜春风
疏忽
68与6

1981年第1期

陈建功
母国政
王蒙
卢新华
陆文夫
李广智
王亚平
开市大吉
子爵号
棋瘾
芒果
鱼钓
芝加哥之死
美丽崖豆杉
就是这个角落……

张一弓
陆文夫
汤吉夫
顾尔鐔
成一
张林
郑赤鹰
朱定
徐慧
黄一峰
叶文玲
文兰
庄东贤

同犯
最后一个军礼
水泡子
青衫湿
在姚村
深深的长森巷
沃土
喜多村秀美
新来的教练
赶场
张寡妇卖汤圆
人啊,人
第28号人物

张贤亮
李斌奎
汪曾祺
戴晴
铁凝
李潮
孟伟哉
曾绍阳
胡世晨
吴若增
阮氏丁香
我们建国巷
温柔之乡的梦
碧落黄泉
海与灯塔
人过兴旺峪

1981年第2期

苏策
方南江、李荃
蒋濮
理由
贾平凹
庞天舒
汪洋
邓友梅
王安忆
陈朝璐
卢永华
张永龙
田东照

1981年第3期

徐怀中
叶之蓁
魏雅华
李栋、周毅如
孔捷生
赵二湖

这车好炭
柘子
他调不了我的心
情尽
勒干和娜霜
春天的绿叶

林文询、雨 樵

1981年第4期

水东流
乡场上
在水煎包子铺里
我们正年轻
悔
作品欣赏第一课
白莲
鸡肋
泰利父子的眼泪
一篇草稿

梁晓声、文乐然

1981年第5期

内当家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美与丑
陈奂生转业
普通老百姓
缝隙
诱人的枣花香气
喜悦
最后一篓春茶

1981年第6期

竞争者
奇妙的旅程(中篇)
蛮牛的新寨
她们的路
大淖记事
麦苗返青的时候

张枚同、程 琪

彭兴国
高禄堂
陈国凯
於梨华
石 锐

高晓声
何士光
王兆军
叶之蓁
高 缨
罗 旋
徐懋庸
阮 朗
瞿 航

王润滋
叶蔚林
益希卓玛
高晓声
迟松年
李国文
成 一
邹志安
王振武

闰 水
王群生
黄 尧
王海鸽
汪曾祺

差子考试
山道弯弯(中篇)
美金的代价

1981年第7期

蝴蝶(中篇)
不
少年chén女
“美人儿”
夕阳山外山
四妯娌
烟姐儿
农民老子
黑三点
第十二夜
佤山风雨夜

1981年第8期

粮食问题
挣不断的红丝线
你在想什么?
发生在春天里……
王结实
飘逸的花头巾
影响
数学权威和他的宝贝儿子

1981年第9期

北极光(中篇)
黑娃照相
共鸣
乡村酒肆
调动之后
麦青青
尘心
在远离北京的地方
爱的复活

杨若木
谭 谈
依 犁

王 蒙
戴 晴
舒 群
沈虹光
陶 荣
彭见明
李传锋
矫 健
伊 始
毛守仁
董秀英

邹志安
张 弦
顾笑言
王金力
李 准
陈建功
火 笛
徐 岳

张抗抗
张一弓
张 波
赵金九
赵致真
恽建新
郭才明
孟伟哉
刘文琦

1981年第10期

山月不知心里事
职责(中篇)
关于仔猪过冬问题
田园
岔路口
长城魂
今夜月儿圆
村里的笑声
201光棍宿舍
春水微波
报复
猪郎公架鹊桥

贺景文、张昌华

周克芹
陈中冀
谌容
韩蔼丽
陆柱国
赵熙
马未都
莫应丰
青禾
潘保安
吴雪恼

1981年第11期

伞
轱辘井
将军和他的警卫员
草芥
本家主任
第八颗是智齿
甜……
闪亮,闪亮,小星星
老人的歌
复苏
在三湾村小道上

从维熙
林斤澜
冯岗
刘绍棠
成一
任正平
沙石
王小鹰
黄大荣
吴立智
张晓成

1981年第12期

焦老旦和熊员外
轱辘把胡同9号
本次列车终点
龙种(中篇)
走向新的草场
七个音符
风雪纳连河
三角地的黄昏

李志君
陈建功
王安忆
张贤亮
多吉才旦
张抗抗
刘小江
徐军

河南小姐

陈新

1982年第1期

将进酒
在地震的废墟上(中篇)
老兵
腐蚀
到远处去发信
重返绿草营
这里,有一条小路
东湖洼之晨
作家的奇遇
双井屯

何士光
中杰英
权延赤
叶永烈
刘心武
王立纯
王哲伟
张秋华
白文
王祁

1982年第2期

小溪九道弯(中篇)
最后一票
瓜王轶事
野花瓣儿
天到黄昏时
心灵上的墓碑
“大能人”趣话
清梦常温
芳顺大姐的苦恼
杯中异曲
星星,闪烁在天幕上

叶文玲
张一弓
张武
王钢
张西庭
从维熙
锦云、王毅
王术、余柏森
蔡嵘
毛志成
继迅

1982年第3期

归来的儿子
春前草(中篇)
幸福沟轶事
明姑娘
本色
巨星
花蜘蛛
别有蹊径
屋檐下

陈毅
鲁彦周
杏果
航鹰
雪华
陶然
克非
时永刚、刘巽达
范小青

1982年第4期

张铁匠的罗曼史(中篇)	张一弓
报纸的故事	孙犁
巨兽	周立武
鸡鸣茅店月	张昌华、贺景文
“大篷车”上	方方
甜甜的泪水	肖元
那失落了的……	张雄辉
乡恋	王家男
公开的“内参”(中篇)	张笑天
女明星	陈冲

1982年第5期

蓝色的阿尔善河(中篇)	敖德斯尔
魔界	李陀
下棋看五步	李栋
迷宫之径	王安忆
山路曲曲弯弯	刘树德
在金皇冠的阴影下	建安
两个狩猎汉	严啸建
大黑	吴欢
猎户星座	王观胜

1982年第6期

洗礼(中篇)	韦君宜
母亲与遗像	海波
阿鸽与船	姜滇
错失	金依
笑	屈兴岐
瞧,这些导弹兵	李存葆
银杏树	张弦
船家	吴雪恼
故土	赵熙

1982年第7期

清水湾,淡水湾(中篇)	姜滇
彩色的鸟,在哪里飞翔?	海波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前妻	航鹰
那五	邓友梅
设有靶标的小岛	黄传会
主人	耿志勇
陆大车和他的“臭豆腐理论”	孙春平

1982年第8期

奇异的旅程(中篇)	周永年
种包谷的老人	何士光
我们也是祖先	陈祖国
进山	张中吉
鹰拳	冯骥才
沉寂的正午	扎西达娃
请和我同行	子心
没有“负荷”的电	楚良
山水情	周渺
月是仲秋明	余加祯
散戏	洪醒夫

1982年第9期

射天狼(中篇)	朱苏进
小草	佳峻
清水店主	魏树海
波动的色彩	李霖宇
石门二柳(中篇)	储福金
飞扬的尘土	范小青
杨柳巷的故事	韩冬
啊,朋友	方方
心……星?	岳建一、黎早
黄丝带	程乃珊

1982年第10期

流泪的红蜡烛(中篇)	张一弓
蟹价的涨落	孙吴
内应力	张晓东
蹬“二等车”的大嫂	枫亚

失去祖国的孩子
无标题对话
杨梅忝的表嫂
彩色宽银幕故事片
登台
白云上的红樱桃

陈 模
沙叶新
叶文玲
湛 容
尤凤伟
四 海

强龙
哦,香雪
登山
美的回声
老樵夫
江那边

曲一日
铁 凝
汪 骏
吴 萍
钟理和
扎西达娃

1982年第11期

燕儿窝之夜(中篇)
世界在他们眼前展开
睡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导演之家
在自然风景区(中篇)
西望博格达
墨渍
桃花汛
身后的黑影

魏继新
罗来勇
程 枫
梁晓声
刘晓喻
陈小初
柏 原
王小鹰
何厚础
万 捷

头条新闻
御厨传奇(中篇)
写给未诞生的孩子
寻觅
脸皮招领启示(外二篇)
红叶,在山那边(中篇)
序奏
大柳树下传奇
月照乡间路
亮雨
新安江上游的传说

张 宇
吴正格
陆星儿
茹志鹃
吴若增
郑万隆
阿 耀
李本深
黄学农
南 丁
丁建顺

1982年第12期

高山下的花环(中篇)
八级工匠
没有想到的事情
关于申请添购一把铁壶的报告
醉人的春夜
黄果兰,更娇艳的黄果兰

李存葆
邓 刚
王路遥
许世杰
吴金良

谭 力、昌 旭

根
夜深了
赶春集

董川风
吴 强
蒲 峻

1983年第3期

锅碗瓢盆交响曲(中篇)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五十周年婚礼日
姜守本进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
快乐王国
九月菊
货场趣闻

蒋子龙
史铁生
苏叔阳
郭建华
高 缨
王左泓
迟松年
王大鹏

1983年第1期

就职宣誓
古墓
大坂
美女陈情
卖书的

徐朝夫
徐孝鱼
张承志
舒 群
杵从巨

1983年第4期

肖尔布拉克
黑骏马(中篇)
青龙潭
爷爷,我自己下海
泥脚
新房

张贤亮
张承志
王 蒙
杨显惠
高晓声
徐恒进

天骄
赶马车的小伙子
同是青山一株草
打电话

1983年第5期

遍地月光
抹不掉的声音
献你一束花
泥活
城南旧事(中篇)
驴队的覆灭
新浴
叙旧记
看车姑娘

1983年第6期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中篇)
三个副师长
最后一个渔佬儿
毕业歌
挑担鱼苗走湖湾
出让冠军的人
马可夫
青青的竹
最后一棵菩提
丰碑

1983年第7期

美食家(中篇)
大山和小船
远方的树(中篇)
片段
木雏
售棉大路
三颗枸杞豆
你说过我们还会相逢

黄放
轩锡明
徐朝夫
郭志一

叶蔚林
肖复兴
冯骥才
房树民
林海音
周崇棕
赵 践
陈椿年
肖克凡

铁 凝
权延赤
李杭育
范小青
姜 滇
蒋志和
简 嘉
韩 起
张 长
李本深

陆文夫
雁 宁
韩少功
王小鹰
林斤澜
莫 言
程 海
刘乃康

夏夜,月儿弯弯

1983年第8期

走进暴风雨(中篇)
兵车行
晚香
黄金心
左撇子球王
“书法家”
雷雨前后
我爱玛莉

1983年第9期

迷人的海(中篇)
哦,穆罕默德·阿麦德
一个复杂的故事
围墙
能人和笨蛋的故事
张团长轶事
瓜棚记
魔术
心,一片远航的帆
姑苏残云
“B52”越过蓝线
古箫

1983年第10期

市场角落的“皇帝”(中篇)
修鞋铺的故事
东方女性(中篇)
有钱十万
人生何处不相逢
陡坡
起名

1983年第11期

条件尚未成熟
荒原作证

侯成路

冯骥才
唐 栋
刘 斌
周宗奇
肖建国
司玉笙
张仁胜
黄春明

邓 刚
王 蒙
绍 六
陆文夫
刘 真
吴 强
肖复兴
阎振新
邓开善
高友群
蒋 巍
李贯通

韩静霆
陈吉蓉
航 鹰
钟道新
柳 杞
孙少山
苏纪迅

张 洁
梁晓声

鲁班的子孙(中篇)

真迹

秋爽

绿茵茵的河岸

邻里之间

加油女工

师表

1983年第12期

秋雪湖之恋

蓝屋(中篇)

啊,白鹭

桥

落花时节

她在桥上走

山里同年哥

死去的和活着的

佳佳的心事

小神仙

1984年第1期

新客规今天生效

花湿红泥村(中篇)

火神(中篇)

一片被吹动的绿叶

热雨

最后的微笑

大票子

风烛残年

1984年第2期

中南海的夜

山风(中篇)

彭成贵老汉

葡萄的精灵

各人头上一方天

一路平安

王润滋

吴翼民、吴凤珍

叶文玲

乌热尔图

王大鹏

吴广宏

吴世祥

石言

程乃珊

陈晓

魏志远、吴雨初、马连义

刘绍棠

朱玉葆

李海音

张波

瞿琮

刘少博

姜汤

姜滇

张一弓

仇学宝

张弦

董秀英

李明

钟道新

舒群

徐孝鱼

马烽

王蒙

杨旭

肖复兴

苦瓜

有这样一个小女兵

1984年第3期

沉沦的土地(中篇)

狱中纪事二题

赵百万的人生片断(中篇)

也是一个中年

归来

沉在水底的司维兹

炊烟

月照襄河渡

1984年第4期

北方的河(中篇)

灵魂

荒岛(中篇)

这该是第七柄枫叶了

村西头有个老天保

远方的夜

死巷

1984年第5期

绿化树(中篇)

历史选择了他

瘦龙岛

惊涛

一千和一

你,在茫茫的人海中 徐耿、程玮

1984年第6期

枫林晚(中篇)

真正的球迷

雪夜来客

明天行动(中篇)

心隙

托乎达森和拜格图尔

我,神奇的指挥棒

张峻

中夙

周梅森

庄启东

浩然

叶九如

陈忠宪

李叶

戴明贤

周元镐

张承志

陈军

张天民

叶楠

权文学

宋学武

姚宜瑛

张贤亮

何晓鲁

邓刚

陈世旭

张抗抗

航鹰

刘进元

冯骥才

郑万隆

王小鹰

李世勋

关鸿

课桌后,一个小小的脑袋
乡邮员的一天
编辑逸事
咖啡馆之

1984年第7期

白与绿(中篇)
“黄埔”五期
一百单八磴
渔眼
两颗行星
响亮的足音
“我是来当儿子的……”
呵,我们的“一线天”
三月桃花水
打错了

1984年第8期

祖母绿(中篇)
麦客
豆腐村的新闻人物
村路带我回家(中篇)
“鸟迷”
谪仙记
避雷针
喜丧

1984年第9期

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中篇) 徐怀中
陪同 石言
路基,长长的路基 钟铁夫
腾跃 达理
昨夜风暴过洞庭(中篇) 赵凤凯
沼泽地 鲁女
意想不到的事情 意西泽仁
爷爷唱的歌 韩建东

马宝康
谈玉忠
贾平凹
梦马林

陈放
周大新
张石山
邓刚
陈继光
张茜菱
仇学宝
姚泽芊
彭见明
刘以鬯

张洁
邵振国
李克定
铁凝
杨建成
白先勇
陈卓乾
章印

选择

1984年第10期

虎门“犬”子(中篇)
指挥员轶事
找乐(中篇)
晚霞
惊涛续篇·车灯
最佳家庭结构
清凉界
红月亮
永恒的瞬间(中篇)

1984年第11期

神鞭(中篇)
中国心(中篇报告小说)
走出狭弄
人人之间
我的同龄人
越狱

1984年第12期

门铃
祝福你,费尔马!(中篇)
尾灯
为了收获
望大陆
龙凤彩带

闰水、陈璇

1984年增刊·中长篇选粹

长篇小说

两代风流 刘亚洲
津门大侠霍元甲(选载) 冯育楠

中篇小说

慈禧墓珍宝失窃案 苏金星

域外小说

女人回来了 (日本)穗积隆信著

丰光

佳峻
张卫明
陈建功
周克芹
陈世旭
肖士庆
尹俊卿
聂鑫森
效耘

冯骥才
刘亚洲
沈善增
王安忆
陆其国
桂雨清

陆文夫
鲍昌
张洁
梁晓声
程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小说月报30年 卷1 1980 - 1984

作者=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

页数= 586

S S 号= 12649146

D X 号= 000006873267

出版日期= 2010 . 02

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中篇小说人到中年	谌容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张一弓
蝴蝶	王蒙
那五	邓友梅
射天狼	朱苏进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
锅碗瓢盆交响曲	蒋子龙
美食家	陆文夫
迷人的海	邓刚
短篇小说西线轶事	徐怀中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张弦
陈奂生上城	高晓声
丹凤眼	陈建功
灵与肉	张贤亮
受戒	汪曾祺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冯骥才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梁晓声
哦，香雪	铁凝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史铁生
编后记	
小说月报三十年总目录（1980～1984）	